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35）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五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五卷

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8日) …… 29
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2日) …… 30
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13日) …… 33
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5日) …… 36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7日) …… 37
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1日) …… 39
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日) …… 40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3日) …… 43
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23日) …… 45
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28—31日) …… 46
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4日) …… 49
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8日) …… 50
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8日) …… 53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8日) …… 56
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8日) …… 57
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0日) …… 59
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30日) …… 62
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5日) …… 64
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9日) …… 67
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15日) …… 68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2日) …… 70
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4日) …… 71
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4日) …… 72
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3日) …… 73
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0日) …… 77

39.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20日) …… 79
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1日) …… 80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4日) …… 82
42.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25日) …… 84
43.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26日) …… 85
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4日) …… 88
45.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12日) …… 89
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6日) …… 92
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18日) …… 94
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8日) …… 95
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30日) …… 98
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1日) …… 98
51.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3日) …… 98
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6日) …… 99
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8日) …… 100
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11日) …… 103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1日) …… 105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0日) …… 107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1日) …… 108
5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2日) …… 110
59.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2日) …… 111
60.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3日) …… 113
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7日) …… 115
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30日) …… 116
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4日) …… 117

6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8日) …… 118
6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8日) …… 119
66.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3日) …… 122
67.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5日) …… 122
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6日) …… 124
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8日) …… 126
70.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9日) …… 127
71.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22日) …… 130

1883年

7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9日) …… 132
7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0日) …… 133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81年1月—1883年3月)

1881年

1. 马克思致沙尔·龙格 (1月4日) …… 139
2. 马克思致某人 (1月31日) …… 143
3.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2月1日) …… 144
4.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2月2日) …… 146
5.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2月19日)…… 147
6. 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2月22日) …… 152
7.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2月24日) …… 155

8. 马克思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 (3月8日) …… 159
9. 恩格斯致斯·弗·考夫曼 (3月11日) …… 161
10.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3月12日) …… 162
11.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3月28日) …… 166
12.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3月30日) …… 166
13.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4月4日) …… 169
14.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4月11日) …… 170
1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4月14日) …… 175
16.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4月28日) …… 177
17.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4月29日) …… 179
18.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5月31日) …… 181
19. 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 (6月2日) …… 184
20.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6月2日) …… 185
21.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6月2日) …… 185
22.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6月6日) …… 186
23.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6月17日) …… 188
24.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6月20日) …… 190
25. 马克思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 (7月2日) …… 194
26. 恩格斯致诺里斯·阿·克洛斯 (7月22日) …… 196
27. 恩格斯致《自由》编辑部 (7月22日) …… 197
28.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7月22日) …… 198
29. 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8月6日) …… 199
30.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8月9日) …… 199
31. 恩格斯致乔治·希普顿 (8月10日) …… 200
32. 恩格斯致乔治·希普顿 (8月15日) …… 202

33.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8月16日) …… 204
34.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8月17日) …… 204
35.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8月18日) …… 209
36.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8月25日) …… 211
37.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8月27日) …… 214
38. 马克思致卡尔·考茨基 (10月1日) …… 217
39. 马克思致敏娜·考茨基 (10月1日) …… 218
40.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0月25日) …… 219
41.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11月4日) …… 227
4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1月30日) …… 228
43.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12月7日) …… 232
44.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12月10日) …… 236
45.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12月13日) …… 237
46.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2月15日) …… 238
47.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12月17日) …… 241
48.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12月18日) …… 243
49. 恩格斯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2月29日) …… 244
50. 恩格斯致列甫·尼古拉也维奇·加特曼 (12月底) …… 245

1882年

51.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1月4日) …… 246
5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月6日) …… 248
53.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1月12日) …… 250
54.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 (1月12日) …… 251
55.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1月23日) …… 252

56.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月25、31日）…… 255
57.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2月7日）…… 260
58.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2月10日）…… 266
59.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2月18日）…… 269
60.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2月22、25日）…… 269
61.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2月23日）…… 280
62.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2月23日）…… 281
63.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3月16日）…… 282
64.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3月20日）…… 285
65.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3月27日）…… 288
66. 恩格斯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3月31日左右）…… 290
67.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4月6、7日）…… 291
68.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4月10日）…… 295
69. 恩格斯致倍尔托特·施帕尔（4月12日）…… 295
70.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4月13日）…… 296
71.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4月13—14日）…… 297
7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4月17日）…… 304
73.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4月21日）…… 305
74.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4月28日）…… 306
7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5月3日）…… 307
76.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5月6日）…… 309
77.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5月8日）…… 310
7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5月10日）…… 311
7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5月16日）…… 314
80.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5月21日）…… 318

81.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5月26日） …… 319
82.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5月28日） …… 320
83.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6月4日） …… 324
84.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6月17日） …… 325
85.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6月20日） … 326
86.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6月21日） …… 328
87.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6月26日） …… 332
8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7月15日） …… 337
89.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 （7月25日） …… 339
90.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7月31日） … 341
91.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8月9日） …… 342
9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8月9日） …… 343
93.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8月10日） … 346
94.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8月20日） …… 347
95.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8月27日） …… 349
96.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9月12日） …… 351
97.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9月13日） …… 354
98.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9月20日） …… 357
99.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9月22日） …… 360
100.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9月23日） …… 363
101.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10月9日） …… 367
10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0月20日） …… 369
103.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10月21日） …… 372
104.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0月27日） …… 375
105.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0月28日） …… 378

106.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10月30日) …… 381
107.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1月2—3日) …… 382
10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1月4日) …… 388
109.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1月9、16日) …… 393
110.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11月10日) …… 396
111.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11月15日) …… 398
11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1月28日) …… 399
113.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12月14日) …… 404
114.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12月14日) …… 405
115.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12月15日) …… 407
116.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12月16日) …… 409
117.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2月16日) …… 412
11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2月22日) …… 414
119.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12月23日) …… 417

1883年

120.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1月8日) …… 419
121.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1月9日) …… 420
122.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1月10日) …… 422
123.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月18日) …… 423
124.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2月8日) …… 426
12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2月10日) …… 429
126.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2月10日) …… 430
127.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2月16—17日) …… 433

12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2月27日) …… 437
129.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2月27、28日,3月1日) …… 441
130.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3月2日) …… 447
131.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3月7日) …… 450
132.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3月10日) …… 452
133. 恩格斯致沙尔·龙格 (3月14日) …… 454
13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3月14日) … 454
13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3月14日) …… 455
136.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3月14日) …… 456
137.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3月15日) …… 457
138.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3月15日) … 458
139.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3月15日) …… 461
140. 恩格斯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 (3月16日) …… 461
141.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3月24日) … 462
142.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3月25日) …… 463
143.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库诺 (3月29日) … 464

注释 …… 467—539
人名索引 …… 540—579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 580—602
期刊索引 …… 603—610。

插　图

卡尔·马克思 (1882年) …… 50—51

1870年9月至1894年10月恩格斯在伦敦住过的房子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160—161
燕妮·马克思（晚年）…… 240—241
燕妮·马克思—龙格…… 424—425
伦敦海格特公墓内的卡尔·马克思墓
（1956年建立纪念碑之前）…… 460—46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书　　信

1881年1月—1883年3月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81年1月—1883年3月

1881年

1881年

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伊斯特勃恩[1]

1881年7月7日于　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①

亲爱的摩尔：

我在上一封信中完全忘了谈钱的问题；肖莱马在场，使我的行动受了点约束。你现在可以得到一百到一百二十英镑。只是要问一下，你是不是想一次全拿到手，如果不是，给你寄多少，这里留多少？你收到这封信时，请立即作出决定，以便我明天就可以收到回信。肖莱马和彭普斯明晚恰好要去看戏，而我留在家里，这样我就可以立即用琳蘅的名字开一张支票并带给她；你的夫人或你可以决定如何处理这笔钱。

杜西和多·梅特兰两人都演得很好。小姑娘十分沉着，在舞台上显得很可爱。杜西在充满激情的场面中演得很出色，但是看得出来，她是在模仿艾伦·特里，就象雷德福模仿厄尔文一样。不

① 自1870年11月到1894年10月初恩格斯住在这里。——编者注

过她很快就会改掉这种习惯的。如果她想给观众留下印象，就一定得发展自己的风格，而这一点她自然是能做到的。

听说海洋空气到目前为止对你的夫人还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在初期往往是这样的，但愿以后会产生这种效果。

彭普斯星期一[①]要和肖莱马一起去曼彻斯特把小莉迪娅接回来。听说你们已写信给杜西，要她到你们那里去；这样，我可能要过些时候，等彭普斯回到这里以后再走。我们大概很快要去布里德林顿码头，然后，等肖莱马从德国回来，同他一起去泽稷岛；至少现在的打算是这样。

我们大家向你的夫人和你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恩·

2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2]

1881年7月27日于阿尔让台镇
梯也尔林荫路11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不能在信里详谈，因为我有一大批信要寄发，而且孩子们[②]有权利占去我的头一天。

从伦敦到多维尔的旅行，正象所希望的那样，很顺利。这就

---

① 7月11日。——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外孙：让·龙格、昂利·龙格，埃德加尔·龙格和马赛尔·龙格。——编者注

是说，当我们从梅特兰公园[1]动身的时候，我妻子感到很不舒服，但后来并没有因旅行而有什么恶化。一上船，她立即进入妇女室，找了一个漂亮的沙发躺下。当时天气十分好，海面非常平静。在加来上岸时，她的状况比离开伦敦时要好，因而决定继续旅行。按照我们的票，去巴黎途中只有加来和亚眠两个站可以中途下来。她认为亚眠太近了（从那里到巴黎大约有两小时路程），用不着停留。从亚眠到克雷途中，她觉得要腹泻了，肚子也疼得越来越厉害。车在克雷只停留三分钟，然而她总算用上了这个时间。我们于晚七时半抵达巴黎，龙格在车站上接到了我们。然而要等着坐从这一站开往阿尔让台的直达车，时间太晚了。因此，海关官员检查完行李，我们就坐马车前往圣拉查尔车站，在那里稍等了一会，就乘火车前往目的地，而我们到达时才十点钟左右。当时她觉得很不好受，不过今晨（至少是现在，即十点钟左右）她的感觉比通常在伦敦同一时候要好些。无论如何，回去时在中途必须有更多的停歇才行。

龙格今天将把我介绍给他的医生[2]，这样，腹泻一旦再犯，就可以立即采取措施。

我们看到这儿大家都很健康。只是琼尼和哈利由于气温的变化（白天的酷热严重地威胁着所有的孩子们，特别是琼尼）有点感冒。住宅是一座避暑别墅，非常豪华，看来以前是供某富翁避暑用的。

向彭普斯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摩尔

---

① 梅特兰公园路41号（马克思和他的一家自1875年3月到他逝世止住在这里）。——编者注

② 杜尔朗。——编者注

看样子，杜西已经把我的到来一事写信告诉了她在巴黎的通信者①，所以龙格对我说，我的到来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他说，《无政府主义者报》将把对选举运动[3]不怀好意的罪名强加于我。克列孟梭对他说，对于警察我根本用不着担心。

3
恩格斯致马克思
阿尔让台

1881年7月29日于约克郡
布里德林顿码头望海路1号

亲爱的摩尔：

昨天早晨还在我们动身[4]之前收到了你的信，知道你们一路还比较顺利，我很高兴。你打算在回来的路上作些停歇，这很对，让这样一个病人连续支撑十二个小时，的确太冒险了。但愿空气和环境的改变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我们十点半起程，五点零五分到达这里，我少了只箱子，不知是在什么地方搞错了，不过晚上就找到了。我们花了大约十五分钟的时间找到了一个漂亮而价钱又不太贵的住所（和去年的那两间相似，但在各方面都好得多）。昨天下了一点雨，不过看来今天正在逐渐转晴。为了消度近来我们在伦敦又常常遇到的那种雨天，前天我从杜西那里拿来了斯卡尔金的著作和毛勒关于领主庄园的前两卷著作[5]。

① 卡尔·希尔施。——编者注

我们想在这儿先住三个星期，也许四个星期，这要看天气和其它情况而定。我这里有支票；要是你需要什么，请不要客气，告诉我你所需要的大致数目。你的夫人绝对不应克己了；她想要什么或者你们知道她喜欢什么，都应该使她得到满足。

杜西前天还在我们这里，我和她一道去取书，而且和她一起喝了非喝不可的比尔森啤酒。在这里没有德国啤酒也可以过得去。码头上的小咖啡馆里的苦麦酒好极了，和德国啤酒一样起沫。

请尽快来信，告知近况。

我们大家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燕妮。彭普斯嘱咐特别问候琼尼，我也是这样。还请代向龙格致意。

你的　弗·恩·

4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里德林顿码头

1881年8月3日于阿尔让台镇
梯也尔林荫路11号

亲爱的弗雷德：

我在经济方面不得不这样压榨你，使我很为苦恼。但是由于最近两年来我们家务中出现的混乱，我欠下了各种各样的债务，这一切很久以来就使我感到很大负担。本月15日我得付给伦敦方面三十英镑，这件事从我们离开伦敦的那天起就一直压在我的心头。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和在伊斯特勃

恩[1]一样，总是时好时坏，不同的只是可怕的疼痛来得很突然，例如昨天就是这样。我们的杜尔朗医生是一个很出色的医生，幸好住得离我们很近，他立即采取了措施，使用了唐金有意储存下来的一种烈性麻醉药。在这以后她①一夜睡得很好，今天的感觉如此之好，一反常态在早晨十一点钟就起床了，并且同燕妮和孩子们②一起逗乐取笑。(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腹泻就停止了。杜尔朗一开始就说：如果这只是偶然现象，那就没有什么要紧，但也可能是内脏本身受感染的症状。幸好不是这种情况。)

暂时的“好转”当然并没有阻止病情的自然发展，不过它却使我的妻子产生错觉，并使燕妮坚定了（虽然我表示过不同意见）必须尽可能在阿尔让台久住的信念。我对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所以更加担心。昨天夜里实际上我是第一次又睡得比较安稳。我觉得我头昏脑胀，好象头脑里有架水车在转动一样③。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呆在阿尔让台，既没有访问过巴黎，也没有写信鼓励巴黎的任何人来看我。希尔施在《正义报》编辑部里对这种“禁忌”已经向龙格表示了完全合理的惊讶。

此外，在最近的五天里，这里演出了一场科采布式的戏剧。

燕妮找到了一个很活泼的农村年轻姑娘作厨子，燕妮对她各方面都满意，因为她对待孩子们也很亲热。她从最后的女主人雷诺医生（也是阿尔让台的一位医生）的夫人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个“否定的”评价，她就自动离职了。龙格的老母亲一有机会就想对燕妮实行专制，她对这件事非常不满意，认为主动地给雷诺

---

① 燕妮·马克思。—— 编者注
② 燕妮·龙格和她的孩子：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 编者注
③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书斋》）。—— 编者注

夫人写信是一件最刻不容缓的事。

雷诺太太是个漂亮的卖弄风骚的女人，她的丈夫是头野驴。所以这对夫妇家里发生的事在阿尔让台议论纷纷。他们不知道，他们以前的女仆就在同一个镇上重新找到了工作，并且还是在杜尔朗医生的密友龙格先生家里，而杜尔朗医生的妻子却是雷诺太太的情敌！这是值得注意的。

果然在一个美好的早晨雷诺太太来了——在此以前她本人和小燕妮并不相识——，她告诉小燕妮，这个姑娘和男人们有不清白之事（而这位太太呢？），此外更坏的是，这个姑娘是个小偷，偷了她本人的一只金戒指；雷诺太太向燕妮保证，她愿意在家庭范围内调解这件事而不诉诸“当局”，等等。总之，小燕妮把姑娘叫来了，雷诺太太劝告她，同时又威吓她，姑娘承认了，把戒指还给了她……接着雷诺医生向民事法官告发了不幸者。结局是：昨天她被送到凡尔赛，交给了法院侦查员。你知道，在罗马法里，家庭= 奴隶，法典[1]作为罗马法的残余，它把那些通常属于违警法庭审理的轻微犯罪行为转交给陪审法庭审讯。

燕妮在此期间在民事法官——一个好样的人——那里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步骤，不过事情已由不得他了，因为已对这个姑娘正式提出起诉。他记下了燕妮的证词，也把她指出的雷诺太太不合法律的诉讼程序记录在案了，这些对姑娘毕竟是有利的。

燕妮为姑娘辩护使民事法官感到惊奇，但是他还是很幽默地对待这一切。他问她：“您这岂不是为盗窃行为辩护吗？”——“当然不是，先生，还是请您先从逮捕阿尔让台的，而且还要加上

① Code pénal（法国的刑法典）。——编者注

巴黎的所有大盗贼做起吧!”

直接的后果是，她仍然没有厨子。伦敦来的笨姑娘——以前在我们那里呆过的卡里的妹妹——在这方面完全不行，何况她为四个孩子的事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顺便说一下。顶替了希尔施在《福斯报》的位置的那个诺尔多获得了法国勋章！为此希尔施在《正义报》上揭露了他。《正义报》抨击内阁说，它竟把勋章发给一个诽谤法国的人 (诺尔多是德匈犹太人，他为了维护俾斯麦，曾写书反对梯索的关于《真正数十亿的国家》的著作[6])，就象发给想使美丽的法国承担一百亿而不是五十亿赔款[7]的布莱希勒德一样。

现在正在巴黎的蠢驴诺尔多写了一封信答复《正义报》，信中把自己打扮成法国的卫士，不过他当即被《正义报》和第二天的《法兰西共和国报》给揭穿了。

祝好。

你的 摩尔

5
恩格斯致马克思
阿尔让台

1881年8月6日于约克郡
布里德林顿码头望海路1号

亲爱的摩尔：

你的信前天晚上寄到这里的时候，由于信封的缘故，几乎是开口的。已经约定好昨天去弗兰伯勒角游玩，所以今天才给你回信。

微不足道的三十英镑，你不必挂在心上。如果你没有不同意见，我就如数把支票及时寄给杜西，而由你给她以必要的吩咐。如果你需要更多一些，请告诉我，我把支票的数额开大一些。因为我随身只带了几张空白支票，这些我还需将就着用。

非常感谢你告诉我关于病人[①]的消息。如果我处于你的地位，我就会尽可能准确地遵守唐金规定的期限。你那里的医生[②]肯定会在这方面帮助你的。如果疼痛加剧，甚至可能在途中发作，这样你们就会狼狈不堪。

关于女仆的事，我们无论如何比可怜的小燕妮更觉得可笑；幸好目前至少有个琳蘅在她那里！真不知道，在这样两位法国资产者中间，该是哪一位使我们更为吃惊：是借口为燕妮寻找品德好的女仆而一心一意使燕妮经常没有女仆的龙格的老母亲呢，还是一旦收回戒指就违背自己的合乎公德的诺言（没有诺言她是绝对收不回自己的戒指的）的诚实的医生夫人[③]？

这里的一切活动和通常的海滨疗养区一样，十分枯燥无味；而且很遗憾，我不得不停止游泳，因为它总是使我的听力愈来愈差。这对我来说是十分难受的，但也只能这样，如果我不想过早地象奥耳索普那样变聋的话。我今天写信给劳拉，邀她来这里住一些时候，这样她就可以安排在你们回去的时候再回到伦敦，或者随后很快就回去。

附上龚佩尔特的来信，它会使你吃惊的。用不着我对你说，信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② 杜尔朗。——编者注
③ 雷诺。——编者注

里谈的是伦敦的贝尔塔·伯克尔那个住在曼彻斯特的姐妹的事[①]。

给诺尔多授勋章一事的确令人不解。还在不久以前，我就在《科伦日报》上看到了一篇对于他那本厚颜无耻的书《真正数十亿的国家的纪事》[8]大加赞许的评论。不过与布莱希勒德作对比还是对的，因为诺尔多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这个国家里，还可榨取很多东西。这一点，饥饿的普鲁士容克们自然是会牢记在心的。

我的墨水快用完了，剩下一点刚够给劳拉写信，所以就用向你们大家致衷心的问候来作结尾。

你的　弗·恩·

你不管希尔施之流，除你认为必要的以外，不多为巴黎分神，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6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里德林顿码头

1881年8月9日　[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弗雷德：

刚刚收到你的信。这封信我用挂号寄发；龙格说，不必考虑信被拆开的事；不过挂号信，特别是在阿尔让台这种小地方，发送得快一些。

---

① 见本卷第17页。—— 编者注

星期六[①]我们带着我妻子到巴黎去了一趟，她坐在敞篷车子里观看了巴黎；她很喜欢这个城市（它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永远不散的集市）。当然我们在中途停歇了几次，并且在咖啡馆前面的凉台上休息了一会。归途中她一度感到不适，尽管如此，她还想再去。

她的情况和平常一样，有时感到难以忍受，有时接连几个小时又好一点。由于越来越消瘦而更加虚弱了。昨天有小量的出血，医生[②]认为这是虚弱的症状。我告诉他，我们应当严肃地考虑回家的问题；他说，还可以等几天再作出最后决定。燕妮自己弄得我很不好办：我向她说了本星期末回去的事，而她却把大批衣物送到洗衣店去了，这些东西下星期初是取不回来的。无论如何我一定打电报把我们动身的日期告诉你（如果事先来不及写信通知的话）。奇怪的是，虽然我夜间睡眠很不好，而且白天操心和令人着急的事也不少，可是大家都说我脸色很好，而这也是符合实际的。

小燕妮气喘很厉害，因为房间里穿堂风很大，不过这孩子和往常一样，表现得很顽强。

星期天我要带海伦[③]去看看巴黎，因此事先给希尔施写了一封信，而且正赶巧了。他已经准备动身（这使考布很为遗憾并使他的妻子感到伤心）去德国。他想向德国党的领导人表明，遭受警察的威胁，没什么奇怪的。昨天他走了。

昨天雅克拉尔和他的俄国妻子[④]这可爱的一对曾在这里吃早饭。今天还要招待利沙加勒和我们医生的妻子（和她的姐妹）。

---

① 8月6日。—— 编者注
② 杜尔朗。—— 编者注
③ 德穆特。—— 编者注
④ 安·瓦·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 编者注

我们从雅克拉尔那里得知，他曾参加过巴提诺尔的竞选大会[3]，作为候选人出席的有：昂利·马雷、我们的雷尼亚尔博士以及……皮阿，皮阿突然地——自然得到警察许可——出人意料地在那里出现了。他遭到了难堪的嘲笑。当他谈到公社的时候，爆发了一片喊声："你们背叛了它！"雷尼亚尔的成就也并不大些。为了显示自己的反常和深奥，这个傻瓜一开始便宣称："我反对自由！"全场发出了一片叫喊声。他接着作了解释，说他指的是"修道会的自由"，这已无济于事。这位文化战士失败了，昂利·马雷也是如此。

或许极左派在人数上会有所增加，但主要的结局大概将是甘必大取胜。在法国的条件下，短促的选举时间会使那些掌握着无数"阵地"的骗子手们——那些能分配政府机构职位和支配"国库"等等的人取得优势。如果"格雷维分子"[①]在甘必大最近几次遭到失败后有力量把他的拥护者卡佐、孔斯旦和法尔赶出内阁，那他们就能击败甘必大。"既然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追逐职位的人、证券投机商及其他许多人对自己说，——可见甘必大是个真正的人物！他们不敢攻击他的阵地，不能指靠他们。"尽管他干了种种蠢事，但激进的和反动的报纸每天对他进行的全面攻击只是加强他的地位。何况，农民还把甘必大看作是可能的共和主义的最极端的代表。

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还给小杜西去了一封信，给了她一些必要的吩咐。我还需要一点钱，因为这次旅行的花费大些（此外，医生认为，由于有海洋空气，在布伦呆一些日子对病人会起良好的作用），需付给医生相当数目的款子，还要以某种方式偿还我们使

① 茹尔·格雷维的信徒。——编者注

小燕妮负担的花销。

龚佩尔特在建立第三个 (或者是第二个) 家庭。恭喜！对一个医生来说，这种行动是合理的。关于伯克尔女士，我的妻子在曼彻斯特听到了各方面的赞许。

祝好。

你的 摩尔

比斯利越来越使自己处于可笑的境地。魏勒尔本该制止在《劳动旗帜报》上颂扬麦克斯·希尔施。[9]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阿尔让台

1881年8月11日于约克郡
布里德林顿码头望海路1号

亲爱的摩尔：

你的挂号信昨天晚上收到了，不过仍然是开口的，而且这次是完全开口的。我把信封给你附上，你可以看看，它甚至没有粘住。

刚刚给杜西用挂号寄去一张五十英镑的支票。如果你想把其余的二十英镑 (你要的三十英镑以外的) 中的一部分或全部寄到巴黎去，那么由杜西来办比你去兑换直接给你寄到伦敦的支票要快些。寄往巴黎的汇票，杜西很容易收到。

关于法国的选举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这个议院反正开会开不长，连名投票法一旦施行，它很快就会再度被解散。

昨天早晨我通知希普顿先生[①]说，他再也不能从我这里得到社论了。[10]考茨基给我寄来一篇关于国际工厂立法的软弱无力的作品，译文很糟，我作了修改并寄给了希普顿。[11]昨天收到了校样和希普顿的信，有两处他觉得"太激烈了"，并且对其中一处他还有误解；他问我是否同意把它们改得缓和些。我已做了并答复如下：

⑴ 星期二[②]建议我作修改（信是星期三收到的），而我的答复要到星期四，即在报纸[③]出版之后才能寄到伦敦，这有什么意思；

⑵ 如果这对他来说太激烈，那末对于我的还要激烈得多的文章他更该觉得是这样了，所以如果我停止供稿，对我们双方都会更好一些；

⑶ 我的时间不再允许今后每周定期写社论。此事我本来打算在工联代表大会（九月份）[12]之后通知他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我现在就停止供稿，也许他在这次代表大会面前的处境会得到改善；

⑷ 毫无疑问，他有责任在关于麦克斯·希尔施的文章[9]排印之前把它拿给我看看。我不能继续担任"报纸的撰稿人了，因为它极力颂扬德国工会，而这些工会只能与被中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中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相比。"另外我祝他一切幸运等等。这封信他今天早晨已经收到了。

最主要的原因我没有告诉他：就是我的那些文章对该报的其他东西和对读者不起任何影响。如果多少有点影响的话，那就是来自自由贸易的秘密信徒方面的不显露的反应。报纸依然是各种

---

① 见本卷第200—201页。——编者注
② 8月9日。——编者注
③ 《劳动旗帜报》。——编者注

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幻想的混合物，而在具体政治问题上或多或少地——毋宁说是更多地——倾向于格莱斯顿。在一期或两期报上似乎出现过的反应又不见了。不列颠工人完全不想再继续前进，他们只有通过事变，通过工业垄断权的丧失，才能振作起来。而暂时也只能是这样。

我们住在这里到今天已两个星期了，天气变化无常，大部分时间都很冷，并且经常是阴天；不过雨下得并不那么多。我们在这里至少还要再呆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但无论如何不会更久。

我自从到这里以后，看的是《每日新闻》而不是《旗帜报》。该报蠢得不可思议：鼓吹反对活体解剖！而在消息方面它同《旗帜报》一样贫乏。

希尔施的消遣旅行[1]会给他带来害处；但对他毫无办法。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弗·恩·

8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里德林顿码头

1881年8月16日 [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恩格斯：

我们明天必须动身，因为我收到梅特兰小姐的信，说杜西病得很厉害，不让梅特兰小姐继续照看她，也不找医生看，等等。或

---

① 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许，甚至很可能得琳蘅陪妈妈[①]去伦敦；而我必须立即（也就是说明天）到那里去。

你的　卡·马·

关于杜西的情况我当即写信给唐金医生了；但可能他已不在伦敦。

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81年8月17日于约克郡
布里德林顿码头望海路1号

亲爱的摩尔：

刚刚收到你的电报。但愿你的夫人很好地经受住了这次旅行。我所以这么说，是由于看来你们是坐夜班轮船到达的。情况怎样，请来信谈谈。

我们动身的日期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到明天我们这一周就要结束了，但由于种种情况，我们没有准备好。接到你的电报后，我们和女房东商定了下半个星期的房租。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我们将在下星期一[②]晚上回到伦敦。天气几乎老是阴沉沉的，变化无常而且寒冷，从昨天起干脆下起雨来了。布里德林顿码头在这种情况下令人感到极为无聊。

---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② 8月22日。——编者注

甘必大在夏隆被哄下台去，这太好了！[13]

你的 弗·恩·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81 年 8 月 18 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望海路 1 号

亲爱的摩尔：

昨天晚上才收到你从阿尔让台寄来的信，知道了你突然到来的原因。但愿杜西的病实际上并不严重，—— 她前天还给我写了一封有趣的信；无论如何，希望今晚或明早能得到详细的情况，并得知你的夫人是否和你一起到了布伦或加来，以及她是否留在那里了。

昨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没用参考书便研究了你的数学手稿，我高兴地看到，我用不着其他书籍。为此我向你祝贺。事情是这样清楚，真是奇怪，为什么数学家们要那样顽固地坚持把它搞得神秘莫测。不过这是那些先生们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造成的。肯定地、直截了当地令$\frac{dy}{dx}=\frac{0}{0}$，这个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是没有的。但是很明显，只有当量 x 和 y 的最后的痕迹消失，剩下的只是它们的变化过程的表示式而不带任何量时，$\frac{dy}{dx}$才能真正表示出在 x 和 y 上已经完成了的过程。

你无需害怕在这方面会有数学家走在你的前面。这种求微分的方法其实比所有其它的方法要简单得多，所以我刚才就运用它

求出了一个我一时忘记了的公式，然后又用普通的方法对它进行了验证。这种方法很值得注意，尤其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通常的方法忽略了dxdy等是完全错误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frac{dy}{dx}=\frac{0}{0}$时，而且只有那时演算在数学上才是绝对正确的。

所以，老黑格尔猜得完全正确，他说，微分法作为一个基本条件要求两个变量都有不同的幂，并且至少其中的一个变量是二次或1/2次幂[14]。现在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了。

当我们说，在y=f(x)这个公式中，x和y是变量，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一步，那末这只是一个没有任何进一步结果的论断，而x和y暂时事实上仍然是常数。只有当它们真正地，也就是在函数内部变化时，它们才真正成为变量，而且只有那时，才能显示出隐藏于最初的方程式中的不只是两个量本身的关系，而是它们的可变性的关系。最初的微商$\frac{\Delta y}{\Delta x}$表示在实际变化过程中，即在每一特定的变化当中，这种关系是如何发生的；最后的微商$\frac{dy}{dx}$才表现出它的普遍的、纯粹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由$\frac{dy}{dx}$得出任何的$\frac{\Delta y}{\Delta x}$，而$\frac{\Delta y}{\Delta x}$本身永远只适应于个别场合。但为了从个别场合得出一般关系，个别场合本身应当予以抛弃。所以当函数完成由x到x'的过程，并带着该过程的全部后果之后，可以放心地把x'重新取做x；这已不是原来的x，只是按名称来说还是变量x，它已经过了真正的变化，而且，即使我们重新把它本身抛弃，变化的结果仍保留着。

最后，这里一下子弄清了许多数学家早就断言过，但是他们未能提出合理论据来加以维护的一点，即：微商是最初的，而微分dx和dy是推导出来的：推出这个公式本身要求，这两个所谓

无理因子首先构成方程的一方，只有等到使方程回到它的这一本来的形式$\frac{dy}{dx}=f(x)$的时候，才能用它来作点什么，才使无理的表示式被消除，而代之以有理的表示式。

这件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以致我不仅考虑了一整天，而且作梦也在考虑它：昨天晚上我梦见我把自己的领扣交给一个青年人去求微分，而他拿着领扣溜掉了。

你的　弗·恩·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里德林顿码头

1881年8月18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大概你现在已经收到我前天从阿尔让台给你写的短信。从信中你可以知道，我一个人来到这里，没有带我的妻子（不是象你信里所当然设想的那样同她一起来的）。

接到杜西病情的消息后，我决定尽可能当天就动身；我的妻子则应同海伦[①]一起于今天出发，而且是乘头等车，先到亚眠，在那里过夜，然后过一天到布伦，在那里至少休息一天，如果她愿意的话，住两天或者三天；从那里去福克斯顿，此后再根据她的身体情况由那里直接回伦敦，或者乘以后的任何一班车回来（我觉得最好是后一种办法）。把她留下，我自然是很难过的。但真正

① 德穆特。——编者注

能给予她帮助的是海伦，我自己在跟前对她并不是绝对必要的。此外，我的离开迫使她终于下决心告别阿尔让台，由于身体越来越虚弱，这确实是必要的。

这样，星期二[①]晚七点三刻我乘特别快车离开巴黎，途经加来，约于晨六点钟抵达伦敦。

我当即给唐金医生打了电报，而他到来时已是上午近十一点了，他给杜西作了长时间的检查。她的神经处于极度的抑制状态；她已经好几个星期几乎什么都没有吃了，吃的东西比唐纳医生在其实验时吃的还要少[15]。唐金说，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心脏正常，肺部正常，等等。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胃的功能完全紊乱，不能接受食物（大量饮茶使病情更为恶化；医生立即完全禁止她喝茶）和神经系统严重的过度紧张，因此出现失眠、神经痛的痉挛等等。奇怪的是这种衰弱现象早先没有出现过。他立即采取坚决措施并告诉她——对这样一个固执的女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她要是一个听话的病人，就没有任何危险；但她如继续固执己见，就一切都徒劳无益（他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幸好她答应听话，既然答应了，她是会履行诺言的。唐金说，以后她应当离开此地去散散心。

我之所以提前出发，还因为我知道唐金在 8 月 17 日以后要去赫布里底群岛休假。为了杜西，他在这里呆到星期六，然后留一个代替的人来照管杜西和我的妻子。

最近一次选民大会——在这个会上，甘必大先生从会场内知道了他第一次在伯利维尔大会[16]时只是从会场外的人群那里得知

① 8 月 16 日。——编者注

的东西——的参加者也都是些由甘必大自己的委员会所邀请的人，这些人还是经过委员会任命的委员们的两次清洗以后才准予参加的。因此，这场丑剧便更为意味深长。两次笼罩会场的喊声都是：加利费！甘必大由此得到一条教训，就是意大利的无耻行径在巴黎是吃不开的。罗什弗尔如能公开发表演说，并能直接被提为竞选人，甘必大无疑会遭到失败。伯利维尔的工人居民由于公社事件减少了将近两万人，其大部分被小资产者所取代了。在这种情况下，伯利维尔（两个区）无论是留下来的，还是新补充进来的居民都是最落后的；他们的理想人物，超过甘必大的，就是罗什弗尔了；这两个人1869年都在那里被选为议员。

至于在巴黎的工人党的状况，一个在这点上毫无偏见的人，即利沙加勒承认，它虽然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只有它一个算是站在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政党对面的。它的组织虽然还很弱并且多多少少是空的，但毕竟是有足够纪律性的：它能在所有各区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能在各种集会上引人注目并使官方人士感到伤脑筋。我自己从这方面注意了巴黎各种色彩的报纸，没有一家报纸不被激起反对这个共同的祸患——集体主义工人党[17]。

关于工人党领袖们的最后分裂，最好是我以后口头告诉你。

衷心问候彭普斯和伦德斯顿小姐。

你的　摩尔

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布里德林顿码头

1881年8月19日夜11时半 [于伦敦]

妈妈[①]和海伦[②]刚刚经过福克斯顿到达这里，他们在布伦停留了一下。

我没有写信告诉你，龙格和小哈利都病得很厉害。目前家里尽是不幸的事。

祝好。

卡·马·

① 燕妮·马克思。—— 编者注
② 德穆特。—— 编者注

1882年

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1月5日于文特诺尔市
圣博尼费斯花园1号

亲爱的弗雷德：

白天寒冷而且下雨，夜里有风暴，这就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这里[18]碰到的天气和气候的一般特点。只有昨天例外：阳光灿烂，天气干燥。从杜西接到的书信看来，英国南海岸到处如此。为数众多的初愈病人及其他人士到处感到失望。走着瞧吧！也许天气会好转的。

现在我也戴上了（需要时）“笼口”，换个说法就是口罩，这使我在做必要的散步时少受一点天气变化的影响。

咳嗽或支气管卡他还是很顽固，而且令人难受，但好象有好转，夜里不用服药能稍为睡几个小时，尽管附近海面上风声怒吼；这种闹声反而能帮助入睡。

我的同伴杜西被神经性抽搐和失眠等症折磨得很痛苦。但愿经常在新鲜空气中散步（因为她每天都为种种事情到“城”里

去)，会对她起良好的作用。

自由协会的通告——就是不知道是北明翰的还是其他城市的[19]——真使我感到好笑，通告说，在一个什么周年庆祝会上，不仅老布莱特，著名的教区委员和竞选老手张伯伦要发表演说，而且老奥巴德亚①的“儿子”小约翰②·布莱特先生和几位科布顿“小姐”也将光临。没有说起，是把一位科布顿“小姐”还是把她们全都嫁给年青的奥巴德亚，以便用最适当和最可靠的办法延续布莱特—科布顿的宗嗣。另一个场面是在阿伯康领导下召开的都柏林三千大地主大会[20]，他们唯一的目的是“维护……这个王国中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和自由”。这些人物对副专员的愤怒是可笑的。不过，他们反对格莱斯顿的论战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只是他的高压法和他的五万士兵[21](更不要说警察了)才使这些先生们能对他进行这样的批评和威胁。所有这些喧嚣自然为的是要约翰牛准备清偿“赔偿费”。他这是活该。

从附上的狄慈根的信中你可看出，这个不幸的人倒退地“发展了”，并正好“走到了”《现象学》③那里。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无可挽救的。

我还收到莱茵哈特自巴黎寄来的一份很亲切的表示同情的信，他还让我也问候你。他对我的终生伴侣④一直怀着极大的好感。

我希望能重新恢复工作能力；遗憾的是离这一点还很远。

---

① 奥巴德亚 (Obadiah)：战栗教徒的英国旧绰号 (取自古犹太传说中一个先知的名字)。——编者注
② 原稿为：“杰科布”。——编者注
③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编者注
④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杜西向你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摩尔

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 特 诺 尔

1882年1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我们高兴地得知，你们[①]的沉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另外，虽因天气不利，你的健康状况未能得到重大改善，但毕竟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复发的危险几乎完全消除了，而这也正是要你到文特诺尔去的主要目的。

这里的节日明天即将结束，肖莱马要回曼彻斯特去了，辛勤的工作又将开始，我为此高兴，否则就过分了。星期二在琳蘅那里，星期五在彭普斯那里，昨天在拉法格那里，今天在我这里——而早晨总是比尔森啤酒——，不能老是这样继续下去。琳蘅自然一直同我们在一起，所以她不怎么感到孤单。

在收到这封短信之前，你大概在欣赏老威廉[②]的冠冕堂皇的宣言。他在宣言里声明支持俾斯麦，并宣称这一切都是他的自由意旨。[22]关于在普鲁士由来已久的国王人身不可侵犯的那个地方也很不错。尤其是面对着诺比林的散弹。[23]这对亚历山大二世和三

① 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世是个极好的安慰，他们的人身是不可侵犯的呀！此外，读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时，人们会觉得似乎处在查理十世时代的模仿剧之中。

《旗帜报》又刊登了一篇奇文，是一个俄国将军写的关于局势和虚无主义者[24]的一封信，它和 1845 年普鲁士的将军们所写所说的关于蛊惑者[25]、自由派、犹太人、法国的可恶原则和健康的民众核心对国王的永恒普遍忠诚的言论完全一样，这些自然并没能使革命停止过一天。你看到，地方自治局是怎样造伊格纳切夫的反的；有时用请愿的方式；有时就干脆拒绝参加会议。[26]这是非常重大的步骤，是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官方团体迈出的第一步。

但愿你们和我们这里都有好天气。你们避开了昨天的西北风，这很好。肖莱马和我闲逛了一天，十二点半还从劳拉那里把琳蘅送回家去，全部路程都是步行的。今天是讨厌的雨天，然而趁一时的好转，我们和前天回到此地的赛姆·穆尔还是蹓跶了一小时。现在外边又刮起了大风。杜西的身体怎样？我们大家问候她和你。

你的　弗·恩·

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 年 1 月 12 日于文特诺尔市
圣博尼费斯花园 1 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在这里再呆一个星期试试看（今天开始第三个星期）；直到

现在天气没有丝毫好转，反而更坏了。杜西星期一到伦敦去参加一场戏的演出，然后再回到这里来。

我离开伦敦时，把你给我的四十英镑花了将近二十英镑，用于必要开支。这里每星期的房租是两基尼，加上煤和煤气，除了其它额外开支，大约要两英镑十五先令；其它开支一星期约四基尼。这个窝巢由于气候优越竟需要这么大的开销。连同旅费我共花了大约十七英镑，只剩下五英镑了，这不够最后一个星期的开支 (包括杜西计划外的伦敦之行以及下周我们可能一起返回的费用)。如果你在下星期一以前能再给我寄几英镑来，我将十分感谢。

至于下一步的计划，首先应把杜西从给我作伴的角色中解放出来 (如果再出去，我完全可以不要人作伴)。这孩子的精神处于抑制状态，这非常有害于她的健康。无论是旅行，无论是改换气候条件，无论是医生，在这种情况下都无济于事。唯一能够为她做到的，是满足她的愿望，让她在杨格夫人那里学完她的戏剧课程。她急切地热望，以此来开始她所希望的那种独立的、活跃的演员生涯，如果同意这一点，那末她认为这样的年纪，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种想法无论如何是正确的。我根本不想让孩子认为，似乎她当了老头子的“护士”，成了家庭的牺牲品。事实上，我确信，当前杨格夫人才是她唯一的医生。她是个不外露的人，我说的这些是我观察到的，而不是她自己说的。刚刚谈的这些，同最令人不安的症状具有歇斯底里性质这一点并不矛盾，这种症状在夜里，如梅特兰小姐 (她在这里住了两天) 对我讲的，尤为可怕。但对于这种现象，除了她喜爱的和能把她吸引住的活动以外，暂时尚无他法可治。对于她的“心事”我猜到一些，不过事情太微妙了，不便于在信中谈论。

我收到左尔格家的一封信，是老左尔格[①]写的，左尔格夫人和小左尔格[②]也签了名。他们建议我开始新的生活，就是说，要我搬到纽约他们那儿去住。无论如何这个想法是不错的！

在《工人呼声》上，卡·施拉姆曾引用我的话抨击卡尔·毕尔克利[27]，毕尔克利现在正在攻击施拉姆，向他证明说，他所引用的全部引文和问题毫无关系，因为我没有在任何地方谈到过他毕尔克利所提出的那种货币，即“带利息的抵押银行证券”。的确，毕尔克利感到惊奇，我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到波兰人奥古斯特·采什科夫斯基（《论信贷和流通》1839年巴黎版），虽然“严厉的蒲鲁东”在《经济矛盾的体系》中同采什科夫斯基（毕尔克利银行证券的“第一个发现者”）进行了大量的，但是客气的论战。这个采什科夫斯基，如瑞士出生的毕尔克利所说，是个伯爵，另外他还是个“哲学博士”[③]和“黑格尔分子”[③]，甚至是“马克思的同乡”即“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的“波兹南议员”——就是这个伯爵等等，有一天真的在巴黎（《德法年鉴》的时代）访问了我，他弄得我简直一点不想，也无法去阅读他的拙劣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为了土地贵族的利益并受他们的委托建立英格兰银行的时代，就有人试图发明一种同他们称之为“个人的”信用货币（象现代的银行券）相反的，应当同时充当流通手段的“实在的”信用货币，但是毫无结果。毕尔克利在他重新独立发现的采什科夫斯基“思想”的“历史性”诞生日期上，无论如何是大错特错了！

---

①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
② 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
③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威廉的俾斯麦宣言[①]最初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皇帝混在一起了！作为德意志皇帝，这个家伙甚至没有一点具有历史意义的经历，没有一点霍亨索伦的传统（在这方面，现在最惹人注目的是旅行——“普鲁士亲王”赴英宪制考察旅行[28]）。俾斯麦——虽然很不高明地——打出了这张牌，这在蒙森、李希特尔、亨奈耳之流作了令人作呕的充满效忠于皇上的保证[29]之后，这是很迷人的。或许，我们还会看到些东西。

你的 卡·马·

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诺尔

1882年1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首先附上二十英镑，计五镑的银行券四张 G/K 53969、70、71、72，伦敦，1881年10月7日。此外，给了琳蘅十英镑，供她纳税，并使她手头能有点钱。最后，下星期我将有更多的现金，这样你回来以后我们就能安排下一步的计划。

你感到体力足以独自继续旅行，使我非常高兴。

施拉姆同毕尔克利的论战[②]，我浏览过一部分材料，觉得很可

① 见本卷第29页。——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笑。采什科夫斯基早在 1842 年前曾写过一本自然哲学植物学的书[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给《德国年鉴》甚或《哈雷年鉴》[②]写过稿。

我们的巴黎朋友现在自食其果了。我们两人对他们所作的预言，丝毫不差地全都应验了。他们由于急躁，把只要他们能够克制和善于等待就可以利用的大好形势给弄糟了。他们象小学生（以拉法格为首）一样陷入了马隆和布鲁斯为他们设下的圈套，—— 马隆和布鲁斯完全采用旧同盟[30]的手法，只是用暗示来造谣中伤，他们从来不公开指名，而是秘密地口头说破这些暗示—— 他们陷入了圈套，进行了指名的公开回击，现在他们将被加上和平破坏者的罪名。此外，他们的论战也是幼稚的；这一点，只要读一下对手的回答，就马上可以看出。例如，盖得把若夫兰极其重要的地方放过去了，因为他讨厌这些，并且对下列事实保持沉默，即尽管他持反对立场，全国委员会[31]还是通过决定，认为若夫兰的纲领比最低纲领[32]要激进一些，因此，若夫兰获得了党所授予的权力。若夫兰自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向盖得指出了这一点。[33]拉法格则把文章写得使马隆有可能这样来回答他：我们只是断定中世纪市镇市民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仅此而已，而您，拉法格先生，对这一点有争论么？现在，从巴黎寄来一封接一封的抱怨信，说他们无可挽回地被打败了，而且在最近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他们肉体上也要挨打；盖得极端绝望，正如他一个月前极端自信一样，除了分裂之外，他找不到别的拯救少数派的办法。现在，当他们惊奇地发觉他们必须自食其果的时候，他们就作出

① 看来是指奥·采什科夫斯基的著作《历史学绪论》。—— 编者注
②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和《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编者注

值得称赞的决定，把所有的个人恩怨放在一边。

我寄给你一份旧的《科伦日报》，但上面有一篇很有意思的关于俄国的文章[34]。

此外，由马隆和布鲁斯起草、若夫兰署名的载于《无产者报》上的论战文章（反对盖得的），是一篇巴枯宁式论战文章的极好样板，完全是《桑维耳耶通告》[35]的笔调，只是更为粗鲁。

降低赎金法令[36]就这样颁布了。在巨量的欠缴税款中小小的几成能有多大意义呢！但没有收到的每一百万对于俄国国库却都是有意义的。

此外，俾斯麦比所能设想的还要走运：帝国国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掩护他去卡诺萨朝圣！[37]但也是这届帝国国会唯一能取得一致的事情。绝妙的多数：封建主、教皇至上主义者、分立主义者、波兰人、丹麦人、亚尔萨斯人、几个进步党人、[38]可怜的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

说到朝圣：今天早晨我碰到了弗尼瓦尔，他身穿紧系腰带的蓝色夹大衣，头戴宽边帽，看起来活象一个前往圣地寻找圣安东胡子的朝圣者。

热情问候杜西。

你的　弗·恩·

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1月15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非常感谢你寄来二十英镑。

我已经决定明天就动身，因为天气日益“寒冷”，这对于我发肿的那边面颊毫无好处。这样一来我只是失掉两天时间，但因此杜西却不必往返跑一趟了。

虽然一再警告，我们的人在巴黎还是上了大当[①]（拉法格和盖得是活该）；不过，既然他们手中还有两种报纸[②]，那么他们凭借一定的灵活性总还能保持住战斗阵地。

俾斯麦在帝国国会中供认德国工人终于“唾弃了”他的国家社会主义，[39]我认为，不仅直接地在德国，而且一般说来在国外这都是一个巨大胜利。卑鄙的伦敦资产阶级报刊总是极力散布相反的看法。

我接到老弗兰克尔从“国事犯监狱”寄来的极亲切的信，还收到符卢勃列夫斯基的一封信，符卢勃列夫斯基显然是受日内瓦的波兰党的委托而写的[40]，然而他在激动之中不仅忘了代表党签署，也忘了签上他本人的名字。

如果说若夫兰象《无产者报》上论战文章[41]中所说的那样，当

---

① 见本卷第34页。——编者注
② 《平等报》和《公民报》。——编者注

时在伦敦为维护盖得进行过反对当地“国际”的示威，那末无论如何，这种示威是柏拉图式的，以致除了若夫兰本人或许还有他最亲密的同伙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也就是说，它完全是“私下”进行的。

祝好。

你的 摩尔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2月17日于马赛卡恩比埃尔大街小路弗尔宫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杜西大概昨天给你寄了一封短信。我原来是想在下星期一才离开巴黎，但由于我的健康状况根本没有好转，我决定立即动身去马赛，从那里马上于星期六乘船去阿尔及尔。[42]

我在小琼尼陪同下在巴黎只拜访了一个尘世之人，就是梅萨。（结果，他—— 梅萨使我不得不闲扯了很多，除此以外，我回到阿尔让台稍晚了一些，约在晚上七点。整夜失眠了。）我曾试图说服他，请朋友们，特别是盖得，将会晤推迟到我从阿尔及尔回来以后。但全都是白费。事实上，正是现在盖得受到各方面的猛烈攻击，所以和我“正式”会晤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为了党的利益作这种让步毕竟是应当的。因此我约定同他们会晤，盖得和杰维尔同梅萨大致在下午五点以后应约到了博马舍林荫路8号“里昂和

牟罗兹旅馆”。开始我在楼下，在餐厅里接见了他们，陪同我由阿尔让台 (星期三下午) 到那里的杜西和小燕妮也在场，由于小燕妮在场，盖得有些发窘，因为他刚刚写过一篇反对龙格的很尖刻的文章，尽管她 (小燕妮) 对此事并不介意。女孩子们一走开，我就把他们先带到了我的房间，大约聊了一个小时，然后下楼去餐厅—— 可是梅萨却趁机悄悄地溜掉了—— ，在那里他们还和我一起喝了一瓶博韦酒。七点钟他们都“消失了”。此外，虽然我在晚九点就已经睡下了，到一点钟那吵得要命的车辆声还没有停止；就在这个时候 (大约一点钟) 我吐了，因为我又说得太多了。

在过里昂以前，马赛之行很顺利，天气很好。由于火车头出了故障，先是在卡西停了一个半小时；而后在瓦郎塞机器又出了毛病，虽然这次停车的时间不那么长。这时天气寒冷，刮着很厉害的刺骨寒风。本应在将近午夜十二点的时候就可以到达 [马赛] 的，我们却在清晨两点以后才到；虽然我穿上了所有的衣服，但还是冷得有点打颤，我只好以“乙醇”御寒，并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它。最后一个令人不愉快的考验是在马赛车站的最后一刻钟 (或更长些)：四面都是敞着的，寒风刺骨，领行李时的手续很繁复。

马赛今天阳光普照，但风本身还并不暖和。杜尔朗医生劝我住在前面提到的那个旅馆里，我明天 (星期六) 下午五点就由这里动身去阿尔及尔。“法国邮船航运公司”办事处就设在我住的这个旅馆里，因此我当即在这里买了“赛义德号”的船票 (八十法郎的一等舱)；行李也是在这里托运的；这样，一切都再方便没有了。

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搞到一份《无产者报》(《平等报》这里也出售)。我觉得，拉法格总是在增加新的不必要的事端，而且细节可能和实际情况差得很远。至于他把傅立叶说成是“共产主义者”，现

在，当他因此遭到他们[1]的嘲笑时，不得不解释说，他是在何种意义上把傅立叶称之为“共产主义者”的。对这种“大胆的论断”可以不去管它，可以“解释”或者“补充”；最糟糕的是，总是不得不去摆脱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我发现他预言说得太多了。

衷心问候劳拉；我将从阿尔及尔给她写信。有一个保护人就足够了；龙格给他的朋友费默写了一封长信，此人原来是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的犯人（在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后来高升为阿尔及尔上诉法官。关于护照之类的事情没有问题。在旅客的票上，除姓名外不写别的。

问候琳衙和其他朋友们。

再见。

老摩尔

19

马克思致恩格斯[2]

伦　　敦

1882 年 2 月 21 日于阿尔及尔市东方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我于 2 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五点乘一艘非常好的轮船“赛义德号”离开了马赛。航行迅速，所以星期一（2 月 21 日）凌晨三点半已经到达阿尔及尔。[42]但是，海上航行时很冷，并且尽管船上一切都很舒适，但由于船舱里吵得要命的机器声、风声等等闹

① 即《无产者报》编辑部。—— 编者注
②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没有署名。—— 编者注

得我两夜没睡着觉。

在这里我又一次遇到和威特岛[18]同样的误会，但是有相应的改变。这就是，这次阿尔及尔的季节反常地寒冷和潮湿，而尼斯和门顿相反地现在把大多数旅客都从阿尔及尔吸引过去了!总之，我有些成见，我曾几次暗示先去里符耶腊。看样子，命该如此!善良的法官①昨天极其殷勤地接待了我；在我抵达的前一天龙格的信已经使他有所准备；他今天来拜访我，商量下一步的安排。到时候我再详细告诉你。衷心问候大家。往法国和英国的信件不是每天都发送的。来信写我的名字，并写上：由阿尔及尔市穆斯塔法神父路37号民事法庭法官费默先生转交。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弗·恩格斯先生

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3月1日于阿尔及尔迎宾大道穆斯塔法神父路“维多利亚旅馆”(现在可以按上述通讯处直接给我寄信)

亲爱的弗雷德：

给你发的电报必定比明信片②先到，因为后者可能引起没有必要的不安。事实是，由于许多小小的不利情况 (包括海上的航

① 费默。——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行)，我受病魔驱使于2月20日在阿尔及尔登岸，当时冻得要死。

阿尔及尔的十二月是讨厌的，一月份天气很好，二月寒冷且较潮湿。我还赶上了上述三个月的最后一个月中最冷的三天，——2月20、21、22日。我失眠，食欲不振，咳嗽得厉害，有点惘然若失，有时犯重忧郁症，象伟大的唐·吉诃德一样。这样，是立即返回欧洲，既未达到目的又白花了钱，而且还要在可怕的机器声振得人头疼的那个船舱中再度过两夜呢？还是立即动身到离撒哈拉大沙漠很近的比斯克拉去，可靠地摆脱这种误会？然而考虑到使用相应的交通或运输工具又需要七、八天时间的旅行，这是很困难的，并且据熟悉当地情况的人的意见，由于在赴比斯克拉途中可能发生意外，对一个目前已是残废的人来说，这决不是没有危险的！

2月22日下午温度计既然向我预报了好天气，而且我在到达的当天就同善良的法官费默一起找妥了"维多利亚旅馆"，因此我便离开了"东方大旅馆"(令人讨厌的空谈哲理的激进派艾什顿·迪耳克也住过这个旅馆；此外，在《小庄园主报》和阿尔及尔的其他小报上，每个英国人都是勋爵，甚至布莱德洛在这里也成为布莱德洛勋爵了)，带着行李到城东工事外的一个小山上来了。这里的环境好极了：我的房间面对着地中海的一个海湾，阿尔及尔港，以及象罗马剧院那样沿着小山坡层层高起的别墅(这些小山的山脚下是谷地，上边是另外的一些小山)；远处是群山；而且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麦提福角后面——卡比利亚山脉中——的雪峰，朱尔朱腊山脉的最高峰。(上面所说的小山全是由石灰石构成的。)再也没有比这里早晨八点钟的景致、空气、植物——欧洲和非洲奇妙的混合——更迷人的了。每天早晨大约从十点或者九点起至十一点，我到谷地和比我住的小山更高的小山上去散步。

尽管这样，人们还是整天吃灰尘。起先，只是2月23到26日，天气确实起了极好的变化（但我还是冻得够呛，以致这些天我穿的衣服同在威特岛[18]和在阿尔及尔市时不同的仅仅是，在别墅里用轻便大衣换下了犀牛皮大衣，其他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变化），但后来就开始了（从2月27日开始到现在大约持续了九天）所谓的tempête（暴风雨），也就是既无雷鸣也无闪电的狂风，这是连本地人都很害怕的恶劣天气。所以到现在事实上只有三天真正的好天气。

同时，我的咳嗽一天比一天严重，痰多得厉害，睡眠少，而主要的是有种很难受的感觉，似乎我的左侧完全瘫痪了，而且我的精神非常不好。所以我请来了斯蒂凡医生（阿尔及尔最好的医生）。昨天和今天我同他见了两次。怎么办呢？我马上要到阿尔及尔去配他给我开的药；他给我作了非常认真的检查后，开的处方是：(1) 斑蝥火胶①，用小刷子蘸着“文身”；(2) 溶于一定数量水中的亚砷酸钠，吃饭时服用一汤匙；(3) 必要时，特别是夜里咳嗽时，服用一汤匙可待因和胶质镇静饮剂的合剂。过一星期他再来看我。他为我规定的体操，要坚持做，但要严格限制；除了消遣性的阅读外，禁止任何严肃的脑力工作。这样一来，事实上我回伦敦的日期一点也早不了（反而要推迟一些）！因此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应以过于美好的希望来安慰自己！

就写到这里吧，因为要到阿尔及尔买药去了。此外，你知道，没有人比我更讨厌随便动感情的了；但如果不承认我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②——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

① 起皰硬膏，斑蝥膏。——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的——的怀念之中，那是骗人的。请告诉我在伦敦的女儿们[1]，让他们给老尼克[2]写信，而不要等他先动笔。

彭普斯创造人的大事进展如何？请代我向她致衷心的问候。

请代我向海伦[3]，以及穆尔和肖莱马问好。

亲爱的老朋友，就写到这里吧。

你的　摩尔

附带说一句，斯蒂凡医生象我亲爱的唐金医生一样，总忘不了……白兰地！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4]

伦　　敦

1882年3月3日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弗雷德：

昨天收到了你2月25日的来信和《每日新闻》的剪报（奥·诺·[5]的悲喜剧式的英国国家的和爱情的秘密）。希望杜西最后会不再以轻率态度对待自己的健康，并希望我的白鹦鹉[6]小劳拉跟过去一样身体健壮，因为她进行大量的体育锻炼。我还没有收到

---

① 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③ 德穆特。——编者注
④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⑤ 奥里珈·阿列克谢也夫娜·诺维柯娃的笔名。——编者注
⑥ 劳拉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注

巴黎的任何回信。暴风雨——这里的神圣用语是Tempête——从2月26日起一直持续不断，尽管总是有不同的变化。

3月2日，我和所有住在一起的人一样，整天都被软禁在屋子里；从清晨起，带有伦敦色彩的阴沉晦暗的天空就下起倾盆大雨；但这一次却是头一回在一阵阵暴风中时而夹杂着雷电；到了下午四点钟又是蔚蓝色的天空，再晚些则是非常美丽的月夜。气温整天不断变化，时而下降，时而上升。在这期间，除了别的治疗方法以外，我又开始了“文身”；第二天夜里，立即显著好转。今天早晨，3月3日，头一件事就是“文身”；风没有吓住我，从九点到将近十点一刻一直在有益健康的海洋空气中散步，这对我来说是最愉快不过了；回来的时间恰好是在暴风再次到来之前。再过几分钟就要叫我去吃早饭了，就利用这关键时刻把这封短信及时奇出。

你的　摩尔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弗·恩格斯

22
马克思致恩格斯[1]

伦　　敦

[1882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　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弗雷德：

我的助理医生[2]刚刚 (早饭后) 把我胸部因昨天的涂擦而引起的许多鼓得很大的水泡挑破，并作了其他处置；在这以后还需要在床上躺一两个小时，我就在床上用明信片歪歪斜斜地写这封短信，因为时间紧迫；问题是信差破例一早要从旅馆到阿尔及尔去，以便把信件等送往那里的邮局 (星期一、三没有往法国的邮班)。

自星期二 (3 月 21 日) 以来，除了必然的间歇外，又日夜都有猛烈的暴风雨，雷鸣，偶而也有闪电，每逢晚上，尤其是深夜都下大雨，而今天早晨也下了大雨。星期二的白天，在变得非常灰暗的、阴森可怕的天空预示暴风雨即将来临之际，首先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次暴风雨中真正的非洲西洛可风所扮演的角色。

斯蒂凡医生昨天到这里来了；检查结果令人满意：病情好转；还有胸部最下边一个地方以及背部的一个相应地方在发炎。下星期 (即大约下星期三或星期四) 我的助理医生勿需再涂擦这两个地方了；可见斯蒂凡是要把这专门留给自己来做。

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摩尔

---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 编者注
② 卡斯特拉兹医生。—— 编者注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弗·恩格斯]

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3月28—31日 [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弗雷德：

3月28日。今天一清早就下起了讨厌的雨，——我就给杜西写了一封短信。可是信刚刚发出，暴风雨就来了，这一次是头一回来势那么凶猛：不仅狂风咆哮，大雨如注，雷声隆隆，而且还夹杂着一个接一个的闪电。这样一直继续到深夜；和往常一样，气温同时急剧下降。在近似半椭圆形的美丽的海湾里，海浪色调的变化非常有趣：雪白的浪花拍打着海岸，由蔚蓝变成碧绿的海水给浪花镶上了边。

3月29日（星期三）。连绵不断的雨真讨厌，一阵阵呼啸的狂风也同样讨厌；天气寒冷而且潮湿。

今天早饭（通常是在十一点一刻或十一点半开饭）前不久，斯蒂凡医生抱着一个专门的目的来到我这里，他要把他所发现的背部和胸部最下边的那两个地方“贡献”给“文身”之用，这两个地方是他给自己留下的“攻击点”。和每次出诊一样，首先作仔细的检查；左侧较大的那个部分有显著好转；我以前提到过的最下边的那两个地方，目前听到的还是踏雪音，而不是赫尔姆霍茨的乐调，这些地方只能逐步使之恢复正常（天气不好也影响更快地

好转）。斯蒂凡今天第一次对我说，——显然因为他认为我的健康已经大大恢复，可以无所顾忌地和我谈了，——在我到达阿尔及尔时，旧病已经复发，而且病势极其严重。只有用斑蝥膏可以防止渗出液。他说，病情的变化比他所预料到的要好。但在今后多年之内，我必须特别小心谨慎。在我离开阿尔及尔时，他将给我写一份诊断书，也可供我在伦敦的医生[①]参考。他说，象我这样大年纪的人，一定不能让这种病反复发作。早饭后过了几个小时，我所有被刺画过的皮肤感到非常难受，我觉得好象皮肤绷得很紧，简直想要挣脱它；痛了整整一夜；搔痒是绝对禁止的。

3月30日。早八点，我的助理医生、我的助手[②]来到我床前。原来，由于不由自主的动作，水泡全弄破了；夜间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水灾，床单、绒毯、衬衣都湿了。可见，对“所攻击的”地方“文身”起了应有的作用。我的殷勤的助理医生立即给我包扎好，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和绒毯摩擦，而且可以保证以后吸水更顺利。今天（3月31日）早晨，卡斯特拉兹先生发现水终于出完了，而且差不多完全结疤收口了。这样，我大概在一星期之内（从3月29日算起）可以进行第二次“文身”。那就更好。

3月30日（昨天）。将近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天气变得暖和舒适，所以我在走廊里散了散步；然后睡了一会，以补偿夜间的睡眠不足，今天还要这样做，因为即使象30日至31日的那个夜间那样，毫不觉得痛，但是由于严禁搔挠患处，夜间总是难以入睡。

今天（3月31日）天气捉摸不定；不管怎样，暂时还没有下雨；也许象昨天一样，快到中午的时候会比较“好”，这个时刻快到了。

---

① 唐金。——编者注
② 卡斯特拉兹。——编者注

对我的健康状况的报道，没有更多可补充的了；总的来说，一切令人满意。

今天收到了小杜西的信。

顺便告诉你，不久前，她给我寄来一封随函附给你的信；写信人的签名我认不出来，你定能认出。无论如何这是个奇怪现象：这个克韦德林堡的律师是有他自己的世界观的！有一点我不明白：这个人已把他打算要给我的他写的那本“书”寄到梅特兰公园[①]去了呢，还是他先想得到我的确切地址，以便他的书能确有把握地寄到？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杜西应该通知他书已收到，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应该把我的“可靠”地址告诉他。

我亲爱的，你和家里的其他人一眼就会看出我在构词法、造句、语法方面的错误；由于我还精神恍惚，我总是事后才能发现它们。这就向你们表明，我距离“有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还差得很远。慢慢地进行治疗，大概以后总会见效。

吃早饭的铃刚刚打过，所以我得把这封短信准备好，让去阿尔及尔的信差带走。

趁此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摩尔

① 即马克思在伦敦的地址。——编者注

24
马克思致恩格斯[1]
伦　　敦

1882年4月4日星期二　[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弗雷德：

你的明信片收到了；小劳拉3月29日的信也来了。

衷心祝贺彭普斯。

总的说来，我的健康在好转；但天气和我开了玩笑。

3月31日，星期五，白天费默来访——在此之前几小时我给你发了一封信[2]；他顺便告诉了我一个阿尔及尔气象学家透露给他的一个机密：下星期的前三天将有猛烈的西洛可风，接着将下三、四天雨，然后真正的明媚的春天就会到来。谁不相信这一点，谁就会犯错误。

然而星期六（4月1日）和星期一（4月3日）天气暖和（有点“过于”闷），不过卷起了尘柱的风（这还不是西洛可风）把我禁闭在我的走廊里；相反地，4月2日（星期天）早晨天气非常好，因而吸引我散步达两小时之久。

昨夜狂风咆哮；今天早晨五点左右下雨，从八点开始没有雨了，天空有云，风一阵阵地刮个不停。昨晚月光照耀下的港湾呈现了一幅美妙的图画。对走廊前面的海景，我总是看不够。

---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衷心问候肖利迈[1]和其他的人。

你的　摩尔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 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弗·恩格斯

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4月[2]8日星期六　[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弗雷德：

昨天下午四点钟斯蒂凡医生给我作了检查。他十分满意，尽管变化不定的天气往往引起新的感冒；他发现下边部位 (胸左侧) 的渗出液几乎完全消失了；背部 (左下部) 一个地方还不见效。昨天他通过用斑蝥火胶在皮肤上“文身”的办法专门对付了这个地方，结果非常痛。由于这一次的“刺画”，整夜 (4月7日至8日) 没有入睡，但是今天早晨，鼓起的水泡中的水分非常有效地排除了。因此我相信，这块绊脚石现在很快就可以搬掉了。我的助理医生卡斯特拉兹先生不得不给我弄了半个小时绿得象西瓜一样的水泡；此后我得在床上躺到十一点半吃早饭的时候；因为包扎好以后，残液还继续一滴一滴渗出；这时躺着最合适。

---

① 肖利迈 (Jollymeier) 是肖莱马的谑称，由英文单词列《jolly》(“快乐的”，“有醉意的”) 和德国人的姓Meier (有“农夫”的意思) 组成。——编者注

② 原稿为：“3月”。——编者注

不过斯蒂凡发现，由于天气不好，咳嗽有些厉害起来（但这只是相对的，因为在这以前差不多已经没有了）；这个星期连着四天我都可以利用早晨的时间去散步；从昨天中午开始，雨就下个不停，夜间和今天白天下的是“倾盆大雨”；今天似乎打算在饭厅里生点火，但是这里的壁炉，看来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这种目的，而只是装样子用的。

早饭后，在中午两点钟的时候本来准备睡一下，以便多少补偿一下昨夜的失眠，可是真见鬼，这个星期和下星期是法庭闭庭期间。结果我的计划被待人非常亲切的费默法官打乱了，他直到下午五点钟，即晚饭前不久才离开我这里。顺便说一下，费默在谈话中还对我讲，在他任民事法官期间，采用（而且这是作为一种“常规”）迫使阿拉伯人认罪的特殊刑讯方式；当然，这是“警察”干的（就象英国人在印度所干的那样）；法官则装作对所有这一切毫无所知。另一方面，据他说，假如有一伙阿拉伯人主要是为抢劫而杀了人，后来真正的罪犯被查了出来，抓到了，判了罪并且处死了，可是殖民主义者的受害的家庭对这样偿命也并不感到满足。它要求再多“斩首”几个，至少要多杀半打无辜的阿拉伯人。不过，这里的法国法官，即上诉法院，往往加以抵制，而在某些地方单独办案的孤立的法官如果不暂时（他们的权力不能比这更大了）把一打完全无罪的阿拉伯人以杀人或抢劫未遂等嫌疑关进监狱，不提出起诉，那末在某种场合下他们自己的生命就会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威胁。我们知道，欧洲殖民主义者不管是在一个地方定居，或者是由于事务关系在“劣等种族”中暂时居住，他们通常总是认为自己比漂亮的威廉一世更加神圣不可侵犯[①]。

① 见本卷第29页。——编者注

而在对待“劣等种族”的那种无耻的傲慢自大和烧死活人祭摩洛赫神般的残忍上，英国人和荷兰人要超过法国人。

彭普斯的家庭使命大有希望，而海德门的政治使命，相反地应当认为大有问题。你的短信[①]使他懊丧，那是这个青年人自作自受，何况他对我耍无赖是完全预计到我自己出于“宣传上的考虑”不会公开损害他的名誉。[43]他确实了解这一点。

跳康康舞的英雄博登施泰特和臭不可闻的美学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费舍是威廉一世的贺雷西和味吉尔。[44]

顺便说一下。你寄给我的《科伦日报》上刊载的那篇谈论斯柯别列夫的文章非常有趣。

今天（星期六）这封短信不可能发出了，因为星期一、三、六一般没有开往马赛的“邮船”；而每逢星期日轮船却破例在中午一点从阿尔及尔起航，所以信件应该在早晨十一点以前（星期日）送交邮局。阿尔及尔的“维多利亚”旅馆每逢星期日一清早就派信差把信送走。其余几天是在阿尔及尔开往马赛的轮船出发之前即下午五点半把信送走。

可是，我真希望这封短信明天就能送走，因为斯蒂凡医生最近一次检查的结果特别良好。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摩尔

---

① 见本卷第290页。——编者注

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4月18日星期二　[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弗雷德：

昨天收到了你的信，小杜西的信以及“皇家的”[①]邮件。

我在最近给小劳拉写信[②]时曾预言，“两个最好的日子”将来临；但是信还没写完，西洛可风（正式的天气预报和法国的其他文件中用Sirocco这个字，有时写一个c，有时写两个）就刮起来了，它的呼啸声在我看来是预报的“强烈大气运动”的序曲。我已向劳拉承认，我对这种东西已经厌倦了，说实在的，“对非洲已经厌倦了”，我决定一旦斯蒂凡医生不再“需要我”，就立即离开阿尔及尔。

从4月14日（白天）到4月17日——阵风，暴风雨，大雨，太阳的酷热，冷一阵热一阵地不断（几乎时时）变化着。今天一大清早天气非常好，但是现在，早晨十点钟，风又重新吹起了它那令人极其厌烦的调子。——气象局在昨天的公报——不如说是预报——中说，5月3—4日，特别是5月7—8日将有“强烈大气运动”（再往后它目前看不出来）；而除此之外，还说在这个五月

① 双关语：“皇家的”（《Kaiserlichen》）和“凯泽尔的”（《Kayserlichen》）两个形容词相似。恩格斯通过阿·凯泽尔银号给马克思寄钱。——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97—304页。——编者注

的头一星期将发生所谓“地震活动”(这种“地震活动”据说是由于潜在的地震而周期性地发生的)。

16日(星期天)斯蒂凡医生来了;他用叩诊检查后,说:“胸膜炎”的痕迹(指“复发”)再也没有了;相反地,他说,他对支气管的状况感到不如上次检查时那样满意(也是左侧)。尽管如此,他还是用了很大的精力来给我“文身”(星期天即4月16日午饭后的全部时间和直到星期一清晨前的整整一夜,我感到非常难受,真佩服他的精力!)——话又说回来,斯蒂凡医生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支气管炎和这里的天气有密切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在阿尔及尔继续呆下去可能产生不良影响。他认为,如果不发生什么料想不到的情况,譬如说这里的天气显著好转,或者我的健康状况恶化(这种可能性很小),那就可以让我带着诊断书于4月底离开。所以,我可能乘坐来阿尔及尔时坐过的、船长还是那个马塞(一个很漂亮的青年人)的那艘“赛义德号”,于5月2日回到马赛,然后从那里前往卡恩、尼斯或门顿去寻求幸福。因此不要再从伦敦给我寄任何信件或报纸,除非在收到这封信之后马上就投寄。如果在这期间,上述决定有什么改变,我将立即从这里给你们写信。

恐怕在我以及卡斯特拉兹一家离开非洲的时候,“铁”就要来到阿尔及尔了;现在大家都在准备逃跑。这封信内容贫乏,你要原谅。由于费精力给我“文身”,4月16至17日夜间,我没有睡着;4月17到18日没有任何疼痛,因为助理医生[1]昨天早晨七点钟已经尽了他的责任,但长新皮肤时感觉发痒,第二天夜里又弄得我彻夜未眠。此外,因为今天一清早我就享受了清晨散步的快

① 卡斯特拉兹。——编者注

乐（而且达两小时之久），所以 üw begriyp（您知道）（不记得荷兰人是怎么写的，反正是 übegreip（您知道）！—— 鬼知道，这个《Begriff》（概念）他们怎么用的这么多—— 这个声音我在扎耳特博默耳[45]从罗特豪斯牧师现在离了婚的妻子—— 后来我的表妹[①]嫁给了他—— 的口中听到后，至今犹在耳边响着），总之，你知道，我应该睡觉去，以补偿几个不眠之夜。在这个时候：睡吧，“你还有什么要求呢！”[②]不过我必须先向你讲一讲法国当局对一个可怜的强盗，一个可怜的阿拉伯人，不断犯罪的职业杀人犯进行的恶毒戏谑。只是到最后，这个可怜的罪犯被“送去见上帝”—— 象伦敦佬说的那样—— 的时刻，他才得知，不是被枪毙，而是被斩首！这违反协议！这违背诺言！尽管有协议，他还是被斩首了。还不仅如此。他的亲属们曾希望，就象过去法国人允许做的那样，把头和身子拿回去，以便能把两者缝合起来，然后埋一个“全尸”。可是办不到了！于是哀号，咒骂，发狂；而法国当局断然拒绝，而且是第一次！当躯干进入天堂的时候，穆罕默德就会问：你把自己的脑袋丢在那儿了？或者问：脑袋为什么失去了躯干？你不配进天堂！你滚到基督狗那儿去吧！亲属们因此而痛哭流涕。

你的　老摩尔

在亲切交谈中斯蒂凡告诉我，他虽然完全不懂德文，但他是德国人的后代—— 关于此事我以前没有打听过。他的父亲是从普法尔茨（兰道）迁到阿尔及尔来的。

---

① 安东尼达（南尼达）·菲力浦斯。—— 编者注
② 引自亨·海涅诗歌集《归乡集》。—— 编者注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　[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弗雷德：

收到了你的信和《科伦日报》。

我写这封短信只是想告诉你，5 月 2 日 (星期二)，我将乘坐来阿尔及尔的那艘“赛义德号”离开阿尔及尔，船长还是那个“海军中尉马塞先生”。上星期三，我参观了由六艘装甲舰组成的法国舰队；我当然是仔细观看了旗舰“柯尔培尔号”，舰上的一个军士，一个漂亮的有学识的青年，把一切都详尽地给我看了并作了表演。临别时他以真正的法兰西精神对我说：他讨厌这种无聊的职业，他说希望尽快退伍。我和我的同伴 (同住“维多利亚”旅馆的三个房客) 得到许可，在“公事”结束以后才能参观舰艇。我们乘坐舢板，或者说是小船，荡来荡去，就这样，从那上面观看了旗舰和其他五艘装甲舰的演习。明天白天在“柯尔培尔号”上有“舞会”；我本来也可以通过费默得到一张请帖，但是没有时间了。因为星期二 (4 月 25 日) 斯蒂凡作了最后的检查；用火胶“文身”已作完了；复发的胸膜炎暂时完全消除了，尽管这样，明天 (星期六) 下午三点我要到他那里去取他的诊断书，并且与他告别。现在天气有时炎热，但实际上，整整一个星期 (今天也是这样) 刮着飓风——狂舞着的西洛可风 (夜间是不停的飓风，白天往往是一阵阵凶猛的飓风)。这就是我的咳嗽至今没有减轻的原

因；所以是从阿尔及利亚逃走的时候了。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老摩尔

顺便说一下，太阳迫使我去掉了预言家的胡须和“假发”，不过 (因为我的女儿们比较喜欢我过去的样子) 我在把自己的头发献给阿尔及尔理发师的祭坛之前去照了像。像片下个星期天 (4月30日) 取。我一定从马赛给你们寄几张去。你们会相信，考虑到做了长达整整两个月之久的火胶刺画 (我在用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的风格写[46])，—— 而且我实际上没有一天完全安宁的日子 —— 我还是勉强作出了欢快的样子。

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5月8日于蒙特卡罗“俄罗斯”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在我 (五月初) 离开阿尔及尔[47]以前两三个星期，气象台已预告海上有暴风雨。果然，我在非洲的最后几天，不停地刮着猛烈的西洛可风，同时天气酷热。不过，阵风，尘柱和突如其来的、虽然有时是很快就过去了的气温下降，破坏了酷热的天气。这期间我的支气管卡他加剧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由于海上有暴风雨 (5月4日至5日的夜里)，船舱里也感觉到有穿堂风；我在大雨中到达马赛 (5月5日早晨)，并且一直到尼斯雨都没停。我又

把一个雨天 (昨天) 带到了蒙特卡罗；今天天气非常好。你看，我和雨有不解之缘，因为在我到来之前，不论是尼斯，还是蒙特卡罗都几个月没有下过雨。不过这次的雨只是捉弄了我一下；没有什么严重影响，不象在阿尔及尔那样。

5日和6日我在尼斯逗留，很快就感到那里的风变化无常，根本不能指望气温稳定。今天，在这里和我在同一旅馆下榻的一个 (在英特拉肯居住的) 外科医生德拉肖博士肯定了我这个短时间的经验。他利用假期旅行的机会，游览过尼斯及其近郊和里符耶腊一些最著名的地方，同时他还有业务上的考虑：他想弄清楚什么地方最适宜于推荐给患肺病、慢性支气管卡他等等的病人。他坚决反对尼斯，主张蒙特卡罗，认为甚至比门顿还强。德拉肖博士今天就要返回自己的祖国瑞士去。

你通过亲身的观察[48]，或者通过书报和绘画，对于这里极为优美的风景是很熟悉的。它的许多特色使我鲜明地回想起非洲的自然景色。

至于“温暖干燥的空气”，那末，一般说来，这样的空气不久之后到处都会有。太阳的黑子预示着辐射的强烈作用，所以法国恐怕会有干旱。

为了做到心安理得，我明天去听听这里的一位德国医生库奈曼的意见。我把斯蒂凡医生 (只是从他的名片上我才知道了斯蒂凡还是阿尔及尔医学院的代课教授) 的诊断书带在身边，这就使我不必多讲废话。—— 斯蒂凡医生刚一宣布胸膜炎已消失，我就立即开始按他 (斯蒂凡) 的规定在胸部和背部 (左侧) 的最上面的部位涂擦碘酊。从上船的时候起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再做这件事，况且用自己的手在自己的背上做这件事很“费劲”，虽然德拉

肖医生建议我借助镜子试着做。走着瞧吧。无论如何我想先和库奈曼医生谈谈。我打算尽可能多地在新鲜空气中走走。

在蒙特卡罗娱乐场的阅览室里，法国和意大利的一切报纸几乎都有；德国报纸陈列的情况还不错，英国报纸很少。我从今天的《小马赛人报》上知道了“卡文迪什勋爵和伯克先生被刺杀”[49]。这里的人们，譬如在“俄罗斯”旅馆中一起进餐的人们，对于娱乐场赌博厅里的情况（轮盘赌桌和 trente- et- quarante[①]赌桌上的情况）倒是更感兴趣。特别使我开心的是一个大不列颠的后代，他愁眉苦脸，怨天尤人，暴躁易怒，为什么？因为他绝对相信他能“捞到”一些金币，结果却输掉了一些金币。他不懂得即使用不列颠式的粗鲁也不能“制服”福图娜。

必须结束这封信了，因为这里的信件先得派人送到摩纳哥去投寄。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摩尔

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 年 5 月 20 日于（摩纳哥）
蒙特卡罗“俄罗斯”旅馆

亲启

亲爱的弗雷德：

这里所写的东西不必给孩子们看，因为这会白白地使他们担

① “三十和四十”又名“红与黑”，是一种赌博。—— 译者注

惊受怕。不过我至少应该把自己最近的感受告诉某一个人。

在最近的一封信(我记不确切是直接给你的,还是给杜西或者劳拉的)中我写过,会见库奈曼医生[①]之后将把详细情况告诉你。会见是在5月8日进行的;他是亚尔萨斯人,有渊博的科学(医学)知识;例如,还在收到你的信以前,他就把科赫博士关于杆菌的发现告诉我了。他是一个很有实践经验的人,年龄不下于五十二至五十四岁,因为1848年时他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作为政治家,他把《时报》看作是适合自己气质的机关报;他说科学已经使他确信,一切都只是"缓慢地"向前运动;不能有丝毫的革命急躁情绪——否则此后它会迫使"后退"几乎同样远(譬如就象艾希特纳赫的游行[50]一样);首要条件是教育群众和"非群众"等等。总之,在政治方面他是一个共和主义的庸人;我在这里提到这一切,是为了说明我为什么不和他谈论这个问题,而只限于谈论摩纳哥专制暴君查理三世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的"政策。他认为我是1848年事件的参与者,但是除了这个时期的以外,关于我后来的社会活动,我丝毫没有让他知道。现在来谈本题吧。起先,他根据我通过他的女仆转给他的名片(上面写着:博士)判断,我是医学博士,而我转交给他的斯蒂凡医生以及我新结识的英特拉肯的医生[②]的名片,使他对此更加深信不疑了,此外由于库奈曼想知道在伦敦谁给我看过病等等,我把唐金医生的名片也交给了他,我说他是我的朋友雷伊·朗凯斯特教授的朋友。随后我把斯蒂凡的诊断书给他看了。

这样,因为他认为我本身是医学博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德拉肖。——编者注

上都和他是同行,所以在对我进行了听诊和叩诊之后,他就把一切和盘托出了。使我焦急的是胸膜炎又犯了,虽然不太严重,而且只是在背部左侧的一个地方;支气管炎反而或多或少是慢性的;库奈曼原想经过他上一两次斑蝥膏之后,就可把事情(胸膜炎)了结;但是,5 月 9 日(星期二)第一次上斑蝥膏,5 月 13 日(星期六)我第二次去找库奈曼;他第二次开了斑蝥膏的处方;要到 5 月 16 日(星期二),等伤口收口之后才能上;5 月 19 日(星期五)我到他那儿去了;进行了听诊和叩诊;他发现情况已好转,因为渗出液减少了;他主张今后不必继续使用斑蝥膏了(因为这些医生怕病人忍受不了每个星期都要重复的某种程度的痛苦和折磨),他说,现在我可以只用碘酊(斯蒂凡开给我治支气管炎的处方)涂擦上边以及胸部和背部左侧的下边就行了。我不同意这样做,如果渗出液还没有完全消失,我宁肯再上一次斑蝥膏(5 月 23 日,星期二);我从斯蒂凡医生那儿听说,对于胸膜炎,碘酊只是一种疗效不大的、不可靠的药物,用这种药物会把治疗时间拖长。库奈曼医生对于我决定英勇地接受治疗,显然是更为高兴;我现在希望,5 月 26 日或 27 日他会告诉我,这回的第二次旧病复发(暂且)已告结束。

的确,在这一方面"命运"这次和过去一样,甚至几乎和缪尔纳博士的悲剧[51]中描写的一样,很不吉利。为什么库奈曼说我的支气管炎是这样一种"慢性的"呢(而且我早就料到我会"听到"这种说法的)?因为在整个里符耶腊,天气这样罕见地、反常地变坏了;不过,在他看来,这也许是正常的,因为从一月份到五月初非常缺雨,甚至几乎完全没有下过雨;过于好的温暖的气候不能不引起反作用。我很简单地向他作了解释,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从阿尔及尔来到这里的罪过;从 5 月 4 日起我随身把雨带到了马赛,而我现在呆的

这个地方的天气，在经过某种抵抗之后，也相应地变得有了我早已熟悉的阿尔及尔“恶劣天气”的特点了。这需要很大的耐性，从我的通信者方面来说，尤其是如此。老是重复类似的东西太枯燥了。多么无益的、没有内容的、而又付出了昂贵代价的生涯！

明天我给杜西写信[①]，因为她的信已经搁在那儿很久很久没有回了。今天行动不方便，因为我一弯腰，由于同内衣或衬衣磨擦，上斑蝥膏以后长起来的新皮肤还在作痛。请注意：我给孩子们写的是真的，但不是全部。何必使他们耽心呢？

你的　摩尔

当库奈曼医生第一次看病后拒绝收费时，他把我看作“医生”同行的错觉消除了；他得知我是外行，因而应当“慷慨破费”时，他变得迷人极了。

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5月30日　[于蒙特卡罗]

亲爱的弗雷德：

自从5月23日给我涂上斑蝥膏(在蒙特卡罗的第三次)以来，到今天为止，我确实一直在和库奈曼医生见面，但只是为了“支气管炎”。至于胸膜炎，今天已作了长时间的最后的诊察；渗出液“消失了”；剩下的就是所谓的干性胸膜炎；液体一点儿也没有了，但还

① 见本卷第318—319页。——编者注

有象布料摩擦的沙沙声—— 如果为了通俗一点可以这样不正确地形容的话。库奈曼认为,为了顺利地结束这件事,最好我今天再涂一次斑蝥膏,然后到卡恩去呆几天,在这以后可以到巴黎去。

在他看来,我得胸膜炎只不过是非常偶然的,一般说来按我这样强壮的、正常的体格,本来可以永远不得这种病;但是根据同样的理由,在四十年以前我也可以得这种病—— 偶然嘛!由于有复发的可能,要根除这种病比较困难。

因为我美丽的前胸后背全部暴露出在他的面前,他便叫我注意:由于患胸膜炎,过去左侧比右侧扩大了;现在相反,左侧(说的是患处)比右侧紧缩了,而这正是我治疗的结果。为了完全根除胸膜炎的最后的残余,即所说的难忘的标记,建议晚些时候到空气比较稀薄的山区去住一个时期。肺部必须通过这样一种锻炼,即周围环境本身强迫它进行的锻炼才能重新得到"矫正"。我当时很难听懂那些细节,因为他为了使我更能听懂 (关于细节方面的) 法语起见,常常辅之以亚尔萨斯的德语,而有时辅之以某些美国式的英语。不过斯蒂凡医生第一天就告诉我的一点是清楚的,他说:您的胸腔还是原样子;因此如果形成的多余的组织压缩了一侧肺所占的地方,那末这一侧肺就只好满足于较小的空间。随着这个组织的消失,这一侧肺重新相应地扩张。我刚刚从库奈曼处回来,现在将近下午六点,邮局就要停止 (六点) 今天的工作了。由于今天夜里我要上最后一次斑蝥膏,明天根本谈不到写信的问题;后天我应该休息,因此在 6 月 2 日或 3 日你们"未必" (因为我还要收拾行装) 能继续得到我的消息。

致衷心的问候。

老摩尔

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6月5日于卡恩

亲爱的弗雷德：

5月30日，在背上打了最后的（在蒙特卡罗）烙印；5月31日，继续施行的手术把我软禁在家里；6月3日，我从库奈曼处解放出来，当天就离开了。他建议我无论如何要在卡恩逗留几天[52]，因为单是为了使手术后的伤口“干燥”，也必须这样做。

于是，我就在上流社会的懒汉或冒险家的这个巢穴里混了整整一个月。这里，自然景色非常优美，而在其他方面，是个无聊的地方；它是“宏伟的”，因为完全是由大旅馆构成。除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的旅馆、咖啡馆等等的听差和仆役之外，这里没有任何平民“群众”。这个老强盗窝，即摩纳哥，座落在凸出的山岩上面，三面海湾环抱，它至少是个古老的中世纪意大利式的小城市；另一方面，迅速发展起来的康达明，大部分建筑在摩纳哥“城”和“赌博场”（即蒙特卡罗）之间的下面靠海的地方。确切地说，康纳哥，这是“政治”，“国家”，“政府”；康达明，这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而蒙特卡罗，这是“娱乐场所”，并且由于赌博场的关系是整个三位一体的财政基地。值得注意的是，格里马耳迪们本性难移；过去他们靠海上掠劫为生，比如，他们之中的一

个[①]给洛兰佐·梅迪契写信说：他们的土地有限而且贫瘠；因此，大自然本身就促使他们从事海上掠劫；洛兰佐一定会因此而宽宏大量，保证每年给他们赠送“礼物”，因为他们未“敢”抢劫佛罗伦萨的船只。这就是洛兰佐每年付给他们一点赡养费的原因。

在神圣同盟战胜拿破仑之后，达来朗为了消遣从流亡者中间选中一个极坏的恶棍即过去摩纳哥的暴君[②]作为自己的伙伴，—— 于是达来朗制造了一场恶作剧：让他，即“弗洛雷斯坦”[③]的父亲“为了王朝正统原则”而“恢复王位”。这两个恢复王位的人—— 在黑森—加塞尔恢复王位的人[④]和在摩纳哥恢复王位的人[53]—— 是值得写进普卢塔克的新版本[⑤]中去的一对。而且热那亚人[①]（主要是靠抢劫钱财为生）和德国“族长”[③]是多么好的对比啊。

我们的库奈曼医生仍然为一件事而暗自悲伤，他（库奈曼）已经就职当了现在最显贵的（完全瞎了的）查理三世的御医，但由于持有自由主义信念被辞退了，并且不得不把位置让给了一个英国人（皮克林医生）。在自然选择中，即在挑选小国的小暴君的御医时，英国人占了上风，这当然是由于这个畜生的天性本身起了保证作用！但最可恶的是：这个皮克林医生本人，在他由于自然选择应召去当御医之前，在摩纳哥得了重病，库奈曼医生给他治疗并且治好了他的病。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伤心的、非常不幸的悲剧是很多的！

---

① 朗伯托·格里马耳迪。—— 编者注
② 奥诺雷四世·格里马耳迪。—— 编者注
③ 弗洛雷斯坦一世。—— 编者注
④ 威廉一世。—— 编者注
⑤ 普卢塔克《比较传记》。—— 编者注

说也奇怪，这种热天气使我的由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不是好转，而是恶化了。当然，得感冒的“借口”就更多了！但是，库奈曼 (而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他象通晓法国的医学文献一样地通晓英国的、德国的医学文献，是肺病和胸腔科专家) 不同意你关于返回巴黎的意见。他说我不能进行这样一次在途中不断停歇的旅行。说现在的天气不仅白天炎热，而且晚上也温暖；现在得感冒的主要危险是在火车站上；我在旅途中停歇得越多，复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我在卡恩必须带两瓶好的波尔多陈酒，供旅行时饮用。跟斯蒂凡医生一样，他的论据是：无论是医治胸膜炎，还是医治支气管炎等，都应把胃看作基础；应当吃得好而多；甚至要强迫自己“习惯于”这样做；要“喝”“好酒”，如果不能多走路、爬山等，可以经常乘车等去散心；要尽量少思索等等。

于是，遵照这个“教导”，我正走在定会成为“白痴”的道路上，虽然如此，我还是没有摆脱支气管卡他。

老加里波第因得支气管炎而“永生了”[54]，这对我是一种慰藉。当然，到了一定的年龄，因为什么而“去见上帝”，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我从5月3日来到这里，今晚离开。在尼斯，以及这次在卡恩都例外地有大风 (虽然是暖和的) 和尘柱。连大自然也具有某种小市民的幽默 (例如，早在旧约里就说用尘土喂蛇，就象幽默地预示达尔文说蚯蚓以尘土为食物一样[55])。且看里符耶腊所有地方报刊上流传的这样一个自然界的笑话：5月24日有一场可怕的大雷雨，特别是在门顿；雷电劈了紧靠车站 (门顿) 的一个地方，并且把在它附近行走的一个市民脚上的一只鞋底劈落了，而那个

市民的其他地方却安然无恙。

热情问候你们大家。

老摩尔

我要过几天之后才把我来到巴黎的消息告诉朋友们。我还必须尽量少和“人们交往”[56]。我感到杜尔朗医生是一个出色的咨询医生。

32
马克思致恩格斯①
伦　　敦

1882年6月9日于阿尔让台镇
梯也尔林荫路11号

亲爱的弗雷德：

你知道，就象假释犯一样，每到一个新地方[57]，我都必须到最近的医生那里去报到。所以，昨天去杜尔朗医生处进行了检查。健康情况和离开蒙特卡罗时一模一样。对于支气管炎，我将试用恩吉安的硫矿泉水治疗几个星期，从阿尔让台到恩吉安坐车要十五分钟左右。如果硫矿泉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那杜尔朗医生就想让我到比利牛斯山区（科特雷）去。（库奈曼医生也向我讲过同样的意见，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已开始给我吃硫磺片。）恩吉安的一位专家②是杜尔朗的密友，杜尔朗将为我写一封介绍信给他。总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② 弗纪埃医生。——编者注

之，杜尔朗医生认为，我的健康状况和体力同离开的时候已大不一样；在经过两次复发并且用过十四次斑蝥膏之后，我的健康状况还这样好，连他也感到惊讶。

问候你们大家。

老摩尔

龙格每天晚上给我带来他完全用不着的《旗帜报》。我还没有给加斯科尼人[1]写信。咳嗽迫使我谢绝朋友的访问。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弗雷德里克·恩格斯先生

33

马克思致恩格斯[2]

伦　　敦

1882年6月15日　[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弗雷德：

我本以为能把大约自上星期以来的进展情况告诉你的。但是我刚一来到，更确切地说是在我来到后的第二天，气温就降低了。这样一来，就如杜尔朗医生和他的朋友恩吉安的医生[3]说的那样，天气目前还不允许我开始用硫矿泉水进行治疗。按我过去的状况，

① 拉法格。——编者注
②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③ 弗纪埃。——编者注

在吸烟的幸福时期，这种天气对我来说可真是好极了！尽管天空相当经常地被云遮盖着，不时下雨，刮风，与其说象夏天，不如说象深秋，然而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这仍然是很舒服的天气！

昨天—— 在我给圣保罗，加斯科尼人[1]写了信以后，—— 他来看了我。我见到他，很高兴。在得到我进一步的指示以前，他将按照我的意见对我来到此地一事保守秘密。

我睡得早，起得晚，同孩子们和小燕妮[2]一起度过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到目前为止一直尽量利用每个有利的时刻进行短时间的散步。我在这里感到自己比在阿尔及尔，蒙特卡罗或卡恩的任何时候都好。而且这里的天气看来也将好转。我第一次去恩吉安之后马上给你写信。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摩尔

小杜西作为目击者写了一个关于海德公园群众大会的很有意思的报道。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弗·恩格斯

① 拉法格。—— 编者注
② 燕妮·龙格和她的孩子们：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 编者注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6月22日　[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弗雷德：

你的信到来时离邮局下班总共只有几分钟了，邮局关门早得要命，因此只能写几行。

直到今天才能把进展情况告诉你，因为从星期天到昨天都是雨天，我的硫磺治疗曾经中断，到今天才恢复。科特雷现在冷得要死，而且那里的治疗季节一般要到七月中旬才开始。因此恩吉安这里正是时候，虽然天气至今还不适于不间断地利用水疗院。也许其他的人可以不太在乎，但有"余迹"的人就不得不小心谨慎。杜尔朗医生说，全部困难在于要避免能引起胸膜炎复发的各种情况。

让纽约的先生们自己"翻印"自己负责好了，只是要他们别任意增补。[58]

星期天我们等海伦[①]来。

因为我还必须避免作任何长时间的谈话，所以，让拉甫罗夫知道我在此地，目前还为时过早。他恰恰是一个能够使我整整聊上几个小时的人。

问候小燕妮[②]。

你的　卡·马·

---

① 德穆特。——编者注
② 原稿如此，但马克思显然是指杜西。——编者注

35
马克思致恩格斯[①]
伦　　敦

1882 年 6 月 24 日　[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弗雷德：

昨天收到挂号信；今天在巴黎取了钱。由于天气的种种变化，我的胯股附近得了肌风湿；加上其他种种原因，结果 22 日到 23 日的那个夜间由于剧痛未能入睡；第二天一天没有吃东西（昨天仍然在恩吉安作了硫磺吸入疗法）；杜尔朗晚上来了，用涂擦鸦片的办法给我治好了；这样一来，这次事故就消除了，只剩下一点肌风湿的轻微的症状。

至于恩吉安，那末第一个应当回答的问题——因为这要看各人的情况——是这里的硫矿泉水作用够不够大？无论如何，莱茵哈特在这里治好了自己的支气管炎，更早一些时候龙格也是如此。龙格在他结婚前好久好久的时候，还去过科特雷。科特雷海拔约一千二百至一千四百米。如果我用不着为了支气管卡他到那里去，我将非常高兴；不管怎样，在目前还谈不上去科特雷。海伦[②]将到圣拉查尔站下车，龙格去那里接她。

祝好。

摩尔

---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② 德穆特。——编者注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弗·恩格斯先生]

36
马克思致恩格斯[①]

伦　　敦

1882年7月4日　[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弗雷德：

夏季是从7月1日（或者更确切些说，只是从7月2日）才真正开始的。到目前为止我已洗了两次带淋浴的硫矿泉水浴，明天洗第三次。从来还没有尝试过比用水龙带满身浇水（换个说法就是淋浴）更美妙的事了。从浴池出来站在一种木板搭的台子上，而且处于“天然”状态，然后管浴疗的人，象音乐家使用他的乐器一样，使用水龙带（大小和消防水龙带差不多），一面指挥身体的动作，一面在一百八十秒钟（即三分钟）之内忽弱忽强地轮流扫射身体的各个部位（头部，大脑区除外），一直到腿和脚都包括在内，并且不断地逐渐增加喷水量。

你看得出，一个人在这里为什么会不想写信：早晨八点半我要到达火车站（也就是说这正是去恩吉安的开车时间）；近中午时回到阿尔让台；接着马上吃早饭，之后觉得非常需要休息，因为各种形态的硫磺使人疲劳；然后在户外散步等等。硫磺蒸汽使吸入治疗室内昏暗不清；在这里要呆三十至四十分钟；每五分钟在一个特定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没有署名。——编者注

的桌旁(从一个带开关的锌管中),吸入以特殊方法喷射出来的含有硫磺的蒸汽;每个人从头到脚都用橡皮裹住;吸完之后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围着桌子行军,这是但丁《地狱》中的无罪的场面①。

问候肖莱马。我有一张我在阿尔及尔照的像片要给他。

拉法格自认为是这里的伟大的预言家。对他来说巴黎是世界上唯一值得人生活的地方。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弗·恩格斯先生

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8月3日星期四于阿尔让台镇
梯也尔林荫路11号

亲爱的弗雷德:

难以写信的原因如下:早晨七点半开始洗脸,穿衣,喝晨咖啡等;八点半坐车去恩吉安,多半要到中午才回来,然后在阿尔让台同家里人一起吃早饭;中午两点到四点休息,然后散步,和孩子们玩,所以听和看(特别是思维)的能力,丧失得比黑格尔本人在《现象学》②中还厉害;最后,晚上八点吃晚饭,一天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哪里还有写信的时间呢?

小杜西帮助小燕妮做很多很多的事,很难说她在这里是休息;

① 指但丁《神曲》中对地狱的描写。——编者注
②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编者注

杜西对孩子们和可怜的小燕妮[①]非常好，她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表现出了在伦敦没有发挥出来的特长。

杜西和劳拉还没有见面，她们也未必急于见面。出于礼貌，她们还是应当在我这儿哪怕是见一次。

现在首先谈谈健康情况。我的治疗是6月17日开始的。天气至今不大象 (法国) 平常的夏天，以致恩吉安六月开始的疗养季节，对于有水疗院的疗养区来说，被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这里的人们希望八月和九月会“好一些”。气温不断变化，天空经常布满着云，预示着尤其在中午以前有雨和暴风雨，风很大，空气充满着水蒸汽，因此总是闷热—— 就象是伦敦的“闷热”状态。法国人好不容易摆脱了和英国的联盟；英国的气候 (我指的只是伦敦的气候) 似乎反而越来越加入这里即巴黎及其近郊的国籍了。至少今年是如此。当然，间或也有一些天或一天中的某些时候天气是很好的。在这种条件下我在治疗过程中不得不与“一些愉快的障碍”作斗争。大概琳蘅记得，有一天弗纪埃医生给作了检查，几个小时之后杜尔朗医生又给作了检查，两次检查都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嘶哑声已消失，同时“支气管”卡他也已消除。关于“这类情况”我没有告诉过你，因为我预感到这种支气管卡他还绝没有嘶哑地发出它的最后一音。事实上，当天气突然变坏时又听到了嘶哑声。咳嗽并没有“消失”(的确减轻了好多)，这我知道；但在咳嗽性质发生变化之后，可能还留下一点儿咳嗽。

本星期一 (7月31日) 弗纪埃医生在听诊时发现还有嘶哑声，虽然减弱了些；他说，天气恰巧对于这类病特别不利。病人平均只能进行三个星期的硫矿泉水治疗；实际上很多人无法长期忍受

① 燕妮·龙格和她的孩子们：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 编者注

这种治疗而不得热病，等等。根据我的总的来说算是强壮的体格，他认为，——因为咳嗽还使我得不到安静，特别是每天早晨——最好把治疗延长到八月中旬，继续作吸入疗法，沐浴，淋浴以及喝硫矿泉水；若是超过这个期限那就不适宜了。当然，我完全听从医生们的劝告。的确，另一方面，要实现去恩格丁[59]的计划显然会太晚了；弗纪埃和杜尔朗都担心，这样我可能要冒气温变化不定的危险，尤其是在我这种状况下，没有特殊的必要不应这样做。

我希望你无论如何到这里来几天 (拉法格一家很容易在巴黎给你找到住处)，这不仅是为了我可以和你讨论今后怎么办，特别是你知道，在用过所有这些可恶的斑蝥膏之后，我是多么渴望再见到你！何况是在我几次濒于死亡之后！

小劳拉给我写信说，杰维尔将于8月2日晚坐车到他的故乡塔布城去。但因我表示想要见见他，梅萨提议8月2日在他家里安排一顿早饭，我可以趁此机会同拉法格一家，以及杰维尔和盖得见面。这是我第一次接受这类邀请。(由于热闹的谈话或者闲聊，事后我至今仍然感到疲劳。)事情经过良好。我觉得《公民报》的人就埃及事件[60]等所举行的一些公开集会是成功的；至于他们报纸的成绩，那末，相反地，还不能令人满意。顺便提提，且不说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报纸，相当多的最有影响的一部分巴黎报刊，也比伦敦报刊要独立自主得多。尽管有大多数职业政客的压力，尽管有在甘必大直接领导下共同行动的《法兰西共和国报》、《时报》和《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的密谋，另外，尽管金融巨头 (路特希尔德等)——同英国人一起对埃及进行十字军远征，对他们有直接利害关系——企图实行收买，巴黎报刊还是戳穿了想同英国或同四国同盟[61]一起去进行干涉的一切阴谋 (甚至弗雷西纳的伪装起来的阴

谋)。如果没有这些报刊,克列孟梭就不可能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在伦敦哪里有"独立自主的"报刊的一点点影子呢?

我确实不记得,洛里亚的伟大著作[①]放在我的藏书中的什么地方;而且我认为,它不值得你花工夫去寻找。你知道,读了这部"著作"以后 (或者更确切地说,读了这本书的前半部,因为我没有耐心再读下去,后半部只是翻了一下,看了看洛里亚先生怎样幻想用恰当的方式来建立他的标准理想——小土地所有制即小农所有制),洛里亚在私人场合对我的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和在公开场合的"优越"腔调,以及为了便于反驳而对我的观点所作的某种歪曲——所有这些都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高兴。但是,尽管按最初的印象我不想和他发生任何关系,我还是比较密切地注意了他,因为他显示出有才能,因为他啃了很多书本;因为他,这个可怜的家伙,给我写了很多关于他渴望求知的信;因为他还很年轻,而他那绝非青年人的,而是自作聪明的古旧的倾向,看来,部分地要由意大利的条件来解释,部分要由他所受的教育来解释;最后,因为他在当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掌握、而有时还不无成效地掌握了他在《资本论》中找到的研究方法。使我感到"好玩"和高兴的是,他为在自己的《土地所有制》[①]中证明《资本论》已经过时而洋洋自得。虽然如此,我过去只是对这个青年人的"性格"有怀疑。

但是,当我读完了这两本小册子[②],在杜西来到这里两天以后,我就向她说出了自己最后的、明确的并且是非常肯定的判决,

---

① 阿·洛里亚《地租和地租的自然消失》。——编者注

② 大概是指阿·洛里亚的小册子《意大利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和《人口规律和社会制度》。——编者注

我的用语，——你猜怎么样？——就是小杜西也惊讶地发现，竟和我给她看了的你7月31日来信的用语一字不差地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你和我——不仅得出了完全一模一样的结论，而且对这一结论用了完全相同的表达方式！在这种条件下，今后对待他可以只限于采取讽刺性的防御，而不以任何其他的方式作出反应！他比小考茨基要坏许多倍，后者至少有些善良的愿望。

顺便说一下希尔施，如果他确实曾和梅林一起行动[62]，那末党永远也不会原谅他这一点。如果我能见到他，那末一定直接叫他回答。但是，对于有关我的情况的争论，最好保持沉默。否则，工人们会怎么想呢——似乎我只是装病并且很不必要地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

拉法格一家下星期将搬到他们那所真正的住宅去，住宅很好，而按这里的房租讲，据说是很便宜的。再见，老朋友。并向琳蘅问好。

你的　摩尔

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8月10日星期四　[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弗雷德：

下星期二我将从弗纪埃医生处得知，我应最后同恩吉安告别呢，还是仍需继续治疗一些日子。

很遗憾，我不得不通知你，如果我（和劳拉一起）要离开这

里到瑞士去（有人建议我去斐维或类似的地方），在动身之前我还需要添补一些钱。首先，我偶然发现房东坚持要燕妮（这里人们是不开玩笑的）交付三个月的房租，今天我不得不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弄钱来解决这件事。

此外，我希望琼尼和杜西一起到伦敦去（只有一个人反对，——就是龙格，他根本不关心这样做是否会减轻小燕妮的负担，以及这是否会对琼尼有好处）；到那时我还要给杜西一些钱，让她在英国带着小男孩到海滨去住两个星期。龙格先生不让琼尼到我们这里呆半年的主要借口是：为了身体健康，琼尼需要诺曼底的海洋空气，因此龙格打算把他送到住在卡昂的老龙格夫人那里去。

事实上琼尼在这里变野了：在法国居住期间，他连在读书写字等方面已经学到的那一点点东西也忘记了；由于生活无聊（即由于［无］[1]事可做），他变得不听话了，给小燕妮增加的麻烦比其他三个孩子[2]更大。龙格先生对这个孩子“什么”也不管，他的“爱”就表现在他为了每天能见到他几分钟而不愿让他离去，因为龙格在阿尔让台午饭前多半是躺在床上，下午五点又要到巴黎去。

由于小燕妮面临的情况[3]，龙格以后根本无法管住琼尼这个孩子。杜西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导者，她会把他引上正路。因此龙格至少失去了下面的“借口”，这孩子不能去英国（在那里杜西同样会把他送到学校去），因为他必须“去海滨”。他应当“去海滨”，不过是在英国。

---

① 手稿照片上此处有插入号，但无插入语。——编者注
② 燕妮·龙格的年岁较小的孩子：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③ 分娩。——编者注

除了上面所说的一些开支以外，在给医生[①]付了钱和购买了各种必需品之后，我剩下的钱就不够支付从这里去瑞士的旅费了。这样压榨你，我感到很不好受，但是如果不直接回伦敦的话，没有这笔钱是不行的。

祝好。

摩尔

据法国各报，即巴黎各报，首先是《时报》报道，李卜克内西即将去巴黎，目的是“和德国的工人建立联系并看望从阿尔及尔回来以后住在阿尔让台的社会主义者卡尔·马克思”，我认为这样的简讯[63]散发着“警察的”气味，甚至对李卜克内西来说也太轻率了。如果他还能在这里见到我，我就要对他完全坦率地指出他的“轻率举动”(全都出于他喜欢妄自尊大)。

39

恩格斯致马克思

阿 尔 让 台

1882 年 8 月 20 日于大雅默斯市[64]

哥伦比亚坊 10 号

亲爱的摩尔：

钱来了，我今天立即去银行定购了一张一千二百法郎的支票。可望于星期二收到它。

---

① 弗纪埃。—— 编者注

上星期二医生大检查的情况如何？[1]至今还没得到任何消息。

如果支票兑现有困难，那就干脆把它寄回，我再改用汇票给你寄到巴黎去。寄支票这种事只是一种万不得已的办法。

彭普斯和婴儿[2]都很愉快，小家伙已经有两个牙了。肖莱马过一个星期以后要到德国去。开饭了，只好就此搁笔。

你的　弗·恩·

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大 雅 默 斯

1882年8月21日星期一于阿尔让台镇
梯也尔林荫路11号

亲爱的弗雷德：

“变成现银”[3]是在前天实现的。

从上星期一开始，整个一周天气特别坏；下雨（有时寒冷），有暴风，闷热；主要是潮湿，然而巴黎当局却“正式”通知“缺水”。这里的官僚甚至在发生圣经里面讲的那种大洪水的时候，也能制造出饮用、洗涤、家庭和工业等等用水“正式缺水”这种事来。

昨天我最后一次去恩吉安的吸入治疗室，进行了沐浴和淋浴，在临别的时候，弗纪埃医生就地给作了检查，结果如下：

(1) 支气管的嘶哑声大大减少了，要不是可恶的天气，也许

① 见本卷第77页和下一封信。——编者注
② 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
③ 戏指收到了恩格斯寄来的钱。——编者注

会完全消失了；

⑵ 胸膜炎的摩擦声依然如故；这是早已预言过的难治之症。在最好的情况下—— 而这种情况绝不是常见的—— ，这种胸膜炎留下的纪念也要保存若干年。让我到日内瓦湖去—— 到目前为止，那里传来的天气预报是很好的—— ，因为两位医生[1]都认为，支气管卡他的最后遗迹可能会在那里自行“消失”。走着瞧吧。对于呼吸山地空气以进行肺部锻炼来说，季节太晚了，首先应该避开寒冷。

按医嘱这一次只能在白天去瑞士，所以我得在第戎过夜，第二天才能慢慢腾腾地向目的地前进。希望根除任何引起“复发”的因素。

小杜西已经在上星期三带着琼尼走了；我们收到了她的来信；一切顺利。她打算 8 月 19 日 (星期六) 和琼尼一起到伊斯特勃恩去。因为从她的教育目的着眼，首先必须使这孩子一开始就绝对处于她的监督之下，所以杜西选择了这个滨海的小城市，在那里他找不到任何“朋友”。

遗憾的是小燕妮常闹小病。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她得不到任何安静和休息。

劳拉身体很好；明天她和我一起走。

利沙加勒同布鲁斯一伙的争吵[65]产生了一个良好的结果，即后者不再拥有任何一家日报了。外交家马隆在这件事情当中对布鲁斯采取中立态度，因为他 (马隆) 不敢与《不妥协派报》总编辑罗什弗尔相逆，冒昧地在该报对布鲁斯之流表示同情 (马隆也

① 杜尔朗和弗纪埃。—— 编者注

不“想”“敢于”这样做)。

盖得和他那一派正在巩固自己的地位。

衷心问候肖利迈和彭普斯。

祝好。

摩尔

龙格先生以其习惯的待人接物的态度，要带鲁瓦到我这里吃饭；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为此找到适当的日子，却选择了今天，而今天我需要收拾行李等等，此外我得去和杜尔朗医生告别，最后还想和小燕妮单独在一块呆一会儿。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大 雅 默 斯

1882年8月24日于洛桑北方旅馆

亲爱的 [弗雷德]：

昨天从第戎到洛桑[66]途中一直下雨，天气较冷。晚九点在雨中到达洛桑。我向茶房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里是什么时候开始下雨的？回答是：才下了两天 (也就是我从巴黎动身的那天起)。真有意思！

我们打算今天到斐维、蒙特勒等地去看看，以便选择住处。信暂时寄到洛桑，留邮局待领。还希望能及时得到若干后备“弹药”，以便随时应付各方面的用途。收信人写沙尔·马克思博士，不要写卡尔·马克思。

龙格到我动身的那天为止还是那个老样子。我前两次在阿尔让台逗留时[67]，龙格一直答应《资本论》的译者鲁瓦这个可怜鬼同我会面；每次龙格都没有找到适当的时间。而这一次，龙格又纠缠着要我同鲁瓦会面，我就让他安排在最近一个月之内。结果怎样呢！恰好在我要动身的那一天—— 当时我要收拾行李，要去和杜尔朗医生告别，还有很多话要和小燕妮谈—— ，龙格没有预先通知我，就跑到巴黎把鲁瓦弄来，把他带到阿尔让台吃饭 (在中午一点钟)。这一天刮着寒冷的东北风，我同可怜的鲁瓦在花园里进行了推托不了的谈话，结果我得了感冒。这要感谢龙格！

顺便说一下。一个在巴黎为德国许多资产阶级报纸效劳的德国记者写信给我，极其阿谀奉承地向我表示敬意。他认为凭良心应该告诉我，他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当然，也不是这派报纸的记者；但是，他说德国“社会”各界对官方关于我的健康状况的报道感到不安；因此他请求到阿尔让台访问我，如此等等。

当然，我没有答复这个阿谀奉承的下流文人。

问候你们大家。

摩尔

等咳嗽再次好转，我一定到日内瓦拜访老贝克尔和符卢勃列夫斯基。

42
恩格斯致马克思
洛　桑

1882年8月25日于大雅默斯市
哥伦比亚坊10号

亲爱的摩尔：

电报刚刚收到，匆匆写这封短信谈几件事。星期三[①]晚上接到了你的信[②]，但就在那一天，在接到来信之前我已把从阿·凯泽尔银号那里拿到的、开给巴黎希尔施长子的一千二百法郎凭票即付支票给你寄往阿尔让台。第二天我就写信给燕妮，告诉她信里装有什么，并请她仔细办好一切。从那里取款不会有什么困难。

我们在这里还要呆两个星期，在这里，大家的健康有很大的增进，只有肖利迈在天气不好的时候，风湿病间或发作。他星期一要到德国去，我将同他一起去伦敦；打算把杜西和琼尼带回来。

希望你那里的天气比我们这里最近四天的天气要好些，但又能有海洋空气对我们所起的那种作用。小家伙[③]的食欲增长得惊人，体重显著增加。

大家衷心问候你和劳拉。

你的　弗·恩·

对德·巴普用手枪射击杜韦尔惹[68]一事你作何感想？啊，绿眼

---

① 原稿为："星期一"。——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80—82页。——编者注
③ 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

的妖魔！[1]

43
恩格斯致马克思
洛　桑

1882年8月26日于大雅默斯市
哥伦比亚坊10号

亲爱的摩尔：

今天早晨收到你[2]和劳拉从洛桑寄来的两封信，现在我利用房中暂时出现的安静时刻给你写信。这一次天气不好，不是你而是《纽约先驱报》预报的低气压区造成的。如果杜西可以把以前这里下雨的原因归咎于你在巴黎时离我们太近，那末现在我们必须指出，最近天气变得潮湿起来是恰恰发生在你远离我们这里的时候，而且星期三晚上，我们这里和你们洛桑一样，也是大雨倾盆。今天早晨仍然是一阵接一阵的大雨，而预报所说的以后会有的好天气还不知何时到来。

龙格这样不懂事，真见鬼！在寒冷的东北风中偏偏在花园里接待鲁瓦，难道这是绝对必要的吗？

埃及的战争[69]开始很顺利。《科伦日报》直截了当地断言，英国人在两个半小时之内就把亚历山大里亚炮台打哑了，其余五小时继续进行炮轰完全是为了摧毁城市。—— 迅速占领运河业已顺利地实现了，不过我刚一得悉，沃尔斯利在放人登上战舰的时候

① 莎士比亚《奥赛罗》第三幕第三场。—— 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82—83页。—— 编者注

曾故意大肆张扬说，目的是去炮轰阿布基尔，当时我就对一切都明白了，我就能向肖莱马说出与现在所执行的完全相符的全部作战计划。后来我从过期的几号《科伦日报》上得知，经伊斯美利亚向开罗进军的计划早在十天到十二天以前全伦敦就都知道了。机密保守得多好啊！这个计划本身是在目前情况下可能作出的最合理的一个。不过不可能很快付诸实现。固然，狡猾的英国人运去了野炮，但是既无马匹也无骡子驮运。目前正在南欧和非洲购买骡子。在一个平坦的没有森林的国家进行侦察，系留汽球是不可缺少的，原来拒绝使用这种气球，现在却在追运。在亚历山大里亚近郊埃及人的筑垒阵地前面加强了侦察，但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谁也不会那么蠢，会把自己的兵力展开在筑垒阵地前面。沙福依尔附近的英勇事迹非常可笑——五个小时的战斗，两个英国人负伤！沃尔斯利已有三万人，目前正在要求调遣他的第三师，但这个师还只是在动员中。而当这个师到达的时候，在他占领亚历山大里亚和开罗之后，也未必有足够的军队去肃清三角洲和占领沿岸各城市。如果阿拉比很聪明，避免任何决战，向中埃及和上埃及撤退的话，事情就会大大拖延下去。且还不说，在尼罗河稍微提前涨水的情况下，掘穿大堤就可以使英国人的一切全都付之东流。不过越来越有可能，事情的最终解决不会是通过军事行动，而是通过幕后的外交把戏。

有一件颇为不错的小事：担任不列颠协会主席的卡·威·西门子揭露了官僚主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70]在英国，米制同旧制一起合法使用已经多年。人们还是很想从巴黎订购米原器和公斤原器的精确复制品。但是如果有人希望从有关机关获得这些单位的精确的、经过检验的复制品，那末该机关就会回答说：议会

的有关条例并没有授权它也没有责成它办理这件事。但是如果你作生意时使用的不是该机关所许可的米和公斤，那末这就是欺诈和犯罪。于是，这个小小的“很有道理的”疏忽就把整个条例一笔勾销了，结果是，算了吧，一切照旧。顺便谈谈，正如西门子所断言的，从大陆上普遍采用米制时起，保留旧制对英国工业非常有害；许多机器之类据说现在已不能出口，因为它们适合于另一种量度，而不适合于米和公斤。

但愿你的咳嗽逐渐痊愈，并且终于等到较好的天气。你旅行时在轮船上要多加小心。晚间水上常常寒冷多雾。在明年春天以前，看来，你还需要多加保重，然后你的支气管炎将最终根除；此后到高山疗养区进行一些肺部锻炼，到那时我们就渡过难关了。

窝州有一种上好的伊服尔酒，很值得推荐，尤其是陈的。还有一种纽沙特尔红酒，叫科塔伊酒，这种酒有些起泡沫；泡沫在酒杯中构成一种星状，这种酒也相当好。最后，维尔特林 (瓦尔特林纳) 酒是瑞士最好的一种酒。此外，我住在那里的时候 71，普提布尔格酒、马康酒和波若列酒都非常好，而且不贵。你大胆地饮这些酒吧，如果漂泊不定的生活终于使你感到厌倦了，你就想一想，这毕竟是能够使你恢复过去精力的唯一办法；这种精力可以暂时保养一下，但有朝一日它对我们是大有用处的。如果你见到贝克尔和符卢勃列夫斯基，请代为问候。

全体“伙伴”衷心问候你和劳拉，我下一次就给她写信。

你的 弗·恩·

44
马克思致恩格斯[①]
伦　　敦

1882年9月4日于斐维市勒芒湖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劳拉将详细写信告诉你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事件，或者确切些说，并非没有的事件，因为我们住在这里[72]就象生活在乐土中一样。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沿湖游览了一番。

8月31日我收到了小燕妮的信，附有你的信和一张支票；我已将支票交给这里的任顿银号，以便在巴黎兑取。

8月31日、9月1、2、3日天气非常好（昨天太热）。今天有暴风并下雨；但愿这场雨不会变得连绵不断。奇怪的是，我仍然老是咳嗽，看来我是斐维唯一咳嗽的人，至少我没有遇到第二个。不过我的一般状况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我和劳拉一起爬上了这里的葡萄园高地，以及蒙特勒的更高的葡萄园，一点也没有感到呼吸困难。

巴黎市参议会议长桑让先生曾到我们旅馆里访问过我；他是我1849—1850年期间在伦敦认识的流亡者之一。他送给我一份曾被派往罗马参加颂扬加里波第活动[73]的代表团（桑让本人也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向巴黎市参议会所作的正式报告；报告主要是颂扬“桑让”自己，因为他总是代表其他法国代表发言。他还把一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没有署名。——编者注

册《资本论》拿给我看，这册书似乎是他到离此不远的森林中幽居时给他作伴的。

英国人在埃及[60]迄今还没有获得象沃尔斯利所“预告过”的那种十分迅速的成功。

昨天我从《日内瓦报》附刊上看到，微耳和先生再次论证，他远远超过达尔文，他实际上是唯一有学问的科学家，正因为如此，他“蔑视”有机化学。[74]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弗·恩格斯先生

45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斐　　维

1882 年 9 月 12 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明信片①和劳拉的信都收到了。使我高兴的是，终于有了好天气，但愿这种天气能够持续下去。我们星期六回到这里；杜西、琼尼和我们一起在雅默斯度过了一个星期。

对桑让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一直在想，这个雍容大度的好心肠的人可能会担负什么使命呢，最后终于在报纸上看到：市参议会议长！这实际上早在 1850 年在他的脸上就已显露出来了。

我手头有任顿银号的若干伦敦期票。

---

① 见上一封信。—— 编者注

如果你还打算在瑞士游览一下，那末你可以选择的最好最方便的旅程是，从日内瓦经伯尔尼前往英特拉肯和布里恩茨，从那里越过勃留尼格 (只有三千一百五十英尺高) 到费尔瓦德施泰特湖，如果你有兴致的话，可继续前往苏黎世。这对于初愈的病人来说是一种轻松的旅行，而且你可以看到瑞士的几个风景最优美的地方。在英特拉肯和琉森或靠近费尔瓦德施泰特湖的某个地方，可多停留一些时间。在日内瓦湖上，莫尔日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从那里可以眺望勃朗峰最美的风景。

埃及事件[60]越来越暴露出有俄国外交在当中捣鬼。格莱斯顿在由可爱的奥里珈①给他足擦了一通肥皂②之后，现在不得不让一个手艺更灵巧的师傅给他刮胡子。英国必须在和平时期占领埃及，以便使可怜的俄国因此也在和平时期不得不为了自卫而占领阿尔明尼亚。高加索的部队已向边境推进，仅卡尔斯一地就驻有四十八个营，—— 这支部队一直处于充分准备状态。为了证明格莱斯顿赞同再把一个“基督教”国家从可怕得不堪言状的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恰恰在目前，故作姿态地把柏林会议[75]之后派往小亚细亚去监督改革的英国全权代表们召回，并公布他们的报告，从这些报告来看，土耳其人把他们愚弄了，一切都是老样子，官吏的腐败作风没有铲除。帕麦斯顿死了，格莱斯顿万岁！也乐于在埃及同俄国人结成联盟的甘必大万岁！遗憾的是，美好的旧时代过去了，俄国已经不是站在俄国外交的背后，而是站在它的对面了。

---

① 奥里珈·阿列克谢也夫娜·诺维柯娃。—— 编者注

② 这里是用《eineifen》一字的几种意思构成的双关语，直译为“擦肥皂”，转义是“哄骗”，“巧妙地欺骗”。—— 编者注

我很想设法到你那里去一趟，但是如果我出了什么事—— 哪怕是一时出事，那末我们的全部财务安排就会陷于紊乱。这里找不到一个人我可以赋予他全权，让他办理毕竟有点复杂的收款等事宜。唯一合适的人是赛姆·穆尔，但他已外出，而这些事只能就地办理。此外，我曾盼望至少今年夏天你能来，哪怕时间不长也好。你不可能在这里度过今年冬天，这一点在你离开英国和你旧病复发之前我就知道了；这我当时就告诉琳蘅了。现在，在旧病复发之后，你要过一个象春天一样的冬天，这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我高兴地得悉，杜尔朗和弗纪埃一致坚决主张这样做；尽管由于你不在这里，我感到非常寂寞，那也只好如此，在你彻底恢复健康之前，其余一切都应退居次要地位。但这里十分重要的是，财务秩序别受到破坏，因此我认为在这一切能够继续下去的时候，我的最严格的义务就是保证自己不遭到任何意外。

加特曼发明了一种电灯，得了专利权，他把这个专利权按照一个订得非常坑人的合同以三千英镑卖给了一个骗子手，因此，他能否得到钱，什么时候才能得到钱，是十分令人怀疑的。他现在又找到了一个职务，但能否长久？对于他的经常不断的时起时落，很难搞清楚。

非常感谢杜西带来的阿尔及尔礼物。匕首是地地道道东方的，锋芒所及，寸草不生。烟斗我还要给它配一个烟管才能试用。彭普斯对她的阿拉伯手镯感到非常自豪。她在忙于布置自己的新居，看样子，还要弄一个星期。她的小家伙[1]在雅默斯明显地长个儿了。琼尼从昨天起，进幼稚园 (在格拉弗顿坊，在你以前的住所

① 彭普斯的女儿莉莲。—— 编者注

对面)。

大家衷心问候你和劳拉。

你的　弗·恩·

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9月16日于斐维市勒芒湖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正当我坐下来给你写信的时候，茶房送来了《日内瓦日报》，上面载有倍倍尔逝世的消息[①]。这是可怕的，是我们党的一个极为重大的不幸！他是德国 (可以说是"欧洲") 工人阶级中罕见的人物。

你对我的忘我的关怀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对此我内心时常感到惭愧，—— 但我现在不想谈这个问题。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就计划一定要在伦敦哪怕是度过十月份，并且一定和你在一起。弗纪埃和杜尔朗也不认为这是冒险，如果十月的天气还可以的话。这还是可能的，尽管九月份多雨。这里的气压计8日上升，9日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下降到12日的最低点，13日又上升 (达到几乎同11日同样的高度)，此后下降，从昨晚起又重新缓慢上升。虽然整个来说瑞士全境都在下大雨，刮大风 (多次发生山崩并因此而造成了许多"伤亡事故")，但斐维附近却是例外，天气比较好 (早晨和晚间头几个小时寒冷，也

① 见本卷第94—95页。—— 编者注

只是一种例外)。因此我们延长了在这里逗留的时间。这里的空气是有益于健康的。尽管一天当中温度和空气湿度不断变化，我的健康还是在好转。我认为我的支气管卡他已变为普通卡他。不过，只有到日内瓦我才能证实这一点，我打算在那里找一个高明的德国医生看一下，即让他给我听诊一下。尽管你建议的旅行[①]令人神往，但在目前瑞士的天气条件下，未必能实现。今年这里的葡萄收成，看样子，“不怎么样”。还可以看到，在米迪峰下了雪——并且较通常为早；在汝拉山脉这是“正常”现象。

伯尔尼《联邦报》宣称沃尔斯利是一个几乎比老拿破仑还卓越的统帅。

同俄国人一起搞的阴谋[②]，有个难题；很可能，俾斯麦乐于让俄国人去搞鬼，不过那时就必须使奥地利得到“安慰”，并且要使普鲁士的君主制得到补偿。因此，俄国人进入阿尔明尼亚可能导致普遍战争，这也许是符合俾斯麦的意愿的。

顺便说一下。那把匕首，从它做得很粗糙这点你想必已经看出，是卡比尔人[76]制造的。至于烟斗的管子，我随身带了三根（在植物园的存货中只给一支烟管配到烟斗），是竹子的。带管子的事我不想麻烦海伦[③]和杜西了，因为管子太长，她们的箱子放不下，我决定自己带回伦敦。

从劳拉刚刚收到的小燕妮的信中得知，龙格带着狼[④]和哈利到奥卞去了。遗憾的是，小燕妮的健康令人担心，这点在巴黎时医

① 见本卷第90页。——编者注
② 同上。——编者注
③ 德穆特。——编者注
④ 马克思的外孙埃德加尔·龙格的绰号。——编者注

生(弗纪埃和杜尔朗)就告诉我了。小燕妮正在不安地等着来自伦敦的关于琼尼的消息;自小杜西带琼尼到雅默斯去以后,她没有得到任何音信。小劳拉今天也写信给小燕妮,也告诉她:琼尼一切都好,而且,象我们从你的信[1]中知道的,他已经进了幼稚园。

衷心问候小杜西、琳蘅、彭普斯和—— 可别忘了—— 我的外孙[2]。

我们如果离开斐维,一定给你写信。

你的 摩尔

普鲁士的恶狗没有用监狱等等来促使倍倍尔的死亡吗?

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斐 维

1882年9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你的信[3]和劳拉的信于今晚九点收到,我立即跑到杜西和琳蘅那里,把必要的内容告诉了他们。

关于倍倍尔逝世的假消息,使我们这里的人也极为震动。早在星期六晚上就有很多材料说明这是假的,刚刚收到的《正义报》刊登的李卜克内西的电报也说,倍倍尔尽管病情严重,但现

---

① 见本卷第89—92页。—— 编者注
② 让·龙格 (琼尼)。—— 编者注
③ 见上一封信。—— 编者注

在他正逐步恢复健康。

我回来的时候，恰好来了消息说，燕妮生了一个小女孩[1]，而且一切都再顺利没有了。

你们如离开斐维，请留下通讯处 (留邮局待领或其他方式)。明后天再详谈。

你的 弗·恩·

衷心问候劳拉。

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9月28日于巴黎[77]

亲爱的弗雷德：

劳拉的信 (我在里面附了一个便条) 因一时疏忽留在劳拉房间的书桌上，所以要到邮局关门后才能投寄。但是为了不耽误时间，我再重复一下：如果杜尔朗医生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允许我渡拉芒什海峡的话，请尽快从伦敦给我寄银行券来 (通讯处照旧，仍寄阿尔让台)。

今天所谓的苍天降了倾盆大雨，尽管阿耳方一直害怕"水荒"。

关于伦敦的天气状况，望立即写上两行告知。

你的 摩尔

① 燕妮·龙格的女儿燕格。—— 编者注

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9月30日于巴黎

亲爱的弗雷德：

正当我准备从阿尔让台到这里来 (即到圣拉查尔车站) 接劳拉，同她一起在巴黎吃完午饭，然后把她带回阿尔让台的时候，正巧邮差给我送来了你的信和附件。劳拉大约一刻钟以后到来，可能会把你给她的信带来。

今天杜尔朗医生给我作了检查，小燕妮也在场。湿罗音消失了，还有点笛鸣音，不过这种顽固的卡他差不多已经消除，其性质已经根本改变了。我的总的健康状况，据医生说，已大大改善，说我甚至“发胖了”。

他坚决主张我在伦敦居留的时间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两个星期，如天气非常好，也不能超过三个星期。他担心的与其说是轻度的寒冷，不如说是潮湿的空气。他认为我无论如何不能乘晚班特别快车经过加来，必须白天到加来去，而且只能第二天乘早班轮船离开那里。

此外，他表示应该及早到威特岛、泽稷岛、莫尔累 (布列塔尼) 或波城作冬季旅行。总的说来，他认为到南方太远的地方对我没有好处，除非必要时才能这样做。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我住在斐维比住在较为温暖的蒙特勒更合适。他的出发点是，正常的气温等等不会因为我的到来而突然再次发生剧变。他最后声明，只

有在得到关于最近几天的令人放心的气象预报之后，才能最后“许可”我前往伦敦（法国医生对伦敦的气候抱有强烈的成见）。他说，如果我不犯任何错误，他现在有把握完全治好。因此在星期二以前我不会离开。

以金融骗子杜克累尔为代表的法国政府，如果知道我在这里（特别是在议院闭会期间），也许会打发我出去旅行而不经杜尔朗医生的许可，因为在罗昂和圣亚田各自召开的社会主义者（两种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78]上的“马克思派”和“反马克思派”已经作了可能作的一切，使我难于在法国呆下去。不过我也得到一些补偿，臭名远扬的同盟式党徒——马隆、布鲁斯等人——“悄悄地”诽谤说，马克思是“德国人”，也就是“普鲁士人”，所以法国的“马克思派”是祖国的叛徒，他们以为这似乎（我们的布鲁诺[①]喜爱的用语）会对人产生影响，但这个希望“完全”落空了；这帮人甚至一次也没有敢“公开”提出这种诽谤。这是一种进步。

克列孟梭病得很厉害，还没有完全复原。他在生病期间离开巴黎的时候也带着《资本论》。看来，对法国真正或所谓的“进步”领袖们说来，在目前这已成为一种时髦了，真是如果“魔鬼病了……”[79]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不要忘了肖利迈。

摩尔

离开法国之前，我一定写信或打电报。

① 鲍威尔。——编者注

50
恩格斯致马克思[①]

文 特 诺 尔

[1882年11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希望你一切顺利。[80]寄上两号《平等报》，昨天寄出两号旧的《科伦日报》。今晚这里狂风大作。昨天关于引渡在直布罗陀的马塞奥的短暂辩论[81]，是格莱斯顿及其同伙的耻辱。琼尼今天拔掉了两颗牙，他的勇敢精神完全出人意外，连沙曼医生也惊讶不已。别无新闻。

你的　弗·恩·

星期三晚

51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 特 诺 尔

[1882年] 11月3日　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明信片已收到；我们本来有些不放心，因不知你在旅行的第二天感觉怎样。一切都好！附上拉法格的来信——总之，布里萨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克、皮卡尔和布伊毕竟一度动摇过！[82]

想必你已知悉，在腊万纳，安得列阿·科斯塔当选，在挪威，共和派多数当选。[83]

附上《平等报》和你一直感兴趣的两个“此地人”的最新功勋。

你的 弗·恩·

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诺尔

1882年11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劳拉今天给我来来一封短信，从这封信看来，《平等报》的命运[84]明天才能决定，但前景是很好的。

你看过今天的《旗帜报》没有？上面刊载的来自法兰克福的电讯说，自伊格纳切夫抵达巴黎以来，俄法妥协的新的尝试正在进行，看来，目前采用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据说，如果法国在引渡带炸药的人[85]方面表现出某种更大的积极性，俄国人将在突尼斯、埃及等地给予法国有力的支持。由此，法国就开展了警察运动！且看，在这个问题上是否会向议院提出什么提案。

拉法格寄给我一份《无产者报》，上面载有在圣亚田宣读的对他、盖得以及其他人的起诉书[86]。纯粹巴枯宁主义的，而且是非常软弱无力的拙劣作品：最有力的论据，是那些互相矛盾的、反映一时情绪的拉法格致马隆的信，马隆放心地公布了这些信，看来，他并不怕拉法格公布他的信。他是对的，这些先生们对自己的材

料使用得很是时候;如果在此以后拉法格硬要拿出马隆的信来,那已经是饭后送芥末了。我明天把这件东西寄给你,不过由于伯恩施坦的缘故,你必须退还给我,我也许还要用它去对付他。我所需要的材料伯恩施坦不是想不寄,就是想连同需要的材料一起把有关工厂立法的半个图书馆寄来,我已制止他这样作——但愿还来得及[①];我每天都在等着瑞士工厂法,我已经替你订了德国最新的工商业条例,其中也包括工厂法[87]。

这里别无新闻。

你的 弗·恩·

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11月8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展出的德普勒的实验[88]你认为怎样?龙格答应给我找德普勒的著作 (专门证明可以通过普通电报线进行远距离输电)[89]已经将近一年了。情况是,德普勒的一个密友达尔松瓦尔博士是《正义报》的编辑,他发表了德普勒的各种研究成果。龙格照例每次都忘了把这些东西寄给我。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了你转寄来的"报纸",在那上面,舍布鲁克和里弗斯·威尔逊作为"伦敦债券持有者的保证人"而大出风头![90]

① 见本卷第388页。——编者注

在昨天《旗帜报》上登载的关于下院的辩论中，格莱斯顿为这些保证人被足骂了一通，因为这个里弗斯·威尔逊还在英国国家债务管理局担任很高的（即报酬优厚的）职务。显然，格莱斯顿被弄得狼狈不堪，他起先试图对此采取轻蔑的态度，但当人们宣布要提出反对里弗斯·威尔逊的决议来进行威胁时，格莱斯顿就撒谎说，他实际上对加尔威斯顿和伊格尔铁路公司等毫无所知。我们的伟大而神圣的老人①在直布罗陀"引渡"一事[91]上所作的表演也颇不逊色。大家都记得，这个格莱斯顿在奸诈狡猾的官僚寡头政界中，并非徒劳地曾同格莱安之流一起受教于罗伯特·皮尔爵士门下。

查理·迪耳克爵士在埃及问题上笨拙地胡说八道，愚蠢地推托躲闪，无耻地支吾搪塞，这对他来说是完全理所当然的[92]。他既没有格莱斯顿的那种虔诚的诡辩，也没有已故的帕麦斯顿的那种风趣的嘲笑。迪耳克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教养的暴发户，他把自己的厚颜无耻看作是伟大。

因为我在这里常买《旗帜报》，所以也在该报上发现了你提到的法兰克福的电讯②。

顺便说一下。如果伯恩施坦给我寄来《年鉴》③，那就好了，上面有奥尔登堡（我记得作者的姓好象是这样的）论述我的价值理论的文章[93]。虽然我并不需要这篇文章，但是如果我手头有一份关于当时人们维护什么观点的材料，总是要好些。在我给荷兰小牧师④写信的时候，这一切我都记得；从那时到现在，这段时期我一

① 格莱斯顿。——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9页。——编者注
③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编者注
④ 指斐·多·纽文胡斯（见本卷第152—155页）。——编者注

直生病，同时我的妻子逝世了，这是我记忆力不断衰退的时期。

这里经常是狂风怒号，尤其是傍晚和夜间；清晨多半下雨，或者至少是阴天；白天经常有放晴的时候，这个时间必须抓紧利用；但整个说来天气是不稳定的、变化无常的。例如上星期日四点钟，我去爬小山，在那里沿着蓬曲施的一条小路散步，小路通到蓬曲施的阶梯式上升的最高的一群房屋（最低的紧靠大海）；再往前去，小路便时上时下，蜿蜒于山脊与斜向大海的山坡之间（上次和杜西到这里时，我没敢爬上这条小路）。在这里可以漫步几个小时，尽情地同时享受山地空气和海洋空气。当时象夏天一样热；蔚蓝色的天空只有朵朵透明的小白云，可是突然下起冰凉的雨来，霎时间天空乌云密布。我的肌风湿（在左胸，接近旧的患处）看来要归功于此，星期一夜间疼得如此厉害，以致星期二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愿望请医生来看。我的老处女麦克利恩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有两个医生常来她家。最大最红的人物是“伊·格·辛克勒·科格希尔，皇家肺结核病医院医生”。我问是否就是我几乎每天都在她家门前不愉快地遇到他的马车的那个老怪物。是的，就是这个人。原来，他经常看望一个长住这里的老女人，“她没有什么大毛病”，但“她喜欢找医生，每星期至少三次”。我谢绝了这个保护人。第二个医生是为她的其他房客治病的，相反地，据说是一个年青人，詹姆斯·姆·威廉森医生。我请了这一位，他的确是一个可爱的年青人，没有丝毫祭司气味。实际上，除了一种擦剂外，他并没有给我开什么药。（在这种肌风湿持续发作的时候，我感到很不舒服，因为这种病引起不愉快的感觉，特别是在咳嗽的时候。）总之，他对这种坏天气表示遗憾。至于咳嗽，最近还在伦敦时就开始越来越讨厌和具有痉挛性了，不过在这方面，我自

己就是医学顾问，但愿不要医生的帮助很快就能消除。

为了在户外散步时不致受到变化莫测的风和反复无常的气温的太大影响，我不得不带一个口罩备用。

《旗帜报》和《地球》上登载的一封信，在这里引起了一场大争吵，这封信说，文特诺尔是伤寒的主要发源地，并且最近好象已有几个得病者死亡。对这一“诽谤”，目前地方报刊上正在发表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的答复。但最滑稽的是，文特诺尔市政厅的庸人们竟打算借此对写信人以诽谤罪提出起诉！

祝好。

摩尔

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 特 诺 尔

1882年11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你的信[①]我当天晚上就给杜西看了。琳蘅和琼尼为了观看市长的就任游行，一早就到派尔希[②]的办事处去了，晚上我们大家聚集在彭普斯家里吃晚饭。琼尼十分可爱，彭普斯家的鹅非常好吃。

你找到了一个称心的医生，我很高兴。一个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有一个医生在身边，总要好一些，如果为了任何小事都往这里

① 见上一封信。—— 编者注
② 罗舍。—— 编者注

写信，那有什么好处？但愿风湿病和咳嗽现在有所好转。

今天给你寄去两号《平等报》以及该报的一期周刊。根据（里昂）全国理事会的宣言[94]你可以确信，里昂人依然是些纯粹不学无术的人。关于同巴黎资本家谈判的进行情况，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消息[84]；也就是说，看来还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迪耳克在回答使之难堪的问题时所持的无礼态度实在令人吃惊，然而看来这正是那些支持他的自由派暴发户所非常喜欢的。[95]现在，他们很快就会感觉到辩论结束的后果。直布罗陀事件日益恶化；不但警察局，而且地方长官①即法官也发出了引渡的命令；[81]州长在报上看到关于此事的消息，但未采取任何措施！同时，俄国人正日益逼近波斯和阿富汗，正在修筑通向波斯的麦什特的道路，并且修筑从撒马尔汗经布哈拉通向阿富汗的巴耳赫（古代的巴克特里亚）的道路，他们在土耳其搞阴谋，连他们在东鲁美利亚的被庇护者阿列科— 帕沙也觉得太过分了，然而这一切不管是伟大的格莱斯顿还是渺小的迪耳克，都没有觉察到。俄国人无疑是打算在明年春季采取某种行动。至于他们贷款的情况，你大概已从关于波提—巴库铁路的优惠借款的报道中知道了。他们不得不用某个公司作掩护，而且还接受了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啊！

福尔马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开展了维护马隆的运动：在文章[96]结尾甜蜜蜜的辩护腔调中，明显地可以听到马隆的低声细语。对于威廉②在《正义报》上对卞尼格先的大肆吹捧，你认为怎样？即使诚实的威廉这样做，也太过分了。

瑞士工厂法[87]也在今天寄出。奥尔登堡的文章一有机会我就

① 在英国，地方长官即民事法官，也是最高警官。—— 编者注
② 显然是指李卜克内西。—— 编者注

向伯恩施坦订购[1]。看来，伯恩施坦先要经过一番考虑，然后才给我写信，在法国事件上我根据他自己的论据，以充分的理由向他证明[2]，他的结论是错误的，所以他未必还能说出什么来。

辩论结束以后，下院已经完全降低到大陆议会的水平了；从它现在的组成情况来看，这种地位对它是完全适合的。

我很想知道德普勒在慕尼黑所作的实验[3]的详细情况；我完全不明白，一向公认的而且工程师们在实践中（在他们的计算中）仍然在应用的导线电阻计算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能存在。在此以前人们认为，在同一种导线材料的条件下，电阻按照导线横截面缩小的比例而相应地增大。希望龙格能把这些著作寄来。这个发现使十分巨大的、一向白白浪费的全部水力立即可以得到利用。

现在要包捆报纸了。这里大家都很健康。

你的　弗·恩·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11月11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无产者报》奉还。[4]很难说谁更伟大，——是向马隆和布鲁斯倾吐自己预言家的灵感的拉法格呢，还是马隆和布鲁斯这两位

---

① 见本卷第10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82—386、388—392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00。——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99—100页。——编者注

英雄，一对明星。这两个人不仅有意撒谎，而且甚至自我欺骗，仿佛外部世界除“阴谋”反对他们以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仿佛实际上所有人的大脑结构同这一对贵人的一模一样。

拉法格具有黑人部落的坏特征：毫无羞耻之心；我指的是那种显得可笑的羞耻之心。

然而，如果不是有意毁灭报纸[①]，如果不是指望（这是难以置信的）政府提出起诉把报纸埋葬掉，那末已经是时候了，是拉法格停止吹嘘他在未来革命中必将建立赫赫功勋的幼稚大话的时候了。这一次他自己把自己大大愚弄了一通。自然，由于害怕某家告密报纸摘登被查禁的《革命旗帜报》上的可怕的、警察认为非法的无政府主义言论，—— 要知道这家《革命旗帜报》比保尔·拉法格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的地道的预言家“走得更远”，—— 由于害怕这种革命的竞争，拉法格就引证自己的话来证明（近来他有一个坏习惯，不仅听任自己的预言在世界上流传，而且还通过自我引证来“肯定”这些东西），《革命旗帜报》—— 也就是无政府主义—— 仅仅是抄袭了拉法格等人的深奥哲理，只不过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准备把它付诸实现而已。预言家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他们视为自己灵感的东西，相反地常常只是留在他记忆中的过去的回音。而拉法格所写的东西和他自己所“引证的东西”，实际上无非是巴枯宁处方的回音。其实，拉法格是巴枯宁的最后一个学生，他是笃信巴枯宁的。他该重新看看他和你合写的关于“同盟”的小册子[②]，这样就会明白，他的最新武器是从哪里借来的。是的，他花费了很多时间才理解了巴枯宁，而且是错误地理解了巴枯宁。

---

① 《平等报》。—— 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篇文章是在保·拉法格参与下写成的）。—— 编者注

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

今天天气非常好，我该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空气了 (现在还只是上午十点半)。

在上封信中我告诉你，我想不求助于医生来消除咳嗽，但是威廉森医生郑重警告我说，我还是应该高高兴兴地同意服药。实际上药剂对我是有效的；它的主要成分是硫化奎宁，其余的成分如吗啡、哥罗仿等等，在过去强迫我服用的药剂中是一直有的。

加特曼发明事业的分娩阵痛情况如何？

祝好。

摩尔

从昨天《旗帜报》刊载的议会辩论的报告中你自然会知道，“极可尊敬的”里弗斯·威尔逊带着痛苦的心情恭恭敬敬地把自己的方案送上了祖国的祭坛，解除了他自己和高贵的娄即舍布鲁克所共同担负的保证人的职务。[90]里弗斯·威尔逊该多痛苦啊！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11月20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本周末（也就是在下星期一，11月27日）我将陷入困境。因为我应该事先在一周以前把这种情况告诉你，所以我现在就这样

做了。在离开伦敦之前，我付给议会书商圣金约五英镑，付给科尔克曼 (书商) 约两英镑，此外因各种杂事花了三英镑。

杜西和琼尼在今天三点钟左右天气尚好的时候，从我这里走了。

我非常不安地等候巴黎的消息。拉法格、盖得等人招致法庭的追究[97]，这是不可原谅的。这是可以预料到的；这都是由于“害怕”来自“无政府主义者”的竞争的缘故！真幼稚！

祝好。

你的 卡·马·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诺尔

1882年11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我正想问你“储备”情况怎样，今天恰好接到了你的来信①。附上三十英镑支票，你可以象往常那样去兑取。这样，下星期一或许就在本星期六你便可以拿到钱，如果你舍得花一个先令的电报费，星期五就可拿到。

附上 (1) 穆尔的一篇数学研究[98]。代数方法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微分方法，这一结论当然只是就他自己的几何作图法而言，在这里也还算正确。我已写信告诉他说，你对于人们如何用几何作

① 见上一封信。—— 编者注

图法来体现事物这一点，是完全不重视的，应用曲线方程便足够了。此外，你的方法和老方法的根本差别在于：你把x变为x′，也就是使之真正起变化，而其他人则是从x+h出发，这终归是两个量的和，而不是表示一个量在变化。因此，你的x纵然通过x′再变回到原来的x，毕竟和原先的已不是一回事；而如果先把h加到x上，然后再把它减去，x是始终保持不变的。但是，变化的每一图解都只能表示出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即结果，也就是一个已经变为常数的量；表示线段x及其附加线段的是x+h，也就是一根线段的两节而已。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x如何变为x并再变为x，这是不可能用图象表示出来的。

还附上(2)刚刚收到的伯恩施坦的一封信，望阅后退还给我。

(彭普斯带着小家伙[1]来把我打断了，所以这封信不得不就此结束，因为我打算在五点半把它发出。)

我不知道，对福尔马尔所作的马隆式的历史叙述[96]要不要给以某些斥责。对马赛代表大会[99]只字不提，这已是严重歪曲历史了。如果伯恩施坦在给最后一篇文章[96]作的注释中不指出这一点，那就有必要加以驳斥。

《平等报》我读完后即寄出。拉法格答应写的信和往常一样还未收到。他用教授的口气给侦查员写的公开复信[100]是幼稚的。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似乎是千方百计想使自己被捕一样。幸好内阁状况不稳，所以他们也许还能逃脱。

杜西和琼尼昨天平安到达。

你的 弗·恩·

① 女儿莉莲。——编者注

58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11月22日于文特诺尔市
圣博尼费斯花园1号

亲爱的弗雷德：

支票已收到，谢谢！

正象你也马上看出来的那样，赛姆[①]在批评我所运用的分析方法[98]：他若无其事地把这种方法抛在一边，他不研究这种方法，而去研究我还只字未曾提到过的几何应用。

我未尝不可以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所谓微分方法本身的全部发展，——这种方法始于牛顿和莱布尼茨的神秘方法，继之以达兰贝尔和欧勒的唯理论的方法，终于拉格郎日的严格的代数方法（但始终是从牛顿—莱布尼茨的原始的基本原理出发的），——我未尝不可以用这样的话去对待分析的这一整个发展过程，说它在利用几何方法于微分学方面，也就是使之几何形象化方面，实际上并未引起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太阳刚刚出来，正是适于散步的时刻，因此在这封信里我就暂且不再谈数学了，不过以后有机会还要回过头来细谈各种方法。

伯恩施坦关于普鲁士铁路“国有化”的消息很有意思。

我不同意他认为马隆—布鲁斯组织[101]规模庞大的看法；盖得

① 赛米尔·穆尔。——编者注

当时对圣亚田代表大会上“人数众多的”(!)代表团所作的分析并没有被驳倒；不过这已是无谓的争论了。法国真正的工人党的第一个组织是从马赛代表大会[99]开始建立的；马隆当时在瑞士，布鲁斯还不知在什么地方，而《无产者报》——以及它的工团——采取了否定的立场。

艾莫斯这头蠢驴——英国官吏在埃及的喉舌——给《对埃及人的掠夺》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凯提供了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答辩》[102]的机会，从而使得他的当事人的处境极其困难。里弗斯·威尔逊、罗塞耳和戈申以及同他们一起的英国内阁更是被凯弄得非常狼狈。

祝好。

摩尔

59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 特 诺 尔

1882年11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我昨天附有三十英镑支票的信，想必已收到。

加特曼星期天晚上带着发明家的如痴如狂的陶醉心情，来到我这里。他说，从星期五起，他的伽法尼电池开始工作，使一个有强大电阻的电流计转动了，起初指在50°以上，现在经常指在46°。它似乎不仅会均衡地工作三个月，而且会均衡地工作六个月到一年，而不必进行校正。但是，由于他的这项革新尚未取得专

利特许证，他不想让购买者看到。据说这里又需要我来干预。我坚决拒绝了，我建议派尔希[①]来处理这个很简单的和容易解决的事情（也这样做了），并劝告加特曼将来向他的英国购买者提供过去向他们出售过的那种商品，而不是什么其他好一些的或坏一些的商品。这会不会起作用，还是个问题。这个年青人狂热地工作着；工作和狂热使他精疲力尽，他只是在清晨三至五点钟睡一下，面色很难看，不过他的穿着更讲究了，每次来都换一套西服。在他获得专利特许证的新的革新中有这样一项：为了防止电池中的氢氧化钾溶液KOH受空气中二氧化碳的作用和防止它变成碳酸钾，他往溶液中注进了油，并且象派尔希说的，他怎么也理解不了为什么没有达到目的，相反地，油脂和碱变成了一种象肥皂似的东西，而且真的是肥皂！

不久以前我终于间接地买到了全套的精装本《日耳曼古代史史学家》，你猜是谁出卖的藏书？—— 施特鲁斯堡博士！在这里我在普卢塔克关于马利乌斯的著作中找到一处，如果把它同凯撒和塔西佗的著作[②]对照一下，就可以把全部土地关系弄清楚了。

基姆布利人“迁移了，但不是一下子，也不是通过连续不断的远征来实现的，而是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里，年复一年地越来越远地向前推进，就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经过斗争和战争，他们走遍了整个大陆”[103]。

这一处同七十年以后凯撒描绘的苏维汇人每年更换新的耕地的情形对照一下，就说明了日耳曼人迁移的方式：在什么地方过冬，春天就在什么地方播种，而收割以后就继续迁移，直到冬季再停留下来。至于说他们通常在夏季耕种土地（如果不是代之以

① 罗舍。—— 编者注
② 凯撒《高卢战记》；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编者注

掠夺的话)，这对那些从亚洲带来农业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对的。从基姆布利人那里我们还看到迁移的过程，而在凯撒时代它就结束了，那时莱茵河成了他们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两处还说明，为什么凯撒的著作[104]中说“他们根本没有私有的和单独的土地”：在游牧生活时期，只可能在氏族组织的基础上共同耕种土地，把土地分段划界是不可思议的。在土地公有制下，朝个体耕种方面的进步——相应地也是个退步——，后来在塔西佗的著作中谈到了。

杜西交给我各种报纸，让我转给你，我加上了一份《平等报》。《平等报》的粗鲁，看来确实给了检察机关以深刻的印象；姓名地址仍是拉法格亲手写的。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60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 特 诺 尔

1882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附上拉法格的信，阅后退给我，因为这是我今天早晨才收到的。总之，大概几天以后他就得进监狱。这是些不可救药的蠢材。如果盖得和拉法格在蒙吕松坐牢，那末报纸[①]的情况就会相当糟糕。政府不敢在巴黎审判他们，但是悄悄地、一个一个地在外省

① 《平等报》。——编者注

搞，使他们不能为害，这一点它是能够做得出来的。在报纸还没有站稳脚跟之前，他们本来是不应当为此提供任何借口的，可是没有这样做，却干出了巴枯宁式的蠢事。

我曾要拉法格寄给我关于两党力量对比以及马雷—果达尔事件的材料[105]。你看看他的回答。显然，正是为了迎合工团，马隆及其同伙牺牲了马赛代表大会[99]以来运动的纲领和全部历史。因而马隆表面上的强大实际上是他的虚弱。如果把自己的纲领降低到最普通的工联的水平，那自然容易拥有“广大的群众”。

我在电学方面获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你可能还记得我对笛卡儿—莱布尼茨关于 mv 和 mv^2 作为运动量度争论所发表的意见[106]；这些意见归结为：mv 是机械运动在传递机械运动本身时的量度，而 $\frac{mv^2}{2}$ 是其运动形式改变时的量度，按照这种量度，它转化为热、电等等。而对于迄今为止问题只是由物理学家在实验室中得到解决的电学来说，被看做电能代表的电动势的量度是伏特（E）——电流强度（安培，C）乘电阻（欧姆，R）的积。

$$E = C \times R。$$

当电能在传递中不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时，这是正确的。但是西门子在不列颠协会最近一次会议上以主席身分发表的演说[70]中，与此同时提出了新的单位——瓦特（称之为W），它应表示电流的实际的能（即区别于其它运动形式，俗称能），它的值等于伏特×安培，$W = E \times C$。

但 $W = E \times C = C \times R \times C = C^2R$。

电气中的电阻和机械运动中的质量是一回事。因此，无论在电的运动中还是在机械运动中，这种运动在量上可以测量的表现形式——一种是速度，一种是电流强度——在不变换形式的简单

传递中，作为一次因数发生作用，反之，在变换形式的传递中——作为平方因数发生作用。可见，这是由我首先表述出来的运动的普遍自然规律。但是现在必须尽快地结束自然辩证法。[106]

你家里一切均好；不过到处都是劣质啤酒，只有西头的德国啤酒不错。

你的 弗·恩·

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11月27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拉法格的信。对拉法格和盖得的愚蠢行为的气愤我先前在给你的信中①就发泄过，因而已经消了一些。真是不可思议，一个在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人，怎么能这样轻率地—— 不客气地说，这样愚蠢地—— 不知为了什么而去冒丧失一切的危险！拉法格关于中了魔的财政部的文章[107]非常成功。

至于巴黎的“工团”，我从巴黎公正人士的言谈里得知（在阿尔让台逗留期间[108]），这些工团可能比伦敦的工联还要坏得多。

你对于平方在变换形式的能的传递中所起的作用的论证非常好，为此向你祝贺②。

祝好。

摩尔

① 见本卷第105—107页。—— 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 编者注

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 特 诺 尔

1882年1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附上今天收到的倍倍尔的信。他所未能马上看懂、但能使他们摆脱反社会党人法[109]的“迷惑不解的东西”，自然是俄国爆发危机①。奇怪的是，这些人都不能习惯于这样的思想，即推动力应该来自那里。要知道，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解释过这点。他指望爆发一次新的大危机，我认为这为时过早；象1842年的那种中间危机是可能出现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遭受损失最大的当然是工业最落后的国家——德国，它只好满足于世界市场需求的残屑余渣。

盖得在蒙吕松第一次审讯后当即被释放，无论是巴赞还是拉法格都没有被捕，相反地，巴赞在《平等报》上发表了致他那个地区的警官的一封信，信中对密探在他住宅周围进行监视提出抗议，并且通知警官，何时可以在家里逮捕他。这些人的幸运多于智慧。我要到五点半的邮班走了以后才能读完《平等报》，所以你将随明天第二次邮班收到它（两号）。

我从一个旧书商那里得到一本《一七九一年五月三日波兰宪法的产生和消灭》，1793年版，没有注明出版地点。[110]这是你经常

① 见本卷第414页。——编者注

提到的书，书中详细描述了弗里德里希一威廉二世对待波兰人的卑鄙行径。价值整整一个马克！

加特曼那个能点亮六盏斯旺白炽灯的电堆应在明天完成。如果事情成功了，也就是说，如能在一个长时间内连续发光，从而事实上证实了电流强度的恒定性，那么，电堆就会立即公开展出并“建立”一个经营这种电堆的公司。加特曼还将把各种展品拿到水晶宫[111]去展出，那里不久将举行新的电气展览。他和派尔希[①]为他找到的银行家都为这一发明而感到欢欣鼓舞。

这里一切都好。

你的　弗·恩·

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12月4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倍倍尔的来信[109]，这封信使我很感兴趣。我不认为最近可能出现工业危机。

十一月的天气尽管变化很大，但总的说来是好的。十二月初严寒来临，继而冰雪融化，道路泥泞。今天天气很好，尽管如此，我却被判处软禁。因为近来我的嗓子有些嘶哑（当然不是由于说话造成的），喉头感觉不适，咳嗽加重，虽然我作了正常的、不间断的、长时

① 罗舍。——编者注

间的散步,睡眠反而更坏了,所以只好又请医生。要离开这些先生真不那么容易!这不过是喉头卡他;但是他却认为,在炎症没有好以前,我必须呆在家里。除服用温和的药物外,他让我吸安息香的蒸汽(里边还掺了一种我觉得好象是哥罗仿之类的东西)。今天又给我做了听诊和叩诊——这是我来后的第三次,他认为其他方面都正常。几天之后他再来看一下,以便决定是否可以解除软禁。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报》上为我的价值理论而互相反驳的三个争论者——拉弗勒、卡菲埃罗、康德拉里——都在胡说八道[112]。但是,如果就康德拉里从马隆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史》一书中摘录的关于我的价值理论的引文而论,马隆事实上比这三个见识浅薄的人还要肤浅。

但愿梅特兰公园路41号[①]一切都好。我期待那里的简短来信,但我知道,可怜的杜西工作很繁忙。

祝好。

摩尔

64

马克思致恩格斯[②]

伦　敦

1882年12月8日于文特诺尔

随信把今天收到的载有关于希普顿及其同伙消息[113]的《无产者报》寄还给你(顺便说一下,拉法格在《平等报》上大肆颂扬

① 马克思在伦敦的住址。——编者注
②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了他们为支援一次法国“罢工”而进行的募捐。总之，任何一个偶然的刺激都马上会使他按照“既定的”方向转动)。

至于今天收到的你最近一张明信片中提到的那一号错寄给我、应当还给你的《无产者报》，根本就没有收到。它本来应当在昨天、今天或者至迟在本星期内寄到，但是情况并非这样；也许是邮局把它遗失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应当收集有关普鲁士国有矿山等企业中工人待遇问题的资料（详细的），以便用来评价瓦盖纳—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

祝好。

摩尔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弗·恩格斯先生

65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 特 诺 尔

1882 年 12 月 8 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关于《无产者报》的事情是这样的：不久前我给你寄那一包《平等报》和《科伦日报》的时候，还打算寄给你谈到工联的那一号《无产者报》，我以为已经把它放到包里了。我包装时，有人在房间里，所以包得有点匆忙。第二天我在自己这里发现了谈到工联的那一号《无产者报》，但是没有找到登载圣亚田卑鄙事件的另外一号[114]，

因此我断定,我再次把这一号寄给你了。今天在白天的光线下面我检查了所有这一切,发现它仍装在你寄回给我的那个信封里;大概,这就是我未能找到它的原因。

从你给杜西的明信片中,我知道,你仍被软禁在家——在这样的雪天和雪后道路泥泞的情况下,这无论如何是最好不过的了;不过,也许很快会变好(不是指"最好不过",而是指天气比现在好)。你要作好准备,你患胸膜炎后在北方度这第一个冬天,呼吸道会得点小毛病,只有经过来年夏天的治疗才能完全治好。

为了最后彻底弄清楚塔西佗的日耳曼人[①]和美洲的红种人间的相似之点,我从你的那部班克罗夫特著作[②]的第一卷里作了一些摘要。这种相似确实特别令人感到惊奇,因为生产方式如此不相同——这里是渔业和狩猎业,没有畜牧业和农业,那里是向农业过渡的游牧业。这正好说明,在这个阶段,生产方式不象部落的旧的血缘关系和旧的两性(sexus)相互共有关系之解体程度那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前俄罗斯美洲地区的特林基特人就不可能与日耳曼人极其相似,而且,大概比你的易洛魁人与之更加相似。[115] 那里面解答的另一个谜是:由妇女承担主要劳动和非常尊敬妇女,两者是如何很好地协调起来的。其次,我为我的推测找到了证据,即在欧洲,最初在克尔特人和斯拉夫人那里发现的初夜权是旧的两性共有关系的残余:在两个相距很远并且起源不同的部落中,部落的代表萨满都有初夜权。我从这本书里学到许多东西,关于日耳曼人的问题暂时感到满足了。墨西哥和秘鲁我不得不放得更靠后

①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编者注
② 休·豪·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编者注

些。情况是:班克罗夫特的著作我已交还,却取来了毛勒的其余著作,这样,现在全部著作[116]都在我这里了。我必须阅读它们,以便写结尾的论马尔克的文章①,这篇文章写得很长了,虽然我重新改写了两三次,但是仍然感到不满意。用八至十页的篇幅来概述马尔克的产生、兴盛和衰落,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要我还有点时间,就把这篇文章寄给你,以便听取你的意见。我自己很想摆脱这个不足道的东西,重新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117]。

看一看神圣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在所谓原始部落那里可以看到——,这很有意思。神圣的东西最初是我们从动物界取来的,就是动物;相反地,"人的戒律"在上帝的诫命面前,就象在《福音书》中那样,被看作污秽的东西。

加特曼的可点六盏斯旺灯(每个白炽灯泡的光度是六烛光)的电堆装置,应该昨天完成,但是,不知是否成功了。

我将提醒伯恩施坦注意萨尔布吕肯,我早就这样做过。但是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09]的情况下,要在那里弄到材料会有困难。颁布非常法之前,就曾竭力使这个区保持清洁。

《平等报》我在下一次邮班寄去。拉法格还没有被捕,因为给我寄报纸时的姓名住址是他自己写的。

关于工联代表团[113]:在可能派的大会上,法国人为了表示欢迎而唱了《马赛曲》的时候,可敬的希普顿及其同伙决定,要给以应有的报答,于是便齐唱了《天佑女王》②。《科伦日报》是这样报道的,这份报纸,我已寄给劳拉。

但愿你的喉头和天气都好转!

你的 弗·恩·

---

①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② 英国国歌。——编者注

66
恩格斯致马克思[118]
文 特 诺 尔

[1882年12月13日于伦敦]

晚上九点二十分刚收到这封信。当然，保尔[①]到蒙吕松法院去受审以后，会马上被释放的。明天我就暂且给劳拉寄一笔必要的钱去。梅特兰公园41号一切都好。

67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 特 诺 尔

1882年1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附上关于马尔克的附录[②]。请于星期日寄还给我，以便我能在星期一检查一遍—— 今天我没有来得及完成最后的检查。

这里所提出的对中世纪的农民状况和十五世纪中叶以来第二次农奴制的起源的看法，我认为一般说来是无可争辩的。我重读了毛勒的全部著作[116]中一切与此有关的地方，在那里面几乎找到了我的全部论点，而且都有证据，此外，也有一些正好相反的论断，但它们不是缺乏证据的，就是从这里恰好没有涉及到的时代

① 拉法格。—— 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马尔克》。—— 编者注

得出的。这种情况特别出现在第四卷《领主庄园》的结论中。在毛勒的著作中这些矛盾的产生是由于：⑴ 他习惯于不分主次地和杂乱无章地引用一切时代的证据和事例；⑵ 他具有法律偏见的残余，每当问题涉及对发展的理解时，这种偏见就对他起阻碍作用；⑶ 他对于暴力和它的作用注意得非常不够；⑷ 他具有“开明的”成见：似乎自从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必定会不断朝着更美好的方向进步，这不仅妨碍他认识真正进步的对抗性质，而且也妨碍他认识个别的倒退情况。

你可以看出，这篇东西绝不是一气呵成的，而确实是一段段拼凑起来的。初稿虽是一气呵成的，但可惜有错误。我只是逐步掌握了材料，因此作了很多修改。

附带谈一下，农奴制的普遍恢复是妨碍十七和十八世纪德国工业发展的一个原因。首先，行会中的相反的分工，同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相反的分工：分工不是在手工工场内部实行，而是在行会之间实行。在英国这里，工业向没有行会组织的农村迁移。在德国，这种作法因为农民和从事农业的小市镇居民变为农奴而受到阻碍。但是由于这一点，一出现外国工场手工业的竞争，行会本身也就终于瓦解了。至于妨碍德国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其他原因，在这里我就不谈了。

今天又是整天浓雾弥漫，整天都点着煤气灯。加特曼的电堆大概不能用于照明，至多只能对电报等有用。关于这一点，等事情彻底弄清以后再详谈。

祝你健康，希望你很快就会遇到可以外出的天气。

你的 弗·恩·

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 特 诺 尔

1882年1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昨天被人打断了，今天继续写。大概你已看出我的信写得多么匆忙，——起先在修改手稿[①]时，后来在写信时，彭普斯和婴儿[②]都一直在打扰我。你关于农奴制在十三和十四世纪几乎全部——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消失的意见，使我最感兴趣，因为以前你在这个问题上表示过某些不同的看法。在易北河东部地区，德国农民的自由，是通过移民牢固地确定下来的；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毛勒[③]认为，当时“全体”农民都重新获得了自由（也许比十四世纪稍晚一些）。他认为德国南部也是这样，正是在那个时候依附农民受到最好的待遇。在下萨克森，情况也是大致如此（例如新“佃农”，实际上是世袭的佃农）。他只是反对金德林格[④]的农奴制似乎在十六世纪才产生的观点。但是，从这个时候起农奴制重新复活了，再版了，我觉得这是毫无疑义的。麦岑[⑤]指出首先重新谈起关于东普鲁士、勃兰登堡、西里西亚的农奴问题的年

---

①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② 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
③ 格·路·毛勒《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编者注
④ 尼·金德林格《德国农奴依附关系的，尤其是所谓农奴制的历史》。——编者注
⑤ 奥·麦岑《一八六六年以前普鲁士国家边陲地带的土地和农业关系》。——编者注

代是十六世纪中叶；汉森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材料[①]也是如此。毛勒把这叫做温和的农奴制，如果是把它和九至十一世纪的农奴制—— 其实那是古代日耳曼奴隶制的继续—— 相比较的话，他是正确的；如果是指根据十三世纪和以后的法典地主对农奴拥有审判权，他同样是正确的。但是，同十三和十四世纪——而在德国北部还有十五世纪的农民的实际地位相比，则新的农奴制无论如何也不是温和的了。尤其是在三十年战争[119]之后！在中世纪依附关系和农奴制度的等级举不胜举，以致《萨克森之镜》[120]甚至根本不谈农奴的权利，自三十年战争以来，则大大简化了，这也是很说明问题的。总之，我迫切地希望知道你的意见。

也是彭普斯打扰得我没能在提到俄国公共所有制的地方加一个注释，说明这个消息是从你那儿来的。

附上老贝克尔[②]的来信；幸好我能马上领会那个委婉的暗示，给他寄去了五英镑，因为我刚好卖了股票，而且当天就拿到了现款。

附上两号《平等报》，希望明天能送到；你可以从上面看到，拉法格已当即被释放，昨天晚上大家已在巴黎等待他。

加特曼的电堆：当他仅仅装上一个由很长的导线构成电阻的电流计，因而电力只是逐渐地消耗时，一切都进行得很好。但是当他一装上电灯，电阻集中在一点，即集中在细而短的灯丝上时，就一切都完了；氢马上使银电极极化，微弱的电流只是使灯丝发出微弱的红光。现在他又在埋头搞其他的各种改进方案，但所有

---

① 格·汉森《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农奴制的消灭和一般说来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改变》。—— 编者注

②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编者注

这些方案说明，他没有找到症结所在。不过供给他经费的那些先生们是否愿意继续实验，还是个问题。

你考虑一下，你是否能够在一月份的头一个星期在你那里替我和肖莱马订两个床位？如果没有什么干扰的话，我们很想去你那儿玩几天。但是由于肖莱马的风湿病等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阻挠。不过，如果我们得知你能把我们安排在你那里或邻近的地方，以及我们应当在什么时候最后告诉你我们到达的时间，那我们是可以对此作出相应的安排的。

你的　弗·恩·

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2年12月18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手稿[1]寄还；非常好！

医生[2]刚才又来过；不能说我感到有好转，宁可说恰好相反。外面不冷，但是有雨，潮湿，所以医生坚持，不出现好天气，他就不能让我出去；否则，他说他不承担责任。

真见鬼！必须有耐性！

祝好。

摩尔

---

①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② 威廉森。——编者注

70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 特 诺 尔

1882年1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昨天下午五点钟收到你的信，今天早晨收到手稿①。你的评价太过誉了，至少就形式而言，我是不敢当的。今天中午天气很好且又暖和，所以，你大概终于能够从软禁状态中释放几个小时吧。不过，我们这里从中午一点钟开始雾又越来越浓，因而有时天阴暗得象夜间一样。

波多林斯基的东西[121]我是这样看的：他的真正发现是，人的劳动能够比在没有它的情况下更长久地使太阳能保留在地球表面上并起作用。他由此得出的全部经济方面的结论都是错误的。我手头没有这个东西，但我不久前还在意大利文的《人民》上看过。如何使包含于一定数量的食物中的一定的能量通过劳动变为比其本身更多的能量，这个问题我是这样为自己解决的：假设一个人每天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为一万个热量单位的能量。这一万个热量单位永远等于一万个热量单位，而且如大家知道的，在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时，实际上由于摩擦等等要损耗一部分，这一部分不能变为有用的能。在人体内甚至要损耗很大的一部分。因此，在经济劳动过程中所用的体力劳动任何时候也不可能等于一万个热量

①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单位，它总是要少一些。

由于这个缘故，体力劳动还远远不是经济劳动。这一万个热量单位所完成的经济劳动，绝不是这一万个热量单位本身整个地或部分地，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的再生产。相反地，它们的大部分消耗掉了，即耗费于人体热量的增加和散发等等上，它们所留下来的有用的东西，只是排泄物的肥效。人通过耗费这一万个热量单位所完成的经济劳动，宁可说是在于把他从太阳那里获得的新的热量单位固定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这些新的热量单位和最初的一万个热量单位的联系仅仅在于这种劳动。新的热量单位，即由于耗费包含于一天食物中的一万个热量单位所固定下来的单位，究竟是五千、一万、两万或一百万个热量单位，这完全取决于生产资料的发展水平。

而要用数字把这一点表示出来，只有在最简单的生产部门，即狩猎业、渔业、畜牧业和农业中才有可能。在狩猎业和渔业中，甚至不固定新的太阳能，而只是利用已固定的太阳能。并且很明显，从一个人的正常的营养来说，他通过狩猎或捕鱼所获得的蛋白质和脂肪的数量，并不取决于他所消耗的这些物质的数量。

在畜牧业中能的固定程度，取决于有计划地把通常很快就枯萎、死亡、腐烂的那部分植物变为牲畜的蛋白质、脂肪、皮肤和骨头等等，也就是说，固定一个较长的时间。这里的计算就很复杂了。

在农业中，计算更为复杂，这里要把包含于辅助资料、肥料等等中的能量也加进去。

在工业中，这种计算是完全不可能的：投入产品中的劳动，大部分是完全不能用热量单位来表示的。例如对一磅棉纱来说这也许还可以想象，因为它的韧性和抗拉力还勉勉强强可以用力学公

式表示出来，不过，在这里这已经是完全无益的学究气了，而对于一块未加工过的布，那就是荒谬的了，对于经漂白、染色、印花的布，则尤为荒谬。一个锤子、一个螺丝钉和一根针里所包含的能量，其大小是无法用生产费用来表示的。

我看，用体力量度来表示经济关系是完全不可能的。

波多林斯基完全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劳动的人，不仅是现在固定的太阳热的消耗者，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过去固定的太阳热的消耗者。能的储备——煤炭、矿山、森林等等方面的浪费的情况，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从这个观点来看，狩猎和捕鱼也并不是固定新的太阳热，而是利用并已开始消耗原先积累起来的太阳能。

其次，人通过劳动所作的是有意识的，而植物所作的则是无意识的。植物是变换了形式的太阳热的巨大吸收体和贮藏体，这是早已尽人皆知的。既然劳动可以固定太阳热（这在工业和其他部门中绝不是时时都能做到的），所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够把动物消耗能和植物贮藏能的天然机能结合起来。

波多林斯基离开自己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而走入歧途，因为他想为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寻找一个新的自然科学的论据，因而把体力的和经济的东西混为一谈。

附上四十英镑的支票，以便在你需要的时候能够凭它取钱，从而保证你无后顾之忧。

关于杜西去的事，我今天晚上和她谈谈。至于我们，当然肖利迈马上就同意了。更确切的要等他来后才能商量好。明日详告。

你的　弗·恩·

71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 特 诺 尔

1882年1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再来谈谈波多林斯基[①]，我要作一个修正：通过劳动积蓄能，实际上只有在农业中才行；在畜牧业中，一般说来，植物积蓄的能只是转移给动物；这里其所以谈得上积蓄能，那只是因为要是没有畜牧业，饲料植物就会无用地枯萎掉，而在畜牧业中则被利用了。相反地，在所有的工业部门中只消耗能。最多也只能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植物产品—— 木材、稻草、亚麻等等—— 和积蓄了植物能的动物产品，通过加工得到利用，也就是说，比听任它们自然腐烂，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因此，一切工业劳动者都要靠农业、畜牧业、狩猎业和渔业的产品维持生活这一早已尽人皆知的经济事实，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用物理学语言来表达，但这未必有多大的益处。

附上劳拉的信；燕妮的情况事实上并不很坏，只要她好好地作系统的治疗就行，这样做之所以必要，并不是由于有直接的危险，而是因为如果对这一切不在意的话，就可能产生最不愉快的后果。

加特曼放弃了他在这里搞的全部事业，明天又要启程到海外去。这最好不过了。他订的一些合同使自己在这里承担了这么多

① 见上一封信。—— 编者注

的法律上的责任（在某些场合下又没有履行这些责任），以致他本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有这些事，以后和你面谈，他要走了，我感到高兴。他曾经常向我借钱，现在弄清楚了，当时他每星期挣五至六英镑！

你认为伯恩施坦有时轻率从事，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不过在这方面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试看拉法格在《牧师和商人》一文（12月20日的《平等报》）中的新发现，以及同一号上杰维尔所搞的毫无改进的魏特林主义的最新改版吧！

我很高兴，关于农奴制的历史[①]，照实业界人士的说法，我们"达成协议"了。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这一事实甚至曾经使我和另一些人在中世纪农奴制问题上感到迷惑不解；人们很爱轻易地单纯用征服来说明它，这样解决问题又顺当又省事。顺便说一下，你可看看梯叶里的著作[②]。

在古代土耳其半封建制度的全盛时期，土耳其基督徒的地位也有某些与此相似之处。

彭普斯来吃饭了，已经五点了，我必须听从形势的支配。祝愿美好的天气会重新把你治好。

你的　弗雷德

① 见本卷第122—123、124—125页。——编者注
② 奥·梯叶里《诺曼人征服英国的历史》。——编者注

1883年

72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 特 诺 尔

1883年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匆匆随信寄给你：⑴ 拉法格的信，⑵ 倍倍尔的信，⑶ 赫普纳的信，其中的第二、第三两封信请寄还给我。

终于得到了关于燕妮健康状况的消息，从中可以看出实际的情况。在我看来，事情不是想象的那末坏；可怜的孩子由于过度紧张和害怕治疗而变得非常虚弱了，不过，毫无疑问，在劳拉的护理下会很快恢复的。我马上给劳拉寄去了十五英镑，五英镑的零头是为了使劳拉去看燕妮以及给她买东西时手头不致于太窘。在燕妮能重新料理家务之前，最好还是让琼尼继续留在这里。

倍倍尔关于德国工业的报道很有意思，但我看应该带点盐对待它[①]。正在不断发展的，大部分是生产奢侈品的工业，大概还有机织业，可是对纱线征收的关税不允许输出纺织品。自从合并亚

① 意思是说采取批判的态度。—— 编者注

尔萨斯以来，他们那里的纱锭供过于求，从 1870 年以来冶金工厂也是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在真正的大工业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大量发展的呢？甜菜糖竟然使他产生这样大的好感，这也说明眼光短浅。国家向生产糖的容克支付利润一事，这已经在邦议会中讨论过了。

赫普纳。这个小犹太人（显然是在他的同伴约纳斯怂恿下这么做的）想拿手枪顶着我们的胸口来要求为《宣言》[1]写序言，对此你的看法如何？我认为，对于这种无赖的信件，或者根本用不着回答，或者最多让他去找莱比锡版的序言[2]；如果这个序言不能使他满意，那就让他干脆不要印《宣言》好了。

如果你要给左尔格写信谈加特曼的问题（假如你还没有做这件事的话），你最好能加几行关于小赫普纳的事。

邮局快关门了——我为了钱的事进了一趟城，接着又寄了钱，所以晚了。

你的　弗·恩·

73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83 年 1 月 10 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弗雷德：

你立即把拉法格的信转寄给了我，这很好；它给了我很大的

---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编者注

安慰，尤其是今天我同时还收到了拉法格直接寄来的信，而从这封信来看，情况似乎已经好转。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无论如何现在不要让琼尼走。在燕妮痊愈以前，这根本谈不到。如果使女孩子的处境更加困难，那是不可饶恕的。今天我还要直接给龙格写封信。最好你自己给小燕妮写几句话，讲讲这个意思。你就讲，地方军[①]不会因此就失去琼尼。

奇怪的是，现在每当神经受刺激，我的咽喉就立即被卡住，就象红色沃尔弗[②]卡住自己的兄弟——粮食投机商[122]一样。我想说的是，几天以前我收到巴黎的坏消息后的最初时刻所受的惊吓，引起了咳嗽痉挛性地发作，险些把我憋死。可怜的小燕妮患气喘病时一定常常有这种极其痛苦的感觉。

至于“小赫普纳”，我的意见是和他打“商务性”的交道。应当通知他，他可以随意翻印我们为莱比锡版写的序言[③]，也通知他，俄国人去年出版了一种新译本[④]。如果他认为没有我们专写的新序言就不值得翻印《宣言》，那末，他自己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怎么办最合适，就让他怎么办吧。“拿手枪顶着胸口”——这是“我们自己人”的气质和风度，因此，在和小赫普纳打交道时，对此只好象对某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勉强容忍了。

从可怜虫迈斯纳那里我收到了1881年的账目[123]；照他的话说，这是不景气的一年，但是这关系不大，因为，按照他本人的通知，在1882年书就将近售“完”；1881年卖掉的愈少，1882年

① 指在巴黎的亲属。——编者注
②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编者注

卖掉的就必然愈多。我的长时间的沉默一定使他不安。穆罕默德终于向他降临了；可惜我还不能寄一包校样[①]去，这是他更想要的东西。由于长期软禁在家，解禁只是例外，特别是由于经常恶心，或者文雅地讲，用南德意志话讲，即用卡尔·布林德太太（原科亨太太）的说法，由于天天“呕吐”（这是咳嗽的结果），我至今不能尽快地进行校对。我想只要耐心和严以律己，还是会很快重新走上正轨的。

摩尔

① 指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校样。—— 编者注

第 二 部 分

第 二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其他人的信

1881年1月—1883年3月

1881年

1881年

1

马克思致沙尔·龙格

巴　　黎

1881年1月4日　[于伦敦]

亲爱的龙格：

我这里积攒了一大堆旧报纸，要找出登载着总委员会（包括它的委员—公社社员）同大名鼎鼎的布莱德洛进行论战[124]的那一号《东邮报》，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不过我想列斯纳手头有《邮报》。其实对您来说这完全不重要。布莱德洛诋毁公社社员；正如您当时在《邮报》上向他声明的那样，他重复《自由》和《夜晚报》这类报纸上的最卑鄙的诽谤；他疯狂地攻击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①]，等等，——所有这些都未必能够使他在巴黎资产阶级的眼里受到损害。但是这一点还是可以简单提一提，因为这能够说明一个人的为人。在1871年9月《东邮报》上发表的总委员会总书记（当时总书记是黑尔斯，但提他的名字就会给予他过多的荣誉）对布莱德洛的答复中，就曾写道：

①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编者注

“肆意破坏私人住宅（梯也尔的炮轰）是布莱德洛先生的朋友们所干的事情……　在共和国时期，罗什弗尔曾因违反出版条例罪被判处终身流放。如果布莱德洛先生也因自己的演说被判处终身流放，那该怎么样啊！”

重要的是，总委员会（它的会议记录摘要曾登载在《东邮报》上）揭露了布莱德洛曾经是普隆—普隆（他当时在伦敦）所豢养的食客，并且在巴黎有可疑的交往关系。在1871年12月1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我提到过，不久以前，布莱德洛曾到过巴黎，在那里曾和戴特罗瓦和艾米尔·德·日拉丹来往（这件事是一个用阿扎马特或别的土耳其名字作笔名的法国人告诉我的，而他是从一位女士那里听说的，这位女士大概是布里蒙，她参加过我下面要讲的那次集会）。艾米尔·日拉丹设宴招待过他，出席宴会的有一些可疑的，即波拿巴派的女士，席间布莱德洛吹嘘自己在伦敦的所谓声望，使自己陷入了可笑的境地。

如果布莱德洛说，在他与布里蒙相识的那个时候，她是一个热心的爱国者，那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在色当战役[125]以前，所有的波拿巴派，就他们希望自己的皇帝[①]胜利这一点来说，他们都是爱国者。在色当战役之后，他们仍然是爱国者，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路易·波拿巴复辟，即使是在俾斯麦的协助下复辟，才能拯救法国。

不言而喻，您不应当引用我的话。至于布莱德洛和布里蒙的友谊的详情细节，勃朗（老头子）可以提供。

布莱德洛同总委员会论战时曾经得到《夜晚报》（一家巴黎报纸）的支持。在1872年1月2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赛拉叶报告说：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他读了《夜晚报》上一篇为布莱德洛辩护的文章。文章说，他〈布莱德洛〉[1]给报纸〈《夜晚报》〉写稿，使报纸感到荣幸，他是政府的可靠拥护者，他与那些蛊惑阴谋毫无关系。”

当格莱斯顿解散议会(迪斯累里借此把他推翻了)时，布莱德洛讲演的大厅挂着巨幅标语：“别了，破坏圣像者，人民的救星！欢迎，圣斯蒂凡教堂的伟大勇士！”[126]但是他失算了。他没有当选为议员，尽管他写信给布莱特和“伟大的自由党”的其他领袖，公开央求支持(央求好评)，但他们对他的回答非常冷淡。他吹嘘说自己曾和终身主教(英国国教教会的)共进午餐，这也未能帮助他。

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布莱德洛之所以比较走运是由于下面的原因。他是那些支持格莱斯顿的亲俄运动，反对迪斯累里，叫喊得最凶的蛊惑者之一，而且事实上是那个想要不惜任何代价再次捞到“官家的羹肴”的政党的最狂热的代理人之一。此外，在当时面临着的决定性的选举战中，决不会轻视任何一个选区。辉格党和激进党的那套假正经不得不抛到了九霄云外。

虽然北安普顿的很多鞋匠属于布莱德洛的“宗派”，但这还不能保证他在这个城市当选；上次所有这些鞋匠一致投了他的票，但他还是落选了。不过还有另一个自由党候选人也难以当选，因为他以搞“可疑的金融交易”出名，此外，他还因另一方面的丑事丢了脸(他被人打过耳光)。此人就是拉布谢尔。他是《每日新闻》的三个所有者之一，因此，也是那个自由党的大亨，虔诚派教徒资本家赛米尔·摩里的同伙。要让布莱德洛或拉布谢尔各自单独地当选是很难的，如果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成功。虔诚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派教徒赛米尔·摩里对无神论者布莱德洛的公开推荐 (在报上发表了一封信) 保证了北安普顿信教的人投他的票，而布莱德洛则保证了该市不信教的鞋匠投拉布谢尔的票。这样一来，他们两人都由北安普顿选入了议会。

布莱德洛的无耻透顶，特别表现在他要尽手腕排挤掉其他一切有声望的无神论宣传家，因为他们象罗女士那样，不愿意成为他个人的忠实仆从 (科学宣传家们正在转向其他社会阶层)。他用把党的全部基金占为己有的手段达到了这一目的。他甚至做到使伦敦全部讲演厅不对其他人开放，同时他用党的经费为自己修建了一个讲演厅。因此，罗女士及其他人只好局限于在外省讲演。如果您对此感兴趣 (不过我觉得不值得去了解细节)，您可以通过那些与此直接有关的人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情报。

祝好。

卡·马·

您能否告诉我关于爱·福尔坦这个人的某些情况，他给我写了几封信，对我用“我亲爱的老师”这个称呼。他的要求很“低”。他在研究《资本论》，提出要每月写摘要，并逐月惠寄给我；而我则应每月修改它，向他解释他所理解错了的地方。等他不慌不忙地写出最后一个月的提要，并且经我修改退还给他，他就会得到一份可以付印的手稿，这份手稿，按他的说法，“将以万丈光芒普照法兰西”。

仅仅由于时间不足，我也不同意他的建议，但无论如何应该回他一封信。可能他的愿望是非常好的。在给他写信之前，我想了解他的一些情况。目前他住在博韦市巴黎门街 22 号。

2
马克思致某人[127]

伦　　敦

1881年1月31日于 [伦敦]
西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①

阁下：

请把随函寄上的单子中所开列的报纸等寄给我。此外，如能告诉我有没有什么工厂法简明手册，我将对您非常感激。

我这里有几份工厂法，但是一个法国众议院的议员求我替他搞到一本能从中找到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切资料的手册。记得工厂视察员雷德帕思先生仿佛出版过这类东西。[128]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马克思及其一家从1875年3月到他逝世住在这里。——编者注

3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1881年2月1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①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耽搁了很久，终于动手给您写回信。

不过，既然您打算很快就到这里来，对您惠寄给我的那本书②写详细的书面批评，看来也许是多余的了，我将有机会和您面谈这一问题，所以这里只稍微谈点意见。

(1) 第66页以及后面几页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剩余价值和资本赢利之间，除了对可变资本或全部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差别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实际差别。《反杜林论》第182页上引用了《资本论》中与此有关的一些最重要的地方。[129]

(2) 即使讲坛社会主义者[130]硬要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向他们解答一个谜，即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可能发生的人口过剩的威胁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垮台的危险，那我也绝无义务去实现他们的愿望。为这些人解决他们由于自己的混乱的超智慧所产生的一切疑问，或者，譬如说，哪怕是仅仅反驳一个谢夫莱在他的许多厚书中所写的那一大堆荒谬已极的胡言乱语，我看，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光是修改这些先生们加上引号从《资本

① 恩格斯从1870年9月到1894年10月初住在这里。——编者注
② 卡·考茨基《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编者注

论》中摘引的错误引文，大概就可以凑成一大本书。在他们要求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让他们首先学会阅读和抄写吧。

况且，我决不认为这个问题在当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当前刚刚在形成中的美国的大规模生产和真正的大农业，生产出堆积如山的生活资料，使我们大有窒息的危险；当前是变革的前夜，这种变革除了其他后果之外，还应使地球上的人口得到增殖——您在第169—170页上所谈的，很肤浅地涉及到这个问题——，这种变革在欧洲也必然要求大量增加人口。

欧勒的计算法[131]，其价值跟下面这种计算法一样，照这种计算法，一个克劳泽在公元第一年起按复利计算，则每隔十三年增加一倍，那末现在就应为大约$\frac{1\times 2^{144}}{60}$盾，即体积超过地球的一大块银子。您在第169页上说美洲的社会关系和欧洲差别不大，这只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是对的，即假使您观察的都是一些沿海的大城市，或者只是这些关系的表面的法律形式。广大美洲居民无疑地生活在非常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条件下。移民源源而来，就能证明这一点。而要使人口增长一倍，仍然需要三十年以上。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

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我和您笨。

其实，早在1844年我就谈过这个问题（《德法年鉴》第109页）："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社会主义）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132]

暂时到此结束——其余的问题等以后当面和您讨论。您要到这里来，这样做很好。您是年青一代中真正想学到点东西的少数人中的一个，而在无批判的气氛下，现在德国出的一切历史和经济书籍越来越糟，对您来说，摆脱这种气氛将是很有益处的。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4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1年2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附上给考茨基的信[①]，请转寄给他。我不知道他给我的维也纳的地址是否还适用。

新年以后出版的五号《社会民主党人报》说明它有很大的进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步。“击败者”的悲观失望的调子和傲慢骄矜的美德互为补充，小市民的温顺和莫斯特式的革命词句交相为用，还有，同莫斯特纠缠不休——所有这一切都停止了。调子变得流利而且坚定了，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报纸就会不是麻痹德国的群众，而是激励他们的勇气。既然您那里有《新莱茵报》，您可以不时翻阅一下。正由于我们对自己的敌人持鄙视和嘲笑的态度，在戒严前的六个月里我们获得了差不多六千个订户，虽然在11月我们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133，1849年5月我们又拥有原来的订户数目，而且甚至更多。《科伦日报》现在承认自己当时只有九千个订户。

既然您那里好象是缺乏小品文，那末您可以设法转载1848年第44号上的诗歌《今天早晨我到杜塞尔多夫去了》，——标题大体可用：《一八四八年吞食社会主义者的人（1848年7月14日《新莱茵报》上的小品文）》，作者署名：格奥尔格·维尔特（1856年死于哈瓦那）。[134]总之，继续这样干下去吧！

您的 弗·恩·

《不要偷窃！》和为处死路易十六作的辩护[135]很好。

5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36]

彼得堡

1881年2月19日于伦敦

阁下：

现在匆忙地写几行字来答复您友好的来信。

从兰兹格特回来以后，总的来说，我的健康已经恢复了，但一连几个月的恶劣天气使我有幸得了影响睡眠等等的慢性鼻炎和咳嗽。而最坏的是我妻子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尽管我请了伦敦的一些最有名的医生。此外我还有一大堆琐琐碎碎的家务，谈起来都令人感到腻烦。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我一直不得不，而且现在仍然不得不费力地读完一大堆从各个国家，特别是从美国寄来的蓝皮书[137]，这样我的工作时间只勉强够完成这一任务，因为我的医生们多年来就严禁我在夜间做任何工作。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在通信方面就积欠了许多债。而且，我家里现在忙乱得不可开交，因为我大女儿龙格夫人和孩子们①要从伦敦迁居到巴黎去，她的丈夫② (这一时期他一直在伦敦皇家学院当教员) 在大赦以后成了巴黎《正义报》的编辑之一 (克列孟梭在马赛发表的半社会主义的演说就是他示意的[138])。您可以理解，在我妻子目前的健康情况之下，这次分别是多么痛苦。我们的外孙—— 三个小男孩—— 对她来说，正如对我本人一样，是无穷尽的乐趣的源泉。

现在先谈一谈随信附上的手稿[139]。它的作者是拉法格先生，我第二个女儿③的丈夫，是我身边的学生之一。他请我向您询问一下，您是否能帮助他成为彼得堡杂志《祖国纪事》或《言语》的撰稿人 (我认为，这是他能寄以希望的仅有的两种杂志)。如果有这种可能，他委托您修改和删节一切不合圣彼得堡气候的地方。至于他的“名字”，可以只用姓名开头的字母。无论如何，您会有兴

① 让、昂利和埃德加尔。—— 编者注
② 沙尔·龙格。—— 编者注
③ 劳拉。—— 编者注

趣读完这篇手稿。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您的文章[140]，这篇文章的确是极富于“独创性的”。因此，它才受到人们的抵制。只要冲破墨守成规的思想罗网，那末遇到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抵制”——这是墨守成规的人一碰到困惑不解的事物时所使用的唯一的自卫武器。我在德国已经受了多年的“抵制”，而在英国现在仍然在受到抵制，稍有不同的是，在这里人们对我的攻击往往是这样荒谬和愚蠢，以致要是作公开回答都会使我感到难以为情。您就继续这样干下去吧！照我的意见，您下一步首先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上层阶级在农业中的代表，地主们的债务的惊人增长，并且要指出，他们是怎样在“新的社会支柱”的监督下在社会蒸馏器里面“结晶”的。

我很想看到您和《言语》的论战。一当我的生活的航船开进比较平静的水域，我一定对您那本《概况》发表更加详细的意见。但是有一点我现在不能不谈一谈。土壤日益贫瘠而且又得不到人造的、植物性的和动物性的肥料等等来补充它所必需的成分，但它仍然会依天气的变化莫测的影响，即依不取决于人的种种情况，继续提供数量非常不一的收成；但从整个时期，比如说从1870年到1880年来观察，农业生产停滞的性质就表现得极其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气候条件迅速地消耗土壤中还保有的矿物质肥料，从而就为荒年铺平道路；反之，一个荒年，尤其是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歉收年，使土壤中含有的矿物质重新积聚起来，并在有利的气候条件再出现的时候，有成效地发挥作用。这种过程当然到处都在发生，但是，在其他地方，它由于农业经营者的限制性的干预而受到调节。在人由于缺乏财力而不再成为一种“力量”的地方，这种过程便成为唯一起调节作用的因素。

例如，1870年你们的国家获得了一次极好的收成，但是，那一年是一个顶点，紧接着便是一个很坏的年头；大歉收的1871年可以看做一个新的小周期的起点，这个周期在1874年达到了新的顶点；随后紧接着便是1875年的荒年；然后又开始高涨，这次高涨以1880年这个更坏的荒年告终。如果把整个时期总起来看，就可以看出，平均年产量总是一样的，各个年份之间以及各个小周期之间的差别纯粹是自然因素造成的。

我在前些时候曾经写信[①]告诉您，如果说英国所经历的一次严重的工商业危机并没有在伦敦引起金融上的彻底破产，那末这种例外现象只能用法国货币大量流入来解释。现在，连英国那些墨守成规的人也看到并且承认这一点。例如《统计学家》杂志（1881年1月29日）写道：

“金融市场在过去一年之内所以如此安稳，完全出于偶然。法兰西银行在秋初让它的黄金储备量从三千万英镑减少到二千二百万英镑……　去年秋天我们无疑地是费了好大劲才逃避了这场致命的危险。”（！）

英国的铁路系统和欧洲的国债制度一样，都在同一个斜面上滚动。各个铁路公司的董事中当权的巨头们不仅举借数额越来越大的新债，来扩大他们的铁路网，即扩大他们象君主专制一样进行统治的“领土”，而且扩大他们的铁路网，以便获得新的借口举借新债，从而有可能向债券、优先股票等等的持有者支付利息，以及间或以稍稍提高红利的形式给那些受骗的普通股票持有者一点小恩小惠。这种巧妙的办法迟早会导致一场可怕的灾祸。

在美国，铁路大王不仅象过去一样受到西部的农场主和其他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马克思1880年9月12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编者注

工业“企业家”的攻击，而且还受到商业界最大的代表——纽约商会的攻击。铁路大王和金融骗子古耳德这个大吸血鬼曾经对纽约商业巨头们说：

“你们现在攻击铁路，是因为你们认为它们由于目前不受欢迎，最易受到损害；但是你们要当心啊！继铁路之后，会轮到各种公司〈在美国人的方言里意思是股份公司〉，然后轮到各种形式的合伙资本；最后就轮到任何形式的资本；这样，你们就在为共产主义铺平道路，共产主义的倾向在人民当中现在就已经愈来愈普遍了。”

古耳德先生真是“嗅觉灵敏”。

在印度，不列颠政府面临着的，即使不是一次总起义，也是严重的麻烦。英国人以租税、对印度人毫无用处的铁路的红利、文武官员的养老金、阿富汗战争及其他战争的支出等等形式，每年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他们不付任何代价地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不包括他们每年在印度境内攫为己有的在内——，即仅仅是印度人被迫每年无偿地送往英国的商品的价值，超过六千万印度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收入的总额！这是残酷的敲骨吸髓的过程！那里荒年一个接着一个，而饥荒的规模之大，是欧洲迄今为止所无法想象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组织的真正的谋反正在进行中；不列颠政府意识到有某种东西正在“酝酿”中，但是这些笨蛋（我指的是政府官员）被他们自己那套议会的言谈和思考方式所愚弄，甚至不愿意弄清事实真相，不想了解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严重到什么地步！欺骗别人结果也欺骗自己，这就是议会智慧的真谛。这倒更好！

您能否告诉我您的文章里引证过的朗凯斯特教授的著作《论退化》已经译成俄文没有？[141]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上月我们这里来了几个俄国客人，其中有季别尔教授（他目

前住在苏黎世）和卡布鲁柯夫先生（由莫斯科来的）。他们曾经整天整天地在英国博物馆里进行研究。

没有关于我们“共同的”朋友[①]的消息吗？

顺便提一下：扬松最近的把俄国和欧洲作对比的统计学著作[②]—— 已引起强烈的反应。我倒很想看一看。

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如果拉法格的文章在彼得堡找不到“安身之地”，请您把它寄还给我。

6
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　　牙

1881年2月22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最尊敬的同志：

我长时间没有回信，是因为我想在答复您1月6日的信时附上一份修正表，这些修正您在再版《资本与劳动》[142]时也许是必须作的。由于家务事忙乱以及一些事先预料不到的工作和其它的干扰，这份表我还没有完成，因此暂且先寄给您这封短信，没有附

① 格·洛帕廷。—— 编者注
② 尤·埃·扬松《俄国与西欧各国的比较统计学》。—— 编者注

表，因为如果我继续沉默会引起您的误会。我认为必须修改的地方都是一些细节；主要的东西，问题的实质，已经讲清楚了。

感谢您的友好的献辞；您用这一献辞亲自向我们的资产阶级敌人提出了挑战。

《伟人传》[143]的作者①是一个学校视察员之类的人，他写信请我把我的传记材料寄给他；此外，他还让他的出版者找我的妹夫尤塔，要尤塔说服我答应他的请求，因为我往常对这类请求都加以拒绝。这位先生——《伟人传》的作者——给我写信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承认这些观点的重要性，并对我表示尊敬等等。就是这个人后来厚颜无耻地把声名狼藉的普鲁士间谍施梯伯的诽谤谰言写入了他的小册子，即硬说——大概是在某一个波恩讲坛社会主义者[130]的怂恿下——我有意捏造引文；然而这位正人君子甚至没有花功夫去读读我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同极可尊敬的布伦坦诺进行论战的文章[144]，如果他读了我的文章，他会看到布伦坦诺起先是在《协和》杂志（工厂主的刊物）上责备我“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进行了伪造”，后来又作狡辩，似乎他对此不是这样理解的等等。一家荷兰杂志愿意向我提供篇幅来驳斥那个“学校视察员”，不过我对这种臭虫的叮咬根本置之不理。就是在伦敦的时候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我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态度，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有时给以迎头痛击，随着年龄而增长的智慧，使人避免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

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

① 阿·凯迪伊克。——编者注

题”[145]，在我看来是提得不正确的。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此外，一个由于人民的胜利而突然产生的政府陷入窘境，这决不是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恰好相反。胜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由于自己的“胜利”立刻感到束手束脚，而社会主义者至少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行动。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末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

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使凡尔赛分子的吹牛马上破产，如此等等。

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有相应的改变之外，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是一样明确的，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在十八世纪有哪一个法国人曾经事先、先验地哪怕是极模糊地意识到用什么方式实现法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呢？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

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临近的幻梦曾经煽起古代基督徒反对罗马帝国的火焰，并且给了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经常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理解，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各国政府日甚一日地折磨得狂怒起来的群众，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绝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

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决定性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因此，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复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7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巴　　黎

1881年2月24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燕妮：

大名鼎鼎的雷尼亚尔把他的著作推荐给你，想取得你的“同情”。[146]这位雅各宾党人，正捍卫英国可敬的新教和英国的庸俗自由主义，而且使用的就是这种庸俗自由主义的历史体系，的确值得深表同情。不过，我们且看看他的“事实”。

(1) “1641年三万新教徒被屠杀”。——这里，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处境同巴黎公社一样。凡尔赛分子屠杀了三万名公社社员，却把这说成是公社的恐怖。在克伦威尔时期，英国的新教徒至少屠杀了三万爱尔兰人，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兽行，就捏造一个神话，说什么这是为了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杀戮三万新教徒实行的报复。

事实真相是这样的：

因为奥尔斯脱是从占有它的爱尔兰人——在1600—1610年那个时期他们的土地是公有的——手中夺去，而被交给苏格兰的新教徒——军事殖民主义者的，所以在1640年以后的动荡时期，这些殖民者感到自己的占有不安全。英国政府在都柏林的清教徒的官方代表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苏格兰国民公约派[147]的军队准备在奥尔斯脱登陆，并且要杀绝所有的爱尔兰人和天主教徒。爱尔兰的两个最高法官之一威·帕森斯爵士宣称，一年以后爱尔兰将不再剩下一个天主教徒。正是在英国议会里一再重复的这些恐吓，激起奥尔斯脱的爱尔兰人于1641年10月23日举行起义。但是并没有发生任何屠杀。当时所有的历史文献都说爱尔兰人仅仅是打算实行大屠杀，甚至两个是新教徒的最高法官（1642年2月8日的告示）也宣告说，“他们的阴谋的主要部分，其中包括大屠杀，未能得逞”。但是在1642年5月4日，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把爱尔兰妇女剥光衣服扔进河里（在纽里城），并且屠杀爱尔兰人（普兰德加斯特《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殖民》1865年版）[148]。

(2) “爱尔兰是英国的万第[149]”。——爱尔兰是天主教的，新教的英格兰是共和的，因此爱尔兰是英国的万第。但毕竟有一个小小的区别：法国革命要把土地交给人民，而英国的共和政治则要在爱尔兰把土地从人民手中夺走。

除雷尼亚尔以外，多数研究历史的人都很清楚，如果抛开教义上的种种争吵和注解的话，全部新教改革是一个广泛筹谋好了的没收地产的计划。开始是夺取教会的土地。随后在那些新教掌权的地方，天主教徒被宣布为叛乱者，于是他们的土地就被没收。

但爱尔兰的情况特殊。

普兰德加斯特说："看来，因为英格兰人认为上帝犯了一个错误，把爱尔兰这样一个好地方赐给了爱尔兰人；所以英格兰人力图纠正这个错误差不多已有七百年之久了。"

爱尔兰的全部土地问题的历史，就是不断地把爱尔兰的地产没收过来转交给英国殖民者的历史。这些殖民者在克尔特社会的魔力之下，经过不多的几代已变得比土著更爱尔兰化了。然后又进行新的没收和新的殖民；并这样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

在十七世纪，整个爱尔兰，除不久前已经苏格兰化了的北部以外，进行新的没收的条件已经成熟，并且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以致不列颠（清教徒的）议会授权查理一世出兵去征服爱尔兰的时候，曾决定拿应当在爱尔兰没收的二百五十万英亩土地作抵押来筹集这笔军费！贷出这笔款项的"冒险家"[150]还有权任命这支军队的军官。这些冒险家瓜分土地的办法是这样的：即他们在奥尔斯脱得到每一千英亩土地须出贷款二百英镑，在康诺特须出三百英镑，在曼斯特须出四百五十英镑，在伦斯特须出六百英镑。如果居民起来反对如此乐善好施的计划，那他们就是万第派！也许雷尼亚尔会有机会在什么时候出席国民公会，那时候他大概会仿效长期国会[151]的例子，用同样的办法去同可能出现的万第作斗争。

"废除惩治法典[152]！"——不过，要知道，这些法律的大部分被废除的时间不是在1793年，而是在1778年，当时英国受到了起

来反抗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威胁，第二次废除的时间是在1793年，当时出现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威胁，为了同它作战，英国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兵员！

“皮特给梅努特提供了津贴！”[153]—— 这种施舍很快就被托利党人取消了，只是在1845年才由罗·皮尔爵士重新恢复。但是只字未提这位大人物还给过爱尔兰另一件礼物 (这是他第一次博得雅各宾党人的好感)，即不仅是“数量可观的”、而且是真正慷慨的“津贴”—— 用来收买爱尔兰和英国合并[154]的三百万英镑。议会的一些文件表明，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衰败城镇”和名义上的选区所花费的一项开支，数目就不下于一百二十四万五千英镑 (奥康奈尔《关于爱尔兰问题致女王的备忘录》)。

“得比勋爵建立了国民学校的制度”。[155]—— 确实不错，他是为什么他这样做呢？请看看菲茨吉本写的《一八六八年的爱尔兰》这本虔诚的新教徒和托利党人的著作，或1826年议会委员会委员关于爱尔兰教育的官方报告。由于英国政府不管教育，爱尔兰人才把教育子女的事情自己抓起来。当时，英国的父母们坚决主张把子女送进工厂去挣钱，而不是送到学校去学习，爱尔兰农民却踊跃地自己出钱办学。学校的教师是流动的，他在每个村子各呆几个月。人们给他找一间小房子，每个孩子每周交学费两个便士，冬天再交点泥炭。夏季天气好的时候，就在靠近篱笆的田地上进行教学，所以这种学校当时以“篱笆学校” [hedge-schools] 著称。当时也有一些游学的学生，他们腋下挟着书本从一个学校到一个学校，可以毫无困难地从农民那里得到膳宿。1812年，爱尔兰有四千六百所这种“篱笆学校”，在议会委员会委员这一年的报告中说，这种教育

"祸多于福","人们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而接受这种教育,尽管我们认为有可能对它进行某些纠正,但是,看来要制止它的普及是不可能的:可以改善它,但决不能阻挠它"。

可见,这些真正的国民学校并不符合英国人的目的。为了消灭它们就创办一些假国民学校。在这些学校里世俗的东西少到什么程度,从下面的事实即可看出:课本中所编选的都是从天主教和新教的圣经里摘出来的片断,而且经过都柏林的天主教和新教的大主教认可。请把那些直到今天仍然对义务上学叫嚷不已的英格兰人同这些爱尔兰的农民对照一下!……

8
马克思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56]
日 内 瓦

1881年3月8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41号

亲爱的女公民:

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很遗憾,我对您赐问的问题不能给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的答复。几个月前,我已答应彼得堡委员会[157]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不过,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

……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　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158]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亲爱的女公民，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9
恩格斯致斯·弗·考夫曼
伦　　敦

[草稿]

1881年3月11日于　[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考夫曼先生：

在回答您本月9日的盛情来信的时候，遗憾的是，关于作保问题，我不能满足您的愿望。对于作保，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给自己定了一条永不变更的规则，如果能出钱，我宁肯立即拿出钱来，而不愿作保。但是我现在手头没有钱；即使我有钱，我又可以不用它，我认为把它交给德国的党是自己的首要义务，我们现在必须把多余的每一分钱交给德国的党。①

希望您能找到其他办法筹得不足的款项。

仍然忠实于您的②

---

① 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但是我还有另一种考虑。近十年来我经常看到，这里的一些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成员变换频繁，因此常常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未等我作的保证到期，协会[159]就奉行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方针了，归根到底，要我替莫斯特先生作保，这种要求是根本不应该提出来的。"——编者注

② 这封信没有署名。——编者注

10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1年3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这里附上一些关于禁止通奸的材料[160]。您是否能用得上，我自然不知道。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所以您应当考虑好，谈这一问题是否会弊多利少。无论如何，我愿意告诉您一种谈论这个戒律而又不陷于庸人劝善的办法；我所掌握的搜集到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历史材料，对您总是会有用的。

此外，报纸①总的说办得很不错。个别的几号很好。要是少登几篇象论国家社会主义那样的学理主义的文章[161]，是不会有害处的。怎么能把杜尔哥同奈克尔，尤其是同可怜的卡龙相提并论呢？杜尔哥是十八世纪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奈克尔是金融贵族的最实际代表，拉菲特们和贝列尔们的先驱，卡龙则是个典型的贵族，他的办法是收入多少就花多少："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②。怎么能把这些人，特别是杜尔哥、甚至奈克尔，同俾斯麦相提并论呢？俾斯麦充其量也只是象卡龙那样，想不择手段地弄到钱；再说，难道可以丝毫不加考虑地把这个俾斯麦同施特克尔、而另一方面又同谢夫莱之流相提并论吗？他们也都各自具有完全不同的倾向。如果说资产者把所有这一切混为一谈，那末决不能由此得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 编者注
② 据说这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讲的话。—— 译者注

出结论说，我们也应当不加批判地这样做。学理主义的根源正是在于相信对手自私自利的和眼光狭小的论断，并且根据这些论断来建立体系，这种体系当然是以它们为基础，并且随着它们的破产而破产。对俾斯麦来说，第一是为了钱，第二是为了钱，第三还是为了钱，而他弄钱的借口纯粹依对外部情况的考虑而变换。如果在帝国国会是另外一些人占多数，他就会抛弃他现在的一切计划而制定相反的计划。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根据在理论上是那样无知、在实践上是那样变化无常的俾斯麦这个畜生所采取的任何步骤来作出关于现代社会破产的结论，正如不能根据象施特克尔那样的小丑的精神上的舞蹈病，或根据象谢夫莱这样一些“思想家”的废话来作出这样的结论一样。这些人根本不“想”宣告现代社会破产 (这大约就是他们所“想”的全部东西)。恰巧相反，他们纯粹是靠想方设法去重新修补现代社会而活着。且看谢夫莱是一个怎样的思想家：在《精髓》一书中，这个愚蠢的士瓦本人承认，他对《资本论》中的一点 (最简单的一点) 思考了整整十年才理解，而他的理解却荒谬已极！[162]

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163]、皇家陶瓷厂——都叫做“社会主义”，这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私利而进行的捏造。对这种捏造我们应当加以批判，而不应当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它，并且根据它建立起一套理论，那末，只要提出下面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一起破产，这种论据就是：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

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

此外，我认为您对报纸应当采取的方针的看法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我还感到高兴的是，近来，报纸不再象当初那样滥用“革命”一词了。在1880年的严重动摇[164]以后，起初这是很好的，但最好还是和莫斯特针锋相对，谨防夸夸其谈。不连篇累牍地用“革命”一词也可以表达革命的思想。其实，莫斯特这个可怜虫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他已经不知道往哪儿靠岸了，何况弗里茨舍和菲勒克在美洲的成就[165]使他最后的希望遭到破灭。

报纸现在能够真正激励和振奋我们在德国的人，而对这些人，至少对所谓的领袖们，这有时是非常需要的。我又收到了几封诉苦的信，已作了适当的回答。菲勒克起初也很灰心，但他去伦敦呼吸了几天自由的空气之后，又恢复了朝气。报纸应当把这种自由的空气带到德国去，为此首先必需蔑视和嘲笑敌人。只要人们又学会了嘲笑俾斯麦之流，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不应当忘记，人们，至少是大多数的人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尤其是一大批鼓动家和编辑很不舒服地从非常舒服的状态中被摇醒过来。因此，现在必需提高情绪，同时要不断地提醒人们，俾斯麦之流同他们在谋刺事件[23]之前一样，仍然是蠢驴，仍然是骗子和仍然是在历史进展面前无能为力的可怜的蠢人。因此，对这伙混蛋的任何朝弄都是有价值的。

关于爱尔兰，只说这么一点：爱尔兰人只有过分聪明，才会不知道起义对他们来说会是灭亡；只有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发生战

争的情况下，起义才有成功的希望。在此期间，爱尔兰人迫使格莱斯顿在议会中实行大陆式的会议规则[166]，从而破坏了整个英国议会制度。他们还进一步迫使格莱斯顿抛弃了自己的一切空话并且变得比最激烈的托利党人更象托利党人。高压法[167]通过了，土地法案[168]会被上院或者否决，或者阉割，那时就会开始争吵了，即各党派的秘密分化就会公开。从格莱斯顿上台时起，辉格党人和温和的托利党人，也就是全体大土地占有者正在悄悄地联合成一个土地占有者的大党。一旦这点完全成熟，家族的和个人的利益就会得到调整，或者，例如一旦土地法案使这个新党走上社会舞台，内阁和现在的多数马上就会垮台。那时新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会出来对抗新的保守派，但是除了工人和爱尔兰农民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后盾。为了在这里不再发生愚弄和欺骗，在约瑟夫·考恩（新堡选出的议员）的领导下刚刚在组成一个无产阶级激进派。约瑟夫·考恩是一个老宪章主义者，即使不是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个半共产主义者，并且是个非常出色的人物。爱尔兰在促成一切；爱尔兰是帝国内的推动因素。这些我是私下跟您谈谈。关于这个问题下次详谈。

祝好。

您的　弗·恩·

请您代我向考茨基问候，因为他不久就要到这里来，所以详细地答复他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您见到博伊斯特，请代为问候。

11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1881年3月2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老朋友：

我马上给你寄钱去，只要你使我有可能这样做，即把你的新地址告诉我的话。我寄时必须写明新地址，而我在《先驱者》上面找到的那些地址，我觉得未必适用，而且可能引起麻烦。只要我得到你的复信，你马上就会收到一百法郎和详细的答复。

你的 弗·恩格斯

12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1881年3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菲勒克 (附上他的明信片) 想要我告诉您关于波士顿大会的情况；但是正象在一些复杂的事情当中常有的那样，这里也碰到了许多障碍：(1) 哈尼的信写晚了一个星期，(2) 他忘了附上报纸上的报道，这篇报道我昨天才收到。今天我把它交给了正在此地的考茨从，让他加工一下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用。[169]

波士顿大会虽然通知工作做得差，但开得很好；到会的有一千五百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德国人。第一个发言的是去年夏天访问过我们的美国共产主义者斯温顿 (他是一家纽约大报纸①的所有者)，接着是弗里茨舍，最后发言的是反对奴隶制的杰出人物温德耳·菲力浦斯，除了约翰·布朗以外，对于消灭奴隶制和胜利地进行国内战争，他比任何人贡献都大；这是美国也可能是全世界第一流的演说家。他向德国人表示感谢，因为1861年，所有大城市的德国体操协会的会员用生命掩护他免受美国的一些暴徒的袭击，并为联邦保存了圣路易斯城。[170]他讲得怎样，我只举一个例子：

"由于离战场很远，我不想冒昧地对斗争方式加以评论。我遥望着距离此地四千哩以外的俄国，看到深重的灾难正笼罩着它的人民。但是我希望总会有人把人民从这种灾难中解救出来。如果这只能靠匕首来实现，我就欢迎匕首！这里会有一个美国人对此加以责难吗？如果有的话，那就请他看一看〈指着挂在墙上的相片〉在邦克斯山附近牺牲了的约·沃伦吧。"

这话是在3月7日讲的，而在13日，一颗炸弹做到了匕首未能做到的事情[171]。

据今天的《旗帜报》报道，英国政府已就谋杀的文章对莫斯特起诉！[172]如果俄国大使馆和格莱斯顿一定要把小傻瓜汉斯②变成一个大人物，那只好听他们的便。不过还很难知道，莫斯特是否会被判罪。一些大报就炸弹事件所表示的道义上的愤慨，多半只是一种礼节上的表态，这里的资产者为了保持体面，任何时候也不会拒绝这种表态。一些更加如实地反映情绪的幽默报纸，对

① 《太阳报》。—— 编者注
② 汉斯是约翰 (莫斯特的名字) 的小名；小傻瓜汉斯是德国民间童话里的一个著名人物。—— 编者注

此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而在诉讼结束以前，还可能发生许多变化；因此，要十二个陪审员作出定罪所必需的意见一致的判决，还完全没有保证。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可以说，温德耳·菲力浦斯的行动 (一位年青的美国记者威拉德·布朗对此起了促进作用，他去年常到马克思这里来，并且总的说来在美国报纸上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为他们作了必要的宣传) 具有重大的意义。效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证明说，在美国的德国人，甚至资产者，对俾斯麦的崇拜正在消失。但是□[1]同李卜克内西一起作第二次旅行的希望未必能够实现：因为不可能很快地再度到那里去。况且彼得堡的重大事件和它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看来将使起码要在明年才能进行的这次旅行成为多余。亚历山大三世，不管愿意不愿意，势必采取某种坚决行动来掀起一场狂潮恶浪，在这之前可能发生短时期的残酷迫害，而瑞士大概很快就会实行大批的驱逐出境。同时老威廉[2]越来越糊涂，并且眼看就要一命呜呼；俾斯麦日益疯狂，看样子他想千方百计地扮演普鲁士的疯狂的罗兰这个角色；各资产阶级政党日益加剧地解体，政府的横征暴敛达到顶点。即使我们全都袖手旁观，事变也会迫使我们走上前台，并为我们准备好胜利。在总危机临近的时候，早已预言过的全世界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瞎眼的敌人在为我们工作；加速世界崩溃的发展规律，正在全面的慌乱中和通过这种慌乱发挥作用；—— 看到这一切真是令人高兴。

---

① 指菲勒克；因为德文 Viereck 是四角形的意思。—— 编者注
② 指威廉一世。—— 编者注

马克思和我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

13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1年4月4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在邮局即将下班之前给你写这封信，因为刚刚给你汇去四英镑，即一百法郎八十生丁，但愿你能及时收到。我需要得到你的地址，因为这里邮局要求有地址，否则不接收汇款。李卜克内西没有实践他的诺言，我要责备他，他们应当为你做点事情[①]。

不过，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同志们又重新鼓起了勇气；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多数同志吓破了胆；现在报纸[②]也办得很不错了。头脑简单的莫斯特真是走运：他的《自由》本来已经奄奄一息，而英国政府忽然最出色地帮了它的忙[172]。令人莫解，怎么会做出这样难以置信的蠢事，不过我们这里自由派把持一切，而他们是任何愚蠢卑鄙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他们做得如此匆忙，以致直到现在甚至还不知道根据法律的哪一条来对莫斯特进行审判！但是俾斯麦曾需要使用这种手腕来在帝国国会中进行关于社会党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恩格斯1880年12月24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人的辩论[173]，由于我们的格莱斯顿首相老是想着被刺死的亚历山大①，所以事情没有遇到任何障碍。现在他们草拟起诉书就很困难，而更加困难的是挑选给莫斯特判罪的陪审员。这样一来，莫斯特就会廉价地变成一个知名人物，虽然只不过是在一个短时间内，而俾斯麦即使现在有点得意，但他终究会再次落得名誉扫地。

马克思和我衷心问候你。

你的　弗·恩格斯

14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4月11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小燕妮：

你们走了以后，这里就变得寂寞起来了——你不在了，琼尼、哈拉和“茶！”先生②不在了！当我听到与我们的孩子们相似的声音时，我往往就跑到窗子跟前去，刹那间忘记了孩子们已在海峡的彼岸。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现在你们有一所好的、适合于孩子们的住房；其他方面看来比在伦敦稍微差些——不过气候除外，你会逐渐感到那里的气候对气喘病也有良好的作用。

我又给妈妈③请来了由朗凯斯特教授推荐给我的一位新医

---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外孙埃德加尔的绰号。——编者注
③ 指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生，就是唐金医生；看样子他是一个富有学识的聪明人，不过对妈妈的病来说，我看所有的医生实际上都一样好。但是，医疗顾问的变换可以使她宽心，最初一段时间——多半为时不久——，她对新的埃斯库拉普赞不绝口。龙格的单片眼镜在他走后马上就找到了，它确实放在你们的卧室里。我们决定让希尔施给捎去，不过这个好搬弄口舌的人，在有机会大肆搬弄口舌的时候，看来无论如何是不能离开伦敦的。仅仅一个“可怕的”莫斯特案件[172]，对于这只鹿①来说，就是取之不尽的（尽管决非“水晶般清澈”的）源泉。现在他威胁说，要到4月18日才走。此外，他发现了他过去非常厌恶的考茨基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从这个Kautz②显出酒量很大的时候起，恩格斯对他也宽容多了。当这个可爱的人第一次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是说这个Käutzchen②，我脱口第一句就问他：您象不象您的母亲③？他保证说一点也不象，我就暗暗为他母亲庆幸。他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是勤勉的，对统计学下了不少工夫，但收效不大，是个天生的俗种，不过，在他那种人当中他还算个正派人；我尽可能地把他打发到我的朋友恩格斯那里去。

前天这里成了道勃雷④俱乐部，而昨天除了梅特兰的两个姑娘以外（朗凯斯特和唐金医生也来了一会儿），海德门和夫人⑤突然来到我们这里，他俩爱好久坐。我喜欢她那种思考和言谈的爽

---

① 双关语：希尔施，原文Hirsch，是姓，也有牡鹿的意思。——译者注
② 《Kautz》（其指小词是《Käutzchen》），怪人，和姓Kautsky（考茨基）发音相似。——编者注
③ 敏娜·考茨基。——编者注
④ 道勃雷是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一个人物。——编者注
⑤ 玛蒂尔达·海德门。——编者注

快、毫无拘束而又果敢的风度,然而可笑的是,她以某种景慕的心情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的洋洋自得、喋喋不休的丈夫的一张嘴 妈妈 (当时快到晚上十点半了)疲倦得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了。不过,那场哑剧还是使她开心了一阵子。事情是这样的,杜西在道勃雷们中间发现了一个新的神童—— 一个叫雷德福的人 ;这个青年已经是个律师,但是他鄙视法律学,他和瓦尔德霍恩干同一行工作。他的仪表很好,是厄尔文和已故的拉萨尔的混合体 (但是同拉萨尔所固有的犹太侯爵的那种犬儒主义的、无耻地纠缠不休的举止毫无共同之处) ;这是一个聪明的、还有点出息的青年。多莉·梅特兰拚命向他献殷勤,——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所以妈妈和杜西在吃晚饭的时候,一直互相使眼色。最后,梅特兰先生也来了,他头脑十分清醒,想起要同邻座的好教训人的海德门争辩关于格莱斯顿的问题,而招魂者梅特兰是信奉格莱斯顿的。当时我很不舒服,咽喉痛,所以当这伙人全走了的时候,我很高兴。真是怪事,没有社交根本不行,而当有社交的时候,又想竭力回避。

加特曼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分正在乌里治辛勤地劳动;不论用任何语言同他谈话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日内瓦的俄国流亡者要求他拒绝承认罗什弗尔[174],而且要公开发表声明。他不可能也不愿意这样做,仅仅由于彼得堡委员会给罗什弗尔写过言过其实的信,而罗什弗尔已在《不妥协派报》上发表了这封信,他也不可能这样做。事实上日内瓦人长期以来力图使欧洲相信,实际上是他们在领导俄国的运动;现在,当他们自己散布的这个谎言被俾斯麦之流抓住了的时候,当这个谎言变得对他们有危害的时候,他们却作出相反的断言,妄想使全世界相信他们自己是无辜的。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一些空谈家、糊涂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他们

在俄国“战争舞台”上的影响完全等于零。

你是否注意到了圣彼得堡对谋杀事件组织者的审判[175]？这真是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空谈和实干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彼得堡执行委员会[157]如此努力活动，而发表的宣言却非常“克制”。它的做法与莫斯特和其他一些孩子般的空谈家的幼稚做法截然不同，后者把刺杀帝王当作一种“理论”和“法宝”加以鼓吹（象迪斯累里、萨维奇·兰多尔、马考莱、马志尼的朋友斯坦斯菲尔德这样一些非常天真的英国人就是这样做的）；相反地，前者力图使欧洲相信，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俄国独特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对此不应多作道德说教——赞成或是反对，就象对待希沃斯的地震[176]一样。

由于这件事情，下院发生了一件大丑事。（你知道，这些可怜的格莱斯顿分子为了迎合俾斯麦和哥尔查科夫，拿倒霉的莫斯特作样子，想要扼杀英国的出版自由，——不过他们未必能够得逞。）丘吉尔勋爵（出身于马尔波罗氏族的一个厚颜无耻的年青的托利党人）就《自由》的津贴金问题向查理·迪耳克爵士和布拉西——内阁里的两个下等角色——提出了质询。他们对此断然否认，而丘吉尔不得不说出向他提供这些情况的人。于是他说出了回避不了的马耳特曼·巴里先生！我随信给你寄去《每周快讯》（迪耳克的报纸，由“伟大的迪耳克”的弟兄、“哲学激进派”艾什顿·迪耳克主编）上关于这件事的剪报以及马耳特曼·巴里发表在《每日新闻》上的声明。显然，迪耳克在胡说八道；这个自命为未来“英吉利共和国总统”的吹牛大王是多么卑贱，由于害怕失掉自己的职位，他竟然按照俾斯麦的指示来决定赏给或不赏

给哪些报纸一英镑！加特曼一到伦敦，艾什顿·迪耳克就请他吃早饭，如果这件事也弄得尽人皆知，那又会怎么样呢？不过加特曼当时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让人“展览”。

顺便谈一下孔德主义者— 叛徒马克西。《正义报》给这位好汉的荣誉太多，对他过分客气。英国的自由派这个独特的集团和比他们更坏的变种—— 即所谓的激进派实际上认为《正义报》的作法是犯罪，即它不顾传统、不顾协议，对这些流氓和骗子所采取的态度不合常规，不支持自由主义的大陆报刊上所传播的关于他们的神话！仔细想一想，伦敦报刊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攻击是多么卑鄙无耻，而当有人认为需要进行反驳的时候，要在这些报刊上说一句话，登几行答辩又是多么困难，既然如此，就难于维持下列的原则了，按照这个原则，巴黎报刊既然批评了“伟大的”格莱斯顿这个头号伪善者和旧学派的诡辩家，就有义务给格莱斯顿提供整栏整栏的篇幅发表马克西先生的散文，使马克西能够殷勤地报答他预先给与的赏赐。

即使格莱斯顿关于爱尔兰的政策 (高压法[167]和武器法[177]的政策) 如此正确，正象它如此虚伪那样，难道这就能成为说这个人“慷慨大方”和“宽宏大量”的根据吗？好象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于这一点似的！还是应当让马克西明白，这种柏克司尼弗式的空话在伦敦有公民权，但是在巴黎没有！

让龙格读一读今天《泰晤士报》上帕涅尔在科克的演说；在那里他可以找到对于格莱斯顿的新土地法案[168]所应当说的东西的实质；同时不应当忽视，格莱斯顿通过事先采取的种种卑鄙措施 (包括剥夺下院议员的言论自由[166]) ，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现在爱尔兰发生大规模的逼迁，而法案只是一种纯粹欺骗，因为贵族已

从格莱斯顿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再也不害怕土地同盟[178]了，他们无疑将把法案否决掉，或者把它阉割得使爱尔兰人自己最终也去投票反对它。

千遍地吻孩子们；问候龙格。亲爱的孩子，来信讲讲你的健康怎样。再见。

你的　老尼克①

亲爱的琼尼，你喜欢法国吗？②

1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1年4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非常感谢您寄来的单印本；但是根据多方面的考虑，我们希望通读这些演说的全文。考茨基可能已经请您把速记记录[179]寄来用几天。在帝国国会和邦议会里说了许多最好不说的话[180]，由于对问题不完全了解，所以我们不能对它加以评论。

您关于想要离开报纸③的声明，使我们感到惊讶和很不愉快。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这样做，如果您能收回这个决定，我们将非常高兴。您一开始就很善于编辑报纸，采取了正确的调子，并

① 卡·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② 这几个字，马克思用大的印刷字体写在信头上。——编者注
③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且表现了应有的机智。对于编辑报纸来说学识渊博并不那样重要，重要的是善于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而这一点您几乎经常都能做到。譬如考茨基就不能做到这一点，他总是有很多的次要观点，也许这对于杂志上的长文章是适用的，但是在需要迅速作出决定的报纸上，就往往弄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在党的机关报上这是不行的。考茨基和您在一起也许完全合适，但是我担心，如果光他一个人，理论上的犹豫不决会经常妨碍他直接从坚决进攻的立场出发，而这种立场是《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必需的。我想不出，现在有谁能够代替您，现在李卜克内西正在坐牢[181]，不能到苏黎世去，况且除非万不得已，这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帝国国会里更需要他。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您非留下来不可。

如果说我们还没有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文章，那末您可以相信，这决不是因为您领导报纸的关系。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在德国发表的那些言论。虽然答应过我们，说这种事不会再重复了，说今后将明确地表达出并且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革命性质。不过我们想先看看实际行动，而且我们不大相信（不如说根本不相信）某些先生们的革命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非常希望看看我们所有的议员的发言速记记录。您用过以后，把它们寄来用几天，这对您当然不会有什么困难；我保证很快退回。这将有助于排除我们和德国党之间现在仍然存在的——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最后的障碍。这只是在我们之间谈谈。

格莱斯顿大概在为莫斯特准备凯旋。未必能找到十二个一致同意给莫斯特判罪的陪审员，而哪怕有一个陪审员认为莫斯特无罪，整个审判就完蛋了；当然还可以组织另外一批陪审员再进行一次审判，但这几乎在任何时候也行不通。何况控告莫斯特所根

据的1861年的法律[182]还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总的来说律师们的意见是，这个法律的条文不适用于这一案件。

阿盖尔以爱尔兰土地法案[168]把某些公有土地交给佃农为理由而退出政府，这成为这个法案在上院的命运的不祥之兆。同时帕涅尔顺利地在曼彻斯特开始了自己的周游英国的宣传旅行。大的自由派联盟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其实，尽管这里一切进展缓慢，但是更加扎实了。

总之，不要刚遇到些困难就屈服，不要灰心丧气，要象以前一样继续安心编辑报纸。在万不得已时，请写信到莱比锡去，叫他们派一个人来协助您；也许这是消除您必需克服的种种困难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一旦您找到新人的时候，您还来得及谈离开的问题。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16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1881年4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已征询过一个内行人士（一个交易所经纪人）的意见，看看当事人应怎样做较好，——是继续付款给“大不列颠相互公司”（办事处设于奇普坡大街101号，这就是那个大不列颠相互保险公司吗？），还是停止付款。我得到的答复是：

"我们恐怕除了按照他们提出的要求继续付款以外，别无他法"(we fear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but to keep on paying the calls as they are made)。

爱德①已给我们寄来了帝国国会中辩论戒严和伤亡事故保险法的速记记录[183]。我们对你的两篇演说表示祝贺。我们尤其喜欢那篇关于保险法的演说。演说中使用了以讽刺占优势的正确的调子，这种讽刺是高尚的，又是以真正了解实际情况为依据的。对法律草案已批判得淋漓尽致，无需乎作任何补充了。我应当坦白地告诉你，同时还以马克思的名义来说这样的话：这是我们读到过的你的演说中最好的一篇，辩论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在整个帝国国会中旋工倍倍尔是唯一有教养的人。

在二读时你也许可以增添这样几句话：诸位先生，你们也许会问我们，良心怎么能允许我们投票赞成给这个政府拨款，即使这些款项是用于资助那些遭受不幸的工人？先生们，在普鲁士邦议会和你们自己为批准拨款作了安排之后，帝国国会在财政问题上的权力，即握紧钱袋迫使政府作出让步的可能性就等于零了。帝国国会和邦议会完全放弃自己的批准预算的权力，毫无代价地放弃了这一权力，所以这区区几百万根本算不了什么。——况且过去的一切拨款都是为了剥削者的利益（保护关税，以高于其价值30%的价格去购买铁路——莱茵河地区的股票原来的行市低于一百二十，由于政府提出收买铁路而上涨到了一百五十，现在到了一百六十！）；而这一次的款项至少是为工人们而拨付的！

总之，你提出的通过法律草案的条件，能使你完全无后顾之忧。

冯·普特卡默老兄[184]，这个粗野的容克和官僚是一个何等做

① 指爱德华·伯恩施坦。——编者注

慢而凶恶的蠢才！

你的 弗·恩·

马克思向你衷心问好。

爱德写信说，他暂且留下[1]。

17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4月29日于 [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41号

亲爱的燕妮：

我祝贺你顺利分娩；至少，从你能亲自给我们写信来看，我认为一切都好。我们家的“女性那一半”都希望，“新来的人”[2]增加人类“最美好的一半”；而我却宁愿在历史的这一转折关头出生的孩子们是“男”性。他们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

“新来的人”出生的日期几乎和你的、琼尼的和我的生日碰在一起了。他和我们一样偏爱欢乐的五月。我自然是受妈妈[3] (和杜西，尽管她自己或许会有时间写信) 的委托，向你表示一切最良好的祝愿，不过我不知道这种“祝愿”有什么用处，也许只是为了掩饰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吧。

---

① 见本卷第175—176页。—— 编者注
② 马赛尔·龙格。—— 编者注
③ 燕妮·马克思。—— 编者注

我希望，你能逐渐地找到一个合适的女仆，使你的“家务”有条不紊。恰巧在现在这样一个紧要的时刻你如此操劳，真使我有些不安。

从你上次来信看来，琼尼的健康有好转。我有幸亲自见过的三个孩子[①]中他的确是身体最弱的一个。你告诉他，昨天，当我在公园—— 我们的梅特兰公园—— 散步时，一个魁梧的人，公园的看守人，突然向我走来，打听琼尼的消息，最后告诉了我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要“离开”自己的岗位，并让位给一个更年青的“力量”。他走后，“南安普敦勋爵”酒馆[185]将失去一个常客。

在“我们的圈子”里—— 这是比斯利给起的绰号—— 没有多少新鲜事。彭普斯还在等待着博伊斯特的“信息”，同时又在顾盼着考茨基，但他至今尚未“表明态度”。她将永远感激希尔施，因为他不仅提出了正式的“求婚”，而且在他遭到拒绝以后，就在他去巴黎以前，又提出了“求婚”。这个希尔施越来越令人讨厌。我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坏。

伦敦人最新的狂热是吹捧迪斯累里，这些约翰牛洋洋自得，陶醉于自己的宽宏大量。他们在死者临终前还敬之以烂苹果和臭鸡蛋，在他死后却对之顶礼膜拜，这难道不“高尚”吗？同时这教育了“下层阶级”：尽管他们的“天然首长”在争夺“肥缺”中相互倾轧，死亡却揭露了一个真理，“统治阶级”的领袖永远是“伟大而卓越的人物”。

正当由于从美国进口粮食和牲畜，爱尔兰 (以及英国) 的土地必定要跌价的时候，格莱斯顿要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花招—— 只

① 燕妮·龙格的孩子：让 (琼尼)、昂利和埃德加尔。—— 编者注

有“愚蠢的政党”不了解这一点——，就在这样一个时刻，他使国库为土地所有者服务，使他们能够按已非其所值的价格把这些土地卖给国库[186]！

爱尔兰土地问题的实际困难——决不光是爱尔兰有这些困难——非常之大，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让爱尔兰人实行地方自治，从而使他们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约翰牛十分愚蠢，不能理解这一点。

正巧恩格斯来了，他向你致以衷心的祝贺，因为已经是投邮的时候了，我不能不结束这封信，只好就此搁笔。

问候琼尼、哈利和可爱的“狼”① (他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并问候他们的爸爸龙格。

你的 老尼克

18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5月3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燕妮：

非常感谢你亲切的来信。你能在百忙中坐下来给我们写信，真是太好了。让我马上来谈谈最主要的事情。我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妈妈②还是很快就会到你那里去的。星期天

① 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摩尔对我说过，医生[1]认为，她已经很强健，可以旅行了。她的健康状况往往变化很大，有时她整天都能支持住，甚至晚上还去看戏，有时却又深受剧痛的折磨，并且一连几天几乎不能起床。不过这种发作，看来只是发一下就过去了，并不引起显著的恶化。但是她还在继续消瘦下去，这似乎是唯一的经常的症状，这种症状如果不消除，就可能成为危险的症状。这是一种什么病我一点也不知道，并且我常常感到医生们也不知其所以然，不管怎样，他们在诊断方面意见很不一致。当杜西给你写信的时候，恰巧妈妈的病正在发作，所以对医生说的当时她暂且不能旅行这句话，我觉得，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解。医生本人很愿意她去，因为他期望环境的改变会产生好的效果。

现在谈谈摩尔所采用的土耳其浴。这你不必担心，他采用这种疗法只是由于他的一条腿患风湿性僵硬，妨碍他行走。至于他的感冒，天气已经暖和起来，很快就会完全复原，到海滨去旅行就能痊愈——这是我的看法。我刚才同他一起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走了一走，希望散步会对他有好处。妈妈也曾出去过，这就是说，她目前的情况并不太坏。

我高兴的是，尽管乡村生活有种种细小的不方便，但房屋、花园和周围的大自然还是使你感到愉快，这毕竟是最主要的；其它的东西，或者你会逐渐设法克服，或者你会对它们习惯起来。我特别羡慕的，当然是葡萄酒窖以及一般的酒窖，对它们我们在伦敦这里只能望洋兴叹。

自从你和龙格迫使克列孟梭在突尼斯问题上持唯一“正确

---

① 指唐金。——编者注

的”观点[187]以后，你们的确受到了老科勒特的极大重视。我完全可以想象出这个老头子看到巴黎一家大日报①在宣扬真正正统政策时的欢欣鼓舞的心情，你想想，这个老家伙毕生维护王权，而现在却在谈论救世的共和国。

我们在这里过得和往常一样，所不同的只是鲍利夫人正在我们这里；她把她丈夫前妻的长女带到曼彻斯特去，她要在那里鲍利的一个老朋友家住一个时期。她不象以前那样胖了，但还是那样活跃。上星期天，我们出乎意料地走运：得到了一些车叶草，并用一打摩塞尔酒酿造了三大钵五月葡萄酒，这些酒正好就被我们为数相当多的一伙人喝光了。我们共十四个人，都很愉快。琳蘅也在，她今天早晨告诉我说，她曾有点不舒服；“她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这样厉害的醉后的头痛”(请不要宣扬这件事情！)。鲍利夫人很惋惜这次未能在这里见到你，她要求代她衷心问候你。

加特曼昨天来告诉我们说，他要去美国，这对他很合适，他在乌里治的西门子发电厂中找到短期的工作以前，怎么也不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当的职业，但是，现在这短期工作也完了。他说，去几个月就回来。

彭普斯的感觉和往常一样，有时头痛。我唯一的病是左耳听力越来越差。我希望，也许夏天会痊愈。

衷心问候龙格。彭普斯和我都向你问好。

永远爱你的 弗·恩格斯

① 《正义报》。——编者注

19
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

纽　　约

1881年6月2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斯温顿先生：

我未必需要向您介绍带这封信的人——我的亲密的朋友加特曼先生。托他给您带去一张我的相片。这张相片很不好，但这是我剩下来的唯一的一张。

至于亨利·乔治先生的书[①]，我认为它是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的尝试。当然，这并不是作者的本意，但是更早的一些李嘉图的追随者（激进派），早就设想可以通过由国家占有地租的办法使一切得到纠正。关于这种学说，我在《哲学的贫困》（发表于1847年，是反对蒲鲁东的）[188]中曾经提到过。

马克思夫人向您致良好的祝愿。不幸的是，她的病越来越危险了。

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菲勒克”到了美国的时候，变得如此糊涂，竟然把我的朋友恩格斯同我弄混了，他把我向您致意说成是恩格斯向您致意；对

① 亨利·乔治《进步和贫困》。——编者注

我的另一个美国朋友，他也是这样做的，从那位朋友的来信中，我才知道了这个误会。

20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

霍 布 根

1881年6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热情地向你介绍持这张名片的人——我的朋友加特曼。

21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1881年6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让持信人，我们的朋友列甫·加特曼到你那里去，他是莫斯科的知名人士。我认为没有必要对他特别加以介绍，来提请你关心他。他在美国逗留期间，如果你能给他某种帮助，这就是为共同事业服务，就是对马克思和我两人的情谊。

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22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6月6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唐·吉诃德：

我直到现在才给你写信，这的确是我的过错，不过你知道，我在这方面总是怀着善良的愿望，但行动跟不上。其实没有一天我不想念你和可爱的孩子们[①]。

你不必为我的健康担忧：我曾患了一次严重的感冒，几乎象已故的塞格温的慢性鼻炎那样没完没了；不过现在快要好了。

关于妈咪[②]，你知道——她患的那种病无法可治，她的确愈来愈虚弱。幸好疼痛不象在类似情况下通常产生的那样严重，直到现在她每星期去伦敦各剧院看几次戏，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她现在能惊人地支持住，但是去巴黎旅行是根本谈不上的。丽娜·舍勒尔昨天完全出乎意外地来了，我认为这很好，她将在这里住一个月左右。

琼尼收到我寄给他的《狐狸—莱涅克》[③]了吗？这可怜的小家伙，有人读这本小书给他听吗？

今天（银行假日[190]）和昨天都下大雨，冷得要命，这是天父经常为他的伦敦平民教徒储备着的讨厌的东西之一。昨天他就用雨

---

① 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夫人燕妮。——编者注
③ 歌德《狐狸—莱涅克》。——编者注

破坏了帕涅尔的支持者在海德公园的示威[191]。

加特曼上星期五去纽约了。我高兴的是，他现在没有危险了。但是他干了一件什么样的蠢事啊！—— 他在动身的前几天通过恩格斯向彭普斯求婚—— 而且是用书面的方式，同时他向恩格斯表示，他认为，他这样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换句话说，他 (加特曼) 相信彭普斯会同意他 (加特曼) 的求婚。彭普斯的确使劲向他卖弄过风情，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激发考茨基。我刚刚从杜西那儿知道，同一个加特曼在她动身去泽稷岛之前向她提出过求婚。但是最近一次最恶劣，因为那个为俄国运动捐躯的著名的彼洛夫斯卡娅同加特曼“自由”同居过。她不久以前刚刚死于绞刑架下[192]。从彼洛夫斯卡娅到彭普斯，这真是太岂有此理了，所以现在妈妈对这种行为，并且对所有的男人都非常厌恶！

龙格论述爱尔兰问题的文章很好。我们大家都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因为一些时候以来他的名字在《正义报》上越来越少见了。你看到或者听到过备受赞扬的希尔施的什么消息吗？今天我收到了他寄来的两份纽约的报纸。

只有一条值得提及的新闻。据说有一个美国人①发明了一种割煤机，它能使采煤工人现在的大部分作业成为多余 (也就是说不需要在掌子面和矿井中“割”煤了)，留给采煤工人的任务只是把煤敲碎和装车。这一发明如果成功—— 完全有理由这样设想，它将有力地推动美国的发展，并且严重地动摇约翰牛的工业优势地位。

妈咪还让我告诉你，丽娜②到这儿来是参加马丁·塔波尔的一个成功的崇拜者的女儿莉沙·格林的婚礼的。

---

① 杰弗里。—— 编者注
② 舍勒尔。—— 编者注

劳拉正在尽力使妈咪开心和愉快。

海伦[①]衷心问候你。

好了，现在你替我多多地吻琼尼、哈拉和高尚的狼[②]。对那个“伟大的陌生人”[③]，我不敢这样随便。

你的气喘病怎样？它还折磨你吗？我简直不能想象，有四个孩子，可只有一个有名无实的女仆，你怎么能有喘口气的时间。

再见，亲爱的孩子。

老尼克

23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6月17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燕妮：

匆匆答复今天早晨刚收到的你15日的来信。我上次给你写信时，医生[④]坚持让你妈妈[⑤]到巴黎去，但她自己不愿去，说她感到自己还没有强健到可以去旅行的程度。几天以后，医生发现她确实更加虚弱了，因此他不能再建议她去巴黎了。她的确日见消瘦，

① 德穆特。——编者注
② 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
③ 马克思的外孙马赛尔·龙格于1881年4月出生，马克思还没有见过他。——编者注
④ 唐金。——编者注
⑤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并且今天她向我诉说自己日益虚弱,特别是穿衣服感到很困难。她现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当我在他们那里的时候，医生曾劝她起床和出去散步。现在医生对摩尔说，他俩最好是去伊斯特勃恩，并且要立即动身。我们曾试图说服她，她当然是竭力反对，说如果她必须到什么地方去的话，那就去巴黎，等等。当时我们对她说，在伊斯特勃恩呆两个星期，或许会使她的体力恢复到能够去巴黎的程度，等等，等等。说到这里，我就离开他们了。结果如何，大概过一、两天杜西会告诉你，因为当时她说很快就给你写信。

不管这是什么病，不断地日益消瘦并且软弱无力，显然是一种严重的症状，特别是这种症状，看来，并未停止发展。多数医生认为：只要不超越一定的限度，这本身并不是一种危险的症候；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事例，突然不再虚弱下去了，体力也恢复了。我希望，到海边休养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只要她肯去就好了！

对摩尔来说，变换一下环境也有好处。他也需要稍微休整一下。他夜间咳嗽已经不那么厉害了，睡眠也好了一些，这已经不错了。

丽娜·舍勒尔来得正好，现在住在你们家，她还是象往常那样活跃和厚道，但更聋了。她来了，使你妈妈很兴奋。我希望她会在这里住一个时期。

赛姆·穆尔上星期顺利地通过了最后的律师考试。

我从杜西处知道，你找到了一个新的女仆，看来她使你满意，因此你的家务负担也必然会减轻。

这封信就写到这里，因为我想早一点把它交给早晨的邮班寄出去，希望明天晚上它能到达你那里。帕涅尔小姐的信我过几天

寄还给你。向龙格和琼尼致衷心的问候。

爱你的　弗·恩格斯

24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1881年6月20日　[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今天中断了别的工作，终于打算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可是真见鬼，客人一个接着一个，因此我剩下的时间已经未必够在邮局关门前给你写封短信了。所以，只能简略地谈谈。

这里所有的人都很喜欢你的儿子①。半年多来，咳嗽、感冒、咽喉痛和风湿病使我深居简出，回避社会交往，所以我和他大约每星期进行一次随便的短时间的谈话，我发现，他对我们观点的领会头际上比看起来的要好得多。总之他是一个有才能的、能干的青年，并且很有学识，性格可爱，而最主要的是精力充沛。

刚刚离开我的最后的客人是菲勒克和他的新婚妻子②——她娘家也姓菲勒克。这位先生从美国回来以后[165]，我没有见过他。前几天他让考茨基带着各种文据（其中一份是李卜克内西写的，他自己签了字并代表倍倍尔签了字）来要我签字。这些文据都涉及到通过菲勒克与《纽约人民报》等就林格瑙的遗产[193]问题所达成的某些协议。我拒绝签字，因为象我声明过的那样，我只能通过我

① 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
② 劳拉·菲勒克。——编者注

们的全权总代表左尔格就这件事情进行谈判。同时，我向菲勒克声明，按照我的意见，首先应当从仍保留在纽约的在美国募集的全部捐款的剩余部分中给你拿出一百二十美元，以便付给圣路易斯的律师。菲勒克今天通知我说，他已立即向纽约方面发出了相应的指示，而在莱比锡人面前由我承担责任。他来得很适时，否则明天我就会向莱比锡发出正式抗议书，反对莱比锡党的领导人的行动方式，因为在这件事上他们至今的态度是好象他们有权单独决定一切似的。

事后菲勒克对我说，你要求补偿你所花费的八十美元。我对他说，我们这些遗嘱执行人认为，如果诉讼失败，在诉讼结束后给你补偿，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还在收到你寄来的那本亨利·乔治的书[①]以前，我已经得到了另外两本：一本是从斯温顿那里得到的，一本是从威拉德·布朗那里得到的；因此，我把一本给了恩格斯，另一本给了拉法格。今天我只能非常简单地谈一下我对该书的意见。

这个人在理论方面是非常落后的。他根本不懂剩余价值的本质，因此，就按照英国人的榜样，在关于剩余价值的已经独立的部分的思辨中，即在关于利润、地租和利息等等的相互关系的思辨中兜圈子，而他思辨的水平甚至比英国人还要低。他的基本信条是：如果把地租付给国家，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到过渡措施[194]的地方，你也能找到这种要求）。这本来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它最早（撇开十八世纪末提出的类似要求不谈）是由李嘉图的第一批激进的信徒在他刚去世以后提出来的。

① 亨·乔治《进步和贫困》。——编者注

1847年，我在一篇反对蒲鲁东的著作里曾经谈到这一点："穆勒(老穆勒，不是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后者仅仅是略微变换形式地加以重复)、舍尔比利埃、希尔迪奇等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求地租由国家占有以代替捐税，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进程中的一个无用的累赘。"[195]

如上所述，我们自己也把国家占有地租看做其他许许多多过渡措施中的一种。这些措施，如《宣言》也指出的，充满了内在的矛盾，这是必然的。

但是，第一个把激进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种要求变为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并且宣称这种措施可以解决现代生产方式中所包含的种种对抗的人，是科兰。他生于比利时，当过拿破仑的骠骑兵军官，在基佐当权的后期和小拿破仑[196]执政的初期，他住在巴黎，写了一部多卷本的关于他的这个"发现"的专著①以造福世界。他还有另一个发现，就是：虽然没有上帝，但是有"不灭的"人的灵魂，而且动物"没有感觉"。如果动物有感觉，即有灵魂，那末我们就是食人生番，在地球上就不可能建立正义的王国。他的少数残存的信徒，多半是比利时人，多年来每月在巴黎的《未来哲学》杂志上宣扬他的"反土地私有论"和有灵魂论等等。他们自称"有理性的集体主义者"，并且吹捧这个亨利·乔治。

普鲁士的银行家、曾做过彩票收集者的东普鲁士人萨姆特(这是一个大傻瓜)，继他们之后独立地也拼凑了关于这种"社会

① 让·吉·塞·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编者注

主义”的一大本书[①]。

从科兰算起，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丝毫不触动雇佣劳动，也就是丝毫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想以此哄骗自己或世人，说什么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弊端就一定会自行消灭。可见，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

亨利·乔治的论调显然也露出了这种狡猾的，同时也是愚蠢的用心。这对他来说是更加不能原谅的，因为他本来应当相反地提出问题：在美国，广大人民曾经相对地，即同文明的欧洲比起来，容易得到土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对地）现在还是这样，那末怎样解释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对工人阶级的奴役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得更迅速、更无耻呢？

另一方面，乔治的书以及它在你们那里引起的轰动，其意义在于，这是想从正统的政治经济学中解放出来的第一次尝试——虽然是不成功的尝试。

看来，亨·乔治根本不了解那些与其说是理论家不如说是实践家的早期美国抗租者[197]的历史。不过，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也是一个天才的美国式的广告家），例如他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的论加利福尼亚的文章[198]就能证明这一点。他还有一种令人讨厌的傲慢无礼、自命不凡的态度，这是所有这些发明灵丹妙药的人的显著特点。

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不幸得很，我妻子[②]的病是不治之症。

---

① 阿·萨姆特《社会学说》。——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过几天我同她到海滨的伊斯特勃恩去。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的　卡·马克思

25
马克思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
伦　　敦

[草稿]

1881年7月2日于伊斯特勃恩市[1]
萨塞克斯区特米纳斯路43号

阁下：

马克思夫人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危险，需要我经常照料她，所以对您6月5日的来信回答晚了。

老实说，当我发现您在伦敦逗留期间对您当时已经酝酿好并已实现的计划——把遭到《十九世纪》拒绝的文章经过某些修改，作为《大家的英国》的第二、三章，即您对联盟纲领的说明[199]加以发表——如此严守秘密时，我是感到有些吃惊的。

您的来信中根本没有提及为我准备的这个意外的东西，您写道："您是否认为，我应当在引用您的书时提到您的名字，等等"。

我觉得，这个问题您应当在发表之前提出，而不应当在发表之后。

您任意使用《资本论》这一尚未译成英文的著作，却不提著作本身或它的作者，蒙您赐告两个理由。

一个理由是，"许多人〈英国人〉对社会主义和这个字眼感到

恐惧。”您在第86页上招唤“社会主义恶魔”，难道是为了减少这种“恐惧”吗？您的第二个即最后一个理由是，“真正的英国人害怕外国人教训他们”！

无论是在“国际”时期，还是在宪章运动[200]时期，我都没有发现这种情况。且不谈这点。如果“真正的”英国人的这种恐惧吓坏了您，那您为什么又在序言的第6页上告诉他们说，第二、三章的“思想”等等，不管它们是什么东西，无论如何都打上了非国产品的印记呢？您要与之打交道的英国人，未必那样愚蠢，以致相信上述引文是出自英国作者的手笔。

尽管您的理由有些可笑，但我还是完全肯定，假如提到《资本论》和它的作者，那是个大错误。党的纲领应当避免对于个别作者或著作的明显的依赖性。我还想补充一点，对于您从《资本论》中借用来的那类新的科学发现，党的纲领也是个不合适的地方；把这些新发现放在一个明确宣布的目的与这些新发现毫无共同之处的纲领的说明中，是完全不妥当的。把它们写进为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的说明中，也许有某种意义。

蒙您厚意告知，您的小册子，“虽然上面标明‘价格半克朗’，并没有公开发行”，而“只是”为了“分发给民主联盟的成员等等。”我完全相信，您的意图正是这样，但是据我所知，您的出版者却持有另外的观点。我的一位朋友，在我的书房内看到了您的小册子，想得到一本，记下了它的名称和出版地点，6月13日通过自己的书商威廉斯和诺盖特去定购，接着就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小册子以及6月14日的发票。

所有这些都使我得出一个唯一实际的结论。万一报刊抓住您的小册子进行批评，那我可能就要被迫出来讲话，因为第二和第

三章有一部分引文是直接从《资本论》中译来的，但没有加上引号同其余的文字分隔开，其余的文字很大一部分也不确切，甚至使人产生误解。

我给您写信完全是开诚布公的，我把这看作是友好往来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夫人和我向海德门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　卡·马·

26
恩格斯致诺里斯·阿·克洛斯
纽　　约

[草稿]

1881年7月22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致诺里斯·阿·克洛斯先生
阁下：

可惜时间不允许我写一篇使您感兴趣的评论①。但是，如果您本人愿意了解大不列颠工人运动的当前情况，您可以在周报《劳动旗帜报》上找到一切必要的材料，它的出版社的地址是：白衣僧街2号。到目前为止该报共出了十二期。大部分没有署名的社论是我写的[10]。

① 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为此必须研究英国工人阶级及其活动的历史，如果不是从采用蒸汽引起的产业革命开始的话，至少要从1824年开始，我没有功夫这样做"。——编者注

如果您想要和莫斯特先生建立联系，您可以按伦敦西区托登楠大院路252号的地址给《自由》编辑[1]写信，他会告诉您在目前情况下有没有这种可能。

如能在您来伦敦时看到您，我将很高兴。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

27
恩格斯致《自由》编辑部
伦　　敦

[草稿]

1881年7月22日　[于伦敦]

致《自由》编辑部

有人[2]从美国给我介绍了一位诺里斯·阿·克洛斯先生，《纽约星报》驻爱尔兰记者，这位先生写信给我说：

“如果莫斯特先生愿意向纽约公众作某种声明，我很乐意为他提供这种机会。”

对此，我答复他说：

如果您想要和莫斯特先生建立联系，您可以按伦敦西区托登楠大院路252号的地址给《自由》编辑写信，他会告诉您在目前情况下有没有这种可能。

特此奉告。

忠实于您的　弗·恩·

---

① 卡·施奈特。——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库诺。——编者注

28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7月22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燕妮：

医生[①]刚刚来看过妈妈[②]，我们准备在本星期二或星期三动身，准确日期，我们将用电报通知你。

望立即回信，因为在你没有告诉妈妈要从这里给你带些什么以前，她是不会离开伦敦的。你知道，她喜欢张罗这类事。

附上五英镑，用作租赁卧具等等所必需的零星开支；其余的等我到达时再付给你。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才同意接受你提出的安排。

至于希尔施向你讲的关于拉法格的事情，那简直是撒谎。我从一开始就确信，拉法格从来没有给自己的巴黎通信者写过任何类似的东西。

再见，亲爱的孩子。千遍地吻孩子们。

老尼克

① 唐金。——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29
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巴　　黎

1881年8月[①]6日于阿尔让台镇
梯也尔林荫路11号

亲爱的希尔施：

我在这里已经将近两个星期了；既没有去巴黎游览，也没有拜访任何熟人。我妻子的状况不允许这样做。

由于她日益虚弱，我也许得比原先的计划大大提前离去，所以我想（如果没有意外事情干扰的话）明天一早就同琳蘅和琼尼去巴黎。我将去看你，如果你的时间允许的话，还打算让你陪陪我们。

问候考布。

你的　卡·马克思

30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伦　　敦

1881年8月9日　[于阿尔让台][2]

亲爱的小劳拉：

我只能给你写几行字，因为邮件就要送走了。

---

① 手稿为："7月"。——编者注

妈妈[①]越来越虚弱，情况令人担心。因此我本来想（因为我们现在只能作短途旅行）无论如何于本星期末动身，并且已把这一点告诉了我们的病人。但她打乱了我的计划，昨天把我们的衣物送出去洗了。这样一来，下星期初以前就别想动身了。

也许——这要看她的健康情况如何——我们在布伦停留几天。医生[②]认为（如果各种情况都顺利）目前海洋空气可能有助于增进健康。

下次给你写详细一些（不过，为此你应当立即把你们的新地址告诉我）。衷心问候保尔[③]。

你的　老尼克

31
恩格斯致乔治·希普顿
伦　　敦

1881年8月10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4]

尊敬的希普顿先生：

寄还按照您的愿望修改过的校样[11]。我觉得，对第一处您理解得不正确，而第二个改动纯粹是形式上的。无论如何，我不理解，这种修改能有什么用处，因为星期二要求修改，星期三这里收到，而星期四，即在报纸[④]出版后才能寄回伦敦。

---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② 唐金。——编者注
③ 拉法格。——编者注
④ 《劳动旗帜报》。——编者注

但这里的问题还不在于此。如果您对这些非常温和而不伤人的东西都开始感到过于激烈，那末，这就使我产生一个想法：您对我本人的往往激烈得多的文章更加会有同样的感觉。因此我不得不把您的意见看作是一种征兆，并得出结论：如果我停止为您寄社论，那对我们双方都会更好一些。这样做比继续到我们必将发生公开决裂的时刻，要好得多。此外，由于时间不够，今后我决不能定期写社论[10]；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早就得出了必须采取这一决定的结论，并考虑在工联代表大会[12]以后付诸实现。不过，我愈早停止为您写社论，也许，您在这次代表大会面前的处境会愈好。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我认为，在发表关于德国的麦克斯·希尔施工会的文章[9]之前，您应当把文章的清样或校样寄给我，因为在您的撰稿人中间，只有我一个人对此问题有所了解并且可以提出必要的意见。无论如何，我不能继续担任报纸的撰稿人了，因为，它不同我商量，就颂扬这些工会，而这些工会只能与被中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中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相比。

再多余地补充一点，尽管如此，我还是祝愿《劳动旗帜报》在各方面获得成就，而且，如果方便的话，我将不时给您提供大陆方面的零星消息。

忠实于您的　弗·恩·

32
恩格斯致乔治·希普顿
伦　　敦

[草稿]

1881年8月15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尊敬的希普顿先生：

我不能理解，对考茨基先生的文章[11]您怎么能作这样奇怪的解释。对第一处您反对说，国家干预违背“许多著名工会活动家”的意愿。当然是这样，因为他们灵魂深处是曼彻斯特学派[201]的信徒，而要是听他们的意见，就不可能有任何工人阶级的报纸。但是，我对文章的这个地方所作的补充本来应当使您相信，这里指的是，而且指的仅仅是象在英国老早就通过工厂立法合法化了的那种国家干预，如此而已，——这是甚至您的“著名活动家”也不反对的东西。

至于第二处，考茨基先生的文章说：对竞争战争实行国际调整，如同对公开战争实行调整一样，都是必要的，——我们要求一个为了全世界工人的日内瓦公约[202]。“日内瓦公约”是各国政府为了战时保护伤员和野战医院而签订的条约。因此，考茨基先生所要求的东西，也就是各国政府之间的一个类似的协定，以保护不仅一个国家的，而且是所有国家的工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免除过度的劳动。我完全不能理解，您怎么能够把这点解释为号召全世界的工人在日内瓦召开一次代表会议①。

请您同意，您对问题作如此错误的理解，这件事无论如何不

能促使我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②]。

至于论述希尔施的文章[9]，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埃卡留斯先生是我们事业的叛徒，我决不可能给为他提供版面的报纸写文章。

况且我没有发现任何一点进步。《劳动旗帜报》和过去一样，仍然是传播关于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形形色色的和互相矛盾的观点的工具，在它刚办起来的时候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假使不列颠工人阶级中间存在着力图摆脱自由派资本家影响的流派，现在这种情况就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既然到目前为止这种流派还没有表现出来，那我就应当得出结论说，它并不存在。如果有确凿的迹象表明存在着这样的流派，那我就要尽一切力量帮助它。可是，我不认为，每星期写一栏文章，可以说是淹没在《劳动旗帜报》上提出的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观点之中，这对于它的建立会有多少帮助。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由于时间不够我已决定在工联代表大会[12]之后停止写稿；所以在此以前我是否还写几篇文章，没有任何意义。

最后，我等待和期望着更美好的时候。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

---

① 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如果您懂得文章的意思，您就应当立即看出：文章中提出的措施具有直接实践性质，并且如此容易实现，现在的一个欧洲政府（瑞士政府）已决定着手实行这一措施；通过把工厂立法和劳工法变为各国国际协议的对象，使所有工业国的劳动时间相等的建议，对于工人有很大的直接利益。对于英国工人尤其是这样，除了瑞士以外，英国的工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好地受到免除过度劳动的保护，因此遭到劳动日长得多的比利时、法国、德国工人们的不公平的竞争"。——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33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81年8月16日　[于阿尔让台]

亲爱的拉甫罗夫：

我明天要离开，所以这次没有机会再和您见面了。但是，既然我已经找到我来巴黎的路，以后我会随时来看看的。

就此搁笔，再见。

完全属于您的　卡·马克思

34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1年8月17日于约克郡
布里德林顿码头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在海边[4]已经三个星期了；趁坏天气到来的机会，在我于星期一，即22日离开之前给您写一封短信。如果有时间，还要给考茨基写一封信①，不管怎样，他很快就会收到答复以及他的登在《劳动旗帜报》上的那篇文章[11]的印样。

---

① 见本卷第214—217页。——编者注

退还的那些反犹文章，您大概已经收到了；我把它们寄给了考茨基，因为您没有告诉我比较准确的地址。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拙劣而幼稚的东西。这个运动只具有在德国当资产阶级怯懦时由上面策动的任何运动所具有的那种意义：这是使保守派在选举中获胜的竞选手段。只要选举一过，或者运动在此之前就已超出了上面规定的限度（象目前在波美拉尼亚那样），它就会立即按照上面的命令象肥皂泡一样地破灭——“连痕迹也永远消失了”[①]。对于这类运动应当嗤之以鼻，而我高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正是这样做的。此外，卡尔·希尔施突然急于想去柏林一趟，并且真的去了，他从那里给我来信说：

“反犹太人运动完全是由上面布置并且几乎是由上面指挥的。我曾经到一些最简陋的酒馆里去过，没有一个人对我的鼻子感到厌恶；不论是在公共马车上，还是在铁路上—— 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听到任何反犹太人的话。推销反犹文章的半官方报纸只有很少的读者。德国人对犹太人怀有本能的敌意，但是我在工人和进步的小资产者和小市民中间所看到的对政府的仇恨更强烈得多。”

关于柏林警察局的一千零一个密探，他说，大家都认得他们，

“因此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非常愚蠢：老是坐在同一些啤酒馆里、同一些桌子跟前”[203]。

您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204]很好。您说，俾斯麦的国有化癖好是不值得我们为之辩护的东西，但它象正在发生的所有这类东西一样，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对我们有利；另外，您说，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如果有点价值，就会自己到我们这边来，如果还要我们去招募他们，那末，他们只会用旧酵母的残余损害

① 歌德《渔夫》。—— 编者注

我们；这些看法都很好。还有其他很多地方也很好，当然对一些个别提法总是可以提出一些异议的。一般说来，最近的一号[①]又非常好：在谋杀事件[23]和颁布非常法[109]以后，被领袖们抛弃了的正确的、有朝气的并且是充满胜利信心的调子，现在又重新出现了，代替了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叫做“把裤子当喇叭”的那种调子。您对布莱德洛的痛骂好极了。[205]

对个别地方提几点意见：

(1) 您完全不必这么夸奖瓦累斯。[206]这是一个可怜的，文学界的，或者不如说是耍笔杆说漂亮话的人，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人物，他由于没有天才而转向极端派方面，以便利用一种倾向，所谓的观点，并借此把自己的恶劣作品塞给公众。在公社时期，他只是说说漂亮话，如果说他也作过什么事情，那也无非是带来了危害。不要轻信巴黎伙伴们（马隆就很轻信他们）关于这个荒诞可笑的吹牛者的话。在格雷维当了总统以后，他给格雷维的信[207]说明他是什么样的政治家：他请求格雷维由上面发布命令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等等；这封信使大赦推迟了几个月。

(2) 西班牙人绝非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在马德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核心（从前的“新马德里联合会”[208]），此外，有一些很好的人员，特别是在瓦伦西亚和卡塔卢尼亚的一些不大的工厂城市里，还有一些分散在各地的人员。最积极努力和最有远见的是我们的朋友霍赛·梅萨，他现在巴黎，是一个优秀青年，与盖得及其他巴黎人进行合作和保持着联系。如果您需要关于西班牙的消息，可用法文给他写信（马隆可以直接把信转给他，或者通过盖得也行，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我这里没有他的地址）。您就说是我介绍的。

总之，我的意见是，象您这样的年青人，在自己的工作中成长得如此之快，而且又如此适合这一工作，当然应该继续做这个工作。克格尔是否也能干好，我很怀疑，况且他目前还在坐牢。他的理论观点我不了解；他是否有比办地方性和讽刺性报纸更大的能力，无论如何这还没有得到证实。英国人常说：let well alone——一动不如一静。老实说，我对任何变动都是不信任和不满意的。

现在谈谈最最革命的代表大会[209]。拉法格弄到了一个意大利人，他是大会代表，但不知为什么被撵走了。此外，拉法格在一个卖葡萄酒和食品的法国商人——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那里遇见了这一帮里的各种各样的人。查明：

⑴ 代表大会代表有二十几个人，其中主要是持有其他地方的委托书的伦敦居民。还有几个法国人、意大利人和一个西班牙人。会议是公开举行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名记者，没有一条狗，也没有一只猫去参加。白白地等了三、四天听众，结果什么也没等着，于是他们通过了一个了不起的决议：宣布会议为秘密的！

⑵ 得到证实的第一点是：对于空空如也的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普遍存在着悲观失望情绪，这几个空谈家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确实没有任何支持者。每个人都了解自己和自己地区的这种情况，尽管每一个人都用关于运动在自己地区取得巨大成绩的弥天大谎去欺骗别人，但是每一个人还是相信别人的谎话。幻想破灭得如此厉害，代表们甚至当着外人的面也不能掩饰对其本身空空如也感到惊讶不已的心情。

⑶ 只有一次群众大会（当然他们邀请了记者参加），以及后

来愚蠢的托利党人和更愚蠢的激进派在议会提出的荒谬的质询，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代表大会。在目前虚无主义流行的条件下，报刊想靠报道一个至多有七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来捞取资本，这是意料中的事。

所以，如果说《自由》谈到第63号代表[210]等等，那末，这是指委托书号码，委托书是由一个、两个或三个人发给的，空白的，或填有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住在伦敦的某一个人的名字的，或者是由一二十个人发给去伦敦的代表的。实际到会代表总数是二十多一点，不是近三十，实际到会的外地代表，确实不足十名。

请注意！使用这一切材料时应当谨慎小心，因为我的这些消息是第三手的。譬如，可以用疑问的口气：是否这么回事？要知道，这些先生们总是揪住任何一个不准确的词句不放。这已经是历次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老传统了。请看一下《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这些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的报告，或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关于分裂以后他们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211]他们的无政府状态，首先表现在每个人都想当军官，没有一个人想当士兵。顺便说一说，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阿德马尔·施维茨格贝耳（这样一个名字！）把担任任何一种国家职务都痛骂为对无政府主义的背叛，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当瑞士联邦军的中尉！

同时衷心问候考茨基，一遇雨天我就给他写信。

您的　弗·恩格斯

35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8月18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可爱的孩子：

七点钟左右我回到了伦敦，即梅特兰公园。

小杜西脸色苍白，身体消瘦。她已经几个星期几乎没有吃任何东西（毫无夸大）；她的神经系统处于极度衰弱的状态；因此经常失眠，双手颤抖，面部有神经痛的抽动等等。

我立即给唐金医生打了电报。他昨天上午十一点钟来了，对杜西进行了长时间的询问和检查。他说她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心脏正常，肺部正常，等等，而只是由于任性的生活方式，胃功能完全遭到破坏，神经系统极度衰弱。

他把杜西给吓唬住了，她已答应遵守他的嘱咐，你知道，她只要作了让步，答应了，就会照办。虽然如此，她的健康只可能很慢地恢复，而我回来得正是时候。再稍微晚一点，情况就可能变得很危险。

在我们动身以前，唐金就告诉我说，他打算日内离开伦敦到赫布里底群岛去。为了杜西，此外还想等候关于妈妈[①]的消息，他在这里还要呆到周末。

写封信来告诉我关于妈妈的情况：她是否从你们那里动身了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等等。龙格和哈拉怎么样?你自己以及其他的可爱的孩子们[1]怎么样？

你的新女仆的情况怎么样？

顺便说一下，萨拉[2]（恩格斯的萨拉）现在每天帮助杜西料理几个钟头的家务，这个姑娘的性格非常好，什么事情都能做。杜西说，萨拉非常乐意到你那儿去，但彭普斯根本没有对她说，莉齐已不在你家里了，你正在找人代替。她和杜西说过，也和我说过，现在也愿意到你那里去，只是害怕一个人去法国。但这没什么。过些时候我或许能亲自带她去。

亲爱的孩子，再见吧！没有任何事情比和你以及亲爱的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日子能使我更快乐的了。

问候最亲爱的杜尔朗医生。

千遍地吻孩子们。

你的　老尼克

杜西向狼[3]和你们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① 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② 派克。——编者注
③ 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

36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1881年8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本想早一些答复你5月13日的来信，但在莱比锡实行“小戒严”[212]以后，我预料你也许会告诉我另外的秘密通讯处；既然没有等来新通讯处，现在就仍用旧的，信中还附上杜西·马克思给李卜克内西夫人的信，我们也没有她的通讯处。

伯恩施坦依然来信说他想离开《社会民主党人报》，并且建议现在让克格尔参加，然后使之成为他的继任者。我认为任何变动都是有害的。伯恩施坦出乎意料地如此称职（例如，他的论“知识分子”的文章[204]，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以外，写得很出色，而且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方针），以致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克格尔在这方面至少还没有经过考验，而情况又是这么摆着：应该避免任何试验。我已力请伯恩施坦留任，我认为最好由你们来说服他。在他主持之下，报纸愈办愈好，他本人也变得更好了。他具有真正的机智，能迅速领悟，这和考茨基截然不同；后者是一个很不错的青年，但却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我和我们大家在个人关系上是很喜欢他的，他在长篇评论文章中有时也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尽管他有最好的意愿，他还是斗不过自己的本性，这比他更强大。在报社内有这样一个学理主义者，是一种真正的不幸；甚至爱

德[①]在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中对他的一篇文章也不得不加上一段批评性的结尾。可是,他为奥地利写了一张农民传单[②],这篇东西显示出某种象他母亲[③]那样的小说家的才能;撇开某些学术用语不谈,这张传单写得很好,会起有益的作用。

我给李卜克内西写信谈了邦议会演说的问题,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说这是"策略"(但是我恰恰认为,这种"策略"是我们公开合作的障碍!),他说,不久在帝国国会中将发表另外的演说。诚然,你已经这样做了[188],但是对李卜克内西的"帝国首相的诚实"[213]这种不妥当的和完全多余的说法,又如何解释呢?也许是他企图用这种字眼来进行讽刺,但记录中看不出这一点,而资产阶级报刊却怎样大肆利用了它啊!我再也没有答复他:反正无济于事。但是连考茨基也告诉我们说,李卜克内西向全世界,例如向奥地利,写信说,马克思和我完全同意他,赞同他的"策略",而人们也都相信这一点。事情再不能无止境地继续下去了!《自由》也在大肆嘲笑哈特曼[④]在讨论伤亡事故保险法时发表的演说[214],如果引用的那些话属实,那么这个演说真是叫化子式的。

在法国,工人候选人在巴黎获得两万张选票,在外省获得四万张选票[215];如果领导人从建立集体主义工人党[17]以来不是接二连三地干了蠢事的话,情况还会更好。但是就是在那里,群众也比大多数领导人好。例如,在外省,个别的巴黎候选人之所以丧失了数以千计的选票,是因为他们在那里也使用了空洞的革命词

① 爱德华·伯恩施坦。——编者注
② 卡·考茨基《美国来的表兄弟,对农民有教益的故事》。——编者注
③ 敏娜·考茨基。——编者注
④ 格奥尔格·威廉·哈特曼。——编者注

句 (这种词句也是巴黎所固有的，如同嘈杂声响为手工工场所固有一样)，但是在那里，人们却严肃对待这种词句，他们说：没有武器和组织，如何进行革命？此外，法国的发展正在经历着它那种合乎规律的、正常的和十分必要的和平方式的过程，这在目前来说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未必能把外省真正吸引到运动中来。

我非常了解，你们感到手痒，因为在德国一切都在对我们如此有利地发展着，而你们却被束缚了手脚，不能利用仿佛自然而然地纷纷落到你们手中的一切成就。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在德国，有许多人 (菲勒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由于不能进行合法宣传，他已经完全灰心丧气了) 过分重视公开宣传，而轻视历史事件的真正动力。只有经验才能纠正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不能加以利用的成就，对我们来说还远没有因此而丧失。只有事变本身才能唤醒冷淡消极的人民群众，如果说这些被唤起的群众在目前情况下思想依然有点混乱，那么当六十万张选票突然增加两倍，当不仅萨克森，而且所有大城市和工业区也都落入我们手中，农业工人也处于容易接受我们思想影响的状况的时候，那时解放的语言所起的作用就会更加巨大，国家和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影响就会更加强烈。这样通过冲击来争取群众，比利用公开宣传来逐渐吸引他们，更为重要，何况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公开宣传的可能性很快又会被夺走。容克、教士和资产者在目前的关系下是不会容许我们来摧毁他们的立足点的，因此最好是由他们自己去干这件事。重新刮起另一种风的时候将要来临。目前你们不得不自己去对付各种艰苦工作，忍受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卑鄙行径，而这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不要忘记对你们和我们的全体同志所采取的任何一个

无耻行为。报仇的时刻一定会到来，那时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利用。

你的　弗·恩·

菲勒克在哥本哈根；通讯处如下：哥本哈根，留邮局待领①。

37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 黎 世

1881年8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过一两天您就会从邮局收到：⑴ 登有您那篇引起了许多好笑事情的文章的《劳动旗帜报》；⑵ 8月18日出版的一期《自然界》杂志；⑶ 退还您的手稿。

我把蹩脚的译文稍加修改之后，便寄给希普顿作社论用。但是好样的希普顿看不懂那篇文章[11]，要求我修改②，不过象往常一样已经太晚了。对于对工人有利的“国家干预”这个词，这位先生不知想了些什么，但想的恰恰不是其中的意思，他忘了这种国家干预在英国早已以工厂法的形式存在。更坏的是：他把“我们要求一个为了工人阶级的日内瓦公约[202]”这句话了解为您要求在日内瓦召开一次代表会议来调整这件事！对这种混蛋有什么办法呢？我借此机会实现了我要同《劳动旗帜报》断绝关系的决定，因为这家报纸不是变好，而是更坏了。

---

① 恩格斯写在信纸边上的话。——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02—203页。——编者注

在《自然界》杂志上您会看到约翰·西蒙在这里的国际医学会议上的发言，这是医学科学对资产阶级的真正的起诉书。约翰·西蒙是枢密院[216]的卫生视察员，实际上是全不列颠卫生警察的首脑；他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此频繁地引证，如此赞扬的那个人，也许他是1840—1860年时代那些忠于自己的职责、态度认真的老官吏中的最后的一个，对他说来，资产阶级的利益往往是他履行自己职责时的主要障碍，他不得不经常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对资产阶级的本能的憎恨是很强烈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资产阶级在牧师的领导下，掀起反活体解剖运动，攻击他这位医生，干涉他的专业部门，但他不象微耳和那样，用软弱无力的说教来回答，而是把矛头对准敌手，向他们进攻：他把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做大规模的商业性实验与医生对动物做一些科学实验相对比，他这就第一次把问题说到点子上了。把这个发言摘录出来，可以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篇绝妙的小品文。[217]

话又说回来，会议已一致宣布活体解剖对科学是必要的。

您的传单①证明，您继承了您母亲②的小说家的才能。我对这张传单比对您从前的一切作品都更加喜欢。如果细心润色，还可以把某些语句加以修改。我劝您再版时最好这样做一下。用书面德语写太难懂，而诸如《Reaktion》③之类的学术性词汇，农民根本不懂，最好避免。这篇小东西值得您从这个角度把它认真地加以改写。这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的一张传单。

您在奥地利的那些莫斯特的拥护者，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就

① 卡·考茨基《从美国来的表兄弟，对农民有教益的故事》。——编者注
② 敏娜·考茨基。——编者注
③ 这个词有“反作用”、“反应”、“反动”等意思。——译者注

应当通过沉痛的教训学得聪明一些。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会损失许多一般说来是优秀的分子；但如果优秀分子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却不顾一切地去搞秘密活动，那他们就无可救药。幸而无产阶级运动具有再生产的强大能力。

菲勒克和他的妻子[①]不走运，在苏格兰碰上了恶劣的天气；他们已坐船去哥本哈根，并且已经到达那里。他们将暂时留在那里；通讯处是：哥本哈根，留邮局待领。

我们的法国朋友们近两年来由于过分热心、有小组习气、喜欢夸夸其谈等等，干了许许多多蠢事，但他们还以为干得太少。《公民报》好象已被出卖给了波拿巴派，波拿巴派虽然还没有把我们的人赶出门外，但已不再给他们钱，总是虐待他们，很象是想迫使他们罢工，以便借此把他们摆脱掉。况且，正如在不顺利时常常发生的那样，我们的人互相争吵。最倒霉的一个是布鲁斯，他真是一个好样的人，但是糊涂透顶，竟然认为整个运动的首要任务只不过是要使他过去的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改变信仰而已。按照他的倡议，曾经通过了一个放弃提出候选人的荒唐决定[218]。但是，法国的合乎规律的和平发展进程，归根到底只会对我们有利。只有当外省卷入运动（如1871年以来发生的那样）并在国家中，即在正常的法律形式下作为独立力量出现（如越来越经常出现的那样），才能结束法国从巴黎历次革命开始的、而随后被外省反动势力往后拉了许多年的、迄今为止的撞击式的发展形式，而有利于我们的共同利益。如果到那个时候巴黎采取行动的时刻到了，那末外省就不会反对它而会支持它。

① 劳拉·菲勒克。——编者注

大家衷心问候您。

您的 弗·恩·

38
马克思致卡尔·考茨基[219]

苏 黎 世

1881年10月1日 [于伦敦]

特急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附上给您母亲①的一封短信，以及给我女儿②的一封短信。要是您把您母亲在巴黎的住址告诉了我，就可以节省时间了。

我本想请您母亲来我家作几天客，同时带她游览一下伦敦。我的妻子③得了不治之症，悲局日益临近，因而妨碍这样做。我现在成了护士。

我定期收到《工人呼声》。它使我感到开心，但并不使我感到惊讶，因为我对自己的瑞士人已有数十年的了解了。

至于麦圭尔先生，根据您的来信判断，他应在伦敦。我们的纽约的朋友们怎么谁也不给他写介绍信？我从一开始对美国社会主义者一直抱某种怀疑态度，特别是我知道，他们当中与希普顿有联系的一些人脾气特别古怪，而且爱好宗派主义。但尽管如此，

① 敏娜·考茨基 (见下一封信)。—— 编者注
② 燕妮·龙格。—— 编者注
③ 燕妮·马克思。—— 编者注

麦圭尔先生可能是一个卓越的党的活动家。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我的妻子和女儿[①]问候您。

39
马克思致敏娜·考茨基
巴　　黎

1881年10月1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夫人：

给您寄去一封写给我女儿[②]的短信。阿尔让台紧靠巴黎，从圣拉查尔车站乘车，大约只需要二十分钟。

要不是我妻子得了重病，恐怕是不治之症，使我们中断了同外界的交往，我本来是准备请您来伦敦到我家作客的。您的儿子[③]大概已转告您，我们全家多么赞赏您的作品。

真诚地祝您身体健康。

最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燕妮·龙格。——编者注
③ 卡尔·考茨基。——编者注

40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1年10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非常感谢您把《平等报》的情况写信告诉了我。[220]除了所谈的那个问题以外，这也使我有机会向您说明，马克思，其次还有我对法国运动是采取怎样的立场的。根据这一个例子，您就可以看出我们对同情我们，也引起我们同情的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运动采取的立场。

我很满意的是，您现在不能给《平等报》以经济援助。拉法格的信又是这样一种冒失行为，法国人，特别是波尔多—里昂以南各地出生的人，往往少不了这种冒失行为。他如此深信这一步骤的英明，同时又如此深信其必然破产，甚至对自己的妻子① (她多次阻止他这样做) 也只是在事后才说出这一点。我们这里都一致反对《平等报》第3号②，只有拉法格例外，他一直主张“总得做点事情”，而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事先就同他们讲过，他们的五千法郎 (如果有那么多的话) 只够出三十二号。如果盖得和拉法格硬要在巴黎得到个报纸的葬送者的名声，我们也没法阻止他们，但我们不再给以帮助。如果将来出乎意料，报纸的情况好转，并且确实是好，那末在困难的时刻人们终究还能设法帮助一

① 劳拉·拉法格。—— 编者注
② 指《平等报》第3种专刊。—— 编者注

下。但绝对必要的是让这些先生们最后学会好好使用自己的经费。

问题是，我们的这些准备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朋友们，全都毫无例外地在最近十二至十五个月内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盖得犯的，他出于荒谬的纯洁主义，阻止马隆应聘担任薪金一万二千法郎的《不妥协派报》工人专栏编辑的职位。整个吵闹就是从此开始的。接着对《解放报》也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马隆让里昂人（法国最坏的工人）的虚伪诺言骗了，而盖得则极力坚持不惜代价地出版日报。后来由于候选人问题[218]发生了无谓的争执，这里很可能是盖得犯了您所谴责他的那种形式方面的错误，但是在我看来，事情清清楚楚，是马隆寻找争吵借口。最后是声名狼藉的冒险主义者博博，即塞孔迪涅先生参加而后又退出《法兰西公民报》，——退出是没有任何政治理由的，因为这只是由于不支付稿费而引起的。后来，盖得与身分非常复杂的人们一起参加了最新的《公民报》，马隆和布鲁斯则参加了可怜的《无产者报》，而过去这两个人——至少是马隆——却一向背地里斥责该报是个平凡的大老粗的报纸。

《无产者报》是眼界极其狭隘的一伙爱耍笔杆的巴黎工人的报纸。它有个规定：只准许真正的手工工人参加会议和撰稿。对“有教养者”怀有极其愚蠢的魏特林式的憎恨，那是自然的事。因此，报纸的内容十分空洞，但是它却奢望成为巴黎无产阶级观点的真正表达者。所以，对于包括两种《平等报》在内的所有同时出版的报纸，虽然表面上显得十分友好，却一直怀有隐蔽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和阴谋。

如果马隆现在断言，法国工人党力求把《无产者报》变成自己的机关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家进行竞争的《平等报》干什

么，那末，马隆本人比谁都更为清楚：⑴ 两种《平等报》最初也是同《无产者报》同时存在，⑵ 原因很简单，因为《无产者报》毫无用处——马隆对《无产者报》工作人员的了解一点也不比盖得差，⑶《无产者报》的几个笨蛋加上马隆和布鲁斯还远没有构成法国工人党。所以，马隆知道：这一切都是胡诌的托词，这是他想把《无产者报》变成自己的机关报，因为他在所有其他地方都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是，是什么东西把马隆和布鲁斯同这家浅薄小报联结在一起呢，这就是他们对马克思的共同的嫉妒。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一想到以法兰西思想造福世界的、拥有思想垄断权的民族，文明中心的巴黎，现在忽然要接受德国人马克思的现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就觉得非常可怕。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况且马克思，他的天才、他的几乎可以说对科学过分认真的态度、他的渊博得出奇的学问，都大大超过我们大家，谁硬要批评他的发现，谁就只会自讨苦吃。为此需要一个更进步的时代。如果说，这样一来，法国社会主义者（即他们的多数）不得不好歹屈服于不可避免的东西，那末也仍然免不了要有些嘟嘟囔囔的。《无产者报》的人们断言盖得和拉法格是马克思的传声筒，他们在同比较亲密的人的谈话中把这一点解释成企图将法国工人出卖给普鲁士人和俾斯麦。在马隆先生的所有著作中，这种嘟囔也表现得很明显，而且方式很不体面：马隆力图为马克思的发现另找一些始祖（拉萨尔，谢夫莱，甚至德·巴普！），或者把马克思的发现硬归之于他们。当然，对党员——不管他们是谁——在这种或那种场合的行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用这类办法去向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争夺完全是他个人的发现，这就

是表现出大概只有排字工人才能有的狭隘性，排字工人的自以为是，您大约根据经验是相当了解的。我完全不理解，怎么能妒忌天才。天才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我们这些没有天才的人一开始就知道，这是我们所达不到的；只有十分渺小的人才妒忌天才。马隆采用的那种隐蔽的方法，也丝毫无济于事。他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个蠢人，处处显得缺乏知识和批判能力。如果将来有一天必须研究一下他的妙不可言的"从最早期起"(!)的《社会主义史》和其他著作的内容，那时就可以使他很不愉快地感觉到这一点。

布鲁斯大概是一个我所见过的最平庸的糊涂虫。在无政府主义中他把无政府状态，即反对政治活动和反对选举抛弃掉了，但把所有其他的词句，特别是策略，都保留下来。现在，他在《无产者报》上的那些篇幅很长、矛头指向盖得（他没有点名）的文章中，自作聪明地谈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建立一个排除（盖得！）独裁的可能性的组织。他在著述方面和理论方面是一个绝顶的庸材，却非常善于搞鬼，如果这种人又能起某种作用的话，那末这是拉法格、盖得和马隆的共同罪过。

最后谈谈盖得。他有极其清晰的头脑，在理论方面远远超过其他巴黎人，他是少数完全不认为现代社会主义起源于德国有损他们体面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①]。正因为如此，《无产者报》的先生们就散布说他简直是马克思的传声筒，而马隆和布鲁斯则带着悲伤的神色继续贩卖这种说法。除了这一伙人以外，谁也没有这个念头。由此得出什么结论，下边再谈。说他贪权，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力求使自己的观点成

①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就这个意义来说，都贪权。如果说盖得是企图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达到这种目的，而马隆则是用拐弯抹角的方法，那末这也只是说明盖得的性格和马隆更加谙于处世之道，特别是同这种不愿听从任何指挥、却甘愿上当的巴黎人打交道时，更是如此。而对于任何一个有些价值的人，我任何时候听人说他贪权，我也只能由此做出结论说，实际上对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盖得有完全不同的缺点。第一，有巴黎的偏见，似乎必须经常反复地说“革命”这个词。第二，他非常急躁。他的神经有毛病，他认为自己活不了多久，因此他想无论如何要身历某些重大事件。由此，以及由于他的病态的激昂情绪，就产生了他的过分的、往往是有害的活动欲望。

此外，如果您再考虑到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只会把分歧理解为个人之间的分歧，您就会明白，这些先生们是怎样刚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便断定已经达到了目的，熊还没打死，就来分熊皮，并因此争吵起来。

不过，盖得的小册子和文章是用法文发表的小册子和文章之中最好的，而且他是巴黎最好的演说家之一。所以我们一向认为他是一个爽直而可靠的人。

现在谈谈我们。我们，即马克思和我，同盖得根本没有保持通信联系。只是当有某种事务上的原因时，我们给他写过信。拉法格给盖得的信的内容我们只知道个大概，而盖得给拉法格的信我们也远没有全部看过。他们可能彼此交换过什么计划，但我们一无所知。马克思，我也是一样，不时通过拉法格向盖得提出过这样或那样的建议，但他未必有什么时候听从过。

但是盖得的确到这里来过，当时是为了起草法国工人党的纲

领草案[32]。导言[①]就是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场，由马克思向盖得口授的：工人只是在成了他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占有方式或集体占有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战胜，而且将日益被战胜；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等等。这真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这是我少见的，说得这样简明扼要，真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奇。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做了某些增减，但是很难说盖得是马克思的传声筒，这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盖得硬要把他的那一套工资最低额的谬论放到纲领里去，因为对纲领负责的不是我们而是法国人，所以最后我们只得随他的便，虽然他也承认这一点在理论上是荒诞无稽的。

布鲁斯当时在伦敦，也许他是很乐意出席的。但是盖得的时间很有限，并且不是没有根据地预料到布鲁斯会引起一场关于他自己也不懂的无政府主义论调的无聊争论，所以他坚持不要布鲁斯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他的事情。可是布鲁斯对盖得的这种做法耿耿于怀，从此他那反对盖得的集团便产生了。

法国人后来讨论了这个纲领，做了一些改动以后便通过了，其中马隆所作的改动决不能认为是什么改进。

后来，我还在《平等报》第2号[②]上写了两篇关于《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的文章，就我所知，这就是我们积极参加法国运动的全部经过。

可是，最使那些微不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满腹牢骚的小人恼

① 卡·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编者注
② 指《平等报》第2种专刊。——编者注

火的是：马克思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和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

马隆也曾想到这里来，但是他想通过拉法格得到马克思的特别邀请；他当然没有得到这种邀请。我们愿意同其他任何人，也愿意同他进行善意的商谈，但是要邀请他！为什么？我们什么时候邀请过人呢？

马克思以及我，对其他国家的运动所持的态度同对法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同他们保持接触，如果值得花力气这样做，而且有机会这样做的话；但是，违反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对我们有害，只会毁灭在国际时代取得的原有的信任。在革命事业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

我还要指出两个事实：

⑴ 不是别人，正是盖得同拉法格在《平等报》给马隆树立了完全不应当有的声望，可以说是创造了神话，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盖得作为一个纯粹法国式的著作家确信他身边务必要有一个工人。

⑵ 我受通信者的委托通知您：曾担任会议（在这次会上马隆反对了坏蛋吕利埃）主席的利沙加勒写道：在会议正要开始之前，吕利埃要求马隆和他谈判几分钟。马隆走了出去就没有回来，最后，他的委员会去找他（利沙加勒是委员会和会议的主席），才

发现他正在同那个曾被他（十分正确地）斥之为最坏的家伙的吕利埃极其友好地一起喝酒，并且几乎就要和平地达成协议了！如果马隆当时不是必需在九点钟去苏黎世参加代表大会[145]，恐怕就会和解了。这样的人还想要做个政治活动家！

梅萨的通讯处如下：巴黎巴克大街36号，霍·梅萨。

关于这封信，马克思一点也不知道。他因患支气管炎及各种并发症已经卧床十二天了；但从星期天起，已经没有——如果谨慎小心的话——任何危险了。我受了不少惊恐。现在情况好了。我希望我们明天即10月27日就向世界表明，我们还活在世上。衷心问候您和考茨基。

您的　弗·恩·

关于《平等报》，我认为最好是起初不要创办任何新的报纸，待党内情况更加明朗一些再说。假使他们一定要这样去干，无论是我们或是其他的人都不会去阻止他们，只是我不能设想，这一次在《平等报》和《无产者报》之间怎么避免得了一场纠纷。这虽然不会成为世界灾难，但是看来毕竟是多余的幼稚病。

考茨基是怎么搞的？但愿他不要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尔萨斯主义者！

41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1881年11月4日于 伦敦[1]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老朋友：

收到你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明信片[221]太晚了，来不及及时给你写信。从那时起，我们这里发生了各种不幸的事情。马克思夫人病重，已卧床不起好几个月，而现在马克思又得了支气管炎，同时引起了各种并发症，按他的年龄和他的整个健康状况来看，这真是非同小可。幸亏最严重的情况已过去了，现在马克思并没有任何危险；但整天大部分时间他还得在床上躺着，他很虚弱。

现在由邮局汇上四英镑，即一百法郎八十生丁，这次我只能给你寄这一点。希望这点钱到得正是时候。虽然我很高兴地得悉，你已能至少是开始谋生了，但这只是开始而已，我很遗憾的是，自己近来相当拮据，因此未能早日给你以援助。

要是任何一个所谓的世界代表大会开得象这次一样没有公开大吵大闹，我总是感到高兴的。参加这种代表大会的往往有形形色色的人，其中一部分人所抱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去在大众面前摆一摆架子，正因为如此，他们任何蠢事都能做得出来。不过这一次还可以过得去。

我们在德国的同志在选举中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222]尽管这一次所有其他的政党都倾巢出动，他们在二十三还是二十七个区

(准确数目我未能得悉)的复选当中还是被通过了。所有这一切是在非常法[109]和戒严的压制下，在没有报刊、不能集会、没有任何公开宣传工具，并且在确信党内成千人在生活上会为此又蒙受牺牲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是了不起的事，它已在整个欧洲，特别是在英国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能得到多少席位，这并不重要。无论如何，能在帝国国会中去说出必须说的话，这就够了。我们在许多大城市里争得了立足点，而不是丧失它，这个事实就是非常好的，为我们德国的小伙子们欢呼吧！

你的　老弗·恩·

4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1年1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如果说有某种外来的事件使马克思的健康又有所恢复的话，那末这就是选举了。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现得如此出色。在英国，1848年大失败[223]以后，工人消极起来，最终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剥削，仅仅保持了工联为提高工资的斗争。在法国，无产阶级在12月2日[224]以后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而在德国，三年当中迫害闻所未闻，压迫有加无已，根本不可能有公开的组织，甚至根本不可能自由交换意见，但是在这以后，我们的小伙子们不仅保存了自己原先的全部力量，而且还更加壮大起来了。并且恰恰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壮大起来了，即运动的重心由半乡村的

萨克森地区转到了大工业城市。

在萨克森，我们的基本群众是手工纺织工人，他们注定要被蒸汽纺织机所淘汰，他们仅仅靠一点点微薄的工资和副业（种菜、雕刻木头玩具等等）来勉强维持生计。这些人的地位在经济上是反动的，他们代表着衰亡的生产阶段。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不象大工业工人那样是革命社会主义的天然代表。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是反动的（例如这里手工纺织工人的残余——“保守工人”的核心终于变成了的那样），不过，他们毕竟不太可靠，特别是由于他们处于极其贫困的状况，比城市工人的反抗能力小得多，同时由于他们的散漫性，比大城市居民更容易受政治上的奴役。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报道的那些事实[225]以后，这些不幸的人们还能英勇地保持这么大的数量，这种英勇精神实在令人惊叹。

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全国性的大运动的真正核心。贫困使他们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在1865—1870年时期——比大城市居民更易于接受社会主义观点。但也正是这种贫困本身使他们较不可靠。溺水者抓稻草，他等不及打救他的船离岸。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稻草就是保护关税和国家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那里，在我们的一些老的区里，几乎只有保守派有过战胜我们的机会。如果说凯泽尔那时候能够在保护关税问题上这样胡说八道[226]，而其他的人又不敢给以适当的反驳，那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象倍倍尔给我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岂不正是那些选民，尤其是选凯泽尔的那些选民！

现在这一切都起了变化。柏林、汉堡、布勒斯劳①、莱比锡、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德勒斯顿、美因兹、欧芬巴赫、巴门、爱北斐特、佐林根、纽伦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哈瑙加上开姆尼斯[①]和厄尔士山地区——这构成一种完全不同的基地。按其经济地位来说是革命的阶级，成了运动的核心。并且运动已均衡地扩展到德国的一切工业区，正是现在它从局限于少数地方性中心的运动，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这是最使资产者感到害怕的。

对于候选人，我们愿寄于很大的希望，虽然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我觉得很难这样指望。但如果倍倍尔再次落选[222]，那就是真正的不幸。只有他能以其真正的机智驾驭住大批新的和确实怀有形形色色新打算的成员，并防止出丑。

至于法国人，那末最好目前不要去触动马隆和布鲁斯先生，看看他们能够干什么。但这点未必能做到。《平等报》日内即将出版；布鲁斯会照旧悄悄地进行诽谤，在《无产者报》上不指名地攻击，而对方沉不住气，会去上当，首先对他进行公开抨击，然后就会被宣布为捣乱分子、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和妄图实行独裁的人。这真是毫无办法。这些人怎么也等不及对手自己去碰一鼻子灰，而对手正需要用论战来延长其生存。马隆，尤其是布鲁斯，如果被置之不理，也许在半年之内就会自己把自己（也许是相互）毁掉。否则这就会延长时间。

兰斯代表大会[227]几乎象所有这种代表大会一样，堪受外界颂扬，但一经仔细分析，却是个骗局。大会所代表的许多“联合会”当中，只有中部、北部和东部三个“联合会”是实际存在的，其他的都只是纸上的东西。阿尔及利亚联合会选出了资产者昂利

① 现在称作：卡尔·马克思城。——编者注

·马雷 (一个激进派议员) 做代表!!这就说明马隆的同盟者是些什么人。盖得要求在全国委员会里仅仅有实际组织的联合会才能有代表，但是被否决了。《无产者报》上的公报撒了谎，对此只字未提。可见，代表大会的半数代表和全国委员会的半数委员不代表任何人，最多不过是"未来的音乐"[228]。已经完全被马隆和布鲁斯抓到手的《无产者报》，之所以如此匆匆忙忙地被宣布为正式机关报，就是因为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事先同不久就要出版的《平等报》捣乱。关于组织问题的一切决定，照例都不是出于内在的合理的动机，而是根据派别的机会主义的考虑作出来的。

今春，拉法格在巴黎的时候，马隆请他设法给他的新版《社会主义史》搞到一篇马克思的序言，这件事情是很能说明马隆对马克思的恐惧病的。当然，拉法格讥笑了他，说他大概是对马克思很不了解，才会认为马克思能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

乔·豪威耳，这个在斯泰福幸运地落选了的"工人候选人"，当然是这里会耍政客手腕的前工人中最坏的坏蛋。他不久以前是工联议会委员会的书记 (当然是一个领薪水的职务)，在此期间他亏空了公款，虽然这件事情勉强掩饰过去了，但他还是被赶走了。

关于波兰人的事情[229]，我近日一定写信告诉卡·考·冯·克兹堡①。现在请向他转达衷心的问候。

马克思还很虚弱，目前不让他到室外去，不让他多干事，不过他毕竟明显地在恢复健康。他夫人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① 考茨基的绰号，克兹堡原文为Kätsburg，Käse意为干酪，同Kautsky (考茨基) 的发音近似。——译者注

43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12月7日　[于伦敦]

我亲爱的好小燕妮：

你当然了解，我现在顾不上写信。因此，我只能寄给你这几句话。因为我还根本不能走出自己的房门，所以医生绝对禁止我参加送殡。我之所以服从，还因为亲爱的亡人[1]在她去世的前夕对护士说过轻视任何仪式的话："我们不是那种重表面形式的人！"

肖莱马是自己从曼彻斯特来这里的。

我至今还不得不用碘酊在胸部、背部等处文身，由于定期重复这样做，使皮肤产生了一种很不舒服、很难受的灼痛。这种处置只是为了防止在恢复健康期间旧病复发（实际上我只是有点轻微的咳嗽了），这现在对我效力很大。对付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一种有效的解毒剂——肉体上的疼痛。你想象一下吧，一方面是世界末日，而另一方面是牙疼得要命的人！

那一次我虽然有过各种犹豫，还是决定到巴黎去了，我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来就感到非常高兴！可贵的不仅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人同你和孩子们[2]一起度过的那段时间本身，——那段时间由于某家庭暴君和厨房米拉波的形象而"有点儿"暗淡，——而且是她患病的最后时期对那段时间的回忆！无疑地，在这个时期怀念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② 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你们也许比你和孩子们在这里更使她感到高兴。

她的墓离可爱的“沙尔”[①]的墓不远。

她及时咽气，这对我是一个安慰。由于肿瘤的位置非常罕见（因此它是活动的，能改变位置），只是在最后几天才产生特有的难以忍受的剧痛（但是注射吗啡后抑制住了，这是医生有意留到临终时才用的，因为在长期使用的情况下，连吗啡也不再起任何作用）。如唐金医生预先告诉我的，病势带有逐渐衰亡的性质，同年老衰竭一样。甚至在最后的几小时，也不用同死亡进行任何斗争，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

顺便说一说，向来忠实地和我站在一起的恩格斯，按照我的请求曾经给你寄去一期《爱尔兰世界》周刊，其中载有一个爱尔兰主教反对土地所有制（私有制）的声明。这是一个最新新闻，我告诉过你妈妈，她认为你也许会把这个新闻刊登在某家法国报纸上以便吓唬法国教权派。不管怎样，这说明这些先生们是善于唱各种调子的。

（有一个名叫瓦·让德尔[②]的人，在1881年12月2日的《正义报》上登了一篇题为《德国的天主教社会主义》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企图证明自己的沙文主义是正确的，理由是他继拉弗勒之后真正相信我们的朋友鲁·迈耶尔（在他的《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一书中）的幻想的统计。而实际上，所谓的天主教社会主义者在德意志帝国存在的整个时间内只有一次选了一个议员参加帝国国会，而且这个唯一的议员选举后就立即只以“中央党[38]党

① 燕妮·龙格的儿子沙尔·龙格。—— 编者注
② 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尼基廷娜的笔名。—— 编者注

员的身分出现”。另一方面，至于天主教工人组织的数目，那末我们的鲁·迈耶尔使法国感到幸运的是，他认为法国的这种组织的数目比德国要多得多。）

刚才我收到了12月7日的《正义报》，我在其中的“新闻”栏内发现一篇悼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显然，她〈指你们的母亲〉同特利尔的律师[1]的儿子卡尔·马克思结婚不是没有种种困难的。当时需要克服不少偏见，其中最大的当然是种族上的偏见。人所共知，这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是犹太血统。”

这种事是纯粹的臆造；当时用不着克服任何偏见。我认为，我把这些文艺的“夸张”算作沙·龙格先生的创作天才，是不会错的。就是这个作者，在谈论关于限制工作日和工厂法时，在另一号《正义报》上提到“拉萨尔和卡尔·马克思”的名字，虽然前者关于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发表过或者说过一个字。如果龙格在自己的文章中永远不再提我的名字，那就是给我的莫大恩惠了。

暗示你妈妈偶然写的一篇匿名通讯报道（实际上是为帮助厄尔文而写的）[230]，我认为是轻率的。当她给《法兰克福报和商报》写稿的时候（她从来没有给被《正义报》称之为完全反动的和庸俗的《法兰克福报》写过稿），该报（《法兰克福报和商报》）同社会主义政党还或多或少有友好的关系。

至于“冯·威斯特华伦家族”，那末他们不是莱茵人，而是不伦瑞克人。按父系说，你母亲的祖父[2]曾是著名的不伦瑞克公爵的秘书（七年战争时）。因此，他很受不列颠政府的宠信，并同阿盖

---

① 亨利希·马克思。——编者注

② 克利斯提安·亨利希·菲力浦·冯·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父亲。——编者注

尔家族的近亲[①]结了婚。他论述战争和政治的著作曾由冯·威斯特华伦大臣发表。[231]另一方面，“按母系说”，你母亲的外祖父[②]是普鲁士的一个小官吏。实际上你母亲生于勃兰登堡的萨尔茨维德尔。所有这一切，不是非知道不可的，但是，不了解这些情况，就无法纠正别人写的“传记”。

我亲爱的孩子，现在给我寄一封详细叙述琼尼等人活动情况的信吧。当昂利很想来的时候，没让他到我们这里来，我总觉得遗憾。这是一个需要全家照料的孩子，要全家只照料他一个人才好。在需要你照顾的这么多孩子当中，他是一个重大的负担。

多多地吻你和你的“小家伙们”。

你的忠实的父亲　卡·马·

我对迈斯纳关于需要出《资本论》第一卷新版即第三版的通知颇为不满。本来我想一俟我重新觉得自己有了精力，就以全部时间专门从事第二卷[232]的收尾工作。

请以我的名义写几句话给莱茵哈特。我找不到他的通讯处。他是你妈妈的熟人。[③]

① 珍妮·威沙特 (彼得罗的)。—— 编者注
② 霍伊贝耳是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的父亲。—— 编者注
③ 最后两段是马克思补写在信头上的。—— 编者注

44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

日 内 瓦

1881年12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你从报上大概已经知道我妻子[2]逝世了 (她是12月2日去世的)。你当然理解，在受到这个无可弥补的损失后的头几天，我根本不能写信。真的，除了她的弟弟即在柏林的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外，你是迄今为止由我亲自通知这件事情的唯一的人；其他的朋友或熟人都是我的小女儿[3]通知的。

我的妻子直到最后一分钟仍然是你的忠实的朋友，她对于党没有帮助你这样一个坚定而英勇的老战士和你的忠实的终身伴侣[4]为争取生存而斗争，表示了正当的不满。

我自己还有病，但健康渐趋恢复；胸膜炎加上支气管炎曾严重到这种程度，以致有一段时间，即有几天，医生们对我能否恢复健康都表示怀疑。再见，亲爱的朋友。问候你的夫人。

卡·马·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瑞士) 日内瓦活水镇沃朗德路约·菲·贝克尔先生

---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 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 编者注
③ 爱琳娜·马克思。—— 编者注
④ 伊丽莎白·贝克尔。—— 编者注

45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 得 堡

1881年12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的妻子[①]经过长期而痛苦的疾病之后于本月二日逝世了。为了照顾病人，我同她一起度过了秋天，开始是在英国海边的一个小地方（伊斯特勃恩），后来在阿尔让台（离巴黎大约有二十分钟的路程）。在阿尔让台，我们能够同我们的大女儿（龙格夫人）以及她的四个对外祖父和外祖母十分依恋的小男孩[②]（大的[③]约五岁）生活在一起感到非常愉快。

这次在我亲爱的妻子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到巴黎去，从我这方面来说，是很冒险的。但是，我听从了我的好朋友唐金医生的意见，决定这样做，好让她得到这么一次最后的愉快！

偏不凑巧，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我自己的健康状况相当不稳定，在我们返回伦敦以后，我突然得了支气管炎，且并发了胸膜炎，因此在我妻子生命的最后六个星期中有三个星期我不能同她相见，虽然我们是住在两个相连的房间里。

到现在我还不能出门。当时我差点要“离开这个邪恶的世界”了。现在医生们想让我到法国南部，甚至到阿尔及尔去。

---

① 燕妮·马克思。—— 编者注
② 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 编者注
③ 让。—— 编者注

我所收到的从各地寄来的吊唁信，对我是个取得安慰的丰富泉源，因为所有这些信件（除了唯一的一封俄国人的以外）都表示了真挚的同情以及对我亲爱的妻子的出色品质的真正的了解和赞扬。

我的德国出版者[①]通知我，要出《资本论》第三版。这个通知来得很不适时。第一，我首先应该恢复自己的健康，第二，我想尽快地完成第二卷[232]（即使是我不得不在国外出版它）。我现在特别想完成它，以献给我的妻子。

不过，无论如何，我要同我的出版者商妥，我对第三版只作尽量少的修改和补充；但是，另一方面，我将要求他这一次只印一千册，而不是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印三千册。将来作为第三版的这一千册售完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对该书作出目前如换一种情况本来要作的那些修改。

永远是您的忠实的朋友　阿·威廉斯[②]

46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1881年12月15日　[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的儿子[③]从这里亲自给你带去的消息，一定使你对于我亲

① 奥托·迈斯纳。——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③ 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

爱的、永世难忘的终身伴侣[1]逝世 (12月2日) 的消息有所准备。我自己的健康还没有怎么恢复，未能去对她表示最后的敬意。我实际上至今一直被软禁在家里，不过，下星期我打算去文特诺尔 (在威特岛)。

最近这场病之后，我已是双重残废了：精神上是由于失去了我的妻子，生理上是由于病后胸膜硬结和支气管应激性增强。

遗憾的是，我不得不花一些时间来专门恢复自己的健康。

需要出新的德文版《资本论》。[232]这对我来说很不是时候。

你们的亨利·乔治越来越暴露出他是个骗子。

我希望小左尔格平安到达；请代我问候他。

你的 卡·马克思

英国人近来开始起劲地研究《资本论》等等。在最近的十月的 (或十一月的，我记不清楚了) 那一期《现代评论》上登载了约翰·雷伊写的一篇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233] (很不象样，错误连篇，但是正如我的一位英国朋友前天所说的那样，还"公正")。为什么"公正"呢？因为约翰·雷伊没有断言，我四十年来宣传有害的理论，是出于"坏的"动机。"我必需称赞他的宽宏大量！"至少要对自己所批评的东西有足够了解的这样一种"公正"，看来是具有不列颠庸俗习气的下流文人所根本不懂的东西。

还在这以前，六月初，有个名叫海德门的人 (以前他自己硬闯到我家里来) 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大家的英国》。小册子是想阐述"民主联盟"[199]的纲领，—— 民主联盟是不久以前由半资产阶

① 燕妮·马克思。—— 编者注

级、半无产阶级的各种英格兰和苏格兰激进派团体组成的[1]。关于劳动和资本的两章，不过是逐字逐句照抄或复述《资本论》而已，但是这个家伙既不提书名，也不提作者；为了使自己不被揭露，他在自己的序言的末尾说：

"至于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思想和大部分实际资料，我要感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的作家的著作，等等，等等。"

这个家伙写了一些荒唐的辩白信给我本人，例如说什么"英国人不喜欢外国人教训他们"，"我的名字非常令人憎恨，等等"。尽管如此，他的小册子——就它剽窃《资本论》来说——做了很好的宣传，虽然这个人是一个"脆弱的"生灵，他甚至没有足够的耐心（而要想学点东西，这是首要条件）去踏实地研究问题。所有这些可爱的中产阶级作家——如果不说是专家的话——都满怀着一种非满足不可的愿望：立即利用顺风传到他们耳朵里的任何新思想来捞取金钱，或者捞取名誉，或者捞取政治资本。这个家伙好几个晚上来我这里剽窃，想捞取和用最省力的办法学到点东西。

最后，12月1日的最近一期《现代思想》月刊（我将寄一份给你）发表了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的一篇文章《现代思想的领袖。第二十三——卡尔·马克思》。

目前这是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对新思想充满真正的热情并勇敢地起来反对不列颠庸俗习气的文章。不过作者所提供的关于我的传记资料大部分是不真实的，等等。在对我的经济原理的阐述及其译文（即摘自《资本论》的引文）中，有许多错误和混乱的地方，虽然如此，用大号字印成的广告在伦敦西头[2]的墙上到处张

① 见本卷第194—196页。——编者注
② 伦敦西区，那里住的主要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编者注

贴，宣传这篇文章的发表，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对我最重要的是，还在11月30日我就收到了上述的一期《现代思想》，使我亲爱的妻子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得到了愉快。你知道，她是多么热情地关怀所有这类事情。

47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1年12月17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我亲爱的孩子：

刚才杜西在恩格斯的帮助下乘马车把给我们孩子们的一箱圣诞节礼物运往托运公司去了。海伦[①]请我特地指明她送的小短上衣一件是给哈利的，一件是给埃迪[②]的，一顶小毛线帽子是给帕[③]的；其次，劳拉送的一件“天蓝色小外衣”也是给那个帕的；我送的一套水兵服是给我亲爱的琼尼的。妈咪[④]在她生命最后几天里，有一天曾非常快乐地笑着对劳拉说起，我们同你带琼尼到巴黎，在那里给他挑了一套西服，他穿起来活象个小小的“醉心贵族的小市民”[⑤]。

我从各地和从各种民族、各种职业等等的人们那里收到的吊

① 德穆特。——编者注
② 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
③ 马赛尔·龙格的绰号。——编者注
④ 马克思夫人燕妮。——编者注
⑤ 茹尔登，是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的人物。——编者注

唁信，都赞扬妈咪，都充满了非常真诚的心情，非常深厚的同情，这是罕见的，而通常这只不过是奉行故事而已。我认为这是因为她一切都自然而真实，朴素而不做作；因此她给人的印象是富有朝气和乐观愉快。赫斯夫人甚至写道：

“由于她的逝世，自然界毁坏了它自己的杰作，因为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这样聪慧而慈爱的女人。”

李卜克内西写道，没有她，他也许已沉沦于贫困的流亡生活之中，以及其他等等。

尽管她外表柔弱，但她生来是多么异乎寻常地结实，由一点即可看出：尽管她卧床这么长时间，但她身上没有任何褥疮，这使医生深为惊讶。我最近一次患病时，只卧床两星期，就长了好些褥疮。

因为自从我恢复健康以来，天气一直很坏，所以直到现在我仍被软禁在家里。但是按照医生们的嘱咐，我下星期应该到文特诺尔（威特岛）去，然后从那里继续南行。杜西同我一起去。

你会收到（由同一个邮班同时寄出）刊登在《现代思想》月刊上的一篇关于我的文章[①]。英国的评论如此热烈地为我们的事业辩护，这是第一次。妈咪还赶上了高兴地读到这篇文章。摘自德文“本文”的引文太坏（我是想说英文译得太坏），我已经请杜西把我们留给朋友们看的那几份加以修改。《生平》那一节里面的错误无关重要。

我亲爱的孩子，现在你能给我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好好地注意自己的身体！我希望同你一起再度过许多美好的日子并很好地

① 见上一封信。—— 编者注

尽自己当外祖父的义务。

千遍地吻你和孩子们。

你的忠诚的 老尼克

关于维凡蒂等人我本来能写好多东西，不过大概杜西已把这方面的内容据为己有了。

48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 黎 世

1881年12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我于今天下午三点五十分收到了您和伯恩施坦的电报，现高兴地通知您，马克思的健康现在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可以把他——首先——送到英国的南海岸去了。他在本星期内到那里去；等他又能稍微习惯于户外活动，不用担心旧病复发时，他大概要继续往欧洲南部，并在那里住一些时候。

我未能用电报回答您，因为那样我就得去中央电报局，而彭普斯同她的丈夫[1]以及赛姆·穆尔（他们大家都向您衷心问好）照例在我这里吃饭，再晚一点，如您所知道的，总还有其他人来。明天拍电报就未必有意义了，因为这封信大概会差不多同样快地寄到。

① 派尔希·罗舍。——编者注

关于波兰人，日内写信[229]；最近这里事情极其杂乱。

《平等报》又重新出版了。第1号里面，几乎所有的文章开头都写得很好，但结尾都令人大失所望。[234]第2号我还没有看到。

衷心问候伯恩施坦。

您的　弗·恩格斯

49

恩格斯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　　牙

1881年12月29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我高兴地通知您，关于卡尔·马克思得了绝症的消息，纯属谎言和捏造。他的病（支气管炎和胸膜炎）现在已经好了，他根据医生们的建议今天到文特诺尔（在威特岛上）去了；医生们希望，那里温暖的气候和干燥的空气会很快使他完全恢复健康。您的信我一定转寄给他。

您的顺从的仆人　弗·恩格斯

50

恩格斯致列甫·尼古拉也维奇·加特曼[①]

伦　　敦

[草稿]

[1881年12月底于伦敦]

我这里有一封从美国寄给你的信，但是嘱咐我把这封信只交给你本人。你能来取信吗？

你的

① 这封信没有署名。——编者注

1882年

51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伦　　敦

1882年1月4日于文特诺尔
圣博尼费斯花园1号

亲爱的小劳拉：

今天是文特诺尔第一个还不错的晴天。据说，在我们来到[18]以前天气非常好。从那以后，每天刮大风，彻夜狂风暴雨；每天早晨象在伦敦一样，总是乌云密布；气温比伦敦低得多，而且最令人厌烦的是时常下雨。（当然，空气比伦敦“清洁”。）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我的咳嗽，实际上是支气管卡他，与其说是减轻了，不如说是加重了。尽管这样，还是有进步，因为我不服鸦片剂等等夜里能自然地睡一段时间了。不过总的状况还没有达到可以进行工作的地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逗留的第一个星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似乎在开始好转。如果天气更暖和一些，对于象我这样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休养地。

我的同伴[①]（这只限我们之间谈谈）几乎什么也吃不下；神经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性抽搐使她很痛苦；要是不去购买必需品或稍微散散步，她就整天读书写字；她很沉默寡言，事实上，她同我一起呆在这里似乎只是出于义务感，就象一个把自己作为牺牲品的蒙难者似的。

没有从燕妮[①]那里得到关于圣诞节礼物的新消息吗？这事使我不安。

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在这里，我直到现在遇到的只是消极的东西，因此不能告诉你任何积极的东西，只能告诉你一个很大的发现：在这里代表地方文坛的就有三家报纸，这里甚至有艺术学校和科学研究所，科学研究所在下星期一晚上要举行关于印度的种姓和“手工业”的大型讲演。

我今天收到了莱茵哈特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最诚挚地、怀着最深厚的同情谈到我们的巨大的不幸[②]。德国资产阶级报纸迫不及待地宣布，有的说我死了，有的说我在最近的将来必然要死亡，这使我很开心；为了它们，“这个与世界失去联系的人”也一定要重新成为有活动能力的人。

威拉德·布朗从纽约给杜西写了一封信；他委托在新奥尔良的一个很亲近而有资格的朋友照料你们家的事情。这位朋友写道，骤然看来这里发生过大骗局，不过首先他应该进行详细的调查，以便掌握确凿的证据。

随信寄去《泰晤士报》上（1881年12月29日的）金融论文的剪报，给保尔[③]做为笑料，这篇文章显然是萨伊先生和路特希尔德先生给登出来的。

---

① 燕妮·龙格。—— 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夫人燕妮逝世。—— 编者注
③ 拉法格。—— 编者注

(问候保尔和海伦[①]。)

再见，我亲爱的孩子。望快来信。

你的　老尼克

5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1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今天匆忙给您写信，为的是解释一下最近一号《平等报》上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奇怪说法。问题在于盖得好心好意邀请全"苏黎世的"著名死敌[②]来主持报纸的德国部，而那个人当然没有忘记通过这种方法来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存在而《灯笼》不存在这点表示自己的不满。为了事业的利益，对此事请切勿介意。如果有任何类似的事情重演，我们就立即加以制止。但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直截了当地立即指责了议员先生们的胆怯，从而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定，而某些人在倍倍尔不在时大概是想回避这个决定的。[235]

不过，《平等报》的人们得到的幸运超过了他们实际上应当获得的。马隆和布鲁斯真丢尽了脸，他们趁若夫兰当候选人的机会，违反兰斯代表大会[236]决议，提出了一个温和的纲领，并且索性隐瞒了在兰斯讨论过的事项中他们感到不痛快的一项 (巴黎出版的

① 德穆特。——编者注
② 卡尔·希尔施。——编者注

《平等报》第4号第7版)。这样，他们就使《平等报》有正当的理由声明，——在当时情况下，从策略上考虑，这是必要的，——追求独裁的真正的“权威主义者”不是盖得等人，而是马隆等人；既然现在斗争已经公开进行，当然我们完全同情盖得和他的朋友。此外，《平等报》同往常一样，在内容方面远远超过《无产者报》。马隆和布鲁斯又在象真正的巴枯宁主义者那样重新活动起来：他们指责别人有独裁的欲望，而自己却不顾党的决议，想在维护“自治”的幌子下实行统治。

马克思在威特岛，在文特诺尔，但是他来信说[①]，那里的天气非常恶劣，比我们这里还坏。不过，可望天气很快发生变化，不管怎样，旧病复发的危险现在已经几乎排除了。资产阶级报刊迫不及待地散布消息说，他最近必将死亡，这对他是有利的，他说：“现在我更应该长久地活下去，以刺激刺激这群恶狗。”

考茨基还必须再忍耐几天；现在肖莱马在这里，我最多只能研究点自然科学；此外有许多需要东奔西跑的事情要到下星期才能结束。那时，就象达姆斯塔德人肖莱马所说的，如果有时间，我一定给他写信谈谈波兰人问题[②]。

衷心问候考茨基和您。

您的 弗·恩格斯

① 见本卷第27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60—265页。——编者注

53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82年1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艾米尔：

在各种干扰和障碍（其中也包括节日的吃吃喝喝）消除以后，我终于得到了充分的安宁，现在我可以最衷心地向你、小绿蒂[①]、伊丽莎白[②]和她的未婚夫[③]祝贺他们订婚。1842年秋末，我同奥古斯特·埃尔布斯勒一起去曼彻斯特[237]的时候（从那以后，我同他只在巴门见过一、两次面），自然，我连想也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同我的侄女结婚。的确，当时谁都还没有想到这两个青年人。对于这件事可以作出种种适当和不适当的评语，不过我且不作了，因为这本来是每一个人都能很容易地想到的，况且这对青年人正忙于现在和将来的事情，他们根本抽不出时间去管对他们还没有出世的那个时代所做的完全不必要的议论。

不过，我倒希望订婚及其最近的和长远的后果在我们家庭里发生得稍许缓慢一些，当然，在象我们这样人口兴旺的大家庭里，在我们所经历的六十年当中，从起点一开始，这种事就是按平方比增长起来的，反对这种自然规律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我觉得身体总的说来相当好，只是左耳几乎听不见了，而且

---

① 夏绿蒂·恩格斯。——编者注
② 伊丽莎白·恩格斯。——编者注
③ 卡·亚·埃尔布斯勒。——编者注

每年冬天我都伤风；不过我对此早已习惯了。温和的冬天无论如何会帮助你摆脱肺炎的后遗症，或者哪怕使它有所减轻；今天这里虽然下毛毛雨，但又暖和得我上街都不用穿大衣了。

热情问候你们大家、小绿蒂、特别是未婚夫妇。

你的 弗里德里希

能在这里见到艾米尔[①]，我将很高兴。

54

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

科 伦

1882年1月12日于威特岛 [艾特诺尔]
圣博尼费斯花园1号

我亲爱的丹尼尔斯夫人：

就是在我给您写信的那一天，我的女儿[②]在她从伦敦带来的文件中还发现了我的一张比较旧的照片。当时我立即把它装在现随信附上的信封里寄往科伦，但“帝国邮局”把它退还给我了。

劳驾请通知我您的准确地址。然后我再把这个罪证寄给您。

致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① 艾米尔·恩格斯，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侄子。—— 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 编者注

55
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82年1月23日于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朋友：

随信附上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的几句话[①]；因为这是供俄文译本用的，所以在修辞上不象用原著文字德文发表所必须的那么考究。

我几天以前才回到伦敦。因为我患了胸膜炎和支气管炎之后，遗留下了慢性支气管卡他，我的医生[②]希望把它治好，所以让我到文特诺尔（在威特岛）去，因为那个地方甚至在冬天也常常是暖和的。不过，这一次我在文特诺尔逗留的三个星期中，那里的天气潮湿而寒冷，天色阴沉，雾气弥漫，而在同一个时间里，伦敦却几乎是夏天的天气，可是这种天气在我回到伦敦时已结束了。

现在，他们想把我送到南方的某个地方去，也许是到阿尔及尔。无法进行选择，因为意大利我不能去（米兰有一个人曾被捕，因为他的姓同我的相似）；我甚至不能从这里乘轮船经过直布罗陀，因为我没有护照，而那里甚至英国人也要看护照。

如果这种该死的“英国”病不是如此影响脑子的话，不管医生和我的亲友们多么坚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干这种浪费大

---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编者注

② 唐金。——编者注

量时间的事。此外，如果旧病复发，即使在复发之后我能恢复健康，那也要耗费更多的时间。虽然如此，我首先还是要在这里试着干点事。

寄给您一期《现代思想》，其中载有关于我的一篇文章[238]。作者所引用的传记资料是完全不真实的，这点不必向您多说。您的通信者，我的女儿爱琳娜向您问好，她已在寄给您的那一本上修改了英文译错了的摘自《资本论》的引文。但是，不管巴克斯先生译得多么糟糕，—— 我听说他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人—— 毫无疑义，他是第一个对现代社会主义真正感兴趣的英国评论家。他那如此真诚的语言和充满信心的语调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有个约翰·雷伊，—— 我觉得他好象是某英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师，—— 几个月以前在《现代评论》上就同样的题目发表过一篇文章[233]，这篇文章很肤浅（他虽然故作姿态，引用了我的一系列显然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著作），但却充满了真正的不列颠人由于他们特有的愚蠢而渗透全身的那种傲慢。他竟然宽宏大量地推断，我—— 在几乎四十年当中—— 不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而是按照信念用错误的理论把工人阶级引入了歧途！一般说来，这里的人们开始力求对社会主义、虚无主义等等有所了解。一方面有爱尔兰和美国，另一方面有农场主和大地主之间、农业工人和农场主之间、资本主义和大地主所有制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在产业工人阶级中有某些活跃的迹象，例如，不久以前下院补选时，有些地方的工人以鄙视态度否决了由公认的工联首领们提出的、由“人民的威廉”即格莱斯顿先生公开推荐的工人的官方候选人（特别是否决了国际的叛徒卑鄙的豪威耳[239]）；在伦敦示威性地建立了激进俱乐部，这些俱乐部主要由工人、英国人和爱尔兰人混合组

成，它们坚决地反对“伟大的自由党”、官方的工联主义、“人民的威廉”等等，——所有这一切使不列颠的庸夫俗子恰好在目前产生了获得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知识的愿望。遗憾的是，评论、杂志、报纸等等利用这种“需求”，仅仅是为了向读者“提供”那些卖身投靠、不学无术、阿谀奉承的每行得一便士（即使是他们每行得到一先令）的下流文人所写的乌七八糟的东西。

这里在出版名为《激进报》的“周报”，该报充满善良的愿望，在使用语言方面是大胆的（这种大胆就是放肆，而不是有力量），并企图戳穿不列颠报刊编造的谎言，尽管如此，成效不大。该报缺乏的，就是精明的编辑。几个月以前，他们曾书面和我接洽。当时，我同我亲爱的妻子①一起呆在伊斯特勃恩[1]，后来在巴黎[2]等地，所以直到现在他们还未能同我商谈。其实我认为这没有什么用处。我越读他们的报纸，就越是深信该报是不可救药的。

我的女儿②提醒我，早就该结束这封信了，因为还有几分钟邮局就要发寄邮件了。

祝好。

卡尔·马克思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56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1月25、31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今天才着手答复您12日的来信。马克思同他最小的女儿[①]已从威特岛回来了，两人都觉得身体好多了。马克思很结实，昨天同我毫不停歇地散步了整整两个小时。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工作，另外，在吃午饭的时候（即在下午五点钟）拉法格夫妇经常来，而且有好的比尔森啤酒，所以我白天的时间大部分都白白地过去了，而从三年前我的左眼受了损害（患慢性结膜炎）时起，我就避免在灯光下写东西。

既然现在我恰好在马克思这里，就请您以他的名义衷心感谢赫希柏格提出的恳切建议；但马克思未必能采用它；关于他到南方去的问题，唯一能肯定的是，他不会到里符耶腊去，而且根本不会到意大利去，这完全是由于警察当局的缘故。对于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首要条件是避免警察找麻烦，当然，除俾斯麦帝国以外，意大利在这方面给我们的保障是最差的。

关于德国“领袖”中的情况的报道，使我们很感兴趣。我从来不讳言：在我看来，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特别是在党由于报刊和宣传而变成了为这些领袖提供黄油的奶牛，而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俾斯麦和资产阶级却突然宰了这头奶牛[240]之后，情况就更是这样了。一千人因此一下子被剥夺了生存条件，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直接处于革命者的状况即没有被放逐到国外去，这是一种不幸。否则，许多现在垂头丧气的人都会转到莫斯特的阵营里去，或者无论如何会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过于温和了。这些人大部分都留在德国，而且必须这样做；他们大部分都处于相当反动的环境中，在社会上备受排斥，为了自己的生活而依靠庸人，因而大多数人自己也被庸俗习气所侵蚀。他们的一切希望很快都集中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上面来了。在庸俗习气的影响下，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确实荒唐的幻想：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民事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闭关自守，在同警察和官僚进行斗争时总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这一切都把人弄得筋疲力竭，而不是激发人起来反抗；这样，在这个“大幼儿园”[241]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但是，无论这种用“客观的”过分聪明来掩盖自己缺乏判断力和抵抗力的倾向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产生，我们还是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这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在德国，只有他们是生活在比较现代的条件下，他们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不幸都是资本的压迫所造成的，而德国的其他一切斗争，无论是社会斗

争或政治斗争，都是琐碎的和微不足道的，而且是围绕着一些在别的地方早已解决了的琐碎的事情打转；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争。因此，您能在真正的、没有变成“领袖”的工人中间给自己找到的通讯员愈多，您就愈有可能对抗领袖的号叫。

这一次各种稀奇古怪的人被选入帝国国会，这是必然的。尤其遗憾的是，倍倍尔没有当选[222]。只有他具有清醒的头脑、政治的远见和充沛的精力，不致容许蠢事发生。

有我们的议员郑重参加辩论的速记记录[242]，您能否在用过以后寄给我们用一两个星期？记录由我负责归还。报纸的报道是完全不能信赖的，对此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实，我们无法使任何一个议员，其中包括李卜克内西，把应受谴责的发言寄给我们。

1月31日

这封信不得已又中断了。顺便说说，正逃往美国的小赫普纳曾经到过这里，他囊空如洗，精神空虚。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微不足道的人，他写了一本用心善良的小册子论述法庭判决词的强制执行、票据法、犹太人问题以及邮政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是枯燥而又枯燥的东西；他十年以前原有的犹太人的机智[243]都见鬼去了；我几乎要劝他去受洗礼呢！不过，由于他的缘故，我便有机会了解新的帝国司法法规。这是一些极端乌七八糟的东西。普鲁士邦法的所有的全部肮脏东西同拿破仑法典[244]的一切卑鄙货色拼凑在一起，但却没有拿破仑法典的优点。法官拥有在一切方面自由决定之权，除了纪律条例之外，他们不受任何约束，所以在政治事务中他们的决定当然将取决于而且现在就是取决于他们的

“自由裁断”。这样一来，在德国普遍存在的那种环境下，法官必然会成为行政当局的官吏和警察意志的传达者。此外，有人讲（这句俏皮话大概是文特霍尔斯特讲的），莱昂哈特在临死的时候说过：“现在我对普鲁士人实行了报复，我给他们制订了一个使他们必然毁灭的诉讼程序。”

毕尔克利的那种有息的和应起货币作用的抵押证券，比老年黑格尔分子波兰人采什科夫斯基的糊涂透顶的方案还要陈旧得多。[245]这类想要造福世界的计划，早在成立英格兰银行时期就编造过。因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还根本没有谈信贷（简单的债务关系除外），所以在那里对信用货币最多只能从它们的最简单的形式（价值符号等）以及从它们最附属的货币职能的观点来加以研究，而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去研究有息的信用货币。因此，毕尔克利对施拉姆说：《资本论》中所有这些地方都没有接触到我的特殊纸币，这点他说得对，而施拉姆援引《资本论》证明说，毕尔克利对货币的性质和职能一窍不通[27]，这点他说得也对。不过这还没直接揭露毕尔克利关于货币的特殊方案的全部荒谬性；为此，除了一般地证明这种“货币”不能实现根本的货币职能之外，还要求对这类证券所真正能够实现的职能进行专门的研究。要知道只要毕尔克利一说：“我同马克思有什么关系？我是追随采什科夫斯基的”，则施拉姆反对他的全部论据一下子就不能成立了。——幸好《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干预整个这件事情。所有的这种鼓动大概会自行沉寂下去。

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关于这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讲了，在《新莱茵报评论》上也根据到1848年为止的资料指出过，而除此之外，还指出过，繁荣的恢复会破坏

革命，会为反动派的胜利创造条件。[246]在进行详细分析的时候，必须注意中间危机，它们有些是比较带地方性的、而有些是比较带特殊性的；这种局限于纯粹证券投机事业内的中间危机，现在我们正在经历；1847年以前，这些危机是有规则的中间环节，所以在我的《工人阶级状况》①中周期还是确定为五年。

在法国，双方都犯了严重错误，但最后是马隆和布鲁斯迫不及待地把事情弄到危机的程度并把《平等报》赶出去（联合会联盟[247]没有任何权力这样做），他们这样胡作非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象马隆和布鲁斯这样一些老奸巨猾的阴谋家，竟然干出这样愚蠢的事来，如果不是他们再也不能等待的话，那是无法理解的。显然，《无产者报》已奄奄一息；如果该报停刊，他们就没有报纸了，而对手却有两家报纸②。因此，当他们手中还有一家报纸传播他们的决定的时候，必须把问题解决。现在他们为了反对盖得和拉法格等人而广泛进行的种种卑鄙勾当和彻头彻尾的捏造，特别是若夫兰的那篇并不是由他本人而是由布鲁斯和马隆写的论战文章[33]，——这一切都纯粹是旧巴枯宁同盟[30]的作风，都唤起我们旧的回忆。《社会民主党人报》作得很对，在情况还不大清楚以前，绝不干预；我想，弄清情况并不需要很多时间。

我原来还想就波兰人问题写封信给考茨基，不过今天无法做到了。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①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② 《平等报》和《公民报》。——编者注

57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 黎 世

1882年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我终于着手答复您11月8日的来信了。

1848年革命的实际任务之一（而一次革命的实际的、非幻想的任务总是可以通过这一革命而得到解决的），是恢复中欧那些被压迫、被分割的民族，因为一般说来当时它们是有生命力的，特别是已经成熟得可以独立了。对于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来说，这一任务由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波拿巴、卡富尔、俾斯麦根据当时的关系予以解决了。剩下的是爱尔兰和波兰。这里可以撇开爱尔兰不谈，它只是非常间接地影响大陆的事务。而波兰地处大陆中部，使波兰保留分割状态的，正是一再把神圣同盟[248]联结起来的那种联系，所以波兰使我们很感兴趣。

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1859年以前，在意大利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甚至当时算是最有力的因素的共和主义者，也并不很多。共和主义者到1861年以后才多起来，以后，他们的最优秀的力量投入了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拉萨尔在幸运地被枪弹击中的时候，已经准备承认事业失败并准备放弃事业了。只是在1866年大普鲁士统一小德意志的问题实际解决了以后[249]，拉萨尔派也好，所谓爱森纳赫派[250]也好，才有了意义；只

是从1870年波拿巴进行干涉的渴望彻底破灭以后，事业才具有很大的规模。假如在我们这里还保留着旧的联邦议会[251]，那我们的党会怎么样啊！匈牙利的情况也一样。只是从1860年起它才被卷入现代的运动：上层是欺诈，下层是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1830—1848年，贫乏的共和的国际主义寄希望于法国，认为它负有解放欧洲的使命，其后果是法国的沙文主义日益加强，以致法国解放世界的使命，以及与此相联的领导运动的长子权利，直到现在还在步步妨碍着我们（在布朗基主义者身上表现为讽刺的形式，而在譬如马隆及其同伙身上也表现得很强烈）。而在国际[①]里，法国人也把这个观点当做天经地义的东西来坚持。只有事变才能说服（而且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说服）他们——以及许多别的人，使他们相信，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甚至平等者中间居首位者也只有在直接行动的条件下才是需要的。只要波兰还被分割，还受压迫，那末不论是国内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还是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同除流亡者以外的任何波兰人的真正的国际交往的发展，都不可能。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它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②]那些不把解放国家提到自己纲领的首要地位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我比之为不愿意要求首先废除反社会党人法[109]，实行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德国社会主义者。要有斗争的可能，

① 指第一国际。——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手稿中删去了由此到本段末的几句话。——编者注

首先需要有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关于在最近一次革命之前波兰是否能恢复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根本无意阻止波兰人去努力争取为自己进一步发展所极其必需的条件,或者要他们相信,从国际观点来看,民族独立是很次要的事情,而事实上则相反,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此外,在1873年德国同俄国差一点打起仗来[252],所以当时波兰完全可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到恢复,成为以后的真正的波兰的萌芽。如果俄国的先生们不在最近停止自己的泛斯拉夫主义阴谋和在黑塞哥维那的挑唆[253],他们就会招致一场他们自己、奥地利和俾斯麦都控制不了的战争。黑塞哥维那的事态严重,只有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政党和沙皇感到有兴趣;波斯尼亚匪帮则同现在在那里活动的愚蠢的奥地利大臣和官僚一样,并不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因此,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甚至不经过起义,而仅仅由于欧洲的冲突就恢复独立的小波兰,正如资产阶级所发明的普鲁士小德意志的建立并不靠这个资产阶级所幻想的革命道路或议会道路,而是靠战争一样。

因此,我坚持这样的意见:欧洲有两个民族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在成为国际的民族以前先成为国家的民族:这就是爱尔兰人和波兰人。他们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波兰人在一切危急关头懂得了这一点,并且在革命战争的一切战场上证明了这一点。只要使他们失去恢复波兰的期望,或者使他们深信一个新波兰不久就会从天上掉下来给他们,他们就会对欧洲革命失去任何兴趣。

我们尤其没有丝毫理由在波兰人不可避免地渴望独立的时候去阻挡他们。第一,他们在1863年发明和运用了俄国人现在很有

成效地在仿效的斗争方法（《柏林和彼得堡》附件二）[254]；第二，在巴黎公社中，他们是唯一可靠而有才干的统帅[255]。

然而，反对波兰人的民族意向的是那些人呢？第一，是欧洲的资产者，波兰人从1846年起义[256]以来，并且由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对他们失去了任何信任；第二，是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和受他们影响的人，例如以赫尔岑的眼光来观察事物的蒲鲁东。要知道，在俄国人中间，甚至在他们的优秀人物中间，现在已摆脱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和回忆的人寥寥无几；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使命，在他们看来是毫无疑问的，正象法国的天生的革命倡导权在法国人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一样。其实，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这种骗局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的，但目前还能给我们造成不少不愉快的事情。现在正在准备着一场泛斯拉夫主义的战争，作为拯救俄国沙皇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的最后一线希望；战争会不会发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发生，只有一点是无疑的：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本身出色地进行着的向革命方向的发展，将完全被破坏，并且被推到现在还很难预言的其他道路上去。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因此失去三年到十年，那时情况很可能是：在德国，可能也在俄国，宪制的“新纪元”[257]的到来将有一个短时间的延期；在德国领导下实现小波兰；对法国进行报复战争；各民族互相进行新的挑拨离间；最后，产生新的神圣同盟。所以，泛斯拉夫主义虽然已经快进坟墓了，或者正是因为这样，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甚地成为我们的死敌。卡特柯夫们、阿克萨柯夫们、伊格纳切夫们及其同伙都知道，只要沙皇制度一被推翻，俄国人民一登上舞台，他们的

统治就永远结束了。因此，在国库空虚而又没有一个银行家肯借给俄国政府一文钱的时候，就产生了进行战争的这种热望。

一切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恨死了波兰人，因为他们是唯一的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斯拉夫人，即神圣的斯拉夫事业的叛徒，而这些人是必须用暴力包括在大斯拉夫沙皇帝国之内的，帝国未来的首都将是沙皇格勒，即君士坦丁堡。

您可能要问我，难道我对小的斯拉夫民族和被插进斯拉夫民族中去的三个楔子——德意志人、马扎尔人和土耳其人——分割得支离破碎的那些民族不抱任何同情吗？的确是少极了。捷克斯洛伐克人呼救道："上帝呵，世界上竟没有人公正地对待斯拉夫人〈原文如此〉！"[①]，彼得堡予以响应，于是捷克的整个民族运动都盼望沙皇"公正地对待"他们。其他的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加里西亚人，卢西人（至少是一部分）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能维护这些目的。只有在沙皇制度崩溃以后，这些小民族的民族意向同想取得世界霸权的泛斯拉夫主义倾向脱离了联系时，我们才能给予他们行动自由，而且我深信，对于多数奥地利—匈牙利的斯拉夫人来说，只要有六个月的独立，他们就会央求接受他们回去。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这些小民族拥有他们现在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硬说自己拥有的那种权力，即阻止修筑通君士坦丁堡的欧洲铁路网的权力。

至于在瑞士的波兰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这是流亡者的争论[229]，很少有什么意义，而对于流亡的人来说意义最小，他们三年以后就要庆祝自己的一百周年纪念日，而且在全体流亡者想要进行什

① 扬·科勒《光荣的女儿》，第三篇《多瑙河》。——编者注

么活动，或者，哪怕是制定什么计划的时候，他们那里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方案，并用一种新的所谓理论代替另一种理论。我们之所以不赞成《平等》杂志的先生们的观点，其原因就是上面讲的那一切；我们在为庆祝1830年11月29日的五十周年而写的、在日内瓦的大会上宣读过的信[①]中，把这一点通知了他们。您可以在报告（《报告文集》，《平等》杂志丛书第一辑，1881年日内瓦波兰文版第30页起）中找到这封信。日内瓦的俄国人的一些激进而响亮的词句，显然给《平等》杂志的先生们留下了印象，现在他们想表明，对民族沙文主义的指责与他们无关。这种错误想法之所以产生，仅仅是由于一些地方性的和暂时的原因，它是会消失的，不致于对波兰本身有特别的影响，所以不值得花工夫来详细地加以驳斥。

波兰人将通过什么方式同旧波兰的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以及同德国人达成关于边界的协议，这个问题暂时并不使我们感到兴趣。

然而，甚至在所谓“被压迫”国家内工人也很少受教授和资产者的泛斯拉夫主义欲望的毒害，这一点已由波希米亚[②]的德国工人和捷克工人的出色的团结所证明。

就此搁笔。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编者注

② 捷克。——编者注

58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2年2月10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们根本不知道你病得这样厉害，我们只听说你面部有丹毒性炎症，这种病大都是很容易好的。假使我知道真实情况的话，尽管当时我自己手头很紧，而各方面又都纷纷要钱，那我也会马上给你寄一点现款去。不过，现在也还不晚，所以我给你邮汇了四英镑，即一百法郎八十生丁，大概你已经接到汇款通知单了；由于在这里手续上出了差错，我在今天以前未能把这件事情通知你。

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下面这件事可以认为几乎是一种幸运：马克思在他妻子[1]生前的最后时日里，被自己的疾病折磨得很厉害，以致他不可能更多地去考虑即将到来的、而且果真临到了他头上的不幸。虽然半年多以来我们就已经非常明确地知道情况的严重程度，但这件事情本身仍然不能不是一个残酷的打击。昨天马克思到法国南部去了[42]；他从那里要往何处去——大概只有到巴黎时才会最后确定。无论如何现在不会去意大利，在病体初愈的时候，就连警察找麻烦的可能性，也应加以避免。

我们已经慎重考虑过你的建议[258]，我们认为实行这个建议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但是，它是很快就会到来的。首先，一个新的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经过正式改组的国际，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只能引起新的迫害，最后只能是二者择一：或者是放弃这一事业，或者是使这个组织成为秘密的。后一种做法是不幸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阴谋和暴动的欲望，同样不可避免地会让密探混进来。甚至在法国，也完全有可能重新利用那个还根本没有废除的反对国际的法律[259]。

其次，在目前《平等报》和《无产者报》争吵不休的情况下，对法国人根本不能有所指望，可是必须表明自己支持哪一方，但这样做也有它的坏处。至于我们自己，我们是站在《平等报》方面的，但是我们仍然要避免现在就公开出面支持这些人，因为，尽管我们明确地向他们提出警告，他们还是一再犯策略上的错误。

第三，同英国人一起办事，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困难。在五个月当中，我一直力图通过《劳动旗帜报》（我为它写过社论[10]）从论述往日的宪章运动开始来传播我们的思想，看看这样是否能得到一些反应。但毫无结果，因为那位编辑①，一个好心的但是很软弱的人，最后对我在该报所写的大陆上的异端邪说也害怕起来了，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打算②。

所以，只剩下这样一个国际，这个国际，除比利时以外，仅仅限于流亡者，因为除了日内瓦及其近郊，连瑞士人也不能指望，——请看一看《工人呼声》和毕尔克利。但是，花费力气去建立一个仅仅由流亡者组成的协会，未必是值得的。因为同荷兰人、葡萄牙人、丹麦人共事也是得不到什么成果的，而同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打交道越少越好。

---

① 希普顿。——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00—201页。——编者注

但是另一方面，国际实际上是继续存在着的。各国革命工人之间的联系，就其能够实现而言，也还是保持着的。每一个社会主义的报刊都是一个国际的中心；从日内瓦、苏黎世、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米兰向四面八方伸展出许多线，互相交叉，而我实在看不出，在目前，让这样多的小中心聚结在一个大的主要中心的周围会给运动带来什么新的力量——恐怕这只能增加摩擦。但是，正因为如此，当需要把这些力量集合起来的时机已经到来的时候，这是可以立即实现的，并不需要长期的准备。每一个国家的先进战士的名字在其他一切国家中都是人所共知的，任何一个由大家签署并为大家拥护的公开行动都会发生巨大的影响，——这和大多是人们不知道的旧总委员会[1]委员们的名字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在这种行动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之前，即当欧洲的事变会促使它诞生之前，应当暂不采取这种行动。否则就会损害它将来的效果，而且这只不过是一种徒劳无益之举。这样的事变正在俄国酝酿着，在那里，革命的先锋队就要出击了。照我们看来，应当等待这一事变以及在德国必然产生的反应，——到那时，采取伟大的行动和建立一个正式的真正的国际的时机就到来了，不过到那时，它再也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了。因此，我们坚决主张，这样一种优越的斗争手段，绝不应当在还比较安静的时期，即革命的前夜就使用它，损害它，从而削弱它的作用。

我相信，如果你再次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同意我们的意见。现在，我们俩都祝你早日痊愈，并且希望很快听到你又完全恢复健康的消息。

永远是你的　老弗·恩·

① 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编者注

59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①]

伦　　敦

1882年2月18日于　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非常遗憾，今天午饭后没有碰到您；不过我希望，假使您今天晚上能收到这张明信片的话，可否劳驾明天，即星期天下午七、八点之间到我这里来一下。您可以在我这里见到一些朋友。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和您见面。

您的　弗·恩格斯

[恩格斯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西中央区托登楠大院路阿尔弗勒德街13号彼·拉甫罗夫先生

60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2月22、25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立刻给您回信：(1) 因为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问题变得越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来越尖锐了，(2) 因为现在，在马克思走了42之后，我又要真正坐下来进行工作，今后再也没有时间来作如此详细的阐述了。

速记记录[242]今天寄还。十分感谢。其中大部分都有点平淡无力，不过，既然没有十足的无耻言论和背离原则之处，我就已经感到满意了。今后您如能随时寄速记记录来，我必将感激不尽。过去在萨克森邦议会中所犯的重大错误[180]已经得到纠正，这使我非常高兴。我想，《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于自己的行动[235]所取得的成果可能十分满意。签署声明对于布洛斯来说准是一剂难咽的苦药。[260]我非常高兴的是，尽管有警察和其他方面的阻挠，订户增加到了四千以上，而且报纸能在德国正常传播。对于一种被查禁的德国报纸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1848年以前出版的种种报纸，运进国内要容易得多，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和书商支持它们，不过报费总是收不回去。而这一次工人付款，这也证明，他们多么守纪律，他们和运动多么休戚与共。当事态发展到紧要关头的时候，我丝毫也不为我们德国的青年担心。他们定能出色地经受住任何考验。有庸俗习气的不是他们，而只是那些领袖先生们，后者一开始就不是率领群众，而仅仅是在群众的推动下才向前走。

既然您已经同情“被压迫的”南方的斯拉夫人，所以我的信并没有说服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原先——因为我们大家起初都是从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走过来的——我们从那里学会了这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我还记得，我花了多少时间和作了多少研究之后，才摆脱了这一套，——不过，已经彻底摆脱了。

但是，我要请您别把我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意见强加在我的头

上。奥格斯堡《总汇报》已经使用了多年的一些奥地利的官方论据，同我毫不相干。其中正确的东西，已经过时，而没有过时的东西，又不正确。我决没有丝毫理由抱怨奥地利的离心运动。一旦俄国爆发了革命，也就是说，一旦那里召集了某种代表会议，“对付俄国的堤防”就会变成多余的东西。从那一天起，俄国就会忙于内部事务，泛斯拉夫主义就会彻底垮台，帝国的崩溃就会开始。泛斯拉夫主义只不过是“有教养的阶层”、城市和大学、军队和官吏的人为的产物；农村对它毫无所知，甚至领地贵族也如此窘困，以致于诅咒一切战争。从1815到1859年，奥地利尽管实行胆小而愚蠢的政策，的确曾经是一道对付俄国的堤防。可是现在，在俄国革命的前夜，重新让它充当“堤防”角色，那就意味着延续奥地利的存在，重新为它的存在提供历史的根据，推迟它无法避免的崩溃。这真正是历史的讽刺：奥地利容许斯拉夫人进行统治，就是自己承认，至今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对俄国的战争，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可以结束斯拉夫人在奥地利的统治。

您说，将来一旦各斯拉夫民族（又把波兰人除外）再也没有根据把俄国看作是他们的唯一的解放者的时候，泛斯拉夫主义就完蛋了。这说起来容易，听起来也似乎有道理。但是，第一、泛斯拉夫主义的危险——既然存在这种危险——不在边远地区，而在中心地区，不在巴尔干，而在给沙皇制度提供兵员和金钱的八千万奴隶当中。由此可见，就是应该把杠杆摆到这里，要知道它已经摆好了。难道要用战争再把它搬开吗？

第二、各小斯拉夫民族把沙皇看作是他们唯一的解放者，这种情况怎么会产生，我不打算作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看法是这样，

这就够了；我们无法改变这种看法，而且只要沙皇制度没有推翻，这种看法会一直保持下去；一旦发生战争，这些令人感兴趣的小民族就会站在沙皇制度一边，即站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整个西方的敌人一边。只要情况是这样，我就不可能对它们的直接的、迅速的解放感兴趣，它们同它们的盟友和庇护者沙皇一样，仍将是我们的直接的敌人。

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他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不管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等等多么令人感兴趣，只要他们的解放愿望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那我就同他们毫不相干。亚尔萨斯人也受压迫，将来我们再次丢开他们的时候，我会感到高兴。如果在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夜，他们想要挑起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再次煽动这两国人民去互相残杀，从而把革命推迟下去的话，那我就要说："且慢！欧洲无产阶级可以忍耐多久，你们也可以忍耐多久。当他们得到解放的时候，你们自然也会得到自由，而到那个时候以前，我们不许你们阻挡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去路。"对斯拉夫人来说也是这样。无产阶级的胜利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解放，而不是象沙皇能够给他们的那种虚假的和暂时的解放。因此，到现在为止不仅没有为欧洲和它的发展作任何事情、反而是这种发展的障碍的斯拉夫人，应该具有哪怕是同我们的无产者同样的耐性。为了几个黑塞哥维那人而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夺去比黑塞哥维那的全部人口还要多千倍的生命，依我看，无产阶级的政策不应当是这样的政策。

沙皇怎样去"解放"呢？请去问问乌克兰的农民，叶卡特林娜起先也曾把他们从"波兰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过（借口是宗教），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后来吞并他们。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全部

欺骗实质上是什么呢？就是要侵占君士坦丁堡——仅此而已。只有实行这种侵占才能有力地影响俄国农民的宗教传统，鼓动他们去保卫神圣的沙皇格勒，延长沙皇制度的寿命。只要俄国人一占领君士坦丁堡，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独立和自由就完了：这些兄弟们（bratanki）很快会感觉到，过去甚至在土耳其人统治下他们还要好过得多。这些兄弟们完全是因为幼稚透顶，才相信沙皇关心的是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他本身的利益。

您说，大塞尔维亚也可以成为同奥地利一样的对付俄国的好堤防。我已经讲过，从革命运动已经在俄国强大起来的时候起，我就认为这种“堤防”的理论一文不值。我也说过，我怀着满意的心情期待着奥地利的崩溃。现在我们且来谈谈这些小民族的特质，因为当说到我们的同情心的时候，对这种特质也是应当加以考虑的。

经过两代到四代，在普遍的欧洲革命之后，建立大塞尔维亚无疑是可能的；而目前，在它的成员的现有文化水平的条件下，同样无疑，它是不可能的。

(1) 按宗教信仰来说，塞尔维亚人分为三部分（数字引自沙法里克的《斯拉夫人通信集》，都是1849年的数字）：正教徒二百八十八万人；天主教徒，包括讲塞尔维亚语的所谓克罗地亚人在内，共二百六十六万四千人，不包括克罗地亚人在内，则为一百八十八万四千人；伊斯兰教徒五十五万人。而对这些人来说，现在宗教比民族性还更重要，并且每一种宗教信仰都想取得统治地位。在这里没有取得哪怕使信教自由成为可能的那种文化上的进步以前，建立大塞尔维亚只会导致内战。——请看附上的《旗帜报》。

(2) 国内有三个政治中心：贝尔格莱德、门的内哥罗、阿格

拉姆[①]。不管是克罗地亚人或门的内哥罗人，都不愿意服从贝尔格莱德的统治。相反地，门的内哥罗人和他们的朋友，即克里沃什[②]和黑塞哥维那的一些落后的小民族，都要保卫自己的“独立”，反对贝尔格莱德和任何其他的中央政府，不管它是不是塞尔维亚人的政府，他们都将象对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一样加以反对。这种独立的含义是，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对压迫者的仇恨，就从自己的“被压迫的”塞尔维亚同胞那里盗窃牲口和其他动产，如同他们在一千年以前所做的那样；谁要侵犯他们这种抢劫的权利，谁就是侵犯他们的独立。我可以满有把握地断言：在欧洲中部存在着这样一些落后的小民族，这是时代的错误。即使这些人具有瓦尔特·司各脱所歌颂的苏格兰高地居民——其实他们也是劫夺牲口的大盗——的那些优点，我们最多也只能谴责现代社会所采用的迫害他们的方法。如果我们执政，我们也应当结束这些好汉们积习已深的、象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和施因德汉斯一样进行抢劫的那种自古以来的传统。要是有一个大塞尔维亚政府的话，它也非这么办不可。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建立大塞尔维亚，意味着重新挑起现在黑塞哥维那人正在进行着的那种斗争，即挑起同门的内哥罗、卡塔罗[③]、黑塞哥维那的一切高地居民的内战。

因此，仔细分析一下，建立大塞尔维亚，决不象泛斯拉夫主义者和腊施之流的自由派企图向我们描绘的那样简单和不言而喻。

话又说回来，您要同情这些落后的小民族，尽可听您的便；何况他们本来就够有诗意的了，并且正在创作着完全是古塞尔维亚

---

① 克罗地亚称作：萨格勒布。——编者注
② 塞尔维亚称作：克里沃希埃。——编者注
③ 塞尔维亚称作：科托尔。——编者注

风韵的民歌 (古塞尔维亚的诗歌是很优美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甚至可以把《旗帜报》上的一篇文章寄给您。但是，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沙皇制度的工具，而在政治中是不容许有诗意般的同情的。假使这些好汉们的起义会引起世界大战，从而破坏我们的整个革命形势，那末，为了欧洲无产阶级的利益，应当毫不惋惜地牺牲他们以及他们盗窃牲口的权利。

总之，如果产生一个大塞尔维亚，那它只会是一个扩大了的塞尔维亚公国。塞尔维亚公国干了什么事情呢？它仿效奥地利的榜样，建立了一种由在西方——大部分是在维也纳——受过教育的贝尔格莱德人和出生于其他城市的人组成的开明的官僚制度；这些人对农民的公共所有制关系毫无所知，并且仿效奥地利的榜样，颁布沉重地打击这种关系的法律，从而，农民大批大批地遭受贫穷和剥夺，而他们在土耳其人统治时代却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富裕起来，纳的税也少得多。

保加利亚人在自己的民歌中作了自我描绘，不久前一个法国人把这些民歌编成集子在巴黎出版[①]。这些歌谣很多是写火灾的。房屋着了火，一个年青妇女被烧得奄奄一息，因为她的丈夫不救她却去救黑母马。在另一首歌谣中，一个年青妇女去抢救首饰，却因此而把自己的一个婴儿遗弃在烈火之中。如果例外地有什么崇高勇敢的行动，那总是土耳其人干的。您在世界上什么地方还可以找到这种蠢猪式的人吗？

而且，假使您看一下有关这个地区的一张象样的语言分布图(例如在上述沙法里克的那本书中，或看基佩尔特1867年的奥地

① 奥古斯特·多宗《保加利亚民歌》。——编者注

利和多瑙河下游各国地图)，那末您就会相信：关于解放巴尔干的这些斯拉夫人的事情决不那么简单，除了塞尔维亚地区以外，整个领土都布满了土耳其的移民区，而且同希腊的沿海地区犬牙交错，更不用说萨罗尼加是西班牙的犹太人的城市。的确，一些正直的保加利亚人目前正在迅速地清除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的土耳其人，把他们打死，赶走，烧掉他们的房屋。假如过去土耳其人也这样干，而不是扩大保加利亚人的自治权，不是把他们的税款减得比现在交纳的要少，那末保加利亚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关于战争，我觉得您对待它过于轻率了。如果事态发展到爆发战争，那末俾斯麦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使俄国成为进攻的一方，因为他能等待，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不能等待。假如德国和奥地利要卷入东方的战争，那就只有很不了解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才预见不到马上就会掀起复仇的沙文主义叫嚣，而无疑是怀有和平情绪的多数法国人民在这种叫嚣面前则必然会保持沉默，这就会使得法国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成为进攻的一方，那时将占统治地位的沙文主义很快就会提出对莱茵河左岸的要求。我觉得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德国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结果，爱国沙文主义也会重新在德国完全占上风。这样一来，种种前景总的说来都于我们不利。而如果战争真的爆发，那末，这样一场在1813—1815年以后的第一次欧洲战争的结局，是完全不可预料的，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如果战争爆发，那也没有办法。

现在再说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目前在德国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形势，它正在越来越快地加速革命的到来，不久就必然会把我们党提到首位。我们自己甚至不需要为此作任何事情——只要让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工作就够了。况且，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纪元[257]，

将有一个持自由主义态度的，极其优柔寡断、动摇不定的新皇帝①，他简直是天生的路易十六的角色。我们所缺少的唯一的东西，就是适时的从外面来的推动。而俄国的形势会成为这种推动，在俄国爆发革命，现在只不过是几个月之内的问题了。在俄国，我们的同志简直使沙皇变成了俘虏[261]，使政府陷于混乱，使民族的传统动摇。即使不再遭到新的重大打击，崩溃也一定会在最近时期内到来，这种崩溃将延续若干年，正如1789—1794年间的情形一样；因此，它影响西方，特别是影响德国的时间会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运动将逐步地增长，而与1848年不同，那时到3月20日反动派就又在全欧洲甚嚣尘上了。总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好的革命形势。能够破坏它的只有一件事：斯柯别列夫本人在巴黎说过，只有对外战争能够把俄国从它已经陷入的泥坑中拔出来。这场战争可以医好我们的同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给沙皇制度所造成的一切创伤。这无论如何足以结束沙皇的俘虏般的处境，把全国人民的愤怒转移到社会革命者身上，使他们失去现在他们所得到的自由派的支持，——那时候，所作的一切牺牲就会白费，而不得不在更加不利的环境下一切从头开始；不过类似的把戏未必能够玩两次，并且，您可以相信，在德国，我们的人也要末跟爱国的叫嚣同流合污，要末会招致一场反对自己的狂暴行动，两次刺杀事件[23]后出现的那种狂暴行动同它相比都等同儿戏；那时候，俾斯麦就不会象过去一样以反社会党人法[109]来对付最近的选举，而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手段了。

如果保持和平，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就会狼狈不堪，而必

① 威廉二世。——编者注

然很快就会实行退却。那时候，皇帝[①]充其量也只能再作一次最后的尝试——依靠那些垮了台的、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的老官僚和将军。这种情况延续不了几个月的时间，此后就再也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召集自由派，即召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国民议会，而就我对俄国的了解来看，这就意味着1789年方式的革命。难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发生战争吗？绝对不希望，甚至即使有二百个高贵的强盗式的部落会因此而毁灭。

关于这点已经说够了，现在来谈谈毕尔克利。他的小册子[②]我没看就塞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我尽力在自己这里或者在马克思那里找找。因此现在我不能准确地谈出他所希望的是什么东西。

2月25日

我刚才把马克思的住宅翻遍了，但小册子还是没有找到。按照我们的分工，这类专门性的问题由马克思进行研究，因为他生病，我们未能讨论这件事情。

假设毕尔克利允许每一个苏黎世的土地所有者按照自己的领地得到相应的抵押，而且这种抵押券可以作为货币来流通。那末，这样一来，流通货币的总量就决定于上述地产的总值，而不是决定于足够供流通之用的、数目要小得多的总额。所以，现在问题就很明显：

⑴ 要末抵押券不能变换现金，这样，根据马克思表述的规律[262]它们就要贬值；

⑵ 要末它们可以变换现金，这样，它们的一部分，即对于

①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② 卡·毕尔克利《银行的民主改革》。——编者注

流通来说是多余的一部分，就会回到银行去进行兑换，不再成为货币，并且银行自然要为此投入资本。

然而一种生息的、因而每天都在改变着本身价值的货币代用品，仅仅因为这一点就不适于作流通手段；不仅折合为现款的商品价格需要从头议定，而且这些证券本身的价格也需要从头议定。假使苏黎世人能够把抵押券变换现金，而不赶紧拿到银行去兑换，不照旧只是使用既方便又无息的老货币，那他们就是比我所认为的还要更糟糕的商人了。如果州银行把自己的资本和它所能收集到的一切存款都投入抵押，那就不知道它从何处去获得新的流动资本了。

假使抵押券不能变换现金，那它们很快就会不再成为货币。那时人们就将从外面——幸好世界比苏黎世州稍大一点——获得硬币和可靠的纸币，并且使用它们，因为绝对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这种可怜的抵押券当作货币接受，那时，这种抵押券，正如您正确地说的，只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的不动产押据而已。如果政府一定要把它们当作货币强加给公众，那是它不会有好结果的。

这只是私下说说，请您不要以我的名义去使用上述那些话，因为，再说一遍，小册子我没有看，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关于这个问题的古典经济学文献；而对类似这样的东西是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加以批评的，也没有把握不会遭到反驳。不过，这种东西无论如何是胡说八道。

马克思已于星期一早晨到达阿尔及尔[42]，我和医生们一直劝他到那里去，可是他不太愿意。他在那里有一个熟识的民事法庭法官①，此人曾被波拿巴放逐过，对阿拉伯人的公共所有制关系很

① 费默。——编者注

有研究，他提出要向马克思阐述这个问题。

衷心问候您和考茨基。

您的　弗·恩·

61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82年2月23日于　[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朋友：

《1882年财政改革年鉴》上有下列地址：

迪耳克，温·艾什顿，西南区海德公园门1号，

还有——查理先生，西南区斯隆街76号。

我从您那里回来，在家里发现了唐金医生（就是前些时候给加特曼看过病，也给马克思家看过病的那个人）的一封来信，他信中说：

"几天以前我收到了加特曼的一封信（上面的地址是：培德福德广场亨特利街14号），他在信中问我，他可不可以来看看我。我马上给他写了回信，给他两个日期让他选择，但此后没有得到他的任何音信。

假使我的信遗失了的话，请告诉我，您知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您见到他，劳驾向他转达，他可以在任何一天晚上十一到十二点之间到我这里来（西区北贝克莱街60号）。"

您可否劳驾把上述的信通知加特曼？既然唐金的信没有寄到，我想，大概是门牌号码写错了，对那个号码我也没有把握，因为我也只是从唐金那里知道的。因此，我不知道确切地址，无法直

接同加特曼联系，所以请您作作中介，因为，您说过，他住的地方离您很近。

我给唐金写信说，我希望几天后能告诉他更确切的消息；如果可能的话，请设法在星期日下午告诉我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些情况。

您的 弗·恩格斯

62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

阿尔让台

1882年2月23日 [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孩子：

气候一直很好；我住在阿尔及尔城堡外小山上的一所非常舒适的别墅里。现在我需要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安静；但愿很快恢复健康。

吻所有的孩子们；问候龙格。

深深爱你的 老尼克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法国) 巴黎阿尔让台镇梯也尔林荫路11号沙尔·龙格夫人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63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2年3月16日于 [阿尔及尔]“维多利亚”旅馆 (同过去一样，来信通过费默。)

我亲爱的孩子：

通过费默收到了你的信以后，我派信差到“东方”旅馆去，也在那里查询一下，他给我取来了你2月24日的信。

现在简单地给你谈谈我的健康状况。

由于我咳嗽加重，痰多，失眠等等，我把斯蒂凡医生请来了(他还给我同旅馆中隔壁的旅客看病)，于是从2月26日他第一次给我诊察以后，我一直由他治疗。这是一个非常果断而严格的人。他发现，由于自从我离开巴黎以来一直到现在为止的种种不利因素凑合在一起，我的左侧——因为患胸膜炎而变衰弱——机能不正常。治疗的主要药物是斑蝥膏 (用斑蝥火胶在左背和左胸“文身”的办法来排除液体)，它对我很有效，另一种是“镇静”药，治咳嗽的；最后，还有亚砷酸钠 (无味，象水一样) ——每次饭后服用。只要天气许可，让我继续在早晨进行短时间的散步。

遗憾的是 (要是有良好的天气，厉害的咳嗽也许自然好了)，3月6日开始咯血，而在3月8、9两日大量吐血以后，比较轻微的咯血一直继续到12日，13日咯血才彻底好了。这样，这件不愉快的事拖了一个星期；斯蒂凡医生努力进行了治疗：禁止任何活动 (当然也包括散步)，几乎也完全禁止谈话，规定进行热足浴等

等，此外还开了效力很强的药剂。同时，继续用斑蝥膏、治咳嗽的镇静药等等给我进行治疗；这样一来，咳嗽的确是大大减轻了。天气也开始渐渐在变化，虽然它还不十分好。我们的别墅（“维多利亚”旅馆）座落在小山上，面前就是海湾，两旁是象罗马戏院座位那样一层层高起的别墅；这里空气非常好，甚至不需要在我住的和旁边的其他房间的前面的小走廊上，或者在作为下楼的通道的凉台上散步。医生[①]要在给我的患病部位再作一次检查之后，才准许我散步。应当说，近来我不仅又有了食欲，而且终于又睡得着了。（实际上，从2月16日在巴黎旅馆的那一夜起，到上述的这个时候为止，一直连续不断地失眠。）

总之，结果是这样，正如我已向伦敦写信说过的[②]，由于这一次愚蠢的、考虑不周的旅行，现在我的健康又处于我离开梅特兰公园[③]时的那种状况。不过，我应当说，许多来到这里的人都遭受了，而且现在仍然在遭受着同样的厄运。最近十年来，阿尔及尔从没有过这样糟糕的冬季。在有了威特岛[18]和其他地方的经验以后，当时我自己是犹豫不决的，但恩格斯和唐金彼此互相激发了对非洲的热情，而且他们两人都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情报，都没有考虑到今年的气候异乎寻常。我几次力图用暗示的方法告诉他们，最好还是先去门顿（或尼斯），因为拉甫罗夫从他的俄国朋友们那里得到了非常好的消息，可是我那好心的乐观的老弗雷德[④]——我重复一下，只在我们之间说说，他容易由于爱护人而害了

① 斯蒂凡。——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0—43页。——编者注
③ 伦敦的一条街，马克思住在这里。——编者注
④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人，——对于这类事情却丝毫听不进去。

我应当告诉你，两位女士，这家别墅式的旅馆的两位女主人，对我照顾得十分周到。至于作斑蝥膏的手术，年青的药剂师卡斯特拉兹先生（他从十二月份起就作为病人同他母亲一起住在这里）十分殷勤，他给我“文身”，然后把胀得鼓鼓的水泡挑破，接着把受到了一些刺激的皮肤缠上绷带等等。这一切他都做得极其小心谨慎，他非常客气地自愿给我帮忙。

对于我来说，再没有比阿尔及尔市，特别是它的郊区的夏天和春天更具有魔力的了，假使我身体健康而且我所有的亲人（尤其是几个外孙[①]）都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会感到自己如同在《一千零一夜》中一样。每当我从你那里得到关于可爱的孩子们的消息时，我总是非常地高兴。杜西也给我写信说，她惦记着孩子们，她很想再跟他们在一起。不过至少在一个月之内恐怕我不能离开这里，因为首先我得在斯蒂凡医生的指导下彻底做完一个疗程，实际上，只有到那时才能开始进行真正的空气治疗（当然，那时的天气要稳定下来才行）。

《正义报》（同《公民报》的论战）我没有看过，而且除了《平等报》以外，根本没有见过任何一家巴黎报纸。从你来信中知道杜西机敏地避免了灾祸[263]，我非常高兴。当利沙加勒出版自己的《战斗报》时，当然，你会把它的头几号寄给我。我不相信会搞出什么名堂；不过走着瞧吧。

在我来到这里的头几天（还住在“东方”旅馆的时候），好心的费默使我累极了，我是说，他使我翻山越岭地满城跑，此外过

① 让·龙格、昂利·龙格、埃德加尔·龙格和马赛尔·龙格。——编者注

多的讲话也使我累极了。我让他知道我是一个残废人以后，很快就把这一切结束了。不过他是希望我好；现在他知道，安静、孤单和沉默是我的公民天职。

替我吻所有的孩子们。问候龙格。多多地吻你，亲爱的孩子。

你的 老尼克

64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1882年] 3月20日星期一 [于阿尔及尔]

我亲爱的保尔：

您3月16日的亲切来信我今天（20日）就接到了，可见，它在路上的时间显然比从伦敦来的一般信件要少得多。

首先，我的好样的加斯科尼人，“上穆斯塔法是什么意思？”穆斯塔法是一个人名，如同约翰一样。沿着以色列路走出阿尔及尔市，就能看到前面有一条长的街道。这条街道的一边，在小山的脚下，耸立着一幢幢四面是花园环绕的摩尔式别墅（“维多利亚”旅馆就是其中之一）；另一边——沿着大路——遍地是象阶梯一样层层下降的房屋。所有这些总称为上穆斯塔法；下穆斯塔法是从上穆斯塔法的斜坡起直到海边。两个穆斯塔法构成一个市镇（穆斯塔法），镇长（这个人用了一个不是阿拉伯的，也不是法国的，而是德国的名字）随时用官方海报向居民作各式各样的通知，——可见，制度是很软弱无力的。上穆斯塔法的街上正在不断地修建新的房屋，拆除旧的房屋等等，虽然从事这种工作的工

人都是健壮的人，而且是本地居民，但是他们在做完头三天工作以后就害热病。因此，他们工资的一部分是企业主提供给他们每天服用的奎宁。这种习惯在南美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我亲爱的预言家。您的消息这样灵通，以致在信中说："您一定在贪婪地阅读阿尔及尔出售的一切法国报纸"；其实，连"维多利亚"旅馆的其他旅客从巴黎收到的几种报纸我也不看；我的全部政治读物只限于《小庄园主报》（阿尔及利亚的小报，类似巴黎的《小报》、《小法兰西共和国报》等等）的电讯。这就是一切。

燕妮给我写信说，她把您也提到的龙格的文章寄来，但我一直没有收到。我从伦敦收到的唯一的报纸，就是《平等报》，但它根本就不能叫做报纸。

圣保罗，您这个怪人！您是怎么知道的，或者是谁告诉您说，我要"用碘酊涂擦皮肤"？您会要打断我说，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其中暴露出您的"物质的事实"的方法。根据爪子可以辨认狮子！实际上，我不是象您说的"用碘酊涂擦皮肤"，而是要让人用斑蝥火胶在背上刺画，以便排除液体。第一次，当我看到被这样刺画过的左侧（胸和背）时，我觉得它真象是种上了甜瓜的小菜园。从3月16日我给恩格斯写信的时候起，无论是背上还是胸上（胸上也刺画），都没有一块干燥的地方可以再作这种手术了；这种手术在22日以前不能再作了。

您说："附上一封准会使您发笑的邀请信。"有可能。但是这封"附上的"信还在您自己的手中，您怎能想叫我发笑呢？等以后有机会时，我要向费默先生提及他过去的同志——蒲鲁东主义者拉法格。现在，医生[①]不让我出去，我就趁此不许任何人来经常

① 斯蒂凡。——编者注

访问或进行长时间的交谈。

雨照旧下个不停。气候竟如此反复无常；天气时时变化，经历着各种节气，或者由一个极端突然跳到另一个极端。尽管如此，还是看得出有逐渐好转的倾向，不过需要等待。而与此同时，从我刚离开马赛起到现在为止，尼斯和门顿的天气都一直非常好！但曾经有过一种固定的看法——对此我是没有责任的——这就是非洲的阳光和这里的有奇效的空气！

上星期六，我们把和我们同住在“维多利亚”旅馆的一位名叫阿尔芒·马尼亚德的旅客埋葬在上穆斯塔法；这是一个还很年青的人，是巴黎的医生打发到这里来的。他原在巴黎一家银行做事，在阿尔及尔期间，老板们继续付给他薪金。不过，为了使他的母亲满意，他们打了电报来叫把他的尸体挖出来送回巴黎，——而且这一切费用也由他们支付。这样慷慨的事，甚至在那些掌握着“他人钱财”的人那里也是少见的。

我的睡眠逐渐在恢复；没有得过失眠症的人，是不能体会到彻夜不眠的痛苦终于消除时的这种愉快心情的！

向我亲爱的白鹦鹉[1]和所有其他的人问好。

您的　卡·马克思

① 劳拉·拉法格的绰号，是根据古小说中一个人物——时装裁缝的名字起的。——编者注

65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2年3月27日星期一　[于阿尔及尔]

我亲爱的孩子：

今天（3月27日）收到了你的信。你知道，当我每次得到你的音信的时候，我是多么幸福。我的信没有向你隐瞒过最坏的事情，因此，你也完全可以相信，我说自从我给你写了上一封信[①]以来，我的健康状况不断好转，这完全是实话。失眠（原来这个病最糟糕）好了，食欲恢复了，咳嗽再没有大发作，相反地，已大大减轻。不言而喻，因为斑蝥膏有强烈的作用，每星期只能上一次，所以左侧胸膜（肺组织本身还根本没有伤及）的疗程还需要一些时间。当然，天气极不稳定，时常突然变化，有暴风、酷热、严寒和雨，实际上，好的时刻只是罕见的现象；要有稳定的，与季节相称的，暖和的和“干燥的”天气，那只是梦想。例如，昨天我们还以为决定性的转变来了，——天气非常好，我还去散了散步——但是今天天空晦暗阴沉（带有黑色），大雨倾盆，狂风怒号。这里的人们已经厌倦到了极点，因为很明显，这样的天气从十二月份（包括十二月在内）以来对于阿尔及尔来说就是完全不正常的。而问题就在于，本来应当预先弄清这种情况，而不应碰运气地作这样的旅行。

只在我们之间说说：虽然威特岛[18]的天气不好，可是我的健康

① 见本卷第282—285页。——编者注

状况却大为好转，以致当我回到伦敦的时候，大家都惊讶不已。况且在文特诺尔，我是安心的；而相反地在伦敦，恩格斯的担心（还有多嘴的拉法格也认为，我需要的只是“散步”、新鲜空气等等）实际上弄得我心绪不宁。我感到，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情况了；所以当时我那样着急地一定要离开伦敦！可见，最真实诚挚的爱可以害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更危险的东西呢！

亲爱的孩子，正象我已经告诉过你的[①]，我很走运，我在这里所交往的都是些心地善良的、友好的、朴实的人们（瑞士籍的法国人和真正的法国人；在我的别墅式的旅馆中，既没有德国人，也没有英国人）。莫里斯·卡斯特拉兹先生自告奋勇在斯蒂凡医生的指导下来帮助我；甚至尼姆[②]也不见得更能体贴入微。所以，我的孩子，你不要因为我好象无人照顾而感到苦恼。不论是男人或女人对我的照料都十分周到，另一方面，我享有“病人”的特权——当我想一个人呆着或者不想管周围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沉默不语，不闻不问等等。

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注意法国的、英国的和其他国家的日报，我只阅读电讯。我希望得到的，就是象龙格论罢工那样的文章（拉法格在给我的信中非常赞扬这些文章）。关于马萨尔的蠢事，到现在为止，除了你写信告诉我的以外，我一无所知。

请你写信给希尔施，让他把他在亚当夫人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264]寄给我。我多么盼望有朝一日飞毯能把琼尼送到我这里来。我可爱的孩子要是看到摩尔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土耳其人、黑

① 见本卷第284页。——编者注
②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人——总之，所有这些巴比伦人，以及掺杂有“文明的”法国人等等和迟钝的不列颠人的这个东方世界的服装（大部分是非常优美的），会感到多么惊奇。替我吻我的小哈利，高尚的狼和伟大的帕[①]！

我亲爱的孩子，现在再见吧，并代我问候龙格。

你的　老尼克

暂时还谈不上做什么工作，甚至不能为了再版而校订《资本论》[②]。

66
恩格斯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
伦　　敦

[1882年3月31日左右于伦敦]

阁下：

感谢您给我寄来了小册子[265]。著名的老托姆·斯宾斯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使我很高兴。

我将很高兴地同您个人结识，只要您和我的朋友马克思搞好关系的话，——我看到，您认为目前值得引证马克思的著作了。

致敬意。

弗·恩·

---

① 指马克思的外孙、燕妮·龙格的儿子：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② 指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67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2年4月6、7日 [于阿尔及尔]

我亲爱的孩子：

费默法官刚才给我带来了你3月31日的信；我对你的来信总是感到极为高兴，但是，我亲爱的孩子，你哪有时间写信呢？我经常为你的小家务担忧，因为你得在艾米莉这样糊里糊涂的怪人的帮助下去料理，何况单是你的四个小家伙[①]本身就要占去甚至一个最能干的女仆的全部工作时间。

你答应给我的几号《正义报》，前几天费默已交给我了（上面也有希尔施的作品，这是从亚当夫人的《评论》[②]上转载来的[264]）。龙格论罢工的文章写得很好。顺便说一下，在一个地方他说，拉萨尔想出来的只是词句（而不是发现了李嘉图和杜尔哥等人确定的规律本身）。[266]而实际上他——拉萨尔——是借用了“有文化的”德国人所熟悉的歌德的说法，而歌德则是把索福克勒斯的“永恒不变的规律”[③]改为“永恒的铁的规律”[④]。

费默不得不在我的“房间”里沉默地坐在我的对面看书，等着我把给杜西的信写完（那一天我收到了她的以及恩格斯的来

① 指燕妮·龙格的孩子：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② 指《新评论》。——编者注
③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编者注
④ 歌德《神圣的》。——编者注

信)，交信差送到城里去。

今天我在等着斯蒂凡医生。如果他来的话，我就能够在这封明早将要发出的信中把他检查的结果告诉你。其实，我的健康恢复得还不错，尽管对于一个渴望重新获得活动能力并结束这种残废者的无聊职业的人来说还是缓慢的。但是这种拖延都是由十分异常的阿尔及利亚的坏天气造成的。费默在这里住了十二年，从来不记得有这样的天气。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变化无常的——真正的四月天气，突然由阳光灿烂变为下雨，由酷热变为严寒，晴朗的天空变成阴暗的、几乎是乌黑的天空，干燥的空气变成充满水蒸气的空气；总之，天气绝不是“靠得住的”，或者说远不是这里一般认为是平常的、“正常的”阿尔及利亚的“春季”天气。虽然如此，在风不特别大和不下雨的时候，四月的早晨还是舒适的，因此，我今天、昨天和前天才能享受早晨散步的快乐。这样，我连续三天每个早晨都愉快地散步了一、两个小时。

刚才从象阶梯一样层层高起的小花园（满园红花盛开）传来的喧闹声打断了我。花园有一条通向我们的阳台（它与我们别墅的第一层是连接着的）的林荫道，而我的房间（还有另外的五间）是在二楼，对着阳台顶上的小走廊；阳台和走廊前面是海景，四面是迷人的全景。就这样，喧闹声把我吸引到走廊。如果小琼尼站在我身边，看到下面花园里那个漆黑的真正黑人拉着小提琴跳舞，带着愉快而开朗的笑容敲打着长长的金属响板，用自己的身体做出优美的动作，那他会多么快活地从心眼儿里大笑起来啊。阿尔及利亚的黑人以前多数是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等等的奴隶，但在法国人的统治下得到了自由。

就在他即黑人的后面，有另外一个人，仪表端庄、微带温和

的笑容，在观看这场黑人表演。这是个摩尔人（英文是Moor，德文是Mohr）；顺便说一下，在阿尔及利亚把一小部分离开了沙漠和他们的村社，在城市里和欧洲人住在一起的阿拉伯人称为摩尔人。他们身材高于一般的法国人，他们有椭圆形面孔，鹰勾鼻子，炯炯发光的大眼睛，乌黑的头发和胡须，但他们的皮肤有各种颜色，从近乎白色到深褐色。他们的服装——甚至是穷人的——都漂亮而雅致：穿短裤（或者长衫，不如说是用白色细毛料做的托加）或者带风帽的斗篷；他们用缠头或者一块作裤腰带用的白凡尔纱包着头（在气候不好，天气炎热等等的时候，风帽也作此用），他们平常光着脚，不穿鞋，只是有时穿黄色的或者红色的摩洛哥皮做的鞋子。

甚至最穷的摩尔人，在用斗篷“披身的艺术”方面，在走路或站立时所表现出的自然优雅和高贵气度方面，都胜过欧洲大演员（他们在骑骡子或驴子，偶尔也骑马的时候，一般不象欧洲人那样跨在它们身上，而是把两条腿放在一边，表现出懒散地沉入幻想的样子）。

上面说的在我们花园中站在黑人后面的那个摩尔人开始叫卖“橙子”和“公鸡”（也有母鸡），——这两种商品合在一起卖是令人奇怪的。在这个甚至现在还没有失去其庄严的摩尔人和正在跳舞的得意地微笑着的黑人之间，有一只鸟庄重地走动着，这是一只极为高傲的孔雀（我们这里一个房客的），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蓝脖子和一条非常漂亮的长尾巴。我是多么想听到我的琼尼看到这个三重奏时的响亮笑声啊！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饭后有一部分时间我当然是同费默交谈，他给我带来了你的信，而后回到阿尔及尔去了）。现在下雨；气温

骤然下降，使人感到极不舒服。向杜尔朗医生致良好的祝愿！

1882年4月7日

雨下了一整夜；今天早晨天空多云，但没有雨；空气清爽，尽管水蒸气太多了。我散步了一小时（早晨九至十时），我担心会碰上雨，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下。由于斯蒂凡医生前天没来，昨天也没来，我今天早晨给他写了封信；无论如何今天就把这封信发出，不能等医生检查的结果了。斯蒂凡医生不会在下午五点钟以前来。你看，这是个好迹象，医生开始对我放松些了，——就是说，他不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不严格遵守出诊的时间间隔了。

如果我能回到我外孙们和他们好妈妈的身边，我该多么幸福啊！我根本不愿意在这里呆得比医生认为绝对必需的时间更长些。

多多地吻你。

你的　老尼克

附去一份剪报，这是从恩格斯寄给我的一份美国的德文报纸上剪下来的。这是对最近的“德国奴才诗歌”的有趣的批判。我希望龙格尽力研究一下。

亲爱的孩子，我已经把这封信封上了，可是又不得不拆开它。斯蒂凡医生来得比我预料的要早些。经过新的检查，他断定——我很高兴，我能把这点告诉你，——在这段时间我的左侧恢复得几乎也象右侧那样好了。

68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　　敦

1882年4月10日于　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校样[267]退还给您。如果我不是希望昨天晚上见到您并对您说："基督他复活了吗？"[268]，这件事情我早就做了。

您能不能费心把序言的德文稿给我用几天？《社会民主党人报》要求我们把这个序言寄给它，既然序言已经在《民意》杂志（我们因自己作为它的撰稿人而感到自豪）上发表了，那末这就不会有什么不方便了。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据我看，我们的思想被表达得很好。

69
恩格斯致倍尔托特·施帕尔

伦　　敦

[草稿]

1882年4月12日　[于伦敦]

阁下：

我不认识您，也不认识您说的卡·施米特先生。如果您指的

是无政府主义者卡·施奈特先生，那他定能带您到玫瑰街的俱乐部[269]去，使您得到帮助。鉴于《自由》的撰稿人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270]，我不大愿意资助这个派别的拥护者。何况我还不了解您是属于哪个派别的；众所周知，在托登楠街49号有一个与德国的大党有关系的德意志俱乐部[271]，我相信，这两个俱乐部不致让一个从祖国逃出来的党内同志饿死。

在一个大的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们因在德国受到警察的迫害而大感经济匮乏的情况下，我由于财力所限，无法还去资助敌视社会民主党的那些派别的拥护者。但是如果托登楠街的协会同意给您某种帮助的话，我很乐意出自己的一份。

致深切的敬意。

完全忠实于您的

70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①

霍 布 根

[1882年4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今天通过邮局给你寄去了已经出版的几号《平等报》。以后出版的还会给你寄去。马克思在阿尔及尔，他的胸膜炎复发了，现在差不多完全好了。但今年冬天他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希望很快就能收到你的信。你的儿子②在做什么？

---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② 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恩格斯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美国纽约霍布根弗·阿·左尔格先生

71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伦 敦

1882年4月13—14日星期四 [于阿尔及尔]

我可爱的白鹦鹉：

我由于到现在才给你写信而在责怪自己，但这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从这里写信告诉你。我经常回想起你在伊斯特勃恩[272]，在我生病的燕妮[①]的床边，当你每天来亲切探望，使唠唠叨叨的老尼克感到如此快乐的时候的情景。但是，亲爱的孩子，你要知道：整个上星期和这个星期，费默都在度复活节假。他的住宅在米歇尔街（这样叫上穆斯塔法的一段路），位于耸立着“维多利亚”旅馆的小山的脚下。这个旅馆离费默那里很近很近，不过他得“爬山”，因为往上没有铺设道路。实在说，他在这段时间里如此热心地看望我，以致我想在午饭后写信的美好的打算成了泡影。一般说来，费默先生决非令人讨厌的客人，也还算幽默。在我给他看了几号《公民报》和《平等报》之后，他到我这里来时，

① 指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对盖得的那种一直要继续到用印刷油墨预先把最后一个压迫者资产者斩首为止的“未来的恐怖主义”进行了不少的讥笑。费默不喜欢阿尔及尔；他，他的全家都不适应这里的气候 (热病等等常来拜访)，—— 虽然这一家的全体成员，从他的夫人开始，都是“土著人”。但最主要的还是，法官的薪水只能勉强维持很简朴的生活。在殖民地的主要城市里生活费用一向是很高的。有一点他是赞同的—— 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同时又是中央政权所在地的其他城市，都没有这里这么行动自由：警察缩减到最必需的最少数量，社会中的放荡不羁现象闻所未闻，——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摩尔人的影响。事实上穆斯林居民不承认任何隶属关系：他们认为自己既不是“臣民”，也不是“被管理的人”，除了在政治问题上以外，没有任何权威，—— 这正是欧洲人所不能理解的。阿尔及尔的警察为数不多，而且大多数是土著人。同时，在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放荡不羁的各种民族混合在一起的这种情况下，往往必不可免地发生冲突，并且卡塔卢尼亚人不辜负自己的老名声：在他们的白色或红色的腰带里—— 他们的腰带不是象法国人那样系在衣服底下，而是象摩尔人等一样扎在外衣上—— 就象经常佩戴着“饰针”一样，佩戴着长匕首，这些卡塔卢尼亚的子女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它们来反对意大利人，法国人等等，以及当地人。顺便说说，几天前在奥兰省捕获了一伙制造伪币的人和他们的头目—— 以前的西班牙军官；原来，他们的欧洲代理机关设在卡塔卢尼亚的首都巴塞罗纳！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没有被捕，偷偷地逃到西班牙去了。这个新闻以及其他的类似新闻，我都是从费默那里听来的。法国政府方面向费默提出了两种有利的建议：第一，去新喀里多尼亚，他同时被指派在那里建立新的诉讼程序，薪

俸是一万法郎 (并且连家属一起都免费乘车到那里去，到达那里以后还有公家的免费住宅) 或者，第二，去突尼斯，在那里他也可以得到比这里更高的法院职位，条件也更优惠。已经给了他时间进行选择；他将接受其中的一个建议。

从费默先生自然要转到天气上来，因为他非常爱咒骂天气。从复活节的星期一 (这一天也包括在内) 起，我没有放弃过一次早晨的散步，尽管只是昨天 (12日) 和今天没有出现过变化无常的四月天气。昨天——虽然我们经受了轻微的西洛可风，即几阵疾风——天气基本上是好的；在早晨九点钟 (12日)，背阴地方的气温是19.5°；而在太阳下面是35°虽然我早上已经散了步 (4月12日)，午饭后我又去阿尔及尔观看了几天前驶入它的港湾的俄国装甲舰“彼得大帝号”。

官方气象局预告说4月15—16日 (将有暴风雨) 和4月19、21、25、27、29、30日将有强烈的大气运动；不过四月下半月的天气总的来说将是好的；但是，与此同时恐怕随着五月的到来，——作为对没有真正的阿尔及利亚的春天 (因为它只是昨天才开始的) 的一种补偿——难以忍受的暑热马上就要来了。无论如何，我不愿意做天气实验站的实验对象。最近四个半月以来天气非常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天晓得阿尔及尔会给我们准备下什么。大多数有远见的人 (其中包括著名的“兰克”) 前天就离开了非洲海岸。我只能呆到斯蒂凡医生声称我的左边已经修好为止，至于患胸膜炎留下来的瘢痕就不去管它了，关于这点非常有学问的唐金和休谟医生当然都知道。令人不愉快的是，在这里，咳嗽经常复发，尽管不厉害，但总是使人厌烦。

这封信中断了，这是最愉快的：有人敲门；请进！罗扎利太

太（女仆之一）给我送来了你，亲爱的白鹦鹉和好样的加斯科尼人[①]的信——一封长信，在信纸上，和信封上一样，已经有“国民联合公司”[273]的公章。看来这次事情成功了。这不是卡·希尔施先生所袒护的企业！另一方面，更多地触动我的，当然是我的白鹦鹉要走了。希望这还不是很快就发生的事情。姨母白鹦鹉对小燕妮和她的孩子们[②]来说，将是很难得的，这对我来说也是某种补偿；况且也没有必要成年呆在伦敦；巴黎又这么近。顺便说一下。拉法格是否给彼得堡寄去了文章的续篇[274]（我不知道第一次寄去的东西怎么样了）？非常重要的是不要失掉彼得堡这样的点；它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对于往那里写通讯的人来说也同样如此！

这封信又中断了：时间是午后一时，我已经答应同卡斯特拉兹夫人、她的儿子[③]和我们旅馆的另一位旅客克劳德夫人（来自纽沙特尔州）去参观“哈马公园”或“实验公园”。要到吃饭的时候（晚上六点钟）才回来，而在饭后我从来还没敢写过信。所以，明天才能写完这封信。只是为了给白鹦鹉增加一些有益的知识，我再谈一点：1541年10月23日在皇帝查理五世（或者以西班牙的历史为依据是查理一世）指挥下二万四千名士兵正是在这个“哈马”登陆的[275]；一个星期以后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杰出的残余败军装上了船，这些船是在26日的暴风雨中保存下来的，好不容易被多里亚收集在麦提福附近。这个地点，即麦提福角，位于阿尔及尔港湾终止的地方，在阿尔及尔对面东岸上，我从“维多利亚”旅馆的走廊上用好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它。

---

①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② 燕妮·龙格和马克思的外孙：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③ 卡斯特拉兹医生。——编者注

4月14日星期五

此刻，即午后一时左右，我开始写这封信，是想对上面写的作点补充。昨天白天同12日一样，天气晴朗。12和13日的傍晚(晚八时左右)都很暖和——这是很不寻常的——但同时又凉爽(相对来说)，因此确实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今天早晨暖和得有些"闷热"，但在后两小时风刮得很大，昨天预告的14到15日的"暴风雨"可能要来了。

昨天午后一时我们走下去，到了下穆斯塔法，电车把我们从那里送到"哈马公园"或"实验公园"，这个公园被用来作为公共娱乐的地方(有时还奏军乐)，作为栽培和推广当地植物的苗圃，最后还作为进行植物科学实验的植物园。整个公园占有很大的面积，一部分是山地，另一部分是平原。要想更仔细参观，至少需要一整天，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一个譬如象费默先生的朋友、老傅立叶主义者杜兰多先生这样的内行的人作陪，杜兰多是植物学教授，在"法国登山运动员俱乐部"举办星期天定期游览时，他是该俱乐部一个小组的领导人。(很遗憾，我的健康状况以及斯蒂凡医生的严格禁令，至今还不容许我参加这些游览，虽然我已被邀请过三次了。)

这样，在进入"实验公园"以前，我们喝了咖啡，——当然是在露天里——喝摩尔人的咖啡。摩尔人的咖啡做得非常好，我们坐在长凳上喝。有六个来参观的摩尔人……[1]，坐在粗糙的矮木板台子上面，弯着腰，交叉着双脚在享受着自己的"小咖啡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咖啡壶)带来的愉快，同时在一起玩着纸牌(这是文明对他们的征服)。下述场面使人非常吃惊：这些摩尔人

① 手稿上字迹不清。——编者注

中间有几个穿着很讲究，甚至很豪华，其余的穿一种我不妨暂且叫作“短衫”的衣服，看样子过去是白色毛料的，但现在已经破烂不堪；然而在真正穆斯林的眼睛里，这类事情，幸运或者倒霉，都不会造成穆罕默德的子女之间的差别。他们在社交中绝对平等——是完全自然的；相反地，他们只是在风俗习惯受到破坏的时候，才意识到这种平等；至于谈到对基督徒的仇恨及最后战胜这些异教徒的希望，那末他们的政治家正当地把这种绝对平等感，把这种平等的实际存在（不是在财产或地位上，而是在人格方面）看作是支持这种仇恨并且不放弃这种希望的保证。（然而没有革命运动，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关于“实验公园”的平原部分，我只指出一点：它被非常美丽的三条纵向的大林荫路所切开；在主要入口的对面是梧桐林荫路，其次是“棕榈林荫路”，这条路的尽头是由七十二棵大棕榈树组成的绿洲，一直延续到铁路和海岸，最后是木兰和一种无花果树（ficus roxburghi）林荫路。这三条大的林荫路又被许多其他横着穿过去的林荫路所切断，例如长长的令人惊叹的“竹子林荫路”，“纤维质棕榈”、“龙血树”、“桉树”（塔斯马尼亚的蓝色树胶树）林荫路等等（后几种生长得非常快）。

当然，在欧洲植物园里是不可能有这类林荫路的。

在一个周围全是梧桐树的圆形大广场上，午饭后演奏了军乐，军士，即乐队的指挥穿的是通常的法国制服，相反，乐队（一般士兵）穿的是红色的肥大灯笼裤（东方式样的），白色薄呢鞋系着裤脚口，头上戴着红色非斯卡帽。

在公园的树木里面，我没有提到橘子树、柠檬树、还有扁桃树，橄榄树等等（虽然正是它们也使我闻起来感到很愉快），更没

有提到仙人掌和芦荟，它们 (同野生的橄榄和扁桃一样) 野生在我们住所附近的乱木丛中。

虽然我很欣赏这个公园，但我必须指出，这次参观以及类似参观中令人不愉快的方面，就是无法避免的石灰粉，尽管午饭后，回家以后，夜里，我都感觉很好，然而石灰粉的刺激所引起的咳嗽在某种程度上使我感到伤脑筋。

我今天还在等待斯蒂凡医生，但这封信我不能拖延不发；因此，关于他诊断的情况就要晚些再报告给弗雷德[1]。

最后，象士瓦本的迈尔通常说的那样：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稍微高一点的历史观点上。和我们同时代的游牧的阿拉伯人 (应当说，在许多方面他们都衰落了，但是他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使他们也保留下来许多优良的品质) 记得，以前他们中间产生过一些伟大的哲学家和学者等等，也知道欧洲人因此而嘲笑他们现在的愚昧无知。由此产生了下面这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短小的明哲的阿拉伯寓言：有一个船夫准备好在激流的河水中驾驶小船，上面坐着一个想渡到河对岸去的哲学家。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哲学家：船夫，你懂得历史吗？

船夫：不懂！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生命！

哲学家又问：你研究过数学吗？

船夫：没有！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生命。

哲学家刚刚说完了这句话，风就把小船吹翻了，哲学家和船

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编者注

夫两人都落入水中，于是

船夫喊道：你会游泳吗？

哲学家：不会！

船夫：那你就失去了你的整个生命！

这个寓言会使你对阿拉伯人产生某些好感。

多多地吻你和问候你。

（向大家致良好的祝愿。）

老尼克

7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4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当我从拉甫罗夫那里知道序言[①]已在《民意》杂志上发表时，我就立即要求[②]给我原稿的副本，但原稿在巴黎，放在拉甫罗夫的写字台里。不过他打算写信到那里去要。后来我到马克思那里找草稿，也无结果。最后我向拉甫罗夫要来了俄译文的单印本，以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己动手把它译回德文：我担心这项工作会由随便一个俄国人来做，而事实果然如此。[267]到现在拉甫罗夫才把附上的原稿副本寄给我。其实，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也是有过错的。我曾准备给您寄明信片，但肖莱马和阿道夫·博伊斯特正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95页。——编者注

在我这里作客，同时因为我们很多时间是同拉法格夫人 (她的丈夫[①]在巴黎) 和杜西·马克思在一起，我便把明信片的事给忘了。但为了使您相信我并不是缺乏善意，过些时候我将把手稿寄给您。

您反对了盖泽尔这个可鄙的懦夫[276]，我向您表示敬意。

私下说说：马克思自2月21日起在阿尔及尔，他在路上得了感冒，到那里胸膜炎又复发了，他遇上了极坏的天气，但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他还要在那里呆多久，暂时还不知道。他总是碰上倒霉的天气。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73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4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寄给您《科伦日报》上论“希尔施男爵”[277]的剪报。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报纸认为应当痛斥这种招摇撞骗的人。如果有篇幅，值得全文转载，这会成为一篇精彩的小品文，特别是因为它出自《科伦日报》。如果您不把它全文转载，那就请您用后还给我。《序言》[②]的手稿也请在方便时还给我。

---

①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必须说明：马茂德—奈迪姆—帕沙同马茂德—达马德—帕沙（苏丹[1]的内兄弟）一样，是俄国人出钱在君士坦丁堡收买的大奸细。一个俄国人波利亚科夫也想谋得土耳其的铁路租让权，但没有得到（因为俄国人不能在准备向土耳其开战的同时又去央求土耳其人），此后，俄国人最为关心的当然是，给唯一同他们竞争的、而且又是受到奥地利庇护的奥地利人希尔施造成这样的条件：即让希尔施和他的奥地利都为土耳其所憎恨，而土耳其人仍然没有统一的铁路网。其实，土耳其财政上任何相对的削弱对俄国都是有利的。于是奈迪姆干着自己的营生，希尔施给他钱，因为他把土耳其出卖给希尔施，而俄国也给他钱，因为他完全出卖土耳其。俄国外交是大手大脚的，不象小店主对自己的竞争者那样斤斤计较，因此，如果没有其他出路，它可以把虚假的或暂时的优势让给象奥地利这样的对手，以便利用这种优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衷心问候您和考茨基。

您的　弗·恩·

74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2年4月28日　[于阿尔及尔]

亲爱的孩子：

只说三言两语：我想，只有在海滨居住才能对可怜的哈利有

---

①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编者注

帮助。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应当赶快带他和他的小兄弟们[1]到诺曼底去。你的推测完全象孩子一样，以为我可以事先不同你和我的外孙们见见面 (不管见面的地点是诺曼底、巴黎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就回英国去。

至于谈到我的健康，情况正在继续好转，否则斯蒂凡医生不会允许我离开“非洲”。我想，在里符耶腊的“过渡”阶段只需两周或两周左右就足够了。

亲爱的孩子，向你致良好的祝愿。

老尼克

7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5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您能否再寄给我若干份论早期基督教[2]的单印本或登载该文的那一号报纸？我很想要那篇文章，它对宣传是有用处的；我想把它寄给那些平时看不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人。有三、四份就够了。

附上一篇短评[3]，它对证明美国的资本积聚正在以何等惊人的速度进行，是有意思的。United States Bonds是美国公债券。

---

① 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 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 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论美国资本的积聚》。—— 编者注

N.Y.C. 和 H.R. Stock 是纽约中央铁路—哈德逊河运公司的股票；real estate 是地产。

一美元等于四马克多一点，以整数计，等于四马克或五法郎。

我很高兴地看到，人们到处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一边反对可怜的胆小鬼的抽泣。

达尔文的信—— 一封极为亲切的信—— 当然是写给马克思的。但是，对4月28日在《公民报》上发表的拉法格的文章《达尔文的淘汰说和统治阶级》，你要加小心：他在文章结尾发现了一种什么新的文昌鱼，真笑死人。拉法格在巴黎，我刚给他写了一封信，对他的拉法格氏文昌鱼大大嘲弄了一番。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但愿此地的协会[159]不致使您对民主联盟[199]产生错觉。民主联盟目前没有任何意义。它的头目是一个沽名钓誉的议会候选人，名叫海德门，以前是保守党人；他只有靠爱尔兰人的支持和专门为了达到爱尔兰人的目的才能够召开群众大会，而且他自己在群众大会上只能扮演第三流的角色，否则，爱尔兰人简直会向他吐唾沫。

格莱斯顿大丢其丑；他的爱尔兰政策全部破产了，他不得不放弃对福斯特和爱尔兰总督库伯－坦普尔 (帕麦斯顿是他的继父) 的支持，呼喊“父亲，我犯了罪”：爱尔兰议员①被释放了，高压法[167]不再延长了，决定将农民欠的地租废除一部分，另一部分根

① 帕涅尔、达维特、狄龙、奥凯利。—— 编者注

据合理的分期偿还条件由国家支付。[278]另一方面，托利党人现在已经恍然大悟，他们想挽救还能够挽救的事情：当事态还没有发展到农民夺取土地的时候，最好让农民按照普鲁士方式依靠国家帮助交纳租金，这样，土地所有者总还可以捞到一点东西！爱尔兰人的确迫使行动迟缓的约翰牛有时稍微动一动。这一切都是开枪射击[279]的结果！

76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伦　　敦

1882年5月6日于蒙特卡罗
“俄罗斯”旅馆

我亲爱的白鹦鹉：

我到达蒙特卡罗[47]这儿总共才几个小时。我甚至怀疑能否找到足够的时间来写已经答应给恩格斯写的信（无论如何他晚一天就会收到信）。

现在，我得为各种小事东奔西跑。寄给你一张照片，另一张给弗雷德①；没有一种艺术会使人更难看。

老尼克

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77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2年5月8日于蒙特卡罗
“俄罗斯”旅馆

亲爱的小燕妮：

蒙特卡罗——给你寄出这封短信的地方，是构成“摩纳哥”国家的三位一体的三个（并列的）地方（摩纳哥、康达明和蒙特卡罗）之一。环境非常优美，气候比尼斯甚至比门顿还要好。

当然，我总是碰到滑稽的事——把头两个雨天（一月以来的）带到了这里，好象是雨专门在等待着我从阿尔及尔到来似的。但是，如果不算这一点，我遇到了非常好的天气。

你从我最近一封信[①]中已经知道，我的胸膜炎算是对付过去了；支气管卡他只能逐渐好起来。其实，空气很快会到处变得干燥和温暖（相反地，人们不得不担心缺乏雨水）；太阳的作用将特别厉害，因为它整个儿蒙上了大黑点。一句话，到处很快会出现对我有利的天气。

由于不知道我将在这里呆多久，所以希望立即从巴黎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找到你们。最好是给我这里打电报，因为打一个三、四个字的电报就可以把必要的一切通知我了。

多多地吻孩子们。

你的　老摩尔

① 见本卷第306—307页。——编者注

7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5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利用被打断了的午休时间来给您写信。关于童贞马利亚—伊西达，这是一个小问题，由于篇幅不够我未能涉及。[280]迷信马利亚和迷信所有的圣徒一样，发生在比我所探讨的要晚得多的时期（当时一些诡计多端的神父把信多神教的农民所喜欢的庇护神改造成为圣徒还给他们），最后，这种解释本来还应当从历史上来加以证明，为此就需要对这个问题作专门研究。关于光轮和月华的问题也是这样。不过，迷信伊西达，在罗马帝国时代，这是国教的一部分。

复本位制。主要的是我们应当——特别是在许多“领袖”关于我们党在经济问题方面对于资产阶级的优越性（对这种优越性，这些先生们自己是完全没有份的）胡吹一通之后——避免在经济方面严重地损害自己的威信，不要象这些先生们丝毫不知羞耻地干出的那样，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博得某一部分工人的欢心，取得选举中的胜利或其他某种成就。总之，他们以萨克森正在开采银矿为根据，认为可以采取两本位制的欺骗行为！他们为了多获得几个选民，建议我们党在无疑应当成为党的支柱的这样一个领域内使自己蒙受洗不清的耻辱！

可是我们的著作家先生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同资产阶级著作家一模一样，认为自己有对什么都不学习和对什么都发表议论

的特权。他们给我们胡诌了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就其经济上的无知、新出笼的空想主义和自以为是的态度来说，未必有什么东西能同它们相比，俾斯麦把它们禁止了，这是帮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忙。

关于两本位制问题，现在这里说的不是一般的两本位制，而是金银价值的比例为 $15\frac{1}{2}$：1的这种特殊的两本位制。这一点是必须加以区别的。

两本位制变得愈来愈不可能实行了，因为金银价值的比例过去至少大致是稳定的，只有缓慢的变化，而现在则天天发生很大的波动，即首先朝着下述方向波动：白银的价值由于其开采量大大增加而下降，在北美尤其是这样。黄金储备枯竭，这是白银巨头的捏造。但是，不管白银的价值变化的原因如何，事实还是事实，对此我们首先应当加以注意。白银正在日益丧失其作为价值尺度的能力，而黄金则保持着这种能力。

现在，两种金属的价值比例大约是 $17\frac{1}{2}$：1。白银的占有者却想把原先的比例 $15\frac{1}{2}$：1重新强加给全世界，但这是不可能的，正如不可能把机器纺织的线纱和纺织品长期地到处保持在手工纺织的线纱和纺织品的价格水平上一样。铸造铸币并不决定铸币的价值，而只向获得者保证它的重量和含银量，铸币无论如何不能把银的价值从 $17\frac{1}{2}$磅变为 $15\frac{1}{2}$磅。

这一切在《资本论》关于货币的那一章（第三章，第72—120页）里面[281]，论述得非常明白，非常详尽，所以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关于近来波动问题的材料，请参阅泽特贝尔的《贵金属的生产和比值》(1879年哥达、佩尔特斯版)。泽特贝尔是这方面的头号权威，而且是德国币制改革之父；还在1840年以前他就

鼓吹采用等于$\frac{1}{3}$塔勒的“马克”。

总之，如果按照15$\frac{1}{2}$磅白银=1磅黄金的折算来铸造银币，那末这种银币一定会流回国库去，因为任何人都会设法使之脱手。美国在使用按照旧的含银量铸造的、但只值九十分的银元时就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俾斯麦在他想用强制办法使已经停止流通、已被黄金代替的银塔勒重新流通的时候，也经历过同样的情况。

银行行长戴兴德先生以为借助于两本位制德国可以不用足值的黄金而用次等的白银来偿还外债，这样一来就可避免任何黄金危机；这一手一旦成功，对于国家银行来说当然是极其方便的。不过，这一切的唯一后果，将是戴兴德先生证明自己根本不适合于当银行行长，与其坐在国家银行里，不如坐在学校的板凳[①]上。

假使普鲁士容克能够用17$\frac{1}{2}$：1行市的白银偿还自己的抵押债务或偿付抵押的利息，那他们当然也感到幸运，因为这种抵押的交易原来是用15$\frac{1}{2}$：1行市的白银做成的。而因为这是在国内发生的，所以，债务人对债权人的这种欺诈当然是可以实现的，只要贵族找到人借给他们17$\frac{1}{2}$：1行市的白银，使他们能够按15$\frac{1}{2}$：1的行市去偿还债务。因为贵族本身缺乏还债的资金。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按15$\frac{1}{2}$的行市去借白银，这样一来，对于他们来说就什么变化也没有了。

至于德国的白银生产，那末用德国矿石冶炼与用南美矿石冶炼（在莱茵河）比较，前者所占的地位一年比一年小。1876年，德国白银总产量约为二十八万磅，其中用南美矿石冶炼的有五万八

① 文字游戏：《Schulbank》——“学校的板凳”，《Reichsbank》——“国家银行”。——编者注

千磅，但从那时起，后者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了。非常明显，把白银贬低为辅币，必然会更加降低它的价值；与作货币用的白银相比，作其他用的白银为数很少，由于白银停止作为货币流通而有更多的白银投入市场，作其他用的白银的增长也不会快多少。

用不着去考虑英国会在什么时候实行两本位制。任何一个金本位制的国家现在都不可能重新长期实行两本位制。普遍的两本位制本来就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所有的人现在达成协议，重新按照 $15\frac{1}{2}$：1的行市来定银价，他们还是不可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银的价值只是 $17\frac{1}{2}$：1，绝对没有办法反对这一事实。否则，人们也可以同样成功地做出如下决定：二乘二等于五。

在我们被驱逐的头几年，班贝尔格尔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是一个很正派的热心的人，是不伦瑞克公爵卡尔的秘书。后来我们再没有见到过他。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7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1882年5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早就想给你写信。尤其是因为我不知道马克思是否已经答复了你最近的那封信。他曾经一再答应我要这样做，但你也知道，当一个人生病时，情况会是怎样的。因此，今天我终于给你写这封信。

马克思起先去威特岛[18]，但那里的天气又寒冷又潮湿。后来取

道巴黎赴阿尔及尔。他在旅途中再次得了感冒，在阿尔及尔又碰上寒冷而潮湿的天气以及随后气温的急剧变化。这次感冒又转为胸膜炎（肋膜炎），没有在这里初患时那么来势猛烈，但拖了很长的时间。他现已基本痊愈，并且在非洲的暑热终于到来之前，已跑到蒙特卡罗即摩纳哥公爵[①]的赌场里去了。一当夏天真正来临时，他将离开那里与龙格夫人及其孩子们一道到诺曼底海滨去，在七月初以前未必回得来。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把咳嗽这个老病根彻底除掉，看来他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他在阿尔及尔拍了照，气色又显得很好。

在总的来说取得了如此辉煌成就的选举中偏偏你遭到失败[222]，真是一大不幸。在许多新的和多少有点不可靠的当选人当中，本来就加倍地需要有你。起初看来这是一次令人颇为遗憾的失误，但现在情况似乎有些好转了，因此使我倍觉高兴（马克思也感到同样高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勇敢态度，它敢于挺身出来坚决反对布罗伊埃尔之流的哀号和怯懦，尽管有布洛斯和盖泽尔这样一些议员站在他们一边。[282]有人曾探听我们的意见；菲勒克给我写了一封对该报表示大为不满的信，对此我已十分友好但又十分坚决地把我的看法告诉了他；此后我就没有再听到他的音信。赫普纳曾路过这里，“心绪忧伤，囊空如洗”[②]，并且抱怨不已；他写了一本调子十分低沉的小册子[③]，从中我看出他在精神上已消沉到何等程度。两个人抱怨得最多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不顾及德国的现行法律，德国法庭以所传播的报纸的内容为

① 查理三世。——编者注
② 歌德《抒情诗集》中的一首诗：《掘宝者》（此处系套用）。——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57页。——编者注

借口，给传播人加上侮辱陛下、叛国等罪名而送进监狱。但是，报纸本身以及对我们的同志的审讯报告都充分表明，这些禽兽法官不管该报写些什么，总可以找到判罪的借口。要出版一种使法官抓不着把柄的报纸，这还是一种有待发明的艺术。同时，这些先生们还忘记了，如果机关报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软弱无力，他们就会驱使我们的人大批大批地转到莫斯特的营垒中去。话又说回来，我还是劝告伯恩施坦[①]（我们迄今一直尽可能给他以道义上的支持），要使用讽刺和讥笑的方法去稍微缓和一下自己那种义愤填膺的腔调，因为这种腔调如果不是变得枯燥无味，就会愈来愈走向极端，那时它就变得荒谬可笑了。

前天辛格尔到我这儿来了，我从他那里得悉，秘密通讯处还可以用，以前我对此没有充分的把握，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这个地址了。辛格尔有另一种考虑。他属于这样一种人：这些人认为对任何东西实行国有化都是半社会主义的措施，或者无论如何也是预备性的社会主义措施，因而暗暗热衷于保护关税、烟草垄断、铁路国有化等等。所有这一切全是胡说，是片面地被夸大了的反对曼彻斯特主义[201]斗争的遗产；这种胡说特别是在投奔到我们方面来的资产阶级的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分子当中追随者最多，因为，这种胡说可以使他们在同自己那些资产阶级的及“有教养的”人士争论时占上风。据辛格尔说，不久以前在柏林你们那里辩论过这一问题，他——幸亏——是少数。我们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没有权利为了这样一些细小的打算使自己的名声受到损害。我曾试图向他阐明：(1) 照我们的看法，在德国，保护

① 见本卷第336页。——编者注

关税完全不适用（在美国则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的工业是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并成为有输出能力的，但是对于这种输出能力来说，外国的半成品在国内市场上竞争是绝对必需的；生产比国内的需要多出三倍产品的钢铁工业，利用保护关税仅仅是为了对付国内市场，反之，正如经验所证明的，在国外却要采取倾销价格；(2) 烟草垄断是一种如此微不足道的国有化，以致我们在辩论中甚至不能拿它来作例证。总的来说，不管俾斯麦能否将它付诸实现，我都毫不在乎，因为不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结果只会对我们有利；(3) 铁路国有化只是对股东们有利，他们可以把股票高价卖出去，而对我们却没有丝毫利益，因为如果我们首先把国家掌握在手中的话，我们可以同样迅速地象收拾国家一样，收拾几个大公司；股份公司业已提供证明，资产者本身是何等的多余无用，因为全部管理工作都是由雇佣人员去做的，而国有化对此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论据。但辛格尔对这种国有化过分固执己见，只同意我一点：即从政治观点看来，你们采取的否定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

邮局快关门了。衷心问候你和李卜克内西。

你的　弗·恩·

80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①]
伦　　敦

1882年5月21日于蒙特卡罗
(摩纳哥)“俄罗斯”旅馆

亲爱的孩子：

我欠你的债已经很久了，本来我打算今天 (星期天) 给你写一封长信，但人是这样想，可事要由温度计来安排。今天例外地天气非常好，因此想到户外去过一天，不想“坐下来写信”。而晚上我不写信：我已经答应过我的卫生顾问。

同朋友费默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过：只要我一登上法国南部的海岸，天气立即会发生变化。果然——我就是这种“不走运的”人，而且我为自己的这种特点而自豪——预言部分地实现了。从一月初起，里符耶腊出现了有如夏季一般的罕见的好天气，只有一些爱唠叨的人抱怨雨水少。从5月4日我到达马赛时就开始下雨，有时整天整天地下，更经常的是下半天，并且几乎总是夜间有雨；气温总的是下降；有时刮冷风；一般地说，天气不稳定，变化无常；空气里——即使不是经常地——充满了水蒸气。尽管如此，这里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暖和的，虽然不是我的肺部现在恰恰需要的那种干燥和稳定的天气。但是，无论在意大利或在其他地方，目前都没有更好的天气：卡恩、蒙特卡罗和门顿是三个最有益于健康的地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方,气温最平稳,平均温度比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高。

你的 老尼克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 伦敦 (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梅特兰公园路41号马克思小姐

81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①]

阿尔让台

1882年5月26日于蒙特卡罗

"俄罗斯"旅馆

亲爱的孩子:

每当我收到你的信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幸福,虽然我觉得过意不去,因为你的老尼克剥夺了你的一部分晚上休息时间。

我的健康正在随着天气而好转。可能我六月初迁往卡恩并在那里呆一周左右。一切都要根据医生的意见和六月份夏天开始时的情况而定。

拉·(我说的是从古巴岛来的那个人)的报纸[②]出了一些重大的差错,多半是由于无知和想"走得尽可能远"的幼稚愿望造成的。

至于《战斗报》,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那上面有什么精彩的东西。诚然,我只读了开头的四号,不过我总归会有时间看它的!

我的心同你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惦念他们。但是经过一系列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② 保尔·拉法格指的是《平等报》。——编者注

极不愉快的“医疗”试验，我不再着急了。无论如何，希望很快同他们在一起。

你的　老尼克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巴黎阿尔让台镇梯也尔林荫路11号沙尔·龙格夫人

82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　　敦

1882年5月28日于蒙特卡罗
“俄罗斯”旅馆

亲爱的小杜西：

无论在恩格斯的信中或昨晚收到的你的信中，我都没有发现倍倍尔的信。大概是由于疏忽大意，信还留在伦敦。无论如何，这事与我无关。

今天背阴的地方是二十四度，大致从我给你寄明信片[①]的那天起暑热开始了 (虽然天空还不象熟悉此地情况的人所要求的那样没有一点云彩)。在这种情况下，原想给你寄一个详细报道的“善良愿望”又不能实现了；但这是个不大的损失。

至于从阿尔及尔启程的海上旅行，我只说一点，天气对这次旅行是很不利的；特别是5月4日至5日的那个夜间有猛烈的暴风雨；我的船舱 (而且我不得不同一个里昂的普通商人合坐) 里

① 见本卷第318—319页。——编者注

面风很大。当我们一早 (5月5日) 到达马赛时，正下着寒冷的滂沱大雨。轮船不能靠岸，只好把乘客和行李由小船转运，后来，使我们大为满意的是，在我们被允许进入尼斯以前，我们不得不在寒冷的而且有穿堂风的海关炼狱中呆几小时。这些使人感冒的“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的机体的工作，并使我在蒙特卡罗重新投入埃斯库拉普的怀抱；如果单单是治疗“支气管”，那我就不需要埃斯库拉普，只要按斯蒂凡医生开的方子服药就行了。我想，库奈曼医生过几天会放我走 (可能在下星期二，5月30日)。所以，我在六月初以前无论如何逃不出这个强盗窝。我是否还要在这里呆得更久，这要由库奈曼医生决定。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在一般有利的气候条件下，增加敏感性 (因此，他们更容易旧病复发)。例如，在北方，由于突然吹了一点穿堂风而引起胸膜炎、支气管炎等等的急性发作，这是不可想象的事，而在阿尔及尔，法国居民则必须经常保持警惕。有位弗略里太太，现在就住在这里的“俄罗斯”旅馆，她由于患支气管炎从巴黎到卡恩去了；在三月份和四月份，她在那里完全恢复了健康，还心情愉快地去爬山等等。为了巩固疗效和散心，她从卡恩到了蒙特卡罗，在这短短两小时的路程中，在昂提布的火车站上感冒了，现在她感觉自己比以前在巴黎时还要坏些。据那些不是为了娱乐或赌博而到这里来的人说，他们十个人中大约有九个成了旧病复发的牺牲品。

歌德在赞美“脱去”老蛇皮的人[①]的时候，大概没有把脱去人造“假皮”算做返老还童的过程。

下次，当天气不象今天这样“烤人”的时候，我一定再给你讲讲

① 歌德《温和的讽刺诗》第5节第86行 (此处系套用)。——编者注

这个盖罗尔施坦公国的一些事情。(这里总离不开奥芬巴赫的音乐,离不开施奈德尔小姐[283],离不开穿着过于讲究的宪兵——他们不到一百人)。这里大自然很美,而且它还经过艺术的修饰,我指的是魔术般地出现在不毛的山岩上的花园,它们有时顺着陡坡倾斜而下,直到迷人的蓝色大海,宛如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平台。但是,摩纳哥—盖罗尔施坦的经济基础是赌场。只要明天关闭赌场,整个摩纳哥—盖罗尔施坦就会进入坟墓!我不喜欢去赌场;你想象一下,在饭店,在咖啡馆等地方,人们谈论和窃窃私语的几乎全是关于轮盘赌以及"三十和四十"①。例如,一会儿某个年青的俄国女人(某俄国外交官的妻子,"俄罗斯"旅馆的一个房客)赢了一百法郎,当场又输了六千法郎;一会儿某人已经没有回家的路费了;另一些人输得倾家荡产;只有极少数人在这里赢了很少一点钱走了;我指的是赌徒中的少数人,而他们几乎全是富人。在这种场合下根本谈不到精打细算等等;只有很小很小的机会可以碰上好"运气",尽管如此,如果人们有一笔可观的赌注,他们就会拿它去冒险。我了解,这也吸引着女人:上流社会的女士们和半上流社会的女士们,女学生和女市民,全都跑到这里来,这是这里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的。我想,除了会同赌场一起沦落下去的摩纳哥—盖罗尔施坦以外,尼斯如果没有这个蒙特卡罗的赌场,也不能作为一个时髦的城市维持下去,在冬季,上流社会的人士和冒险家们都麕集在这里。尽管如此,这种赌场同交易所相比,是多么幼稚的游戏啊!

(该换掉这个笔尖和墨水了:用它们写字真要一套完整的艺术!——这话我是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的。)

---

① "三十和四十",又名"红与黑",是一种赌博。——译者注

在娱乐场 (那里面也进行赌博) 的右边紧挨着的是“巴黎咖啡馆”，它的旁边有一个小亭子；那里每天都张贴着耀眼的广告，不是印的，而是画的，有作者姓名的缩写字；人们花六百法郎可以从他那里知道白纸黑字写的全部科学秘密，即只要有一千法郎就能在轮盘赌或者“三十和四十”中赢得一百万。而真有不少人去上这个为傻瓜设下的圈套！确实有很多男女赌棍都相信这种纯属碰运气的赌博的科学；先生们和女士们坐在“巴黎咖啡馆”门前或娱乐场的美丽花园的条凳上，手持计算表 (铅印的)，低着头，在乱写乱画计算着什么东西，或者，一个人深思熟虑地对另一个人述说他所喜欢的是“哪一种办法”——是否应该赌“级数”等等，等等。可以认为，人们入了疯人院。摩纳哥的格里马耳迪[①]和他的盖罗尔施坦公国，以及赌场的承担人都发财致富，并且归根到底比被他们哄骗的人对奥芬巴赫有“更大的兴趣”。

如果我的住址有变化，我一定打电报通知你。无论如何，回家的时候——首先我要去巴黎——我会一路“小心谨慎”并在中途停顿。

向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老尼克

① 查理三世。——编者注

83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

阿尔让台

1882年6月4日于卡恩

亲爱的孩子：

我将在6月6日开始的那周的头几天中的一天到达。我不能说准确；这取决于事先无法预料的种种情况。因此，如果你不去为我到达的准确日期和钟点而操心，那就使我很感激了。以前我常说，没有任何事象有人到车站来接我那样使我心绪不宁。也不要对任何人说（包括加斯科尼人[2]、俄国人[3]和希尔施）你在那周等我。我希望到梯也尔林荫路11号你的家里得到充分的安静。

你的　老尼克

所谓“安静”我是指“家庭生活”，“孩子们的喧闹”，整个这一“小小的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有意思得多。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巴黎阿尔让台镇梯也尔林荫路11号沙尔·龙格夫人

---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②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③ 拉甫罗夫。——编者注

84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
伦　　敦

1882年6月17日于阿尔让台镇
梯也尔林荫路11号

亲阅

亲爱的孩子：

我曾经同恩格斯讲好——并已经口头告诉过保尔[2]，——只要我能去瑞士（大约在七月下半月），将由你陪同。说实在的，我恐怕不能再次一个人冒险去作这样的旅行。你看，这也就多多少少成了你的义务——作山谷老人的旅伴。

另一方面，由于我应当在这里至少还要逗留三个星期左右来完成在恩吉安的硫矿泉水疗程，所以我希望海伦[3]和杜西在这段时间内到这里来住一个短时期。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写信告诉过海伦和杜西。

小燕妮邀请拉法格明天来一趟。

再见。

老尼克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英国伦敦北区交叉路特雷姆利特小林坊37号保尔·拉法格

---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② 拉法格。——编者注
③ 德穆特。——编者注

夫人

85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1882年6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托我办的事，我最近几天内一定完成。订购《平等报》的报费我将转寄给在巴黎的拉法格，并向他要一个收据，哪怕是非正式的收据。至于《劳动旗帜报》，如果我从7月1日才开始订阅，你决不会吃亏；那报纸越来越不象话了。

马克思在阿尔及尔大约住了两个月，在那里他的胸膜炎又复发了，我好象已写信告诉过你[①]。病治好以后，他就到摩纳哥的蒙特卡罗去了，胸膜炎又发了一次，不过这次较轻。三个星期以前，他从那里去巴黎，现在他的女儿龙格夫人那里，住在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他每天从阿尔让台到恩吉安去用当地的硫矿泉水治疗他的慢性支气管卡他和咳嗽。他总的健康状况很好；至于他以后的旅行路线，那全由医生决定。

给我们寄来的《宣言》[②]的英译文，不经过彻底修订根本不能用。不过你了解，在目前的条件下，修订是绝对办不到的。

列甫[③]已经好几个月毫无音信了。他是一个很古怪的人，应当

---

① 见本卷第296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③ 加特曼。——编者注

听其自便。我这里甚至没有他的地址。顺便说说，一些时候以来，我常收到利林塔尔医生从纽约寄给列甫的通知，我只能通过巴黎把这些通知转交给他。这个利林塔尔是谁？

拉萨尔派到了美国以后，他们的领袖欲必然表现出来。这些以真正福音的唯一传播者自诩的人，对处在精神上愚昧状态中的美国人不可能不飞扬跋扈。而且，当他们在德国的埃盘日益丧失以后，他们必须在美国占据新地盘。不过，我们倒很幸运地在德国摆脱了他们；在美国，一切都发展得快十倍，他们很快就会退出舞台。

我相信，你的眼睛会好起来，如果你加以保护的话。有一次我也不得不为这种事忙碌，我知道这是多么讨厌的事情。

一般说来，德国的情况非常好。虽然，党内著作家先生们曾经企图使党发生反动的、资产阶级的、驯服的、有教养的转变，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工人处处受到的侮辱，使他们普遍地比三年前更加革命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大概你已经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看到了。在那些领导人中，这次倍倍尔也表现得比谁都好。李卜克内西就稍微摇摆了一下，不仅因为他伸出双手不经慎重选择地欢迎每一个只要有一点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有教养者”，而且因为他的女婿，那个胖胖的、又笨又懒的布鲁诺·盖泽尔是最绝望的抱怨派[284]中的一个。这班先生当时极力想用温良恭顺，卑躬屈膝的办法，乞求取消反社会党人法[109]，因为这项法令剥夺了他们的稿费收入。只要这个法令一旦被取消 (资产者本身也不指望现在的帝国国会或另一个什么样的帝国国会延长这个法令，因为它完全没有效果)，就一定会发生公开的分裂，而菲勒克、赫希柏格、盖泽尔、布洛斯之流就会形成一

个独立的右翼；在他们还没有最后垮台以前，可以间或同他们进行谈判。这种意见我们在反社会党人法刚一颁布时就说过了[①]，当时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在《年鉴》[②]上发表了一篇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耻到了极点的文章，评论过去党的活动，并要求党采取比较文雅礼让的做法。[285]

问候阿道夫[③]。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请告诉阿道夫，彭普斯生了一个小女孩[④]。

86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1882年6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只能凭记忆来答复你的信，因为我已把它交杜西转寄给马克思[⑤]，此后就没有看过了。

马克思住在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他的女儿[⑥]那里大约已经有

---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编者注
②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编者注
③ 左尔格。——编者注
④ 莉莲。——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320页。——编者注
⑥ 燕妮·龙格。——编者注

三个星期；据说他气色很好，变黑了，象一个真正的“摩尔”(你知道，这是他的绰号)，情绪很好，只是由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还使他伤脑筋。为了根治此病，他终于不得不成为硫磺帮[286]的一个成员而让福格特称心满意。也就是说，他在附近的恩吉安用硫矿泉水进行治疗。至于他下一步到何处漫游，将由医生决定。

事态迟早会发展到同党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发生冲突并使左右两翼分裂，对于这一点，我早已不再存有任何幻想，我在为评述《年鉴》上的那篇文章而起草的书信①中，就曾直率地声明，我认为这种情况是我所期望的。[285]你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只能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我在上一封信②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用不着急于实行这种分裂。如果这些先生们自愿决定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右翼，那么很快就会一切都好了，不过他们未必会这样做；他们知道，他们将是一支纯粹由军官组成而没有士兵的军队，就象“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一样，这个纵队在1849年的战役中参加到我们这方面来[287]，而且还表示只愿意“在勇敢的维利希的指挥下作战”。当我们问到这支英雄纵队由多少战士组成时，我们得到的回答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我们怎样哈哈大笑起来：一个上校，十一个军官，一个号兵和两个士兵。当时这个上校费尽心机想装得象个不屈不挠的施因德汉斯，他有一匹马，却又不会骑。——这些先生们全都想当领袖，但他们只有留在我们党内才能冒充领袖，因此他们就小心翼翼地防止引起决裂。另一方面，他们知道，当反社会党人法[109]仍然有效的时候，我们也有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14—317页。——编者注

理由避免党内分裂，同时对分裂我们又不能公开辩论。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容忍他们在书面上和口头上的埋怨和呻吟，一直到我们重新有可能在本国国内和在工人们的面前就原则上和策略上的争论问题同他们划清界限为止——只要他们不走得太远，不迫使我们提前实行分裂的话。目前，反社会党人法反正快要寿终正寝了，当它一旦废除，按照我的看法，就必须坦率地讲明情况；那时候这些先生们的行为本身就会告诉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

一旦他们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右翼时，可以根据情况在能够接受的限度之内和他们商定采取某种共同行动，甚至和他们结成同盟等等。不过未必有这种必要：决裂本身将把他们的软弱无力彻底暴露出来。他们在群众中既无支持者，自己又无才能，也无知识，有的只是自命不凡，而且十分严重。话又说回来，到时候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管怎样，通过分裂我们可以使问题明朗，并且可以摆脱那些和我们格格不入的异己分子。

我们不必担心那时我们再也没有象样的帝国国会候选人了。那纯粹是一种偏见。假如有一个工人在帝国国会中说话时偶尔把《Mir》和《Mich》[1]混淆起来，那末我们只要问这样一句就够了：难道霍亨索伦们早就学会了把《Mir》和《Mich》区别清楚吗？且不去说那些元帅了。弗里德里希一威廉三世和他所宠爱的路易莎在用《Mir》和《Mich》时甚至比奥·卡佩尔出的错误更多。如果俾斯麦委派一些工人——他们虽然说话有语法错误但投票时却很内行——担任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成员而不感到难为情，难道我们倒要为此感到害羞吗？我知道，这对于有的人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

① 《Mir》是德语“我”字的第三格，《Mich》是“我”字的第四格。——译者注

情。但对我们来说，丝毫不是这样。同时，这也许会结束我们的议员的一种极其荒谬的做法——大家轮流发言，这似乎是“民主的”，而实际上并不如此。一个政党哪儿有这么多好的议会演说家呢？而当我们在帝国国会里有二百个人的时候，那又将怎么样呢？

有一点你是完全可以指望的：如果事态发展到同这些先生们冲突起来，并且党的左翼公开反对他们的话，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会同你们一道走，并且积极地、光明正大地行动起来。如果说我到现在才用自己的名字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撰稿人出面[288]，那末要知道这纯然是因为上述这些先生如此长期地对该报施加了影响的缘故，也是因为在一个长时期内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再保持这种影响的缘故。

你知道，在巴黎，工人党的队伍中正在闹不团结。在最近一次法国中部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无产者报》的那帮人（马隆、布鲁斯等），干脆毫不客气地把《平等报》的人（这是我们的最优秀的人：盖得、杰维尔、拉法格等）开除出去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完全正确地谴责了这种做法，《平等报》译载了这段话。[289]对此，《无产者报》答复说：他们一派已向德国党的领导讲明情况了，并且说是随后已经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关于此事你了解什么情况吗？《无产者报》的那帮人是一伙极其厚颜无耻的爱撒谎的人，但另一方面，我记得有许多例子，莱比锡《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对于法国人和法国的事务干过一些十足的蠢事。你能否告诉我一些实际情况？我将设法寄给你《无产者报》的剪报。马隆、布鲁斯及其同伙感到担任工人的候选人这个角色太无聊了；因此他们就和某些激进派资产者和著作家联合起来，并邀请其余的这类人参加这个联盟；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更快地当选。他们对《平等报》所采用的斗

争手段和巴枯宁主义者的那种卑鄙龌龊的老手法一模一样。

你的　弗·恩·

87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290]
苏 黎 世

[1882年6月26日于伦敦]

……爱尔兰运动中有两派。第一派，最早的一派，是土地派，这一派，起先是由被英国人剥夺了土地的克兰首领以及天主教大土地所有者组织的、得到农民支持的强盗活动（这些强盗在十七世纪时称为托利，现代托利党人的名称就是直接从他们那里借用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按地区和省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发反抗土地掠夺者——英国大地主——的运动。Ribbonmen（绿带会员），Whiteboys（白光团员），Captain Rock①，Captain Moonlight（月光队长）[291]等等的名称虽然改变了，但反抗的形式，即不仅枪杀可恨的大地主及其代理人（大地主的收租人）②，而且也枪杀那些用暴力把别人从农场赶走而占据该农场的农民，以及进行抵制、写恐吓信，举行威胁性的夜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象在爱尔兰的现代英国土地占有制一样古老，即最迟从十七世纪末叶起就存在了。这种反抗形式是压制不了的，暴力对它也无能为力，它只能随同产生它的原因一起消灭。但从本质来看，它具有地方的、分

① 岩石队长。——编者注
② 这一段括弧中的译文和说明看来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加的。——编者注

散的性质；它永远不会成为普遍的政治斗争形式。

实行合并（1800年）[154]以后，城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族反对派很快就开始出现了，它也象在一切拥有没落小城市的农业国（例如，在丹麦）一样，把律师当成了自己的天然领袖。这些领袖也需要农民；因此他们不得不去寻找那种得到农民拥护的口号。因此奥康奈尔起先找到了解放天主教徒[292]的口号，后来又找到了取消合并的口号。最近，这一派迫于土地占有者的卑鄙行径，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土地同盟[178]在社会方面追求更为革命的（也是在爱尔兰可以达到的）目的——彻底消灭掠夺土地的大地主，而在政治上却抱着相当和平的态度，只要求地方自治，也就是要求成立一个与全不列颠议会并存并从属于它的爱尔兰地方议会。而这一点通过立宪的道路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被吓破了胆的土地所有者已经在叫喊必须（甚至托利党人也支持这个建议）尽快豁免农民所欠的地租，以便挽救尚可挽救的东西。另一方面，格莱斯顿也声称，扩大爱尔兰自治权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除了这两派以外，在美国国内战争以后，又出现了芬尼亚运动[293]。参加过这一战争的几十万爱尔兰士兵和军官，是抱着为解放爱尔兰而筹建一支军队的秘密念头而去的。战后美英之间的纷争成了芬尼亚社社员的主要推动力量。如果事态发展到发生战争的地步，几个月之后，爱尔兰就会变成合众国的组成部分，或者至少会成为一个受它保护的共和国。英国根据日内瓦仲裁法庭的裁决心甘情愿对亚拉巴马号事件[294]承担和付出的赔款，是为了收买美国不去干涉爱尔兰而付出的一种代价。

从这时起，主要的危险已经消除。为了镇压芬尼亚社社员，警察的力量已足够了。每一次秘密活动中必然会发生的叛变也有助

于此；不过变节的只是一些领袖，这些人后来就成了直接的奸细和伪证人。流亡到美国的领袖在那里的移民中间从事革命活动，而大部分都象奥顿诺凡－罗萨一样堕落下去了。凡是在这里看到过1849—1852年欧洲移民情况的人，对这一切都会感到熟悉，——当然，这只是用美国人固有的夸大的眼光来看。

现在，毫无疑问，很多芬尼亚社社员已经回来了，并恢复了旧日的武装组织。他们形成运动中的重要因素，迫使自由派采取比较坚决的行动。但是除了恐吓一下约翰牛之外，他们什么也不能达到。诚然，约翰牛在其本土以外的帝国范围内正在明显地变弱，但是，这里离它的家是那么近，它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镇压爱尔兰的任何起义。首先，在爱尔兰配置了一万四千名“警官队”——用步枪和刺刀武装起来并受过军事训练的宪兵。其次，有三万左右的常备军，并且还很容易调来同等数量的常备军和英国民军来加强它。此外还有舰队。约翰牛对起义的镇压，是以残酷无比著称的。如果没有外来的战争或战争危险，爱尔兰起义丝毫没有成功的机会，但这方面的危险只能来自两个强国：法国，尤其是合众国。不过法国根本就谈不上。在美国，各个政党为了争取爱尔兰人的选票，都在献媚，许下了很多诺言，但毫不兑现。它们并不想为爱尔兰而卷入战争。它们甚至希望左右爱尔兰的是一种促使爱尔兰人更多地流亡美国的局势。显然，一个二十年之后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富有和最强大国家的国家，是不大愿意去从事那种可能而且势必妨碍它本国蓬勃发展的冒险行动的。二十年之后，它就会完全以另一种语言来讲话了。

但如果产生了同美国作战的危险，英国会欣然满足爱尔兰人的一切要求，不过就是不会答应他们完全独立，由于地理位置的

关系，这种独立根本不符合它的愿望。

因此，爱尔兰人只剩下一条一个一个地逐步夺取阵地的立宪道路了，不过芬尼亚社社员的那种充满秘密性的武装阴谋会仍然是非常起作用的因素。但是这些芬尼亚社社员自己却愈来愈习惯于独特的巴枯宁主义；刺杀伯克和卡文迪什[49]只能有一个目的：破坏土地同盟和格莱斯顿之间的妥协。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妥协对爱尔兰说来是最好的结局。由于佃户欠了地租，大地主把几万名佃户赶出家园，而且是在武装力量的保护下行动的。阻止这种有系统地灭绝爱尔兰人口的做法（被赶走的人或死于饥饿，或被迫迁往美国）是当前第一要求。格莱斯顿准备提出一个法案，要仿照奥地利1848年封建义务赎金的办法来付清欠款：三分之一由农民支付，三分之一由国家支付，三分之一由大地主自认损失。土地同盟本身的建议也是如此。由此看来，凤凰公园的“壮举”如果不是道地的愚蠢，就是纯粹巴枯宁主义的、广告式的、毫无目的的“以行动进行的宣传”。如果这种宣传没有产生类似赫德尔和诺比林的愚蠢行为[23]所产生的那种后果，那只是因为爱尔兰的情况毕竟不完全与普鲁士相同。因此，让巴枯宁主义者和莫斯特派把这种幼稚的行动去和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为相提并论吧，让他们拿尚未到来的“爱尔兰革命”去进行恐吓吧。

在谈到爱尔兰的时候，还有一点应当记住：决不可无条件地赞扬任何一个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决不可在他入土以前对他表示支持。克尔特人气质和对农民的惯常剥削（爱尔兰的一切“有教养的”阶层，特别是律师就是靠此过活的）使得爱尔兰的政治活动家非常容易贪赃受贿。奥康奈尔竟然每年从农民那里拿整整三万英镑作为自己的鼓动费。为了实行合并，英国使用了一百万英

镑来进行贿赂，有人指责一个受贿者说："您出卖了自己的祖国"。这个人回答说："对了，而且我感到万分高兴的是，我有一个可以出卖的祖国。"①

德国历届政府、警察和法官对我们的人所采取的手段越来越卑鄙无耻，就是用最厉害的字眼来评论它们还显得太软弱无力。但是，既然单是一些厉害的字眼不一定使语言具有足够的力量，并且经常重复象坏蛋之类的字眼，其效力就逐渐减弱，因而只得使用越来越"厉害"的字眼，而这样就有陷入莫斯特—施奈特文风[295]的危险，那末，最好是采用其他办法，不要厉害的字眼而又能保证有力量和富于表达力。这种办法是有的，即主要是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愤怒语言更能刺痛敌人。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最好是象最近几号所做的那样，在一切可行的地方采用早已行之有效的讽刺笔调。偶尔给以打击将更为有效。倍倍尔在这方面也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何况您的记者现在对那种猛烈抨击当前事件的做法也十分担心。

针对《平等报》刊印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谈到中部联合会代表大会开除它的拥护者的那段文章的译文，《无产者报》登载了一篇虚伪文章[296]，谈论什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法国全国委员会进行友好通信的问题。您是否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此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道存在着这样的对外联络委员会；莫非就是鼎鼎有名的联络局[297]？

《战斗报》已奄奄一息——这是个失败，而且是应得的失败。利沙加勒原来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记者；他和他的同僚马隆和布鲁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原文到此为止。——编者注

斯在反对盖得等人——马克思派、nébulosités allemandes[1]等等的时候，诉诸巴黎人的仇恨德国的沙文主义情绪。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妨碍利沙加勒向《公民报》的所有者[2]提出自己要参加该报编辑部！当然，编辑部立即拒绝了这一要求 (这只是私下说说)。

马克思在阿尔让台自己的女儿[3]家里，他避开巴黎，用恩吉安的硫矿泉水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和咳嗽；总的来说，他的健康得到了恢复并且感觉良好，但他还必须多加保重。

我让阿道夫·博伊斯特转交给您一本米拉波著的《柏林宫廷秘史》，不知他是否给您了？这本书《社会民主党人报》倒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

您的 弗·恩·

8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7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立刻答复您最近的来信，否则，遇上星期天，信要三天以后才能寄到。

关于梅林事件[62]，此地有一个熟人曾告诉过我；我马上知道了作者和幕后提词人。自从希尔施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计划

① 德国的糊涂思想。——编者注
② 布龙默施坦。——编者注
③ 燕妮·龙格。——编者注

当时由于您和倍倍尔在场而遭到如此彻底的破产之后，他便对“苏黎世派”怀着令人可笑的满腔怒火。我们相当经常地毫不含糊地向他表示过，我们在这方面不会支持他，他的行动完全由他自己负责，——但这只产生了一个结果，那就是他不再用抱怨来打扰我们。不过，他早已又在巴黎了（在那里人家容忍他），并且于上星期天，即7月8日，同某个丽娜·哈舍尔特小姐结了婚。

至于这个问题本身，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介入。梅林散布了关于我们的大量谣言，如果我们只反驳某一点，那就会间接地承认其余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们已经多年没有理采任何谎言，除非万不得已非要我们回击不可。因为我们的人掌握着《人民报》，只要简单地报道一下六月某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载了一篇有我署名的文章[298]就够了。这是最好的回答。正如所设想的那样，您自己也可以引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这个材料并且补充说明，马克思和我对我们的公开行动总是预先互相商量好的。我很高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文章正好现在发表出来，这是对这一切愚蠢行动的毁灭性打击。

同时我认为，您把赫希柏格搁在一旁，做得很对。本来他正想纯粹以个人名义出现，因而他可以在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自己出来为自己辩护。我不知道，如果把同《年鉴》上的文章有关的旧事[285]重新提出来，是否会帮他的忙；如果因此在党内产生对我们立场的怀疑，我们可能会被迫回头来谈这个问题，而我至少认为这完全是多余的。

因为马克思在阿尔让台深居简出，并且尽可能不让旁人知道他住在那里，所以，据我所知，他没有同希尔施见面，也未必渴望见到他。马克思需要安静，因此，在不是绝对必要的时候，即在希尔施

再没有抛出什么东西来的时候，我不想用这件事去打扰他。

我收到了考茨基的涉及各种问题的长信，甚至不是一封而是两封[299]，但正象我已经写信告诉您的那样[①]，现在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内容如此广泛的通信，况且为了有可能深刻地考虑某些个别的问题并得出答案，我必须对它们进行专门研究。这就是我沉默的唯一原因。

我根本不知道有任何一部关于宪章运动的好著作。如果我能够让我们在波士顿的老朋友哈尼 (前《北极星报》编辑) 来写宪章运动史，那他的确是一个合适的人。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我本人同希尔施根本没有任何通信联系，因此我决没有理由把我对这一事件的观点告诉他。如果有机会，我当然要加以利用。

89
恩格斯致阿道夫·赫普纳
纽 约

[草稿]

1882年7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赫普纳先生：

我迟迟没给您回信，是由于马克思患病并一再更换地点。只

① 见本卷第269—270页。——编者注

是最近，我才能同他进行事务上的通信。我们对您所计划的事业的意见[1]如下：

因为在法律上您完全有权利在那里翻印欧洲出版的东西，所以我们认为您最好充分利用这种权利，不必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如果您想翻印《共产党宣言》，我们丝毫也不能反对；而且我们根本不会想到要对此提出抗议，除非是作了删改——历史文件是根本不容许删改的——或作了不恰当的注释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能给您写序言，除了因为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以外，主要是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由于某种连带责任使自己跟一件我们既不能、也不愿意过问的事情有了关系。因此，您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决定是否翻印其他著作的问题，我们决不会埋怨您在出版我们的书籍的同时还出版别的什么书籍。

对于我的《工人阶级状况》[2]，也是一样。如果您照原样翻印这一著作，我决不能反对。可是，如果我给了您特别的许可，我就有责任对该书作增订和注释，使它跟现在的情况联系起来，而这就得费半年功夫。此外，我应当事先有保证，就是这件工作一旦开始了，就得进行到底。

我想我已向您说明了，为了您的利益，您最好是自己做自己负责。除非迫不得已，我们决不会妨碍您的事业，宁可说恰巧相反。

至于新的《资本论》浅说，马克思对于这类版本有过许多不愉快的事，所以不能向他提这样的建议，特别是现在。不过马克思给莫斯特编写的浅说第二版[300]改正了（这只是私下说说！）一些

① 见本卷第70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重大的错误，并作了某些增补，因此这本浅说还是有它的长处的，可以翻印。

我能够推荐给您翻印的别的东西好象不多了。莱比锡的书籍多半是讨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一些议会候选人的博士论文。茹尔·盖得的法文著作大部分是好的，但它们过于偏重法国情况。白拉克的《打倒社会民主党人》对您也许不适用。倍倍尔的议会演说是在德国出现的符合我们意向的最好的东西，不过，显然是针对当前大众所注意的问题而写的；拉萨尔的著作充满了经济学上的错误，而且他的全部观点早已过时了。白拉克的小册子《拉萨尔的建议》提出了正确的批判，不过还不彻底。

还是请您自己选择吧。祝您工作顺利。

您的 弗·恩·

90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①]

巴 黎

[1882年7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

我早就想对您寄来俄文版《宣言》[301]表示感谢，但未能给您写信，因为关于马克思的情况无可奉告，而又严禁我把他住在阿尔让台的消息告诉在巴黎的任何人。遗憾的是，医生规定他尽可能少说话，这个禁令迫使他还要隐居下去。

①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编者注

柯瓦列夫斯基顺便来看过我，当时我不在家。只有马克思小姐[1]见到他，而他没有留下地址。大概，他来了几天之后就走了，但我完全不知道他的去向。好象他有回祖国的打算。马克思小姐[1]在阿尔让台。如果您去向龙格打听，也许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您的　弗·恩·

[恩格斯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法国巴黎圣雅各路328号彼·拉甫罗夫先生

91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1882年8月9日于伦敦

老朋友：

昨天我未能给你邮去汇票。但今天我已经办了这件事，邮局会付给你五英镑，按牌价可折合一百二十六法郎。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生活情况，我很高兴。我本来也想多方设法使你、马克思和我又能够相聚在一起，但今年未必会有这种可能；这个夏天你也许还能够见到马克思，但这要取决于医生让他到什么地方去。这封信没写完，其余的只好拖几天再写，邮班很快就要走了，而我还必须给伯恩施坦写一封详细的有关各种问题的信。

祝你现在同往常一样身心健康，请接受我的衷心问候。

你的　老弗·恩格斯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9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8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今天只是匆匆忙忙提出几点意见，因为日内我要去海滨，忙得不可开交。

(1) 关于德文版《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我也早就在考虑，特别是自从我看到这本书在许多优秀的法国人的头脑中引起了真正的革命以来。[302]我高兴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一致。但是写一个比较简练的德文本，比起那个写得比较自由的法文本来，困难要大得多。把这个东西写得通俗而又不损害内容，也就是要使它能够成为人人易懂的宣传性的小册子，任务是艰巨的，但是我去海滨时一定尽力而为。什么时候您能开始刊印？刊印需要多少时间？当然，那时应当把校样寄给我（象法国人所作的那样，一式两份，这会提供很大的方便）。

(2) 显然您认为，从我们的老交情考虑，李卜克内西有正当权利向您索取我的信[①]，并且您也有责任把那封信给他使用。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使我感到不满的地方。以往您不可能知道，我和李卜克内西之间发生的许多不和的事，十之八、九是由于他的这类自作主张的做法引起的：未经许可发表私人信件，对我的文章加

① 见本卷第332—337页。——编者注

些荒诞的或同原文意思直接矛盾的注解等等。这次他又十分令人不能容忍地利用了我的信。这封信是直接针对您的文章而写的。[290]而李卜克内西却这样看待它：似乎其中提供了“我的”关于整个爱尔兰问题的论述。这是极其轻率的，特别是有人拿出达维特的演说来反对我的信，但到写信的时候他还根本没有发表演说，演说与那封信毫不相干，因为达维特和他的国家土地所有制那时还只有点征候。当李卜克内西想要表明自己的“优势”时，他总是这样轻率从事。好吧，让他闹笑话去吧，但是他不应当在这里滥用我的书信。因此他使我不得不请求您将来（我想说得尽可能得体和更合乎外交词令）把我的信件给他时，顶多是让他看看，而不要把原件留在他那里，也不要给他抄件。

⑶ 我把有关希尔施—梅林问题[62]的必要情况告诉了马克思，虽然我把此事尽可能说得幽默些，我还是担心如果卡尔施[①]偶然见到马克思，他会度过不十分愉快的一刻钟。

⑷ 我觉得在埃及问题上您过于袒护那个所谓的祖国党了。[303]关于阿拉比我们知道得不多，但是可以十拿九稳，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帕沙，他不愿把税收让给财政巨头，因为他按照道地的东方习惯只想自己饱私囊。农民国家中常见的历史正在那里重演。从爱尔兰到俄国，从小亚细亚到埃及——在农民国家中，农民的存在为的是受人剥削。从亚述帝国和波斯王国的时代起就是如此。萨特拉普——另一种说法即帕沙——这是东方剥削者的主要人物，正如商人和法学家是现代西方的人物一样。不承认欠总督[304]的债务，这当然是件好事，但试问：下一步怎么样呢？我们西欧社会

① 卡尔·希尔施。——编者注

党人不应当象埃及费拉[305]或一切罗曼人那样，轻易上这个钩。真奇怪！罗曼语国家的一切革命者都抱怨说，过去他们进行革命总是对别人有利，——其原因很简单：他们往往被“革命”这个词所迷惑。只要某地刚一发生暴乱，整个罗曼语族革命界总是根本不加批判地欣喜若狂。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支持被压迫的费拉，但不必同时赞成他们现在的种种幻想（要知道农民需要遭受世世代代的欺骗，才能通过切身经验醒悟过来），我们可以反对英国人的暴行，但绝对不必因此而支持他们现在的军事对手。在一切国际政治问题上，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那些在政治上感情用事的党派的报纸应当采取非常小心谨慎的态度，我们德国人既然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我们就有义务在这方面通过批评来证明自己的这种优越性。

不过，批评得够多了！可惜我今天已经没有时间给您寄小品文栏的材料[306]。我很想用事实向好样的卡尔施证明，关于我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关系他向梅林编造了一些什么样的胡说八道。不过您不久就会收到材料，那时候您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注释中直接提一下这件事，——当然，不要点卡尔施的名，他现在已经不那末好受了。

趁此衷心问好。只要有可能，我将从海滨给您去信，也将给好样的考茨基去信；我现有的他的通讯处大概已经过时。最近的通讯处是奇给某个用法国姓的女人，——但愿这确实只是一个秘密通讯处？

您的 弗·恩·

93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1882年8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附上订阅《平等报》的收据；从这些出色的生意人那里比这再好的我也无法给你弄到了。自从劳拉·拉法格去巴黎以后，我们在这里再也没有看到和听到关于这一报纸的情况了。共付了十四先令。

今天分两包给你寄去7月1日—8月5日的《劳动旗帜报》。如果你专门订阅这种报纸，那是毫无意思的。我干脆把我这一份寄给你，省得往纸篓里丢。

马克思还在阿尔让台，正在用恩吉安的硫矿泉水治疗慢性支气管炎。他还必须谨防胸膜炎复发。其他的事情，医生们知道，或许也不知道。

匆匆草此。

你的　弗·恩·

94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82年8月20日于大雅默斯市
哥伦比亚坊10号

亲爱的艾米尔：

我们——肖莱马、彭普斯、小家伙[1]和我在这里已经呆了十天。[64]今天我才着手给你回信，这是海滨疗养区愉快的懒散造成的过错。

首先，我已把你直接介绍给赛姆·穆尔，请求他把他的市内事务所的地址寄给你（律师们的这些事务所叫做chambers），因为我这里没有这个地址，而白天只有在那里可以找到穆尔。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具有本民族的一切优点而没有其任何一点缺点的典型的英国人。当然他也是社会民主党人并且也讲德语，虽然讲得不很流利。他乐意尽力帮助你，他比我能对你更有用。当一个人弃商已经将近十三年，而且离开曼彻斯特也已经十二年之后[307]，他在那些以互相勾结为首要原则的人们中间的影响就很小了。而穆尔只是在三、四年以前才弃商，他仍旧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更能做到某些事情。例如，我甚至不知道那些同我有过来往的人是否还活着，他们过去的公司是否还存在，他们是否把整个企业都卖出去了。如果我把你介绍给欧门和罗比，也许不会有好处，反

① 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

而有害处；这些人不会让你看他们的工厂，并且最后会在交易所里叫他们所熟识的其他纺纱厂主和工厂主对你有所警惕。

生产针织纱和缝纫线的工厂，你是没法进去的，因为据我所知，除了欧门—罗比工厂以外，在曼彻斯特没有这类工厂。有各种纺纱企业，但你在那里只看得到旧式的并纱机，因为这些工厂主把未加工的纱拿去出售。怎样才能比较容易地进入工厂，这取决于每个个别场合的情况，但是，一般说来，我一向认为，最好是向介绍给你的人说实话，坦率地说明你的身分。许多德国搞纺纱业的人企图用取巧的办法钻进去，结果几乎总是有人揭穿他们并且在交易所里把他们的情况告诉其他人，此后就什么也不给他们看了。这里的竞争比在德国规模大得多，象在德国经常玩弄的小手腕，在这里是根本吃不开的。

肖莱马十月初也会回到那里去，他也能够帮助你。首先，欧门—恩格斯公司给德国大信托公司的推荐对你很有用处，它将给你进一步的帮助，甚至能够指点你，在什么场合不说明你的身分是恰当的。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就要开饭了。总的来说，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美好的天气、比尔森啤酒、海洋空气和海水浴，把我星期一（即你动身的那一天）患的胃病完全治好了。彭普斯和肖莱马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95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

阿尔让台

1882年8月27日于大雅默斯市
哥伦比亚坊10号

我亲爱的燕妮：

多谢你的来信。即使寄个明信片来，我也很满意。你拆开了我给摩尔的信并关心该信[①]的内容，我很高兴。

我收到了洛桑来信[②]和斐维来电[72]，电报中附有他们的[③]新地址：勒芒湖旅馆，看来他们想在那里住下去。至于谈到摩尔的健康，我很高兴收到了你的清醒而无偏见的报道。劳拉见到他仅仅几小时，她得到的印象似乎过分乐观，另一方面，杜西在阿尔让台又见到了他，她却感到颇为失望，认为他没有多大好转。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我们有一切理由对他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这些成绩是在一直缠住他不放的很坏的天气下，并且是在三次——其中两次是非常严重的胸膜炎复发之后取得的。我从未指望他今冬能够呆在英国，这一点在他动身去阿尔及尔以前我就向海伦[④]和其他讲话谨慎的人说过。因此这对我来说并不是意料之外的。我

① 见本卷第84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82—83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和劳拉·拉法格的。——编者注
④ 德穆特。——编者注

感到失望的只是他在冬季以前未必能到这里来呆几周。不管怎么说，我感到满意的是，医生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这就更易于使他服从。由于支气管炎仍未痊愈，他还要在恩吉安或科特雷呆些日子，然后在山区——在阿尔卑斯山区或比利牛斯山区——施行气候疗法，这将重新使他完全恢复工作能力。但是，正象你所说的，如果旧病复发，这一切就会受到影响，不过，现在这种可能性很小，特别是由于他已取得了经验。

我亲爱的燕妮，我知道，你承受了多么沉重的负担，而且现在还是这样。我常常惦记你，并且由于一点也不能帮你的忙而心里不安。当我每天早上去尼姆[①]那里喝比尔森啤酒的时候，你和摩尔几乎是我们每天经常谈的话题。但是我知道，我勇敢的燕妮不会失去勇气，当你将接受最近的考验[②]时，我希望和期待你把家务安排好，使自己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静。

你想象不到，彭普斯自从到这里来以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她为自己的小孩[③]忙个不停；穿着打扮、娱乐、闲逛——这一切看来她全忘了。她对小家伙照顾得很周到，她情绪很好，很有耐心。的确，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即使现在她长出两个牙齿的时候，她也几乎总是在笑。我们希望母亲和孩子将这样继续下去。

肖莱马向你衷心问好，他明天动身去德国，我同他一起到伦敦去办事，要去一两天。只要天气不撵我们走，我们还要在这里逗留两周；从上星期二起，天气极不稳定。可怜的派尔希[④]是上星期三

---

①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② 分娩。——编者注
③ 女儿莉莲。——编者注
④ 罗舍。——编者注

到达的，看来，他注定要在潮湿中度假期——这对风湿病患者来说是不妙的前景。至于谈到我，海洋空气和海水浴大大地增进了我的健康，但愿今年冬天我能好好地做一番工作。

我们大家向龙格、你和孩子们[①]衷心问好并致良好的祝愿。

爱你的　弗·恩格斯

96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1882年9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您确实应该原谅我，让您如此久等回信。由于我遇到了相当多的各种各样的干扰，为了最终能着手工作，我只得放下所有次要的事情，并且除绝对必要者而外把一切通信都搁置下来。因为您在殖民地问题[299]上向我提出了绝非那么容易解决的课题，所以您的信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并且连善良的瓦尔特也被遗忘了。

如果瓦尔特和布劳恩博士到这里来，我将乐意见见他们，并且欣然为他们做需要我去做的一切。其余的都好办。但是，说实在的，瓦尔特在这里研究什么呢？要知道这正是首先应当解决的。是社会主义本身吗？为此他无须到这里来，这一点他在奥地利和德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都能够办到；况且进行这种研究的源泉，即值得阅读的文献，很快就会枯竭。是政治经济学吗？是历史吗？关

① 燕妮·龙格的儿子；让、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于这些问题的资料在英国博物馆里浩如烟海，以致没有经验的人可能马上会被它们弄得晕头转向。是自然科学吗？这方面需要讲义，讲义在这里出奇的昂贵。我认为，在把这个人送到这里来以前，应当确定明确的研究计划——至少是大致的——，如果把这个计划告诉我，我就很容易判断，这个计划在什么地方能完成得最好，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此外，如果不掌握哪怕是少许英语知识，他在这里就会寸步难行。我想，他最好是首先用半年左右来学点法文和英文，以便在出国前至少能勉勉强强学会用这两种语言阅读。此外，如果他想顺利地从事研究，他总还应当在历史方面、地理方面以及如有可能还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具备某些初步知识。他在这方面的情况怎样，我不知道，但如果他的这些知识很欠缺，那末最好先把他送到维也纳去，让他在自己的朋友的指导下初步获得这些知识，并且先大致知道怎样才能独立地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否则在伦敦这里，多半是白花钱。这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也许这一切并不完全恰当，但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文化程度，所以我想，不管怎样我应该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如果您把有关这方面的更详细的情况告诉我，那您就不致久等回信了。您知道，总的来说，我一向赞成把有抱负的青年人送到国外去，使他们能开扩眼界并摆脱在祖国必然会产生的地方偏见。

不过，关于瓦尔特的问题，您不要对马克思抱很大的希望。他在五月以前未必回得来，而且在回来以后大概还必须十分保重，以便有可能完成他的工作。问题在于，现在还严禁他多说话，而且晚上他也需要安静，否则他夜里睡不好觉。白天他当然愿意工作。在应该摆脱掉长久不愈的慢性支气管炎的时候，而且在三次重犯

严重的胸膜炎之后，必须注意不仅要彻底治好疾病，而且要不让它复发，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六十五岁的时候——这本身就令人十分操心。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依我看，真正的殖民地，即欧洲人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亚，都会独立的；相反地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领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展开，还很难说。印度也许会，甚至很可能会闹革命，既然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不能进行殖民战争，那就必须容许它这样做，那时自然不会没有种种破坏。但是，这类事情是任何革命都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将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们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

埃及的事件[60]是俄国外交制造的。让格莱斯顿侵占埃及（埃及还远未落入他的手中，他即使能够得逞，也还绝不是说他已经能

保持住埃及),是为了使俄国可以占据阿尔明尼亚,——按照格莱斯顿的说法,这样做又可以把一个基督教国家从伊斯兰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这件事上其余的一切都是幌子、把戏、借口。这种企图是否会成功,很快就会见分晓。

热情问好。

您的　弗·恩·

扎克斯博士刚才寄给我他所著的关于绍林吉亚一书[①],为此请代我向他表示感谢;我一读完它,就给他回信。

我的秘密通讯处:瑞琴特公园路122号派·怀·罗舍夫人,不必信封里套信封。这就是彭普斯;顺便提一下,她已经有一个女孩[②]。虽然,彭普斯已不住在我这里,但这无关紧要。

97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9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在大雅默斯疗养区,什么工作也没有做成——五个人呆在一个房间里,其中还有我的侄女[③]的四个月的婴儿[②],因此,什么事都不能干,我也就没干任何工作,逍遥自在,大喝上好的比尔森啤酒。

---

① 艾·扎克斯《绍林吉亚的家庭工业》。——编者注
② 莉莲。——编者注
③ 彭普斯。——编者注

但是明天我将开始工作,并且在完成小册子[①]以前不再中断。

您建议在序言中谈谈俾斯麦的社会主义,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我自己的愿望。但是,在序言中清算不了这些臭东西,不然序言就会弄得太长。此外,我缺少关于伤亡事故保险等等问题的材料,就是说,没有必不可少的有关的法案。

这个题目早已在我的脑子里盘旋,我也很明白,应当写点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因此,我准备写 (为《社会民主党人报》) 一系列论述现在德国流行的假社会主义的文章 (其中每篇文章将自成一个非常完整的整体);以后这些文章可以出单行本。[308]第一部分:俾斯麦的社会主义—— (1) 保护关税, (2) 铁路国有化, (3) 烟草垄断, (4) 工人保险。但为此我必须有:

对第2点—— 标明最近时期国有化的铁路 (贝尔格—勃兰登堡、柏林—格尔利茨、柏林—施特廷、勃兰登堡—波兹南) 在国有化之前不久的行市的行情通报,以及如可能时,还必须有国家为这些铁路付出的价格;

对第4点—— 俾斯麦的法案,提交帝国国会时的那个本子。

如果您能给我搞到这个,那我就有足够的材料了。

不过,我还想加上第二部分并在其中批判被拉萨尔使用开的,我们的人有时也还在重复的那些模糊不清的概念,例如"铁的工资规律"[266],"全部劳动产品归工人"[309] (而不是归工人们) 等等。这比第一部分更需要,这里需要作彻底清算,而如果这将触怒不幸被接受到我们队伍里来的拉萨尔派"领袖"[310]中的某一位,那就更好了。因此,老实说,第二部分对我来说最为重要。

---

①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 编者注

但是，我不知道，对神圣的斐迪南[①]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批评，是否合乎某些人的口胃。他们大概会认为，在党的机关报上出现这种东西，就会挑起党内分裂和破坏曾经同拉萨尔派订立的协议。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切一旦写出来可以全部出单行本而不必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

总之：或者全部都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然后出单行本，或者马上出版单行本，或者索性作为没有写成的东西暂时搁下。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请随意选择，如果有必要，请同其他人商量商量。但我们一旦商定了的东西，就应当付诸实行。我由于《杜林论》一书曾遭遇过不愉快的事情，即莫斯特提出抗议[311]，现在我不能再一次遭遇这种事情了。

其实，对于俾斯麦精神和与它有关的一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专门论述关于可能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问题的两篇文章[312]中，已经讲得很好了。我推测这是倍倍尔写的；如果不是，那末党就可以庆贺自己有了第二个这样的人，他非常善于洞察事物本质，抛弃一切次要考虑，同时写得非常简洁明了。文章好极了。

您为德国某些人的委靡不振进行辩解的话，我也已经不止一次地自言自语过。但是，尽管如此，这都是自古以来德国人的那种意志薄弱和缺乏毅力，以及企图不是在工人面前而是在庸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是可尊敬的好心人而根本不是可怕的食人生番（有人认为你就是这样的人）的倾向。这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以为他们所受的一点点教育是解放工人所绝对必需的，据他们说，工人自己不能解放自己，只有靠他们去解救。在他们看来，只有靠

① 拉萨尔。——编者注

“有教养的”市侩的帮助，工人阶级才有可能获得解放；贫穷的、软弱无力的、“无教养的”工人怎么能够自己取得解放呢！

昨天我给考茨基写了封信[①]。他断定说，他在那里发现了几个出色的哲学博士。如果他们确实出色，他们会很受欢迎。

阿道夫·博伊斯特能给您唱《布雷的牧师》的曲调[313]。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98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斐 维

1882年9月20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但愿摩尔已经收到我18日的短信[②]。今天虽然有些困难，但我应履行我对你的诺言。工作了一整天，一直干到六点，然后才吃晚饭，现在整九点，所以我仍感到胃里有点儿负担，此外派尔希[③]正坐在房里，不过好在他已被《约瑟夫·安得鲁斯》[④]吸引住了。

我熟悉斐维吗？要知道，1849年9月我在那里驻扎过两星期左右[71]，我熟悉从维耳讷夫到日内瓦的瑞士沿湖一带的地方，熟悉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4—95页。——编者注
③ 罗舍。——编者注
④ 菲尔丁的一部长篇小说。——编者注

米迪峰和勃朗峰等地。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我们军官们就驻扎在你们住的岸边的旅馆里。当时维利希常在湖边树荫下的空地上训练他的两匹马。

只是很遗憾，你们一点儿也不能按我给你们指引的路线[①]走。伯尔尼的南方高原地区在很多方面都胜过日内瓦湖。但如果摩尔想在十月来英国一游的话，你们不久就得离开阿尔卑斯山了。但愿他到这儿来不会有什么危险。否则这是愚蠢的。正如关于他过冬的地方一样，也让医生去决定吧。不过如果他打算来，就不要拖得太迟了。我们这里的气候一直不错，但相当冷，尤其是在晚上和早晨；昨天下了一整天雨，今天没雨了，但几乎一直是阴沉沉的。附带说一句，摩尔的气压统计数字[②]和我们在雅默斯时的体验完全一致，只不过是我们在那里遇到的下大雨的一天正是气压计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当时杜西老是祷告，希望那个愚蠢的东西再降下来！

那种有星状泡沫的酒，是科塔伊酒的特质，据我所知，别的纽沙特尔酒没有这种特质，也没有这么好。

我很想知道是谁编造了那个关于倍倍尔的谣言[③]。直到上星期五（巴黎报纸是在这一天报道的），《科伦日报》对此毫无所知，起码是根本没有提到。看样子这是由梅林编造，由希尔施在巴黎捅出来的。我可能猜错了，但如果这是事实，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另外还有什么人能那么快就在《战斗报》和《公民报》上登出讣告，引用（起码是登在《战斗报》上）倍倍尔很久以前关

① 见本卷第90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2页。——编者注
③ 指报纸上关于倍倍尔已死的荒诞报道。——编者注

于他完全主张合法手段的那次讲话呢？当时我们大吃一惊。星期五晚上，托登楠街工人协会[271]的两个成员来找我，问我那是不是事实？那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同一天晚上，杜西得到了一份登载着上面提及的那篇文章的《战斗报》。《正义报》的沉默可能是因为龙格不在。当时想在咖啡馆里找德国报纸是徒劳的；有点什么消息的报纸，星期六再也不会留在餐桌上了。在星期六晚上，杜西终于收到了她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我没有收到），而那报上不但没提及这事，反而说倍倍尔身体很好，又可以出来走动了。假使失去倍倍尔，那是不可弥补的。不仅在德国，就是在别的地方，哪里还能找到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在年青的一代里，哪能找到一个在理论上那么明确，在实际工作中那么机敏，同时又是那么沉着果断的人？幸好，这并不是事实，当所有的疑虑都已消失时，我感到的宽慰是难以形容的。

我还特别感到高兴的是，燕妮已度过难关，终于实现了许多人长久以来所抱的期望①。我想她准是经受了一段很难熬的时刻。杜尔朗一定已找到人照顾她，梅特兰公园41号的人②深信他已这样做了，在这种情况下，“创造者”③不在，也许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小彭普斯④在生水痘，很不安静，变得爱哭了。这一切不要几天就会过去的，不会使她感到太烦躁的，只不过她的舌头上长了两个小泡，加上两只正在生长的乳牙，使她的嘴感到很痛。此外一切都很好。

---

① 指燕妮·龙格生了女儿燕妮。——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和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③ 沙尔·龙格。——编者注
④ 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

大家都向你和摩尔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伯恩施坦说，《布雷的牧师》[①]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杜西自从回到这里来以后，到上个星期天为止，已经给燕妮写了三封信了！

99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9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寄上序言[②]以及第一节和第二节[③]。第三节以及结尾的文章都已完成，结尾的文章约七页，论述古日耳曼的土地公共所有制（《马尔克》）。但是，我想再认真审读一遍，因此要稍为在我这里搁一搁。

书开头的介绍我不能同意。当拉法格出版法文版的时候，马隆寄给他一个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类东西，所以马克思便同拉法格写了这个导言[314]，这个导言在那里也许还合适。但对于我个人出版的德文版来说，这就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了。顺便说说，当马

① 恩格斯《布雷的牧师》。——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编者注
③ 指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的章节。——编者注

克思回来的时候，我也许设法给您写一本关于1840年至1852年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小册子[315]。应当找个时候做这件事。但一大半资料在马克思那里，而他塞到哪里去了，只有天知道。

当然，两个伤亡事故保险法案，以及秋季提交帝国国会的有关社会问题的一切新法案我都需要。

坚决谴责间接税的要求，我们早在1849年和1850年就提出来了[316]，拉萨尔正是从这里抄袭了这种要求。您关于拉萨尔的其他意见，我注意到了。对于其中的某些意见，可以提出一些异议，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对拉萨尔个人完全不会涉及，但我毕竟不得不扫除一种幻想：似乎拉萨尔在经济学方面（以及在其他一切方面）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①。

我很高兴，文章的作者原来是福尔马尔②；这证明他进步很大。您所说的有关反社会党人法[109]的一番话，我完全同意。只有在这项法律完全彻底废除的情况下，废除才会对我们有利。而只有当多少有点新的生气进入德国政治小铺的时候，当直接酝酿着革命的事件——新纪元[257]、俄国的宪法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出现的时候，这才能发生。到那时，毫无疑问，我们必将在现在我们只占极少数的一切地方获得多数，并且赢得除萨克森以外的一切大城市。

你们对法国人的抱怨，这是大家经常发出的抱怨。他们经常受个别人一时的情绪和影响的支配。《公民报》我不看，《平等报》收到得也很不按时，我甚至不知道，这家报纸是否还存在，因此怎么也不能断定，近来这些人在干什么。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同布鲁

① 见本卷第355—356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56页。——编者注

斯不能和好。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只承认可以参加选举的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他和马隆把其他人撵出了中部联合会[317]，使斗争尖锐到极点，布鲁斯还在斗争中采用了纯粹巴枯宁式的策略：诽谤、造谣和一切可能的卑劣手段。虽然另一方的策略有时是荒谬和幼稚的，虽然它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使我们外国人无法维护他们（我们在这里一贯拒绝维护他们），但主要的是，无论如何不能同布鲁斯搞任何合作。他的小集团想用"同盟"[30]的手法掌握整个运动，只要他没有得逞，他是不会甘休的。

话又说回来，"工人党"的两派加在一起也只不过占巴黎工人群众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工人群众至今还追随克列孟梭这类人；盖得反对克列孟梭的论战也带有过多的个人性质，而且完全不是以正确的方式进行的。其实，克列孟梭是一个很可以发展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比现在走得更远，特别是如果他懂得了问题在于阶级斗争的话；当然，只有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他才会懂得这一点。盖得固执己见，认为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甘必大的"雅典共和国"比起克列孟梭的"斯巴达共和国"危险要小得多，因此想要预防后者，似乎我们——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党——可以阻止某个国家经历其必然的历史发展阶段。他也没有考虑，在法国，我们不经过克列孟梭式的共和国，未必能够从甘必大式的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而如果不这样理解必然的历史联系，以及事变发展的大致进程，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党的政策。但是我已经对这些人不抱希望，随便他们怎么干算了。比利时人的劝告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给选举基金库寄钱的约·斯图·穆勒的侄女和养女名叫海伦娜·泰勒，因此，应当把她和艾伦·姆·泰勒区别开来；虽然两

个名字都取“海伦”的意思，它们毕竟是有严格区别的。

关于加尔西亚，我毫无所知。俱乐部[318]有人偶尔来看我，因此，有机会时我一定向那里打听一下。

顺便说说。谁在《公民报》和《战斗报》上散布倍倍尔逝世的谣言？我们在这里和马克思在斐维[72]（他在那里度过了三周），当时都大吃一惊，而在《正义报》星期一晚上登出李卜克内西辟谣的电报以前又没有任何可能核实这个消息；要知道，《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有无报道，我们都根本不能指靠，因为它早在星期四就出版了。

马克思现在大概已经在回阿尔让台的途中，也许他要在日内瓦停几天。他的身体好些了，但由于夏季的坏天气，疗效大受影响。

如收到手稿，请在来信中提一笔；并且把手稿和校样一起寄来，当然，按印刷品邮寄。其他的东西①还可以在我这里搁多久而不致影响工作？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100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1882年9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们因为你的缘故受了一场很大的虚惊。一周以前，本月15

① 见本卷第360页。——编者注

日[①]，星期五晚上十点钟，协会[159]来了两个人找我，询问两号《公民报》刊登你已逝世的消息（并有讣告）是否真实。我回答说很不可靠，但说不出任何肯定的东西。由于一个很无聊的人坐在我这里，虽然我再也没同他多谈，但他还是不走，所以直到十一点钟以后我才跑到杜西·马克思那里；她还没有睡。她那里有一份《战斗报》，也载有讣告，对消息的来源没有任何说明，却作为确实无疑的新闻加以报道。这样一来，就引起普遍的惊慌。这个会给德国的党带来极大不幸的消息，至少很象是真的了。英国报纸由于沉浸在埃及事件[319]的喜悦之中，对此丝毫没有报道，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况且，我在星期六晚上没有接到《社会民主党人报》，虽然这倒是常有的情况。幸而，我在星期天早晨得悉，杜西已接到她那份《社会民主党人报》，从该报的内容判断，这个消息是很不足信的。到咖啡馆中查阅德国的报纸，是毫无希望的，因为它们每天更换。我们就是这样不知究竟，万分痛苦，直到星期一晚上终于送来了《正义报》正式辟谣时为止。

马克思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在日内瓦湖畔的斐维，在反动的《日内瓦报》上读到了这段新闻，该报自然是作为确实消息报道的。他在心绪极度紊乱中当天就写信给我[②]，他的信恰巧就在上面说的那个星期一晚上寄到，所以我还能利用早晨的邮班寄给他这个叫人高兴的消息[③]，即一切全是捏造。

不，朋友，你没有权利这样年青就离开我们。你比我年青二十岁，我们还要共同坚持许多有趣的战斗，在此以后，当我与世

---

① 原稿为："16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92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94—95页。——编者注

长辞时，你还有义务留在火线上。既然被误传死去的人应比所有的人都更长寿，那么你也和马克思一样[320]，现在大概注定要成为一个十分长寿的人了。

真见鬼，是谁散布这种愚蠢的流言？又是那个爱撒谎的梅林在背后搞的吧？[321]

我在两、三个月前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即我就党内温良分子的问题答复你的那封信①，你收到了吗？

在这个期间，大概你已不止一次地看到，你要我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开撰稿的希望正在实现。就在昨天我还把《反杜林论》三章中的头两章在大加修订和通俗化之后，寄给了伯恩施坦，这三章应当按法文版本[302]的式样用德文出版②。其余的也弄好了，不过只要不妨碍出版，仍把它留在我这里，以便我可以把最困难的这一部分再好好地审阅一遍。有一篇论述古日耳曼的土地公共所有制的长文③作为附录。当你入狱时，我建议你设法从某个图书馆弄到格·路·冯·毛勒著《德国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的历史概论》和他的《德国马尔克制度史》。在德国，有能够不抱成见和不抱“学者”偏见地看待这些事物的人，来熟悉一下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上面这些著作是主要的，阅读它们会使你在一切有关土地所有制问题和农业问题的辩论中有最坚实的根基。

根据福尔马尔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写的几篇文章（关于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可能性[312]）来看，此人有了很大进步。如果这

---

① 见本卷第328—332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一点在其他方面也得到证实，我将感到很高兴。我们极其需要能干的人。

马克思正在摆脱三次胸膜炎给他带来的后果而慢慢复元。为了医治那由支气管炎引起的、根深蒂固的、十分折磨人并且妨碍睡眠的咳嗽，他曾在阿尔让台利用过附近的恩吉安硫矿泉水，但由于恶劣的天气以及他的整个健康状况，医疗效果比几乎肯定可以预期达到的要差。随后他和拉法格夫人去斐维三个星期；前天他应当已从该处动身——先去日内瓦，然后去巴黎，如果天气容许，在十月份会到这里来住几个星期。他无论如何不应在伦敦过冬，至于是在英国南部或在其他什么地方，必须由医生决定。但我从他的信中看出，健康的恢复虽然因恶劣的夏季天气而受到阻碍，却仍不断取得进展。

朋友们，你们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似乎“小戒严”[212]使你们所有的人——正象疾病使马克思那样——变成真正飘泊的荷兰人①了。

当你看到李卜克内西时，请代我向他衷心问好。

整个埃及事件是犹太人（路特希尔德、埃尔兰格尔，等等）对旧日在法老统治时期被逐出埃及的一种报复。[321]

你的　弗·恩·

① 根据神话，一个荷兰的航海者被惩罚无休无止地在海上飘泊，永不靠岸。——译者注

101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2年10月9日于 [伦敦]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白鹦鹉：

这里的天气不坏，也就是说，有几个小时相当好，阳光灿烂；其它时间天空布满了云，有时下起毛毛雨。但是总的来说，天气不冷，只是早晚经常有雾。

肖莱马星期六到伦敦来了，但只作短暂的友好访问——今天晚上他又要去曼彻斯特，因为明天他要在那里的讲台上“造孽”。他向你致良好的祝愿。

恩格斯很生气，因为已经好几个月不给他寄《平等报》了，我的那一份也不再寄到伦敦来了。订购《公民报》包括寄到伦敦的邮费需要多少钱？我离开巴黎时完全忽略了这件事，你回信后，我立即给你汇款。

昨天我们在恩格斯那里吃午饭。彭普斯和小家伙[1]以及派尔希[2]当然也在那里。小家伙很活泼；无论如何比她妈妈唠叨得有意思得多。

昨天晚上唐金来看望我，但他只在本周内才会给我做医疗检

① 女儿莉莲。——编者注
② 罗舍。——编者注

查。他发现我的气色好了些。他认为，在英国即将到来的雾季中，威特岛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地方。

琼尼很快活，并且一般说来是“幸福”的，虽然常常令人感动地谈到自己的妈妈[①]和哈利。在杜西的指导下，他现在又习惯于每天早上用“冷水”从头到脚冲洗了。他的“健康”是再好不过的了。按时早睡（晚八点），这对他也是有益的。他的学识已达到这样的高度：已经能认“大写字母”以及钟表上的大罗马数字。

我非常焦急地等待从你那里知道燕妮的消息——她的健康状况和家事。龙格一家[②]回来了吗？

伟大的鼓动家圣保路斯[③]当然又在波尔—罗亚尔林荫路的宝塔里坐上了王位。来信给我讲讲他的奇闻趣事吧，但首先是讲讲你自己——你近况怎样，身体怎样。

咳嗽仍旧使我苦恼，这简直是一种警告，我必须彻底根除它，以便重新获得全部工作能力。

琳蘅和琼尼向你问好。

祝你健康，我亲爱的和忠实的旅伴白鹦鹉。

老尼克

① 燕妮·龙格。——编者注
② 沙尔·龙格和儿子：昂利、埃德加尔和马赛尔。——编者注
③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10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10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早就想写信告诉您法国的情况，但是一直到现在才动笔。这也好，我这样倒可以一举两得了。

(1) 圣亚田。尽管有比利时人的好意劝告，不可避免的事还是发生了，互不相容的因素已经分开了。[78]这是一件好事。起初，在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如果接受纲领的时候暗地里还有保留，这在以后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在这里我们从来没有为马隆和布鲁斯所迷惑。他们两人都是在巴枯宁的阴谋学校里培养出来的；马隆甚至是建立巴枯宁的秘密"同盟"[30]的共谋者（他是十七个创始人之一）。但是，毕竟还应当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表明，他们是否连同巴枯宁的理论一起放弃了巴枯宁的实践。事情的进程表明，他们接受了纲领（同时歪曲了它，马隆给它加进了许多坏的东西），不过暗中却想推翻纲领。在兰斯和巴黎开始的事情[322]，在圣亚田完成了。党纲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了。1880年的共产主义的导言[323]，已被1866年国际章程的导言所代替，而1866年的国际章程之所以不得不那么一般地表述，正是因为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非常落后，而又不能把他们摈除在外。纲领的正确要求都被取消了，因为每个地方组织有权为了任何一种特殊目的随意制定自己的单独的纲领。这个

所谓的圣亚田党，不仅不是工人党，而且根本不是一个党，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纲领：它至多只是一个马隆—布鲁斯党。这两个人能够对旧纲领提出的最严重的责难，就是这个纲领推出去的人比吸收进来的人还多。这一点现在已得到补救：蒲鲁东主义者和激进派[324]再也没有理由留在党外了，而如果事情照马隆这一帮人所希望的那样发展，那末福尔马尔所抱怨的“革命稀粥”[325]就会成为法国无产阶级的正式说法。

在所有的罗曼语国家中（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对待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证向来是很宽的。这些代表资格证很多都是见不得阳光的。当这种事情还没有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当问题还只涉及次要事情的时候，其危害性还不那么大。但是巴枯宁主义者把这种做法变成了（最初是在汝拉）常规，他们一贯地伪造代表资格证，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夺取领导。现在在圣亚田就是这样。在筹备代表大会的时候，完全使用了巴枯宁的一整套旧策略，对这个策略说来，撒谎、诽谤、阴谋诡计，一切手段都是好的。布鲁斯只是在这方面才是能手。但是这些人忘记了，这在小的支部里和在汝拉这样小的地区是能够得到胜利的，而在一个大国的真正的工人党内就必然要使那些干这种事情和要这种手腕的人遭到毁灭。圣亚田的表面的胜利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而马隆和布鲁斯很快就会彻底完蛋。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250]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有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一帮恶棍没落以后，团结才有可能，其实就在那时我们的人去谋取团

结也是过于匆忙了。[310]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同时还想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牺牲运动的阶级性质，这些人也必须先行没落，然后团结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团结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的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

此外，甚至罗昂派也很需要经常的尖锐的批评。他们常常醉心于革命的词句和毫无根据地渴望行动。

⑵《公民报》—《战斗报》。还在夏天，当《战斗报》处境困难，钱都耗费在广告和类似用途上，资本家扭头不顾，而利沙加勒又同马隆—布鲁斯决裂的时候，利沙加勒就向盖得建议把两家报纸合并起来，他们两人都是主编，每人都有权从另一家报纸编辑部撤销三个人。利沙加勒想用这样的手段排除他所怀恨的拉法格。《公民报》的编辑们一致拒绝了这一点。《战斗报》的处境每况愈下。于是利沙加勒背着《公民报》的编辑们同该报的所有者（一个荷兰金融家[①]）达成了关于两家报纸实行合并的协议，指望用这种"政变"的办法迫使编辑们听命于他。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公民报》的编辑们一天也未停止过出版报纸，而且向法院控告所有者破坏合同。这样一来他们就使利沙加勒的全部阴谋遭到了破产，利沙加勒大丢其丑，连他自己也承认这点，于是使出自己最后的手段，挑动"懦夫拉法格"（他在《战斗报》上这样称呼拉法格）进行决斗，应当相信拉法格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干这种事的。利沙加勒被这种波拿巴式的举动把自己永远毁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党为了反对圣亚田派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自己的报纸的时候，把该报的生存当赌注，以挽救自己个人的快要完蛋了的报纸，不惜任何代价（如果他的手

① 布龙默施坦。——编者注

段得逞的话）改变报纸的性质，并且与该报的所有者资本家结成联盟来反对党的代表，反对编辑，这是不能容忍的。

如果附上的材料用语太激烈，请把它缓和一下。小册子[①]的印刷情况如何？马克思在这里（这要保密！），但愿他能到英国海滨去过冬。

您的　弗·恩·

这封信将于10月20日傍晚五时寄出，您在明天晚上或星期日[②]早上可以收到。

103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2年10月21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前天我们收到了保尔[③]寄来的迁移后的《公民报》[326]的头两号。从《正义报》上我们已经知道，高贵的普罗斯比尔[④]试图给予工人党以什么样的日阿尔纳卡式的打击[327]；从上述两号《公民报》上我们看到，这一打击没有得逞，而根据《公民和战斗报》对“懦夫保·拉·”[⑤]所开的不高明的一枪，我们知道，普罗斯比尔是

①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
② 原稿为：“星期六”。——编者注
③ 拉法格。——编者注
④ 利沙加勒。——编者注
⑤ 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消息非常灵通的，他被迫撕下了自己的假面具，让人看看他实际上是个什么人——卡桑尼亚克式[328]的莽汉。自然，保尔不会这样愚蠢，竟落入这一圈套。

我们已经两天既没有收到《公民报》，也没有收到《公民和战斗报》了，而今天连《正义报》也没有来。因此我们完全摸不清头脑。是《公民报》因为缺乏经费出了两号以后就停刊了呢，还是应当完全归功于法国人的卓越的组织天才我们才没有收到它？你知道，象这样的紧要关头，必须经常供给我们一些在此地不能得到的消息。昨天我给伯恩施坦写了一封长信①，谈到马隆—布鲁斯，也谈到上面这件事；而在巴黎每天都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重要的是马上将它们正确无误地通知伯恩施坦。我没有材料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难道巴黎的朋友们真的没有可能去做这种对于他们自身利益极关重要的事情吗？

今天我从摩尔处听说，你给他去了信，燕妮似乎好一些。摩尔觉得身体一般说来很好；唐金给他进行了诊察，由于发现他大有好转（除了最后两次胸膜炎留下的不可避免的痕迹之外）甚至感到惊异；唐金认为，摩尔可以到英国的南部海滨去过冬。他应当快点动身；我们这里天天都是极为潮湿的天气，不过还暖和，而且当别人那里天气非常好的时候，我们这里就开始有浓雾了。

但愿你能够在哪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突然到这里来，看看所发生的变化。摩尔晚上当然不能出来，因此我这里除了彭普斯一家和偶尔海伦②来之外，没有任何人来。“科利木”完全消失了。前几天伟大的洛里亚又顺便来了。情况是这样的，这天晚上肖利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德穆特。——编者注

迈[1]在这儿，因为我们都稍带醉意，可怜的洛里亚只好忍受了某些嘲笑；他问海伦，她是否也研究过政治经济学；而对我们说，他在柏林尝过摩塞尔酒，他说，这种酒的味道象糖水一样。你可以想象得出，引起了多强烈的哄堂大笑。我看，——可怜的书呆子饱尝了我们这伙“尖酸刻薄”的人一顿嘲笑。你想想看，他不愿相信你和杜西是姊妹，当他听到谁是你们的父亲时瞪大了眼睛。

今天亚历山大罗·奥尔德里尼先生来找摩尔，当时我也在那里，但是大家坚决——这使我很高兴——不接见他。如果摩尔见了他，天晓得，以后又会有多少这类扎纳德利来找他。

彭普斯一家过得很好，他们已在自己的新房子里住了两星期或将近两星期，但是因为现款不够，房子还没有完全陈设好家具。小家伙[2]曾患胸脓肿，不过正在好转。查理[3]和贝万小姐已经结婚三星期了；从他们获得幸福结局以后我还没有见过他们。

现在已经是邮局快关门的时候了，因为想让你明天早上收到这封信，我应当搁笔了。衷心问候保尔，如果你看见盖得和梅萨，也衷心问候他们。

爱你的　弗·恩·

---

① 肖利迈（Jollymeier）是肖莱马的谑称，由英文单词《jolly》（“快乐的”、“有醉意的”）和德国人的姓Meier（有“农夫”的意思）组成。——编者注

② 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

③ 看来是勒兹根。——编者注

104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10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急于把巴黎事件[1]的结局通知您，因为我想巴黎人不会给您寄材料去——我们自己在这里也不得不向这伙人强行索取材料。

总之，《公民报》继续由旧编辑部出版，同时，利沙加勒在两个无政府主义者马耳斯和克里埃的帮助下编辑《公民和战斗报》。星期五晚上，《公民和战斗报》为了万达·克里洛夫的一篇小品文企图（通过警察）使《公民报》被没收，原先的《公民报》的所有者、荷兰金融家、现在利沙加勒的合伙人布龙默施坦还曾对该报提出所有权的要求。由于及时得到警告，小品文被撤销，前去没收的警官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星期日，《公民和战斗报》编辑部声明，如果再出现没收《公民报》的企图，它的全体成员（三人）就要辞职。就在那个星期日晚上，《公民报》按照律师建议改名为《两个世界的公民报》后以非法命名被没收，这又是按照布龙默施坦的要求进行的。星期一，更确切地说是星期二早上，该报又以《国际公民报》的名称出版，并且要求《公民和战斗报》编辑部遵守自己的诺言，实行辞职。后者不想这样做。马耳斯和克

① 见本卷第371—372页。——编者注

里埃私下宣称，他们以后无论如何要辞职，但是现在不这样做；克里埃以所谓参予孟索一累明事件[329]的罪名，被逮捕入狱。

当时《公民报》编辑部如果不把报纸改名，每天都要担心遭到没收，所以四天以前已改名为《平等报》，与此同时还要继续出版周报《平等报》。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们已经三个星期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了。况且我们今天连《平等报》也没收到。而法国人卓越的组织天才在我们的朋友那里却恰巧表现为组织惊人的混乱，所以由此还得不出任何结论。

想借助于法官和警察来搞掉《公民报》的企图，撕下了利沙加勒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他是极端愚蠢和卑鄙下流的罕见的结合物。

马克思请您寄一本瑞士工厂法[87]给他。如果您能告诉我们德国现行的工厂法大约是在哪一年通过的，以及这是一个专门的法律还是帝国工商业条例[87]的一部分，我们将非常感激您。这样我们就能设法弄到它。马克思为了出第一卷第三版①需要它，为此他答应有机会时给您寄点什么东西供《社会民主党人报》之用。过几天他就动身到威特岛去，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那里过冬（从这里乘车五六小时到达）。

您的那位加尔西亚先生是许多渺小的民主主义者之中的一个，他们在伦敦这里到处闲逛，参加一切团体。[330]他们的最新领袖，或者如施梯伯所说的主脑[331]，就是狂热民主派的钻营家、在最近的选举中遭到了失败的议会候选人海德门律师。谁也不跟这些小人物走，他们只是相互支持。他们分裂成各种各样的宗派和一帮非宗派的摇摆不定的一般民主派。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在大众面前显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编者注

示自己的重要性。加尔西亚的通讯中之所以大量列举许多并不出名的名人，其原因就在这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不管有多少善良愿望，但是也不乏充当主角的愿望。因此我劝您要非常小心地对待这个人的信件：硬要把一个小集团（它二十年来用过各种各样的名称，采取过许多不同的形式，但仍然如此微不足道）装扮成有影响的党，——他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就是如此。不过，我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存在，不是为了使这些十分卖力的阳萎病患者闻名大陆。附上这些小团体之一的一张入场券，加尔西亚是该团体的书记，不久前他曾请我到那里去作报告；当然，我拒绝了。

以最迫不及待的心情等着关于俾斯麦的材料。如果马克思现在就动身，我就要开始认真地工作，而如果我坐下来进行一项早就应当完成的巨大的工作[①]，那我就不能那么快抽得开身，所以预先通知您，那时候您就只好等一等。假使材料已经在我这儿，我马上就能着手，并且在此以前就能搞完。倍倍尔答应了，但是什么也没有寄来，而现在他又即将坐牢，李卜克内西已经被关进去了[332]，从其余的人那里我更得不到什么了！

附上给考茨基的信。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① 恩格斯显然是指《自然辩证法》。——编者注

105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1882年10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终于着手给你写信了。马克思又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星期，他后天要去威特岛，因此我一直没法安静地做点事。

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我非常喜欢的是第一篇[312]，因为它给了“右翼”的抱怨派先生们以应有的回击，这些先生们甚至不惜接受那些对党来说要比反社会党人法[109]本身还要坏的条件，来争取废除反社会党人法，这无非是想借此重新筹办象《审判报》之类的报纸，从而又得以回到旧日的写作方面的“埃及的肉锅”[333]。我以为，针对这些先生们——文章就是针对他们的——指出下面的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即：接受使党的处境更加恶化的条件，自愿废除反社会党人法是很容易实现的；应当强调指出，靠屈膝乞求的办法我们是很难摆脱反社会党人法的。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也是纯理论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法律将会被那些导致革命而且不久就会到来的事件一扫而光。

第二篇文章我相当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有两、三个人一直在旁边谈话，否则我就会从作者对革命的看法看出法国的影响，同时大概也就认清了我们的福尔马尔。你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334]“都是反动的一帮”[335]这种说法终于在长久期待之后被实现了。这里是所有的正式党派纠合在一起，那里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组

成严整的队伍；一场大决战，一下子就会全线胜利。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刚刚相反，实际上，正如你也指出过的，革命是在绝大多数人民以及正式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因此而被孤立了的政府、并要推翻它的时候开始的；而且只有在那些还能继续存在下来的正式党派在相互斗争中一个促使一个和一个接着一个地垮台以后，只有在这以后，才会出现福尔马尔所谈的彻底分裂，与此同时，我们取得统治权的时机也就来临了。假如我们和福尔马尔一起立刻从革命的最后一举开始革命，那对我们将是非常不利的。

末尾论及新策略的那一段话，我当时没怎么重视，——无论如何，要是人们手头有刑法典，可以在这里找到许多使人坐牢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人偶尔向这方面偏了，这不是了不得的事，因为另一方面偏得也不少。如果说我把这一点看得太轻了，那末我以为你则看得太重了。根据菲勒克在《南德意志邮报》上兴高采烈的情况，你可以看到，右翼在怎样想方设法利用你的反驳。[336]我不认为我们在德国的同志会由于福尔马尔的文章就真的立即接受他的说法。不过对他要求宣布“我们要秘密组织起来”这一点，应当断然拒绝。

我焦急地等待关于俾斯麦的材料，但是现在你们两人[①]正在坐牢[332]，大概，我只好再等一些时候。不过，如果我那时要埋头于另外的、也是我早该动手的长篇文章[②]，那我就不能把它中途搁下，而不得不把俾斯麦往后推了[③]。

在法国，期待了好久的分裂发生了。[78]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

①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恩格斯显然是指《自然辩证法》。——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55—356页。——编者注

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象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也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我希望这封信能在你入狱以前到达你手里。马克思和杜西衷心问候你。马克思的健康正在完全恢复，如果胸膜炎不再犯，明年秋天他的身体将会比近几年以来都好。如果你在《Käfigturm》[①]（在伯尔尼的叫法）碰到李卜克内西，请代我们大家问候他。

你的　弗·恩·

① “塔笼”（监狱）。——编者注

106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巴　　黎

1882年10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请你们定期把每日出版的《平等报》寄给瑞士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他们将寄给你们《社会民主党人报》作为交换。这是不相等的交换——用周报换日报，但对你们方面还是有利的。这可以使《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随时了解巴黎发生的事情，而您自己也明白，一个多少是无产阶级的编辑部不可能订阅所有在巴黎出现和消失的报纸。

到目前为止，《社会民主党人报》获得巴黎消息的主要来源是福尔马尔，他是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以前当过军官，受伤后两腿瘫痪了。他是马隆的朋友，您可以想象，马隆是怎样唆使他反对你们的党。马隆不仅利用了大量的错误，——你们也竟然在这方面帮了他的忙（譬如九月号上发表的莱昂·皮卡尔关于在巴黎的德国人的荒唐文章[337]），而且按照自己惯用的手法向他说了好多谎话。

不过，福尔马尔是个好小伙子，他在德国出版了一本非可能主义的小册子[312]，其观点已使他今后不能再在法国当可能派了。不妨找个机会同他谈谈，并向他指出问题的另一面。我没有他在巴黎的地址，但不难找到。

我正在苏黎世出版经过大量补充的德文版《空想社会主义和

科学社会主义》[338]。我得到书以后将立即给您寄几本去。它大约比您的译本[302]长一倍。是否有可能根据德文版出版新的法文版？

我再说一下，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提供消息对您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伯恩施坦的愿望非常好，但我们不可能从这里让他了解我们自己也常常不知道的事情。最好找个机会写信给他，请他提供点情况等等。这就是马隆用以博得人们好感的和你们总是忽视的无害的方法。我劝您随时想到，巴黎不再是世界的首都 (再也没有这样的首都了)，更不是整个世界。

衷心问候劳拉。

昨天马克思在我这里吃午饭，晚上我们都在他那里吃晚饭并喝罗木酒直至深夜一点，今天他到文特诺尔去了。

完全属于您的　弗·恩·

107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仍未收到校样① (刚寄到，11月3日)。然而我收到了倍倍尔寄来的1882年伤亡事故和疾病保险法案，但不是纯粹俾斯麦社会主义的、未受帝国国会投票影响的最初的草案[183]。我很希望收到的正是这个草案以及另一个有关伤亡事故保险银行的草案；没有

①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

这个就什么都做不成[339]。

收到“波兹南侯爵”[①]，十分感谢。关于其他铁路的详细情况我不需要。有1879年年初或年中（在铁路国有化的某些情况开始为人所知以前）以来的股票行情就足够了；那时和现时的行情的不同足以表明，国家是怎样收买资产阶级的。

从许多方面来说，拉萨尔都是一个好的法学家，并且对罗马继承法有足够的研究，能以自己的知识博得法学家的敬佩（这是他喜欢用的说法；在英国博物馆参观罗塞达碑[340]的时候，他对马克思说：“你看怎样，我是否值得花半年功夫博得埃及学家的敬佩？”）。在德国，如果某人从一定的理论观点出发对某一点有所发展，这就足够了，并且法学家现在忘记了，拉萨尔所发展的理论，是逐字逐句地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中剽窃来的，况且在运用于罗马继承法时这种理论还是不正确的；罗马继承法不象黑格尔所说的是从“意志”中发展而来的，而是从罗马的gens即氏族家庭公社的历史中发展而来的，关于氏族家庭公社，大部分法学家也都知道得不多。其实，我只是想说，我得破除那种说拉萨尔是有创见的思想家的神话[②]，而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不知道《无产者报》上刊登的拉法格的信[③]，我打算向巴黎方面去要报纸，但未必能从那里得到。如果报纸还在您那里，请给我寄来。我会还您的。总之，马隆应该当心点：拉法格那里有一堆他写的有损其名声的信。

---

① “波兹南侯爵”（《Marquis-Posener》）是勃兰登堡—波兹南铁路公司（Märkisch-Posener Eisenbahngesellschaft）在交易所的外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61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99—100页。——编者注

皮卡尔的荒谬文章，当然，在《公民报》上被宣布不予赞同[337]，马克思本人看到过。不过，那个给您寄去文章，并用蓝铅笔在一些地方划了着重号的人并不懂法语；他把皮卡尔借甘必大领导的……爱国主义同盟的……资产阶级剥削者之口说出的话当作《公民报》沙文主义的表现而加了着重号！我把这段话用红铅笔打了着重号。皮卡尔喜欢做盖得的反对派，因此他塞进这篇文章，以捉弄盖得；如果那里是一个正正经经的编辑部，就不会刊登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

现在来说说“《公民报》编辑们在果达尔问题上极不体面的举动”[105]。我们偶然之中清楚地知道了这件事情；在巴黎，无论是当事人，或者完全是局外人，都不止一次地向马克思讲过这件事。在某次会议上发生了那个事件之后，果达尔来到《公民报》编辑部，盖得对自己过去的无政府主义伙伴仍有点私人感情，在那里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在心平气和的谈话之间，果达尔突然毫无理由地打了盖得一记很重的耳光。其他人都跑过来。果达尔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胆怯退缩到角落里：人们还不至于会虐待他这个俘虏吧！而幼稚的《公民报》工作人员，没有狠狠揍他一顿，却进行劝说并且决定，应当真的把他放走，因为他是俘虏！！可惜果达尔就这样没有尝尝棍棒的滋味，趁机马上跑掉了。但是第二天晚上，明知大多数编辑不在，十二个武装的（拿着粗棍子等等）无政府主义者闯入编辑部，并以种种威逼手段要求赔罪。然而马萨尔态度强硬，他们便只好什么也没捞到就走了。而中部的联合会[247]立刻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它好几个晚上都派了工人保卫编辑部，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现在我倒要请您告诉我，“极不体面”等等究竟在什么地方。

从您的信的整个内容我得出的结论是，您没有定期收到《公民报》，因此，您除《平等报》和《无产者报》以外，必然局限于在巴黎的同志的报道，而这些同志自己所采用的完全是马隆及其同伙的消息，并且看样子对他们表现了相当轻信的态度。但是，党的机关报主要是受身处异国首都的同志——他们又是常常变动的——的影响来判断另一国家的工人运动，依我看来，这无论如何是不应当容许的。在国外的德意志协会，无疑是关于国外运动的消息的最坏来源。它们往往不能了解运动的全貌；它们多半只局限于一些狭窄的固定联系，因而不能跟上周围运动的步伐，并且，即使它们的影响等于零，它们还是认为，到目前为止，它们比起德国本国的群众来仍是了不起的。假如我们对此地协会[159]的不稳定的多数的意见哪怕是稍加考虑，难道我们能够自由地判断英国的运动或非运动吗？在纽约的德意志协会不就是那样不加批判地对待美国工人运动的吗？每个协会首先要求的是别人承认它的作用，因此，如果它没有一个很有魄力又很有理智的领导，就容易堕入外国那些玩弄诡计的人的罗网。

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如果《公民报》去年夏天的销售量为二万五千份，并取得了那样的地位，以致使利沙加勒为了夺取它[①]竟拿自己的名誉下赌注，那末，这在一定程度上毕竟好象同流传的所谓威信扫地的情况相矛盾。但更

① 见本卷第371—372页和第375—376页。——编者注

加同这点相矛盾的是这个事实：威信扫地没有妨碍这些人享有这样的威望，即他们被驱逐出《公民报》以后，当天就创办了一家新的大型日报[326]，几乎完全靠工人和小资产阶级（ouvriers et petits indus- triels，—— 拉法格语）的支持使该报整整两周免受旧《公民报》所有者①的阴谋诡计的破坏，并已经找到一个资本家，他们明天就要同他就报纸②问题最后达成协议—— 行还是不行。在这样雄辩的事实面前，马隆大概只好把自己的“威信扫地”留给自己。而马隆先生本人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致当他请求罗什弗尔给他在《不妥协派报》上发表的文章增加稿费时，那人答复他说：“如果您写得少些，我会付给您多些”。让马隆试试口袋里一文不名能否在巴黎创办日报，以表明他享有怎样的威望！

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吧。我请拉法格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寄《平等报》作为交换③，他今天写信给我说，他将这样做，因此请您也给《平等报》编辑部寄《社会民主党人报》。如果您将来没有按时收到《平等报》，您只要写几个字—— 发个明信片就行了，通讯处是：巴黎波尔—罗亚尔林荫路[66]号保·拉法格。

至于福尔马尔的文章[312]，第一篇写得很好，很有说服力，它把矛头指向那些叫嚷不惜任何代价废除反社会党人法[109]的人。第二篇文章我只是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我正准备出发并且身边有三、四个人在闲谈。否则，对于他在文章末尾要求党采用过分粗暴的语言，我不会象实际上所做的那样，掉以轻心。在这个问题上，倍倍尔是正确的[334]，但是我认为，他对于这一点看得太重了。第二篇

① 布龙默施坦。—— 编者注
② 《平等报》(日报)。—— 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81—382页。—— 编者注

文章的真正缺点（我虽然发现了这个缺点，但没有重视），在于幼稚地设想即将到来的革命应当从整个世界分为两军开始："这里是韦耳夫派！这里是魏卜林派！"[341]；一方面是我们，另一方面是整个"都是反动的一帮"[335]。这就是说，革命应当从第五幕开始，而不是从第一幕开始，—— 第一幕是一切反对党共同反对政府及其弊端，从而取得胜利，在这以后，在胜利者当中，一些政党一个接一个地被淘汰，退出舞台，这就会最后使人民群众完全转到我们方面来，到那个时候，福尔马尔的有名的决战方能开展。但这一点在这里是次要的，文章的实质在于证明如果按照"右翼"先生们的愿望行事，当然我们可以摆脱反社会党人法，但党要接受比这个法律本身更坏的条件，不过这些先生们又可以出版象汉堡《审判报》之类的报纸，并把这些报纸冒充为党的机关报。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福尔马尔，这个看法我也写信告诉了倍倍尔①。

昨天我邮汇给您（里斯巴赫旧公路137号）十二先令即十五法郎十生丁，交付我和马克思的订阅费。请告诉我下次付款的日期。

祝贺报纸印数接近七千份②！

您的　弗·恩·

经您修改之后，序言③中提到有关维登代表会议[342]的任何话都是多余的，因此我把它删去了。请寄给我两份校样④。已校好的我将在今天或明天寄出。

---

① 见本卷第378—380页。—— 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印数。—— 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初版序言》。—— 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 编者注

10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1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谨向您肯定敝函昨日已发，并荣幸地奉告，本月1日尊函已妥收无误，勿此作复。”您看，旧的公文格式尚未完全忘记。

立即给您写信，以便使您省去许多多余的麻烦。感谢您盛情地找到并寄给我们所有这些书籍，但“目前我们实在不能利用它们”。问题在于，在第三版[①]中，马克思只想修改和补充有关工厂立法现状的材料，为此他需要这些法律的准确的文本，别的什么都不需要。无关紧要的东西，诸如劳动保护条例、责任条例等等，对于这一目的没有任何意义。至于我写论述俾斯麦的著作[339]还需要的东西，我昨天已写信告诉您，这就是不久前国有化的六条铁路从1879年年初或年中以来的股票行情和俾斯麦的伤亡事故保险等法案的第一稿。如果我需要即将问世的扎林格的最新出版物[②]（我很感谢您提醒我注意它），我在四、五天内能在这里搞到。

非常感谢您告知有关加尔西亚的情况；说不定在什么地方还会遇见他。他对于某些工联领袖为在拉芒什海峡铺设隧道进行鼓动一事所发表的议论，是完全正确的。那全是一批始终甘愿卖身投靠（摩里手下的）激进资产阶级的人；—— 这一次，《劳动旗帜

① 指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 编者注
② 《1883—1884年扎林格氏交易所年鉴》。—— 编者注

报》编辑乔·希普顿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隧道修筑公司犒赏这些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不会纯粹出于热情去花旅费等等。固然，这一切确实是无辜的，但希普顿现在毕竟尝到了资产阶级的金钱的滋味，而且由于他毫无骨气和沽名钓誉，这可以使他走得很远。童贞已失，那末其他老奸巨猾的“工人代表”可能很快就会使他完全俯首听命。

我愿意相信，巴黎方面正在纷纷给您寄去支持马隆和反对盖得的信件。但您援引的那个记者自己暴露了他在这件事上不是个内行，他声明他是受了当时对德国人的激烈攻讦的影响而写的，并指责您履行自己作为党机关报编辑的职责，即批判地和概括地“鸟瞰”全部问题，而不象他自己那样，为一时的和地方性的事件所支配。而如果这个人两个月过去了仍旧为那篇倒霉的文章[①]纠缠不休，如果他仅仅根据这么一件事就给一个重要的工人派别下结论，难道党的机关报也应当那样狭隘吗？如果在巴黎有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和半社会主义的工人向可恨的德国人发泄自己的沙文主义，难道《公民报》应对此负责吗？无论如何它的责任不会大于在巴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下列事实所负的责任：在巴黎、伦敦、纽约和美国其他一切大城市有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到紧要关头时，他们同意减少工资，从而使当地工人（在美国甚至有爱尔兰人！）的工资降低，因此给德国工人群众造成并不十分冤枉的坏名声。最后，如果他对那篇文章这样厌恶，为什么他不反对它呢？这篇文章已经被宣布不予赞同——诚然，是以相当缓和的形式，——但马克思告诉我说，依巴黎的记者们看，这是完全

① 见本卷第384页。——编者注

过得去的方式，当地任何一家报纸对待犯了过失的编辑，只要这家报纸没有受到压力，通常就是采取这种方式。而本来是可以施加这种压力的，并且很简单。只要写封抗议信，并由某人或某代表团把它交到报纸[①]办事处，编辑部就不得不严肃对待了。假使值班编辑（可能就是皮卡尔本人）加以阻挠的话，那么只要威胁一下说，如果《公民报》明天不刊登这封信，这封信当天就要送到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去，这就足够了。也许您的记者的法文不够好，那可以去请教福尔马尔；福尔马尔不在时，希尔施是会乐意帮忙的。如果这些人这样做，就会受到尊敬并使《公民报》得到有益的教训，而我也会为此感到高兴。但起初象绵羊般驯服地忍受一切，而后却唉声叹气——这纯粹是德国的作法，并招来了对德国人理所当然的鄙视。如果我们竟然容忍来自法国人和英国人方面的这类东西，如果我们的人在德国也这样没有骨气，这会给我们造成什么结果呢？在巴黎的德国社会党人在要求党的机关报重视他们关于法国运动的意见之前，首先应当证明，第一，他们总的来说能够不抱成见地和毫不偏袒地进行批评，第二，他们在法国人面前能捍卫自己。过去在这里这两点都不具备。

您说在巴黎出版日报有害处，我不能同意。周刊在巴黎只能对狭小的范围发生影响；为了影响群众，应当有日报。我们也曾反对过出日报，因为那时没有任何机会弄到一家日报并且那时发生了把《解放报》迁往里昂[218]的幼稚做法。现在情况不同了。《公民报》使自己和自己的编辑在巴黎出了名，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报纸不得不同它进行论战并且都被击溃了，如果我们现在失去这

① 《公民报》。——编者注

家日报，便是一大失败。下面的事实同这一点丝毫没有矛盾：报纸不可能是理想的、十全十美的，它的由整个委员会进行编辑工作的虚假民主，常常造成事实上没有任何编辑部，就象刊登皮卡尔的文章时的那种情况。但是拉法格不久前给我寄来了约二十号谈到分裂问题[78]的报纸，除了早就受到斥责而且在周报上也可能出现的某几点之外，我根本没有发现报纸就那么糟糕。任何熟悉巴黎报刊情况的人事先都会说，每周出两次的报纸，是不可思议的，它将是个死胎。要么是周报，要么是日报。《公民报》迅速变成了日报《平等报》（它现在在巴黎的销售量已超过五千份），这表明，前《公民报》编辑部现在肯定有很大的把握出版日报。

现在谈谈克列孟梭的群众大会。用德国的尺度来衡量这件事以及巴黎其他事件，是根本不行的。当选民不让甘必大在他的选区讲话[13]时，所有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报刊都感到兴高采烈。现在在克列孟梭身上发生了同样的情况[343]。克列孟梭是个冷静的、谨慎的人，他完全愿意继续前进，如果他认为有这种必要的话；他甚至愿意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如果能够说服他这样做的话："请说服我吧！"他的选区的工人便采取非常有效的说服办法，向他指出，他的议席非常不稳。这也许会促使他懒洋洋地去研究一下社会主义。

但是，干这种事的人究竟是谁呢？仅仅是盖得及其同伙吗？不，要知道会议的主席是若夫兰，他是马隆的朋友，克列孟梭在蒙马特尔的选举中的未来的对手！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时象平时一样，举止那样彬彬有礼，竟投票选举马隆派的主席，并且同马隆的拥护者一致行动。如果工人的行为应当受到指责，那末这种指责在更大的程度上应当针对马隆的拥护者，而

不是针对盖得的拥护者。

《公民报》上的话无非是说，这种反对克列孟梭的策略今后还应当保持下去。既然这种策略是成功的，为什么今后不继续采用它呢？我原来想看一看，《无产者报》能否在会上对《平等报》采取以牙还牙的态度。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可以使我作这种推测的任何理由。但即使现在发生这种事情，这也毫无意义并且未必会长期继续下去。

现在要赶快在邮班出发以前——否则这封信要到星期一早晨才能送走——对您筹划的修改纲领的运动说几句话。我认为这是非常不适时的。纲领不好，但谁也没有再谈这件事了，修改纲领应做得无懈可击。所以，当不能公开选举代表时，也就是说，当不能对任何代表资格证提出异议时，如果不是十分必要，最好不要触及纲领。修改纲领会使右翼有借口把自己装扮成真正捍卫党的原则、忠于经过考验的旧纲领等等的人。在把这个纠纷的苹果抛到被捆住了手脚的党里来以前，请好好考虑考虑。

一切政治侨民的最大危险就是渴望行动：该发生什么事吧，该干点什么事吧！于是就去干些他们并不明白其意义，后来他们自己才确信最好别干的事情。也许您和福尔马尔也有点渴望行动的毛病吧？此后对于这种事您可要当心啊！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马克思在文特诺尔，即在威特岛[80]上，他感觉良好。

109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1882年11月9、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劳动旗帜报》我已订到12月3日，付了四先令五便士，并已通知希普顿把以后的全部收据寄给我。所以，如果你想停止订阅，那就快些告诉我。

马克思在这里住了三个星期，身体好多了，现在他需要的只是呼吸新鲜空气和注意保重。他的一些次要的病已经好多了，明年夏天有把握治好。主要的是今冬不能让胸膜炎复发，因此他到威特岛的文特诺尔去了[80]，我刚才收到了他从那里寄来的短信①。如果条件允许，他将在那里很好地从事第三版②的工作，并且可以指望，并不需要他花费太多的时间。总的说来，他精神很饱满，情绪也很好，如果到明年秋天以前一切都很顺利，他的健康将会比最近几年都好。

感谢你告诉我关于利林塔尔的消息。现在我对此人已经非常了解，就象从小学起就已同他相识一样。

我高兴地得知，你的阿道夫③情况很好；但愿他很快就会找到

---

① 见本卷第100—103页。——编者注
② 指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
③ 小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

使他能迅速上进的道路。他的来信我都收到了，可惜，象许多其他信件一样，我还没有给以答复。

赫普纳——是个真正倒霉的人，他在进行抨击时，譬如他反对舍维奇时，尽抓些鸡毛蒜皮的事。谁会这样赞赏“德国文化”！他首先应当了解美国文化。而这正是典型的德国作风。这么一个从德国外省小市镇出来的人，立刻就想教训美国。不过美国将会“驯服”他，但因为他有才能，并且也还算机灵，所以可能还是很有用的人。

11月16日

瞧，这是怎么搞的。这封信一个星期以前我写了半截，到今天才继续写，但愿能够写完。

拉法格从春天起就在巴黎，他的妻子[①]随后于夏天到了他那里。她和马克思一起到斐维[72]呆了一个月。事情是这样：马克思起先在阿尔及尔[42]，之后在蒙特卡罗（摩纳哥）[47]，在这两个地方，他的胸膜炎都复发了。以后他到阿尔让台[57]龙格那里住过，从那里去邻近的恩吉安用硫矿泉水浴治疗他的慢性支气管炎。后来他到了斐维，最后回到这里。

你知道，拉法格（在我的大力帮助下，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向他自己的妻子学习德文）用法文出版了我的《反杜林论》的三章（引论，和第三编《社会主义》的前两章），冠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题目。这本小册子在法国很受欢迎。多数人懒得读象《资本论》那样厚的书，因此薄本小册子的作用快得多。我现在要把这本小册子作一些解释性的补充用德文出版[302]，

① 劳拉·拉法格。——编者注

手稿已经在苏黎世，第一印张已经印好了。小册子一问世我就给你寄去。同时你们那里有一个 in utraque lingua[①]给美国群众作启蒙工作的斯蒂贝林博士。这个人充满着美好的愿望，但没有理论的头脑，因而相当混乱。

《平等报》现有每天出一次的和每周出一次的。每天出一次的（它代替《公民报》，我们的人被用财政手腕从该报排挤出来了[②]）能否维持下去，要看和一个有钱的先生的谈判成功与否。《社会民主党人报》对我们的人和马隆之间的分裂，反应过于软弱。但老奸巨滑的马隆（巴枯宁秘密“同盟”[30]十七个创始人之一）很善于谄媚逢迎，因而骗取了在巴黎的德国人的信任，再加上我们的人干了一些糟糕透顶的蠢事，结果现在巴黎人拚命对苏黎世施加压力。此外，连李卜克内西从这里路过巴黎回家时也和马隆来往。如果拉法格和盖得不再干太大的蠢事，《社会民主党人报》我还是能对付的。

问候阿道夫。

你的　弗·恩·

① 直译是：用两种语言（即用希腊语和拉丁语）；这里是指用英语和德语。——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71—372页和第375—376页。——编者注

110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　　敦

1882年11月[①]10日于 [文特诺尔]
圣博尼费斯花园1号

我亲爱的小杜西：

总的来说，我绝不能抱怨文特诺尔。天气反复无常，狂风暴雨，时而多雨，时而干燥，时而晴朗，时而寒冷，等等，但尽管如此，很少有雾，有充足的新鲜空气，除了不多的几天以外，通常一天总有几小时适合长时间散步。昨天和今天的天气相当凉，但从十一点到两点，在海滨 (孩子们常在这里玩耍，他们使我想起可怜的哈利) 和在我们散步的悬崖下面，直到火车站，甚至到小山岗，都不缺阳光！

亲爱的孩子，你不应当忘记，我决不是在身体好的情况下到这里来的。相反地：几乎连续不断的痉挛性咳嗽，多痰，以及近两周以来夜间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 决不是良好的自我感觉的征候。这不可能在一天内发生变化，但是必然会向好的方面变。

实际上，我还是很方便的，在我收到 (今天) 唐金医生从伦敦寄来的药方之前，我就去找威廉森医生看了风湿病。不过，风湿病的患处离胸膜炎复发的老病灶很近，以致威廉森医生只是经过仔细听诊和叩诊以后，才使我确信，自从唐金医生最近的一次检查以

① 原稿为："2月"。—— 编者注

后，一切正常。咳嗽减轻了，但威廉森今天（第二次）来看我时劝我再服一种药；他说，这种药能使我更快地过渡到只须多吸新鲜空气和在户外作长时间的散步便可望完全恢复健康的阶段。

不过，我现在还没有开始真正工作，而是在做各种准备。

你那里有没有威廉·兰伦德的《庄稼汉皮尔斯的控诉》，如果没有，你能否替我到弗尼瓦尔那里去弄到一本，或者，书不贵的话，看能不能从“古籍”[①]发行的书中买到一本。

然后请看看，你能否在一套（旧的）《平等报》中（我指的是以前的《平等报》周报）——放在我床旁的桌上——把巴黎官方经济学家称赞对欧洲来说是廉价的华人劳动的那篇文章[344]，更确切些说是报道，给找出来？有一期以前的马隆的《评论》[②]（摆在沙发后面我的一个书架上）所讨论的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个关于华人劳动的问题。如果是，而又找不到《平等报》，你能否把这一期寄给我。

我的琼尼在做些什么呢？不再咳嗽了吗？问候他和琳蘅。你的身体怎样？

我终究要给可怜的小燕妮[③]写封信。我很难过；担心她承受不了这个重担[④]。

祝好。

老尼克

① 指“英国古籍学会”。——编者注
② 《社会主义评论》。——编者注
③ 燕妮·龙格。——编者注
④ 即面临的分娩。——编者注

111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1882年1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今天下午三时收到您的电报，我当即回电说："不可能"。因为当时我手头没有您的地址，我想，既然"回电费付讫"，发报处会知道把回电发往何处，所以我的电报只写："维也纳，考茨基"。而刚才，即晚上九点半，我收到了附来的条子。要找出那封有住宅地址的信是不可能的；我能做到的一切，就是马上给您写信，以便不致错过早晨的邮班。

为了不再象我过去多年以来那样分散自己的精力，我应当把自己的撰稿活动局限在一个最狭小范围内——只限于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而且只有在实际上有必要的时候，或者在必须——象不久以前回答梅林的荒谬行动[62]时那样——表明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敌对情绪的时候，才给它撰稿。由于马克思患病和外出，同各国党的全部通信工作完全落在我的身上，这对我本来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如果我想要在晚年完成自己的比较巨大的著作[345]，我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参加您的杂志①的工作，当然，我祝它获得各方面的成功。

我现在尤其不可能写一篇论述达尔文的文章。我曾写信对伯

① 《新时代》。——编者注

恩施坦说过，将来在我写作过程中接触到这个题目时，他是会收到这样一篇文章的；不过这还不是一个月能够做到的，这部分地是由于他的过错，因为他自己鼓励我写完全属另一个领域的著作，我自己也认为这更加必要[①]。因此，在我把这件事做完，并且重新回到自然科学，搞起动物学来以前，写文章的事根本谈不到。如果我写一篇泛泛论述达尔文的文章来敷衍塞责，这不论是对您还是对我都没有好处。因为时间已经晚了，所以我只能感谢您告诉我关于当地情况的有趣的消息，最后，对您的订婚[②]表示衷心的祝贺。

忠实于您的 弗·恩·

11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1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首先十分感谢您送来关于国有化铁路的资料。这完全够用了。[346]我从倍倍尔那里得到了1882年伤亡事故和疾病保险法案，不过我还需要1881年的相应的法案[183]的最早文本，恰恰是在这一文本中俾斯麦对穷人的突如其来的同情表现得最为充分；在第二种文本中，资产阶级议员的投票已经大大地钳制了他，所以这已经不是完完整整的俾斯麦了。

① 见本卷第355—357页。——编者注
② 同路易莎·施特腊塞尔订婚。——编者注

《工人呼声》以前马克思收到过，但大概是没有续订，所以现在不再给寄报纸来了。

福尔马尔的文章[96]，除了几处次要的地方以外，纯粹是重弹马隆的旧调[347]。1871年以来法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在这里完全被歪曲了，这本来是不应该轻易放过的。例如在第二篇文章中责备盖得没有参加一些小集团（后来由那些小集团发展成了《无产者报》或纯粹的合作社派，他当时恰恰是同那些小集团作斗争的）！似乎后来的《无产者报》派总的说还接纳了一个“非工人”！而主要的歪曲就是杰维尔在11月19日的《平等报》上（《创刊五年》——《平等报》的历史）所正确指出的那一点：在几次代表大会上为“集体主义派”纲领进行的斗争和在1879年马赛代表大会上这一纲领的胜利[99]。关于这一点福尔马尔只字不提。我不能设想福尔马尔是有意进行这种捏造，但同样难以理解的是，他怎么能不知道这一点，而且他关于法国工人运动史的全部知识怎么能只限于马隆认为有必要告诉他的那些东西。

他只字不提马赛代表大会，是要隐讳一个重要的事实：法国工人党在三年以前承认了集体主义派纲领[92]，所以马隆背离这一纲领肯定是倒退了一步。既然必须使我们在德国的人对法国运动的历史不要了解成这个样子，即似乎它应当是按马隆的当前需要那样发展的，而是要了解它的实际进展情况，所以这一错误非纠正不可。据我看来，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利用上述杰维尔的文章，这正是因为它毫无论战的性质。如果您那里已经没有这篇文章了，请用明信片通知我，我便立即把它寄给您。

不过，让马隆小心点吧。假使我们要象他通过福尔马尔描绘盖得的活动那样，对他的事业和功绩详细地，但更准确地加以描

绘，那他就会狼狈不堪。我们还保存着他反对1871年3月18日起义的全部文件。他参加运动是在事后，是在事情的进展好得出乎他的预料的时候。

至于两个派别的力量，我已请拉法格写信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348]罗昂派在巴黎有十五个小组，在这些小组的帮助下，《平等报》维持了整整一个月，这无论如何是很能说明他们的情况的。在外省，据拉法格说，他们有很大的势力。北部联合会[349]实际上支持他们，它不愿意干预巴黎的纠纷，但忠于旧的集体主义派纲领，而且在自己的《苦役犯》的第1页上刊载了这个纲领。罗昂派最近将在鲁贝召开有北部的全体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而且与北部联合会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另一家外省的工人报纸《南特的被剥削者报》，也在第1页上连同导言一起刊载了旧的纲领，转载了《平等报》上的一些文章，杰维尔是该报的撰稿人。这样，外省仅有的两家工人机关报都站在罗昂派一边。在外省，如不把北部计算在内，凡有工人组织的地方——兰斯、厄皮纳、里昂、整个阿里埃煤矿区、波尔多、昂古列姆、罗什福尔——我们到处在打击可能派，他们只是在布列塔尼和马赛还有点势力。

马隆以他自己的没有纲领的绪论这一施给乞丐的稀汤吸引着许多人，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如果建立一个没有纲领的党，一个谁都可以参加的党，那末这就不成其为党了。受到马隆和福尔马尔如此青睐的老宗派主义者，多年来已证明自己毫无力量，最好是让他们安然死去。至于工团，那末，如果把每一个同英国工联一样，只为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而斗争，根本不关心运动的罢工协会，——如果把所有这些协会都列入工人政党，那末实际上会组成一个维护雇佣劳动，而不是消灭雇佣劳动的党。正如马

克思告诉我的[①]，巴黎的这些工团多数甚至比英国工联更次。为了迎合这些人而放弃任何党纲，是不能带领他们前进的。真是闻所未闻：一个没有纲领的党，一个这样的党，根据它的含含糊糊的绪论（完全是按照也相信共产主义可以在五百年以后实现的“共产主义者”米凯尔的精神制订的[350]）势必得出结论，每一个小组都可以制造它自己的纲领！

可是，工团对马隆有什么好处呢？它们不缴纳会费，它们不派遣代表参加联合会理事会，它们在分裂以前只是名义上属于联合会联盟[247]，而且现在也只是名义上还属于那个联盟；它们的作用，正象拉法格说的那样，纯粹是柏拉图式的。它们在这里只是充当配角。马隆的其他小组的情况如何，从下面拉法格的一段话可以看出：

“在第十七区，我们的朋友在代表大会以后组织一个小组，马上就有二十九人参加。为了同我们捣乱，可能派把他们的一个我听说总共只有二十个人的小组分成五个小小组，统一于地方的联合会委员会。手法颇妙，但这只能欺骗局外人和远离此地的人。”[351]

巴枯宁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据拉法格说，可能派只是在蒙马特尔才真正有些势力，并且在那里也组织得很好。

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我们一辈子都处于少数，我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巴黎的组织数量不多（果真如此，我还不理解可能派为什么不敢出席罗昂派关于两个代表大会[352]的辩论会），这可以由于报刊的影响而一倍或两倍地得到

① 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

弥补。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的巴黎记者们怎能认为圣亚田派是“真正的工人政党”，我真是无法理解。首先，这帮人根本不是什么党，更不是什么工人政党，就象此地的工人一样。但是他们在一开始就象此地的工人一样完全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把他们联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工人的纲领。那些为激进派搜罗一批工人选民的工人领袖的行为，在我看来，是直接的背叛。

为了取笑，我还根据您的意见问了关于果达尔的事[353]。这位果达尔同他的老师马雷一样，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在土鲁斯的机会主义报纸上撰稿。按照任何惯例，而不仅是按照巴黎报界的惯例，拒绝刊登这样一个人的所谓反驳文章，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的朋友又干了一件最大的蠢事，在报纸①的生存还没有保证的时候，就以自己的最最革命的吹牛给自己招来了迫害。您知道，盖得已经被捕，大概，随后就该拉法格了。假使这两个人都去坐牢，那就会失去最积极的—— 不仅是作家，而且是组织者。杰维尔懒惰，马萨尔当编辑部秘书倒不坏，但是要在困难的条件下保存报纸，这两个人恐怕不行。其他三个人我就不去说了。老公社社员布里萨克和布伊宁可说是个累赘，而皮卡尔是一个平庸的记者。

您根本不要相信，似乎盖得和拉法格想要使所有的组织“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这是全部巴枯宁的策略的一张惯用的王牌，在法国，当没有其他论据的时候，也总是经常把它抛出来。

---

① 《平等报》。—— 编者注

《平等报》同国外的关系！您只要了解这个编辑部的混乱和它的德语水平就知道了！要是将来拉法格被释放了，您最好直接给他写信——他至少会去做需要做的一切。任何别的主意我出不了。

如果您想要利用小册子[①]的内容摘要，这我完全同意。结尾的文章[②]您现在很快就能收到。施米特事件好极了。[354]波拉基早就在伦敦设了一个私人警察所；在姓名地址簿上它被列在调查局（共有十八个）当中——波拉基，伊格纳齐乌斯·保罗，西区帕丁顿草坪13号（离我很近），《外国警察报》记者。

但愿我对印数[③]将达七千份所表示的祝贺又迟了。不过今天可以祝贺我六十二岁生日。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113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2年12月14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我昨晚九点半收到你的来信，哪怕是写几个字赶今早的邮班寄给你也来不及了，因为这里九点以后投递的寄往外国的信件要到次日晚间才送走。

---

①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③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印数。——编者注

《平等报》同国外的关系！您只要了解这个编辑部的混乱和它的德语水平就知道了！要是将来拉法格被释放了，您最好直接给他写信——他至少会去做需要做的一切。任何别的主意我出不了。

如果您想要利用小册子[①]的内容摘要，这我完全同意。结尾的文章[②]您现在很快就能收到。施米特事件好极了。[354]波拉基早就在伦敦设了一个私人警察所；在姓名地址簿上它被列在调查局（共有十八个）当中——波拉基，伊格纳齐乌斯·保罗，西区帕丁顿草坪13号（离我很近），《外国警察报》记者。

但愿我对印数[③]将达七千份所表示的祝贺又迟了。不过今天可以祝贺我六十二岁生日。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113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2年12月14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我昨晚九点半收到你的来信，哪怕是写几个字赶今早的邮班寄给你也来不及了，因为这里九点以后投递的寄往外国的信件要到次日晚间才送走。

---

①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③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印数。——编者注

为什么我不早些给你写信呢？因为我没有什么令人快慰的事值得告诉你，而你已从将军的信里知道，我自己觉得身体不错，只是患了气管卡他被软禁了两个来星期，但胸膜炎或支气管炎没有复发。这是令人极其快慰的事，因为大多数和我同时代的人——我指的是和我年岁相同的人——现在已纷纷入土。世上有的是壮驴，还要珍惜老驴的生命干什么呢？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保尔写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①]，既幽默又泼辣，既扎实又生动，而在这以前往往出现一些极端革命的词句，使我看了生气，因为我始终把它们看作“夸夸其谈”。我们的人最好把这类专长让给那些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实质上是现存秩序的支柱，而根本不会带来无秩序——他们生来就是蠢才，——混乱不是他们的过错。现时他们为“暗检室”[355]这一“社会灾祸”效了劳。他们最坏的是，甚至最客观的“法院侦查员”——假如世上有这种侦查员的话——也不得不公开宣布：他们是绝对“没有危险的”！假如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不是这样极其“无辜”，人们可以宽恕他们的一切！但他们决不因此就是“圣徒”。亨利七世（他战胜了理查三世）请求一个教皇[②]把亨利六世列为圣徒，这个教皇说了句很恰当的俏皮话，他回答说：“无辜”（即“白痴”）还不足以尊为“圣徒”。[356]

我的孩子，无论如何你在这里会遇到比在其他多数地方——包括法国和意大利——更好的天气。我住在这里象个隐士一样，除了威廉森医生外，谁都见不着，同他见面的每一分钟都觉得十分

① 见本卷第115页和第408页。——编者注
② 尤利乌斯二世。——编者注

可贵。

总之，孩子，只要你的义务允许你 (因为，用法国的雇佣文人的话来说，保尔同当局的光荣斗争引起人们的同情)，就到我这里来住吧！

有几本在神圣的罗斯而不是在国外印刷的新出版的俄文著作[357]证明，我的理论正在那个国家迅速传播。不论在什么地方我所取得的成就都不会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

你的 尼克

115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2年12月15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派尔希[①]在昨天晚上七点钟以后才把钱送来，所以在今天以前什么事也办不了 这里附上一张五英镑的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它的号码我已记下来了，现冒险把它立即全部寄出。

毫无疑问，在此以前，至少是现在，你对保尔[②]的命运[97]已经清楚了。我相信，现在他重新获得自由了，即使还没有回到巴黎。不过我担心蒙吕松的波拿巴派和其他保守派法官会让他们[③]每人

① 罗舍。—— 编者注
② 拉法格。—— 编者注
③ 拉法格和盖得。—— 编者注

过几个月的“隐居生活”。很明显，政府打算在巴黎明目张胆地实行迫害以前，先在外省制造一些先例。因此，蒙吕松的检察机关已着手办案——既然已着手办案，那法官就一定会使之达到预期的结果——，其目的仅仅在于挽回审判官们的声誉。既然这一案件肯定会提交违警法庭审理，那末，就甚至不可能产生在由陪审法庭审理的条件下还可能产生的那一点点疑问。

短期监禁本身将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其实，我认为，它给保尔带来的好处多于坏处。不过，他们的期限大概正赶上《平等报》最需要保尔和盖得他们两人的时刻。而最近以来报纸大有改进。这也许是巴黎的生活同积极的撰稿活动相结合的结果，不管怎样自从保尔克服了学者先知的那种教条主义，并开始机智俏皮地写文章以来，最近他的文章写得好多了。关于候选人崩图的那篇文章[358]很吸引人；但是我觉得其中处处可以发现女性手笔的痕迹。关于中了魔的部（我忘了法文标题）那篇文章[107]，也给人以同样的印象，这篇文章摩尔也特别喜欢①。现在，假使保尔和盖得要坐牢，报纸就会失去灵魂。杰维尔只是偶尔显得机智有趣；一般说来他并不笨，但是呆板，有学究气；马萨尔是善良基督教徒的反面，因为他是一个肉体愿意而心灵（esprit）软弱的人。这样，我不得不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得出结论说，在报纸处于财政危机的情况下，保尔和盖得恰恰是最需要的两个人。因此，恰好现在，即在无政府主义者大肆吹牛的时候，在同他们的最最革命的姿态进行竞争的时候，如果保尔和盖得被置于这种困难境地，那将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① 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

无论那里情况如何，我希望你站在自己三十年的高度来沉着冷静地看待这些小小的痛苦，就象在波拿巴将军入侵时，金字塔站在自己四千年的高度沉着冷静地看待法国军队和波拿巴本人那样。

燕妮[①]的情况怎样？她好些吗？我在梅特兰公园[②]很少听到她的消息，连她们[③]自己也知道得不多。

热爱你的　弗·恩·

116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1882年12月16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早就盼望弄得一些钱，以便再给你寄五英镑，昨天我终于弄到了，当晚你的明信片也来了。因此，我立即给你邮汇了所说的五英镑即一百二十六法郎，但愿你能按时收到这笔钱。

我很高兴地得悉，你已经摆脱了所有州里的和市里的无谓事务——这种事情简直是白白浪费时间，从这当中，除了诽谤和无谓的烦恼而外，什么也得不到。顺便说一下，索拉里这头笨驴还是每次给我寄两份《先驱者》。那里的发行工作真不错啊！

无政府主义者每年都自杀，每年却又死灰复燃。只要没有开

① 燕妮·龙格。——编者注
② 伦敦的一条街，马克思一家住在这里。——编者注
③ 爱琳娜·马克思和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始对无政府主义进行真正的迫害，这种情况就会继续下去。这的确是通过迫害可以消灭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宗派。无政府主义之所以经常复活，因为总是有一些好出风头的人追逐廉价声誉。无政府主义似乎就是专门为此而创造的。不过，使自己遭到危险——那可不行！因此法国现在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迫害，只有当这种迫害不是纯粹装样子，不是警察的欺骗时，才会使这帮人受到损害。但是不管怎样，总会有人成为牺牲品，这就是孟索的可怜矿工[329]。不过，我对无政府主义的小丑们已经如此习惯了，以致当这种小丑的模仿同真正的运动混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只是在象奥地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里有危害性，而且也仅仅是暂时的。还有汝拉，那里有分散在各家的钟表制造业，也是这种荒唐行为的天然中心，在这里你的打击将是有益的。

医生允许马克思在英国南部海岸过冬，他住在威特岛已经将近一个半月了。到目前为止，他的两种主要疾病的情况很好：无论是胸膜炎还是支气管炎，都再也没有任何痕迹了。当然，要是天气和我们这里一样坏（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浓雾，好不容易算是过去了），对一个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患各种轻微的感冒，而在马克思的健康状况下，感冒会拖得很久，很伤脑筋。不过如果情况仅仅是这样，那还不要紧。很可能明年夏天还会让他到瑞士去，如果这样，你当然会见到他。

拉法格夫人的地址是：巴黎波尔-罗亚尔林荫路[66]号。她的丈夫不久以前被捕，不过现在又恢复自由了。问题涉及他在外省的一些演说，蒙吕松的法院侦查员①曾传唤他和盖得，他们不但没有

① 爱·皮康。——编者注

服从，反而在《平等报》上无情地嘲笑了他一通。当然，随后就发出了逮捕令，虽然拉法格每天都到编辑部去，根本没有隐藏起来的打算，甚至还声明他要在一些会议上发表演说，并且发表了演说，但是出色的巴黎警察还是花费了三个星期才搜捕到他。拉法格，在他之前的还有盖得，在蒙吕松经第一次审问后即被放出来了。不过他们还有可能被关押几个月。

你知道，法国的工人党分裂了[78]。马隆和布鲁斯迫不及待地想当议员，因此他们必须尽快地弄到一群选民。于是建立了一个没有纲领的党（的的确确如此，因为在绪论的许多“鉴于”之后势必得出结论，每个地方组织都可以制订自己的纲领），他们乐于接纳各种败类，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他们就把那些只是以在代表大会上推翻旧纲领为条件而接受旧纲领的人搜罗到党内来。盖得、拉法格以及其他人由于多数票的反对而失败，那些仍然忠于纲领的人都转移到了罗昂。我们的人不会运用策略，并且犯了一些无法挽回的错误，但是他们会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能派”的领导地位是不会长久的。我们的人拥有每天出版的《平等报》这个非常有力的杠杆，而且他们完全以事业的利益为重，这一点对于马隆和布鲁斯这种好闹纠纷的人是谈不上的。

祝你健康，老朋友，坚强些，我们还不会那么快就衰老，你知道，我们的路还长着呢！

你的　弗·恩·

117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2年1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肖莱马埋怨说，他已很久没有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报》了；他的订阅期限已满，因此早在一个月以前他就给我寄来一张支票（我给忘了），现附上，他希望再订阅一年，而“余下的钱供党使用”。

关于马尔克[①]这篇手稿，我不得不通篇重新改写了三次，为此，我又阅读了毛勒的十卷厚本著作[116]中的五、六卷，此外，还把它们同其他的史料作了比较。现在我已将手稿寄给马克思，他埋头钻研这些问题[359]比我时间长得多，深入得多，预期他在星期一把它退回。

马隆在愚弄福尔马尔。否则，他肯定会纠正福尔马尔的如下错误论断：《平等报》攻击“同盟分子”时，指的是巴枯宁的“同盟”[30]。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人们对可能派就是这样称呼的，因为现在已经分不清他们和社会主义同盟[360]的成员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同盟是大约在四年以前由原先的公社财政代表茹尔德在其他现在的和过去的蒲鲁东主义者（如龙格）的合作下建立起来的，它是《正义报》的社会主义后备力量。想必您看到过那里在选举期间曾谈起

①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这个同盟。在最近众议院普选中，这个同盟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并且获得了—— 至少是在某些选区—— 和工人党大致相同的票数。如果说福尔马尔尽管在巴黎住了一年半还不知道这个情况，那就是马隆有意向他隐瞒了这一点，就象向他隐瞒了其他许多事情一样。轻率地同一帮人结交的时候，这种事是常有的。

福尔马尔真可笑，他吹捧马隆是守纪律的党员，而指责别人破坏纪律[96]。究竟是谁破坏纪律？是那些高举旧旗帜的人呢，还是那些直接为了背叛旧旗帜、代之以新旗帜而网罗支持者的人呢？如果马隆不是预先网罗了那些蓄意废除旧纲领并且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受网罗的人的话，他怎么会在圣亚田[78]获得了多数呢？

马隆和他的克洛维斯·雨盖之间为了路易·勃朗而发生的争吵，妙不可言。这也算作一个党！

你可以看出，北部联合会[349]已经公开表示支持罗昂。

拉法格在最近几号《平等报》上发表了几篇非常好的文章，例如关于候选人崩图的文章358就是其中之一。对这些文章来说俏皮话比学理主义的预言要合适得多。

劳驾把肖莱马没有收到的那几号补寄给他。

忠实于您的　弗·恩·

11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1882年1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希望后天会放你出来一昼夜[361]，这样，这封信你就不难收到了。

我上一封信①中你感到迷惑不解的地方，无非是这样的意思：我认为，非常法[109]的废除要么是直接通过具有革命性质的事件（例如在俄国进行新的打击或者召开国民议会，这会立刻对德国产生影响），要么是通过一些总归是推动运动向前发展和替革命作准备的事件（在柏林的王位更替，俾斯麦死去或下台），——两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一个“新纪元”[257]。

美国的危机——如同这里的危机以及还没有在各地消除的德国工业的困难一样——在我看来决不是真正的危机，而只不过是前次危机中生产过剩的余波。由于数十亿的投机热潮，上一次德国的经济崩溃是提前到来的；这里②和美国的经济崩溃却是按照正常的期限即在1877年来临的。但生产力在任何繁荣时期都从来还没有得到过象1871—1877年期间那样的增长；因此正象1837—1842年间那样，这里的和德国的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在棉织业和制铁业方面产生了长期的困难；市场至今还不能把全部

① 见本卷第378页。——编者注
② 英国。——编者注

产品消化掉。由于美国的工业迄今主要仍是为受关税保护的国内市场而生产，所以在那里，生产的迅速增长很容易引起地方性的中间危机，但这种危机归根结底只会缩短美国成为有输出能力并作为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而出现于世界市场的时间。因此，我并不认为——马克思也这样看[①]——真正的危机会在通常爆发的期限以前很早就到来。

我认为，发生欧洲战争将是一种不幸；这一次的战争会具有非常严重的性质，战争会在长时期内到处煽起沙文主义，因为每个民族都会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已经处于胜利前夕的俄国革命者所进行的全部工作会变得徒劳无益，前功尽弃；我们的党在德国会立即被沙文主义洪流淹没和冲垮，在法国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那时可能产生的唯一好结果，就是恢复小波兰，但这种情况其实也可以通过革命产生，而且是自然地产生。由于战争失利而出现的俄国宪法，比通过革命道路夺取的宪法，会具有完全不同的、宁可说是保守的意义。我认为，这种战争会把革命推迟十年，固然，以后革命会更为彻底。总而言之，又嗅到了战争的气味；俾斯麦拿出了和奥地利的同盟来示威，这和1867年他在卢森堡事件中拿出和南德意志的同盟[362]一样。春天是否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且等着瞧吧。

你说的关于德国工业的情况，特别是明确地证实制铁业生产者之间的卡特尔合同已被撕毁一事，使我们很感兴趣。这是不能持久的，至少对于那些不搞欺诈就活不下去的德国的工业家来说是如此。

---

① 见本卷第117页。——编者注

迈耶尔的书[363]我们这里迄今尚未看到，因此你告诉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来说还是新闻。马克思会跟他的红衣主教并列在一起，这原是可以料想得到的；迈耶尔对于他能从曼宁红衣主教那里直接到马克思那里去，总是感到特别满意，他从不放过机会谈论这一点。

洛贝尔图斯在他的《社会问题书简》①中几乎发现了剩余价值的踪迹，但是他没有再向前走，否则，他就得抛弃他一心要帮助那些困于债务的容克的全部幻想，而这是我们可爱的洛贝尔图斯所不愿意的。不过，正象你所说的，他比起德国所有的庸俗经济学家，包括那些本来只是靠我们所抛弃的垃圾过活的讲坛社会主义者[130]在内，要好得多。

卡尔②求婚的事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闻。据目睹者告诉我说，这次婚礼仿佛进行得如此无精打采，以致一个参加这次不按宗教仪式举行的婚礼的人竟感叹地说："这是第一流的葬礼！"

我昨天已把小册子的最后一部分手稿，即关于马尔克制度和一般德国农民简史的附录[338]寄往苏黎世。因为毛勒写得很不好，往往从一个论题跳到另一个论题，在初读之下难以抓住头绪。我一收到校样，就把全书寄给你，因为它不单是摘录毛勒的著作，而且也间接地予以批判，同时还包含有很多新东西。这是几年来我研究德国历史的第一个成果，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我能够首先把它献给工人，而不是献给书呆子和其他"有教养者"。

该搁笔了，否则就来不及趁晚上的邮班把这封信用挂号寄出。

---

① 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编者注
② 即卡尔·希尔施。——编者注

普鲁士人看样子还不至于拆[1]挂号信，到目前为止，一切来信都正常，长期的经验使我学会了比较准确地辨别这种事情。

请将附上的圣诞节贺节片转交你的夫人[2]，并代我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119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3]

伦 敦

[1882年12月23日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孩子：

我从劳拉的信中 (这封信是恩格斯为了沟通消息今天寄给我的[4]) 得悉，小燕妮[5]又患了这种严重的炎症。如果对它不加注意，我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我们还是应当考虑 (并且在琳蘅动身到我这里来以前和她商量一下)，我们是否应当至少把哈利从小燕妮那里带走，甚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让他到这里来。小燕妮带着这些孩子哪能有时间去治病！但另一方面，如果另外的人取代了琼尼的位置，那我们的琼尼 (在卫生方面) 将会多么受忽视！

哈利特别加重了可怜的小燕妮的如此困难的处境。

你把兰卡 (或者是兰克，记不清了) 的《生理学》带给我；此

---

① 双关语：《bestiebern》(拆) 是由普鲁士政治警察头目的姓 Stieber 构成的，与《durchstöbern》("搜查"，"挖掘") 发音相似。—— 编者注

② 尤莉娅·倍倍尔。—— 编者注

③ 这封信是用明信片写的，没有署名。—— 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130页。—— 编者注

⑤ 燕妮·龙格。—— 编者注

外，把弗里曼那本不大好的书（《欧洲史》）也带给我，因为它可以供我作年表用；它放在我的卧室里，在放报纸和其他东西的书架上。

[马克思在明信片的背面写着]

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梅特兰公园路41号马克思小姐

1883年

120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　　敦

1883年1月8日于文特诺尔
圣博尼费斯花园1号

亲爱的小杜西：

星期六我收到了威廉森医生的短信，其中附有弗·贝肖医生给威廉森的信，贝肖的信上注有：1883年1月4日，滨海圣莱昂纳兹市勇士广场5号。信里提到：

“我们这里整整一个星期几乎连绵不断地下雨或者是潮湿的天气，但从2日起，相反地，天气干燥起来。从那时起，每天下午有阳光，尽管不多。我争取明天告诉您更多的情况。我认为，总的说来哈斯廷斯的气候比南岸大部分地方要干燥，虽然也许因此气温要低一点”，等等。

星期六（1月6日），这里天气挺好，但这只是中午；昨天天气也干燥，但是冷一些；跟往常一样，空地上阳光很充足。昨天和前天我都散步了；今天看样子也是好天。如果不是直接晒着太阳，总的说来还有点凉。但无论如何气温有希望逐渐增高。

如果这里天气捉弄人，可以转到哈斯廷斯去，至于到了变换

地点本身就会有好处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离开文特诺尔到哈斯廷斯去是有些好处的，但是到同威特岛条件差不多的文特诺尔附近的南岸各地去，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我仍在同积痰进行艰苦的斗争；星期六早晨起床时，咳嗽痉挛性地发作，以致我想喘几秒钟气都不行。我想，这是神经受了刺激——替小燕妮[1]担心所致！这不必多讲了。我想立即到阿尔让台去，可是一个生病的客人，恐怕只会更加重孩子的负担！要知道谁也不能担保，走这一趟不会引起我至今幸免的旧病复发。但是，不能去看望孩子，心里总是很难受的。

致良好的祝愿。

老尼克

121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　　敦

1883年1月9日　[于文特诺尔]

我亲爱的好孩子：

你这样经常和这样详细地给我写信，真是可爱，但我不愿意占用你仅有的那一点点可由你来支配的“空闲”时间。你的信是在我给你发了信[2]，从海滨散步回来后才收到的。巴黎方面暂时没有任何新消息。

---

① 燕妮·龙格。——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今天，我正想不顾风声怒号出去“徒步旅行”，这时候我的医生[①]来了；他说我必须呆在家里，因为外面很冷。他又给我进行了听诊。一切还是老样子，即患慢性卡他 (因此嗓子还一直是嘶哑的)，但如果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我的健康状况好转了，因为令人担心的地方完全没有触及。但是几乎没有间断过的咳嗽，本来就非常讨厌，由于每天呕吐，变得简直无法忍受了。这常常使我不能工作，而医生却相信—— 他还相信，这就不错了！—— 能够使我摆脱这种折磨 (靠刚刚给我开的药剂)。走着瞧吧。

顺便讲一下：在我的卧室或我的书桌里，在皮夹子或哪个小盒子内，应当还有几张我在阿尔及尔照的相片。要是你能找到，可以给我寄两张来。我已答应送一张给威廉森太太。

迈斯纳先生昨天给我寄来了他1881年的账目[123]；收入很少，但1882年必定会多一些，因为他同时还告诉我，余存的《资本论》很快就会售完。当然，他急着要校样[②]。何况他很久很久没有听到我的任何消息了。现在他终于要得到我的详细答复了。

考恩关于埃及的演说，实质上还是过去海德门的英国政治的“未来的音乐”。[364]这些长吁短叹的资产者 (而考恩在这方面也是资产者)，这些可怜的英国资产者，在日益加重的对历史使命所负的“责任”的重荷之下呻吟，而又如此无法反抗这种历史使命！不过，就连考恩一想到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牢固的侵略基地加上从三角洲到开普兰的“不列颠非洲帝国”的这幅迷人妙景，也垂涎三尺。图景真不坏呀！事实上，还有比征服埃及—— 在一片和平景象中

① 威廉森。—— 编者注
② 指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 编者注

征服——更无耻、更虚伪、更伪善的“征服”吗！甚至这个考恩（而他无疑是英国议员中最好的一个）也衷心赞扬这类“英雄业绩”；“我国军事实力的光辉显示”。可怜的考恩！他是地地道道的不列颠“资产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以为作了一笔很大而且非常有利的交易；他看不出，既然“政治”在这个事件中起作用，英国“年迈的伟人”只不过是另外一些非不列颠人的狡猾之徒手中的工具而已，而戈申之流泰然自若地承担起了对于“内部”利益的“责任”。

考恩有时迷信到这种地步，以致认为达费林勋爵真正是超群绝伦的外交天才。让这些不列颠人见鬼去吧！

代我吻吻我的外孙[①]。

再见。

老尼克

122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伦　　敦

1883年1月10日　[于文特诺尔]

亲爱的孩子：

附上的拉法格的信（望以后寄还给我），使我对小燕妮[②]感到很放心，虽然拉法格——可能是为了安慰我——把整个事情说得

① 让·龙格。——编者注
② 燕妮·龙格。——编者注

过分乐观；但是看样子直接的危险过去了。

他所写的有关狼、帕[1] (他现在崇拜狼) 的情况等等很有意思。

在目前状况下，现在把琼尼送到阿尔让台去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恩格斯也同意我这个意见)。在燕妮能重新亲自料理家务以前，他不能回去。只应注意主要的东西，而不必考虑次要的东西，过去没这样做，差点没把燕妮害了。多几个月或少几个月，这并不要紧，何况可怜的孩子一回去就会陷入一片紊乱之中。

小杜西，我希望你立即写封信给小燕妮，讲讲这个意思。我今天还要往《正义报》给龙格写几句，讲一下这件事。

你应当给小琼尼讲讲他的小兄弟的情况；当然你也要把拉法格信中的主要内容告诉琳蘅。

昨天天气很糟糕，今天也远不是“美好的”，很潮湿。可我今天还想自己的散步……[2]

123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3年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先是节日，后是丧日[3]，一直受到干扰。您自己可以理解，我几乎连片刻的空闲时间也没有，马克思从文特诺尔回来之后，由

---

① 燕妮·龙格的两个儿子埃德加尔和马赛尔在家里的绰号。—— 编者注
② 信的结尾部分残缺。—— 编者注
③ 指燕妮·龙格逝世。—— 编者注

于支气管炎（幸好目前还不严重）被软禁在家里，他不能多说话，而全部家务又需要料理。（只是此事切勿在报上透露，要是马克思看到好样的菲勒克在今天的《南德意志邮报》上轻率地，并且有些部分又是不真实地谈论这件事，他就会发火。）

尽管如此，我终于还是为您抽出了一个来钟头。至于随信奉还的龚贝尔的信，龚贝尔同海涅笔下的龚佩利诺[1]有共同特点，那就是也对证券感兴趣。一般说来，这是在国外的德国社会党人的极好的标本，因为他显然在巴黎住过。由于为这些人创造了一种他们本人完全没有出力的、往往只是理解得极其粗浅或者根本不愿意花力气去理解的理论，所以他们当中每一个孤陋寡闻的人都认为自己高于所有其他外国人。他从海尔布朗或是其他什么闭塞的角落来到伦敦或巴黎，却因为这里不重视他孤陋寡闻的见解而感到震惊。他不去扩大自己的眼界，不去学会一点东西，却偏要变得比以前还要目光短浅，因为这样更能显示他与冥顽不灵的外国人的不同之点，也就是他的臆想的优越性。可是这类人统治着德国侨民团体，如果他们现在使您吃苦头，那您不妨回想一下，是谁在颁布反社会党人法[109]以后力图通过集中之类的办法使这些团体起不应起的作用呢？假如您当时象现在这样清楚地了解这些人，就未必那么热心了。

“一批光明磊落的人”——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哈赛尔曼或弗里茨舍以及凡是被驱逐出国或自行来此的人都能说得出来的其他许多人光明磊落呢？

龚佩利诺谈起自己的证券时，就眉飞色舞。这位孤陋寡闻的

① 海涅《旅行札记》。——编者注

义侠骑士如此假仁假义地反对例行的做法——这些做法诚然令人很不愉快，但其对党的实际益处仍然远远超过可能的害处——，这肯定是有用意的。工人没有证券。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证券交易专栏。就是说，只有也想靠证券赚钱的小资产者才要求在自己的党报上设立一个好意的、正直的、道德的证券交易专栏。第一，指点如何最好地剥削工人（证券收入也是无酬劳动的利润），不是社会主义报纸所应干的事。第二，如果龚佩利诺仍然要求社会主义的报纸这样做，那么这决不利于说明他的社会主义，更不利于说明他的商业天才。我也有证券，有时买进卖出。但我总不至于天真到作买卖时要到社会主义的报刊里去找主意。谁干这个、倒了霉，那他活该。阿伯拉罕·龚佩利诺，去受洗礼吧！

格里伦贝格尔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对普特卡默的伪善态度的回答[365]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样做是对的。不要象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我们的策略从来就是这样，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们已经相当成功地战胜了一切敌人。老弗里茨①在给他的将军们的一个指令中说："总之，我们士兵的天才就是善于进攻，仅仅这一点就很了不起"[366]；这句话也适用于我们德国工人。但是如果凯泽尔②在辩论非常法的时候——假定□③的简要记录是确实的——退缩和诉苦，说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匹克威克式的革命者[367]，那该怎

① 弗里德里希一威廉二世。——编者注
② 麦克斯·凯泽尔。——编者注
③ 菲勒克；Viereck——姓，《viereck》——"四角形"。——编者注

么办呢?那就应当说:整个帝国国会和联邦会议[368]都只是靠革命建立起来的;老威廉在并吞三个王位和一个自由市[369]的时候也曾经是革命者;全部法制、全部所谓的法律基础都只不过是完全反对人民意志的和直接反对人民的无数革命的产物。德国人的这种思想上和意志上的该死的委靡状态 (有人如此卖力地把它同"有教养者"一起带到党内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掉啊!

邮局要关门了。我也许遗漏了您来信中的个别事项,待一有机会,我立即答复。谢谢寄来的照片。您什么时候寄来校样①呢?

祝好。

你的　弗·恩·

124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3年2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1. 相信您已收到12月20日由这里用挂号寄出的最后一部分手稿(《马尔克》)[338]。但是印刷厂拖拉得真不象话。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您可以重印扉页,在上面注明1884年。到底什么时候能出下一印张?

2. 无论是伤亡事故保险法的最初草案,无论是倍倍尔对这个问题的演说,我均未收到。但是我觉得,采取专门行动来反对俾

① 指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德文版。——编者注

斯麦的社会主义，现在似乎为时已晚。菲勒克的小报[①]对它已失去任何兴趣；辛格尔以前深深地迷上了国有化，近来已完全抛弃了，而且简直是革命的了，而帝国国会里的一帮懦夫——布洛斯、盖泽尔之流，看来即使不是丧失了希望，那至少也是丧失了勇气。在这种情况下，何必用大炮轰蚊子呢？我觉得，应当让俾斯麦的社会主义自己埋葬自己。就是说，剩下的事情就是批判拉萨尔的余毒了。但是，如果小册子[②]印得还是这样慢，恐怕连这个攻势在其发动之前就过时了。

3 您对马隆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个人不是那样愚蠢，或者确切些说，不是象他装的那样笨拙。这是个假装头脑简单的人，他从巴枯宁主义者那里学会了如何悄悄地逼迫人家还装出人家逼迫他的样子。您总有一天会相信我是对的。

4 交易所税。在英国这里，它老早就以简单的、最普通的印花税形式存在着，就是在转让时交纳占支付额的0.5%的印花税和五先令手续费（无记名股票这里很少，不用纳税）。结果只是在没有实际转让的差额交易中进行着真正的股票投机。所以课税只涉及所谓的“大宗投资”。因此根本不能做到使股票投机商无法逃税。

我反对这个，(1) 因为我们一般只要求直接税而反对一切间接税，以便人民知道和感觉到，他们交纳多少和应当怎样向资本进攻；(2) 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赞成给这个政府一文钱。

您把反对交易所的嚎叫称作小资产阶级的行为，这是很对的。交易所只改变着从工人中已经窃得的剩余价值的分配，而这种分

① 《南德意志邮报》。——编者注
② 指弗·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德文版。——编者注

配是如何进行的，这一点对于工人，作为工人而言，起初也许是根本无所谓的。但交易所朝着集中的方向改变分配，大大加速资本的积聚，因此这是象蒸汽机那样的革命的因素。

征收出自道德目的的课税，这也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想法——只有征收啤酒税和白酒税还勉强有理由可说。这种主张真是可笑之极和反动透顶。如果交易所不在美国造成巨大财富，在这个农民国家里怎能产生大工业和社会运动呢？

您如果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是很好的，但是要慎重。不要给施特克尔之流以可乘之隙。

5.《资本论》第三版[232]。看样子要拖延些时候，因为马克思还在生病。呆在经常下雨的文特诺尔，对他没起什么好作用。又加上女儿①死了。他三个星期前回来了，嗓子哑得只勉勉强强能说话；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要求很多（只是关于这一点切勿在报纸②上透露）。

6. 我们将非常感谢您寄来洛贝尔图斯和迈耶尔的书③。这个人曾经接近于发现剩余价值，但他在波美拉尼亚的领地妨碍他做到这一点。

十分感谢所寄的照片。

考茨基把他论美洲粮食的小册子④寄给了我。真是绝妙的讽刺：三年前主张限制人口增长，因为否则人就会没有东西吃了，而现在却发现，人口还不够多，甚至光是美洲的产品也吃不完！[370]之

---

① 燕妮·龙格。——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③ 约·卡·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该书系鲁·迈耶尔编辑并作序出版。——编者注
④ 卡·考茨基《大洋彼岸的食物竞争》。——编者注

所以发生这种怪事，是因为对所谓的“问题”是一个一个地、不加联系进行研究。这样，当然就成了那个违反杜林意愿的“在事物本身中客观地存在着”的辩证法[371]的牺牲品。

我高兴地得知，霍亨索伦家族里又有一个专好男风的人。这还不足以说明全貌。卡尔亲王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也确实“迷恋”这种事，但也“迷恋”女色。顺便说一下：阿道夫·博伊斯特把米拉波的《柏林宫廷秘史》转给您了吗？这本书是我叫他带给您的。如果没有，您到他那里去取。书中有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极其珍贵的材料，重要的地方都折了页。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

12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2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谨向您肯定敝函昨日已发①，现附上给考茨基的信②，他原先的地址可能已经不适用了。

再来谈谈交易所税，我们完全用不着去否定交易所的“不道德行为”和诈骗行为，我们甚至可以一针见血地把它如实地描绘成资本主义赢利的顶峰，在那里所有权完全直接变成了盗窃；不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过还应当做出进一步的结论：摧毁现代经济的这个表现得最清楚的顶峰，绝对不利于无产阶级，而相反地应当让它充分地自由发展，以便使最蠢的人也开始明白，现代经济会造成什么后果。有些人尽管不是交易所的经纪人，却贪得无厌地搞证券投机，因此必然成为掠夺的牺牲品，我们让这些人去表示义愤吧。当交易所和“实力雄厚的实业界”互相角斗的时候，当那些也企图进行证券投机并由于这种投机而不可避免地被抢劫一空的地主，在剥削阶级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互相斗争中成为第三方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将成为第四方：欢笑的一方。

还请您把准确地址—— 街名和门牌号码寄给我。否则我无法寄钱，而为了购买六本关于施米特的小册子[1]我需要把钱寄上，我和肖莱马希望把小册子寄往德国，请您办一下。

我应该就此搁笔了。

您的　弗·恩·

126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1883年2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我终于能够给您写回信，并对您寄来的一切表示感谢。您不能想象，有多少各种各样的干扰使我不仅不能工作，而且连最紧

① 《德国秘密警察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 编者注

迫的信也不能写。自从马克思生病以来，全部重担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另外函询等等的数目也增加了一倍。况且我晚上不能写字，因为写字使眼睛感到疲乏并且引起失眠。因此，全部文字工作只能用白天的几个小时去搞，而冬天这里白天又很短；加之，此地路远，如果需要去城里跑一趟，几乎总是要花去整整一个工作日。最近我有多少事情要东奔西跑呀！

不谈这些了。《新时代》我还没有看到，但是今天我要给狄茨写信。为了邮寄订费，我需要知道街名和门牌号，—— 这是这里的规矩。

您的关于美洲食物生产的著作[①]很适时。迈耶尔先生大概感到很自豪，因为您大量地利用了他的报道。[372]他是否还在维也纳，您有时跟他见面吗？

世界历史的讽刺多妙呵！三四年前，您作为一个新出笼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宣传必须人为地限制人口的增长，否则，我们大家很快就会没有东西吃了。现在您却证明说：人口不多，甚至吃不完欧洲本身的产品以及美洲生产的过剩食物。埃林杜尔伯爵，请替我猜破这个自然之谜吧！[②]可见，现在必须收起来的不是面包篮子，而是那块尽人皆知的小海绵。不过，这绝不妨碍资产阶级家庭有效地采用这种或另外一种什么方法保持孩子数量和收入相协调，避免过密的生育损害妇女健康等等。但我的意见仍然是：这是丈夫和妻子，大概还有他们的家庭医生的私事（关于这种事，我本人推荐过一种被您叫做“腊契博尔斯基法”的方法），而我们的无产者今后将一如既往，生育无数的后代，保持自己的美名。

---

① 卡·考茨基《大洋彼岸的食物竞争》。—— 编者注
② 亚·缪尔纳《罪》第二幕第五场。—— 编者注

关于您的杂婚一文[373]，我还坚持我过去的看法：共妻（和对妇女来说共夫）是部落内部性交关系的起点，这大概不会使您感到奇怪。相反地，用嫉妒去作心理上的解释，就是硬把后来的看法扯进去，这种解释被成百的事实所驳倒（下面要谈到这点）。达尔文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权威，正如在经济学方面一样——他的马尔萨斯主义就是从经济学中弄来的。关于猴子，在这方面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动物园里的观察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又难于对野猴群进行观察，即使是做了一些观察，也不可能是精确的、完全的，更不可能用来做结论。大猩猩和猩猩根本就不必考虑，因为它们不是群居的。您所引证的实行松弛的一夫一妻制的原始部落，我认为是蜕变了的——班克罗夫特①谈到的加利福尼亚半岛居民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原始状态的标志不是粗野，而是部落古老的血缘关系保留的程度。因此，从这个或那个部落的一些个别现象作出某些结论之前，首先必须确定每一个别场合下的这种关系。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半岛居民中，这种古老的关系大大削弱了，并且没有被什么另外的组织所代替；这是蜕变的令人信服的标志。而他们所提供的证据也是反对您的。在他们那里，妇女也定期回到共有状态。这就是主要的一点，可您却完全不提。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说，凡是在强制放牧[374]下土地定期重新回到共有状态的地方，原先都实行过完全的土地共有制，我认为，可以同样肯定地得出结论说，凡是妇女定期回到——实际地或象征性地——共有状态的地方，原始时期都实行过共妻。这种情形不仅在您的加利福尼亚半岛居民那里发生，而且在许多其他印第安人

① 休·豪·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编者注

部落，以及在腓尼基人、巴比伦人、印度人、斯拉夫人、克尔特人那里也都——实际地或者象征性地——发生，可见这是远古就有的，而且是广泛盛行的，这完全驳倒了嫉妒这种心理论据。我很想看看您将来如何克服这个困难，因为您是回避不了它的。

恰好彭普斯偕丈夫孩子[1]来了，就此搁笔。经常是这样。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

127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3年2月16—17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我开始写这封信（下午四点钟），但什么时候才能写完我没有把握；我最近经常受到种种打扰，除了晚上，根本没有时间，而晚上我又不敢多写，因为这使眼睛疲劳。

你的《萨拉斯— 伊— 戈梅斯》[2]，整个说来是一部杰作。语言与原作一样辛辣，这是我们品尝新的红葡萄美酒时喜欢的那种辛辣，一种健康的辛辣，它使夏米索的三韵句诗比其他任何诗人的更接近于但丁的三韵句诗。我逐行地全部同原作作了对照，表达原作的准确性使我感到惊异。但我希望你把某些地方改一改，使译文完美无瑕。正象你自己说的，结尾译得仓促了，事情也确实

① 派尔希·罗舍和女儿莉莲。——编者注
② 阿·夏米索《萨拉斯— 伊— 戈梅斯》。——编者注

是这样。下面具体谈一谈。

序诗。第3三韵句："它这样矗立着"——它不能"矗立"，因为只有从船桅顶上才能看到它。——"从柳里克"：这样不行，因为夏米索本人就在"柳里克"船上。

第5三韵句：我看要改译。《Den Versuch zu wagen》[①]，指的就是冒险驾船安然通过该纬度地区各岛屿周围的珊瑚暗礁所造成的激浪。

第7三韵句第3行：缺一个音节，《our》[②]不能作双音节的词用。

第15三韵句：译文"虽然……这可能被擦掉"会引起误解。原作说得明白，所写的东西，已经被人们自己的脚擦掉了。

第31三韵句第1行："这寒冷的岩石"根本不行，因为"它透过鞋底烫着他的双脚"。

第一篇。第1三韵句：《Ich sah bereits im Geiste》[③]——不能在开头把这省略了。读者根据译文会以为那个人已经完全占有了这一切想象中的宝库，只是在末尾——第8三韵句——才说明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奇妙的幻想，而且由于开头的省略也还是说得不够明白。去寻找财富的勇敢水手的形象是整个这一部分的基础，因此，故事一开始就应当把他突出出来。

第4三韵句第1行：《and for myself too were content and gain》[④]，不看原作就不明白。

---

① "冒险尝试"。——编者注
② "我们的"。——编者注
③ "我脑海里已经浮现出"。——编者注
④ "我自己也满意和得益了。"夏米索原作则是《Und selber hatt' ich Ruhe mir gewonnen》——"而我为自己获得了安宁"。——编者注

第9三韵句第3行：《cabins》[1]给这一行加了一个多余的音节，并且不准确。《Der untre Raum》[2]，按水手的说法是《hold》，而且这是个单音节的词。

第二篇。除一处外没有什么毛病，而且这也是个笔误。第16三韵句第1行：《For they (have) sighted me》[3]漏了《have》。

第三篇。第7三韵句：我认为《worser far》[4]的说法较好，但庸俗的读者是否喜欢这种说法呢？你能变成一个竟用《worse by far》[4]这种说法的庸人吗？

第15—20三韵句：你自己的几种方案表明，你对自己的译法不十分满意。我完全相信，这里可以想出新的成功的处理办法。结尾部分很好。

开头和末尾通常是薄弱的环节，因为开头你工作还没入门，末尾你已经有点疲倦了，但是我想，你把这一切搁一些时间以后，一定能够重新精力充沛地来做这件工作，并作出你定能够作出的成果。

摩尔也想读完译文，但不是现在就读。最近他夜里睡眠很不好，使他不得不打消自己的精神嗜好，所以他不看小说而开始看出版书目了。但前天夜里睡得很好，所以昨天他看起来完全象另外一个人。还有一个好的迹象：他的双脚以前每晚都是冰凉的，只有用热芥末水洗了才暖和过来，最近两天晚上却十分暖和，根本不需要洗了。慢性喉炎和支气管炎在慢慢好转，但咽东西仍疼痛，

① “船舱”。——编者注
② “底舱”。——编者注
③ “因为他们看见了我”。——编者注
④ “坏得多”。——编者注

嗓子很哑。等我去看望他以后今晚再继续把这方面的情况告诉你。他昨天的食欲很好；尼姆[①]大显身手，发明了一些适合他的病情的新菜肴。

2月17日。我昨天从梅特兰公园[②]回来已经是夜里一点钟了，所以我未能写完这封信。摩尔感觉自己几乎和往常一样，但不看书目而又看起弗雷德里克·苏利埃的作品来了——无论如何这是个好征兆。你看，他现在每天都喝一品脱牛奶，可是他原来是个非常讨厌牛奶的人，甚至牛奶放在桌上都受不了！不管怎样这对他是有好处的。除罗木酒外，他有时（特别是在喝牛奶时）还喝白兰地，大约每四天喝一瓶。

最糟糕的是，他的病是这样复杂，以致在应当注意最紧急的方面——呼吸器官——以及有时应当用安眠药的时候，就顾不上其他方面，例如胃的状况；你知道，他的胃根本不是非常健全的消化器官。但他的食欲依然相当好，我们也尽量设法主要供给他量少营养多的食品。

我认为，我们的朋友过分急于出新的《平等报》。如果保尔[③]和盖得不得不根据木兰法庭的判决“服刑”[97]——这毕竟是完全可能的，那报纸怎么办呢？盖得那篇发刊词[375]，根本不符合要求。他关于普选制选出的法官所发表的议论，既完全适用于普选制本身，也完全适用于共和国和任何其他政治制度。如果法国先生们不知道如何利用这种普选制，那对他们来说就更糟糕了。要是把选举法官的权利给我们在德国的人，他们在一切大城市里会在选举中

①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② 伦敦的一条街，马克思一家住在这里。——编者注
③ 拉法格。——编者注

获胜并使柏林变成老威廉和俾斯麦坐立不安的地方，除非他们实行政变。但是，因为我的对手说黑的，我就说白的—— 这纯粹是服从对手的规则，这是一种幼稚的政策。我担心盖得的无政府主义的好吹牛的旧习气又会出乎意料地和相当彻底地暴露出来，这样一来他就会走入绝境。

保尔的《两个倒霉的人》好极了。这正是他的拿手好戏[①]。

12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3年2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最近同菲勒克发生了小争执，使我同他断绝了关系。他可能要去苏黎世出席代表大会[376]并在那里的私人谈话中提到这件事，因此我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只听他的一面之词。所以我委托您向菲勒克将要与之谈到这件事的每一个人宣读这封信，至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则不管情况如何，都要读给他俩听。

还在圣诞节之前，菲勒克，或者确切些说，他的妻子[②]，寄给我一张慕尼黑的工程师戴恩哈特的名片，上面写着三个化学— 物理— 工业方面的问题，要我如有可能的话给查询一下。我把名片寄给了在曼彻斯特的肖莱马，他根据所提的问题立即看清这是个钻营的和缠人的发明家，他在极其简单的答复后面还写了一句

① 信的结尾部分残缺。—— 编者注
② 劳拉·菲勒克。—— 编者注

“箴言”。下面就是名片归还菲勒克时的样子：

“1. 在英国的造纸厂里，臭氧是否已经同氯和氯化石灰一样用于漂白废布？—— 否！

2. 同工业中采用的其他漂白剂相比，臭氧是否在技术或经济方面有重大的优越性？—— 否！

3. 提取臭氧并使之应用于工业企业，是否遇到重大的困难？—— 是！

工程师克·戴恩哈特”（印在名片上）。箴言：“发明家，别缠人！”

这就是名片归还时的样子。如果菲勒克不想让自己的戴恩哈特看这个箴言，他只须把问题和答复转抄在一张纸上或一张明信片上，这样，问题也就了结了。

可是我收到了《南德意志邮报》第7号（1月17日的）（它是菲勒克为交换《劳动旗帜报》寄给我的），并在“信箱”栏看到如下的一段话：

“本市戴恩哈特工程师先生：《电工技术革命》的作者给我们写信说，尽管曼彻斯特的肖莱马教授先生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他仍然断定，臭氧可借助于发电机提取”等等。

这是什么意思？这种完全是私人的通信怎么到了报纸上而不是投进真正的信箱呢？菲勒克又怎么竟敢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刊登私人信件呢？这封私人信件肖莱马纯粹是出于对菲勒克的好意给戴恩哈特写的，据菲勒克本人证明，戴恩哈特是个极端缠人的家伙。要么菲勒克不明白他干的是什么事情，要么他是出于对“箴言”的报复而这样做的。

同时，在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和对它们的答复中，根本就没有讲到臭氧能否借助于发电机提取；根本就没有提到发电机。可见，菲勒克间接地硬说肖莱马否定臭氧一般可借助于发电机提取，是公然歪曲事实真相，硬把肖莱马从未有过的看法强加在他身上。但

是，如果把这位名声超出欧洲的化学家在化学—物理学问题上从未发表过的看法强加给他，他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何况这是在学府集中的城市慕尼黑公开做的，要知道那里也有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可能从报纸上看到这一点。因此我把报纸寄给了肖莱马，认为这是自己的直接的责任。肖莱马给我寄来了如下的给菲勒克的信：

“如果有人〈我凭记忆引述〉未经许可发表私人信件，那是不体面的。如果同时还歪曲这个信件，那就太不正派了。”

肖莱马因此要求将名片全部内容：问题、答复和箴言都公布出来，以澄清事实。

为此菲勒克给我来了一封长信，说戴恩哈特就臭氧的问题一连给他写了三封信（可见“发明家，别缠人！”的说法是完全中肯的！）；他在收到肖莱马的信的同时也收到了我的信，我的信对他来说等于顶着胸口的手枪（这是撒谎，他可以把信给人看看；我只不过是要求他有礼貌地完全满足肖莱马的要求），但是据说，肖莱马信中提出的要求使他更为难堪。他说箴言他不能公布（肖莱马当然也没有当真这样要求），至于其他内容，只有肖莱马收回自己信中的侮辱性言词才能公布。他说，他现在还看不出他错在哪里，对于我们以“这种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方式”提出的要求，他应当拒绝答复。

“我并不知道，肖莱马教授先生看《南德意志邮报》，我怎么能设想您在这种情况下竟把那张报纸寄给了他？!您会成为我的密告者，这种可能性我本来认为……是不存在的，假如您能帮我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十分恼怒的教授平静下来，我只会感到高兴。”他说他的读者，11/12是党内同志……，希望不要要求他做“一个自尊的人不能做”的事，等等。

总之，这个人，根据其本人供认，盗用肖莱马的名字，歪曲

他的话，而又希望他不知道此事。我把此事告诉肖莱马（我是唯一的一个让他卷入此事的人），我竟成为菲勒克的“密告者”。受害人竟不是肖莱马，而是菲勒克，尽管肖莱马还只是极其温和地批评了菲勒克的行为。关于歪曲肖莱马的话，根本没有提到。

我们的复信菲勒克可以向任何人宣读。我们给他寄去了一份不是给他而是给编辑部的声明，也就是说，我们打算把它发表，并且建议把问题和答复也一并刊登出来。菲勒克又是怎样做的呢？起初他在“信箱”栏客气地表示道歉：

“我们对此次令人遗憾的误会十分抱歉，并设法使之圆满解决。”

而后来呢？在2月9日出版的第17号上，我们读到：

“关于电工技术革命问题。曼彻斯特的肖莱马教授先生对向他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答复，现在我们刊登于此，以澄清一个〈》误会〈》”：（下面是问题和答复。）

澄清“误会”，结果是把事情弄得十分模糊；本来应当使肖莱马满意，结果反而企图嘲笑他，再次滥用他的名字。在这以后，我就把《南德意志邮报》原封不动地寄回去了。于是，菲勒克又寄来明信片，质问为什么他应该受到这种侮辱人的（对他来说一切都是侮辱》拒绝方式，等等。对此我也是用明信片答复的，我的答复如果他愿意的话，让他自己读给您听好了。肖莱马写信告诉我，“必须同这类猪猡断绝任何关系”。我也这样做了。

您的　弗·恩格斯

129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3年2月27、28日，3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您的信昨天晚上收到了。《平等报》又垮台了；我请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就此事公布如下事实（见附页[1]）。但愿这些人终于会变得聪明一些，不要根据类似的合同去出版日报。起诉不会有任何结果，而只会白白花钱，任何一个法国法庭都会以不受理社会党人的起诉和使他们打输官司为乐事，而报纸反正恢复不了。

顺便说说，盖得和拉法格被控告违反刑法典[377]第91条：进行密谋和煽动内战——死刑。多么无耻的把戏！

好在他们现在至少不能再公开声明自己同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团结一致了，因为那些人在坐牢，——那是一些玩火的孩子，当他们挨打的时候，就装作世上最无辜的小孩。布鲁塞尔有个笨蛋，炸弹在他自己的裤兜里爆炸了！炸药从此变成了纯粹的笑柄。

现在谈谈另外的问题。由于菲勒克竟敢在《南德意志邮报》上对肖莱马采取了一个卑鄙的行动，我同他断绝了关系。我寄给肖莱马的信[2]中详细地谈了这件事，他如果同意这封信的内容，明天会直接从曼彻斯特把信寄给您（现附上此信——它已退回给我了，

① 附页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因为我忘了在信上签名)[①]。我无须乎向您说明，如果菲勒克和弗里茨舍不是作为党的正式代表到这里[165]，我们当时会很冷淡地对待他们。但由于上述情况，另外还因为马克思当时身体不好，我才不得已稍微履行一下接待的义务。此外菲勒克他现在的妻子[②]当时同我的侄女[③]很要好 (她俩当时都秘密订了婚)，等等，等等。我当时十分明确地向他表示了我对他的庸俗民主主义倾向的看法。总之，我同他有过瓜葛，现在必须加以断绝。

象菲勒克对肖莱马采取的这种行为，恐怕连擦皮鞋的都受不了。要知道，肖莱马无疑是整个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中仅居马克思之下的最著名人物。我二十年前同他相识时，他已是共产主义者了。当时他是英国教授们手下的一个贫寒的私人助手。现在他是皇家学会 (这里的科学院) 会员，他在他的专业—— 单烃 (石蜡及其派生品) 化学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权威。他的巨著化学教程，虽然是他和罗斯科合著的[④]，但几乎完全是他一个人写的 (这是所有的化学家都知道的)，此书被认为是英国和德国目前最好的一部著作。他的这种地位是在国外，在同那些最大限度地剥削他的人们进行斗争中取得的，—— 是完全靠真正科学的劳动取得的。他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昧良心的事。同时他在任何地方也毫无顾虑地以社会主义者的身分出现，经常在大学讲师的餐桌上朗读《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俏皮话等等，但他正当地要求人们不要象菲勒克那样，用这样或那样的借口，违反他的意愿，把他拖到公众面前去。明天再写吧；

① 括弧里的话恩格斯补写在信纸的下端。—— 编者注
② 劳拉·菲勒克。—— 编者注
③ 玛丽·艾伦·罗舍。—— 编者注
④ 亨·恩·罗斯科和卡·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 编者注

快半夜了，我已经打破了自己晚上不写东西的规矩了。

2月28日

请不要在报纸上总是称呼我为“同志”。第一，我讨厌任何称号，既然在所有值得重视的德国报刊中，如果不是攻击，都不加称号，只是称呼名字，那么我们也应该照此办理，除非指明“同志”是要确实告诉读者，此人是党员。在讲台上和在口头争论中适用的和惯用的东西，有时在报刊上则是根本不容许的。此外，我们在这里根本不是狭义的“同志”。我们属于德国党的程度，未必大于属于法国、美国或俄国党的程度，我们很少受德国的纲领的约束，正象我们很少受最低纲领[32]的约束一样。我们认为我们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代表的这种特殊地位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但是这种地位不容许我们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党，至少是在我们回到德国并直接参加那里的斗争以前。现在这不会有什么意义。

您说李卜克内西犯了吸收庸俗分子的过错，我们早就有这个意见。李卜克内西虽然有许多极好的品质，但有一个缺点，就是竭力把“有教养的”分子拉进党内，在他这个以前当教师的人看来，如果一个工人有一次在帝国国会里把mir和mich[①]混淆起来，那就是最糟糕不过的事了。无论如何不应当提菲勒克这样的人当候选人，因为他在帝国国会里会比成百个用错了《Mir》的人使我们更加丢脸，顺便说一下，甚至霍亨索伦们和元帅们有时也用错过。如果“有教养者”和根本就是来自资产阶级的人不是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他们就只会有害。如果他们确实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他们会是非常有益的，应当欢迎他们。其次，李卜克

① mir是德语“我”字的第三格，mich是“我”字的第四格。——译者注

内西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为了一时的成果而不加考虑地牺牲将来的更大成果。非常冒险地派菲勒克和弗里茨舍去美国，就是一例。目前一切还平安无事，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弗里茨舍今后在美国不会给我们丢脸呢？以后会有人说：这是正式派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美国的代表啊！奥本海默事件[378]证明，在推举候选人时，对于这类人，应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

又写不完了！

3月1日

我们一直在党内同小资产阶级的市侩庸俗习气作最无情的斗争，因为这种习气从三十年战争[119]以来就在蔓延，现在已经沾染了德国的一切阶级，成了德国人的遗传病，成了奴颜婢膝、俯首帖耳和德国人的一切传统的恶习的亲姊妹。就是这种习气使我们在国外受人嘲笑和轻视。它是我们当中一片委靡不振和意志薄弱的主要原因。它既经常笼罩着王位，也经常笼罩着鞋匠的小屋。只有在德国形成了现代无产阶级以后，才出现了一个几乎完全没有感染这种德国遗传病的阶级，这个阶级在斗争中显示出它目光远大，精力充沛，态度乐观，意志顽强。难道我们不应该反对又人为地使这个健康的而且在德国是唯一健康的阶级感染庸人的目光短浅和委靡不振这种旧遗传病毒的一切企图吗？但是，刺杀事件[23]刚一发生，反社会党人法[109]刚刚通过，领导者们就惊慌失措，恐惧万分，这只能证明他们自己在庸人中生活得太久，而且处于庸俗舆论的压力之下。党在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完全成为庸人的党，但是的确象是那样的党。幸而这一切现在已经克服了，但是在反社会党人法通过以前不久吸收到党内来的那些庸俗分子，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和多半是没有毕业的大学生，还仍然留在我们的队伍中，

我们必须警觉地注意这些人。您在这方面帮助党，这使我们很高兴。您在那里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职务。

不过您不要把《年鉴》中那篇不幸的文章[285]放在心上。文章替交易所经纪人辩解。但是一个人自己可以当一个不错的交易所经纪人，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并因此仇恨和蔑视交易所经纪人阶级。难道我什么时候会想到要为我曾经当过工厂股东这件事进行辩解吗？要是有人想要在这方面责难我，那他就会遭到惨重的失败。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赚它一百万，从而能使欧洲和美洲的党得到大批经费，我马上就会到交易所去。

您对追求敌人的赞扬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讲坛社会主义者[130]放一个小小的赞许的屁，《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也欣然记载下来，对此我们往往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米凯尔的叛变就是从他的如下命题开始的："我们应当在各方面争取资产阶级的赞许"[350]。鲁道夫·迈耶尔可以尽情地奉承我们[363]——但他之所以也受到赞许只是因为那真正有价值的《政界的滥设企业者》①。我们当然从未同他谈论过重大问题，而所谈的几乎仅仅是关于俾斯麦之类的事。迈耶尔至少是个也懂得威吓贵族老爷们的正派人，而不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人，不象现在在意大利也是很盛行的一切讲坛社会主义者那样。他们的典型人物阿基尔·洛里亚不久前来过这里，但访问过两次之后就再也不来了。

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却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这种喧嚷只不过是为他出版的小册子做广告。但是这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

① 鲁·迈耶尔《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编者注

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循环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线输送到迄今连想也不敢想的远距离,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一发现使工业几乎彻底摆脱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末到最后它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但是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以致于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的管理愈来愈不能胜任。笨蛋菲勒克只是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特别喜爱的国有化的新论据:资产阶级所不能做的事,应当由俾斯麦来做。

舒马赫的事使我很难过。但愿这只是一时的;他总的说来还是个活跃、果断的人。可是,正如您所说的,这是德意志帝国的可恶的气氛!

由于许多缘故,我不打算出席代表大会[376]。目前大陆的情况使我宁愿留在这里。

考茨基把他论述婚姻的著作的第二部分[373]寄给了我,在这里面他又想偷偷地贩卖共妻是派生现象的主张。但这是行不通的。我还要给他写信讲这一点①,并把信也寄给您。考茨基的不幸在于,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其次,一个人如果写这么多,那就什么有用的东西也搞不出来。要是想得稿费,他可以写些通俗的东西,腾出些时间来深入地全面地研究科学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所成就。

① 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好男风的人》把我们笑死了，我已将它寄到曼彻斯特去了，它在那里会大受欢迎。

马克思还没有恢复工作能力，他经常不出房门 (他是在他的女儿[①]逝世后立即回来的)，在看法国小说。看来他的病情很复杂。我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比较好的季节。

您的 弗·恩格斯

只是不要在报上[②]登载关于马克思健康状况的任何消息。菲勒克在《南德意志邮报》上把我偶而告诉他妻子[③] (他本人几乎从未给我写过信！) 的消息歪曲得面目全非，我当然是将此事瞒过了马克思，否则他会揪我的头发。这件事菲勒克也丝毫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就做了。

130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 也 纳

1883年3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我收到了您关于婚姻问题的第二篇文章[373]，既然其中包含有对我关于第一篇文章的批评意见[④]的回答，那我就再讲一下；我现

① 燕妮·龙格。——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③ 劳拉·菲勒克。——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432—433页。——编者注

在恰好有一个钟头的空闲时间，明天我就抽不出空了。

首先我认为，您否定共妻是原始现象，又想硬把它说成是派生现象，这是绝对不容许的。凡有共有制的地方——不管是土地的、或者妻子的、或者任何东西的共有制——，共有制就必定是原始的、来源于动物界的。后来的全部发展就是这种原始共有制的逐渐消亡的过程；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例子能证明，共有制是作为派生现象从最初的个人占有发展来的。我认为这个论点是如此无可辩驳，如此有普遍意义，即使您能给我指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例外，不管这些例外乍看起来是多么振振有词，我也认为它们不能作为否定这一论点的证据，而只不过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而已。

其次，您在第一篇文章中硬说嫉妒起决定性作用，而在第二篇文章中又把它完全抛到一旁，这是不行的。在第一篇文章中，松弛的一夫一妻制主要是由嫉妒推论出来的，如我说过的，其他理由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嫉妒能战胜天然的性的共有制——而您毕竟间接地认为存在这种共有制："在部落内盛行过充分的性交自由"——，如果嫉妒因此能够把这种天然的自由限制在暂时的一夫一妻制的范围内，那么嫉妒就更能够战胜较小的障碍了。部落共同占有战俘是小得多的障碍。妻子总是妻子，不管她是自由人还是女奴隶；但如果是女奴隶，而不是享有通奸权利的自由妇女，则丈夫的嫉妒确实可以更容易地使独占得到保证！不过一旦产生与战俘的婚姻，男子的嫉妒便会立刻消失，在原始状态中男子曾觉得如此厌恶的共有制，也变成可以接受的和愉快的了，甚至在实行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以后，甚至在实行后房制的闪语系各族中，丈夫也完全不反对让自己的妻子在一

定期间内到寺庙或任何地方去委身于所遇见的任何男人。不，亲爱的，您不应那么轻率从事。您应当坚持到底，即使这样做对您不太方便。既然嫉妒使原始的性的共有制成为不可能，那末性的共有制从而就一下子永远地，一直到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被铲除了。或者是您的第二篇文章反驳第一篇文章，或者是相反。

再者，您说妇女自由在第一阶段促进了一夫一妻制，因为当时还谈不到压迫，我不同意这一点。性的共有制是以压迫为基础，这一论据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是现代的歪曲，其前提是只讲男性和按照他们的意愿共有女性。这是同原始状态格格不入的。性的共有制是对两性而存在的。如果说您是要驳倒错误的见解，那这还驳不倒被曲解的确凿事实。

其次，您把一切性的共有制及其遗迹归结为劫夺异族妇女，硬说这种婚姻形式是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曾极度风行，可是又举不出任何一点证据。

以下就湮没在假说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些假说中的有些东西对于一定时期和一定]①地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总结您做得太急了，就象特别快车一样。我们无法这样迅速地弄清这些问题。虽然克尔特的Clan②，罗马的gens②，德意志的Geschlecht②——都是一个部落的分支，但是它们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而且它们的起源肯定也是不同的。在各非克尔特民族中克兰的种类也各不相同。

我坚信，您如果继续研究这个问题或者经过若干时间再来研究它，那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也许您会惋惜您在这个极其困难的领域竟采取了如此仓促的态度。您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但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氏族。——编者注

是结论做得太匆忙了，而且太看重了所谓人类学家的意见，这些人我看全都患有一种讲坛社会主义的斜眼症。即使您把巴霍芬使性的共有制神圣化和神秘化的说法[①]驳斥得体无完肤，而性的共有制仍然是事实。

好了，午饭铃响了；请不要见怪，我仍然是——

您的　老弗·恩格斯

131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 比 锡

1883年3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今天我不得不凭记忆给你回信，因为你的来信还在马克思那里，而我又想立刻写信祝贺你后天出狱。

你描述的关于德国工业迅速增长的情况，使我极为高兴。现时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正在经历着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所经历过的事情：交易所正在把所有完全闲置或半闲置的资本动员起来，把它们吸引过去，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通过这种办法提供给工业支配的这些资本，导致了工业的振兴（绝不应把这种振兴和商业繁荣混为一谈），既然事情动起来了，就会愈走愈快。俾斯麦时代和拿破仑第三时代只有两点区别：当时法国的繁荣是由于相对的自由贸易；而在我们这里，尽管实行了对德国来说恰巧是完全不

① 约·雅·巴霍芬《母权论》。——编者注

适宜的保护关税制度，事情仍在向前发展。其次，俾斯麦时代使数量大得多的人失业。这部分地是由于我国同只生两个孩子的法国相比人口增殖得要多得多，部分地是由于波拿巴曾用他的巴黎建筑工程造成对劳动力的人为的需求，而我国在数十亿时代[7]之后，这种情况很快就停止了；显然，还有一些我所不了解的其他原因也起部分作用。不管怎样，市侩的德国终于开始变为一个现代国家，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迅速获得成就是完全必要的。

阅读德国的资产阶级报纸和议会发言，就仿佛生活在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的英国：同样都埋怨流浪的祸害，同样都叫喊强迫制止流浪，叫喊使用监狱和鞭笞。这最能证明，生产者和他们的生产工具的分离，小生产之被机器排挤，以及机器的改善，进行得多么迅速。但这些资产者企图用道德说教和刑罚手段去消除他们本身的行为所必然带来的后果，他们是多么荒谬可笑和卑鄙无耻啊！可惜你不在帝国国会[222]里，这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题目。

你在萨克森邦议会心安理得地举行宣誓[379]的先例，已经有了仿效者。意大利人一致决议，宣誓不应成为障碍，而且科斯塔已毫无怨言地宣誓了[83]。正是这些人，尽管参加选举并且让别人选举他们，却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

我的小册子①在苏黎世被拖延得简直不象话，但现在似乎已经印好了；我不知道在苏黎世这个小城市装订是否要拖这么久，无论如何，我还在等候给我的样本，而样本我迄今还未收到。论马尔克的文章②将会使你弄明白毛勒著作中的许多东西；他写得极其缺乏条理，不过他的著作还是卓越的。他的一本书我读了五、六

①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马尔克》。——编者注

遍，下星期还要读一遍，然后把他所有其他著作[116]联系在一起再仔细研究一下。

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的是，那位满嘴仁义道德和笃信宗教的普特卡默起先在帝国国会里挨了格里伦贝格尔的痛骂，然后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挨了几次痛骂[365]。现在他该小心一些了吧！

小赫普纳在纽约把《我们的目的》[380]翻印了，据说作了修改，其中附有一幅小画像，画的本该是你，但实际上画出来的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因我只有该书的第一版，所以无法判断他是否越改越坏以及改坏了什么。如果你没有他的这一版本，我可以寄给你，你应看看，你在美国人的概念中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现在该搁笔了，我要到马克思那里去；他的健康仍然不好。如果现在是两个月以后的季节，天气和空气就会起好作用，但现在我们这里刮东北风，风势和飓风差不多，而且风雪交加，——这怎么能把这根深蒂固的支气管炎治好！

问候李卜克内西。

你的　弗·恩·

132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3年3月10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今天早晨还没收到保尔[①]的来信，我想在这冰天雪地又刮着

① 拉法格。——编者注

东风的天气，你不会过于急着来伦敦。不过，如果你打定主意要来，一切都为你准备好了。

昨天晚上，唐金去看摩尔了，我可以高兴地告诉你，他对摩尔的健康的估计比两星期以前要好得多。他说，摩尔肯定不比那时差，而是比那时好；如果我们能够使他支持两个月，就大有恢复健康的希望。当然，由于吞咽有困难，他还在不断地衰弱下去，不过我们一定得强使他进饮食。这就是杜西昨晚在一张明信片中给我写的以及今天尼姆[1]告诉我的一切；我今晚能见到杜西，如果得到更详细的消息，我再立即给你写信。唐金认为，肺脓肿目前正日趋好转。近四个（或五个）晚上，没有盗汗了，不过代之而起是白天有一点发烧，这当然也会使他虚弱。

他把《无产者报》和盖得委员会的回答，还有那一号“可恶的”《公民和战斗报》交给我替他保存。因此，可以把保尔寄的那份同其他的东西一起交给苏黎世[2]使用。所以这回幸好可以处理事情的事务性的方面了，但鉴于摩尔目前的健康情况，如果只有他一人掌握全部的材料的话，这不是时时都靠得住的。

马隆和布鲁斯这些前巴枯宁主义者，是一伙肮脏透顶的家伙。这样赤裸裸的伪造，要是在巴黎以外的任何地方，满可以永远置他们于死地了。但因漂亮话对巴黎人有极大的影响，谁知道“手工业工人”[3]不会搜集到多少千张选票呢？不管怎样，让我们期待最好的结果吧。

衷心问候保尔。

爱你的　弗·恩格斯

---

①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②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③ 让·巴普提斯特·杜美。——编者注

133
恩格斯致沙尔·龙格

阿 尔 让 台

[电报]

[1883年] 3月14日于伦敦

马克思今天下午三时突然逝世；请候信。

恩格斯　于伦敦

13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381]

霍 布 根

[电报]

1883年3月14日于伦敦

马克思今日逝世。

恩格斯　于伦敦

13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 黎 世

1883年3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

我的电报想必您已经收到。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本来大有希望，但是今天早晨体力突然衰竭，接着就完全入睡了。在两分钟之内这个天才的头脑就停止了思想，而这正是发生在医生们给了我们最大的希望的时候。这个人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这只有同他经常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舞台上消逝。这种眼界是我们其余的人所达不到的。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长期徘徊。

其余的下次再谈。现在已是午夜十二点钟了，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不得不写信并且为各种事情奔忙。

您的 弗·恩·

136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 比 锡

1883年3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从我给倍倍尔夫人——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通讯处——的电报里，您大概已经知道，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党遭受了多么严重的损失。上星期五医生[①]——伦敦最好的医生之一——还告诉我们，他完全有希望恢复健康，只要食物使他的体力得到恢复，他就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健壮。而且正是从那时候起，他的胃口又开始好一些了。但是今天下午两点多钟我去的时候，看到全家都在掉泪：他的病情很坏；琳蘅说他处在半睡的状态，叫我上楼去看他，当我上了楼的时候——此时她离开房间不过两分钟光景——他已完全睡着，但是长眠不醒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头脑停止思想了。关于致死的直接原因，没有医生的意见我不好判断；整个情况是这样复杂，以致医生们要把它详细写出来，也要花费许多笔墨。然而，现在这毕竟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了。最近六个星期以来，我饱受了惊恐，而我所能说的只是，在我看来，起初他的夫人[②]去世，接着，在他非常危急的关头燕妮[③]又去世，这些都起了作用，加速了他的逝世。

---

① 唐金。——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③ 燕妮·龙格。——编者注

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仰卧在床上，面孔也永远不动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你的　弗·恩格斯

137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 内 瓦

1883年3月15日于伦敦

老朋友：

去年秋天你还见到了马克思[382]，你应该感到高兴，今后你再也见不到他了。昨天下午二时四十五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我们发现他已在安乐椅上安详地长眠了。我们党的最伟大的头脑停止了思想，我生平所知道的一颗最强有力的心停止了跳动。可能是发生了内出血。

现在，我们两人差不多是1848年以前的老近卫军中最后的两个人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子弹呼啸着，朋友们倒下去，但这些对我们两人来说是屡见不鲜的。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被子弹打中，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要击中要害，别让我们长时间受折磨。

你的老战友　弗·恩格斯

138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 布 根

1883年3月15日晚11时45分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的电报已于今晚收到。衷心感谢！

当时要把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定期告诉你是不可能的，因为病情一直变化不定。现在简单地谈谈主要情况。

在他夫人[①]逝世前不久，1881年10月，他得了胸膜炎。痊愈后，在1882年2月被送到阿尔及尔，由于路上碰到寒冷潮湿的天气，到那里又得了胸膜炎。那里天气一直很坏；他的病刚一治好，由于夏天的酷暑即将到来，他被送到蒙特卡罗 (摩纳哥) 去。到那里他又得了一次胸膜炎，但病势较轻。那里天气也很坏。最后，病治好了，他到了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住在他的女儿龙格夫人家里。在那里，他用附近的恩吉安的硫矿泉水医治他的慢性支气管炎。那里虽然天气仍旧不好，但治疗还是有效的。然后他又到斐维住了六个星期，九月间，他从那里回来时，看起来健康几乎完全恢复了。医生许可他到英国南部的海滨去过冬。而他自己对无所事事的漫游生活已感到很厌倦，所以，要是再一次把他流放到欧洲南部去，也许对他的身体有好处，而对他的精神却有害处。当伦敦雾季开始的时候，他被送到威特岛去。那里阴雨连绵；他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又感冒了。新年时我和肖莱马想去看他，但是得到通知，要杜西马上到他那里去。紧接着燕妮[1]去世了；他回到这里的时候又得了支气管炎。由于过去的种种情况，加上他这么大的年纪，这是很危险的。此外还产生许多并发症，尤其是肺脓肿以及体力异常迅速的衰竭。虽然如此，病情总的是在好转；上星期五，给他治病的主要医生[2]（伦敦最好的青年医生之一，是由雷伊·朗凯斯特专门推荐的）还给了我们莫大的希望。但只要在显微镜下观察过一次肺部组织的人都知道，肺部化脓的地方血管壁穿孔的危险是多么大。所以，六个星期以来，每天早晨当我走到拐角的地方的时候，我总是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看看窗帘是不是放下来了。昨天下午两点半钟—— 这是白天探望他的最合适的时间—— 我到了他家里，看到全家都在掉泪：似乎快到临终的时刻了。我就询问了情况，想弄清原因，进行安慰。先是少量出血，接着体力就立刻衰竭了。我们那个非常好的老琳蘅看护他要胜过任何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走上楼去，立刻又下来了，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我可以跟她一起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

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多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

① 燕妮·龙格。—— 编者注
② 唐金。—— 编者注

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地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他常常喜欢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①]不能眼看着这个伟大的天才象废人一样勉强活着，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健壮时经常予以痛击的庸人们嘲笑，—— 不能那样，现在的情况要比那样好一千倍，我们后天把他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去，这要比那样好一千倍。

根据过去发生的、连医生也不如我了解得清楚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只有这一条出路。

尽管这样，人类却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没有了，他们过去每次都从这里得到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才能作出的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忠告。那些土名人和小天才（如果不说他们是骗子的话），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 虽然这也是难免的—— ，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

你的　弗·恩格斯

① 引自伊壁鸠鲁给美诺寇的信《论道德》第2章（此处系套用）。—— 编者注

139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伦　　敦

1883年3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列斯纳：

我们的老马克思于昨天下午三时平静而安详地长眠了。致死的原因首先大概是内出血。

葬礼将在星期六十二时举行，杜西请你务必参加。

匆匆草此。

你的　弗·恩格斯

140
恩格斯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381]

纽　　约

[电报]

1883年3月16日于伦敦

卡尔·马克思于本月十四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法国阿尔让台[①]逝世。数星期以来马克思患支气管炎，又加上肺脓肿，最后由于内出血而逝世。他安然死去，毫无痛苦。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① 关于马克思逝世于法国的错误消息，是《纽约人民报》编辑部加进这一电文的。——编者注

141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　　黎

1883年3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

我收到一封从莫斯科发来的长电报，请求我以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的名义向马克思墓献一个花圈。[383]他们由于不知道我的地址，把电报打到了《每日新闻》编辑部。现在他们请求我告诉他们花圈的价钱和我的地址。可是电报没有签名；署名是：莫斯科彼得罗夫学院学生。

答复谁呢？也许您能给我出个主意。因为电报是在葬礼以后来的，而为了安葬上星期二死去的龙格的小儿子①，坟墓今天又重新打开了，所以我要到下星期才能去献花圈。但是我想通知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我已经收到了他们的电报，而且完成了委托给我的事情。

匆匆草此。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① 昂利·龙格。——编者注

142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　　黎

1883年3月25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劳拉：

附上迈耶尔一封寄到梅特兰公园[①]的信——杜西没看收信人姓名就把信拆开了，但当她看清是谁寄来的信时，就立即把它交给了尼姆[②]，尼姆又给了我。

今天尼姆在摩尔的手稿里找到了一个大包，里面是《资本论》第二卷[232]，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共有五百多页对开纸。由于我们还不知道手稿已为出版准备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我们能否找到别的什么东西，目前最好还是不要在报纸上透露这个好消息。

彭普斯正在日日夜夜等待着老二出生，假使它今天还没有出世的话——星期五以来没听到她的消息了。今天老大[③]满一周岁。肖利迈向你问好。我们两人都向保尔[④]衷心问好。请告诉他，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只刊登了葬仪的报道[⑤]——和《正义报》上的[⑥]基本相同。

---

① 即马克思在伦敦的地址。——编者注
②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③ 彭普斯的女儿莉莲。——编者注
④ 拉法格。——编者注
⑤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编者注
⑥ 弗·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编者注

英国和德国报纸的消息不确切，不灵通，但总的来说还过得去。甚至连马隆也不那么坏。

最新消息。彭普斯和派尔希[①]来了！这样，整整十二个月愉快地过去了。

爱你的　弗·恩格斯

143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库诺
纽　　约

1883年3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诺：

你的信在这里引起了哄堂大笑。凡是了解摩尔的家庭生活和他在亲近朋友中的情况的人都知道，在那里人们都不叫他马克思，甚至也不叫他卡尔，而只叫他摩尔，正如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绰号一样，而当不再叫绰号的时候，那种极亲密的关系也就停止了。摩尔是他从大学时代起就有的绰号；在《新莱茵报》人们也常常叫他摩尔。假使我对他用另一种称呼，他就会以为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需要和解的事情了。

你的　弗·恩格斯

① 罗舍。——编者注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1　1881年6月底到7月20日左右，马克思和他有病的妻子曾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5、10、194、254页。

2　1881年7月26日到8月16日马克思和妻子住在阿尔让台（巴黎附近）他们的女儿燕妮·龙格的家里。——第6、199、254页。

3　法国政府于1881年7月26日颁布命令，规定众议院选举提前在8月21日举行。——第8、16页。

4　1881年7月28日至8月22日，恩格斯在布里德林顿码头（约克郡）休养。——第8、200、204页。

5　指下面一些著作：

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Скалкин.《В захолустьи и столице》. С.-Петербург, 1870）。

格·路·毛勒《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厄兰根版第1—4卷（G. L. Maurer.《Geschichte der Fronhöfe, der Bauernhö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Ⅰ—Ⅳ. Erlangen, 1862—1863）。前两卷于1862年出版。关于毛勒的著作，并见注116。——第8页。

6　指麦·诺尔多的两卷本著作《真正数十亿的国家的纪事。巴黎的概况和景象》（《Aus dem wahren Milliardenlande. Pariser Studien und Bilder》），第1版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第2版书名改为《巴黎。真正数十亿的国家的概况和景象》（《Psris. Studien und Bilder aus dem wahren Milliardenlande》），1881年在莱比锡出版。在这本书中诺尔多附入另一著

作《第三共和国下的巴黎。真正数十亿的国家的新景象》(《Paris unter der dritten Republik. Neue Bilder aus dem wahren Milliardenlande》);第1、2版1880和1881年在莱比锡出版。

诺尔多的这部著作旨在反对维·梯索的多次再版的丛书《到数十亿的国家去的旅行》(《Voyage au pays des milliards》),第1版1875年在巴黎出版;《普鲁士人在德国。到数十亿的国家去的旅行续篇》(《Les Prussiens en Allemagne. Suite du Voyage au pays des milliards》),第1版1876年在巴黎出版;《到被兼并的各国去的旅行。到数十亿的国家去的旅行续篇和结尾》(《Voyage aux pays annexés. Suite et fin du Voyage au pays des milliards》),第1版1876年在巴黎出版。——第12页。

7 指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失败以后,根据和约付给德国的五十亿法郎的赔款。——第12、451页。

8 恩格斯显然是指1881年7月10日《科伦日报》第189号上登载的对诺尔多的《真正数十亿的国家的纪事》一书第二版的评论。——第14页。

9 指约·埃卡留斯的文章《一个德国人对英国工联主义的看法》,这篇文章发表在1881年8月6日《劳动旗帜报》第14号上,未署名。埃卡留斯在文章中赞扬了由麦·希尔施和弗·敦克尔于1868年创建的改良主义的德国工会(所谓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第17、18、201、203页。

10 恩格斯于1881年5—8月曾为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工联机关报《劳动旗帜报》撰稿。该报的主编是乔·希普顿。文章发表时不署名,几乎定期每星期一篇,作为社论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73—318页)。恩格斯总共写了十一篇文章。恩格斯的最后一篇文章《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刊载在1881年8月6日的《劳动旗帜报》上,此后,由于该报编辑部中机会主义分子的影响越来越大,恩格斯就停止为该报撰稿。——第18、196、201、267页。

11 指卡·考茨基的文章《国际劳工法》,文章没有署名,发表在1881年8月13日《劳动旗帜报》第15号上。——第18、200、202、204、214页。

12 不列颠工联第十四年度代表大会于1881年9月12—17日在伦敦举

行。—— 第 18、201、203 页。

13　1881 年 8 月 16 日甘必大本来要在夏隆（巴黎的一个区），在他的选区的选民会上发表演说，但与会者不让他讲话。—— 第 21、391 页。

14　见黑格尔《逻辑学》第 1 册第 2 篇第 2 章的注释：从微分学的应用得出的微分学的目的。—— 第 22 页。

15　1880 年美国医生亨·斯·唐纳在纽约创造了特殊的记录：他做了一个绝食一个多月（从 6 月 28 日至 8 月 7 日）的实验。—— 第 24 页。

16　1881 年 8 月 12 日在伯利维尔（巴黎的一个区）选民大会上，甘必大发表了自己的纲领，他自己也把它说成是“机会主义的”。这个演说证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彻底放弃了他们过去的民主改革纲领，即 1869 年甘必大在伯利维尔宣布的纲领。

关于 8 月 16 日的大会见注 13。

马克思在下面谈到的甘必大的“意大利的无耻行径”，是暗指他的意大利出身（甘必大的父亲生于热那亚）。—— 第 24 页。

17　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张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和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被称做集体主义派。他们的领导人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因此又称盖得派—— 这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更为普遍的一种称呼）。从 1879 年工人党成立之日起，在它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结果于 1882 年引起了党的分裂（见注 78）。—— 第 25、212 页。

18　1881 年 12 月 29 日至 1882 年 1 月 16 日，马克思和他的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在威特岛的文特诺尔（在英国南部）养病。—— 第 27、40、42、246、283、288、314 页。

19　指北明翰自由协会于 1882 年 1 月 3 日召开的北明翰市选民的例行年会。在大会上发言的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北明翰的议员）约翰·布莱特和市政官员、议员张伯伦，完全赞同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对爱尔兰的政策。其中，他们对政府为施行所谓 1881 年爱尔兰土地法而采取的那些措施进行了辩护。

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为了使爱尔兰农民脱离革命斗争，1881年8月22日利用议会通过了爱尔兰土地法，在某种程度上限制英国大地主为所欲为地对待佃农。1881年土地法规定，如果佃农按时交付了租金，大地主就没有权力任意把佃农从土地上赶走；租金的数额十五年固定不变。尽管土地法使大地主在把土地卖给国家时有利可图，并且规定的租金数额仍然非常高，英国的土地占有者还是反对这个法令的实施，力求保持他们在爱尔兰的不受限制的统治地位。——第28页。

20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都柏林英国大地主大会，是1882年1月3日在阿伯康公爵主持下召开的。召开大会的正式借口是讨论副专员——被任命为施行与1881年爱尔兰土地法有关的那些措施的官员——的活动。大地主们借口这些官员的资历和阅历不足，以及议会没有规定他们的权限，断定副专员们在解决降低大地主们所得的租金时不公道。大地主们要求政府立即审理他们的上诉书，并且颁布赔偿损失的法令，以赔偿他们在政府批准降低租金时可能遭受的损失。英国大地主们这些行为背后的真正目的是阴谋破坏土地法。——第28页。

21 由于1880年在爱尔兰广泛开展了拥护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英国议会于1881年3月通过了在国内实行戒严的法令：停止宪法保障，实行戒严，同时派出军队把那些拒绝交纳租金的佃农强制迁出。——第28页。

22 指威廉一世1882年1月4日的谕旨，由他本人和俾斯麦签署。在谕旨中威廉要求今后把政府的所有法令当作国王本身的立宪意旨。威廉援引授予普鲁士国王以个人领导政府政策的权力的普鲁士宪法第四十九条，命令大臣和官员们杜绝对于普鲁士国王这一“宪法权力”的任何“怀疑”。——第29页。

23 指1878年6月2日德国无政府主义分子卡尔·爱德华·诺比林谋刺威廉一世的事件。诺比林用装散弹的猎枪向威廉射击。诺比林的行刺和在他之前帮工麦·赫德尔1878年5月11日的行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并在帝国国会中要求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合适借口。——第29、164、206、277、335、444页。

24　虚无主义者，是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俄国反动政论中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的称呼。在七十年代这一概念在俄国已逐渐不用，可是外国资产阶级报刊仍用它来称呼所有的俄国革命者。——第30页。

25　“蛊惑者”是德意志反动集团从1819年起对德国知识分子和大学学生会会员中间参加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这些人在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以后的时期内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了要求统一德国的政治性的游行示威。反动当局对“蛊惑者”进行了迫害。——第30页。

26　内务大臣尼·巴·伊格纳切夫在1881年两次（6月和9月）由自己选定地方自治局中的“行家”参加讨论国内政策中的某些实际问题——移民、卖酒等问题。由于这个缘故，十二个地方自治局会议要求不是偶尔地，而是经常地邀请地方自治局的代表参加立法活动，其人选不是由政府指定，而是由地方自治局本身推选。——第30页。

27　卡·施拉姆的文章《卡尔·毕尔克利和卡尔·马克思》（《Karl Bürkli und Karl Marx》）载于1881年12月24、31日的《工人呼声》第52和53号。

关于下面提到的那些在英格兰银行建立时代的信用货币发明者们，见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36章）。——第32、258页。

28　暗讽威廉一世在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时期逃往英国（作为普鲁士王位的继承人，威廉在1861年以前拥有“普鲁士亲王”的封号）和他玩弄立宪问题。威廉在英国和自由党的领袖——罗素、帕麦斯顿等人保持密切的关系，同时由于正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制订德意志帝国宪法草案，而注视着那里的事态进程。——第33页。

29　马克思指的是德国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泰奥多尔·蒙森，德国政治活动家欧根·李希特尔和德国教授、进步党议员阿尔伯特·亨奈耳于1881年11—12月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上的发言。这些人的发言充满了效忠普鲁士国王的忠君保证；这些发言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

1881—1882年第五届第一次例会》[第1卷]，自1881年11月17日会议开幕起到1882年1月30日闭幕止。1882年柏林版第21—32、84—87、405—406页（《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es. Ⅴ. Legislaturperiode. Ⅰ. Session 1881/82.》[Bd. Ⅰ]. Von der Eröffnungssitzung am 17. November 1881 bis zur Schlußsitzung am 30. Januar 1882. Berlin, 1882, S. 21—32, 84—87, 405—406）。—— 第33页。

30 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米·巴枯宁于1868年创建的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 第34、259、362、369、395、412页。

31 这里所说的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是由党内右翼领袖马隆和布鲁斯发起于1881年10月中旬，兰斯党代表大会（见注227）前夕建立的，并为该代表大会批准。右翼领袖建立全国委员会企图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 盖得和拉法格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排除出去。为了这个目的全国委员会在全部六个联合会都选派同样数量的代表（每个联合会五名）的基础上建立，这个时期法国工人党在组织上分为六个联合会：中部联合会联盟，东部联合会联盟，北部联合会，南部联合会联盟，西部联合会联盟和阿尔及利亚联合会。因为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只存在前面三个联合会——其中有两个处于马隆和布鲁斯机会主义集团的影响之下—— 而其余的三个只存在于纸上，所以它们的“代表”（他们是右翼领导耍弄各种不体面的伎俩进入全国委员会的）不具有合法的全权。于是除了五名集体主

义派—盖得派，即北部联合会的代表以外，全国委员会的其余二十五名成员都是马隆和布鲁斯的拥护者，这样，党的领导就落到了右翼分子的手里。1882年1月，为了回答关于把盖得派开除出中部联合会的决议，五个盖得派的代表退出了全国委员会（见注247）。——第34页。

32 指法国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法国叫做集体主义派纲领）。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以后，以茹·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请求（通过保·拉法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制订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年5月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订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纲领的理论性的导言是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参与制订纲领的实践部分（见本卷第223—224页）。纲领发表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1880年7月10日《无产者报》和1880年7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在法国工人党哈佛尔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作为“最低纲领”被通过。纲领的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634—636页。分裂以后，在1882年9月圣亚田代表大会上，这一纲领被机会主义分子（可能派）否决了，他们通过了一个新的改良主义纲领，但同时召开的马克思派的罗昂代表大会确认这一纲领仍然有效。

恩格斯这里所指的盖得同马隆、布鲁斯信徒们的论战，是由于法国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引起的。论战中，盖得尖锐地批判了试图修正纲领的全国委员会成员茹尔·若夫兰。巴黎十八个选区的党的小组于1881年底推选出若夫兰作为党的候选人参加巴黎市参议会的选举，若夫兰在巴黎蒙马特尔区发表的他的竞选纲领草案中，完全不顾马克思起草的纲领的理论部分，并且在纲领的实践部分中用一些含糊不清的说法偷换了实践部分的一系列原则上很重要的具体条文（关于八小时工作制和集体所有制等等）。1882年1月8日，马隆和布鲁斯集团利用自己在全国委员会中的优势坚持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决议中委员会同意把若夫兰提出的机会主义的竞选纲领作为党推荐的纲领。——第34、224、400、443页。

33 指 1882 年 1 月 7 日《无产者报》第 171 号发表的若夫兰给《平等报》主编盖得的信，若夫兰在这封信里一方面维护他在巴黎蒙马特尔区选举时提出的竞选纲领，另一方面断言，违反党的纪律的不是他，而是盖得，因为似乎他的活动是取得了全国委员会的同意，而盖得反对全国委员会的决议。—— 第 34、259 页。

34 显然指 1881 年 7 月 25 日《科伦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短评《俄国》（《Rußland》）。短评否认某些欧洲报纸的舆论，即似乎米·德·斯柯别列夫将军于 1881 年夏天访问巴黎是受俄国政府的委托为法俄同盟奠定基础，并就剥夺政治侨民避难权的条约等等进行谈判。《科伦日报》断言，斯柯别列夫访问巴黎是带有私人性质的访问。—— 第 35 页。

35 关于若夫兰的文章见注 33。

桑维耳耶通告 是在 1871 年 11 月 12 日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由巴枯宁派的汝拉联合会通过的。这个通告的目的在于反对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 年）的决议，并且对总委员会的活动作了诽谤性的攻击。在通告里要求立即召开全体代表大会根据无政府主义原理来修改国际的章程。总委员会发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以回答桑维耳耶通告，这个内部通告彻底揭露了巴枯宁主义者的分裂活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3—55 页）。—— 第 35 页。

36 由于农民极端贫困的处境引起六十至七十年代农民运动的高涨，沙皇政府不得不同意稍微降低赎金。1881 年 12 月 28 日颁布了一项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对俄罗斯农民，每一份地降低一个卢布赎金，对乌克兰农民，则赎金原有额降低 16%。—— 第 35 页。

37 指德意志帝国国会 1881—1882 年度会议关于废除 1874 年 5 月 4 日的限制宗教法庭活动法的辩论。在 1882 年 1 月 12 日会议上，三百五十五名议员中，二百三十三名投票赞成废除这项法令，一百一十五名反对，七名弃权。

这项法令是在所谓的“文化斗争”时期—— 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打着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旗号实行一些措施时期—— 德意志

帝国国会通过的一项法令。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反对支持德国分立主义倾向和反普鲁士倾向的天主教会的。

“去卡诺萨朝圣”，恩格斯说这句话是讽喻俾斯麦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对教权派和教皇利奥十三作出的巨大让步。俾斯麦在同天主教会冲突的初期，1872 年 5 月曾在帝国国会中宣称：“我们决不去卡诺萨”，并同教皇庇护九世争吵过，但在七十年代末，他为了首先同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作斗争，需要天主教中央党的支持，便几乎废除了在冲突期间颁布的全部反天主教的法令，并且迫使反天主教政策的主要拥护者辞职，并同新教皇利奥十三和解。俾斯麦对教权派和教皇利奥十三作的让步，等于承认“文化斗争”毫无结果。

“去卡诺萨”一词的来源是：1077 年德皇亨利四世为了祈求教皇格雷哥里七世取消开除他的教籍的决定，到卡诺萨城堡（意大利北部）去做了一次屈辱的朝圣。——第 35 页。

38　教皇至上主义者　是天主教的一个极端反动的派别的代表人物，这个派别反对各民族教会的独立性，捍卫罗马教皇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的权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教皇至上主义的影响的加强，表现在欧洲若干国家建立了天主教党，表现在梵蒂冈宗教会议于 1870 年通过了教皇“永无谬误”等等教条。

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教皇至上主义者是指所谓的中央党——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 年由于普鲁士邦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帝国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461—527 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7—11 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

分立主义者 是在德国西南部的中小邦的统治阶级当中于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产生的对普鲁士政府持反对派立场的派别的代表人物。这些德意志邦的天主教上层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认为自己由于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而受到压制，抱有分立主义的情绪，不满俾斯麦的使德意志普鲁士化的政策，要求与中央政权分立，要求地方私法和特权不可侵犯等。居民主要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德国南部各邦的分立主义者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支持中央党。

波兰人、丹麦人和亚尔萨斯人 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一些单独的党团，也是支持天主教中央党的。在帝国国会中存在这些党团说明，在德意志帝国内存在这样的少数民族，它们不满强行将一系列领土归并德国和不满强迫它们德意志化的政策。这一政策，俾斯麦特别残酷地在1814—1815年归并德国的一些波兰省份和由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划归德国的亚尔萨斯和洛林加以推行。帝国国会的丹麦人议员是1867年归并普鲁士和1871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前丹麦省份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斯坦的代表。在这些民族党团当中，波兰派和亚尔萨斯派最为强大。除了所有这些党团共有的分立主义倾向之外，还有反对俾斯麦在“文化斗争”时期（见注37）的反教权主义政策的斗争，使波兰派和亚尔萨斯派（作为天主教徒的代表）团结起来。

进步党人 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安于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84年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 第35、233页。

39 马克思指俾斯麦1882年1月9日在帝国国会会议上的发言，他不得不承认工人群众对政府改善工人状况的意图极不相信。俾斯麦的发言载于

《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1882年第五届第一次例会》[第1卷]，自1881年11月17日会议开幕起到1882年1月30日闭幕止。1882年柏林版第486页（《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es. V. Legislaturperiode. I. Session 1881/82.》[Bd. I]. Von der Eröffnungssitzung am 17. November 1881 bis zur Schlußsitzung am 30. Januar 1882. Berlin, 1882, S. 486）。——第36页。

40　指列奥·弗兰克尔1881年12月18日和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1881年12月7日就马克思夫人逝世写给马克思的信。

当时弗兰克尔在伐茨（奥匈帝国）的所谓“国事犯监狱”里，他是1881年6月以违犯出版法的罪名被关进去的。

马克思谈到的在日内瓦的符卢勃列夫斯基的“波兰党”，指的是波兰侨民的马克思主义者小组，符卢勃列夫斯基从七十年代末起居住在日内瓦期间同这些人关系密切。——第36页。

41　指若夫兰致《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信（见注33）。——第36页。

42　1882年2月初，马克思根据医生的建议赴阿尔及尔治病，在那里从1882年2月20日住到5月2日。在赴阿尔及尔途中，马克思顺便去看望了他在阿尔让台（巴黎城郊）的大女儿燕妮·龙格，在那里从2月9日住到2月16日。——第37、39、266、270、279、394页。

43　关于马克思同海德门的相互关系见马克思1881年7月2日给海德门的信（本卷第194—196页）。——第52页。

44　暗讽德国反动诗人弗里德里希·博登施泰特和黑格尔分子、四卷本美学著作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费舍的忠君演说。马克思把他们比作贺雷西和味吉尔，是指这两个古罗马诗人写了赞颂奥古斯都皇帝（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的颂歌和颂诗一事。——第52页。

45　大概是指马克思到扎尔特博默耳（荷兰）对他的表舅莱昂·菲力浦斯的一次访问。马克思曾于1862年8月底至9月初，1863年12月21日至1864年2月19日及1865年3月19日至4月8日访问过这个城

市。—— 第 55 页。

46 讽指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外行诗作，他的诗常常因不合德语语法而成为笑柄。—— 第 57 页。

47 按照医生的建议，马克思于 1882 年 5 月 2 日离开阿尔及尔，经过马赛和尼斯到达蒙特卡罗，马克思在这里住到 6 月 3 日，约住了一个月时间。—— 第 57、309、394 页。

48 马克思指的是恩格斯在地中海海岸热那亚的逗留。恩格斯从瑞士赴英国的途中曾于 1849 年 10 月 5—6 日在热那亚停留，当时由于法国政府禁止他经过法国领土，他被迫取道意大利。—— 第 58 页。

49 新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卡文迪什勋爵和原任副大臣托马斯·亨利·伯克于 1882 年 5 月 6 日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被小资产阶级的恐怖组织“不可战胜者”的成员所刺杀，该组织中有过去的芬尼亚社社员。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赞成芬尼亚运动仿效者的无政府主义恐怖策略（关于这一点见本卷第 335 页恩格斯的信）。他们的意见是，这些无政府主义行动对改变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政策不会产生丝毫影响，结果只会使爱尔兰革命者遭受不必要的牺牲，使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遭到破坏。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了一个芬尼亚社社员的秘密组织—— 爱尔兰革命（或共和）兄弟会，开展了争取爱尔兰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的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其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芬尼亚社社员们脱离了爱尔兰人民的广大阶层，并且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和当时进行的英国的一般民主运动联系起来。在六十年代后期，在芬尼亚社社员长期准备的 1867 年 2—3 月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此组织的活动逐渐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它的革命性作了很高的评价，并竭力使它走上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道路。—— 第 59、335 页。

50 艾希特纳赫的游行（确切的名称是：舞蹈游行）是中世纪以来每年圣灵降

临节在卢森堡的城市艾希特纳赫举行的游行，目的是对1374年猖獗过的圣维特舞蹈病不再复发表示感谢。游行者不用普通的步伐，而是做一些前进和后退的复杂动作。——第60页。

51　在德国剧作家和评论家亚·缪尔纳的剧本中，占决定地位的是似乎人命中注定必不可免的劫数和命运。这些所谓"命运的悲剧"的不可缺少的浪漫主义特征是不幸的日子，不祥的预言，引起祸患的武器等等；其情节通常都以悲剧结尾。——第61页。

52　马克思从蒙特卡罗赴阿尔让台的途中于1882年6月3—5日在卡恩逗留了三天。——第64页。

53　以达来朗为代表的法国外交在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上提出了所谓王朝正统原则（le principe de la légitimité），按照这一原则，欧洲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被推翻的"正统的"王朝应一律恢复。其中，威廉一世选帝侯在黑森—加塞尔的王位和奥诺雷四世侯爵在摩纳哥的王位因此"恢复了"。——第65页。

54　加里波第于1882年6月2日患支气管卡他逝世。——第66页。

55　戏指旧约中关于尘土是蛇的食物的那些说法（圣经《旧约》《创世纪》第3章第14行和《以赛亚书》第65章第25行）；并暗指达尔文的著作《关于在蚯蚓活动下腐植土的形成……》1881年伦敦版（《The formation of vegetable mould, through the action of worms…》. Ld., 1881）。按照达尔文的结论，蚯蚓掘松土地并使之通过自己的肠子，大大促进腐植土的形成。——第66页。

56　暗讽阿·克尼格的著作《论与人们交往》1804年汉诺威版（《Ueber den Umgang mit Menschen》. Hannover, 1804）。在这一著作中，作者规定了一个人在同其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的行动准则。克尼格的著作中有很多肤浅的议论和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第67页。

57　从6月6日到8月22日马克思住在阿尔让台他女儿燕妮·龙格那里。——第67、394页。

58　指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阿·赫普纳对恩格斯的请求。赫普纳在

1882年5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允许他在美国翻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以他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给赫普纳的回信见本卷第339—341页）。——第70页。

59 恩格丁——瑞士（格劳宾登州）的山地疗养区，那里有能治病的泉水；它以其非常有益于健康的气候而闻名。——第75页。

60 指从1879年延续到1882年的埃及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那些最后的事件，斗争的目的是反对已对埃及实行财政监督的英法资本家对埃及进行殖民掠夺。运动的导火线是英法代表以债权强国的身分于1878年进入埃及政府（当部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以曾经提出过“埃及是埃及人的”这一口号的阿拉比—帕沙上校为首的进步军官的代表。由于开罗卫戍部队起义，埃及总督（执政者）被迫于1881年9月实行宪制；12月埃及召开了国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同年成立的“祖国党”，它是那些对外国资本的把持感到不满的自由派的地主和商人同依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支持的、怀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军官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祖国党”的目的是要实现埃及独立并在国内建立宪制。1882年2月，埃及组成了一个民族政府（阿拉比在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它开始解除外籍官员在埃及担任的职务，并计划实行民主改革。但是，1882年夏天，英国挑起了和埃及的冲突，开始了反对埃及的军事行动，虽然埃及军队（在阿拉比率领下）和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抵抗，结果还是英国侵略者获得了胜利。英国占领者在1882年9月占领开罗以后，对民族运动的参加者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埃及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抗议英国进攻埃及和炮轰亚历山大里亚的公开集会，是盖得派的中部的联合会（见注247）在《公民报》编委昂利·布里萨克、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的参与下，于1882年7月底在巴黎组织的。盖得派关于埃及问题的决议，向阿拉比—帕沙和“祖国党”表示敬意，认为他们无愧于自己承担的伟大任务。——第75、89、90、353页。

61 马克思指的是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840年7月15日在伦敦缔结的四国协定。协定的目的是要列强对土耳其苏丹采取军事援助的措施，来解决因列强、特别是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在埃及和近东的霸权实行

竞争而引起的1839—1841年的埃及危机。八十年代初，埃及民族运动的增长使英、法达成了暂时协议，在这些年代，它们如果想对埃及实行干涉，首先要使这种干涉具有全欧洲的性质。但是，在英国于1882年7月挑起和埃及的冲突的前夕，法国政治活动家的意见发生了分歧：赞成干涉的有前任总理甘必大和1882年1月接替他这一职务的弗雷西纳（后者建议哪怕是只在苏伊士运河区同英国共同行动，这一建议在7月29日被众议院否决，并且引起了他的内阁的辞职）。主张对德国实行复仇政策的人，激进派的首领克列孟梭，反对干涉，证明这种干涉只能加剧英法矛盾而有利于德国。——第75页。

62　指梅林在卡尔·希尔施嗾使下，于1882年7月2日在资产阶级报纸《威塞尔报》（《Weser-Zeitung》）上发表的文章。当时梅林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者，在这里对《社会民主党人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借口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编辑部有分歧，强调报纸"不近人情"，由于该报，照他的话说，德国工人遭到了接二连三的迫害，他并且声称社会改良主义者赫希柏格是报纸的实际的鼓舞者。梅林在他文章的结尾扬言要对报纸继续进行揭露。此外，他还说马克思的身体不好，并推测说马克思对《资本论》所进行的工作未必能够完成（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梅林这些攻击的态度见本卷第337—338页）。恩格斯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登一条他在报纸上撰稿的消息，以回答梅林的文章（见本卷第337—338页）。《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1882年7月27日该报第31号上发表的题为《关于私人的事情》（《In eigener Sache》）这一针对梅林的尖锐的简讯中，采用了恩格斯的这些指示。——第77、337、344、365、398页。

63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简讯登载在1882年8月6日的《时报》上。——第79页。

64　1882年8月11日至9月8日，恩格斯在英国东部海岸的大雅默斯市休养。——第79、347页。

65　指《战斗报》编辑部的四个成员保·布鲁斯、戴诺、马鲁克和穆泰以及编辑部秘书拉毕斯基埃尔于1882年8月2日退出该报一事。他们和该报编辑利沙加勒决裂，形式上的借口是拉毕斯基埃尔发表过关于他不再作

编辑部责任秘书的声明，说是因为利沙加勒限制了他的主动性，监督他的行动，并且对上述编辑部成员、拉毕斯基埃尔的朋友在报上的言论都实行了监督。——第81页。

66 马克思同女儿劳拉·拉法格在赴斐维（瑞士）途中，1882年8月23日至27日在洛桑逗留。——第82页。

67 马克思指的是他1881年7月26日至8月16日和1882年2月9日至16日在阿尔让台的逗留。——第83页。

68 1882年8月2日，当时在《欧洲》杂志工作的比利时社会党人塞扎尔·德·巴普因他妻子的事引起嫉妒，而企图枪杀两年来一直很要好的该杂志编辑部秘书阿尔图尔·杜韦尔惹，但只使他受了重伤。11月3日举行的审判宣告德·巴普无罪。——第84页。

69 关于埃及战争，见注60。——第85页。

70 指1882年8月23日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主席卡尔·威廉·西门子在南安普顿举行的协会第五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西门子的发言曾发表在1882年8月24日《自然界》杂志第669期上。

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成立于1831年，在英国一直存在到现在；其历次年会的资料都以报告的形式发表。——第86、114页。

71 恩格斯在1848年10月下半月至1849年1月中旬和1849年7月12日至10月初住在瑞士（在日内瓦、洛桑、纽沙特尔和伯尔尼）；这一年，他访问了斐维（窝州），在这里从7月24日住到8月20日左右。——第87、357页。

72 马克思同女儿劳拉·拉法格从1882年8月27日至9月25日住在瑞士的斐维（窝州）。——第88、349、363、394页。

73 指1882年6月11日在罗马和整个意大利为了永久纪念1882年6月2日逝世的朱泽培·加里波第所采取的隆重措施。——第88页。

74 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鲁道夫·微耳和，早期曾是达尔文主义的拥护者，在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成了反动分子，极端仇视社会主

义，并且猛烈地攻击达尔文主义。例如，1877 年他要求停止教授达尔文主义，断言达尔文主义同社会主义运动有密切联系，因而对现存社会制度具有危险性。—— 第 89 页。

75　1878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13 日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在外交压力和军事恫吓的逼迫下，俄国政府把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提交会议审订。

圣斯蒂凡诺和约是俄国得胜的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后于 1878 年 3 月 3 日缔结的。它加强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并引起了得到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强烈抗议。

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的代表出席了柏林会议。会议的结果是作出解决东方危机的暂时决定。当然这次会议未能消除列强的世界政治的紧张关系。—— 第 90 页。

76　卡比尔人—— 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柏柏尔部落群体，居住在朱尔朱腊山脉、君士坦丁省山区和奥雷斯高原。—— 第 93 页。

77　马克思在从瑞士回伦敦途中，9 月 28 日至 10 月初住在阿尔让台他女儿燕妮·龙格那里。在这期间，他去过巴黎几次。—— 第 95 页。

78　指 1882 年秋同时召开的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亚田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昂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

在 1882 年 9 月 25 日在圣亚田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上，党的右翼的拥护者（可能派）在代表资格证上耍尽种种诡计从而取得了多数，大会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派小组（盖得派）退出大会，并于 9 月 26 日聚会于罗昂，在这里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留在圣亚田代表大会的可能派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取消了由马克思参加制定并在 1880 年 11 月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并且赋予一些区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的权利。在圣亚田代表大会所赞同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纲领导言中，用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了”（见本卷第 369 页）。代表大会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和积极活动家—— 盖得、拉法格、马萨尔、杰维尔、弗罗什和巴赞开除出党，并确定了党的新的名称—— 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即所谓可能派的党。

1882年9月26日至10月1日在罗昂举行的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确认自己忠于1880年批准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宣布它是党的所有联合会和小组统一的和必须遵守的纲领，肯定全国委员会背叛了党的原则，剥夺它的权力并将其成员开除出党。分裂的结果，法国工人党（罗昂代表大会保持了这个名称）在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虽然党在人数上减少了，但在组织上巩固了。国内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和主要是大工厂的巴黎无产阶级的一些小组成了它的可靠的基础。跟可能派走的是还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巴黎手工业工人，以及南部（马赛）和西部（布列塔尼）小组（合作社派、工团派、蒲鲁东派等等）。——第97、369、379、391、411、413页。

79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用英语套用欧洲各国在中世纪早期流行的一个谚语的开头，这个谚语是：《The devil was sick，the devil a saint would be：the devil grew well，the devil a saint was he》（“魔鬼病了，魔鬼想当圣人；魔鬼病好了，魔鬼就是圣人”）。这个谚语另外的不同说法里，有把《a saint》（“圣人”）一词换作《a monk》（“修道士”）的。——第97页。

80 马克思从1882年10月30日到1883年1月12日住在英国南部的文特诺尔（威特岛）。——第98、392、393页。

81 1881年古巴（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地）起义的参加者安·马塞奥将军和他两个军官同伴被西班牙政府逮捕后于1882年8月在加迪斯逃出监狱并在英国领土直布罗陀要塞寻找政治避难。他们8月20日来到要塞，但立即被捕并被引渡给西班牙警察。英国当局这种公然的出卖，是违背当时的英国—西班牙条约的，根据这个条约，英国当局有权不向西班牙政府引渡政治流亡者。英国警察和下令引渡马塞奥及其同伴的直布罗陀法官的违法行为，在下院10月31日和11月7日两次会议上被揭露。在这两次会议上，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的阁员（艾释黎、查·迪耳克等人）替直布罗陀当局的行为辩解，同时千方百计袒护伦敦政府，否认政府参与这件可耻的事情。——第98、104页。

82 看来，这里指布里萨克和布伊这两个编辑退出《平等报》编辑部，以及《平

等报》和《公民报》编辑之一的皮卡尔在政治上的动摇。——第99页。

83　1882年10月意大利大选中，意大利社会党人安得列阿·科斯塔由伊莫拉和腊万纳两个市（在爱米利亚罗曼尼亚地区）选为议员，成了意大利第一个社会党人议员。

从1882年10月19日至23日举行了挪威议会选举，共和派取得了巨大胜利。——第99、451页。

84　指《平等报》编辑部同巴黎国民银行就日报《平等报》第4种专刊（1882年10月24日至12月28日出版）的出版经费问题的谈判。——第99、104页。

85　“带炸药的人”一词广泛流行于七十至八十年代的保守派中，用以称呼革命恐怖分子和制造及保存炸药的人。日报《平等报》第4种专刊在1882年11月11日第19号转载了11月6日《旗帜报》的电讯，用关于引渡“带炸药的人”（俄国政治侨民）的谈判来说明法国在这以前不久发生过的政治迫害。——第99页。

86　看来这里指《无产者报》刊载的全国委员会在圣亚田代表大会（见注78）上的报告的报道。报告几乎整个地是反对盖得、拉法格和法国工人党的革命派的其他主要活动家的，报告里还有从拉法格给马隆的一些信件里别有用心地挑出的片断。——第99页。

87　指瑞士政府1877年3月23日通过、1878年3月1日起生效的瑞士第一个工厂法《联邦关于工厂劳动的法令》（《Bundesgesetzbetreffend die Arbeit in den Fabriken》），和1882年颁布的《在同业公会法基础上制定的最新德国工商业条例，以及在维尔腾堡、巴登、巴伐利亚和亚尔萨斯—洛林实施该条例的有关法令，经修改、补充和增加，附有1876年4月7日通过的关于注册的互助储金会法，以及联邦会议通过的各项实施决定》（《Gewerbeordnung，die deutsche，in ihrer durch das Innungsgesetz erlangten neuesten Gestalt，mit den Einführungs- gesetzen für Württemberg，Baden，Bayern und Elsaß- Lothringen，den Abänderungen und Ergänzungen der Novellen und dem Gesetz über die eingeschriebenen Hülfskassen vom 7. April 1876，nebsten Ausführungs

—Verordnungen des Bundesrathes》)。这些资料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所需要的。——第100、104、376页。

88 在1882年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法国物理学家马赛尔·德普勒展出了他在米斯巴赫至慕尼黑之间架设的第一条实验性输电线路。——第100页。

89 马赛尔·德普勒的关于电气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发表在1881和1882年间《电光》(《La Lumière Electrique》)杂志上。他关于输电的专门著作《远距离输电作业》和《论电流的分布》,发表在1881年《电力》(《L'Electricité》)杂志第15和16期上。——第100页。

90 马克思指传遍了英国报刊的轰动一时的新闻:英国国家债务管理局局长里弗斯·威尔逊和舍布鲁克勋爵作为受托人和保证人参加了得克萨斯"加尔威斯顿和伊格尔"铁路股份公司。议员们在1882年11月6日下院会议上提出了质问,认为身居国家财政系统要职的英国官员不容兼当投机企业的保证人,因此里弗斯·威尔逊和舍布鲁克辞去公司保证人的全权。——第100、107页。

91 指直布罗陀的英国当局引渡古巴起义参加者一事(见注81)。——第101页。

92 马克思在这里暗指1882年11月6日和7日下院会议上关于埃及事件(见注60)的辩论。——第101页。

93 亨·奥尔登堡的文章《科学社会主义原理》(《Die Grondlage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刊载在欧·李希特尔博士编《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80年苏黎世版第1年卷下半册第1—13页。——第101页。

94 全国理事会(这是根据党的罗昂代表大会的决定为了同可能派的全国委员会相抗衡在里昂各党小组基础上建立的,设在里昂市)的宣言发表在1882年11月5日《平等报》周报第3种专刊第47号上,标题是:《工人党。全国理事会》。——第104页。

95 恩格斯指的是1882年11月6、7、9日下议院关于埃及事件(见注60)的

辩论。——第 104 页。

96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侨民格奥尔格·福尔马尔发表在 1882 年 11 月 9、16、30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6、47、49 号上的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题目是《论法国工人党的分裂》（《Zur Spaltung der französischen Arbeiterpartei》），署名福。——第 104、109、400、413 页。

97　指盖得、拉法格及法国工人党的其他积极活动家由于在罗昂代表大会（见注 78）以后在里昂、罗昂、蒙吕松、韦森、圣夏蒙以及其他城市发表的演说而受法庭审讯一事。法院侦查员爱德华·皮康传唤盖得和巴赞于 11 月 14 日，拉法格于 11 月 21 日到蒙吕松市初级法院出庭，罪名是煽动国内战争、凶杀、抢劫和纵火；但是被告公开宣布拒绝出庭。10 月 7 日起住在巴黎的拉法格于 12 月 12 日被巴黎警察逮捕。1883 年 4 月底，拉法格、盖得和多尔莫瓦被木兰市陪审法庭判决六个月徒刑和罚款。盖得和拉法格从 1883 年 5 月 21 日起在巴黎的圣珀拉惹监狱服刑。——第 108、405、407、436 页。

98　这里说的赛米尔·穆尔的数学研究是指他所写的对马克思独创的微分学论证方法（关于这个方法并见本卷第 21—23 页恩格斯 1881 年 8 月 18 日给马克思的信）的几页意见。马克思在 1882 年 11 月 22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穆尔的意见作了回答（见本卷第 110—111 页）。马克思在数学领域的研究工作还在六十年代就开始了。从那时起他在许多年期间，系统地钻研了代数学，探讨了数学分析，阅读并摘录了著名数学家的著作，在专门的笔记本上作了大量的札记，并在 1878—1882 年期间写作了微分学简史。——第 108、110 页。

99　马赛代表大会是法国工人第三次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和法国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879 年 10 月 20 日至 31 日在马赛举行。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派（集体主义派）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蒲鲁东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展开了激烈而尖锐的斗争，结果以茹尔·盖得为首的马克思派占了上风。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决议：关于工业国有化和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关于工人夺取政权的决议、关于成立法国工人党（它的正式名称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联合会”，但实际上只称工人党）

的决议。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党章并提出了制定党纲的任务。马克思写道："法国真正的工人党的第一个组织是从马赛代表大会开始建立的"(见本卷第 111 页)。—— 第 109、111、114、400 页。

100 指发表在 1882 年 11 月 18 日《平等报》第 4 种专刊第 26 号上的拉法格给蒙吕松市法院侦查员爱德华·皮康的公开信，回答他 11 月 15 日发出的要拉法格于 11 月 21 日出庭的命令。拉法格在这封信中无情地嘲笑了皮康并声明拒绝出庭(另见注 97)。—— 第 109 页。

101 马克思指的是 1882 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形成的以马隆和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的党(见注 78)。—— 第 110 页。

102 指谢·艾莫斯对 1882 年在伦敦再版的约·西·凯的小册子《对埃及人的掠夺》(《Spoiling the Egyptians》)所写的书评，标题是《〈对埃及人的掠夺〉:修订本》(《《Spoiling the Egyptians》:revised version》)，发表在 1882 年 10 月《现代评论》第 42 卷上。凯为了回答艾莫斯，写了《〈对埃及人的掠夺〉。答辩》(《《Spoiling the Egyptians》. A rejoinder》)一文，发表在 1882 年 11 月《现代评论》第 42 卷上。—— 第 111 页。

103 恩格斯摘引的是普卢塔克的著作《马利乌斯传》第 11—28 章的一段，载于文集《德文本日耳曼古代史史学家》1847 年柏林版第 1 卷上册第 61 页(《Die Geschichtschreiber der deutschen Vorzeit in deutscher Bearbeitung》. Bd. Ⅰ, Hälfte Ⅰ. Berlin, 1847, S. 61)。—— 第 112 页。

104 恩格斯下面摘引的是凯撒的著作《高卢战记》第 4 卷第 1 章。—— 第 113 页。

105 关于法国工人党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后成立的两个党的力量对比，见恩格斯 1882 年 11 月 28 日给伯恩施坦的信(本卷第 399—404 页)。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利用了1882年11月24日拉法格来信中的材料。

恩格斯提到的"马雷—果达尔事件"，是指无政府主义的新闻工作者果达尔和一批盖得的拥护者之间发生的两次事件。在巴提诺尔(巴黎的一个区)的一次会议上，果达尔起来捍卫激进派代表无政府主义者昂利·马雷，因为盖得派指责他卖身投靠法国煤气公司。果达尔无法

推翻《战斗报》的编辑无政府主义者克里埃向盖得派证实的这一事实，便要求同克里埃决斗。同时，果达尔企图挑起同盖得派——《公民报》的编辑们搏斗。大概伯恩施坦在一封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盖得派在果达尔事件中所采取的立场采取了否定态度。——第 114、384 页。

106　恩格斯这里显然是指自己的手稿《自然辩证法》，特别是《运动的量度。——功》这一章。

《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353—657 页）是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之一，是恩格斯对自然科学进行多年的大量研究的结果。与此有关的材料是在 1873 年至 1886 年期间写成的。在这段时间里，恩格斯仔细研究了有关自然科学最重要问题的大量文献，并写成了十篇大致完成了的论文、篇章和一百七十多个札记和片断。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由于全力倾注于完成《资本论》的出版工作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不得不在实际上停止了自己的写作。《自然辩证法》作为未完成的著作留了下来，恩格斯在世时，与此有关的材料没有发表（关于这一著作的写作和发表的情况的详细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注 243）。——第 114、115 页。

107　拉法格的文章《中了魔的部》（《Le Ministère enchanté》）发表在 1882 年 11 月 24 日《平等报》第 4 种专刊第 32 号上，文章中对前财政部长莱昂·萨伊的活动进行了尖刻的批评。——第 115、408 页。

108　1882 年 6 月 6 日至 8 月 20 日和 9 月 28 日至 10 月初，马克思住在阿尔让台自己女儿燕妮·龙格那里。——第 115 页。

109　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 1882 年 11 月 14 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 1882 年 10 月 28 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 378—380 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 1878 年 10 月 21 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

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110 《一七九一年五月三日波兰宪法的产生和消灭》1793年版第1—2册（《Vom Entstehen und Untergange der Polnischen Konstitution vom 3-ten May 1791》. Th. Ⅰ—Ⅱ，1793），此书在莱比锡匿名出版，作者是伊·波托茨基，胡·柯伦泰和弗·克·德莫霍夫斯基。——第116页。

111 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首届世界工商业展览会建造的。——第117页。

112 关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论战，是从1882年10月8日《人民报》第13号上的罗·康德拉里的文章《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批判》（《La critica dell'economia radicale moderna》）开始的。康德拉里在这个报纸上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其中有他在1882年10月15日《人民报》第14号上发表的《拉弗勒和洛贝尔图斯》（《De Laveleye e Rodbertus》）一文，这篇文章谈到了拉弗勒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意见。

此外，在1882年10月22日、29日和11月5日、12日《人民报》第15、16、17和18号上还发表了康德拉里的文章。在17号上还刊登了卡洛·卡菲埃罗给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标题为《论战》（《Polemica》）。——第118页。

113 指1882年底英国工联代表团访问法国一事。代表团团长是工联报纸《劳动旗帜报》的编辑乔治·希普顿。这一代表团的旅费是由拉芒什海峡隧道修筑股份公司支付的，代表团的目的就是为建造这一隧道进行宣传。

代表团到巴黎的访问，奠定了说明法国可能派“对外”政策特征的可能派同英国自由派工联主义紧密联合的基础。——第118、121页。

114　显然是指刊登全国委员会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那一号《无产者报》(见注 86)。——第 119 页。

115　特林基特人(或科洛希人)是组成科洛希语言家族的阿拉斯加东南部的印第安人部落群体。

前俄罗斯美洲是恩格斯对俄国在北美(阿拉斯加)的领地的称呼。按照 1867 年 3 月 30 日条约,这些领地被沙皇政府用七百二十万美元(当时的一千一百万卢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

恩格斯在这里开玩笑地暗指卡·马克思于 1880—1881 年间编写的详细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美国进步历史学家摩尔根研究了包括易洛魁人在内的北美印第安人的氏族团体,写成了自己关于原始社会关系的著作。摘要中有许多马克思的批语和他自己的论点,摘要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1 年俄文版第 9 卷第 1—192 页。——第 120 页。

116　格·路·毛勒用一个总题目联起来的一些著作,是研究中世纪德国土地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这些著作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 年慕尼黑版(《Ein- 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 Hof-, Dorf- und Stadt-Verfas- 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München, 1854);《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 年厄兰根版(《Geschichte der Marken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Erlangen, 1856;《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 年厄兰根版第 1—4 卷(《Geschichte der Fronhöfe, der Bauernhö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Ⅰ—Ⅳ. Erlangen, 1862—1863);《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 年厄兰根版第 1—2 卷(《Geschichte der Dor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Ⅰ—Ⅱ. Erlangen, 1865—1866);《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 年厄兰根版第 1—4 卷(《Geschichte der Städte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 Ⅰ—Ⅳ. Erlangen, 1869—1871)。——第 121、122、412、452 页。

117　恩格斯指写《自然辩证法》(见注 106)。——第 121 页。

118　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这几行字,是附带写在劳拉·拉法格 1882 年 12

月 12 日寄给他的信上的。劳拉通知说，保尔·拉法格刚被巴黎警察局逮捕。按照警察当局的命令，拉法格必须被送往蒙吕松城受审。—— 第 122 页。

119 1618—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是第一次全欧洲的战争，它是欧洲国家的不同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采取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斗争的形式。战争是由于在捷克发生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制度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势力进攻的起义而开始的。随后参战的欧洲国家形成了两个阵营。罗马教皇、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的天主教公爵在天主教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新教国家：捷克、丹麦、瑞典、荷兰共和国以及经过宗教改革的德意志各邦。新教国家曾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手—— 法国历代国王的支持。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战争于 1648 年以签订使德国在政治上的分散性固定下来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而告终。—— 第 125、444 页。

120 《萨克森之镜》（《Sachsenspiegel》）—— 中世纪的一部德国法典，是对地方（萨克森）习惯法的阐述。—— 第 125 页。

121 指谢·安·波多林斯基的文章《社会主义和体力的单位》（《Ⅱ socialismo e l'unità delle forze fisiche》），该文于 1881 年初次发表于《人民》杂志第 14 年卷新丛刊第 3—4 期第 13—16 和 5—15 页；后来以《人的劳动和力的单位》（《Menschliche Arbeit und Einheit der Kraft》）的标题转载于德文杂志《新时代》1883 年第 1 年卷第 413—424 页和第 449—457 页。—— 第 127 页。

122 马克思显然是指 1847 年那些事件。1847 年 3 月 28 日，在与德国民主主义侨民有联系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 Zeitung》）第 25 号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粮食投机的文章。文章显然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斐迪南·沃尔弗写的，他兄弟是个粮食投机商。斐迪南·沃尔弗对他兄弟的活动很愤懑，后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谈了他和兄弟争吵的情况。—— 第 134 页。

123 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出书的销售情况，该书由奥·

迈斯纳出版社于1872年在汉堡出版。——第134、421页。

124　总委员会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查·布莱德洛之间发生论战的原因，是布莱德洛在1871年12月11日发表公开演说时，以及他12月16日刊登在《东邮报》上的信件和1872年1月发表在他自己出版的《国民改革者》周报上的那些信件中，都有诬蔑马克思的言论。在1871年12月1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指出了布莱德洛的这些言论和统治集团及资产阶级新闻界诽谤国际的运动有密切的联系，在1871年6月《法兰西内战》宣言发表后，这种诽谤更是有增无已。马克思在《东邮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对布莱德洛进行揭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14—515、523—525页）。——第139页。

125　1870年9月1日和2日在色当进行普法战争的决战，结果法军大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84—94页）。

法国人在色当的溃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使法国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共和国。——第140页。

126　1874年1月格莱斯顿解散了议会并确定在短期内举行新的选举，以期在下院取得自由党的稳固的多数。但是选举却使保守党取得稳固的多数。因此1874年2月17日格莱斯顿宣告他的内阁辞职，2月21日产生以迪斯累里为首的保守党内阁（恩格斯对1874年英国选举的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41—547页）。

布莱德洛参加了反对派，并用“破坏圣像者”这个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希望于1874年当选为下院议员。

从1547年起，下院的会议就在韦斯明斯特宫内的圣斯蒂凡教堂举行。——第141页。

127　这封信可能是马克思写给伦敦书商乔治·里弗斯的。——第143页。

128　大概指亚·雷德格雷夫的著作《工厂和工场法，1878年，附有序言、大量注释和详细索引》1879年伦敦第2版（《The Factory and workshop act, 1878, with introduction, copious notes, and an elaborate index》. Second edition. London, 1879）。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时利用了雷德格雷夫的工厂报告。——第143页。

129 恩格斯引用的是1878年莱比锡出版的《反杜林论》德文单行本第一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30—231页）。——第144页。

130 讲坛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德文为Katheder）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44、153、416、445页。

131 卡尔·考茨基在他的书中（第169页）援引列奥纳特·欧勒的计算法，按照这种计算法，从纯粹理论上说，十二年多一点时间，人口会增加一倍。恩格斯在作复利计算时把一个克劳泽定为$\frac{1}{60}$盾。——第145页。

132 恩格斯引自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20—621页）。——第146页。

133 指普鲁士当局于1848年9月26日在科伦实行的戒严，由于戒严《新莱茵报》停止出版至1848年10月12日。——第147页。

134 格·维尔特的这首诗发表在1881年8月11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标题《一八四八年吞食社会主义者的人》（《Ein sozialistenfresser aus dem Jahre 1848》）是仿照路·白尔尼的著名抨击性小册子《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1837年巴黎版（《Menzel. der Franzosenfresser》. Paris, 1837）。——第147页。

135 恩格斯指以《十戒》（《Die zehn Gebote》）为题的两篇文章中的头一篇；这篇文章登在1881年1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上，对盗窃人民财物的普鲁士国王们进行了揭露；还指爱·伯恩施坦用利奥这个笔名发表在1881年1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号上的文章《纪

念日》(《Ein Gedenktag》),该文是为路易十六被处死八十八周年而发表的。——第147页。

136 这封信的信封上的地址是爱琳娜·马克思用法文写的:"俄国,圣彼得堡,喀山桥旁,列斯尼科夫住宅,互贷协会,尼·丹尼尔逊先生"。——第147页。

137 指各国政府公布的正式材料,马克思把它们比作英国议会公布的东西,统称为蓝皮书(Blue Books)。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封面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第148页。

138 指克列孟梭1880年10月29日在马赛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提出了实行个别的民主和社会改革的纲领,例如:用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代替各种间接税;取消工资计算簿;工人参加调整工厂内部规则;把工人储金会转交工人自己管理;禁止一定年龄以下的童工劳动;缩减工时等等。这个纲领中的一些项目是克列孟梭从法国工人党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34—636页)中抄来的。

克列孟梭的演说反映了资产阶级激进派想通过向工人献媚来积累政治资本的愿望。——第148页。

139 马克思指保·拉法格《法国土地所有制的变动》(《Движение поземель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во Франции》)一文的手稿。该文被译成俄文发表在《基础》月刊1882年第3—4期和第6期上。——第148页。

140 指丹尼尔逊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况》(《Очерки нашего пореформе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一文,该文用尼古拉—逊的笔名发表在《言语》杂志(1880年10月)上。

马克思下面谈到自己想读完丹尼尔逊和《言语》的论战时,指的是《言语》杂志的诺言:"在今后出版的一期杂志中将要继续讨论这篇文章中的问题"(《言语》杂志1880年10月号第142页上对丹尼尔逊文章的编者按)。但是以后的几期杂志上再也没有提到过丹尼尔逊的文章。——第149页。

141 爱·雷·朗凯斯特的著作《论退化。达尔文主义中的一章》1880年伦敦版(《Degeneration. A chapter in darwinism.》London, 1880)的俄译本,1883年在彼得堡以《论退化。进化论(达尔文主义)中的一章》(《Вырождение. Глава из те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дарвинизма)》)的书名问世。——第151页。

142 指斐·多·纽文胡斯的著作《卡尔·马克思。资本与劳动》(《Karl Marx. Kapitaal en Arbeid》)1881年海牙版,这是用荷兰文写的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所作的简明通俗的叙述。纽文胡斯的这一著作的第二版于1889年出版。——第152页。

143 《当代伟人传》(《Mannen van beteekenis in onze dagen》)是1870—1882年间在哈勒姆出版的一套丛书。由恩·巴尔森主编出版的丛书第十册中刊载了阿·凯迪伊克写的马克思传。——第153页。

144 马克思同布伦坦诺的论战是由于1872年3月7日《协和》杂志第10期上登载了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写的一篇诽谤性文章而引起的。布伦坦诺采用匿名的方式,企图破坏马克思作为一个学者的威信,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伪造所使用的材料。《人民国家报》于1872年6月1日发表了马克思的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97—101页)之后,7月4日《协和》杂志第27期上刊登了布伦坦诺的第二篇匿名文章,对此马克思也作了答复,发表在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上(同上,第118—127页)。马克思逝世以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泰勒继续进行布伦坦诺掀起的诽谤运动,恩格斯于1890年6月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序言中,以及1891年在小册子《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07—213页)中,对泰勒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在这本小册子的《文件》部分,恩格斯刊载了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信。——第153页。

145 斐·多·纽文胡斯在1881年1月6日信中告诉马克思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把一个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即:假使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

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由于苏黎世州委员会不允许在那里开代表大会，所以大会在库尔召开。

由比利时社会党人发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于 1881 年 10 月 2—12 日在库尔（瑞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十二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是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各国社会党的形成时期还没有结束。代表大会决定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第 154、226 页。

146　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和历史学家阿·雷尼亚尔为他写的关于爱尔兰历史的文章写信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龙格，是因为她在法国的《马赛曲报》上发表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670—700 页）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爱尔兰的政策而享有名声。

恩格斯这封信的结尾没有保存下来。——第 155 页。

147　苏格兰国民公约派是国民公约的拥护者，国民公约是在 1637 年反对查理一世专制政府的胜利起义之后，于 1638 年在苏格兰宣告成立的联盟。这个公约的参加者在捍卫长老会（加尔文教）的旗帜下行动，为争取苏格兰的民族自治、反对在国内实行专制制度而进行了斗争。苏格兰国民公约派同查理一世进行的战争，加速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第 156 页。

148　J. P. Prendergast:《The Cromwellian settlement of Ireland》. London, 1865, p. 7. ——第 156 页。

149　万第——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经济和政治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是反革命保皇叛乱的中心。——第 156 页。

150　“冒险家”（《Adventurers》）是流传于十六至十七世纪间的英国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绰号，他们是一些殖民公司和商业公司的参加者，投机商，资助冒险的、但会大赚钱的殖民企业和其他企业的银行家。他们因一家英国商业公司“商人冒险家公司”（《Merchant Adventures》）而得名。——第 157 页。

151　长期国会——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存在长达十三年（1640—1653）

而没有改选的一届英国国会。——第157页。

152 惩治法典（Penal Code或Penal Laws）是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上半叶时英国殖民者以反对天主教阴谋和反对英国国教的敌人作借口，对爱尔兰颁布的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是天主教徒的本地爱尔兰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些法律限制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继承、接受和转让财产的权利，并且广泛采取因极小的一点过失就没收他们的财产的做法，因而成为剥夺还保有土地的爱尔兰所有者的工具。惩治法典为信奉天主教的农民规定了苛刻的租佃条件，更便于英国的大地主和土地中间人奴役他们。这一法典也旨在消灭爱尔兰的民族传统：封闭爱尔兰的国民学校，对教师、爱尔兰天主教教士规定严厉的惩罚措施，等等。只是在十八世纪末，由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惩治法典的很大一部分才被废除。——第157页。

153 指拨给1795年建立的梅努特市爱尔兰天主教专门学校的津贴。皮特政府力图通过建立一所专门学校，把天主教僧侣和爱尔兰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利用这一点作为分裂爱尔兰民族运动的一种手段。——第158页。

154 指1801年1月1日起生效的英国和爱尔兰合并，合并使爱尔兰剩下的一点点议会自治也丧失了（爱尔兰议会被取消；爱尔兰议员到英国议会占一定数量的席位，但总是占少数）。这一合并巩固了英国对爱尔兰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础。——第158、333页。

155 指当时的爱尔兰大臣斯坦利（得比勋爵）于1831年在爱尔兰实行的学校体制。在爱尔兰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建立了一些统一的学校，而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分别讲授宗教课程。——第158页。

156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维·伊·查苏利奇1881年2月16日来信的答复。查苏利奇代表较迟加入“劳动解放社”的同志们，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

马克思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曾拟了四个草稿，把这四个草稿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关于俄国农民公社、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的综合性概述。给查苏利奇的信的草稿（除最后一稿，即

逐字逐句几乎完全与信相符的第四稿外）和原信都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8—269、430—452页）。——第159页。

157　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

“民意党”是由于革命的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发生分裂，于1879年8月产生的民粹派恐怖分子的一个秘密组织。——第159、173页。

158　这里和下面的引文见《资本论》第1卷第7篇第24章第1、7节。这些引文的文字和《资本论》第1卷的文字有差别，原因是马克思引用的《资本论》第1卷是1875年的法文版，而《资本论》第1卷中的译文是按1890年的德文第4版译出的。——第160页。

159　指1840年2月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1850年9月17日，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的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便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恩格斯又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最后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61、308、364、385页。

160　指恩格斯的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不要通奸》（《Du sollst nicht ehebrechen》）；可能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两篇题名为《十戒》（《Die zehn Gebote》）的文章，恩格斯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伯恩施坦。

这篇文章未曾发表。——第162页。

161　指卡·考茨基用辛马霍斯（Symmachos）这个笔名发表在1881年3月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号上的文章《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Der Staatssozialismus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第162页。

162　下面恩格斯批判的是谢夫莱1875年在哥达匿名出版的《社会主义精

髓》(《Die Quintessenz des Socialismus》)一书中阐述的观点。——第163页。

163 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金融部门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163页。

164 暗指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09)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中间在策略问题上的摇摆。其中1879年3月17日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里就在柏林及其郊区实行所谓"小戒严"问题发表的演说、以及1880年2月17日在萨克森邦议会中就开姆尼斯城第一选区的选举问题发表的演说,也反映了这种摇摆。1879年3月17日,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里的演说中声称,社会民主党将遵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因为它是一个改良党,而且是就这个字的严格意义上来说的,他否认"暴力"革命,认为那是荒谬行为。1880年2月17日,李卜克内西在邦议会的演说中说,既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立法机构的选举,它就不是一个变革党。——第164页。

165 弗·弗里茨舍和路·菲勒克于1881年2—5月访问了美国,这是德国社会工人党根据1880年8月20—23日举行的维登代表大会的决议派他们去的。访问的目的是进行宣传并募集党的经费。虽然他们在美国召开的群众大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他们为党募集了一千三百马克,但恩格斯认为,他们在访问期间,把"党的立场降低到庸俗民主派的和道貌岸然的庸夫俗子的水平",这是"不管用什么样的美国金钱"都无法补偿的,认为把他们派往美国是一种失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恩格斯1883年5月10—11日和1884年1月18日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第164、190、442页。

166 大概是指1881年2月3日下院根据格莱斯顿的提议所通过的一项在英国议会实行新的议事程序的决议。爱尔兰的反对派在下院里采取了妨碍议事的策略,使议会无法通过关于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法(见注167)法案,因此格莱斯顿就提出了议长有权随时打断发言者的发言并

将其逐出会议厅的决议案。—— 第 165、174 页。

167　英国议会在十九世纪曾经数次通过高压法（coercion bills）来镇压爱尔兰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在 1881 年初，下院通过了两个关于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法的法案。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境内实行了戒严，英国当局取得了特别的全权。—— 第 165、174、308 页。

168　1881 年土地法案从 1880 年年底起就在议会中讨论，但直到 1881 年 8 月 22 日才成为法律（见注 19）。—— 第 165、174、177 页。

169　关于 1881 年 3 月 7 日在波士顿召开的大会的报道，刊登在 1881 年 3 月 27 日和 4 月 17 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3 号和第 16 号上。—— 第 166 页。

170　德国民主流亡者的代表，其中包括各德国体操协会的会员，积极地参加了 1861—1865 年的美国国内战争，站在北美联邦一方。1861 年在圣路易斯城附近发生的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当时住在附近不远的很多德国侨民都加入了北方人的军队，并击溃了准备把圣路易斯交给南方奴隶主的州长杰克逊的军队。

德国体操协会在美国的许多城市里都有，是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德国民主主义的流亡组织，其中也包括工人的侨民组织的一种形式。1850 年 10 月 5 日，在费拉得尔菲亚代表大会上，这些协会联合成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在其成立初期同在美国的德国工人运动有联系。—— 第 167 页。

171　指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于 1881 年 3 月 13 日（俄历 1 日）刺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事。关于“民意党”见注 157。—— 第 167 页。

172　指莫斯特为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而写的一篇题为《完蛋了！》（《Endlich!》）的文章，该文刊登在 1881 年 3 月 19 日《自由》周报第 12 期上。3 月 30 日，莫斯特在伦敦被捕，5 月 2 日被交付法庭，6 月，以用外国语言写文章为政治谋杀进行辩护的罪名被判处一年半徒刑，实行强制劳动。—— 第 167、169、171 页。

173　指 1881 年 3 月 30 日和 31 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里讨论汉堡参议院和

普鲁士政府关于1880年10月在柏林和汉堡—阿尔托纳实行“小戒严”的报告。

所谓“戒严”或“小戒严”，就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09）第二十八条规定实行的措施。这些措施就是联邦各邦政府可以在个别的专区和村镇实行为期一年的戒严。在戒严期间，只有得到警察局的允许才能举行集会，禁止在公共场所散发印刷品，把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驱逐出该地，禁止或限制拥有、携带、运进和出售武器。—— 第170页。

174 法国的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昂·罗什弗尔在巴黎公社遭到镇压以后被驱逐出法国，于1874年来到日内瓦，在这里同俄国的政治流亡者建立了联系。“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寄给罗什弗尔一封信，请求他帮助委员会的代表列甫·加特曼组织反对沙皇政府的宣传工作。但是，1881年3月26日在《自由》周报上出现了一则消息，说日内瓦的俄国流亡者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发表声明，拒绝同罗什弗尔发生任何联系，并且说从来没有向他提供过情报。—— 第172页。

175 指对参加了1881年3月13日（俄历1日）刺杀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的民意党人（见注157）安·伊·热里雅鲍夫、索·李·彼洛夫斯卡娅、尼·伊·雷萨科夫、提·米·米哈伊洛夫、尼·伊·基巴耳契奇和格·米·格耳夫曼的审判。审判于1881年4月7—10日（俄历3月26—29日）进行。1881年4月10日作出判决：除格耳夫曼以外，所有参加谋杀的人都被判处绞刑。1881年4月15日（俄历3日）执行判决。由于怀孕而缓期的格耳夫曼被判处服无期苦役，于1882年2月14日死去。—— 第173页。

176 希沃斯岛的地震发生于1881年4月3—11日。由于地震有三千多人死亡，一千多人受伤；希沃斯城和附近的乡村差不多完全被毁。—— 第173页。

177 武器法（Arms Act）把一切未经许可携带武器的人看作是社会治安的破坏者，应依法惩办。1881年3月18日，英国议会通过了这个法律以对付爱尔兰，从4月6日起发布命令，规定一切没有特别许可证的人要

在4月15日以前就近向警察分局交出武器，命令还列举了从4月7日起禁止自由出售武器的郡和城市。——第174页。

178　爱尔兰民族土地同盟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迈克尔·达维特于1879年建立的群众性组织。土地同盟联合了爱尔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广泛阶层并得到了爱尔兰资产阶级中进步分子的支持，它在自己的土地要求中反映了爱尔兰人民群众对大地主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自发抗议。但是土地同盟的一部分领袖（帕涅尔和其他人）采取了不彻底的动摇的立场，力图把土地同盟的活动归结为争取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的斗争，也就是争取在不列颠帝国的范围内实行爱尔兰的有限自治，而下赞成革命民主派所坚持的消灭英国的大地主统治。土地同盟于1881年被英国政府查禁，但实际上它一直活动到八十年代末。——第175、333页。

179　恩格斯指的是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其中刊登了奥艾尔和倍倍尔就柏林和汉堡的“小戒严”发表的演说，以及倍倍尔就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发表的演说（见注173和183）。——第175页。

180　显然，恩格斯指的是李卜克内西的发言（见注164）。——第175、270页。

181　李卜克内西因在开姆尼斯的会议上发表演说，于1880年11月中旬被判处半年徒刑，关在莱比锡监狱中。——第176页。

182　显然是指英国议会于1861年通过的《侵犯人身法》（《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关于给莫斯特判罪的情况见注172）。——第177页。

183　关于“戒严”，见注173。

这里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于1881年3月31日和4月4日就1880年10月在柏林和汉堡—阿尔托纳实行“小戒严”和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所发表的两次发言。见《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652—661和744—756页（《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Ⅳ. Session 1881.》Bd. Ⅰ. Berlin, 1881, S. 652—661 u. s. 744—756）。倍倍尔的这两次发言还在1881年4月17

日—5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22号上发表过。

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是俾斯麦实行的所谓“劳工法”的一部分。草案规定为工人伤亡事故保险建立一个专门的帝国银行。用于保险的开支，三分之二由工厂主负担，三分之一由工人负担，但一年所挣工资低于七百五十马克的工人除外（由帝国国库替他们支付）。假如伤病者丧失了劳动力，保险仅在第五个星期开始生效，而在此之前的开支由互助保险会负担。倍倍尔对法律草案进行了详尽尖锐的批评，要求工人伤亡事故保险的开支全部由工厂主负担。法律草案到1884年7月6日才由帝国国会通过。——第178、212、382、399页。

184 暗指罗·普特卡默1881年3月30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他企图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在准备恐怖行动，并且引用了莫斯特的文章（见注172），这篇文章中多次使用了“弟兄”的称呼。——第178页。

185 马克思和他的一家曾住在梅特兰公园附近的梅特兰路41号。梅特兰路与南安普敦路交叉，名叫“南安普敦勋爵”的小酒馆显然是在南安普敦路上。——第180页。

186 指1881年爱尔兰土地法案中的一项条款，这个法案从1881年8月22日起成为法律（见注19）。——第181页。

187 激进派首领若·克列孟梭，就法国1881年3月进行的反对突尼斯的军事远征，抨击以茹·费里为首的政府。克列孟梭指责政府把资财白白耗费在只能削弱法国的军事冒险上。他加以抨击所持的又一个论据是，暴力征服“不开化”民族会减低法兰西民族道德上的威望。——第183页。

18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86—187页。——第184页。

189 这封信以及下面刊登的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曾被《纽约先驱报》在左尔格与该报记者谈话一文中引用过。《纽约先驱报》编辑部曾请求左尔格就俄国民意党人革命家列·尼·加特曼1881年6月从伦敦来纽约一事发表谈话。加特曼参加了1879年11月爆炸沙皇火车的准备工作，暗杀未遂，之后为了逃避警察局的迫害流亡到法国。由于俄国政府坚持

要求把他引渡回国，他在法国被逮捕。在民主舆论抗议的影响下，在维·雨果于1880年2月27日发表致法国政府的公开信要求不把加特曼引渡回国之后，他被驱逐出法国，随后在英国住下。在这里又提出了把加特曼引渡回俄国的问题，于是1881年6月3日加特曼又移居美国。纽约各报，包括《纽约先驱报》在内，报道了加特曼到达的消息。彼得堡各报对加特曼由英赴美一事表示怀疑，于是1881年9月10日的《纽约先驱报》就发表了它的记者与左尔格的谈话，同时刊登了马克思写在自己的名片上的给加特曼的推荐信，以及译自德文的恩格斯的信。——第185页。

190　银行假日（bank holiday）——英国的银行和其他机关职员不办公的日子。一年放假四次，通常都在星期一。——第186页。

191　指1881年6月5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的表示抗议通过对爱尔兰的高压法（见注167）的大会。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英国政府对爱尔兰人民的艰难处境承担责任，要求不再把未付地租的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和强制迁出，释放被捕的土地同盟（见注178）活动家，要求对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实行残酷镇压政策的爱尔兰事务大臣福斯特辞职。帕涅尔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演说，痛斥福斯特在爱尔兰的活动。——第187页。

192　索·彼洛夫斯卡娅装作加特曼的妻子，和他住在一所住宅里，从这里挖了一条通往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路基下面的地道，以爆炸沙皇的火车。对彼洛夫斯卡娅的处决见注175。——第187页。

193　1876年3月18日，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林格瑙遗嘱把将近七千美元——自己的一半财产——交给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他指定了奥·倍倍尔、约·菲·贝克尔、威·白拉克、奥·盖布、威·李卜克内西和卡·马克思为遗嘱执行人。林格瑙1877年8月4日在圣路易斯逝世之后，他的遗嘱执行人曾设法把他留下的这笔遗产转交给党来支配。但是俾斯麦通过外交压力终于阻止了把林格瑙遗产转交给社会民主党。——第190页。

19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90页。——第191页。

195 马克思援引自己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87页）。——第192页。

196 小拿破仑 是维克多·雨果在1851年法国立法议会的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中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1852年，雨果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Napoléon le Petit》）问世以后，这一绰号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第192页。

197 抗租者（anti-renters）是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纽约州那些拒绝向大土地占有者交租并要求把农场全部卖给他们的土地租佃者的称呼。租佃者对企图用暴力来收租的收租人进行了武装反抗。规模最大的租佃者的风潮发生在1836到1845年间。租佃者和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以妥协告终：1846年以后大土地占有者开始逐渐把自己的土地卖给租佃者。——第193页。

198 马克思可能指的是发表在1880年8月的《大众科学月刊》（《The Popular Seience Monthly》）上的亨·乔治的文章《卡尼在加利福尼亚的宣传鼓动》（《The Kearney agitation in California》）。——第193页。

199 指民主联盟，即1881年6月8日在亨·迈·海德门领导下建立的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不列颠的各种激进派团体的联合组织。联盟的纲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共九条：成年人享有选举权，议会任期三年，各选区平等，取消作为立法机构的上院，爱尔兰在立法方面独立自主，土地国有化等等。

在民主联盟的成立会议上，向与会者散发了海德门的小册子《大家的英国》（《England for all》），海德门在其中两章（第二章《劳动》和第三章《资本》）里，把《资本论》第一卷的许多章节作为联盟的纲领条文来加以阐述，但既没有提到作者，也没有提及这一著作本身，并且作了许多歪曲。

民主联盟存在了三年，1884年它被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第194、239、308页。

200 宪章运动——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为实现要求英国国家制度民主化的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而斗

争。关于宪章运动的意义，列宁说过："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76页）。——第195页。

201　恩格斯指一个叫作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思想流派，这个流派反映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派，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那里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202、316页。

202　红十字会1864年日内瓦公约——欧洲十六国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国际协定。日内瓦公约规定交战双方照顾伤病员并给予为伤员服务的医务人员以"中立"权。——第202、214页。

203　恩格斯摘自希尔施1881年8月11日给他的信。——第205页。

204　恩格斯指爱·伯恩施坦用《我们缺少知识分子》（《Es fehlt uns an Intelligenzen》）这一个标题发表的两篇文章。文章用利奥的笔名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1881年7月28日和8月11日第31和33号上。——第205、211页。

205　恩格斯指1881年8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社会政治评论"栏关于布莱德洛的通讯，这篇通讯开头的话是"无神论者布莱德洛准备宣誓……"。——第206页。

206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对茹·瓦累斯的评语："一个勇敢和非常重要的公社委员"（见1881年8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编辑部引用了瓦累斯发表的信件，他在信中拒绝了当法国众议院的候选人（巴黎有两个区推他为候选人），理由是他宁愿不从门口，而从起义人民的肩膀上进众议院。瓦累斯的信发表在1881年8月5日《巴黎公民报》（《Le Citoyen de Paris》）上。——第206页。

207　茹·瓦累斯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茹·格雷维的公开信发表在1879年2月初的《法国革命报》（《La Révolution Francaise》）上。——第206页。

208 新马德里联合会是1872年7月8日由被无政府主义的多数从马德里联合会开除出来的《解放报》编辑部成员建立的。他们被开除的原因是该报揭发了秘密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保尔·拉法格积极参与了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建立和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对无政府主义影响在西班牙的传播作了坚决的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为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斗争。恩格斯曾经为它的机关报《解放报》撰稿——第206页。

209 指1881年7月14—19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恩格斯在这封给伯恩施坦的信中接下去写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消息，几乎没有改动地登载在1881年8月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社会政治评论"栏里。——第207页。

210 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故作神秘，他们在大会上发言不用姓名，而用号码。（见《自由》周报1881年7月30日、8月6日和13日第31、32和33期上发表的代表大会的报告）。——第208页。

211 关于这个问题，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47—49、432—433页）。——第208页。

212 1881年6月在莱比锡曾经实行"小戒严"（见注173），结果，许多积极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出这个城市。1881年7月2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离开莱比锡，倍倍尔移居德勒斯顿，李卜克内西则移居莱比锡附近的勃斯多尔夫。——第211、366页。

213 看来恩格斯是指李卜克内西1881年5月31日在帝国国会所作的关于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另见注183）的发言的这样一处："历史发展进程的力量无限地超过最强大的统治者，俾斯麦公爵本人经历了一些惊人的变化，他诚实地承认……，他有个时期曾当自由贸易派的尾巴，接着又当保护关税运动的尾巴，现在则当社会主义的尾巴。"见《帝国国会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1881年柏林版第2卷第1455页（《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Ⅳ. Session 1881.》Bd. Ⅱ. Berlin, 1881,

S. 1455)。—— 第 212 页。

214　指格·威·哈特曼 1881 年 6 月 15 日在帝国国会就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所作的演说，关于这个演说，《自由》周报（1881 年 6 月 25 日第 26 期）写道："在讨论草案时，哈特曼匍匐在俾斯麦和帝国国会面前"。《自由》周报还摘录了《法兰克福报》发表的哈特曼的演说，其中有些摘录和正式速记发表的演说原文有出入，见《帝国国会速记记录。1881 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1881 年柏林版第 2 卷第 1757—1759 页（《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Ⅳ. Session 1881.》Bd. Ⅱ. Berlin, 1881, S. 1757—1759）。但据速记记录，哈特曼曾声明说，"社会民主党人……欢迎帝国首相提出的草案"，"人道志向"和"帮助穷人的道德感"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 第 212 页。

215　指 1881 年 8 月 21 日举行的法国众议院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第一次从法国工人党中提出了候选人。—— 第 212 页。

216　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专门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界的高级代表所组成。最初成立于十三世纪。在长时期内它拥有代表国王而不经过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枢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它仅保留着接受和审理殖民、宗教和行政事务方面的申诉的权力。参加枢密院的有许多委员会，其中包括考察科学、工业、医学和农业方面情况的各种委员会。枢密院实际上根本不参与管理现今的英国。—— 第 215 页。

217　第七次国际医学代表会议于 1881 年 8 月 3—9 日在伦敦举行。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曾提出活体解剖，即对动物的活体作手术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报刊在保护动物的幌子下发动反对活体解剖的运动，代表会议起来捍卫活体解剖。约翰·西蒙作了最明确的发言，揭露了运动的伪善性质。例如，他指出，提尔施教授为了获得治亚洲霍乱的药剂用老鼠做实验，总共只付出了几只老鼠的生命，而在 1848—1849 年和 1853—1854 年的霍乱流行期间，股份公司由于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润，继续用被污染的水供应伦敦南区的居民，结果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见《自然界》杂

志第 24 卷第 616 期第 370—375 页）。按照恩格斯的指示，《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活体解剖》（《Die Vivi－sektion des Proletariats》）的社论（1881 年 9 月 22 日第 39 号），以捍卫活体解剖。——第 215 页。

218 指代表法国工人党参加法国立法机关的候选人。1880 年 8 月，马隆、盖得和布鲁斯开始在里昂出版《解放报》，并按布鲁斯的建议签订了一个拒绝参加选举的保证书。但是 1880 年 11 月《解放报》停刊了，编辑部的保证书也就失效了。于是盖得提自己作候选人参加 1881 年 8 月 21 日鲁贝城的法国众议院的选举，这就成了马隆和布鲁斯对他进行猛烈攻击的原因。——第 216、220、390 页。

219 这封信是马克思对考茨基 1881 年 9 月 28 日一信的答复。考茨基的母亲敏娜·考茨基于 1881 年秋到达巴黎，考茨基在信中请马克思把她介绍给住在巴黎附近阿尔让台的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龙格。——第217页。

220 爱德华·伯恩施坦在其 1881 年 10 月 14 日信中（10 月 20 日寄出）告诉恩格斯，说 10 月初保尔·拉法格请他在朋友中为新版《平等报》筹款。他问恩格斯，他应该如何对待这种请求，因为他无法正确判断法国工人运动中的发展情况。——第 219 页。

221 指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在 1881 年 10 月 13 日的明信片中告诉恩格斯关于库尔代表大会（见注 145）的情况。贝克尔以瑞士的德国工人代表的资格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第 227 页。

222 恩格斯指的是 1881 年 10 月 27 日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三十一万二千票和十二个议席（克雷克尔、凯泽尔、狄茨、里廷豪森、施托累、布洛斯、哈森克莱维尔、李卜克内西、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福尔马尔、盖泽尔）。倍倍尔在被提为候选人的三个选区（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第四区）的任何一个选区中都没有当选，在美因兹区 12 月 15 日的复选中也没有当选。——第 227、230、257、315、451 页。

223 指 1848 年 4 月 10 日伦敦发生的事件。当时宪章派决定举行群众性的

游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本应前往议会大厦去呈递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第三封请愿书。政府禁止游行示威，为了防止举行游行示威，往伦敦集结了军队和警察。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取消游行示威，并说服示威者解散。游行示威的失败曾被反动势力利用来进攻工人和镇压宪章派。——第228页。

224　指1851年12月2日法国的路易·波拿巴政变。——第228页。

225　恩格斯指的是登载在1881年11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的报道，题目是《为什么我们在格洛高（萨克森）遭到了失败？》（《Warum sind wir in Glauchau (Sachsen) unterlegen?》）。——第229页。

226　指1879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议员凯泽尔在整个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下为政府的保护关税草案辩护的发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谴责了凯泽尔在帝国国会中为这个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有利的提案作辩护，同时也尖锐地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待凯泽尔的错误立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78—182页）。——第229页。

227　法国工人党兰斯代表大会于1881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四十四名代表，其中绝大多数是马隆和布鲁斯机会主义集团的走卒。代表大会确认了由马隆和布鲁斯发起于1881年10月中旬建立的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见注31）。

在兰斯代表大会上马隆和布鲁斯设法就“最低纲领”（见注32）通过了一个互相矛盾的决定。最低纲领被代表大会认为“不完全”符合“劳动人民的意向”，而且由于每一个选区的社会主义委员会都被赋予制订自己的纲领的权利，它实际上是被取消了。但是另一方面，代表大会决定，在通过新的纲领以前，这个纲领仍然有效。这个决定是用来反对团结在由茹尔·盖得领导的《平等报》周围的马克思派小组的。机会主义派的首领们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斗争，是想迫使盖得派首先公开反对他们，然后指责盖得派搞分裂活动，并把他们作为分裂分子开除出党。——第230页。

228 “未来的音乐”一语是从1850年发表的理查·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品》一书而来的；反对理·瓦格纳的音乐创作观点的人们赋予这个用语以讽刺的含义。——第231页。

229 在库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见注145）上暴露了波兰各社会主义小组之间的严重的意见分歧。考茨基在1881年11月8日信中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恩格斯，就《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什么立场征求他的意见。恩格斯在1882年2月7日给考茨基的信（见本卷第260—265页）中作了答复。——第231、244、264页。

230 燕妮·马克思关于英国演员厄尔文的文章登载在1875年的《法兰克福报和商报》上。她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当时英国报刊发动了一个反对厄尔文的运动。——第234页。

231 克·亨·菲·冯·威斯特华伦的著作《不伦瑞克—律内堡公爵斐迪南征战记》（《Geschichte der Feldzüge des Herzogs 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Lüneburg》）于1859年以两卷本出版，而在1871—1872年以六卷本出版。——第235页。

232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在马克思逝世后（1883年）才由恩格斯校订出版。这里马克思把自己著作的那一部分，即后来编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那一部分称为《资本论》第二卷。——第235、238、239、428、463页。

233 约翰·雷伊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The Socialism of Karl Marx and the Young Hegelians》）一文发表于1881年10月《现代评论》杂志第40卷。——第239、253页。

234 法国工人党的兰斯代表大会（见注227）没有解决关于党纲的问题，大会以后，盖得为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最后确定纲领而继续进行斗争。他采取了一切措施恢复出版《平等报》，该报第1号于1881年12月11日出版（第3种专刊）。在这一号里登载了下列文章：盖得的纲领性文章、拉法格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最近的帝国国会选举中的胜利的文章、盖得的关于兰斯代表大会的文章、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等。——第244页。

235　1881年12月在帝国国会中讨论关于遵守反社会党人法的问题时，议员布洛斯和哈森克莱维尔在发言中实际上表示不同意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意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该报1881年12月15日第51号的社论中，提出了强烈抗议。该报直接针对布洛斯和哈森克莱维尔写道，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不应当悲叹和埋怨诉苦，而应当揭露和控诉……不应当谈判，而应当抗议"。该报的这个抗议得到了帝国国会外该党的大多数和帝国国会内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支持。在专门会议（倍倍尔虽然不是帝国国会议员，也出席了会议）上，党团的成员们一致通过一项宣言，表示完全赞同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总方针。——第248、270页。

236　关于兰斯代表大会，见注227。——第248页。

237　1842年11月下半月，恩格斯第一次到英国，去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所属的纺纱厂学习经商。这次恩格斯在英国居住到1844年8月26日。——第250页。

238　指厄·贝·巴克斯的文章《现代思想的领袖。第二十三——卡尔·马克思》（《Leaders of Modern Thought. ⅩⅩⅢ.—Karl Marx》）。这篇文章发表于1881年12月1日《现代思想》杂志第3卷第12期。——第253页。

239　马克思暗指总委员会前英国委员改良主义者乔治·豪威耳发表诽谤性文章《国际协会史》一事。该文发表在1878年7月《十九世纪》杂志上，对第一国际的历史和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作用作了虚伪的论断。同年8月，马克思在《世俗记事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The Secular Chronicle, And Record of Freethought Progress》）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63—169页）。

1881年豪威耳作为斯泰福市的下院候选人参加选举，但遭到了失败。——第253页。

240　暗指反社会党人法（见注109）。——第256页。

241　套用亨·海涅《时代的诗》里的一首诗《安心》中的说法："德意志是温驯

的幼儿园，不是罗马的凶手窝”。——第256页。

242 《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1882年第五届第一次例会》［第1卷］，自1881年11月17日会议开幕起到1882年1月30日闭幕止。1882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es. Ⅴ. Legislaturperiode. Ⅰ. Session 1881/82.［Bd. Ⅰ］. Von der Eröffnungssitzung am 17. November 1881 bis zur Schlußsitzung am 30. Januar 1882. Berlin, 1882）。——第257、270页。

243 显然，恩格斯是暗指阿·赫普纳的小册子《我同莱比锡警察三年半的斗争》1874年不伦瑞克版（Meine 3½-jährige Leipziger Polizeicampagne. Braunschwein. 1874）。——第257页。

244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拿破仑法典，是广义地指整个资产阶级法体系，代表这个体系的是1804—1810年拿破仑执政时通过的五个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在被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的西部和西南部实施过，在莱茵省于1815年合并于普鲁士之后，这些法典仍继续在该省生效。——第257页。

245 暗指卡·毕尔克利同卡·施拉姆之间的论战（见注27）以及奥·采什科夫斯基的著作《论信贷和流通》1839年巴黎版（《Du crédit et de la circulation》. Paris, 1839）。——第258页。

246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1—472页）、《国际述评（三）。从5月到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4—514页）以及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同上，第111—114页）中都阐述了这些观点。——第259页。

247 联合会联盟（全称：Union fédérative du Centre——中部联合会联盟）是组成法国工人党的六个联合会之一。中部联合会联盟于1880年4月前形成，是巴黎各党组织的联合体；其中有八十个工团和小组。联盟的领导权控制在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派——可能派的首领布鲁斯、马隆和若夫兰等人（他们都参加了《无产者报》编辑部）手中。在1882年1月17日和24日中部联合会联盟会议上，《平等报》编辑部以及所有同盖得派

意见一致的党小组，都被开除出中部联合会联盟。正式投票赞成这个建议的只有二十八个小组，即占参加联合会联盟的小组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联盟的八十个小组中只有四十八个小组参加了上述会议）。盖得派在被开除出中部联合会联盟之后，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的联合会，叫做中部的联合会（Federation du Centre）。——第259、384、402页。

248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君主国家的反革命联盟，是为在欧洲镇压革命运动和维持封建君主制度于1815年建立的，到二十年代末业已瓦解。1830年和1848—1849年革命后曾多次企图复活这个同盟。——第260页。

249　指1866年的普奥战争。战争的结果，于1867年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代替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十九个德意志邦和三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南德意志各邦——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达姆斯塔德，于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的国家统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就不再存在了。

小德意志是一个由普鲁士领导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的统一德国的计划。——第260页。

250　恩格斯所说的拉萨尔派就是指全德工人联合会，它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从成立时起，联合会就处于拉萨尔的有力影响之下，因为拉萨尔直接参加了建立该会的工作，而且是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局限于争取普选权和争取和平的议会活动的斗争。拉萨尔派的联合会拒绝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主张建立由国家津贴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立场，从而支持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拉萨尔派的影响下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

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联合会的拉萨尔派的领导的机会主义活动作斗争，到七十年代初，德国的先进工人就退出了联合会。

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召开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革命政党，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人所共知的爱森纳赫派的政党或爱森纳赫党）。党的纲领中虽然反映了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但它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制订的。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奠定了“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牢固的基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93页）。——第260、370页。

251 联邦议会是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联邦议会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是履行中央政府职能的，而是起反革命的作用的，它干预德意志各邦内部事务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镇压各邦发生的革命运动。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联邦议会和德意志联邦一起不再存在了。——第261页。

252 1873—1874年，俾斯麦政府力图挑起对法战争。在这一冲突中，俄国政府坚决站在法国一边。由于俄国、奥地利和英国对德国政府施加压力，俾斯麦的这一企图没有实现。——第262页。

253 根据柏林会议（见注75）决议被奥地利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于1882年1月爆发了起义。起义是因通过占领区兵役制实施法案而引起的，在1882年2月上半月达到了高潮。沙皇政府极力利用起义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第262页。

254 指1863年1月在沙皇俄国统治的波兰土地上爆发的1863—1864年民族解放起义。起义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

1863—1864年波兰起义是波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它得到了俄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的热烈的同情和支持。欧洲工人同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结，在为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创造先决条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匿名书《柏林和圣彼得堡。俄德关系史普鲁士

论文集》1880年莱比锡版（《Berlin und St. Petersburg. Preussisch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Russisch－Deutschen Beziehungen》. Leipzig, 1880），出自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埃卡尔特的手笔。恩格斯在这儿所引证的第二个附件，是专谈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第263页。

255　在巴黎公社时期，勇敢地同巴黎无产阶级并肩作战的许多波兰革命流亡者中间，最著名的有符卢勃列夫斯基和东布罗夫斯基——他们都是有才能的、勇敢的和忠诚的统帅。符卢勃列夫斯基被任命为将军，指挥公社的三个集团军之一。东布罗夫斯基将军，起先领导保卫极其重要的某正面地段的工作，后来统率公社的第一集团军，1871年5月初，被任命为公社全部武装部队总司令。——第263页。

256　1846年2月，在波兰土地上准备了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贵族分子的叛变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逮捕，总发动遭到破坏，只出现了零星的革命发动。只有在从1815年起就由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于2月22日取得胜利，建立了国民政府，该政府发表过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

在克拉科夫起义时由代表农民和城市下层群众利益的邓波夫斯基所拟订的纲领中，既反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又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要求（把土地分给无土地的人，通过建立国家手工工场或“社会”手工工场来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计划）。克拉科夫起义于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签订了一项把克拉科夫归并于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263页。

257　恩格斯所谈的将来在德国出现宪制的“新纪元”，是暗讽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起当普鲁士国王）1858年10月登位摄政时所宣布的“自由主义方针”。1858年，摄政王勒令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并起用温和的自由派执政。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这个方针得到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名称“新纪元”。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新纪元”实际上为从1862年9月俾斯麦上台执政开始的容克公开军

事独裁作了准备，从而“新纪元”也就结束了。—— 第 263、276、361、414 页。

258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在 1882 年 2 月 1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建议成立一个第一国际类型的新的国际工人组织。—— 第 266 页。

259 指法国国民议会于 1872 年 3 月 14 日通过的法律；根据由司法部长杜弗尔提议、由法国国民议会的专门委员会制订的这一法律，凡参加国际的都要判处徒刑。—— 第 267 页。

260 恩格斯暗指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就社会民主党议员布洛斯和哈森克莱维尔的言论所通过的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于 1882 年 1 月 1 日报道了这一决议（见注 235）。—— 第 270 页。

261 指 1881 年 3 月 1 日民意党人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后形成的局势，当时亚历山大三世由于害怕秘密的“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可能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而躲在加特契纳。—— 第 277 页。

262 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3 章《货币或商品流通》。—— 第 278 页。

263 在 1882 年 2 月 24 日的信中，燕妮·龙格告诉马克思说，爱琳娜·马克思拒绝了普罗斯比尔·利沙加勒向她提出的求婚。—— 第 284 页。

264 指卡·希尔施的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Le Socialisme en Allemagne》），该文发表于 1882 年 3—4 月《新评论》杂志第 15 卷，署名为“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Un socialiste allemand）。—— 第 289、291 页。

265 恩格斯指小册子《1755 年和 1882 年的土地国有化。1775 年托马斯·斯宾斯在太恩河畔新堡宣读的一篇讲稿。1882 年重印出版，亨·迈·海德门作注和序》1882 年伦敦、曼彻斯特版（《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Land in 1775 and 1882. Being a Leckture delivered at New-castle-on-Tyne, by Thomas Spence, 1775. Reprinted and edited,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by H. M. Hyndman, 1882》. London, Manchester, 1882）。—— 第 290 页。

266 指“铁的工资规律”。这是拉萨尔在他的小册子《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复信》1863 年苏黎世版第 15—16 页

(《Offnes Antwortschreiben an das Central-Comité zur Berufung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congresses zu Leipzig》. Zürich, 1863, S. 15—16)上的提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规律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6页。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和杜尔哥关于最低工资规律的主张，是指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版于1817年在伦敦出版)第73—499页(Ricardo, D.《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Third edition. London. 1821. p. 73—499)和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建立和分配的探索(1766)》，载于《杜尔哥文集》，欧·德尔的新版本，1844年巴黎版第1卷第10页(Turgot:《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1766)》. In: OEuvres de Turgot. Nouvelle édition par E. Daire. Tome Premier. Paris 1844, p. 10)。对李嘉图和杜尔哥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见《剩余价值理论》第1分册第2章第3节和第2分册第15章第2、3节)。——第291、355页。

267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的校样。筹备出这一版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发起的。直接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这篇序言的，则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密切关系的彼·拉甫罗夫。这篇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1月21日写就，并在1月23日将原件寄给拉甫罗夫。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1882年2月5日《民意》杂志上。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序言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普列汉诺夫译)于1882年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出版。

恩格斯没能从拉甫罗夫那里收到序言的德文原稿，因为它留在巴黎拉甫罗夫的卷宗里(当时，由于沙皇政府的坚决要求，拉甫罗夫已被驱逐出巴黎并转到了伦敦)。1882年4月17日左右，拉甫罗夫才把原稿的副本寄给恩格斯，但是同年4月13日，序言就已经根据《民意》杂志发表的俄文文本译出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号上。恩格斯对译文不满意，它是一个不出名的俄国人译的(见本卷第304—305页)。

后来，序言的德文原稿手稿找到了，1948年《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发表了手稿的真迹复制。——第295、304页。

268 “基督他复活了吗？”——由复活节问候语“基督复活了。”变来的开玩笑的说法。——第295页。

269 伦敦西区索荷广场玫瑰街6号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工人俱乐部所在地，该俱乐部在八十年代由德国和英国支部组成。德国支部是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第一个分支，曾与德国流亡无政府主义者莫斯特的《自由》周报有密切联系。——第296页。

270 恩格斯指莫斯特及其拥护者在《自由》周报上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策略及其国会党团代表的立场的一再攻击。如1881年帝国国会选举前夕莫斯特号召自己在德国的拥护者竭力阻挠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选入帝国国会（对莫斯特和《自由》周报的立场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恩格斯1879年7月1日、1880年4月1日给约·贝克尔的信，马克思1879年9月19日给弗·左尔格的信）。——第296页。

271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159），它在八十年代设在伦敦西区托登楠街49号。——第296、359页。

272 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燕妮在伊斯特勃恩逗留期间（1881年6月底到7月20日左右），劳拉·拉法格到那里去过。——第297页。

273 指法国保险公司“国民联合公司”，当时保尔·拉法格在该公司工作。——第300页。

274 指保·拉法格的文章《法国土地所有制的变动》（《Движение поземель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во Франции》）。该文曾译成俄文刊登在《基础》杂志1882年第3—4期和第6期上。

劳拉在1882年3月2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拉法格的第二篇文章彼得堡当时还没有收到，杂志的编辑，为了发表第一篇，正等待着它。——第300页。

275 指皇帝查理五世在1541年借口与定居在阿尔及利亚的海盗作斗争而对阿尔及利亚（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进行的不成功的进军。西

班牙军队在阿尔及尔城下被土耳其军队打得惨败之后，在阿尔及利亚其他一切设防地点也被赶了出去。——第300页。

276　1882年4月初，社会民主党议员盖泽尔收到一封纽约寄来的挑衅性的匿名信，信中说德国似乎正在酝酿着起义。盖泽尔把信的内容报告了警察局并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在声明中断言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本不把革命当做自己的目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82年4月13日第16号上，以《请摊牌吧！》（《Bekennt Farbe!》）为题的社论中尖锐地批评了盖泽尔的言行，并指出，正相反，党的任务就是要在德国加速革命的变革。——第305页。

277　指1882年4月20日《科伦日报》第109号上一篇题为《君士坦丁堡》（《Konstantinopel》）的通讯；通讯揭露了已获得土耳其的铁路租让权的著名的奥地利铁路投机商摩里茨·希尔施男爵的投机手腕。——第305页。

278　由于不满情绪在爱尔兰人民群众中日益增长，格莱斯顿的英国政府采取某些措施，废除了1881年在国内实施的高压法（见注167）；1882年5月2日，释放了议会的爱尔兰议员，地方自治的拥护者——帕涅尔、达维特、狄龙和奥凯利；同时撤换了已提出辞呈的“高压法的拥护者”——爱尔兰总督弗·托·库伯（帕麦斯顿的继子——威·弗·库伯—坦普尔的侄子）和爱尔兰事务大臣福斯特，并任命卡文迪什勋爵代替后者。——第309页。

279　恩格斯指1882年在爱尔兰大量发生的、由于爱尔兰佃农的困难处境所引起的许多抗暴行动；在这一年内，国内杀死英国地主、他们的代理人、英国官员和其他人的数字增加了一倍。——第309页。

280　显然是指恩格斯的著作《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7—336页）。——第311页。

281　见《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3章。——第312页。

282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反对社会民主党议员哈森克莱维尔和布洛斯的机会主义立场而采取的行动（见注235）。由于这一行动，社会民主党人布罗伊埃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两封公开信（1月19日第4

号和2月23日第9号），信中指责该报不客观，滚到了无政府主义的泥坑等等，并且宣称他同意布洛斯和哈森克莱维尔的观点。驳斥布罗伊埃尔的文章登在1882年1月19日、26日和2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和第9号上。——第315页。

283 马克思在这里和后面暗讽奥芬巴赫的滑稽歌剧《盖罗尔施坦大公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个歌剧的主角由法国著名女演员和歌唱家奥当斯·施奈德尔扮演。——第322页。

284 恩格斯以讽刺的口吻把有机会主义思想的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会议员同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立宪主义者相比，当时民主共和主义者给立宪主义者起了“抱怨派”（Heuler）这个绰号。——第327页。

285 指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施拉姆的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Rückblicke auf die sozalistische Bewegung in Deutschland》）的文章，该文发表在1879年8月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1年卷上。这篇文章是1878年10月在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发表的纲领性的言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第三节。《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82—190页），对这篇改良主义文章作了详细分析和致命的批判。——第328、329、338、445页。

286 “硫磺帮”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打架闹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磺帮”成了普通用语。1849—1850年在日内瓦的一个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小集团曾经开玩笑地以“硫磺帮”为名。1859年，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在自己的诽谤性的言论中把这个“硫磺帮”的活动同马克思及其拥护者联系起来。马克思在自己著名的抨击性的著作《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04—415页）里，驳斥了这种诽谤。——第329页。

287　恩格斯叙述的事情是在他参加过的1849年5—7月德国西南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发生的。关于这件事，见他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329页。

288　恩格斯第一次直接署名在1881年12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上发表了悼文《燕妮·马克思（冯·威斯特华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19—321页）。但恩格斯认为发表他的文章《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同上，第327—336页），是他以报纸撰稿人的身分第一次正式在该报出现（1882年5月4日第19号上）。——第331页。

289　指1882年5月14—21日在巴黎举行的中部联合会联盟（见注247）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平等报》派代表被开除出党。《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82年6月1日第23号上发表的短文《法国》（《Frankreich》）中斥责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平等报》于1882年6月11日在第3种专刊第27号上译载了该信提到的短文中的一段话。——第331页。

290　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这封信是针对1882年5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上的社论，于1882年7月11日左右写成的；社论是伯恩施坦写的，用笔名利奥发表，标题为《爱尔兰局势》（《Die Situation in Irland》）。伯恩施坦把恩格斯这封信的原件给了李卜克内西，后者加进了一些编者的话，把这封信的大部分发表在1882年7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9号《论爱尔兰问题》（《Zur irischen Frage》）一文中。同时，李卜克内西对该信加了编辑部的论战的结语和下列引言："爱尔兰的一个朋友，是少见的一个熟悉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人，从伦敦给我们写来了下面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上阐述的某些观点的不同意见"。该信已发表的那部分原件已经丢失；保存下来的只是一部分，即从"道地的愚蠢，就是纯粹巴枯宁主义的、广告式的、毫无目的的'以行动进行的宣传'"几句话一直到该信的末尾部分。恩格斯在1882年8月9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对未征得他的同意就发表该信提出了抗议。——第332、344页。

291　绿带会员（Ribbonmen，出自ribbon——带子一词）是十八世纪末在爱

尔兰北部发生的爱尔兰农民运动的参加者，他们结成了秘密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佩带绿带作为标记）。绿带会员袭击地主庄园，谋杀他们最仇恨的大地主及其代理人。

白衣团员（White boys）是爱尔兰农民运动的参加者的名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这个运动发展成了反对英国大地主压迫的广泛起义（为了使别人认不出自己，该组织的成员经常夜间出动，把脸涂黑并穿上白短衫）。十九世纪，多数白衣团团体同绿带会组织合并了，还有一部分白衣团团体继续用原来的名称一直活动到十九世纪末。

岩石队长（Captain Rock）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爱尔兰产生和活动的反对英国压迫者的各种秘密农民团体成员的统称。

月光队长（Captain Moonlight）是秘密绿带会对大地主等人提出警告时通常用的化名。—— 第 332 页。

292 解放天主教徒是指英国议会于 1829 年取消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其中大部分是爱尔兰人）获得了被选入议会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提高了四倍。英国统治阶级打算利用这种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和天主教徒土地占有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 第 333 页。

293 关于芬尼亚运动见注 49。—— 第 333 页。

294 亚拉巴马号事件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事件，它是因后者在 1861—1865 年美国内战期间给予南部诸州以军事援助而引起的。英国政府为了本国纺织厂厂主的利益，力图阻挠美国工业的发展，为南部诸州建造和装备了军舰，这些军舰的行动使北部诸州的贸易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有一艘是私掠船的“亚拉巴马号”，它击沉了约七十艘北方诸州的船只。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赔偿由“亚拉巴马号”和其他私掠船给美国公民的财产造成的全部损失。就这一问题在华盛顿召开的委员会于 1871 年 5 月 8 日作出了把亚拉巴马事件移交日内瓦仲裁法庭审理的决定。根据这个法庭在 1872 年 9 月 14 日的裁决，英国应当赔偿美国的金额共计一千五百五十万美元。英国为了力图确保美国不干涉爱尔兰事务，并争取美国不去支持爱尔兰的革命者，便作出让步

并服从了仲裁法庭的决定。——第333页。

295　暗指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流亡者约翰·莫斯特在伦敦出版的《自由》周报，它的编辑是卡尔·施奈特。该报的特点是使用极端革命的词藻和粗暴攻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活动家的政策和策略。——第336页。

296　指同1882年5月14—21日举行的中部联合会联盟代表大会有关的事件（见注289）

关于全国委员会见注31。——第336页。

297　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维登代表会议（见注342）委托党的领导机构建立一国际联络局（Comité extérieur），其任务是建立和保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外国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联系。——第336页。

298　恩格斯指的是他的《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该文发表的准确日期是1882年5月4日和11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和20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7—336页）。——第338页。

299　卡尔·考茨基在他1882年5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恩格斯就殖民地，特别是亚洲殖民地在欧洲无产阶级胜利后的命运将会怎样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考茨基写道："我认为，如果英国无产阶级占有印度，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对于前者来说，好处是获得原料产地，对于后者来说，好处是因为如果听其自然，印度人民就会落入最残暴的专制制度之中……依我看，在欧洲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印度反而会很好地过渡到现代社会主义，而不必经过资本主义这个中间阶段……"。

考茨基的谈这个问题的第二封信是1882年5月31日写的。——第339、351页。

300　指约·莫斯特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1876年］开姆尼斯第2版（《Kapital und Arbeit: Ein populärer Auszug aus《Das Kapital》von Karl Marx》2. Aufl.，Chemnitz，［1876］）。小册子的第一版于1873年在开姆尼斯出版。马克思根据威·李卜克内西的请求，在恩格斯的参加下为出版第二版对小册子作了某些修改和

并服从了仲裁法庭的决定。——第333页。

295　暗指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流亡者约翰·莫斯特在伦敦出版的《自由》周报，它的编辑是卡尔·施奈特。该报的特点是使用极端革命的词藻和粗暴攻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活动家的政策和策略。——第336页。

296　指同1882年5月14—21日举行的中部联合会联盟代表大会有关的事件（见注289）

关于全国委员会见注31。——第336页。

297　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维登代表会议（见注342）委托党的领导机构建立一国际联络局（Comité extérieur），其任务是建立和保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外国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联系。——第336页。

298　恩格斯指的是他的《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该文发表的准确日期是1882年5月4日和11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和20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7—336页）。——第338页。

299　卡尔·考茨基在他1882年5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恩格斯就殖民地，特别是亚洲殖民地在欧洲无产阶级胜利后的命运将会怎样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考茨基写道："我认为，如果英国无产阶级占有印度，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对于前者来说，好处是获得原料产地，对于后者来说，好处是因为如果听其自然，印度人民就会落入最残暴的专制制度之中……依我看，在欧洲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印度反而会很好地过渡到现代社会主义，而不必经过资本主义这个中间阶段……"。

考茨基的谈这个问题的第二封信是1882年5月31日写的。——第339、351页。

300　指约·莫斯特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1876年］开姆尼斯第2版（《Kapital und Arbeit: Ein populärer Auszug aus《Das Kapital》von Karl Marx》2. Aufl.，Chemnitz，［1876］）。小册子的第一版于1873年在开姆尼斯出版。马克思根据威·李卜克内西的请求，在恩格斯的参加下为出版第二版对小册子作了某些修改和

章或小册子的计划。——第355页。

309 “全部劳动产品归工人”的说法首先是拉萨尔在他的下一著作中提出来的：《巴师夏先生—舒尔采·冯·德里奇，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第199—200页（《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 Berlin, 1864, S. 199—200）。

马克思对拉萨尔这一说法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8—23页。——第355页。

310 指两个德国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见注250）的合并，合并是1875年5月22—27日在哥达的合并代表大会上实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抱肯定态度，但是同时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所持的共同意见反映在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和马克思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10页和13—14页）中，此外还反映在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35页）中。尽管在这些文件中对未来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那个包含着一系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许多让步的纲领草案提出了批评，这个草案仍然只是略加修改就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第355、371页。

311 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1877年5月27—29日）5月29日的会议上，杜林派企图设法禁止在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约·莫斯特提出的提案说，“类似恩格斯最近几个月以来所发表的反对杜林的批判文章”的文章今后不应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尤·瓦耳泰希也提出了类似的声明。奥·倍倍尔提出一个折衷的提案：停止在《前进报》上发表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文章，而以《前进报》出版社的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它们；同样地也停止在报纸上对这一争论问题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威·李卜克内西坚决反对莫

斯特的提案和瓦耳泰希的主张。他作为《前进报》的编辑提醒说，关于发表这些文章的决议是上次代表大会通过的，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以后，这些反对杜林的文章是党内的最优秀的著作，从党的利益来看，这一著作是必需的。李卜克内西对倍倍尔的提案提出修正：在《前进报》的科学附刊上、或在《未来》（《Zukunft》）杂志上、或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这样的文章。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李卜克内西修正的倍倍尔的提案。《反杜林论》的第二编和第三编是在《前进报》的附刊上发表的。—— 第 356 页。

312 指刊载在 1882 年 8 月 17 和 24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4 号和 35 号上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未署名的文章，文章的标题都是：《废除非常法吗？》（《Aufhebung des Ausnahmegesetzes?》）。这两篇文章同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标题是：《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略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Aufhebung des Sozialistengesetzes? Ein Wort zur Takt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署名苏尔土尔。—— 第 356、365、378、381、386 页。

313 恩格斯指自己译的具有民间曲调的英国歌谣《布雷的牧师》（见注 306）。—— 第 357 页。

314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的导言是马克思在 1880 年 5 月 4—5 日左右写的。在小册子中，导言是由恩格斯这一著作法文本译者拉法格署名的。手稿中有马克思给保·拉法格的附言，其中说，导言是他在同恩格斯商量以后写的，请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修改内容”。导言大大赞扬了恩格斯的生平。—— 第 360 页。

315 恩格斯没有实现写这本小册子的计划。—— 第 361 页。

316 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1849 年就税收问题不止一次地在《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上发表文章，例如，《打倒捐税！！》、《呼吁书》、《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的发言》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36、39、286—306 页）。1850 年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

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等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288—299页）也涉及税收问题。—— 第361页。

317　指中部联合会联盟（见注247和289）。—— 第362页。

318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159）。—— 第363页。

319　指英国侵占埃及（见注60）。—— 第364页。

320　暗指1881年底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上登载的关于马克思逝世的消息。—— 第365页。

321　恩格斯暗引圣经上犹太人从埃及奴役中逃跑出来的故事，戏指英国和法国的路特希尔德银行（埃尔兰格尔是路特希尔德在埃及的代表），它们是对埃及实行财政"监督"（见注60）的鼓舞者。早在1875年，英国首相迪斯累里在路特希尔德银行的帮助下为英国政府获得了属于埃及总督的苏伊士运河的股票。—— 第366页。

322　指兰斯代表大会关于党纲的决议（见注227）和在巴黎举行的中部联合会联盟代表大会的决议（见注289）。—— 第369页。

323　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在1880年起草的、并由哈佛尔党代表大会（1880年11月）没有任何改动地通过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的导言。由马克思、恩格斯、盖得和拉法格拟定的纲领的实践部分虽被代表大会通过，但接受了马隆提出的某些使纲领大为逊色的修正。—— 第369页。

324　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教会和国家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社会经济性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 第370页。

325　福尔马尔在其《废除非常法吗？》（见注312）的第二篇文章中谈到"反对派的和自由派的'稀粥'"。—— 第370页。

326 暗指利沙加勒为夺取《公民报》而搞的那些阴谋，结果把由盖得拥护者所组成的编辑部赶出了新改名为《公民和战斗报》的该报报社。但是，盖得派立即就用原来的名称《公民报》创办了一个大型日报，该报在未定名为《平等报》之前曾不止一次地改变名称（见本卷第371—372、375—376页）。——第372、386页。

327 日阿尔纳卡式的打击意即背信弃义的打击。1569年3月13日，在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之间的日阿尔纳卡（法国夏龙省的一个城市）战役中，胡格诺教徒的领袖，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孔代亲王受伤被俘并被枪杀。——第372页。

328 指普罗斯比尔·利沙加勒要求和保尔·拉法格决斗一事；恩格斯把利沙加勒比作法国政治活动家、新闻工作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暗讽卡桑尼亚克在报刊上搞的那些引起一系列决斗和司法追究的极其狂妄的行为。——第373页。

329 指1882年10月在孟索·累明（法国）发生的煤矿工人大罢工。罢工是由于使工人阶级状况急剧恶化的经济萧条引起的。罢工期间按照警察局长安德烈指示行事的奸细勃烈尼扎扮演了背叛的角色，安德烈曾给无政府主义报纸《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Sociale》）提供经费，并通过他手下的奸细在这个地方干了一系列恐怖行动。——第376、410页。

330 查·约·加尔西亚是《社会民主党人报》伦敦记者，伦敦美里利邦区的一个小民主团体的书记，该团体的名称是美里利邦中央民主协会（Marylebone Central Democratic Association），会址是：西中央区格拉弗顿东街大学旅馆（Grafton Street East W.C., the University Hotel）。——第376页。

331 “主脑”（《Haupt-Chef》）是普鲁士的一个警官施梯伯在1852年审判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对暗探奸细舍尔瓦尔的称呼，施梯伯为了达到挑衅的目的，力图说明舍尔瓦尔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并造成他和马克思以及被告等有联系的假象（见卡·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第376

页。

332　威·李卜克内西从1882年10月15日起入狱；倍倍尔从1882年11月1日起被判处徒刑，至1883年3月9日在莱比锡监狱服满刑期。——第377、379页。

333　根据圣经故事，受奴役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有些畏难的人由于道路的艰难和饥饿，开始惋惜他们受奴役的日子，因为那时至少还可以吃饱肚子。“惋惜埃及的肉锅”成了谚语。——第378页。

334　恩格斯指的是奥·倍倍尔的文章《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Aufhebung des Sozialistengesetzes?》）。这篇文章发表在1882年10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上，旨在批驳《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见注312）。倍倍尔主要是对福尔马尔的第二篇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因为作者在那里号召采取暴动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的策略。倍倍尔谴责了这一策略，认为这对党来说是不能容许的和极为有害的。他在1882年10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象福尔马尔这样的文章所使用的不谨慎的腔调和语言，只会使党的队伍招致不必要的牺牲。——第378、386页。

335　拉萨尔关于“反动的一帮”的论点被载入由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见注310）。纲领写道：“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对这一拉萨尔主义论点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4—25页）。在本信中恩格斯使用了“都是（einzigen）反动的一帮”。——第378、387页。

336　由于倍倍尔批驳了用苏尔土尔（Surtur）的笔名以小册子出版的福尔马尔的文章（见注312），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路·菲勒克在他出版的《南德意志邮报》上宣称，这本小册子与党的意见毫无共同之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于1882年10月26日第44号上对菲勒克的声明表示抗议，它强调指出载入小册子的文章是党的一个成员写的，而且最初是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的。——第379页。

337 这里提到的莱昂·皮卡尔关于在巴黎的德国人的文章，以《圣马克街的黑幕》（《L'affaire de la rue Saint-Marc》）为题发表在1882年9月3日的《公民报》上。这篇文章是用沙文主义精神写成的，该报编辑部宣布不同意这篇文章。从恩格斯1882年11月4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可以看出，文章引起了德国侨民对盖得派的不满（详见本卷第389—390页）。——第381、384页。

338 恩格斯除了直接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德文本初版的正文作了补充和修改外，还专门为它写了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5—347页），并将论述德国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文章《马尔克》（同上，第351—369页）作为附录收入该书。——第382、416、426页。

339 恩格斯指自己打算写关于俾斯麦和拉萨尔的小册子（见本卷第355—356页）。——第383、388页。

340 罗塞达碑是拿破仑远征军的一位军官于1799年8月在埃及罗塞达城附近发现的一块玄武岩石碑，碑上刻有三种古代文字的碑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俗体文和希腊文，后者为前两者的译文，这使法国学者商博良得以看懂了埃及象形文字。石碑现藏伦敦英国博物馆。——第383页。

341 恩格斯在这里使用的是中世纪两个互相敌对的政派交战时的古老的呐喊——“这里是韦耳夫派！这里是魏卜林派！”（HieWelf，HieWaibling）——，其中一派支持韦耳夫王朝，另一派支持霍亨施陶芬王朝（或称魏卜林王朝，因其世袭城堡和城市称魏卜林）。据传，这最初是这两派的拥护者1140年在魏茵斯堡附近交战时喊的。后来在罗马教皇和德国皇帝相争时期，于十二至十五世纪在意大利发生了奎耳夫派和吉贝林派（即韦耳夫派和魏卜林派的意大利音）之间的斗争。——第387页。

342 维登代表会议——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法（见注109）颁布以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于1800年8月20—23日在（瑞士）苏黎世州奥辛根附近的古城堡维登举行。——第387页。

343　在1882年10月29日在蒙马特尔第十八选区举行的巴黎群众大会上，工人选民不让曾是这个选区的议员克列孟梭讲话。——第391页。

344　马克思指的是1880年6月9日《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21号发表的一篇关于巴黎“政治经济学家协会”1880年5月5日就华侨进入加里福尼亚一事讨论华人问题的会员大会的报道，题为《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华人》（《Le patriotisme de la bourgeoisie et les Chinois》）。官方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勒卢阿－博利约、加尔涅、西莫宁等人称赞利用华人的廉价劳动，说华人的需求极低。1880年7月5日，《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9期上也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经济学家论华人问题》（《La Question chinoise devant les économistes》），署名为：贝·马。——第397页。

345　恩格斯特别是指《自然辩证法》（见注106）。——第398页。

346　恩格斯曾打算利用这些材料写论述俾斯麦和拉萨尔的小册子（见本卷第355—356页）。恩格斯的这一想法没有实现。——第399页。

347　显然是指贝·马隆所著《从大致产生时起到现代为止的社会主义史》1879年罗迦诺版（《Histoire du socialisme depuis ses origines probables jusqu'à nos jours》. Lugano, 1879）。——第400页。

348　这封信中以下关于法国工人党分裂（见注78）以后可能派和盖得派的力量情况的材料和引文，是拉法格在1882年11月24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的。——第401页。

349　北部联合会产生于1880年春。法国工人党分裂（见注78）以前，在组织上分为六个联合会，北部联合会是其中之一。它联合了利尔和鲁贝的各个党组织。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以后，北部联合会仍然站在马克思派一边。——第401、413页。

350　恩格斯暗讽早在五十年代反动时期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的约翰·米凯尔的机会主义立场。米凯尔原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后来成了民族自由党人和普鲁士的大臣。米凯尔早在1856年4月6日和8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已明显地表现出他已离开革命立场。米凯尔断言：

德国革命“不是太近的事”，在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不但应当同小资产阶级，而且应当同自由资产阶级建立巩固的联盟，而在革命胜利以后，应当采取这样的策略，即不要把资产阶级吓跑，使之离开无产阶级。——第402、445页。

351 恩格斯引证的是拉法格1882年11月24日的信。——第402页。

352 指圣亚田代表大会和罗昂代表大会（见注78）。——第402页。

353 关于果达尔见注105。——第403页。

354 恩格斯把揭露在苏黎世的德国奸细弗·施米特叫做施米特事件。《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出版了一本关于施米特和他的德国领导的行径的小册子《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德国秘密警察。文件和基于确凿材料的揭露》1882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ie deutsche Geheimpolizei im Kampfe mit der Sozialdemokratie. Aktenstücke und Enthüllungen auf Grund authentischen Materials dargestellt》. Hottingen-Zürich, 1882）。同年还在那里以同样的副标题出版了一本题为《德国警察的功勋》（《Deutsche Polizeischuftereien》）的小册子。1883年3月，出版了这本小册子的第二版。——第404页。

355 “暗检室”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许多国家邮政部门所属的秘密机构，从事暗中检查信件的活动。暗检室在欧洲从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已存在。——第406页。

356 指红白蔷薇战争（1455—1485）结束后都铎王朝君主专制在英国形成时期的事件。战争的起因是以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即郎卡斯特族和约克族为中心的英国封建主集团之间的流血内哄（战争便由这两个族的纹章——郎卡斯特族的红蔷薇和约克族的白蔷薇而得名）。王朝的奠基者国王亨利七世都铎战胜属约克族的国王理查三世之后，千方百计想巩固王权，并确立他以同郎卡斯特族有血统关系为理由占取英国王位这一极有争议的权利，他试图给这个王朝戴上神圣光环。为了这个目的，他于1506年请求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将在红白蔷薇战争期间被约克族逐下英国王位的郎卡斯特族的代表之一国王亨利六世尊为

圣徒和殉教圣徒。但尤利乌斯二世深知亨利六世是个有名的白痴，担心尊他为圣徒有损罗马教会的威望，便婉言谢绝了国王的请求。

马克思在这里根据《innocent》一词具有“无辜，纯真”、“疯癫，白痴”等不同意义，用了这个双关语。——第406页。

357　卡·马克思大概是根据他当时读了1882年圣彼得堡出版的瓦·沃·（瓦·巴·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Судьбы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С.-Петербург，1882）一书所得印象作出的这个结论。瓦·巴·沃龙佐夫是个有名的著作家和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民粹派领袖，他在该书序言中谈到，俄国的“马克思学派社会主义者”肯定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沃龙佐夫本人则力图证明俄国社会经济进化的非资本主义性质，提出关于俄国发展的独特道路、关于所谓人民生产在国内占统治地位的反科学理论。他在该书的另一处把他所不同意的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称为“普遍接受的理论”。——第407页。

358　指拉法格发表在1882年12月9日《平等报》第4种专刊第47号上的文章，标题是《我们的一个候选人》（《Notre candidat》）。——第408、413页。

359　恩格斯指马克思为了专门研究地租和整个土地关系问题而对有关公社、公共所有制形式以及俄国农村公社的史料和著作所进行的多年研究工作。例如，在此以前不久，马克思仔细地研究了1879年出版的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它的瓦解原因、过程和结果》（《Общинное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причины，ход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его разложения》）一书，从这本书中马克思做了关于公社的性质、公社在各个不同时代和各个不同民族中的地位以及社会经济作用的详细摘记。——第412页。

360　指1880年10月由被大赦的一批公社社员在巴黎建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同盟。该同盟的组织者中间，有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著名的和有影响的活动家，其中很多人曾经是国际工人协会及其总委员会的成员。同盟分子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根本反对任何学说，而鼓吹蒲鲁东主义－博爱主义思想，以此来博得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同情。尽管公社社员有很大的威望，茹尔·盖得还是尖锐地批评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

主义。—— 第 412 页。

361 在这一时期，倍倍尔在莱比锡监狱坐了四个月的牢，但是，政治犯通常被放回家过圣诞节。—— 第 414 页。

362 1866 年奥普战争前夕，俾斯麦曾通过不明确的方式暗中向拿破仑第三保证，假使法国对于建立普鲁士—意大利联盟和消灭奥地利不加干涉的话，他将不妨碍法国占领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莱茵河和摩塞尔河之间的部分地区来扩张自己的领土。1866 年 8 月 6 日，法国政府要求俾斯麦履行对于法国在战争期间保守中立要给予报答的诺言，坚持要恢复 1814 年的边界，从卢森堡撤走普鲁士驻防军，并将卢森堡归并法国。但是俾斯麦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针对这些要求，他在 1867 年 3 月 19 日公布了早在 1866 年就签订了的普鲁士同南德意志邦巴登和巴伐利亚的秘密同盟条约。

这里恩格斯重提俾斯麦那些年代的行为，是让人们注意俾斯麦 1882 年 11 月 19 日同请求德国支持俄国东方政策的沙皇的外交大臣吉尔斯所进行的谈判。在进行了这些谈判之后，德国报刊上出现了评述早在 1879 年就签订了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正式同盟的官方性的评论和文章。—— 第 415 页。

363 指鲁道夫·迈耶尔发表的洛贝尔图斯的通信：《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1882 年］柏林版第 1—2 卷（《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ätze》. Herausgegeben von Dr. R. Meyer. Bd. Ⅰ—Ⅱ. Berlin, [1882]）。倍倍尔在 1882 年 11 月 1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开玩笑说：迈耶尔很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对于他们给予的“很好接待”（在 1879—1880 年他访问伦敦时）显然感到荣幸，不过，这种“荣誉”他们须“与给他同样荣幸的五个红衣主教分享”。—— 第 416、445 页。

364 自由派议员，前宪章主义者约瑟夫·考恩 1883 年 1 月 8 日在新堡发表演说，为英国占领埃及（见注 60）辩解。所谓海德门的“未来的音乐”，马克思是暗指海德门领导的民主联盟（见注 199），这个联盟的纲领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考恩是该联盟的发起人之一。

关于“未来的音乐”一语，见注 228。—— 第 421 页。

365　恩格斯指的是1883年初《社会民主党人报》就社会民主党议员卡尔·格里伦贝格尔在1882年12月14日帝国国会会议上发言反对内务大臣普特卡默一事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普特卡默论证说,必须根据反社会党人法在德国的许多省份实行戒严,因为社会民主党破坏家庭的神圣性和鼓吹恋爱自由)。这些文章是:《从格里伦贝格尔关于遵守反社会党人法的发言谈起》(《Aus Grillenberger's Rede über die Handhabung des Sozialistengesetzes》)(1月1日和4日第1号和第2号)、《谈谈自由恋爱问题。供冯·普特卡默先生在帝国国会宣读之用》(《Zum Kapitel von der freien Liebe Etwas für Herrn von Puttkamer zum Vorlesen im Reichstage》)(1月4日和2月8日第2号和第7号)、《普特卡默和家庭的"神圣性"》(《Puttkamer und die《Heiligkeit》der Familie》)(1月11日第3号)和《论特权的荣誉》(《Von der patentirten Ehre》)(2月22日第9号)。——第425、452页。

366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于1748年8月14日给骑兵少将的指令中的话。——第425页。

367　指1883年1月11日社会民主党议员麦克斯·凯泽尔在帝国国会辩论反社会党人法问题时的发言。——第425页。

368　根据1871年废除的北德意志联邦(见注249)宪法的规定,联邦会议由参加联邦的所有德国各邦的政府所任命的代表组成。会议的职能是批准法律。——第426页。

369　暗指由于1866年普奥战争和德国统一,原先的独立邦——汉诺威、拿骚和选帝侯国黑森以及自由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归并普鲁士一事。——第426页。

370　这里恩格斯是暗指1880年出版的考茨基所著《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Der Einfluss der Volksvermehrung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Gesellschaft》)一书,考茨基在该书中维护马尔萨斯理论的"合理内核"。此书也受到了马克思的激烈批评。——第428页。

371　恩格斯指的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矛盾客观存在于事物和过程之中的原理,杜林在自己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Kritische Ge-

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一书中激烈地抨击了这一原理；1875年该书在柏林出了第二版；杜林在书中非难马克思，说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黑格尔主义的。恩格斯在自己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批判了杜林书中的这个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31—141页）。—— 第429页。

372 考茨基在他所著《大洋彼岸的食物竞争》1881年莱比锡版（《Die überseeische Lebensmittel-Konkurrenz》. Leipzig, 1881）一书的第一部分引用了鲁道夫·迈耶尔在维也纳报纸《祖国》（《Das Vaterland》）上发表的关于加拿大农业形式的许多资料。—— 第431页。

373 指考茨基的文章专辑《婚姻和家庭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r Ehe und Familie》）中的第一篇文章《杂婚》，这些文章发表在达尔文主义杂志《宇宙》斯图加特版第6年卷第12期（1882年10月至1883年3月）。第二篇文章题为《抢劫婚姻和母权制。克兰》，第三篇——《买卖婚姻》。1883年这些文章用专辑的总名称出版单行本。—— 第432、446、447页。

374 强制放牧—— 是古代德意志部落马尔克制度中为公社全体社员规定的义务，在收获以后直至播种以前他们要把耕地上的篱笆拆去，使这些土地能供全体社员作牧场之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8—359页）。—— 第432页。

375 指茹·盖得所写的社论，它刊登在1883年2月16日《平等报》第5种专刊第1号上。—— 第436页。

376 指1883年3月29日至4月2日召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原拟在苏黎世召开。—— 第437、446页。

377 关于盖得和拉法格受法院审讯，见注97。

Code pénal—— 法国的刑法典，于1810年通过，从1811年起在法国和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 第441页。

378 1883年2月德国社会党人莫泽斯·奥本海默被揭发秘密与资产阶级报刊合作并盗用党的经费。—— 第444页。

379 恩格斯指1879年11月威·李卜克内西和1881年7月奥·倍倍尔在

萨克森邦议会的宣誓。——第451页。

380　1883年赫普纳改用《工人运动的目的》(《Die Ziele der Arbeiterbewegung》)这个书名在纽约出版了奥·倍倍尔的小册子《我们的目的》(《Unsere Ziele》),作为他拟定出版的"德美工人丛书"的第一册。赫普纳以倍倍尔的小册子的第六版为蓝本,但对它作了许多修改。——第452页。

381　恩格斯1883年3月14日给左尔格的电报,发表在《纽约人民报》上,该报未经恩格斯同意,把它作为似乎是恩格斯专门发给该报编辑部的电报加以刊载(并在电文中加上"下午"一词)。恩格斯在两天之后真正发给该报的电报(见本卷第461页),编辑部也作了歪曲。恩格斯在1883年4月18日给《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信中,对这种独断行为表示了抗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54、461页。

382　马克思离开瑞士之前于1882年9月26日在日内瓦拜访了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第457页。

383　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的电报全文,恩格斯收在他发表在1883年5月3日和17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一文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80—388页)。——第462页。

人 名 索 引*

A

阿伯康公爵，詹姆斯·汉密尔顿（Abercorn, James Hamilton, Duke of 1811—1885）——英国国家活动家，保守党人；爱尔兰总督（1866—1868和1874—1876）；反对通过爱尔兰1881年的土地法。——第28页。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Ⅱ 1842—1918）——土耳其苏丹（1876—1909）。——第306页。

阿耳方，让·沙尔·阿道夫（Alphand, Jean - Charles - Adolphe 1817—1891）——法国国家官员，职业是工程师；1854年起领导巴黎公用事业的工作，1878年起从事城市供水工作。——第95页。

阿盖尔公爵，乔治·道格拉斯·坎伯尔（Argyll, George Douglas Campbell, Duke of 1823—1900）——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分子，后为自由党人；曾任掌玺大臣（1853—1855、1859—1860、1860—1866、1880—1881），邮政大臣（1855—1858、1860），印度事务大臣（1868—1874）。——第177、234页。

阿克萨柯夫，伊万·谢尔盖也维奇（Аксаков,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1823—1886）——俄国政论家，斯拉夫主义者；五十至六十年代曾批评沙皇政府的内政，七十至八十年代是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和大国主义思想的鼓吹者之一。——第263页。

阿拉比-帕沙，阿罕默德（Arabi Pasha, Ahmed 1839—1911）——埃及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1879—1882年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祖国党的领导人之一；1882年2月起任民族政府的陆军部长，1882年7月起任政府首脑；在泰尔-厄尔-开伯尔失败（1882年9月13日）之后被俘，被英国当局流放到锡兰岛，直至1902年。——第86、344页。

阿列科-帕沙——见沃戈里德斯，亚历山大。

阿扎马特-巴图克（Azamat-Batuk）（真姓提布兰 Thieblin, H. L.）——法国新闻工作者。——第140页。

埃尔布斯勒，奥古斯特（Erbslöh August 1819—1894）——巴门的德国商人，恩格斯的熟人。——第250页。

埃尔布斯勒，卡尔·亚历山大（Erbslöh, Carl Alexander 生于1854年）——奥古斯特·埃尔布斯勒的儿子，1882年起是恩格斯的侄女伊丽莎白·恩格斯的丈

* 本卷中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夫。—— 第 250、251 页。

埃尔兰格尔，米歇尔（Erlanger, Michael 1828—1892）—— 法国路特希尔德银行的高级职员；八十年代为路特希尔德在埃及的代表。—— 第 366 页。

埃卡尔特，尤利乌斯（Eckardt, Julius 1836—1908）—— 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1884 年起为德国外交部的官员。—— 第 263 页。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 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 年—1871 年 5 月），美国通讯书记（1870—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 年以前曾支持马克思，1872 年春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第 203 页。

艾莫斯，谢尔登（Amos, Sheldon 1835—1886）—— 英国法学家，八十年代初起在埃及当律师，亚历山大里亚上诉法院（地方法院）法官（1882）。—— 第 111 页。

奥本海默，莫泽斯（Oppenheimer, Moses）——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883 年被揭发同资产阶级报刊建立秘密联系并盗用党的经费。—— 第 444 页。

奥顿诺凡－罗萨，耶利米（O'Donovan Rossa, Jeremiah 1831—1915）—— 爱尔兰芬尼亚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爱尔兰人民报》的发行人（1863—1865），1865 年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1870 年获赦，不久就流亡美国，在那里领导芬尼亚社；八十年代脱离政治活动。—— 第 334 页。

奥尔德里尼，亚历山大罗（Oldrini, Alessandro）—— 法国社会主义者，曾站在法国方面参加普法战争（1870—1871）；七十至八十年代初住在法国，1882 年底被驱逐出法国；原系意大利人。—— 第 374 页。

奥尔登堡，亨利希（Oldenburg, Heinrich）——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 第 101、104 页。

奥耳索普，托马斯（Allsop, Thomas 1795—1880）—— 英国交易所经纪人，政论家，民主主义者，接近宪章派；在援助流亡的公社社员方面同马克思积极合作；同马克思一家保持友好关系。—— 第 13 页。

奥芬巴赫，雅克（Offenbach, Jacques 1814—1880）—— 著名的法国作曲家，古典小歌剧的创始人之一。—— 第 322、323 页。

奥凯利，詹姆斯（O'Kelly, James 1845—1916）——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新闻工作者；1880 年起为议会议员。—— 第 308 页。

奥康奈尔，丹尼尔（O'Connell, Daniel 1775—1847）—— 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的领袖。—— 第 158、333、335 页。

奥诺雷四世（Honoratus Ⅳ 1758—1819）—— 摩纳哥公爵（1814—1819）。—— 第 65 页。

B

巴霍芬，约翰·雅科布（Bachofen, Johann Jakob 1815—1887）—— 杰出的瑞

士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母权论》一书作者。—— 第 450 页。

巴克斯，厄内斯特·贝尔福特 (Bax, Ernest Belfort 1854—1926) —— 英国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八十年代初起为英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1882 年起为民主联盟（于 1884 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是其左翼积极活动家之一；曾在伦敦（东头）最贫苦的居民中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1883 年起同弗·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英国社会党的创始人 (1911) 和领袖之一；多次为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6 年被开除出党。—— 第 240、253 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 ——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上被开除出国际。—— 第 35、106、107、249、259、332、362、369—371、395、402、403、412 页。

巴里，马耳特曼 (Barry, Maltman 1842—1909) —— 英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2) 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2—1874)，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和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第一国际停止活动后他仍继续参加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为保守党的报纸《旗帜报》撰稿；在九十年代支持所谓的保守党人“社会主义派”。—— 第 173 页。

巴赞，古斯达夫 (Bazin, Gustave) —— 法国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法国工人党党员，兰斯代表大会 (1881) 代表，1882 年 11 月底，以策划发动内战的罪名而被捕；盖得的拥护者。—— 第 116、405 页。

白拉克，威廉 (Bracke, Wilhelm 1842—1880) ——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伦瑞克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者，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创始人 (1869) 和领导人之一，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成员 (1877—1879)；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够彻底。—— 第 341 页。

班贝尔格尔，路易 (Bamberger, Louis) ——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伦敦的德国侨民，《德意志伦敦报》的编辑；不伦瑞克公爵的秘书，后来在苏黎世经商。—— 第 314 页。

班克罗夫特，休伯特·豪 (Bancroft, Hubert Howe 1832—1918) —— 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北美和中美的历史和民族志方面的著作。—— 第 120、432 页。

鲍利，菲力浦·维克多 (Pauli, Philipp Viktor 1836—1916 以后) —— 德国化学家，肖莱马的朋友；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密切；1871—1880 年曾管理雷瑞（曼海姆附近）的一个化学工厂。—— 第 183 页。

鲍利，伊达 (Pauli, Ida) —— 菲力浦·维克多·鲍利的妻子。—— 第 183 页。

鲍威尔，布鲁诺 (Bauer, Bruno 1809—1882) ——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188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 第 97 页。

*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他活动的后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第92、94、116、117、132、166、177、178、190、211—213、229、230、248、257、314、317、320、327—329、331、336、338、341、356、358、359、363—366、377—380、382、386、387、399、414—417、426、437、450—452页。

倍倍尔，尤莉娅（Bebel，Julie 1843—1910）——倍倍尔的妻子。——第417、456页。

贝克尔，伊丽莎白（Becker，Elisabeth 死于1884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妻子。——第236页。

*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Becker，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制刷工；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瑞士的第一国际德国人支部的组织者，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先驱》杂志的编辑（1866—1871）和《先驱者》杂志的编辑（1877—188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83、87、125、166、169、170、227、236、266、268、342、409—411、457页。

贝列拉或贝列尔，艾米尔（Péreire，Émile 1800—1875）——法国银行家，二十至三十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是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弟伊萨克·贝列尔一起创办股份银行 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第162页。

贝列拉或贝列尔，伊萨克（Péreire，Isaac 1806—1880）——法国银行家，二十至三十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兄艾米尔·贝列尔一起创办股份银行 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第162页。

贝万（Bevan）——查理·勒兹根的妻子。——第374页。

贝肖（Bayshave，F.）——英国医生。——第419页。

崩图，保尔·欧仁（Bontoux，Paul Eugène 1820—1904）——法国金融家和企业家，职业是工程师，曾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参加修建铁路和工厂的工作；是靠正统派和教权派的资金建立起来的巴黎的股份银行 Union générale（联合银行）的创建人（1878）和领导人之一；1882年因投机活动被判处五年徒刑，遂逃离国外。——第408、413页。

彼洛夫斯卡娅，索菲娅·李沃夫娜（Перовская，Софья Львовна 1853—1881）——俄国女革命家，秘密团体“民意党”的著名活动家；由于参与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被沙皇政府判处死刑。——第187页。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Beesly，Edward Spencer 1831—1915）——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证论者，伦敦大学教授；1870—1871年在英国报刊上为第一国际和巴

黎公社辩护。——第17、180页。

毕尔克利，卡尔（Bürkli, Karl 1823—1901）——瑞士的著名活动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第一国际苏黎世支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代表和洛桑代表大会（1867）秘书；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93）代表；瑞士合作社运动的发起人和领袖。——第32、33、258、267、278页。

毕克列尔，约翰（Bückler, Johann 1870左右—1803）——德国强盗，莱茵区匪帮的魁首，绰号施因德汉斯（意即屠夫汉斯）。——第274、329页。

俾斯麦，奥托（Bismarck, Otto 1815—1898）——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12、29、33、35、36、93、119、140、162—164、168—169、172—173、205、221、255、256、260、262、276、277、312、313、317、330、355、356、377、379、382、388、399、414、415、426、427、437、445、446、450、451页。

卞尼格先，鲁道夫（Bennigsen, Rudolf 1824—1902）——德国政治活动家，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统一德国；1859—1867年为民族联盟主席，1867年起为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自由党右翼首领，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1883和1887—1898）。——第104页。

波多林斯基，谢尔盖·安得列也维奇（Подолинский, Сергей Андреевич 1850—1891）——乌克兰社会政治活动家和进步学者，达尔文主义者；最早在乌克兰宣传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者之一；1871年起侨居奥地利，其后在法国，八十年代起在瑞士，曾同俄国革命的流亡者有联系，是在维也纳用乌克兰文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组织者之一（1879）；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个人相识，并有通信联系。——第127、129页。

波拉基，伊格纳齐乌斯·保罗（Pollaky, Ignatius Paul）——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伦敦拥有私人警察所，警察报纸《外国警察报》记者。——第404页。

波利亚科夫，赛米尔·索洛莫诺维奇（Поляков, Самуил Соломонович 1837—1888）——俄国的铁路企业主和金融家。——第306页。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Bonaparte, 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éon 1822—1891）——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第140页。

*伯恩施坦，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人报》编辑；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第100、101、105、109—110、121、131、146、147、162、164、165、175—179、204—207、211、212、219、220、222、

223、225、226、228、243、244、248、249、255、257、269—276、279、280、304—308、311、316、332、336—339、342—345、354—357、360、361、365、369、372、373、375—377、382—390、392、399、400、403、404、412、413、423、424、426—430、437、440、441、443、445、446、455页。

伯克，托马斯·亨利（Burke, Thomas Henry 1829—1882）——英国国家活动家，爱尔兰事务副大臣（1869—1882），1882年5月6日被爱尔兰小资产阶级恐怖组织“不可战胜者”的成员所刺杀。——第59、335页。

伯克尔（Böcker）——爱德华·龚佩尔特的妻子。——第13、17页。

伯克尔，贝尔塔（Böcker, Berta）——龚佩尔特的妻子的姐妹。——第13页。

勃朗，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第413页。

勃鲁姆，罗伯特（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新闻工作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第329页。

博登施泰特，弗里德里希（Bodenstedt, Friedrich 1819—1892）——德国诗人、政治家和翻译家。——第52页。

博伊斯特，阿道夫（Beust, Adolf）——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博伊斯特的儿子，恩格斯的远亲。——第180、304、337、357、429页。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Beust, Friedrich 1817—1899）——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伍，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被镇压后流亡瑞士；任教育学教授。——第165页。

布拉西，托马斯（Brassey, Thomas 1836-1918）——伯爵，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铁路和造船业的大企业家；议会议员，自由党人，1880—1884年为海军部部务文官委员。——第173页。

布莱德洛，查理（Bradlaugh, Charles 1833—1891）——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无神论者，《国民改革者》周刊的编辑，曾猛烈攻击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第41、139—142、206页。

布莱特，杰科布（Bright, Jacob 1821—1899）——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约翰·布莱特的弟弟。——第28页。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28、141页。

布莱特，约翰·阿伯特（Bright, John Albert 1848—1924）——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89—1895）；约翰·布莱特的儿子。——第28页。

布莱希勒德，格尔森（Bleichröder, Gerson 1822—1893）——德国金融家，柏林一家大银行经理，俾斯麦的私人银行

家、财务方面的私人顾问和从事各种投机倒把活动的经纪人。—— 第 12、14 页。

布朗，威拉德（Brown, Willard）—— 美国社会主义者，职业是新闻工作者，马克思的熟人。—— 第 168、191、247 页。

布朗，约翰（Brown, John 1800—1859）—— 美国农民，废奴运动革命派著名活动家之一；堪萨斯反奴隶主武装斗争（1854—1856）的积极参加者；1859 年打算在弗吉尼亚州发动黑奴起义，被送交法院，后被处死。—— 第 167 页。

布劳恩，亨利希（Braun, Heinrich 1854—1927）——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新时代》杂志的撰稿人（1883—1888），还参加过其他许多杂志的出版工作，后来是改良主义者。—— 第 351 页。

布里蒙（Brimont）—— 法国女波拿巴主义者。布莱德洛在巴黎的熟人。—— 第 140 页。

布里萨克，昂利（Brissac, Henri 1823—1906）—— 法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社会主义者，政论家；巴黎公社委员，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后任公安委员会总书记，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1880 年大赦后回到法国，法国工人党党员，1882 年为《平等报》编辑部成员；盖得的拥护者。—— 第 98、403 页。

布林德，弗雷德里卡（Blind, Friederike）—— 卡尔·布林德的妻子。—— 第 135 页。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 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是伦敦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六十年代起是民族自由党人。—— 第 135 页。

布龙默施坦（Blammestein）—— 荷兰金融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为法国《公民报》的所有者。—— 第 337、371、372、375、386 页。

布鲁斯，保尔（Brousse, Paul 1844—1912）——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职业是医生，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国外，追随无政府主义者；1879 年加入法国工人党，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机会主义派—— 可能派首领和思想家之一。—— 第 34、35、81、97、105、106、110、111、216、220—222、224、230、231、248、249、259、331、336、362、369—371、373、380、411、453 页。

布伦坦诺，路约（Brentano, Lujo 1844—1931）—— 德国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第 153 页。

布罗伊埃尔，恩斯特（Breuel, Ernst）——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驱逐出汉堡，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起流亡哥本哈根，1882 年他采取机会主义立场，批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政治路线。—— 第 315 页。

布洛斯，威廉（Blos, Wilhelm 1849—1927）——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1872—1874 年为《人民国家报》编辑之一；1877—1878 和 1881—1887 年为帝国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 年十一月革命后为维尔腾堡政府领导人。—— 第 270、315、327、427 页。

布伊，卡季米尔（Bouis, Casimir 1843 左右—1916）—— 法国新闻工作者，布朗基主义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国防政府工作调查委员

会主席，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八十年代是法国工人党党员，《平等报》编辑部成员（1882）。——第99、403页。

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Braunschweig, Ferdinand, Herzog von 1721—1792）——在普鲁士供职时是将军；七年战争时期（1757年11月起）任同法奥军队作战的普军和联军司令。——第234页。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威廉（Braunschweig, Karl Friedrich August Wilhelm 1804—1873）——1823年起为不伦瑞克公爵，1830年9月初被推翻，流亡国外；曾企图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帮助下复辟；在四十至五十年代与流亡者中间的民主派分子保持联系，曾出版《德意志伦敦报》。——第314页。

C

采什科夫斯基，奥古斯特（Cieszkowski, August 1814—1894）——伯爵，波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黑格尔分子，1847年起为普鲁士波兹南区的庄园主；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52年起是普鲁士邦议会议员。——第32—34、258页。

查理一世——见查理五世。

查理一世（Charles Ⅰ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157页。

查理三世（Charles Ⅲ 1818—1889）——摩纳哥公爵（1856—1889）。——第60、65、315、323页。

查理五世（Charles Ⅴ 1500—1558）——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519—1556）和西班牙国王（1516—1556），称查理一世。——第300页。

查理十世（Charles Ⅹ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被1830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第30页。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积极活动家；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第159、160页。

D

达尔松瓦尔，雅克·阿尔森（D'Arsonval, Jacques－Arsène 1851—1940）——法国生理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第100页。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第66、89、308、398、399、432页。

达费林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尔顿·坦普尔·布莱克伍德（Dufferin, Frederick Temple Hamilton－Temple－Blackwood, Marquess of 1826—1902）——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自由党人，爱尔兰大土地占有者，曾参加格莱斯顿内阁（1868—1872），加拿大总督（1872—1878），驻彼得堡大使（1879—1881）和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81—1882）；1882年10月起到1883年12月为英国政府驻埃及的代表；印度总督（1884—1888）。——第422页。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1754—1838)——公爵,著名的法国外交家,外交大臣(1797—1799、1799—1807、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代表;以政治上极端无原则和贪婪著称。——第65页。

达兰贝尔,让(D'Alembert, Jean 1717—1783)——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第110页。

达维特,迈克尔(Davitt, Michael 1846—1906)——爱尔兰革命民主主义者,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土地同盟的组织者(1879)和领袖之一,爱尔兰自治(地方自治)的拥护者;议会议员(1895—1899);曾参加英国的工人运动。——第308、344页。

戴恩哈特(Deinhardt, K.)——慕尼黑的德国工程师。——第437—439页。

戴特罗瓦,比埃尔·莱昂斯(Déroyat, Pierre-Léonce 1829—1898)——法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海军军官;波拿巴主义者;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和普法战争(1870—1871)的参加者;七十至八十年代是许多家报纸的所有者和编辑;艾米尔·日拉丹的亲戚。——第140页。

戴兴德,海尔曼·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Dechend, Hermann Friedrich Alexander 1814—1890)——德国国家活动家,主管普鲁士银行(1864年起),后主管德国国家银行(1875—1890),国务会议成员(1884年起)。——第313页。

* 丹尼尔斯,阿马利亚(Daniels, Amalie 1820—1895)——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罗兰特·丹尼尔斯的妻子。——第251页。

* 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Даниельсон, 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 1844—1918)(笔名尼古拉—逊 Николайон)——俄国经济学著作家,八十至九十年代民粹派思想家之一;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多年信,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译成俄文(第一卷是和格·亚·洛帕廷合译的)。——第147—150、152、237—238页。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73、433页。

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之一;曾任内阁首相(1852、1858—1859、1866—1868)。——第158页。

德·巴普,塞扎尔(De Paepe, César 1842—1890)——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印刷工人,后为医生;第一国际比利时支部的创建人之一,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代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曾一度支持巴枯宁派;比利时工人党创建人之一(1885)。——第84、221页。

德拉肖(Delachaux)——来自英特拉肯的瑞士外科医生。——第58、60页。

德穆特,海伦(琳蘅)(Demuth, Helene (Lenchen) 1823—1890)——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第5、13、15、20、23、26、29、30、33、39、43、70、71、

74、77、91、93、94、103、183、188、199、241、248、289、325、349、350、359、368、373、374、397、405、417、423、436、453、456、459、463页。

德普勒，马赛尔（Deprez, Marcel 1843—1918）—— 法国物理学家和电气工程师，研究远距离送电问题。—— 第100、105、446页。

笛卡儿，勒奈（Descartes, René 1596—1650）—— 杰出的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第114页。

狄茨，约翰·亨利希·威廉（Dietz, Johann Heinrich Wilhelm 1843—1922）—— 德国书籍出版者；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出版社创办人，1881年起为帝国国会议员。—— 第431页。

狄慈根，约瑟夫（Dietzgen, Joseph 1828—1888）——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学成功的哲学家，独立地得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若干原理；职业是制革工人。—— 第28页。

狄龙，约翰（Dillon, John 1851—1927）——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爱尔兰全国土地同盟领导人之一；1880年为英国议会议员；八十年代曾多次被捕入狱。—— 第308页。

迪耳克，艾什顿·温特沃思（Dilke, Ashton Wentworth 1850—1883）—— 英国政治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和旅行家，资产阶级激进派，七十年代初为《每周快讯》这家报纸的所有人和编辑，议会议员（1880—1883）。—— 第41、173、174、280页。

迪耳克，查理·温特沃思（Dilke, Charles Wentworth 1843—1911）—— 英国政治活动家，共和主义者，自由党激进派领袖之一，议会议员；曾任外交副大臣（1880—1882），地方自治事务大臣（1882—1885）。—— 第101、104、173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 第141、173、180页。

杜尔哥，安·罗伯尔·雅克（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1727—1781）—— 法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重农学派的最大代表人物；财政总稽核（1774—1776）；代表资产阶级利益。—— 第162、291页。

杜尔朗（Dourlen）—— 阿尔让台的法国医生，1881—1882年曾为马克思及其一家治病；沙尔·龙格的朋友。—— 第7、10、11、13、15、17、38、67、68、70、71、74、75、81—83、92、94—97、210、294、359页。

杜尔朗（Dourlen）—— 杜尔朗医生的妻子。—— 第11、15页。

杜尔朗（Dourlen）—— 杜尔朗医生的妻子的姐妹。—— 第15页。

杜克累尔，沙尔·德奥多·欧仁（Ducler, Charles-Théodore-Eugène 1812—1888）—— 法国政治活动家，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国民报》编辑（1840—1846），1848年5—6月任财政部长；后任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1882年8月—1883年1月）。—— 第97页。

杜兰多（Durando）——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阿尔及尔的法国植物学教授。—— 第301页。

杜林，欧根·卡尔（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庸俗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结合在一起,是个形而上学者。——第429页。

杜美,让·巴普提斯特(Dumay, Jean-Baptiste 生于1841年)——法国工人(机械工人),可能派分子。——第453页。

杜韦尔惹,阿尔图尔(Duverger, Arthur)——比利时新闻工作者,1879年起为社会党党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为法国《平等报》的比利时通讯员。——第84页。

杜西——见马克思,爱琳娜。

多里亚,安得列阿(Doria, Andrea 1468—1560)——热那亚的海军上将和政治活动家;热那亚的执政者(1528—1560),1528年起为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效劳,曾率领舰队去征伐阿尔及利亚(1541)。——第300页。

多宗,奥古斯特(Dozon, August 1822—1891)——法国外交官员和作家;巴尔干各族人民民间创作文集的编者和译者。——第275页。

E

厄尔文,亨利(Irving, Henry 1838—1905)——著名的英国导演和演员;莎士比亚许多悲剧中的角色的扮演者。——第5、172、234页。

*恩格斯,艾米尔(Engels, Emil 1828—1884)——恩格斯的弟弟,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250、347、348页。

恩格斯,艾米尔(Engels, Emil 1858—1907)——恩格斯的侄子,艾米尔·恩格斯的儿子。——第251页。

恩格斯,夏绿蒂(Engels, Charlotte 1833—1912)——恩格斯的弟弟艾米尔·恩格斯的妻子。——第250、251页。

恩格斯,伊丽莎白(Engels, Elisabeth 生于1861年)——恩格斯的侄女,艾米尔·恩格斯的女儿。——第250、251页。

F

法尔,让·约瑟夫·弗雷德里克·阿尔伯(Farre, Jean-Joseph-Frédéric-Albert 1816—1887)——法国将军,陆军部长(1879—1881)。——第16页。

菲茨吉本,杰拉德(Fitzgibbon, Gerald 1793—1882)——爱尔兰法学家和资产阶级政论家。——第158页。

菲尔丁,亨利(Fielding, Henry 1707—1754)——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十八世纪英国启蒙运动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第357页。

菲勒克,劳拉(Viereck, Laura)——路易·菲勒克的妻子。——第190、216、437、442、447页。

菲勒克,路易(Viereck, Louis 1851—1921)——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884—1887年是帝国国会议员;1896年侨居美国,脱离社会主义运动。——第164、166、168、184、190、191、213、214、216、315、327、379、424、425、427、437—447页。

菲力浦斯,安东尼达(南尼达)(Philips, Antoinette(Nannette) 1837左右—1885)——马克思的表妹,莱昂·菲力浦斯的女儿,第一国际荷兰支部成员。——第55页。

菲力浦斯,温德耳(Phillips, Wendell

1811—1884)——美国著名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卓越的演说家,废奴运动革命派领袖之一,主张用革命的方法反对南方奴隶主,七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主张在美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1871年加入第一国际。——第167、168页。

费默(Fermé)——法国法学家,共和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被流放到阿尔及尔;后来是阿尔及尔民事法庭法官;沙尔·龙格和保尔·拉法格的熟人。——第39—41、49、51、56、279、282、284、286、291—293、297—299、301、318页。

费默(Fermé)——前者的妻子。——第298页。

费舍,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Vischer, Friedrich Theodor 1807—1888)——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分子,写有多卷美学著作。——第52页。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 Georg Heinrich 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派首领之一;《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79—1880);曾多次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104、109、361、365、370、378、379、381、386、387、390、392、400、401、412、413页。

福尔坦,爱德华(Fortin, Édouard)——法国社会主义者,政论家,法国工人党党员。——第142页。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逃离德国,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1860)中揭露了他。——第329页。

福斯特,威廉·爱德华(Forster, William Edward 1818—1886)——英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80—1882);奉行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第308页。

弗纪埃(Feugier)——恩吉安的法国医生,1882年6—8月曾给马克思治病。——第67、68、74、75、77、79—81、91、92、94页。

弗兰克尔,列奥(Frankel, Léo 1844—1896)——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巴黎公社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36页。

弗雷西讷,沙尔·路易·德·索耳斯·德(Freycinet, Charles-Louis de Saulces de 1828—1923)——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历任部长,内阁总理(1879—1880、1882、1886、1890—1892)和外交部长(1879—1880、1882、1886);1892年由于巴拿马舞弊案件的揭发名誉扫地而被迫辞职并暂时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第75页。

弗里茨舍,弗里德里希·威廉(Fri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25—1905)——德国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改良主义活动家之一,职业是烟草工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1863)和领导人之一,

拉萨尔分子，1869年加入爱森纳赫派；国会议员（1867—1870、1877—1881）。——第164、167、424、442、444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Wilhelm Ⅱ 1744—1797）——普鲁士国王（1786—1797）。——第117、425、429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Ⅲ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第330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Ⅳ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206页。

弗里曼，爱德华·奥加斯特斯（Freeman, Edward Augustus 1823—1892）——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党人，牛津大学教授。——第418页。

弗洛雷斯坦一世（1785—1856）——摩纳哥公爵（1841—1856）。——第65页。

弗尼瓦尔，弗雷德里克·詹姆斯（Furnivall, Frederick James 1825—1910）——英国的文学史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创建了许多文学学会，其中包括“新莎士比亚学会”，“英国古籍学会”。——第35、397页。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Wróblewski, Walery 1836—1908）——波兰和国际革命运动的活动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63—1864年波兰解放起义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将军；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积极参加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七十年代末，在瑞士同波兰流亡者接近；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第36、83、87页。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38页。

G

盖得，茹尔（Guesde, Jules 1845—1922）（巴集耳，马蒂约 Basile, Mathieu）——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初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七十年代前半期追随无政府主义者；后为法国工人党（1879）创始人之一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宣传者；好些年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革命派的领导人，曾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34—38、75、82、99、108、110、113、115、116、206、219—225、231、248、249、259、298、331、337、341、362、371、374、379、384、389、391、392、395、400、403、405、407、408、410、411、436、437、441、453页。

盖泽尔，布鲁诺（Geiser, Bruno 1846—189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新世界》杂志编辑，1881—1887年为帝国国会议员；八十年代末作为机会主义者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第305、315、327、427页。

甘必大，莱昂（Gambetta, Léon 1838—1882）——法国国家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1871年创办《法兰西共和国报》；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1881—1882）。——第16、21、24、25、75、90、362、384、391页。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10、186、205、291、315、321页。

哥尔查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 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56—1882）。—— 第173页。

戈申，乔治·乔基姆（Goschen, George Joachim 1831—1907）—— 子爵，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德国人，初为自由党人；1863年起为议会议员，曾多次参加政府，写有许多经济问题的著作。—— 第111、422页。

格莱安，詹姆斯·罗伯特·乔治（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 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是辉格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内务大臣（1841—1846），海军首席大臣（1830—1834、1852—1855）。—— 第101页。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 第19、28、90、98、101、104、141、165、167、170、172、174—176、180、253、308、333、335、353、354页。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e 1806—1880）—— 法国新闻工作者，无原则的政客，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1870），持极右立场；替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 第373页。

格雷维，茹尔（Grévy, Jules 1807—1891）—— 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共和国总统（1879—1887）。—— 第16、206页。

格里伦贝格尔，卡尔（Grillenberger, Karl 1848—1897）——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工人，后为政论家，1881年起为帝国国会议员；九十年代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 第425、452页。

格里马耳迪（Grimaldi）—— 摩纳哥公爵王朝，从十四世纪统治至今（1793—1814年中断过）。—— 第65页。

格里马耳迪，朗伯托（Grimaldi, Lamberto 约死于1494年）—— 摩纳哥公爵（1457—约1494）。—— 第64页。

格林，莉莎（Green, Lisa）—— 第187页。

龚贝尔，阿伯拉罕（Gumbel, Abraham）——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侨居法国，1883年在巴黎任银行职员；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写过许多信件，批评该报在关于法国工人党分裂问题上所采取的正确路线。—— 第424、425页。

龚佩尔特，爱德华（Gumpert, Eduard 死于1893年）—— 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 第13、17页。

古耳德，杰伊（Gould, Jay 1836—1892）—— 美国百万富翁，铁路企业主和金融家。—— 第151页。

果达尔（Godard）—— 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新闻工作者。—— 第114、384、403页。

H

哈利（哈拉）—— 见龙格，昂利。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 著名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红色共和党人》周报和宪章

派其他定期刊物的编辑；1862年至1888年侨居美国；第一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第166、339页。

哈赛尔曼，威廉（Hasselmann, Wilhelm 生于1844年）——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1871—1875年是《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75年起是社会民主党人，1880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第424页。

哈舍尔特，丽娜（Haschert, Lina）——卡尔，希尔施的妻子。——第338页。

哈特曼，格奥尔格·威廉（Hartmann, Georg Wilhelm）——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75年起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两主席之一；1878—1881年为帝国国会议员。——第212页。

* 海德门，亨利·迈尔斯（Hyndman, Henry Mayers 1842—1921）——英国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民主联盟的创始人（1881）和领袖，该联盟于1884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他在工人运动中实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后为英国社会党领袖之一，1916年因进行有利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而被开除出党。——第52、171、172、194—196、239、240、290、308、376页。

海德门，玛蒂尔达（Hyndman, Mathilda 死于1913年）——1876年起为亨利·迈尔斯·海德门的妻子。——第171、196页。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55、424页。

汉森，格奥尔格（Hanssen, Georg 1809—1894）——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许多关于农业史和土地关系史问题的著作。——第125页。

豪威耳，乔治（Howell, George 1833—1910）——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泥水匠，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1861—1862），1864年9月28日第一国际成立大会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9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改革同盟和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书记（1871—1875）。——第231、253页。

赫德尔，麦克斯（Hödel, Max 1857—1878）——莱比锡的帮工；1878年谋刺德皇威廉一世未遂，政府借此实施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335页。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1847年侨居国外，在国外建立了“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第263页。

赫尔姆霍茨，海尔曼·路德维希·斐迪南（Helmholtz, Hermann Ludwig Ferdinand 1821—1894）——德国杰出的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倾向于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第46页。

* 赫普纳，阿道夫（Hepner, Adolf 1846—1923）——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家报》编辑之一，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后侨居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132、133、134、257、315、339—341、394、452页。

赫斯，西比拉（Heß, Sibylle 1820—1903）（父姓佩什 Pesch）——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莫泽斯·赫斯的妻子，马克思一家的熟人。—— 第 242 页。

赫希柏格，卡尔（Höchberg, Karl 1853—1885）（笔名路·李希特尔 L. Richter）—— 德国社会改良主义者，富商的儿子；1876 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创办和资助许多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报刊。—— 第 255、327、328、338 页。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 65—8）—— 杰出的罗马诗人。—— 第 52 页。

黑尔斯，约翰（Hales, John 生于 1839 年）—— 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织工，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书记（1871—1872），土地和劳动同盟的成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主席，后为书记，领导该委员会里的改良派，反对马克思及其拥护者；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 第 139 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 第 22、28、73、383 页。

亨利六世（Henry Ⅵ 1421—1471）—— 英国国王（1422—1461）。—— 第 406 页。

亨利七世（Henry Ⅶ 1457—1509）—— 英国国王（1485—1509）。—— 第 406、451 页。

亨利八世（Henry Ⅷ 1491—1547）—— 英国国王（1509—1547）。—— 第 451 页。

亨奈耳，阿尔伯特（Hänel, Albert 1833—1918）—— 德国政治活动家，国家法史学教授，帝国国会议员，进步党领袖之一，后来加入自由思想党。—— 第 33 页。

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 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 第 33、330、429、443 页。

霍伊贝耳（Heubel）—— 萨尔茨维德尔的普鲁士小官吏，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外祖父。—— 第 235 页。

J

基佩尔特，约翰·赛米尔·亨利希（Kiepert, Johann Samuel Heinrich 1818—1899）—— 德国地理学家和制图家，柏林大学教授；编制过许多地图集。—— 第 275 页。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 第 192 页。

季别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Зибер,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44—1888）—— 著名的俄国经济学家；俄国第一批马克思经济著作的通俗化作家之一，但不懂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站在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上。—— 第 152 页。

加尔西亚，查理（Garcia, Charles J.）—— 英国新闻工作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伦敦通讯员；海

德门的拥护者。—— 第 363、376、377、388 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 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全国统一的斗争；七十年代声援巴黎公社，赞成在意大利建立国际的支部。—— 第 66、88 页。

加利费，加斯顿·亚历山大·奥古斯特（Galliffet, Gaston-Alexandre-Auguste 1830—1909）—— 侯爵，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骑兵团团长，在色当被俘，后被放回参加反对公社的战争，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曾任凡尔赛军队的骑兵旅旅长；七十年代起担任许多显要的军事职务。—— 第 25 页。

*加特曼，列甫·尼古拉也维奇（Гартман,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0—1908）—— 俄国革命家，民粹派，1879 年参加“民意党”反对亚历山大二世的一次恐怖活动，事后流亡法国，后迁英国，1882 年又迁美国。—— 第 91、107、111、112、117、121、123、125、126、130、131、133、172、174、183—185、187、245、280、281、326、327 页。

杰弗里（Jeffrey）—— 美国工程师和发明家。—— 第 187 页。

杰维尔，加布里埃尔（Deville, Gabriel 1854—1940）—— 法国社会党人，法国工人党的积极活动家，政论家，写有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浅释以及许多哲学、经济学和历史著作，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二十世纪初脱离了工人运动。—— 第 37、75、131、331、400、401、403、408 页。

金德林格，尼克拉斯（Kindlinger, Niklas 1749—1819）—— 德国历史学家。—— 第 124 页。

K

卡布鲁柯夫，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Каблук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9—1919）—— 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民粹派；莫斯科大学教授。—— 第 152 页。

卡尔·霍亨索伦亲王（Karl von Hohenzollern, Prinz 1801—1883）——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儿子。—— 第 429 页。

卡菲埃罗，卡洛（Cafiero, Carlo 1846—1892）—— 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第一国际会员，1871 年在意大利执行总委员会的路线；1872 年起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七十年代末抛弃了无政府主义，1879 年用意大利文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简述。—— 第 118 页。

卡富尔，卡米洛·本佐（Cavour, Camillo Benso 1810—1861）—— 伯爵，意大利国家活动家，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思想家和领袖；撒丁政府首脑（1852—1859 和 1860—1861），实行在萨瓦王朝领导下“自上”统一意大利的政策，同时指望得到拿破仑第三的支持；1861 年领导第一届意大利政府。—— 第 260 页。

卡龙，沙尔·亚历山大·德（Calonne, Charles-Alexandre de 1734—1802）—— 法国国家活动家，财政总稽核（1783—1787），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反革命流亡分子的领

袖之一。—— 第162页。

卡佩尔，奥古斯特（Kapell, August 生于1844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木匠，拉萨尔分子；六十至七十年代初是全德工会联合会会员；德意志木工联合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877—1878年为帝国国会议员，根据反社会党人法，于1880年被驱逐出汉堡，脱离了政治活动。—— 第330页。

卡桑尼亚克—— 见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道夫。

卡斯特拉兹（Casthelaz）—— 莫里斯·卡斯特拉兹的母亲。—— 第54、284、300页。

卡斯特拉兹，莫里斯（Casthelaz, Maurice）—— 法国医生和药剂师，马克思的熟人。—— 第45、47、50、54、284、289、300页。

卡特柯夫，米哈伊尔·尼基佛罗维奇（Катков, Михаил Никифорович 1818—1887）—— 俄国反动政论家，《莫斯科新闻》的编辑（1850—1855、1863—1887）。—— 第263页。

卡文迪什，弗雷德里克·查理（Cavendish, Frederick Charles 1836—1882）—— 勋爵，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1865年起为议会议员；担任过许多重要的国家职务；1882年5月被任命为爱尔兰事务大臣，1882年5月6日被爱尔兰小资产阶级恐怖组织“不可战胜者”的成员所刺杀。—— 第59、335页。

卡佐，德奥多·约瑟夫·茹尔（Cazot, Théodore－Joseph－Jules 1821—1913）—— 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职业是法学家；反对第二帝国的政治制度，1851—1859年坐牢；1870年为国防政府外交部的秘书长，1871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1879年至1882年1月（有间断）担任司法部长；甘必大的拥护者。—— 第16页。

凯，约翰·西摩尔（Keay, John Seymour 1839—1909）—— 1862—1882年在印度的英国大银行官员；自由党人；曾参加印度和英国的政治生活。—— 第111页。

凯迪伊克，阿尔诺德（Kerdijk, Arnold 1846—1905）—— 荷兰社会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自由主义者，接近讲坛社会主义。—— 第153页。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Caius Julius Cæsar 公元前100左右—44）—— 著名的罗马统帅，国家活动家和著作家；著有《高卢战纪》一书。—— 第112、113页。

凯泽尔，麦克斯（Kayser, Max 1853—1888）——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帝国国会议员（1878年起），属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右翼。—— 第229、425页。

康德拉里，罗梅奥（Candelari, Romeo）—— 意大利新闻工作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曾给《人民报》撰稿。—— 第118页。

考布（Kaub）—— 卡尔·考布的妻子。—— 第15页。

考布，卡尔（Kaub, Karl）—— 侨居伦敦的德国工人，1865年后侨居巴黎；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和1870—1871年），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第15、199页。

* 考茨基，卡尔（Kautsky, Karl 1854—1938）——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时

代》杂志编辑；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第1877、144—146、165、166、171、175、176、180、187、190、202、204、205、208、211、212、214—218、226、231、243、249、259、260、264、265、280、306、339、345、351—353、357、377、398、399、428—433、446—450页。

考茨基，路易莎（Kautsky, Louise 1860—1950）（父姓施特腊塞尔 Strasser）——奥地利社会主义者，1890年起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秘书；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1893）代表；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第399页。

* 考茨基，敏娜（Kautsky, Minna 1837—1912）——德国女作家，写有许多社会题材的小说；卡尔·考茨基的母亲。——第171、212、215、217、218页。

考恩，约瑟夫（Cowen, Joseph 1831—1900）——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激进派，追随宪章派；新堡援救加里波第大会（1862年9月）的组织者之一，议会议员（1874年起）。——第165、421、422页。

* 考夫曼（Kaufmann, S. F.）——在伦敦的德国侨民，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161页。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28页。

科采布，奥古斯特（Kotzebue, August 1761—1819）——德国反动作家和政论家。——第10页。

科尔克曼（Kolkmann）——伦敦书商。——第108页。

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雅克拉尔），安娜·瓦西里也夫娜（Корвин-Круковская（Jaclard），Ан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1843—1887）——俄国女革命家，第一国际俄国支部成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沙尔·维克多·雅克拉尔的妻子。——第15页。

科格希尔，辛克勒（Coghill, J. G. Sinclair）——文特诺尔的德国医生。——第102页。

科赫，罗伯特（Koch, Robert 1843—1910）——杰出的德国学者，现代微生物学的奠基者之一；八十年代发现了结核病、霍乱等的病原菌。——第60页。

科兰，让·吉约姆·塞扎尔·亚历山大·伊波利特（Colins, Jean—Guillaume—César—Alexandre—Hippolyte 1783—1859）——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比利时人，主张把国家占有地租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社会矛盾的手段。——第192、193页。

科勒，扬（Kollár, Ján 1793—1852）——杰出的捷克诗人和语文学家；斯拉夫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鼓舞者之一；斯洛伐克人。——第264页。

科勒特，查理·多布森（Collet, Charles Dobson 死于1898年）——英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乌尔卡尔特派机关报《自由新闻》的编辑（1859—1865）；1866年起为《外交评论》杂志的出版者。——第183页。

科斯塔，安得列阿（Costa, Andrea 1851—1910）——意大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七十年代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879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后来为争取建立

独立的工人政党而斗争，1892 年起是意大利社会党党员，在党内追随改良派；1882 年起是议会议员。—— 第 99、451 页。

柯瓦列夫斯基，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1851—1916）—— 俄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志学家和法学家；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写有许多原始公社制度史方面的著作。—— 第 341 页。

克格尔，麦克斯（Kegel, Max 1850—1902）——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和诗人；1869 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七十至八十年代曾给各种工人报刊撰稿，在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年代里为此曾多次被判处徒刑；八十年代是社会民主党杂志《胡桃钳》和《实话》的创办人和编辑；党歌的作者。—— 第 207、211 页。

克劳德（Claude）—— 第 300 页。

克里埃（Crié）—— 法国新闻工作者，无政府主义者；1882 年为《公民和战斗报》编辑部成员。—— 第 375、376 页。

克列孟梭，若尔日·本扎曼（Clemenceau, Georges-Benjamin 1841—1929）——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八十年代起为激进党领袖；内阁总理（1906—1909 和 1917—1920），奉行帝国主义政策。—— 第 8、76、97、148、182、362、391、392 页。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53 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 第 156 页。

* 克洛斯，诺里斯（Clowes, Norris A.）—— 美国新闻工作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为《纽约星报》驻爱尔兰记者；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库诺的熟人。—— 第 196、197 页。

孔斯旦，让·安都昂·厄内斯特（Constans, Jean-Antoine-Ernest 1833—1913）—— 法国国家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内政部长（1880—1881、1889—1892），实行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 第 16 页。

库伯，弗兰西斯·托马斯·德·格雷（Cow-per, Francis Thomas de Grey 1834—1905）—— 勋爵，英国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爱尔兰总督（1880 年—1882 年 4 月）；威廉·弗兰西斯·库伯-坦普尔的侄子。—— 第 308 页。

库伯-坦普尔，威廉·弗兰西斯，蒙特-坦普尔男爵（Cowper-Temple, William Francis, Baron Mount-Temple 1811—1888）—— 英国国家活动家，议会议员，历任自由党内阁阁员；帕麦斯顿的养子。—— 第 308 页。

库奈曼（Kunemann 约生于 1828 年）—— 蒙特卡罗的德国医生，1882 年 5—6 月初曾给马克思治病。—— 第 58、59、60—66、321 页。

* 库诺，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Cuno, Friedrich Theodor 1846—1934）——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1871—1872 年和恩格斯经常通信，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第一国际米兰支部的组织者，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会后侨居美国，在那里参加国际的活动；后来参加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第 197、464 页。

L

拉布谢尔，亨利（Labouchère, Henry

1831—1912)——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外交家和新闻工作者,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六十年代末起为《每日新闻》的所有者之一。——第141、142页。

* 拉法格,保尔(Lafargue, Paul 1842—1911)——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论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1869),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1869—1870),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1879);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第29、34、36、38、39、68、69、73、75、77、98—100、106—109、113—116、119、121、122、125、131—134、148、152、191、198、200、207、219—225、231、247、248、255、259、285、286、289、300、305、308、319、324—326、331、360、368、371—374、380—383、385、386、391、394、395、401—408、410、411、413、422、423、436、437、441、452、453、463页。

* 拉法格,劳拉(Lafargue, Laura 1845—1911)——马克思的二女儿,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8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第13、14、30、39、43、49、53、57、60、74、75、77、78、81、84、85、87—89、92—96、99、121、130、132、148、188、199、200、219、241、246—248、255、287、297、300、305、325、346、349、357、358、360、366、367、372、373、382、394、404—407、409、410、417、433、435、436、452、453、463页。

拉菲特,雅克(Laffitte, Jacques 1767—1844)——法国大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金融资产阶级代表,政府首脑(1830—1831)。——第162页。

拉弗勒,艾米尔·路易·维克多·德(Laveleye, Émile-Louis-Victor de 1822—1892)——比利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雇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118、233页。

*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民粹派思想家之一,1870年起侨居国外;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参加者;《前进》杂志编辑(1873—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5—1876);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之一;从七十年代初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第70、204、252、253、269、280、281、283、295、304、324、341、342、462页。

拉格朗日,约瑟夫·路易(Lagrange, Joseph-Louis 1736—1813)——杰出的法国数学家和力学家。——第110页。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172、221、234、260、291、341、355、356、361、370、383、427页。

腊契博尔斯基,亚当(Raciborski, Adam 1809—1871)——波兰医生,参加过1830—1831年波兰起义,起义被镇压后流亡法国,写有许多妇科学方面的著作。——第431页。

腊施,古斯达夫(Rasch, Gustav 死于1878年)——德国民主主义者,政论家,职业是法学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

加者，革命失败后先后流亡瑞士和法国，1873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第274页。

莱昂哈特，格尔哈特·阿道夫·威廉（Leonhardt, Gerhard Adolf Wilhelm 1815—1880）——德国法学家和反动的国家活动家，汉诺威司法大臣（1865—1866）和普鲁士司法大臣（1867—1879）。——第258页。

莱布尼茨，哥特弗利德·威廉（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第110、114页。

莱茵哈特，理查（Reinhardt, Richard 1829—1898）——德国诗人，曾侨居巴黎，亨利希·海涅的秘书，马克思一家的朋友；后来经商。——第28、71、235、247页。

兰多尔，瓦尔特·萨维奇（Landor, Walter Savage 1775—1864）——英国诗人、作家和评论家，追求革命浪漫主义，同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曾积极参加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第173页。

兰克，阿尔图尔（Ranc, Arthur 1831—1908）——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短期内担任过巴黎公社委员；八十年代是各种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报刊的撰稿人，曾任众议院议员（1881—1885），参议员（1891—1900）。——第299页。

兰克，约翰（Ranke, Johannes 1836—1916）——德国生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1889年起成为保守党人。——第417页。

兰伦德，威廉（Langland, William 约1330—1400）——英国诗人。——第397页。

朗凯斯特，爱得文·雷伊（Lankester, Edwin Ray 1847—1929）——英国学者，生物学家。——第60、151、170、171、459页。

劳拉——见拉法格，劳拉。

勒兹根，查理（Roesgen, Charles）——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职员。——第374页。

雷德福（Radford）——英国法学家，马克思一家的熟人，后来是多莉·梅特兰的丈夫。——第5、172页。

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Redgrave, Alexander）——英国的工厂，视察员。——第143页。

雷德帕思——见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

雷尼亚尔，阿尔伯（Regnard, Albert 生于1836年）——法国激进派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第16、155、157页。

雷诺（Reynaud）——阿尔让台的法国医生。——第10、11、13页。

雷诺（Reynaud）——前者的妻子。——第10、11、13页。

雷伊，约翰（Rae, John 1845—1915）——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八十年代曾为《现代评论》杂志撰稿，《亚当·斯密生平》一书的作者。——第239、253页。

李卜克内西，娜塔利亚（Liebknecht, Natalie 1835—1909）——黑森法学家、自由主义者特·雷的女儿，1868年起为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妻子。——第211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

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会员，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斗争，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在某些问题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79、94、104、168、169、176、190、212、242、257、317、327、343、344、363、366、377、379、380、395、437、443、452、456页。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代表。——第184、191、291页。

李希特尔，欧根（Richter, Eugen 1838—1906）——德国政治活动家，进步党领袖，国会议员。——第33页。

理查三世（Richard Ⅲ 1452—1485）——英国国王（1483—1485）。——第406页。

利林塔尔（Lilienthal, F.W.）——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纽约的德国侨民，职业是医生，曾同社会主义者接近。——第327、393页。

利沙加勒，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Lissagaray, Prosper Olivier 1839—1901）——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曾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团体“新雅各宾派”；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一书作者；1880年回到法国，《战斗报》的创建人（1882）和编辑，反对法国工人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第15、25、81、225、284、336、337、371—373、375、376页。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72年），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建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39、461页。

林格瑙，约翰·卡尔·斐迪南（Lingenau, Johann Karl Ferdinand 1814—1877）——美国社会主义者，原系德国人，遗嘱把自己的财产赠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90页。

琳蘅——见德穆特，海伦。

龙格，埃德加尔（Longuet, Edgar 1879—1950）——马克思的外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后为医生，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党党员；1938年起为法国共产党党员；在希特勒侵占法国时期是抵抗运动的参加者。——第6、10、69、74、78、93、148、170、180、181、186、188、210、232、235、237、241、284、290、291、300、307、319、351、368、423页。

龙格，昂利（哈利）（Longuet, Henri（Harry）1878—1883）——马克思的外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第6、7、10、26、69、74、

78、93、148、170、180、181、186、188、210、232、235、237、241、284、290、291、300、306、319、351、368、396、417、423、462页。

龙格，费利西塔（Longuet, Felicitas）——沙尔·龙格的母亲。——第10、13、78页。

龙格，马赛尔（Longuet, Marcel 1881—1949）——马克思的外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第6、10、69、74、78、179、186、188、210、232、235、237、241、284、290、291、300、307、319、351、368、423页。

龙格，让·罗朗·弗雷德里克（Longuet, Jean－Laurent－Frederick 1876—1938）（琼尼 Johnny）——马克思的外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后为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领袖之一。——第6、7、9、10、37、69、74、78、81、84、89、91、94、98、103、108、109、132、134、148、170、175、179—181、186、188、190、199、210、232、235、237、241、284、289、291—293、300、307、319、351、368、397、417、422、423页。

* 龙格，沙尔（Longuet, Charles 1839—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蒲鲁东主义者，后为可能派分子，职业是新闻工作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八十至九十年代被选为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丈夫。——第7—10、14、26、38—40、68、71、78、82、83、85、93、100、105、107、134、139、140、142、148、171、174、175、181—183、187、190、210、234、281、285、286、289—291、294、320、324、342、351、359、368、394、412、423、454页。

龙格，沙尔（Longuet, Charles 1873年9月—1874年7月）——马克思的外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儿子。——第233页。

* 龙格，燕妮（Longuet, Jenny 1844—1883）——马克思的大女儿，新闻工作者，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1872年起为沙尔·龙格的妻子。——第9—11、13、15、17、38、57、69、70、73、74、78、81、83、88、93—96、130、132、134、148、155、170、173、175、179—183、186—190、198、209、210、217、218、232—235、237、241—243、247、281、282、284—286、288—291、294、300、306、307、310、315、319、324—326、328、337、349、350、359、360、368、373、397、409、417、420、422、423、428、447、456、458、459页。

龙格，燕妮（Longuet, Jenny 1882—1952）——马克思的外孙女，燕妮和沙尔·龙格的女儿。——第95、359页。

娄，罗伯特，舍布鲁克子爵（Lowe, Robert, Viscount Sherbrooke 1811—1892）——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泰晤士报》的撰稿人，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868—1873），内务大臣（1873—1874）。——第100、107页。

鲁瓦，约瑟夫（Roy, Joseph）——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和费尔巴哈著作的法译者。——第82、83、85页。

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Ⅰ 1786—1868）——巴伐利亚国王（1825—1848）。——第57页。

路特希尔德，阿尔丰斯（Rothschild, Alfons 1827—1905）——法国路特希尔

德银行行长。——第75、247、366页。

路易莎(Luise 1776—1810)——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妻子(1793—1810)。——第330页。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147、277页。

伦德斯顿(Rendstone)——马克思的熟人。——第25页。

罗,哈里埃特(Law, Harriet 1832—1897)——著名的英国无神论运动女活动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2)和第一国际曼彻斯特支部成员(1872)。——第142页。

罗比,亨利·约翰(Roby, Henry John 1830—1915)——曼彻斯特的欧门—罗比公司的股东。——第347、348页。

罗德黑岑(Roodhuizen, A.)——扎尔特博默耳的牧师,马克思的表妹安东尼达·菲力浦斯的丈夫。——第55页。

罗塞耳(Rowsell)——第111页。

罗舍,莉莲(Rosher, Lilian 生于1882年)——玛丽·艾伦·罗舍的女儿。——第80、84、91、109、124、328、347、350、354、359、367、373、374、433、463页。

罗舍,玛丽·艾伦(Rosher, Mary Ellen 约生于1860年)(父姓白恩士Burns)(彭普斯Pumps)——恩格斯的内侄女。——第5—7、9、25、29、43、49、52、80、82、84、91、94、103、109、124、125、131、180、183、187、210、243、328、347、348、350、354、359、367、373、374、433、442、463、464页。

罗舍,派尔希·怀特(Rosher, Percy White)——英国商人,1881年起是玛丽·艾伦·罗舍的丈夫。——第103、112、117、243、350、354、357、367、373、374、405、407、433、464页。

罗什弗尔,昂利(Rochefort, Henri 1830—1913)——法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左派共和党人,国防政府成员,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逃往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曾出版《不妥协派报》;八十年代末转向教权主义保皇派反动势力阵营。——第25、81、140、172、386页。

罗斯科,亨利·恩菲耳德(Roscoe, Henry Enfield 1833—1915)——英国化学家,写有许多化学教科书。——第442页。

罗特豪斯——见罗德黑岑。

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Rodbertus,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416、428页。

洛里亚,阿基尔(Loria, Achille 1857—1943)——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的赝造者。——第76、77、373、445页。

洛帕廷,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Лопатин, 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5—1918)——俄国革命家,民粹派,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译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152页。

吕利埃,厄内斯特·沙尔(Lullier, Ernest Charles 1838—1891)——法国政论家,原海军军官;1871年3月18日起义的参加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国民自卫军总司令(1871年3月18—25日),对巴黎公社进行过敌对

宣传；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布朗热运动的参加者。——第225页。

M

马尔波罗（Marlborough）——自十八世纪起成为邱吉尔家族的世袭爵姓。——第173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146页。

马耳斯（Mals）——法国新闻工作者，无政府主义者，1882年为《公民和战斗报》编辑之一。——第375页。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Machiavelli, Ni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60页。

马考莱，托马斯（Macaulay, Thomas 1800—1859）——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第173页。

*马克思，爱琳娜（Marx, Eleanor 1855—1898）（杜西 Tussy）——马克思的小女儿，八十至九十年代是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1884年起为爱德华·艾威林的妻子。——第5、6、8、9、13、16、17、19—21、23、24、27—31、35—38、43、46、48、53、57、60、62、69、70、73、74、76—78、81、84、85、89、91、93、94、102、103、108、109、113、118、120、129、172、179、182、187、189、209、210、218、236、241—243、246、247、251、253—255、284、291、305、318—320、322、325、328、342、349、359、360、364、368、374、380、396、397、418—423、453、459、461、463页。

马克思，亨利希（Marx, Heinrich 1777—1838）——马克思的父亲；律师，后为特利尔司法参事。——第234页。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14—1881）（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5—7、9、10、13、15—17、20、21、23、24、26、28、42、102、148、170—172、179、181、182、184、186—189、193、196、198、200、209、217、218、227、231—239、241、242、247、254、266、297、456、458、460页。

马克西，弗雷德里克·奥加斯塔斯（Maxse, Frederick Augustus 1833—1900）——英国政论家和海军上将，孔德主义者；八十年代曾为《正义报》撰稿。——第174页。

马雷，昂利（Maret, Henry 1838—1917）——法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马赛曲报》编辑之一；1881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第16、114、230、403页。

马利乌斯，凯尤斯（Marius, Caius 公元前156左右—86）——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曾任执政官（公元前107、104—100、86）。——第112页。

马隆，贝努瓦（Malon, Benoit 1841—1893）——法国社会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后迁居瑞士，追随无政府主义者；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可能派的首领和思想家之一。——第34、35、81、97、99、100、104—106、109—111、114、206、220—223、225、226、230、

231、248、249、259、261、331、336、360、362、369、371、373、380—383、385、386、389、391、395、400—402、411—413、427、453、464页。

马茂德－吉拉尔－埃德丁－帕沙·达马德（Mahmud Dshelal ed－Din Pasha Damat 死于1884年）——土耳其国家活动家，军事委员会委员，多次担任陆军大臣；1878年被黜和流放，1880年从流放地返回，1881年因参加刺杀土耳其苏丹阿卜杜－阿吉兹被判处终身流放。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内弟。——第306页。

马茂德－奈迪姆－帕沙（Mahmud Nedim Pasha 1810—1883）——土耳其反动的国家活动家，1856年任海军大臣，1871—1876年（断续地）任宰相，受俄国大使的影响极大；1876年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辞职；1879—1883年任内务大臣。——第306页。

马尼亚德——阿尔芒·马尼亚德的母亲。——第287页。

马尼亚德，阿尔芒（Magnadière, Armand 死于1882年）——巴黎的法国银行官员。——第287页。

马萨尔，艾米尔（Massard, Émile）——法国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法国工人党党员，八十年代退出该党；八十年代初是《平等报》编辑部秘书。——第289、384、403、408页。

马塞（Macé）——“赛义德号”轮船的法国船长。——第54、56页。

马塞奥，安东尼奥（Maceo, Antonio 1848左右—1896）——古巴的革命家，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压迫斗争的领导人之一；人民起义（1868—1878、1881和1895）的积极参加者；将军，在战斗中阵亡。——第98页。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第173页。

麦岑，奥古斯特（Meitzen, August 1822—1910）——德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写有许多德国土地关系史方面的著作，1867—1882年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统计管理局工作。——第124页。

麦圭尔（McGuire, P. T.）——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改良主义者，美国社会党党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木工联合会领导人之一；1881年为库尔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代表；后来是社会主义的公开敌人和工人运动中工联主义思想的维护者。——第217页。

麦克利恩（MacLean）——文特诺尔（威特岛）的英国女房主。——第102页。

迈尔，卡尔（Mayer, Karl 1819—1889）——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六十年代任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第303页。

迈斯纳，奥托·卡尔（Meißner, Otto Karl 1819—1902）——汉堡出版商，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其

他著作。—— 第 134、235、238、421 页。

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Meyer, Rudolph Hermann 1839—1899）——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保守党人，洛贝尔图斯传记的作者，以及《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和《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等书的作者。—— 第 233、234、416、428、431、445、463 页。

曼宁，亨利·爱德华（Manning, Henry Edward 1808—1892）—— 英国教士，1851 年改信天主教，英国天主教会的首脑，1875 年起为红衣主教；接近基督教社会主义。—— 第 416 页。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 Georg Ludwig 1790—1872）—— 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在研究中世纪日耳曼马尔克公社的历史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 8、120、122—125、365、412、416、451 页。

梅迪契，洛兰佐（Medici, Lorenzo 1449—1492）—— 弗罗伦萨国家活动家和诗人，弗罗伦萨的统治者（1469—1492）。—— 第 64 页。

梅林，弗兰茨（Mehring, Franz 1846—1919）—— 杰出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八十年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写有许多关于德国历史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著作，卡·马克思传的作者；《新时代》杂志编辑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在创建德国共产党时起过卓越的作用。—— 第 77、337、338、344、345、358、365、398 页。

梅萨—伊—列奥姆帕特，霍赛（Mesa y Leompart, José 1840—1904）—— 著名的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1—1872）和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1872—1873），曾与无政府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西班牙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西班牙文。—— 第 37、38、75、206、226、374 页。

梅特兰（Maitland）—— 多莉·梅特兰的父亲，马克思一家的熟人。—— 第 172 页。

梅特兰（Maitland）—— 多莉·梅特兰的姐妹。—— 第 171 页。

梅特兰，多莉（Maitland, Dolly）—— 英国女演员，马克思一家的熟人。—— 第 5、19、31、171、172 页。

蒙森，泰奥多尔（Mommsen, Theodor 1817—1903）—— 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古罗马史著作。—— 第 33 页。

米凯尔，约翰（Miquel, Johannes 1828—1901）—— 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年代起是自由党人，民族联盟创建人之一（1859），鄂斯纳布鲁克市市长（1865—1870、1876—1880），1867 年起是民族自由党右翼首领之一，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帝国国会议员。—— 第 402、445 页。

米拉波，奥诺莱·加布里埃尔（Mirabeau, Honoré-Gabriel 1749—1791）——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者。—— 第 232、337、429 页。

缪尔纳，亚马多·哥特弗利德·阿道夫

（Müllner，Amandus Gottfried Adolf 1774—1829）——德国的作家、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写有许多宣扬宿命论思想的悲剧。——第61、431页。

摩里，赛米尔（Morley，Samuel 1809—1886）——英国工业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65、1868—1885）。——第141、142、388页。

莫里哀，让·巴蒂斯特（Molière，Jean-Baptiste 1622—1673）（真姓波克兰 Poquelin）——伟大的法国剧作家。——第241页。

莫斯特，约翰（Most，Johann 1846—1906）——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流亡英国；《自由》周报的创办人（1879）和编辑；1880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1882年侨居美国，继续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第147、161、164、167、169—171、173、176、197、215、256、316、335、336、340、356页。

穆尔，赛米尔（Moore，Samuel 1830左右—1912）——英国法学家，第一国际会员，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30、43、91、108—110、189、243、347页。

穆罕默德（Muhammad 570左右—632）——阿拉伯传教士，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按伊斯兰教的说法是先知，即“安拉的使者”。——第55、135、302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摹仿者，穆勒·詹姆斯的儿子。——第192、362页。

穆勒，詹姆斯（Mill，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方面是边沁的追随者。——第192页。

N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Napoléon Ⅰ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65、93、257、409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Ⅲ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39、140、192、260、261、279、450页。

奈克尔，雅克（Necker，Jacques 1732—1804）——法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十八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曾数度被任命为财政总管，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曾企图进行某些改革。——第162页。

尼基廷娜，瓦尔瓦拉·尼古拉也夫娜（Никитина，Варва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 1842—1884）（父姓让德尔 Жандр）——俄国女政论家；六十年代末住在意大利，后来在法国，曾为许多法国期刊撰稿；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第233页。

牛顿，伊萨克（Newton，Isaac 1642—1727）——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第110页。

*纽文胡斯，斐迪南·多梅拉（Nieuwenhuis，Ferdinand Domela 1846—1919）——荷兰人运动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1888年起为议会议员；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九十年代转到

无政府主义立场。—— 第 101、152—155、244 页。

诺比林，卡尔·爱德华 (Nobiling, Karl Eduard 1848—1878) —— 德国无政府主义者；1878 年谋刺威廉一世未遂，政府借此实施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第 29、335 页。

诺尔多，麦克斯·西蒙 (Nordau, Max Simon 1849—1923) (真姓泽德费尔德 Südfeld) —— 法国作家和政论家，原系德国人。—— 第 12、14 页。

诺盖特 (Norgate) —— 伦敦书商。—— 第 195 页。

诺维柯娃，奥里珈·阿列克谢也夫娜 Новикова, Ольга Алексеевна 1840—1925) —— 俄国女政论家，长期住在英国，七十年代在格莱斯顿内阁时期实际上充当俄国政府的外交代理人。—— 第 43、90 页。

O

欧勒，列奥纳特 (Euler, Leonhard 1701—1783) —— 伟大的数学家、力学家和物理学家，瑞士人，曾在彼得堡科学院 (1727—1741 和 1766—1783) 和柏林科学院 (1741—1766) 工作。—— 第 110、145 页。

欧门 (Ermen) —— 曼彻斯特的企业主，欧门—恩格斯公司和欧门—罗比公司的股东。—— 第 348 页。

P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 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 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内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 第 90、101、308 页。

帕涅尔，查理·斯图亚特 (Parnell, Charles Stewart 1846—1891) —— 爱尔兰政治和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1875 年起为议会议员，1877 年起为爱尔兰地方自治派领袖，曾协助建立土地同盟 (1879)。—— 第 174、177、187、308 页。

帕森斯，威廉 (Parsons, William 1570 左右—1650) —— 英国国家活动家，积极参与使爱尔兰殖民地化的工作，爱尔兰大土地占有者，爱尔兰最高审判官 (1640—1648)，枢密院成员 (1623 年起)，议会议员。—— 第 156 页。

派克，萨拉 (Parker, Sarah) —— 恩格斯家里的女佣。—— 第 210 页。

彭普斯—— 见罗舍，玛丽·艾伦。

皮阿，费里克斯 (Pyat, Félix 1810—1889) —— 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 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谤马克思和第一国际；1871 年为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 年大赦后回到法国，1880 年 9—11 月出版《公社报》。—— 第 16 页。

皮尔，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 ——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和派 (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 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 (1822—1827 和 1828—1830)，首相 (1834—1835 和 1841—1846)；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 (1846)。—— 第 101、158 页。

皮卡尔，莱昂（Picard, Léon）——法国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法国工人党党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为《平等报》编辑部成员。——第99、381、384、390、391、403页。

皮康，爱德华（Piquand, Édouard）——法国法学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是蒙吕松市法院侦查员。——第405、410页。

皮克林（Pickering）——卡恩的英国医生。——第65页。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1783—1801和1804—1804）。——第158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32、184、192、263页。

普兰德加斯特，约翰·帕特里克（Prendergast, John Patrick 1808—1893）——爱尔兰历史学家，自由党人，写有许多有关爱尔兰历史方面的著作。——第156、157页。

普隆—普隆——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普卢塔克（Plutarchos约46—125）——古希腊作家，道德论者，唯心主义哲学家，写有古希腊和罗马杰出活动家比较传记。——第65、112页。

普特卡默，罗伯特·维克多（Puttkamer, Robert Victor 1828—1900）——普鲁士反动国家活动家，内务大臣（1881—1888），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者之一。——第178、425、452页。

Q

乔治，亨利（George, Henry 1839—1897）——美国政论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扬由资产阶级国家把土地收归国有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社会矛盾的手段的思想；曾企图领导美国工人运动，并把它导向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第184、191—193、239页。

琼尼——见龙格，让。

邱吉尔，伦道夫·亨利·斯宾塞（Churchill, Randolph Henry Spencer 1849—1895）——勋爵，英国国家活动家，保守派领袖之一，印度事务大臣（1885—1886）、财政大臣（1886）；殖民扩张的拥护者，反对爱尔兰地方自治，主张采取一套社会蛊惑的办法。——第173页。

R

日拉丹，艾米尔·德（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36—1866年（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后担任《自由报》编辑（1866—1870）；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在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1850年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140页。

茹尔德，弗朗斯瓦（Jourde, François 1843—189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右翼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银行职员，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参加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财政委员会的领导人；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1874年

从那里逃脱，1880 年回到法国。——第 412 页。

若夫兰，茹尔·弗朗斯瓦·亚历山大（Joffrin, Jules-François-Alexandre 1846—1890）——法国社会主义者，机械工人，巴黎机械工人工团的组织者之一；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71—1881）；法国工人党党员，该党机会主义派（可能派）的首领之一，1882 年起为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第 34—37、248、259、391 页。

S

萨姆特，阿道夫（Samter, Adolph 1824—1883）——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的追随者。——第 192 页。

萨伊，让·巴蒂斯特·莱昂（Say, Jean-Baptiste-Léon 1826—1896）——法国国家和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辩论日报》编辑之一；1871 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1872—1882（有间断）任财政部长；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敌人。——第 247 页。

塞格温，阿瑟·爱德华·谢尔登（Seguin, Arthur Edward Shelden 1809—1852）——英国歌剧演员。——第 186 页。

塞孔迪涅，阿基尔（Secondigné, Achille）（笔名博博 Boubeau）——法国新闻工作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是《公民报》的编辑之一。——第 220 页。

赛拉叶，奥古斯特（Serrailler, Auguste 生于 1840 年）——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楦工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比利时通讯书记（1870）和法国通讯书记（1871—1872），巴黎公社委员，马克思的战友。——第 140 页。

桑让（Songeon）——法国民主主义者，1848 年革命时巴黎工人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曾流亡伦敦；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巴黎市参议会议长。——第 88、89 页。

沙法里克，巴维尔·约瑟夫（Šafařik, Pavel Josef 1795—1861）——杰出的斯洛伐克语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奥地利斯拉夫主义纲领的拥护者。——第 273、275 页。

沙曼（Shyman）——伦敦的英国牙科医生。——第 98 页。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 85、171 页。

舍布鲁克——见娄，罗伯特。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Cherbuliez, Antoine-Élisée 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信徒，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成分结合在一起。——第 192 页。

舍勒尔，丽娜（Schöler, Lina）——德国女教师，马克思一家的朋友。——第 186、187、189 页。

舍维奇，谢尔盖（Schewitsch, Sergej）——美国社会主义者，原系俄国人；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参加《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第 394 页。

圣金（ST·King）——伦敦书商。——第 108 页。

施拉姆，卡尔·奥古斯特（Schramm, Karl August）——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编辑之一；曾抨击马克思主义，八十年代脱党。——第 32、33、258、328 页。

施米特，弗·（Schmidt, F.）——在苏黎世

的德国警察密探。—— 第 295、404、430 页。

施奈德尔，卡特琳·让娜·奥当斯（Schneider, Catherine-Jeanne-Hortense 1838—1920）—— 法国女演员和歌唱家。—— 第 322 页。

施奈特，卡尔（Schneidt, Karl）—— 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参加汉堡社会民主党各种报纸的出版工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侨居伦敦，追随无政府主义者；是《自由》周报的编辑之一。—— 第 197、296、336 页。

* 施帕尔，倍尔托特（Sparr, Berthold）——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法学家；1881 年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驱逐出柏林，1882 年流亡伦敦，追随拥护莫斯特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 第 295、296 页。

施特克尔，阿道夫（Stoecker, Adolf 1835—1909）—— 德国教士和反动政治活动家，基督教社会党的创建人（1878）和首领，接近保守党的极右派，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和反犹太主义的鼓吹者；1881 年起是帝国国会议员。—— 第 162、428 页。

施特鲁斯堡，贝特耳（Strousberg, Bethel Henry 1823—1884）—— 大铁路承包人，德国人，住在英国。—— 第 112 页。

施梯伯，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 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0—1860），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 第 153、376 页。

施维茨格贝耳，阿德马尔（Schwitzguébel, Adhémar 1844—1895）—— 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第一国际会员，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汝拉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1873 年被开除出国际。—— 第 208 页。

施因德汉斯—— 见毕克列尔，约翰。

舒马赫，格奥尔格（Schumacher, Georg 生于 1844 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制革工人，后为商人，1884 年起是帝国国会议员，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1898 年帝国国会选举时转向自由党人方面，因此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 第 446 页。

斯宾斯，托马斯（Spence, Thomas 1750—1814）——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和建立农业社会主义。—— 第 290 页。

斯蒂贝林，乔治（Stiebeling, George）—— 美国统计学家和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原系德国人，第一国际美国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后来因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国际，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写有许多经济方面的著作。—— 第 395 页。

斯蒂凡（Stephann）——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阿尔及尔的医生，1882 年 2 月下旬至 4 月底曾给马克思治病；原系德国人。—— 第 42、43、46、47、50—52、54—56、58、60、61、63、66、282—284、286、289、292、294、299、301、303、307、321 页。

斯蒂凡（Stephann）—— 前者的父亲。—— 第 55 页。

斯卡尔金（叶列涅夫，费多尔·巴甫洛维奇的笔名）（Еленев, Федор Павлович (Скалдин) 1828—1902）—— 俄国作家和政论家，六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表，闻名的《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

一书的作者。—— 第 8 页。

斯柯别列夫，米哈伊尔·德米特利也维奇（Скобеле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843—1882）—— 俄国将军，著名的军事活动家，参加过讨伐中亚（1873、1875—1876、1880—1881）和俄土战争（1877—1878）。—— 第 52、277 页。

斯坦斯菲尔德，詹姆斯（Stansfeld, James1820—1898）—— 英国国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1859 年起为议会议员，担任过许多重要的国家职务；马志尼的朋友。—— 第 173 页。

斯旺，约瑟夫·威尔逊（Swan, Joseph Wilson 1828—1914）—— 英国物理学家，电灯的发明者之一。—— 第 117，121 页。

* 斯温顿，约翰（Swinton, John 1830—1901）—— 美国新闻工作者，苏格兰人；为纽约许多大报，包括《太阳报》的编辑（1875—1883）；《斯温顿氏新闻》周刊的创办人和编辑（1887 年前）。—— 第 167、184、191 页。

司各脱，瓦尔特（Scott, Walter 1771—1832）—— 杰出的英国作家，西欧文学中历史小说的开创者，苏格兰人。—— 第 274 页。

苏利埃，美尔基奥·弗雷德里克（Soulié, Frédéric 1800—1847）—— 法国作家和剧作家，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共和主义者，反对王朝复辟，1830 年七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第 436 页。

索福克勒斯（Sophokles 约公元前 497—406）—— 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者。—— 第 291 页。

索拉里，让（Solari, Jean）—— 瑞士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先驱者》杂志的编辑。—— 第 409 页。

T

塔波尔，马丁（Tupper, Martin 1810—1889）—— 英国诗人，写有许多空洞教诲的诗。—— 第 187 页。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 55—120）—— 罗马最大的历史学家。—— 第 112、113、120 页。

泰勒，艾伦（Taylor, Ellen M.）—— 第 362 页。

泰勒，海伦娜（Taylor, Helen 1831—1907）—— 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女社会政治活动家；参加过争取妇女政治权利的运动；1880—1885 年曾维护争取爱尔兰自治的要求，1881 年参与建立民主联盟；海德门的拥护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养女。—— 第 362 页。

唐金（Donkin）—— 英国医生，1881—1883 年曾给马克思及其一家治病。—— 第 10、13、20、24、43、47、60、171、182、188、189、198、200、209、233、236、237、252、280、281、283、299、367、373、396、397、453、456、459 页。

唐纳，亨利（Tanner, Henry S. 约生于 1830 年）—— 美国医生。—— 第 24 页。

特里，艾伦·艾丽斯（Terry, Ellen Alice 1847—1928）—— 英国女话剧演员，莎士比亚剧作的角色的著名扮演者。—— 第 5 页。

忒伦底乌斯（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阿费尔）（Publius Terentiue Afer 公元前 185 左右—159）—— 著名的罗马喜剧作家。—— 第 222 页。

梯索，维克多（Tissot, Victor 1845—1917）—— 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和新闻工

作者；1874年前住在瑞士，后在法国；1868年起是瑞士报纸《洛桑日报。瑞士报纸》的撰稿人，普法战争期间是该报的编辑，1891—1893年是《费加罗报》的编辑之一；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激烈地攻击德国。——第12页。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务大臣（1832、1834），首相（1836、1840），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共和国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140页。

梯叶里，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Thierry, Jacques-Nicolas-Augustin 1795—1856）——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接近于了解物质因素和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的历史中的作用。——第131页。

W

瓦尔德霍恩（Waldhorn）——第172页。

瓦尔特（Walter）——德国工人。——第351、352页。

瓦盖纳，海尔曼（Wagener, Hermann 1815—1889）——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新普鲁士报》编辑（1848—1854），普鲁士保守党的创始人之一，俾斯麦政府的枢密顾问（1866—1873）；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第119页。

瓦累斯，茹尔（Vallès, Jules 1832—1885）——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共和主义者，积极反对第二帝国的政治制度，为此，曾多次被判徒刑；第一国际会员和巴黎公社委员，教育委员会和对外联系委员会委员，《人民呼声报》编辑（1871），同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接近，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3年10月起为法国《人民呼声报》编辑。——第206页。

微耳和，鲁道夫（Virchow, Rudolf 1821—1902）——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细胞病理学的奠基人，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进步党的创始人和首领之一；1871年以后成为反动分子，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第89、215页。

威尔逊，查理·里弗斯（Wilson, Charles Rivers 1831—1916）——英国国家官员和殖民官员；1874—1894是英国国家债务管理局局长；1878—1879年是埃及民族政府的财务大臣。——第100、101、107、111页。

威廉一世（Wilhelm Ⅰ 1743—1821）——黑森—加塞尔的选帝侯（1803—1807年、1813年11月—1821年）。——第65页。

威廉一世（Wilhelm Ⅰ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第29、33、51、52、65、168、426、437页。

威廉二世（Wilhelm Ⅱ 1859—1941）——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1888—1918）。——第277页。

威廉森（Williamson）——詹姆斯·威廉森的妻子。——第421页。

威廉森，詹姆斯（Williamson, James M.）——文特诺尔的英国医生，1882年11月—1883年1月初曾给马克思治病。——第102、103、107、118、126、396、397、406、419、421页。

威廉斯(Williams)——伦敦书商。——第195页。
威沙特(彼得罗的),珍妮(Wishart of Pittarow, Jeanie 1746—1811)——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父亲)的母亲。——第235页。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冯(Westphalen, Edgar von 1819—约1890)——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弟弟;1846年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五十至六十年代侨居美国;八十年代初住在柏林。——第236页。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冯(W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反动分子;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第235页。
威斯特华伦,卡洛琳·冯(Westphalen, Karoline死于1856年)——马克思夫人燕妮的母亲。——第235页。
威斯特华伦,克利斯提安·亨利希·菲力浦·冯(Westphalen, Christian Heinrich Philipp von 1724—1792)——不伦瑞克公爵的秘书和朋友,七年战争的参加者,写有许多有关七年战争史的著作,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祖父。——第234、235页。
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Westphalen, Ludwig von 1770—1842)——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父亲,特利尔的枢密顾问。——第234页。
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147页。
维凡蒂,安娜(Vivanti, Anna)——德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保尔·林达乌的姐妹,马克思家的熟人。——第243页。
维津,杰恩·伊丽莎白(Vezin, Jane Elisabeth 1827—1902)——英国女演员,莎士比亚剧作角色的扮演者;马克思家的熟人。——第31页。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1850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329、358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杰出的罗马诗人。——第52页。
魏勒尔,亚当(Weiler, Adam)——德国流亡者,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英国改良派;后来成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第17页。
魏特林,威廉(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职业是裁缝。——第220页。
文特霍尔斯特,路德维希(Windthorst, Ludwig 1812—1891)——德国反动政治活动家;分立主义者;汉诺威的司法大臣(1851—1852、1862—1865),帝国国会议员和中央党的首领之一。——第258页。
沃尔弗(Wolff)——德国商人,斐迪南·沃尔弗的兄弟。——第134页。
沃尔弗,斐迪南(红色沃尔弗)(Wolff, Ferdinand 1812—1895)——德国政论家,

1846—1847年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国外；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后来脱离政治活动。——第134页。

沃尔斯利，加尼特·约瑟夫（Wolseley, Garnet Joseph 1833—1913）——英国将军，1882年指挥在埃及的英国军队。——第85、86、89、93页。

沃戈里德斯（博戈里迪），亚历山大（Vogorides, Alexandros 1823左右—1910）（以阿列科—帕沙这个名字闻名）——土耳其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原系保加利亚人，1856—1861年任驻伦敦大使馆参赞，驻维也纳大使（1876—1878），东鲁美利亚总督（1879—1884）。——第104页。

沃伦，约瑟夫（Warren, Joseph 1741—1775）——美国政治活动家，十八世纪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之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775年死于邦克斯山战役中。——第167页。

X

希尔迪奇，理查（Hilditch, Richard）——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192页。

希尔施，卡尔（Hirsch, Carl 1841—190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好几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第8、10、12、14、15、19、77、84、171、180、187、198、199、205、248、289、291、300、324、337、338、339、344、345、358、390、416页。

希尔施，麦克斯（Hirsch, Max 1832—1905）——德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进步党的著名活动家，1868年同弗·敦克尔一起创建了改良主义工会（人称希尔施—敦克尔工会）；1869—1893年期间为国会议员。——第17、18、201、203页。

希尔施，摩里茨（Hirsch, Moritz 1831—1896）——奥地利银行家，资产阶级慈善事业家，1869年获得了在土耳其建筑铁路的租让合同。——第305、306页。

* 希普顿，乔治（Shipton, George）——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彩画匠工联书记；《劳动旗帜报》编辑（1881—1885）；1871—1896年为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第18、118、121、200—203、214、217、267、389、393页。

西门子，卡尔·威廉（Siemens, Carl Wilhelm 1823—1883）——德国工程师，电气技师，企业主；1859年起曾居住在伦敦，在那里领导德国西门子电气公司伦敦分公司，1882年是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主席和其它一些科学协会委员；写有热和电方面的许多著作。——第86、87、114、183页。

西蒙，约翰（Simon, John 1816—1904）——英国医生，枢密院的卫生视察员。——第215页。

夏米索，阿德尔贝特·冯（Chamisso, Adelbert von 1781—1838）——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反对封建的反动势力。——第433、434页。

肖莱马，卡尔（Schorlemmer, Carl 1834—1892）——德国大有机化学家，曼彻斯特的教授，辩证唯物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5、6、29、30、43、50、73、80、

82、84、86、97、126、129、232、249、304、347、348、350、367、374、412、413、430、437—442、459、463页。

肖利迈(Jollymeyer)——见肖莱马。

谢夫莱,阿尔伯特·艾伯哈特·弗里德里希(Schäffle, Albert Eberhard Friedrich 1831—1903)——德国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宣传放弃阶级斗争并鼓吹资产者和无产者进行合作。——第144、162、163、221页。

辛格尔,保尔(Singer, Paul 1844—1911)——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87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90年起为执行委员会主席;1884年起为帝国国会议员,1885年起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第316、317、427页。

休谟(Hume)——伦敦的英国医生。——第299页。

Y

雅克拉尔,沙尔·维克多(Jaclard, Charles-Victor 1843—1903)——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政论家,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社的积极活动家;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俄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继续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第15、16页。

亚当,茹利埃特(Adam, Juliette 1836—1936)(父姓郎贝 Lambert)——法国女作家和政论家,《新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和领导人(1879—1886)。——第289、291页。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Ⅱ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第29、170、335页。

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Ⅲ 1845—1894)——俄国皇帝(1881—1894)。——第29、30、168、278页。

燕妮——见龙格,燕妮。

杨格——见维津,杰恩·伊丽莎白。

扬松,尤利·埃杜阿尔多维奇(Янсон, Юлий Эдуардович 1835—1893)——俄国进步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曾任彼得堡市政委员会统计处处长(1881年起);写有许多统计学理论和统计学史方面的著作。——第152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Ⅱ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第272页。

伊壁鸠鲁(Epikouros 约公元前341—270)——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第460页。

伊格纳切夫,尼古拉·巴甫洛维奇(Игнатьев, 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1832—1908)——伯爵,俄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1864—1877年为驻土耳其大使,在签订圣斯蒂凡诺和约(1878)时为俄国全权代表;1881—1882年为国家产业大臣,后为内务大臣。——第30、99、263页。

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Ⅱ 1443—1513)——罗马教皇(1503—1513)。——第406页。

尤塔,约翰·卡尔(Juta, Johan Carel 生于1824年)——荷兰商人,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的丈夫。——第153页。

雨盖,克洛维斯(Hugues, Clovis 1851—1907)——法国诗人、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追随激进派;巴黎公社的拥护者;1881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第413页。

约纳斯，亚历山大（Jonas, Alexander 死于1912年）——美国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原系德国人；1878年起为《纽约人民报》主编。——第133页。

Z

扎克斯，艾米尔（Sax, Emil 1845—1927）——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354页。

扎林格（Saling, A.）——供银行家和资本家使用的《交易所年鉴》的德国出版者。——第388页。

扎纳德利，蒂托（Zanardelli, Tito 生于1848年）——法国社会主义者，意大利人，普法战争（1870—1871）的参加者；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初住在法国，第一国际会员，曾给《平等报》撰稿，1882年底被驱逐出法国。——第374页。

泽特贝尔，格奥尔格·阿道夫（Soetbeer, Georg Adolf 1814—1892）——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第312页。

张伯伦，约瑟夫（Chamberlain, Joseph 1836—1914）——英国国家活动家，1873—1875年任北明翰市市长，以后在很多年里是英国内阁成员，英布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英帝国主义思想家。——第28页。

左尔格，阿道夫（Sorge, Adolph 1855左右—1907）——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儿子，职业是机械工程师，1895年以前一直住在美国；1895—1898年为巴库油田的工程师，后来去德国。——第32、190、238、239、296、328、393、395页。

*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Sorge, Friedrich Adolf 1828—1906）——国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侨居美国，第一国际的积极会员之一，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联合会委员会书记，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纽约总委员会总书记（1872—1874），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32、133、185、190、191、238—241、296、297、326—328、346、393—395、454、458页。

左尔格，卡塔琳娜（Sorge, Katharina）——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妻子。——第32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埃林杜尔——缪尔纳戏剧《罪》中的人物之一。——第431页。

埃斯库拉普——希腊神话中的医神。——第171、321页。

安东——基督教圣徒，相传他是努比亚沙漠的一个隐修士。——第35页。

奥巴德亚——古犹太传说中的先知。——第28页。

B

柏克司尼弗——查理·狄更斯的小说《马丁·切斯维特的一生》中的人物，是个

伪君子，假好人。—— 第 174 页。

D

道勃雷—— 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人物。—— 第 171、172 页。

F

福图娜—— 古罗马神话中的幸运女神。—— 第 59 页。

G

龚佩利诺（克里斯托福罗·迪·龚佩利诺）—— 侯爵，海涅的作品《旅行札记》中的人物。—— 第 424 页。

H

海伦——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她引起了特洛伊的十年战争。—— 第 363 页。

J

基督（耶稣基督）—— 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 第 295 页。

L

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 强盗，德国作家克·奥·符尔皮乌斯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第 274 页。

罗兰—— 法国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博雅多的叙事诗《恋爱中的罗兰》、阿里欧斯托的叙事诗《疯狂的罗兰》和许多其他著作中的人物。—— 第 168 页。

M

马利亚—— 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亲。—— 第 311 页。

摩洛赫—— 古腓尼基和迦太基宗教中的太阳神，祭祀摩洛赫时用活人作祭品：后来，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和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 第 52 页。

P

匹克威克—— 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要人物。—— 第 425 页。

R

茹尔登—— 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的主要人物。—— 第 241 页。

T

唐达鲁士—— 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王，因侮弄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身立水中，头上悬挂着果子，每当他想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的时候，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见。—— 第 460 页。

唐·吉诃德—— 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第 41 页。

Y

伊西达—— 古埃及最受尊敬的女神之一；后来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对伊西达的迷信传播到整个地中海，她是基督教圣母的形象之一。—— 第 311 页。

约翰牛—— 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代名词；1712 年启蒙作家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问世后，这个名词就流传开了。—— 第 28、180、187、309、334 页。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答布伦坦诺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97—101页)。

—An die Redaktion des《Volks-staat».

载于1872年6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44号。——第153页。

《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18—127页)。

—An die Redaktion des《Volks-staat».

载于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第153页。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页)。

载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24号。——第224、369页。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89页)。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London, 1871. ——第139页。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59—263页)。

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巴黎版。——第360页。

数学手稿,一部分载于1933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期。——第21页。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页)。

—1848 bis 1850.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2、3期和第5—6期。——第258—259页。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

---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Bruxelles, 1847.——第184、192页。

《致〈东邮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14—515页)。

—To the editor of《The Eastern Post》. 载于1871年12月23日《东邮报》第169期。——第139页。

《致〈东邮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23页)。

—To the editor of《The Eastern Post》. 载于1872年1月20日《东邮报》第173期。——第139页。

《致〈东邮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24—525页)。

—To the editor of《The Eastern Post》. 载于1782年1月28日《东邮报》第174期。——第140页。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1867.——第76、83、144、163、194—196、215、240、253、258、278、279、312、340、394页。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Zweite verbesserte Auflage. Hamburg, 1872.——第134、290、421页。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Dritte vermehrte Auflage. Hamburg, 1883.——第135、235、238、239、290、376、388、393、421、428页。

—Le Capital. Traduction de M. J. Roy, entièrement revisée par l'auteur. Paris, [1872—1875].——第89、97、142、160页。

—Капитал.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Том второй. Книга II: Процесс обращения капитала.——第235、238、463页。

—Капитал.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Том третий. Книга III: Процесс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зятый в целом.——第238、463页。

弗·恩格斯

《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

—Bismarck and the German Working Men's Party. 载于1881年7月23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2号。——第196、267页。

《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91—200页)。

—Le socialisme de M. Bismarck. 载于1880年3月3日和24日《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7号和第10号。——第224页。

《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15—318页)。

—Social classes—necessary and superfluous.

载于1881年8月6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4号。——第196、267页。

《布雷的牧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0—344页）。

—Der Vikar von Bray.

载于1882年9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第345、357、360页。

《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7—336页）。

—Bruno Bauer und das Urchristentum.

载于1882年5月4日和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号和第20号。——第307、311、331页。

《对法国的通商条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87—291页）。

—The French commercial treaty. 载于1881年6月18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7号。——第196、267页。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352页）。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Leipzig, 1878. ——第144、356、365、394页。

《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99—303页）。

—The wages theory of the anti-corn law league.

载于1881年7月9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0号。——第196、267页。

《工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80—286页）。

—Trades Unions.

载于1881年5月28日和6月4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4号和第5号。——第196、267页。

《工人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4—307页）。

—A working men's party.

载于1881年7月23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2号。——第196、267页。

《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77—279页）。

—The wages system.

载于1881年5月21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3号。——第196、267页。

《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74—379页）。

—Das Begräbnis von Karl Marx. 载于1883年3月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号。——第463页。

《两个模范地方议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92—295页）。

—Two model town councils.

载于1881年6月25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8号。——第196、267页。

《论美国资本的积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37—339页）。

—Mit welcher fabelhaften Geschwindigkeit die Konzentration des Kapital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vor sich geht··.载于1882年5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第307页。

《马尔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页）。

—Die Mark.
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121、122、124、126、127、360、365、404、412、416、426、451页。

《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72—373页）。
—Discours de Frédéric Engels.
载于1883年3月20日《正义报》。——第463页。

《美国的食品和土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96—298页）。
—American food and the land question.
载于1881年7月2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9号。——第196、267页。

《棉花和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11—314页）。
—Cotton and iron.
载于1881年7月30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3号。——第196、267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1—247页）。
—Le Socialisme utopique et le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载于1880年3月20日和4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第3号和第4号。——第343页。
—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Traduction française par Paul Lafargue. Paris, 1880.——第363、365、382、394页。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Hottingen-Zürich, 1882（1883年问世）.——第343、355、360、363、365、372、382、387、394、399、404、426、451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5—347页）。
—Vorwort.
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霍廷根—苏黎世版。——第360、363、387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第259、340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96—625页）。
—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第146页。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52—657页）。
—Dialektik der Natur.——第121、377、379、398页。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73—276页）。
—A fair day's wages for a fair day's work.
载于1881年5月7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号。——第196、267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 —— 第133、134、191、192、258—259、326、340页。

—Манифес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Женева, 1882. —— 第252、341页。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5—326页)。—— 第305页。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о второму русскому изданию «Манифест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载于1882年2月5日彼得堡《民意》杂志第8—9期。—— 第134、252、295、340页。

载于1882年4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号。—— 第295页。

《〈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105页)。

—Vorwort:

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附有作者序言的新版》,1872年莱比锡版。—— 第133、134页。

《国际述评(三)。从5月到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2—540页)。

—Revue Mai bis Oktober.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 第258—259页。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72—190页和第34卷)。—— 第328页。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65—515页)。

—L'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et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apport et documents publiés par ordre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Londres—Hambourg, 1873. —— 第106、208页。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55页)。

—Les prétendues scissions dans l'Internationale. Circulaire privé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Genève, 1872. —— 第208页。

《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5—267页)。

—Do meetingu w Genewie, zwotanego na pamiątkę 50-ej rocznicy Rewolucyi Polskiej 1830 r.

载于日内瓦《平等》杂志编辑的《纪念十一月起义五十周年国际大会的报告文集》,1881年日内瓦版。—— 第265页。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埃卡尔特，尤·]《柏林和圣彼得堡。俄德关系史普鲁士文集》1880年莱比锡版（[Eckardt, J.] Berlin und St. Petersburg. Preussische Beiträgezur Geschichte der Ruesisch-Deutschen Beziehungen. Leipzig, 1880）。——第263页。

埃卡留斯，约·]《一个德国人对英国工联主义的看法》（[Eccarius, J.] A German opinion of English tradeunionism），载于1881年8月6日《劳动旗帜报》第14号。——第17、18、201、203页。

艾莫斯，谢·《〈对埃及人的掠夺〉：修订本》（Amos, Sh.《Spoiling the Egyptians》: revised version），载于1882年10月《现代评论》第42卷。——第111页。

奥艾尔，伊·（Auer, I.）1881年3月30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第1卷，1881年3月30日第二十五次会议。1881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IV. Session 1881. Band I. 25. Sitzung am 30. März 1881. Berlin, 1881）。——第175、176页。

奥[尔登堡]，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O[ldenburg], H. Die Grundlage des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载于1880年苏黎世—奥伯施特腊斯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第1年卷下半册。——第101、104页。

奥康奈尔《关于爱尔兰问题致女王的备忘录》（O'Connell. Memoir on Irelandaddressed to the Queen）。——第158页。

B

巴霍芬，约·雅·《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年斯图加特版（Bachofen, J. J. Das Mutterrech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Gynaiko-kratie der alten Welt nach ihrerreligiösen und rechtlichen Natur. - Stuttgart, 1861）。——第450页。

巴克斯，厄·贝·《现代思想的领袖。第二十三——卡尔·马克思》（Bax, E. B. Leaders of Modern Thought. XXIII.—Karl Marx），载于1881年12月1日《现代思想》杂志第3卷第12期。——第240、242、253页。

巴赞，古·《致警官先生》（Bazin,

---

*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G. A Monsieur le commissaire de police），载于1882年11月30日《平等报》第4种专刊第38号。——第116页。

白拉克，威·《"打倒社会民主党人！"》1876年不伦瑞克版（Bracke, W.《Nieder mit den Sozialdemokraten!》. Braunschweig, 1876）。——第341页。

白拉克，威·《拉萨尔的建议。谈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1873年不伦瑞克版（Bracke, W. Der Lassalle'sche Vorschlag. Ein Wort an den 4. Congreß der soc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Braunschweig, 1873）。——第341页。

班克罗夫特，休·豪·《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1875年伦敦版第1卷（Bancroft, H. H. The Native races of the Pacific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Volume I. London, 1875）。——第120、432页。

《保加利亚民歌》，未出版过的保加利民歌，塞尔维亚诗歌译者奥古斯特·多宗翻译出版，1875年巴黎版（Български народни пъсни. Chansons populaires bulgares inédites. Publiées et traduites par Auguste Dozon, traducteur des poésies serbes. Paris, 1875）。——第275页。

倍[倍尔，奥·]《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B[ebel, A.] Aufhebung des Sozialistengesetzes?），载于1882年10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第386页。

倍倍尔，奥·《工人运动的目的》，阿·赫普纳按1877年第6版鉴审校订出版，1883年纽约版（Bebel, A. Die Ziele der Arbeiterbewegung. Nach der sechsten Auflage vom Jahre 1877 kritisch revidirt und herausgegeben von Ad. Hepner. New York, 1883）。——第452页。

倍倍尔，奥·《我们的目的》1870年莱比锡版（Bebel, A. Unsere Ziele, Leipzig, 1870）。——第452页。

倍倍尔，奥·（Bebel, A.）1881年3月31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第1卷，1881年3月31日第二十六次会议。1881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Ⅳ. Session 1881. Band Ⅰ. 26. Sitzung am 31. März 1881. Berlin, 1881）。——第175、176、178页。

倍倍尔，奥·（Bebel, A.）1881年4月4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第1卷，1881年4月4日第二十九次会议。1881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Ⅳ. Session 1881. Band Ⅰ. 29. Sitzung am 4. April 1881. Berlin, 1881）。——第175、176、178、426页。

毕尔克利，卡·《银行的民主改革。或：人民如何得到低息金？关于州银行改组的六个问答》1881年苏黎世版（Bürkli, K. Demokratische Bank-Reform, Oder: Wie kommt das Volk zu billigerem Zins? Sieben Fragen und Ant-

worten über die Reorganisation der Kantonalbank. Zürich, 1881)。—— 第278、279页。

俾斯麦，奥·（Bismarck, O.）1882年1月9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1882年第五届第一次例会》第1卷，1882年1月9日第二十次会议。1882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V. Legislaturperiode. I. Session 1881/82. [Band I]. 20. Sitzung am 9. Januar 1882. Berlin, 1882）。—— 第36页。

波多林斯基，谢·《人的劳动和力的单位》（Podolinsky, S. Menschliche Arbeit und Einheit der Kraft），载于1883年《新时代》杂志第1年卷。—— 第127页。

波多林斯基，谢·《社会主义和体力的单位》（Podolinski, S. Il socialismo e l'unità delle forze fisiche），载于《人民》杂志第14年卷新丛刊第3—4期，1881年米兰版。—— 第127页。

[波托茨基，伊·、柯伦泰，胡·、德莫霍夫斯基，弗·克·]《一七九一年五月三日波兰宪法的产生和消灭》1793年莱比锡版第1—2册（[Potocki, I., Kollontaj, H., Dmochowski, F. K.] Vom Entstehen und Untergange der Polnischen Konstitution vom 3ten May 1791, Th. I—II [Leipzig], 1793）。—— 第116页。

[伯恩施坦，爱·]《爱尔兰局势》（[Bernstein, E.] Die Situation in Irland），署名利奥，载于1882年5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 第344页。

[伯恩施坦，爱·]《"非此即彼！"》（[Bernstein, E.]《Entweder—oder!》），署名利奥，载于1881年12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1号。—— 第248、270页。

[伯恩施坦，爱·]《纪念日》（[Bernstein, E.] Ein Gedenktag），署名利奥，载于1881年1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号。—— 第147页。

[伯恩施坦，爱·]《请摊牌吧！》（[Bernstein, E.] Bekennt Farbe!），署名利奥，载于1882年4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号。—— 第305页。

[伯恩施坦，爱·]《我们缺少知识分子》（[Bernstein, E.] Es fehlt uns an Intelligenzen），署名利奥，载于1881年7月28日、8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33号。—— 第205、211页。

[布伦坦诺，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Brentano, L.] Wie Karl Marx sich vertheidigt），载于1872年7月4日《协和》杂志第27期。—— 第153页。

[布伦坦诺，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Brentano, L.] Wie Karl Marx citirt），载于1872年3月7日《协和》杂志第10期。—— 第153页。

C

采什科夫斯基，奥·《历史学绪论》1838年柏林版（Cieszkowski, A. Prolegomena zur Historiosophie. Berlin, 1838）。—— 第34页。

采什科夫斯基，奥·《论信贷和流通》1839年巴黎版（Cieszkowski, A. Du crédit et de la circulation. Paris, 1839）。—— 第

32、258 页。

D

达尔文，查·《关于在蚯蚓活动下腐植土的形成，以及对蚯蚓习性的观察》1881 年伦敦版（Darwin, Ch. The formation of vegetable mould, through the action of worms,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ir habits. London, 1881）。——第 66 页。

丹尼尔逊，尼·弗·[《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况》（[Даниельсон, Н. Ф.] Очерки нашего пореформе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署名尼古拉—逊，载于 1880 年 10 月《言语》杂志第 3 年卷，圣彼得堡版。——第 149—150、152 页。

《德文本日耳曼古代史史学家》第 1 卷上册原始时代，1847 年柏林版（Die Geschichtschreiber der deutschen Vorzeit in deutscher Bearbeitung. Erster Band, erste Hälfte. Die Urzeit. Berlin, 1847）。——第 112 页。

杜林，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 年柏林第 2 版（部分修订）（Dühring, E.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 Zweite, theilweise umgearbeitete Auflage. Berlin, 1875）。——第 429 页。

F

菲茨吉本，杰·《一八六八年的爱尔兰——英国党派斗争的战场；它不满的真实的和虚构的原因；无益的或有害的补救办法》1868 年伦敦版（Fitzgibbon, G. Ireland in 1868, the battle-field for English party strife; its grievances, real and factitious; remedies, abortive or mischievous. London, 1868）。——第 158 页。

福尔马尔，格·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略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1882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Vollmar, G. H.] Aufhebung des Sozialistengesetzes? Ein Wort zur Takt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Hottingen-Zürich, 1882）。出版时署名苏尔土尔。——第 381 页。

福尔马尔，格·亨·[《废除非常法吗？》（[Vollmar, G. H.] Aufhebung des Ausnahmegesetzes?），载于 1882 年 8 月 17、24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4、35 号。——第 356、361、365、370、378、379、386 页。

福尔马尔，格·亨·[《论法国工人党的分裂》（[Vollmar, G. H.] Zur Spaltung der französischen Arbeiterpartei），载于 1882 年 11 月 9、16、30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6、47、49 号。——第 104、109、400、413 页。

弗里曼，爱·奥·《欧洲史》1875 年伦敦版（Freeman, Ed. A. History of Europe. London, 1875）。——第 418 页。

G

盖得，茹·《归队》（Guesde, J. Rentrée en ligne），载于 1883 年 2 月 16 日《平等报》第 5 种专刊第 1 号。——第 436 页。

格里伦贝格尔，卡·（Grillenberger, K.）1882 年 12 月 14 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

1882—1883年第五届第二次例会》第1卷，1882年12月14日第二十八次会议。1883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Ⅴ. Legislaturperiode, Ⅱ. Session 1882/83. Band Ⅰ. 28. Sitzung am 14. Dezember 1882. Berlin, 1883）。——第452页。

H

哈特曼，格·威·（Hartmann, G. W.）1881年6月15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第2卷，1881年6月15日第六十一次会议。1881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Ⅳ. Session 1881. Band Ⅱ. 61. Sitzung am 15. Juni 1881. Berlin, 1881）。——第212页。

海德门，亨·迈·《大家的英国》1881年伦敦版（Hyndman, H. M. England for all. London, 1881）。——第194—196、239—240页。

汉森，格·《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农奴制的消灭和一般说来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改变》1861年圣彼得堡版（Hanssen, G. Die Aufhebung der Leibeigenschaft und die Umgestaltung der gutsherrlich-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 überhaupt in den Herzogthümern Schleswig und Holstein. St. Petersburg, 1861）。——第125页。

赫普纳，阿·《我同莱比锡警察三年半的斗争》1874年不伦瑞克版（Hepner, A. Meine 3½-jährige Leipziger Polizeicampagne. Braunschweig, 1874）。——第257、315页。

赫希柏格，卡·、伯恩施坦，爱·、施拉姆，卡·奥·]《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批判的箴言》（[Höchberg, K., Bernstein, E. und Schramm, C. A.] Rückblick auf die sozialistische Bewegung in Deutschland. Kritische Aphorismen），载于1879年在苏黎世—奥伯施特腊施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第1年卷上半册。——第328、329、338、445页。

黑格尔，乔·威·弗·《黑格尔全集。作者生前友人菲·马尔海奈凯、约·舒尔兹、爱·甘斯、列·冯·恒宁格、亨·霍多、卡·米希勒、弗·费尔斯特出版的全集版》第1—18卷（Hegel, G. W. F. Werke. Vollständige Ausgabe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Ph. Marheineke, J. Schulze, Ed. Gans, Lp. v. Henning, H. Hotho, C. Michelet, F. Förster. Bd. Ⅰ－XVIII）。

第2卷《精神现象学》1841年柏林第2版（未修订）（Band Ⅱ.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Zweite unveränderte Auflage. Berlin, 1841）。——第28、73页。

第3卷《逻辑学》，第1册《客观逻辑》，第1分册《存在论》1841年柏林第2版（未修订）（Band Ⅲ. Wissenschaft der Logik. Erster Theil. Die objective Logik. Erste Abtheilung. Die Lehre vom Seyn. Zweite unveränderte Au-

flage Berlin, 1841)。——第22页。

第8卷《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1840年柏林第2版（Band Ⅶ. Ⅰ. Grundlinien der Philoso- 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Grundrisse Zweite Auflage Berlin, 1840）。——第383页。

第9卷《历史哲学讲演录》1840年柏林第2版（Band Ⅸ. Vorlesungen i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 schichte Zweite Auflage Berlin, 1840）。——第383页。

J

基佩尔特，亨·《波希米亚、莫拉维亚和奥地利地图》1866年柏林版（Kiepert, H. Karte von Böhmen, Maehren und Oesterreich. Berlin, 1866）。——第276页。

杰维尔，加·《创刊五年》（Deville, G. Il y a cinq ans），载于1882年11月19日《平等报》第4种专刊第27号。——第400页。

杰维尔，加·《劳动》（Deville, G. Letravail），载于1882年12月19、20日《平等报》第4种专刊第57、58号。——第131页。

金德林格，尼·《德国农奴依附关系的，尤其是所谓农奴制的历史》1819年柏林版（Kindlinger, N. Geschichte derDeutschen Hörigkeit insbesondereder sogenannten Leibeigenschaft. Berlin, 1819）。——第124页。

K

卡菲埃罗，卡·《论战》（Cafiero, C. Polemica），载于1882年11月5日《人民报》第17号。——第118页。

凯，约·西·《〈对埃及人的掠夺〉。答辩》（Keay, J. S.《Spoiling the Egyp- tians》. A rejoinder），载于1882年11月《现代评论》第42卷。——第111页。

凯，约·西·《对埃及人的掠夺：一个可耻的故事。根据蓝皮书叙述》1882年伦敦增订第2版（Keay, J. S. Spoilingthe Egyptians: A Tale of shame Told from the Blue Books. Second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London, 1882）。——第111页。

凯迪伊克，阿·《卡尔·马克思传》1879年哈勒姆版（Kerdijk, A. Karl Marx. Haarlem, 1879）。《当代伟人传》（Mannen van beteekenis in onze dagen）丛书第10册。——第153页。

凯撒，凯·尤·《高卢战记》（Caesar, C. J. 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第112、113页。

凯泽尔，麦·（kayser, M.）1879年5月17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9年第四届第二次例会》第2卷，1879年5月17日第四十七次会议。1879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iber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Ⅱ. Session 1879. Band Ⅱ. 47. Sitzung am 17. Mai 1879. Berlin, 1879）。——第229页。

康德拉里，罗·《工资》（Candelari, R. Ⅱ salario），载于1882年11月5日《人民报》第17号。——第118页。

康德拉里，罗·《卡尔·马克思》（Cande-

lari, R. Carlo Marx），载于 1882 年 10 月 22 日《人民报》第 15 号。—— 第 118 页。

康德拉里，罗·《拉弗勒和洛贝尔图斯》（Candelari, R. De Laveleye e Rodbertus），载于 1882 年 10 月 15 日《人民报》第 14 号。—— 第 118 页。

康德拉里，罗·《马克思的价值理论》（Candelari, R. La teoria del valore secondo Marx），载于 1882 年 10 月 29 日《人民报》第 16 号。—— 第 118 页。

康德拉里，罗·《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批判》（Candelari, R. La critica dell'economia radicale moderna），载于 1882 年 10 月 8 日《人民报》第 13 号。—— 第 118 页。

康德拉里，罗·《再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Candelari, R. Ancora sulla teoria del valore secondo Marx），载于 1882 年 11 月 12 日《人民报》第 18 号。—— 第 118 页。

考茨基，卡·《大洋彼岸的食物竞争》，《政治经济论丛》杂志第 2 集第 4、5 册抽印本，1881 年莱比锡版（Kautsky, K. Die überseeische Lebensmittel-Konkurrenz. Separatabdruck aus den „Staatswirthschaftlichen Abhandlungen", Serie Ⅱ, Heft Ⅳ. u. Ⅴ. Leipzig, 1881）。—— 第 428、431 页。

[考茨基，卡·]《国际劳工法》（[Kautsky, K.] International labour laws），载于 1881 年 8 月 13 日《劳动旗帜报》第 15 号。—— 第 18、200、202、204、214 页。

[考茨基，卡·]《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Kautsky, K.] Der Staatssozialismus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署名辛马霍斯，载于 1881 年 3 月 6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0 号。—— 第 162 页。

考茨基，卡·《婚姻和家庭的起源》（Kautsky, C. Die Entstehung der Ehe und Familie），载于 1882 年 10 月—1883 年 3 月《宇宙》杂志第 6 年卷第 12 期。—— 第 432、446—450 页。

考茨基，卡·《美国来的表兄弟，对农民有教益的故事》（Kautsky, K. Der Vetter aus Amerika, eine Erzählung für Landleute, erbaulich zu lesen）。传单。—— 第 212、215 页。

考茨基，卡·《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1880 年维也纳版（Kautsky, K. Der Einfluss der Volksvermehrung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Gesellschaft. Wien, 1880）。—— 第 144、428 页。

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6—1857 年巴黎版第 1—3 卷（Colins L'économie politique. Source des révolutions et des utopies prétendues socialistes. Tome Ⅰ—Ⅲ. Paris 1856—1857）。第 4 卷于 1882 年出版。—— 第 192 页。

科勒，扬·《光荣的女儿》，五章节抒情史诗，1832 年佩斯全文版（Kollár, J. Sláwy dcera. Lyricko-epických básen w pěti zpěwjch. Úplné wydánj. W Pesti, 1832）。—— 第 264 页。

克尼格，阿·《论与人们交往》1804 年汉诺威版（Knigge, A. Ueber den Umgang mit Menschen. Hannover, 1804）。—— 第 67 页。

L

拉法格，保·《法国土地所有制的变动》

（Лафарг, П. Движение поземель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во Франции），载于1882年3月、4月和6月《基础》杂志第3—4期和第6期。——第148、152、300页。

拉法格，保·（Lafargue, P.）给法院侦查员爱·皮康的信，载于1882年11月18日《平等报》第4种专刊第26号。——第109页。

拉法格，保·《牧师和商人》（Lafargue, P. Prêtres et commerçants），载于1882年12月20日《平等报》第4种专刊第58号。——第131页。

拉法格，保·《我们的一个候选人》（Lafargue, P. Notre candidat），载于1882年12月9日《平等报》第4种专刊第47号。——第406、408、413页。

拉法格，保·《笑的权利》（Lafargue, P. Le droit au rire），载于1882年11月21日《平等报》第4种专刊第29号。——第411页。

拉法格，保·《中了魔的部》（Lafargue, P. Le Ministère enchanté），载于1882年11月24日《平等报》第4种专刊第32号。——第115、406、408页。

兰克，约·《人的生理学原理，供保健和医生实际需要之用》1868年莱比锡版（Ranke, J. Grundzüge der Physio- logie des Menschen mit Rücksicht auf die Gesundheitspflege und das praktische Bedürfniss des Arztes. Leipzig, 1869）。——第417页。

朗凯斯特，爱·雷·《论退化。达尔文主义中的一章》1880年伦敦版（Lankester, E. Ray. Degeneration. A chapter in darwinism. London, 1880）。——第151页。

雷德格雷夫，亚·《工厂和工场法，1878年，附有序言、大量注释和详细索引》1879年伦敦第2版（Redgrave, A. The Factory and workshop act, 1878, with introduction, copious notes, and an elaborate index. Second deition. - London, 1879）。——第143页。

雷伊，约·《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Rae, J. The Social- ism of Karl Marx and the Young Hegelians），载于1881年10月《现代评论》第40卷。——第239、253页。

李卜克内西，威·（Liebknecht, W.）1881年5月31日在帝国国会的发言，载于《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第2卷，1881年5月31日第五十三次会议。1881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Ⅳ. Session 1881. Band Ⅱ. 53. Sitzung am 31. Mai 1881. Berlin, 1881.）。——第212页。

罗斯科，亨·恩·、肖莱马，卡·《化学教程大全》1877—1882年不伦瑞克版第1—3卷（Roscoe, H. E. und Schorlem- mer, C. Ausführliches Lehrbuch der Chemie. Bände Ⅰ—Ⅲ. Braun - schweig, 1877—1882）。全书共9卷，于1901年出齐。——第442页。

洛贝尔图斯，约·卡·《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1851年柏林版（Rodbertus, J. K. So- 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 Dritter Bridf： Widerlegung der Ricardo'schen Lehre von der Grundrente und

Begründung einer neuen Rententheorie Berlin, 1851)。——第416页。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1882年]柏林版第1—2卷 (Rodbertus—Jagetzow 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ätze Herausgegeben von Dr. R. Meyer. Bände Ⅰ—Ⅱ. Berlin, [1882])。——第416、428、445页。

洛里亚，阿·《地租和地租的自然消失》1880年米兰、那不勒斯、皮萨版 (Loria, A. La rendita fondiaria e la sua elisione naturale Milano, Napoli, Pisa, 1880)。——第76页。

洛里亚，阿·《人口规律和社会制度》1882年锡耶纳版 (Loria, A. La legge di popolazione ed il sistema sociale. Sienna, 1882)。——第76页。

洛里亚，阿·《意大利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1882年博洛尼亚版 (Loria, A. La teoria del valore negli economisti italiani. Bologna, 1882)。——第76页。

M

马隆，贝·《从大致产生时起到现代为止的社会主义史》1879年罗迦诺版 (Malon, B. Histoire du socialisme depuis ses origines probables jusqu'à nos jours, Lugano, 1879)。——第222、231、400页。

马隆，贝·《从最早期起到现代为止的社会主义史》1882—1883年巴黎版第1—2卷 (Malon, B. Histoire du socialisme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ulés jusqu'à nos jours Tome Ⅰ—Ⅱ, Paris, 1882—1883)。全书共五卷，于1885年出齐。——第222、231页。

马隆，贝·《经济学家论华人问题》(Malon, B. La Question chinoise devant les économistes)，载于1880年7月5日《社会主义评论》第9期。——第397页。

马[隆]，贝·《政治经济学批判史》1876年罗迦诺版 (M[alon], B. Histoire critique de l'economie politique Lugano, 1876)。——第118页。

麦岑，奥·《一八六六年以前普鲁士国家边陲地带的土地和农业关系》1868—1871年柏林版第1—4卷 (Meitzen, A. Der Boden und die landwirth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des Preussischen Staates nach dem Gebietsumfange vor 1866. Bände Ⅰ—Ⅱ. Berlin, 1868—1871)。——第124页。

迈耶尔，鲁·《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1877年莱比锡版 (Meyer, R. Politische Gründer und die Corruption in Deutschland. Leipzig, 1877)。——第445页。

迈耶尔，鲁·《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1874—1875年柏林版第1—2卷 (Meyer, R. Der Emancipationskampf des vierten Standes. Bände Ⅰ—Ⅱ. Berlin, 1874—1875)。——第233、234页。

毛勒，格·路·《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厄兰根版第1—4卷 (Maurer, G. L. Geschichte der Städte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nde Ⅰ—Ⅳ. Erlangen, 1869—1871)。——第121、122、412、451页。

毛勒，格·路·《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厄兰根版第

1—4卷（Maurer, G. L. Geschichte der Fronhöfe, der Bauernhö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ände Ⅰ—Ⅳ. Erlangen, 1862—1863）。——第8、121、122、124、412、452页。

毛勒，格·路·《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厄兰根版（Maurer, G. L. Geschichte der Marken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Erlangen, 1856）。——第121、122、365、412、416、452页。

毛勒，格·路·《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厄兰根版第1—2卷（Maurer, G. L. Geschichte der Dor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ände Ⅰ—Ⅱ. Erlangen, 1865—1866）。——第121、122、412、452页。

毛勒，格·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Maurer, G. L. 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 Hof-, Dorf- und St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München, 1854）。——第121、122、365、412、452页。

米拉波，奥·加·《柏林宫廷秘史，或一个法国旅行者的报道，自1786年7月5日起至1787年1月19日止》1789年版（[Mirabeau, H. G.] Histoire secrète de la cour de Berlin, ou Correspondance d'un voyageur français, depuis le 5 Juillet 1786 jusqu's 19 Janvier 1787. 1789）。——第337、429页。

莫斯特，约·]《完蛋了！》（[Most, J.] Endlich!），载于1881年3月19日《自由》周报第12期。——第167、169、171页。

莫斯特，约·《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1873年开姆尼斯版]（Most, J. Kapital und Arbeit: Ein populärer Auszug aus „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 [Chemnitz, 1873]）。——第340页。

同上。[1876年]开姆尼斯修订第2版（Dieselbe. Zweite verbesserte Auflage. Chemnitz, [1876]）。——第340页。

N

尼基廷娜，瓦·尼·]《德国的天主教社会主义》（[Nikitina, W. N.] Le catholicisme socialiste en Allemagne），署名瓦·让德尔，载于1881年12月2日《正义报》第687号。——第233页。

纽文胡斯，斐·多·《卡尔·马克思。资本与劳动》1881年海牙版（Nieuwenhuis, F. D. Karl Marx. Kapitaal en Arbeid. 's Hage, 1881）。——第152页。

诺尔多，麦·《巴黎。真正数十亿的国家的概况和景象》1881年莱比锡增订第2版第1—2卷（Nordau, M. Paris. Studien und Bilder aus dem wahren Milliardenlande. Zweite vermehrte Auflage. Bände Ⅰ—Ⅱ. Leipzig, 1881）。——第12页。

诺尔多，麦·《真正数十亿的国家的纪事。巴黎的概况和景象》1878年莱比锡版第1—2卷（Nordau, M. Aus dem wahren Milliardenlande. Pariser Studien und Bilder. Bände Ⅰ—Ⅱ. Leipzig, 1878）。——第14页。

P

皮卡尔，莱·《圣马克街的黑幕》（Picard,

L. L'affaire de la rue Saint-Marc），载于1882年9月3日《公民报》。——第381、384、389—390页。

蒲鲁东，比·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roudhon, P. J. Système des con- 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 sophie de la misère. Tomes I—II. Paris, 1846）。——第32页。

普兰德加斯特，约·帕·《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殖民》1865年伦敦版（Prender- gast, J. P. The Cromwellian settle- ment of Ireland. London, 1865）。——第156页。

普卢塔克《比较传记》（Plutarchus. Vitae parallelae）。——第65页。

普卢塔克《马利乌斯传》（Plutarchos. Le- ben des Marius），载于《德文本日耳曼古代史史学家》一书，第1卷上半册原始时代，1847年柏林版（Die Ge- schichtschreiber der deutschen Vorzeit in deutscher Bearbeitung. Erster Band, erste Hälfte. Die Urzeit. Berlin, 1847）。——第112页。

Q

乔治，亨·《进步和贫困：对工业萧条以及贫困随财富的增长而增长的原因的探讨。补救的办法》1880年纽约版（George, H. Progress and poverty: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 of indus- trial depressions, and of increase of want with increase of wealth. The remedy. - New York, 1880）。——第184、191—193页。

乔治，亨·《卡尼在加利福尼亚的宣传鼓动》（George, H. The Kearney agi- tation in California），载于1880年8月《大众科学月刊》第17卷。——第193页。

R

若夫兰，茹·（Joffrin, J.）给盖得的信，载于1882年1月7日《无产者报》第171号。——第34、36—37页。

S

萨姆特，阿·《社会学说。论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1875年莱比锡版（Samter, A. Social- Lehre. Ueber die Befrie- digung der Bedürfnisse in der men- schlichen Gesellschaft. Leipzig, 1875）。——第193页。

沙法里克，巴·约·《斯拉夫人通信集》1849年布拉格版（Safařík, P. J. Slo- wanský Národopis. W Praze, 1849）。——第273、275页。

施拉姆，卡·《卡尔·毕尔克利和卡尔·马克思》（Schramm, C. Karl Bürkli und Karl Marx），载于1881年12月24、31日《工人呼声》报第52、53号。——第32、258页。

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Скалкинъ. В захолустьи и в столице. С.-Петербургъ, 1870）。——第8页。

T

塔西佗，科·《日耳曼尼亚志》（Tacitus, C. Germania）。——第112、113、120页。

梯索，维·《到被兼并的各国去的旅行。到

数十亿的国家去的旅行续篇和结尾》1876年巴黎版（Tissot, V. Voyage aux pays annexés. Suite et fin du Voyage au pays des milliards. Paris, 1876）。——第12页。

梯索，维·《到数十亿的国家去的旅行》1875年巴黎版（Tissot, V. Voyage au pays des milliards. paris, 1875）。——第12页。

梯索，维·《普鲁士人在德国。到数十亿的国家去的旅行续篇》1876年巴黎版（Tissot, V. Les prussiens en Allemagne. Suite du Voyage au pays des milliards. Paris, 1876）。——第12页。

梯叶里，奥·《诺曼人征服英国的历史，兼述这一征服的原因及其直到现代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大陆的后果》1825年巴黎版第1—3卷（Thierry, A. - 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de l'Angleterre par les Normands, de ses causes, et de ses suites jusqu'a nos jours, en Angleterre, en Écosse, en Irlande et sur le continent. Tome Ⅰ—Ⅲ. Paris, 1825）。——第131页。

《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德国秘密警察。文件和基于确凿材料的揭露》1882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ie deutsche Geheimpolizei im Kampfe mit der Sozialdemokratie. Aktenstücke und Enthüllungen auf Grund authentischen Materials dargestellt. Hottingen - Zürich, 1882）。——第404、430页。

W

瓦累斯，茹·（Vallès, J.）致茹·格雷维的信，载于1879年2月《法国革命报》。——第206页。

威廉一世（Wilhelm Ⅰ）1882年1月4日谕旨，载于1882年1月7日《帝国公报》。——第29、33页。

威斯特华伦，克·亨·菲·《不伦瑞克—律内堡公爵斐迪南征战记》，由斐·奥·威·冯·威斯特华伦出版，1859年柏林版第1—2卷（Westphalen, Ch. H. Ph. Geschichte der Feldzüge des Herzogs 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 - Lüneburg. Hrsg. von F. O. W. H. v. Westphalen. Bände Ⅰ—Ⅱ. Berlin, 1859）。——第235页。

威斯特华伦，克·亨·菲·《不伦瑞克—律内堡公爵斐迪南征战记》，由斐·奥·威·冯·威斯特华伦根据其遗著和斐迪南公爵军事档案编纂出版，1871—1872年柏林版第1—6卷（Westphalen, Ch. H. Ph. Geschichte der Feldzüge des Herzogs 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 - Lüneburg. Zusammengestellt aus Materialien seines Nachlasses und des Kriegs-Archivs des Herzogs Ferdinand, und hrsg. von F. O. W. H. v. Westphalen. Bände Ⅰ—Ⅵ. Berlin, 1871—1872）。——第235页。

维［尔特］，格·《今天早晨我到杜塞尔多夫去了》（W［erth］, G. Heute Morgen fuhr ich nach Düsseldorf），载于1848年7月14日《新莱茵报》第44号。——第147页。

维尔特，格·］《一八四八年吞食社会主义者的人》。（《莱茵报》的小品文）（［Weerth, G.］Ein Sozialistentresser

aus dem Jahre 1848. (Aus dem Feuilleton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载于1881年8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第147页。

沃佐夫[沃佐夫]，瓦·巴·]《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1882年圣彼得堡版（В[орцов]，В．[І．] Судьбы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С．-Петербург，1882）。——第407页。

X

[希尔施，卡·]《德国的社会主义》（[Hirsch，K．] Le Socialisme en Allemagne），署名"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载于1882年3—4月《新评论》第15卷。——第289、291页。

西门子，卡·威·（Siemens，C．W．）在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五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载于1882年8月24日《自然界》杂志第26卷第669期。——第86、114页。

西蒙，约·《国家的医学》（Simon，J．State medicine），载于1881年8月18日《自然界》杂志第24卷第616期。——第215页。

[谢夫莱，阿·]《社会主义精髓》，署名"一个经济学家"，《德国报刊》杂志抽印本，1875年哥达版（[Schäffle，A．] Die Quintessenz des Socialismus．Von einem Volkswirth．Separatabdruck aus den《Deutschen Blättern》．Gotha，1875）。——第163页。

Y

扬松，尤·埃·《俄国与西欧各国的比较统计学》1878—1880年圣彼得堡版第1—2卷（Янсон，ю．э．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статистика России 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Тома Ⅰ—Ⅱ．С．-Петербург，1878—1880）。——第152页。

《1882年财政改革年鉴》伦敦版（The Financial Reform Almanack．For 1882．London）。——第280页。

《1775年和1882年的土地国有化。1775年托马斯·斯宾斯在太恩河畔新堡宣读的一篇讲稿。1882年重印出版，亨·迈·海德门作注和序》1882年伦敦，曼彻斯特版（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Land in 1775 and 1882．Being a Lecture delivered at Newcastle-on-Tyne，by Thomas Spence，1775．Reprinted and edited，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by H．M．Hyndman，1882．London，Manchester，1882）。——第290页。

Z

扎克斯，艾·《绍林吉亚的家庭工业》1882年耶拿版（Sax，E．Die Hausindustrie in Thüringen．Jena，1882）。——第354页。

《扎林格氏交易所证券》第2（金融）部分，第7版。《1883—1884年扎林格氏交易所年鉴，银行家和资本家手册》1883年柏林版（Saling's Börsen-Papiere．Zweiter（finanzieller）Teil．Siebente Auflage Saling's Börsen-Jahrbuch für 1883/84．Ein Handbuch für Bankiers und Kapitalisten．Berlin，1883）。——第388页。

泽特贝尔，阿·《从发现美洲到现在的贵

金属的生产和金银比值》1879年哥达版（Soetbeer, A. Edelmetall-Production und Werthverhältniss zwischen Gold und Silber seit der Entdeckung Amerika's bis zur Gegenwart. Gotha, 1879）。——第312页。

文　件

《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第1卷，1881年3月30日第二十五次会议，1881年3月31日第二十六次会议，1881年4月4日第二十九次会议。1881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Ⅳ. Session 1881. Band Ⅰ. 25. Sitzung am 30. März 1881. 26. Sitzung am 31. März 1881. 29. Sitzung am 4. April 1881. Berlin, 1881）。——第175、176、178页。

《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1882年第五届第一次例会》［第1卷］，自1881年11月17日会议开幕起到1882年1月30日闭幕止。1882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V. Legislaturperiode, Ⅰ. Session 1881/82. ［Band Ⅰ］. Von der Eröffnungssitzung am 17. November 1881 bis zur Schlußsitzung am 30. Januar 1882. Berlin, 1882）。——第270页。

《反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法》（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载于1878年《帝国法令通报》（《Reichs-Gesetzblatt》）第34号。——第116、121、206、228、261、277、327、329、330、356、361、365、378、386、414、424、444页。

《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联合会的通告》1871年日内瓦版（Circulaire à toutes les fédération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Genève, 1871）。由代表大会上的汝拉联合会代表签署。——第35页。

《工人党。全国理事会》（Parti ouvrier.-Conseil national），载于1882年11月5日《平等报》第3种专刊第47号。——第104页。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1866年伦敦版（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tatuts et règle-ments. Londres, 18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99—603页）。——第369页。

《降低赎金法令》，载于1882年1月13日《泰晤士报》第30403号。——第35页。

《劳动的社会主义者的竞选纲领》（Programme électoral des travailleurs socialistes），载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24号。——第34、223、224、369页。

《劳动的社会主义者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兰斯）。分析公报》（Cinquième congrès national ouvrier socialiste de Reims. Compte rendu analytique），载于1881年11月5日和12日《无产者报》第162号和第163号。——第230页。

《联邦关于工厂劳动的法令（1877年3月23日）》（Bundesgesetz betreffend die Arbeit in den Fabriken (vom 23. März 1877)），无出版日期。——第100、104、376页。

《民法典》（Code civil），或拿破仑法典，1804年通过。——第257页。

《侵犯人身法》（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1861年通过。——第177页。

《萨克森之镜》（Sachsenspiegel）——第125页。

《刑法典》（Code pénal），1810年通过。——第11、441页。

《在同业公会法基础上制定的最新德国工商业条例，以及在维尔腾堡、巴登、巴伐利亚和亚尔萨斯—洛林实施该条例的有关法令，经修改、补充和增加，附有1876年4月7日通过的关于注册的互助储金会法，以及联邦会议通过的各项实施决定》，1882年科伦第3版（Gewerbeordnung, die deutsche, in ihrer durch das Innungsgesetz erlangten neuesten Gestalt, mit den Einführungsgesetzen für Württemberg, Baden, Bayern und Elsaß-Lothringen, den Abänderungen und Ergänzungen der Novellen und dem Gesetz über die eingeschriebenen Hülfskassen vom 7. April 1876, nebst den Ausführungs-Verordnungen des Bundesrathes. 3. Auflage, Köln, 1882）。——第100、376页。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D

《东邮报》（《The Eastern Post》），伦敦出版

—1871年12月16日第168号，《布莱德洛先生和共产主义者》（Mr. Bradlaugh and the communists）。——第139、140页。

K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

—1881年7月10日第189号，对麦·诺尔多《真正的数十亿的国家的纪事》一书第二版的评论。——第14页。

—1881年7月25日第204号增刊。通讯：《俄国》（Rußland）。——第35、52页。

—1882年4月20日第109号正刊。4月14日通讯：《君士坦丁堡》（Konstantinopel）。——第305页。

—1882年7月13日第192号增刊。7月12日巴黎通讯：《炮轰亚历山大里亚》（Das Bombardement von Alexandrien）。——第85页。

P

《平等报》（《L'Égalité》，巴黎出版

—1880年6月9日第2种专刊第21号，《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华人》

(Le patriotisme de la bourgeoisie et les Chinois)。——第397页。
—1881年12月11日第3种专刊第1号。——第244页。
—1881年12月18日第2号。——第244页。
—1882年1月1日第4号,德国通讯。——第248—249页。
—1882年1月1日第4号,巴黎通讯。——第249页。
—1882年6月11日第27号第1—2页。——第331、336页。
—1882年12月15日第4种专刊第53号,《拉法格被捕》(L'Arrestation de Lafargue)。——第125页。
—1882年12月16日第54号,《蒙吕松的审判案》(L'affaire de Montluçon)。——第125页。

Q

《旗帜报》(《The Standard》),伦敦出版—1881年3月30日。——第167页。
—1882年11月6日第18191号,登在"俄国和法国"栏(Russia and France)的星期日夜晚法兰克福通讯。——第99、101页。
—《文特诺尔的伤寒》(Typhoid at Ventnor)。——第103页。
—1882年11月7日第18192号,《帝国议会。下院。里弗斯·威尔逊先生》(Imperial parliament: House of commons. Sir C. Rivers Wilson)。——第101页。
—1882年11月10日第18195号,《帝国议会。下院。文官的职责》(Imperial parliament: House of commons. The obligations of civil servants)。——第107页。

S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苏黎世出版
—1881年1月30日第5号,《十戒》(Die zehn Gebote)。——第147页。
—1881年3月27日第13号和4月17日第16号,《弗里茨舍和菲勒克在美国》(Fritzsche und Viereck in Amerika)。——第166页。
—1881年8月11日第33号。——第206页。
—1881年9月22日第39号,《无产阶级活体解剖》(Die Vivisektion des Proletariats)。——第215页。
—1881年11月17日第47号,《为什么我们在格洛高(萨克森)遭到了失败?》(Warum sind wir in Glauchau (Sachsen) unterlegen?)。——第229页。
—1882年1月19日第4号和26日第5号,《〈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被告席上》(《Der Sozialdemokrat》 auf der Anklagebank)。——第315页。
—1882年2月23日第9号,《再论布罗伊埃尔先生》(Noch einmal Herr Breuel)。——第315页。
—1882年6月1日第23号,通讯:《法国》(Frankreich)。——第331、336页。
—1882年6月27日第31号,《关于私人的事情》(In eigener Sache)。——第398页。
—1882年9月7日第37号。——第363页。
—1882年9月14日第38号,莱比锡通

讯。——第359页。
—1883年1月1日第1号和4日第2号，《从格里伦贝格尔关于遵守反社会党人法的发言谈起》(Aus Grillenberger's Rede über die Handhabung des Sozialistengesetzes)。——第425、452页。
—1883年1月4日第2号和2月8日第7号，《谈谈自由恋爱问题。供冯·普特卡默先生在帝国国会宣读之用》(Zum Kapitel von der freien Liebe Etwas für Herrn v. Puttkamer zum Vorlesen im Reichstage)。——第425、452页。
—1883年1月11日第3号，《普特卡默和家庭的"神圣性"》(Puttkamer und die《Heiligkeit》der Familie)。——第425、452页。
—1883年2月22日第9号，《论特权的荣誉》(Von der patentirten Ehre)。——第425、452页。
《时报》(《Le Temps》)，巴黎出版
—1882年8月6日，《德国》(Allemagne)。——第79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伦敦出版
—1881年4月11日第30165号，4月10日科克通讯。——第174页。
—1881年12月29日第30390号，《货币市场和西蒂的情报》(Money-market and City intelligence)。——第247页。
—1883年1月9日第30712号，《考恩先生在新堡》(Mr. Cowen at Newcastle)。——第421页。
《统计学家》(《The Statist》)，伦敦出版—1881年1月29日第7卷第153号。——第150页。

X

《小马赛人报》(《Petit Marseillais》)，1882年5月8日。——第59页。

Z

《正义报》(《La Justice》)，巴黎出版—1881年12月7日，登在"新闻"栏(《Gazette du jour》)的悼念燕妮·马克思的文章。——第234页。
—1883年3月20日，《卡尔·马克思的葬仪》(Obsèques de Karl Marx)。——第463页。
《自由》(《Freiheit》)，伦敦出版—1881年6月25日第3年卷第26号，登在"社会政治评论"栏(Socialpolitische Rundschau)的德国通讯。——第208页。
—1881年7月30日第31号、8月6日第32号和13日第33号，《代表大会。报告》(Congress Bericht)。——第212页。
—1882年4月1日第4年卷第13号，德国通讯。——第296页。

文 学 著 作

D

但丁《神曲》。—— 第 73 页。

狄更斯《马丁·切斯维特的一生》。—— 第 174 页。

F

菲尔丁《约瑟夫·安得鲁斯及其朋友阿伯拉罕·亚当斯历险记》。—— 第 357 页。

G

歌德《浮士德》。—— 第 10 页。

歌德《狐狸—莱涅克》—— 第 186 页。

歌德《掘宝者》。—— 第 315 页。

歌德《神圣的》。—— 第 291 页。

歌德《温和的讽刺诗》。—— 第 321 页。

歌德《渔夫》。—— 第 205 页。

H

海涅《安心》。—— 第 256 页。

海涅《归乡集》，第 62 首。—— 第 55 页。

海涅《旅行札记》。—— 第 424 页。

L

兰伦德《庄稼汉皮尔斯的控诉》。—— 第 397 页。

M

莫里哀《醉心贵族的小市民》。—— 第 241 页。

缪尔纳《罪》。—— 第 431 页。

P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 第 222 页。

S

莎士比亚《奥赛罗》。—— 第 85 页。

莎士比亚《无事烦恼》。—— 第 171 页。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第 291 页。

X

夏米索《萨拉斯—伊—戈梅斯》。—— 第 433 页。

Y

伊壁鸠鲁给美诺寇的信《论道德》。—— 第 460 页。

《一千零一夜》。—— 第 284 页。

* * *

圣经。—— 第 66、121、159、327、408 页。

期 刊 索 引

A

《阿尔及利亚小庄园主报》(《Le Petit Colon Algérien》)——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1878年起每天用法文在阿尔及尔出版。——第41、286页。

《爱尔兰世界和美国工业解放者》(《Irish World and American Industrial Liberator》)——美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周刊;1870年起在纽约出版。——第233页。

B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是菲·奥康瑙尔,参加编辑部的还有乔·哈尼。1843年至1850年该报登载过恩格斯的论文和短评。——第339页。

《不妥协派报》(《L'Intransigeant》)——法国的一家报纸,1880—1948年在巴黎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主编是昂·罗什弗尔(1880—1910);八十年代是激进共和派报纸。——第81、172、220、386页。

C

《财政改革年鉴》(《The Financial Reform Almanach》)——英国的一种年鉴,工业资产阶级的出版物,1865—1904年在伦敦出版。——第280页。

D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月刊,1857年起在波士顿出版。——第193页。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第32、146页。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见《哈雷年鉴》。

《灯笼》(《Die Laterne》)——社会民主党的一种周刊,在德国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由卡·希尔施在布鲁塞尔出版,1878年12月15日创刊,至1879年6月29日停刊。该杂志曾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第248页。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英国的一家日报,1803年起在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在该党执政时期是政府报纸;1866年起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103页。

《东邮报》(《The Eastern Post》)——英国

的一家工人周报，1868 年至 1873 年在伦敦出版。从 1871 年 2 月至 1872 年 6 月为国际总委员会机关报。—— 第 139、140 页。

F

《法兰克福报》（《Journal de Francfort》）—— 一家反动报纸，1799 年至 1866 年 7 月 17 日（中有间断）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用法文出版。—— 第 234 页。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56 年至 1943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 年起用这个名称）。—— 第 234 页。

《法兰西公民报》（《Le Citoyen Francais》）—— 见《公民报》。

《法兰西共和国报》（《La République Francaise》）—— 法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日报，由莱·甘必大创办，1871 年起在巴黎出版。—— 第 12、75 页。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 德国的一家日报，1785 年起以《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的名称在柏林出版；人们以报纸所有人的名字称它为《福斯报》。—— 第 12 页。

G

《革命旗帜报。无政府主义者每日机关报》（《L'Étendard Revolutionnaire Organe anarchiste hebdomadaire》）—— 法国的无政府主义日报，1882 年 7 月 30 日至 10 月 8 日在里昂出版。—— 第 106 页。

《公民报》（《Le Citoyen》）—— 法国的社会主义日报，1881 年至 1884 年用不同名称在巴黎出版。参加编辑部的有茹·盖得、保·拉法格、艾·马萨尔、贝·马隆、阿·塞孔迪涅等人。—— 第 36、75、216、220、259、284、297、308、337、358、361、363、364、367、371—373、375、376、384—386、389—392、395 页。

《公民和战斗报》（《Le Citoyen et la Bataille》）—— 法国的半无政府主义报纸，1882 年起在巴黎由利沙加勒、马耳斯和克里埃编辑出版。—— 第 372、375、453 页。

《工人呼声》（《Arbeiterstimme》）—— 瑞士社会民主党和全国工会联合会的机关报，1881 年至 1902 年在苏黎世出版，1903 年至 1908 年在伯尔尼出版。—— 第 32、217、267、400 页。

《国际公民报》（《Le Citoyen International》）—— 见《公民报》。

H

《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和《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的简称，该杂志以日报形式在莱比锡出版，1838 年 1 月至 1841 年 6 月名叫《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1841 年 7 月至 1843 年 1 月名叫《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1841 年 6 月以前，杂志由阿·卢格和泰·艾希特迈耶在哈雷负责编辑，而从 1841 年 7 月起则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顿负责编辑。—— 第 34 页。

J

《激进报》(《The Radical》)——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周报,1880年12月14日至1882年7月在伦敦出版。——第254页。

《解放报。工人党机关报》(《L'Émancipation·Orgone Quotidien du Parti Ouvrier》)——法国的社会主义日报,1880年10月31日至11月24日在里昂由贝·马隆编辑出版。——第220、390页。

K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称在科伦出版;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十九世纪末叶与民族自由党有联系。——第14、35、52、56、85、86、98、119、121、147、305、358页。

《苦役犯》(《Le Forçat》)——法国的社会主义月刊,1882年7月14日至1883年7月7日在里尔出版。法国工人党北部联合会的机关报。——第401页。

L

《劳动旗帜报》(《The Labour Standard》)——英国的一家周报,工联的机关报,1881—1885年在伦敦由乔·希普顿编辑出版;1881年5月7日至8月6日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17、18、196、200、201、203、204、214、267、326、346、388、393、438页。

《联邦报》(《Der Bund》)——瑞士的一家日报,自由思想民主党的机关报,1850年起在伯尔尼出版。——第93页。

《两个世界的公民报》(《Le Citoyen des deux mondes》)——见《公民报》。

M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至1930年以此名称在伦敦出版;七十至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19、43、141、173、462页。

《每周快讯》(《Weekly Dispatch》)——英国的一家周报,1801—1928年以此名称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该报具有激进的倾向。——第173页。

《民意》(《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俄国的秘密报纸,民粹派恐怖主义者的同名组织的机关报,1879年10月至1885年10月出版;在俄国一些城市的秘密印刷所印刷;总共出了十二期;1881年31月1日以前,报纸的编辑是尼·亚·莫罗佐夫和列·亚·吉霍米罗夫,后来是格·亚·洛帕廷等人。——第295、304页。

N

《南德意志邮报。供全体人民阅读的独立民主派机关报》(《Süddeutsche Post·Unabhängiges demokratisches Organ für jedermann aus dem Volk》)——德国的民主主义报纸,1869年至1884年在慕尼黑出版。——第379、424、427、438—440、441、447页。

《南特的被剥削者报》(《L'Exploité de Nantes》)——法国的工人报纸,1882年在南特市出版。——第401页。

《纽约人民报》(《New Yorker Volkszeitung》)——美国的社会主义日报,1878年至1932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

第190、461页。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35年至1924年在纽约出版。——第85页。

《纽约星报》(《New-York Star》)——第197页。

P

《平等。社会主义杂志》(《Równość. Ega-lité. Czasopismo socyjalistyczne》)——波兰的社会主义月刊,1879年至1881年在瑞士(日内瓦)出版。——第265页。

《平等报》(《L'Égalité》)——法国的社会主义周报,1877年由茹·盖得创办,1880年至1883年为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该报断续地分为六种专刊出版:第1、2、3三种专刊每周出一次(共出过113期),第4和第5两种专刊每天出一次(共出过56号)。本应每周出一次的第6种专刊在1886年只出过一期。每一种专刊都有它的刊名。八十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36、38、98、99、104、106、109、113、116、118、121、125、131、219—221、224—226、230、244、248、249、259、267、284、286、296、297、319、326、331、336、346、361、367、376、381、385、386、391、392、395、397、400、401、403、404、408、411—413、436、441页。

Q

《旗帜报》(《The Standard》)——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7年创办于伦敦。——第19、30、68、99、101、103、107、167、273、275页。

《前进报》(《Vorwärts》)——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1876年10月起在莱比锡出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该报于1878年10月停刊。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帮助该报编辑部。——第331、445页。

R

《人民。社会主义者评论》(《La Plebe. Rivista socialista》)——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月刊,1881—1882年在米兰由恩·比尼亚米编辑出版(作为《人民报》的新丛刊出版)。——第127页。

《人民报》(《La Plebe》)——意大利的一家报纸,由恩·比尼亚米主编,1868年至1875年在洛迪出版,1875年至1883年在米兰出版;在七十年代初期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后来是社会主义派的报纸;1872—1873年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支持总委员会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发表过国际的文件和恩格斯的文章。——第118页。

《人民报》(《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抱有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第338页。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

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第153、331、445页。

《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Journal de Genève national,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保守派报纸，1826年开始出版。——第89、92、364页。

S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卡·赫希柏格（路德维希·李希特尔的笔名）于1879—1881年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改良派的杂志；该杂志共出3册。——第101、328、329、338、445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年至1880年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年至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地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并纠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第104、119、146162、166、169、175、176、205、206、211、215、229、248、256、258、259、270、295、307、308、315、327、331、336—338、345、355、356、359、363—365、376、377、381、382、386、387、390、395、398、404、412、425、428、441、442、445、447、452、453、463页。

《社会主义评论》（《La Revue socialiste》）——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可能派的贝·马隆创办的月刊。先是共和社会主义的刊物，后来是工团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刊物；1880年在里昂和巴黎两地出版，1885年至1914年在巴黎出版。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第397页。

《审判报。汉堡、阿尔托纳及其郊区的日报》（《Gerichts- Zeitung. Tageblatt für Hamburg, Altona und Umgegend》）——德国一家社会民主党的日报，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机关报，1878—1881年在汉堡出版。——第378、387页。

《时报》（《Le Temps》）——法国一家保守派的日报，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刊物；1861年至1943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对第二帝国，反对同普鲁士作战；在第二帝国复灭后支持国防政府。——第60、75、79页。

《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英国自由派的月刊；1877年至190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900年起改名为《十九世纪及以后》（《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从1951年起则用《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名称出版。——第194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74、247页。

《太阳报》（《The Sun》）——美国一家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1868年起在纽约由查

理·德纳编辑出版；1875—1883年由约翰·斯温顿编辑出版；一直出版到1950年。——第167页。

《统计学家》（《The Statist》）——英国保守派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周刊，187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50页。

W

《外国警察报》（《Foreign Police Gazette》）——1882年在伦敦出版的一家警察报纸。——第404页。

《未来哲学。唯理论社会主义评论》（《La Philosophie de l'Avenir. Revue du socialisme rationnel》）——法国的一种月刊，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刊物，1875年至1900年在巴黎出版。——第192页。

《无产者报》（《Le Prolétaire》）——法国的工人周报，1878至1884年在巴黎出版；八十年代初法国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即所谓可能派联合在《无产者报》的周围。——第35、36、38、39、99、105、111、118、119、220—222、226、230、231、249、259、267、331、336、383、385、392、400、453页。

X

《先驱者》（《Le Précurseur》）——瑞士的社会主义杂志，1877—1887年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由约·菲·贝克尔负责编辑。——第166、409页。

《现代评论》（《The Contemporary Review》）——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月刊，1866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11、239、253页。

《现代思想》（《Modern Thought》）——英国资产阶级的关于宗教、政治、伦理学、科学和文学问题的进步月刊，1879—1884年在伦敦出版。——第240、242、253页。

《小报》（《Le Petit-Journal》）——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日报，1863年起在巴黎出版。——第286页。

《小法兰西共和国报》（《La Petite République Francaise》）——法国的激进共和派日报，1875—1893年在巴黎出版。——第286页。

《小马赛人报》（《Le Petit Marseillais》）——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日报，1868—1944年在马赛出版。——第59页。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Concordia. Zeitschrift für die Arbeiterfrage》）——德国大工业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刊物，创办于1871年，在柏林出版到1876年。——第153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1848—1849年德国革命时期民主派中革命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第147、464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杂志，该杂志由他们一直出到1850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1850年3月出第1期，总共出过6期。——第258页。

《新莱茵报评论》（《Revue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见《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新评论》(《La Nouvelle Revue》)——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杂志,由茹·亚当创办,187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289、291页。

《新时代》(《Die Neue Zei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年至1890年10月在斯图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是卡·考茨基(1883—1917);1885—1894年恩格斯曾为杂志撰稿;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杂志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第398、431页。

Y

《言语》(《Слово》)——俄国自由派的文学和科学通俗月刊;1878年至1881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第148、149页。

《夜晚报》(《Le Soir》)——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日报,1867年起在巴黎出版。——第139、140、141页。

《邮报》(《Post》)——见《东邮报》。

Z

《战斗报》(《La Bataille》)——法国左翼激进派的日报,由普·利沙加勒在巴黎编辑出版,从1882年起(断续地)出过两辑。——第284、319、336、358、359、363、364、371页。

《正义报》(《La Justice》)——法国的一家日报,激进党的机关报,1880年至1930年在巴黎出版;在1880—1896年期间,领导该报的是报纸的创办人若·克列孟梭,在这一时期,报纸是所谓"极左派"即坚持个别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纲领而反映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党左翼的机关报;1880年7月11日大赦之后,沙尔·龙格成了该报编辑。——第10、12、94、100、104、148、174、183、187、233、234、284、291、359、363、364、372、373、412、423、463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政变以后成了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七十至八十年代该报具有保守的倾向。——第75页。

《自然界。每周科学画报》(《Nature A Weekly Illustrated Journal of Science》)——英国的一家自然科学杂志,1869年起在伦敦出版。——第215页。

《自由》(《La Liberté》)——保守派的晚报,大资产阶级的喉舌,1865年至1944年在巴黎出版;1870年至1871年巴黎被围期间先后在图尔和波尔多出版。1866年至1872年属艾·日拉丹所有,支持第二帝国的政策,主张对普鲁士作战,反对国防政府。——第139页。

《自由》(《Freiheit》)——德国的无政府主义派的周报,约·莫斯特1879年在伦敦创办;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莫斯特和他主编的报纸所发表的无政府主义言论。后来,该报在比利时(1882)和美国(1882—1910)出版。——第169、173、197、208、212、296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保守派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

至 1882 年在奥格斯堡出版。—— 第 271 页。

《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я записки》）—— 俄国的一家文学政治杂志，1820 年至 1884 年在彼得堡出版，后被沙皇政府封闭。维·格·别林斯基参加过该杂志的编辑工作（到 1864 年），亚·伊·赫尔岑等人曾为它撰稿；1868 年该杂志由尼·阿·涅克拉索夫和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负责编辑；杂志把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聚集在它的周围。涅克拉索夫逝世（1877 年）后，民粹派对该杂志取得了占优势的影响。—— 第 148 页。